

# 刘 倩：血 殇——中国河南 HIV/AIDS 报告

河南社会科学院 刘 倩

## 自序

那一天我受人之托带给高耀洁先生一本关于艾滋病的书。高耀洁教授是妇科专家，多年从事性病和艾滋病防治和研究。我电话联系她，她很客气，说太麻烦你了，我派人来取。之后电话给我，说是书收到了。然后就问，你们社科院是干什么的？河南艾滋病的情况你们了解吗？——绝无责难质问之意，只是询问。但这询问竟使我无言以对。我很惭愧。我说，只是听说一些，并不了解。她马上说，我派人送一些资料给你。资料很多，其中有两本高先生的著作，还有几期活页，不是一份，而是几大捆。这些全是高先生自费出版印刷的宣传防治艾滋病的资料。高先生又电话给我，说，你们社科院水平高影响力大，这些资料从你们那里发放出去效果会更好。我认真拜读了高先生的著作和所有资料，除了感动崇敬之外还有震惊。我没有想到社会上还有这样一批为数不少的弱势群体，完全不是由于自身的过错而陷于悲惨绝望的境地，他们就在我们身边，我却一无所知。而当时年逾七旬的高耀洁先生，为此奔走呼吁不遗余力救治救助倾其所有已经整整 5 年。我更加惭愧，不单是因为无知。

我开始散发高先生送来的资料，非常认真而且内心怀着一份神圣。高先生说，这些资料只要识字就能看懂，人们现在对艾滋病的认识存在极大的误区，只是恐惧并不了解，只有了解艾滋病才能防治艾滋病，知识是最好的疫苗。我知道这些资料都是高先生的心血。我惟恐有负使命。但是我很失望。即使是知识圈内的人们，一听说是艾滋病，便显出不耐与不屑，虽然接过了资料，事后一问，便知道很少有人认真去看，因为他们大多对艾滋病依然是那般自以为是的无知，对艾滋病人也依然是那般冷漠鄙夷。

之后，我见到了高先生，听她讲述一些艾滋病村庄的惨状，她的调查，她的忧虑。还看到一些照片，触目惊心。那些因当年卖血而染上艾滋病的农民正在一个一个地死去，他们留下的孤儿将陷入更加悲惨的境地。显然，这已经不单是医学所能够解决的问题了，这更是社会学的问题。在场的还有其他几位朋友，其中有位记者，也曾亲临艾滋病村现场采访，写过很有分量的报道。她说，我真希望有机会学习社会学，然后专事中国的艾滋病研究。我完全听懂了他们的话外之音，我明白大家的意思。

但我一直很犹豫。因为我已经不止一次告诫过自己：我们这代人够麻烦的了，还总是过高估计自己以天下为己任，活得沉重而于世无补。生活中有那么多美好的事物，干嘛偏要面对现实中的残酷？我不想再承受沉重。

但是，终于，这一次，我还是无法背过脸去。也许因为高先生，也许因为我是社会学者，也许还因为其他。

于是有了此后的一番经历，有了这本书面世。

作者

2009年春季于郑州

## 目录

### 自序

### 本书主要人物一览表

### 导论：本书写作的立场和方法

- 一 学者立场
- 二 研究方法
- 三 文本架构
- 四 资料来源
- 五 必要说明

## 第一章 银庄<sup>①</sup>故事

### 一 经济地理和即时疫情

B镇政府疫情报告

驻村工作队报告

Q县政府报告

民间传闻

现场调查

补记

### 二 进村印象

坟墓包围着的村庄

“最困难户”

“村里资格最老的解放军”

两个老党员的家

院墙、房屋山墙被打洞

---

<sup>①</sup> 遵循学术惯例，书中地名、人名皆为化名。

卖血的女人

在村卫生室

### 三 祸起：这里曾经发生了什么？

到处兴起血站

Q县血站：“爱站敬业，人人献血”

村支书家开血站

当地卫生官员述说当时情况

村中唯一的研究生述说当时情形

### 四 银庄村卖血史

卖血的历史

银庄最早的卖血人

“滚雪球一样”卷入卖血风潮

一家三代卖血

村医的分析

“卖血的背景”

### 五 “无名热”与艾滋病

宣布流行“无名热”，1998年5月

最早死亡的艾滋病病人，1998年，1995年？

艾滋病：村里公开的秘密，1999年

银庄最早确证的艾滋病感染者，外省遣送回村，1997年11月

最早发现艾滋病毒的时间，“上海打回来艾滋病血浆”，1992年10月

“现在村里是公开了，对外还是不公开”，2005年12月

事件梳理

### 六 村中几件“重要大事”

“健康体检”

卫生厅长与“一体化卫生室”

小插曲：美国“女记者”与“神药”双汰芝

卫生部长与“五个一工程”

建校事件与修路

### 七 上访与“闹事”

村民最初反映艾滋病的事，“要签名按手印”

村医、村支书最早的反映信

发往各级领导的上访信

行政村党支部村委会的紧急报告

控告血站非法采集血液罪

找血头算账！

集体上访省城、北京

一位接访的县公安局警察：“真的很可怜”

主管县长：“他们快死的人了，神经不正常”

## 八 7.15 事件：“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一天砸三场

没想到会“捺人”

万家乐“闹事”升级到“案件”，6人判刑

城管大队打人事件不了了之，1人死亡

是非曲直黑白莫辨

村口的麦草人

## 九 在历史中行走

艾滋病村的春节

艾滋病人的葬礼

走过历史，记录历史

## 第二章 在大的时空背景中：全球经济一体化与中国社会转型

### 一 在世界大格局中的河南艾滋病

世界-中国-河南

河南与艾滋病的传播蔓延

信息真空期 1985-1995-1999

非同寻常的 2000-2001

形势急迫而又关键的 2002-2003

紧张激烈充满玄机的 2004

### 二 相关文献研究

卫生系统的“问题”报告

孙永德和苏惠存

张可与高燕宁

社会科学界研究

### 三 影响河南艾滋病局势的关键人物和事件

王淑平：第一个报告河南艾滋病疫情的医务工作者

高耀洁：民间防艾第一人

桂希恩：一个教授做的 5 年，可以影响中国 500 年

曾毅：最早对中国艾滋病发出警示的权威专家

“3.14 案件”

文楼村的标示性意义

马士文与“机密文件”

### 四 几个基本“概念”的事实描述

数字：统计数字与关于数字的现场调查

全采与单采

艾滋孤儿与艾滋病孤儿

血价：中原农民的血，是价格最低廉的

血头：一个内涵和边界含混不清的概念

“房子”：话语表达与理解的错位

艾滋认知的误区

### 五 河南艾滋病与 NGO

香港智行基金会

台湾关爱之家

爱德基金会

正生学校

无国界医生组织

李丹与东珍

亚洲博爱救助基金会

国际 NGO 的渗透与“阻隔”：全球基金、武汉会议与其他

NGO 的作用与困境

## 六 政府行动

来自上层的声音与政策思路

河南省政府部门：困境中的“标本”

### 第三章 银庄故事继续

#### 一 村庄的行政

三任村支书

三任工作队

大家族与村中长老

村民代表与艾滋病人代表

“管闲事”

#### 二 治疗的管道：摸着石头过河

救治政策与药品的流失

艾滋病五级防治体系：形同虚设

抗病毒治疗： 依从性教育不到位效果不理想

民间“游医”：评价不一

#### 现场采访

历年病患举例

北京大医院的药物临床试验：官耶？民耶？

#### 三 村庄的变迁

婚姻

“组合家庭”

“迁入”与“迁出”

“流落在外的人”

#### 四 故事经典

“艾滋病你想得也得上，艾滋病在美国哩！”

“打哄哄去卖三四个，染上艾滋病”

“我卖血能卖得不要命，……还差一点卖皮哩！”

兄弟情深：“我手上拴根绳子，要我哥拉着……”

天天是给艾滋病“打仗”哩，“它天天跟着我，打倒我几回了”

“演电影”

红丝带的故事

药价风波

麦种的故事

最“过瘾”的两场事

“卧底”与“奸细”

“管闲事”：谁来主持公道？

一些事不大，“管”大了

一场全村艾滋病患者座谈会

## 五 “造假”

假药

假本子

造假连环套：户口的故事

习惯性造假：艾艾的演讲

造假的惯性：“旋耕”着火麦地

真真假假：一级哄一级，一级压一级

## 六 “走进来”与“走出去”

走进走出的通道，并非媒体记者

刘子亮：最早“走出去”与最早“走进来”

张可的“点”与“联系人”

上海学子对艾滋病村的一线调查

北师大“农民之子”与登上大学讲台的农民感染者

编织希望与上海学艺

狭窄的甬道与被“屏蔽”的世界

## 七 “上头来人”

上头来人与对应的程式

省里大验收

“做局”：不要只相信你的眼睛

## 八 轮回？

非法生产烟花爆竹：“宁可炸死，不愿饿死”

依法查处：矛盾的集合点

卖血与做炮

在劫难逃

## 九 草之根

“草根组织”之于银庄

关爱之家与希望家园

草根的民间往来与社会支助

博弈与磨合：草根-政府-NGO

银庄经验：草根组织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

可昆的愿望：要生产自救，有尊严地活着

华中的愿望：拍一部片子，叫全世界感动

## 第四章 相同和不同的故事

### 一 银庄周边村庄的故事

“村小人口少，感染比例高。”

“妻输血感染艾滋病，又感染了我”

“俺庄散，没照住，最后才叫吃药”

### 二 周边县市的故事

全省唯一注册的艾滋病民间组织

河南最后通过法律途径判决的艾滋病医疗纠纷案

办血站的副院长得了脑溢血

“制造打倒”、“碰碰”、“讨债”

我认识的一个“血头”

### 三 上蔡县的故事

后杨村：疫情最严重的艾滋病村庄

王营村：情况最惨的三家

疙瘩李：偏远小村，疫情反映不出来

张宇村：那时候不让卖血都制止不住，就手交罚款

南大吴村：村民状告村支书

上蔡贪得最严重：出租车司机放鞭炮，县委书记被双规



马深义：人活着要争口囊气，要把家庭弄好

#### 四 走访市、县卫生防疫部门和定点医院

##### K 市

疾控中心座谈

大办单采血浆站的国内外背景

发生这两件事，才意识到艾滋病是单采浆引起的

早就发现单采浆传播丙肝

最初艾滋病例的发现都在外面

艾滋病检测从 1998 年就开始了，估计当年感染不在少数

关怀理解沟通很重要，他们的过激行为，也是因为对他的歧视

卫生部敦促河南查清艾滋病疫情

输血感染是还不敢招不敢惹的一块，将来“发了”，政府才被动哩！

艾滋病工作三大体系：疾控、救治、帮扶

“天是一个天，地是一个地，为啥他那就比我们这好？”

##### Z 市

“打破坚冰”

吴仪来河南很生气，说血头血霸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是杀谁呢？

摸清底子，救治救助

河南艾滋病性传播情况尚属盲点

连省里医疗队都不敢接触艾滋病病人，社会总体上对艾滋病缺乏认识

要落实基层医生待遇，否则艾滋病病人用药就划价高

上面来人，不能理解我们基层人员的苦衷

一部未出版的小说创作

##### S 县

即时疫情

卫生系统搞第三产业，美国也要咱的血，全地区建 30 多个血站

最初发现艾滋病病人，“跟红灯记一样，单线联系”

桂希恩来政府不喜欢，郑锡文采血样底下人也糊弄他

政策很难到位，关键在于可操作性，经费不好落实

医生没有安全感，公安部门不愿管

县乡医院生存发生危机

用药无制度浪费大，“闹人孩子多吃奶”是误区

由艾滋病引发的社会震荡

我们现在是忍辱负重为政府分忧，是政府的一道墙

定点医院

某县人民医院

某县中医院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高法民事审判庭口头通知，输血感染的艾滋病案件不予受理

## 五 黑龙江省北安建设农场艾滋病民事赔偿案

黑龙江输血感染艾滋案受害人获逾千万元赔偿

刑事审判北安农垦法院宣布开庭，民事赔偿立案黑龙江高院受阻

了犹未了：“和解”，究竟谁埋单？

医院再也不敢收治危重病人：在以前，这样的病例我们完全能抢救过来

被告方律师：和解而非判决的方式使这一案件并不具备法律上的标本意义

深层背景：事件背后的另一面，“血鬼”？

## 第五章 故事背后的故事：被“嵌住”的

### 一 进入疫区

第一步：集体受命

第二步：单独行动

第三步：“嵌入”调查地

### 二 从“天下无贼”到“转入地下”

失灵的“尚方宝剑”

“地下工作”：零距离接触

盘根错节：复杂微妙的关系

村主任“掏心窝”的话

艾滋病村寒冷的冬季

### 三 一次自上而下的调研

热烈欢迎全力支持积极配合

卫生局的“新思路”：给艾滋病人的药品加价，用来解决医生的待遇问题

听说你在那时间很久了，都不敢见你

都没公开，那都是为你们的调查开座谈会“专意培养的典型”

正开两会，四大班子调整，“政治敏感时期”，都怕惹事

我们怕追问是谁接待的你

艾滋病的事不准宣传不准报道不准调查不准研究，对艾滋病的打击力度要比平常人大

#### 四 给省委省政府的报告

递交报告

王百姓与省市调查组

派出所长夜访，请求撤回报告

调查组旗帜鲜明的表态：彻底清查，严肃处理

省调查组长：群众情绪很激动，执法确实有问题

市调查组长：令人震惊，想不到群众处境那么困难

K市局长：组织联合工作组进村，彻底清查，严肃处理

一夜之间风云突变

谁想把村里搞乱？

结果……

补记

悖论怪圈

#### 五 一场被取消的学术报告

报告题目：用脚做田野，用心写文章——我的艾滋病课题研究

我知道的比你多，但是敏感问题，不能说

换个题目，讲南街村吧

你是资深学者，要注意影响

#### 六 国务院检查组来了

工作队长的电话：刘教授你在哪里？我们要多联系……

镇党委书记发难：我代表一级党委政府，你代表谁？

人事处长电话：立即回来！

村民：这回一定得给你“扳平”！

省委组织部下死命令：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她弄回来！

国务院来人之后

红丝带故事的演绎版本：我们在哪里被“嵌住”了？

## “大结局”

一个被忽略了的重要情节，1963、1978—1999

科学家的夙愿与采浆术：单采血浆中国推广第一人

“潘多拉魔盒”：血瓶与手铐

暴利之下的疯狂：以血致富

最早的警讯：1994, 1992？

谁之罪？

## 尾声

## 结语 田野实践与反思

进入田野才是第一步，离开田野比进入田野更难

历史的“罗生门”与“通天塔”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本书主要人物一览表

栗卫华：银庄村主任，村党支部书记。

栗可昆：前任银庄村党支部书记，Q县红丝带自救组织负责人，开办希望家园收养艾滋孤儿。

栗可领：前任银庄村党支部书记，“在家开血站”，“血头”，艾滋病上访代表。

栗昭：村医，受聘于B镇卫生院，银庄最早发现并上报艾滋病疫情的乡村医生。

栗中祥：村医，张可医生的联系人。

栗树东：村医，后任村卫生所所长。

栗海华：村医，曾在县血站当化验员。

牛延东：滩头村村民，感染者，最早的艾滋病人上访代表。

栗千臣：滩头村村民，银庄最早卖血人，“血头”，早期艾滋病人上访代表，2003 年艾滋病死亡。

栗新臣：滩头村村民，曾在县血站当炊事员，最早的艾滋病上访代表。

栗可运：栗庄村村民，感染者，第一批上访精英，2003 年死亡。

栗中才：栗庄村村民，感染者，第一批上访代表，2003 年死亡。

栗五营：栗庄村村民，感染者，第一批上访代表，2003 年死亡。

栗华中：栗庄村村民，艾滋病感染者，艾滋病自救小组负责人。

栗可贤：栗庄村村民，艾滋病感染者，多次组织带领感染者到北京做艾滋病药物临床实验。

栗老五：栗庄村村民，艾滋病感染者，多次组织上访北京。

栗长山：栗庄村村民，艾滋病感染者，多次参与上访。

柳桂枝：栗庄村村民，第一个登上大学讲坛的农民艾滋病感染者，编织希望小组负责人。

栗松才：滩头村村民组长，艾滋病感染者，早期艾滋病上访代表。2007 年发病死亡。

栗 因：滩头村村民，艾滋病感染者，曾在县血站当炊事员，后接任滩头村组长。

莫昭红：莫庄村村民组长，早期艾滋病上访代表。

栗可栋：银庄村老党员，早期担任过行政村副支书，村民代表。

栗可顶：栗庄村村民，德高望重长者，村民代表。

诸恒昌：滩头村村民，老民办教师。

夏 新：B 镇前任党委书记。

张 华：B 镇前副书记，早期兼任银庄党支部书记。

张 明：B 镇党委书记。

李 广：B 镇卫生院院长。

萧 峰：B 镇卫生院副院长，防疫站站长。

于 安：B 镇派出所所长。

龚志宾：Q 县中医院院长，县血站站长。

郑 明：Q 县卫生局长。

王新民：项城县私人血站站长，在银庄建采血分点。

民 民：滩头村村民，1992 年 10 月，最早被查出血液中感染艾滋病毒，2002 年发病投塘自杀。

栗海军：滩头村村民，银庄最早确证的艾滋病感染者，1997年11月，从山东烟台被遣送回村。

诸老二：滩头村村民，一家三代卖血6人感染艾滋病，本人卖血到1998年，2007年艾滋病死亡。

栗合香：栗庄村民，1998年4月死亡，银庄被查明的最早死亡的艾滋病人。

牛俊方：滩头村村民，艾滋病感染者，7.15事件首犯，被判刑。

牛俊营：滩头村村民，7.15事件被判刑。

栗留安：栗庄村民。艾滋病感染者，7.15被城管大队打伤，重病卧床，2006年死亡。

高布袋：高庄炮厂老板，艾滋病感染者。

## 导论：本书写作的立场和方法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是一个沸腾的时代，到处充满生机活力，充满机会机遇。但是，一个叫做“艾滋病”的幽灵，搅扰得官方民间惶恐不宁。它在似乎突然之间长出了新的高楼大厦而变得难以区分了的城市中徘徊滞留，也在茅屋田野或者茅屋换了瓦房、田野竖起了楼房的乡间盘桓游荡。<sup>①</sup>这种海外“舶来”的疾病几乎波及中国所有省份震惊朝野上下，这场被称作“世纪瘟疫”的灾难，对于中国社会已经发生和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自己当代文化的许多方面，大概也可以称之为预示性的惊颤，正战战兢兢地为我们所要创造的那个社会提供目前还难以解读的信息。”（孔飞力，1999）那么，艾滋病，这场跨越两个世纪尾首的全人类的大灾难，对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为我们正在行进中的社会提供着什么样的信息？这一殃及千百万人生活生命的大事件，在中国的历史文本中该做如何的记录和解读？

### 一 学者立场

我坚持学者的立场。我坚持认为，学者当有自己的学术定位，当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品格。而我们的立场只能站立在真实一边。克服惯式思维的偏性，克服非学术因素的困扰，担当自己的角色职责，才能体现学术自身存在的道理，为学为文才有价值。

基于这个立场，我坚持说真话。求真求实是科学研究的基石，真实是我的绝对真理。我以为对当下中国的社会研究而言，一部真实的史实记述文本比一部宏观理论专著更为重要；

<sup>①</sup> 国内最早发现感染艾滋病毒的人员中，有吸毒者、农民献血员，也有河北省老干部。

展示呈现正在演进中的社会历史，揭示社会的真相，是当今知识分子首要的责任担当。在这里，我是把艾滋病这场灾难当作人类历史中的一个大事件来看待的。这是一个大悲剧大历史，应当属于全人类的记忆。就像犹太人记忆大屠杀，美国人记忆“9.11”，世界人民记忆二战、记忆奥斯维辛。记忆这些灾难和痛苦的历史，是为了历史不再悲剧。

研究真问题书写真历史，这是我对自己的期许。任何研究都不可能完全排除作者的价值关怀，但是这种价值关怀不应妨害到事实表述的中立和客观。如果说本书叙述中有什么价值倾向的话，那就是我至今还深以为然的五四开启的新价值：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独立精神、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每一个人都有权力走进历史，在这场全人类的大灾难里，河南农村爆发艾滋病这一历史性大事件，是我研究的主题，其中大批农民感染者——这社会最低层最苦难的一群，是我书写的主角。我要为在这场灾难中死亡的人立文正名，把他们的名字篆刻在我们民族的历史里。在这里，他们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不再是自生自灭的“无名者”。为了生存的权利和活着的尊严，沉默者不再沉默，无名者不再无名。诚如英国学者毛姆所言：“只要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教堂天顶上画出那些人像，只要莎士比亚写出了那些台词，以及济慈唱出了他的颂歌，数以百万计的人便没有白活，没有白白受苦，也没有白白死去。”我以为，这也是所有文字书写的最高目标和终极价值。世代相传的经典之作，它们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它们“是人类经受种种苦难艰辛和绝望挣扎的最后证明。”由此，人们洗涤自己的灵魂，升华自己的精神，光明自己的世界，挣脱此岸的苦难渡往彼岸乐土。

## 二 研究方法

这是一项对艾滋病流行的社会学研究。当下中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理论依据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由外而内的美国和西方社会学理论，自上而下的国家政策的解读阐释。而少有缘自本国本土和学术自身的，由内而生、自下而上的学理创建。本书深入田野的研究路径与历史叙述的写作方法，或许会对中国社会学自身实践与理论建设做出一份贡献。

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田野调查，并以历史叙述的方式，展现河南农村爆发艾滋病这一严酷的事实，所采用的，除了社会学，还有人类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关于河南艾滋病的叙述，在现实中早已流传着几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来自坊间的对艾滋病的恐惧；一个是应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对于艾滋病问题的不同姿态和策略；还有一个是适用于国际社会以及各类NGO的介入与干预。这些各种版本的故事，都是不同力量出于各种动因对艾滋病事件的理解、阐释、演绎与“重构”；这些故事在同一时空互相重叠交合勾连，并在“重构”中推动故事

继续演进。

本书所要记述的，是河南农民艾滋病人自己讲述的一段历史。它虽然出自研究者之手，但是研究者并不企图充当“代言人”，而是希望当事者本人“发声”。它是直接来自田野的故事。旨在增强政府、学界、联合国机构对民间视角特别是底层边缘社会的重视，依据民间的经验和观点来提供事实、数据和分析，以补充修正以往人们对中国艾滋病事实的认知，也照亮河南农民艾滋病人自己。这几乎完全是一种立足于民间和基层实践的自下而上的视角，有其局限性，但是保持了一种“在地”的真实。

当下学界许多人在追求“理论建构”和“学术发现”，但是我却企望以历史的原生型态使人们感知“社会实在”，体察理解历史的真实进程。面对大量庞杂的一手资料，我也常常会生出一种理论的冲动，企图设计或是利用某种理论去“结构”“框架”“阐释”它们，使之变得清晰条理更具“理论的品格”。直到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当时我正在村里做调查，电话是一位在读社会学博士打来的，他说想就河南艾滋病问题作博士论文，他的导师建议他与我联系，希望得到帮助，他的导师是一位学界颇负盛名的权威专家。从他乡音未脱的普通话里，我一下就辨识出他河南老乡的出身，一问，果然。而且当时他正在家乡。我知道当地也有不少艾滋病村庄，建议他利用机会作一些田野调查。但是他对作田野不感兴趣，他说多年读书在外对家乡并不了解，导师的意见，不作描述性的研究，“描述性研究已经太多了”，还会被国外利用，使政府不高兴。要作“经济方面的宏观理论的”研究。“如果必要，就到文楼去一下，那里典型，政策多。”<sup>①</sup>约我“回郑州时联系见个面”，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一些“政策文件”。开始接到电话我很高兴，我很希望年轻一代学者参加进来。而电话后我很失望。这就是学界研究吗？他的导师一定要把他培养成一个忘了“根本”的“纯粹”的做“宏观理论”的博士吗？我不相信脱离社会实际能做出什么“宏观理论”。于是当机立断，再次调整自己的研究思路，下决心回到我历史叙述的初衷：实录，真实记录一段历史。并企望在对真实历史的书写中，寻求中国社会学自身方法和理论的突破。

本书将通过中原农村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经存在的长达30多年的卖血历史和90年代中后期开始爆发一直延续至今的艾滋病疫情的具体展现，研究农民艾滋病人群的社会处境；揭示一场重大的灾难性事件发生的前缘后果；探究其发生过程中国家、地方政府、农民百姓是如何行动的，以及他们行动的“实践逻辑”；进而探讨在国家社会转型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双重背景下，国际社会力量的渗透介入对这一切所发生的影响，以及其间各种力量碰撞

---

<sup>①</sup> 之后他又有电话给我，说果然去了文楼村，但他是失望，“几乎什么资料也得不到。”最终，他放弃了这一选题。文楼是第一个曝光的河南艾滋病村庄并因此而著名，详见第二章之四。



交融的互动关系。

“社会”“历史”这些概念，如果没有大大小小的事件构成，就只能是无法感知的抽象概念。中国社会，特别是社会关系盘根错节的中国农村社会，只有通过对其发生其间的一个个看似偶然的事件，特别是矛盾冲突激烈的大事件，才可能看清其“实在的”存在。正如塞威尔所强调的，只有从事件性的角度去理解以及对事件作具体分析，才能恰切地理解具有很大偶然性的历史进程（塞威尔，2001）。艾滋病是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场人类历史的大事件。而发生在中原农村的艾滋病事件，对于理解认知当下处于社会转型和全球化双重背景之下的中国改革，有着特殊深刻的“解释”意义和价值。

都说河南艾滋病“太政治”“太敏感”，而这正是其特色独具之处。正是由于它的“政治敏感性”，使之具有成为一个可以操作的“政治的符号”的可能。在河南艾滋病问题上，既可以生产“政治的资本”，也可以制造“政治的罪名”。它是一柄双刃剑，握其柄者既可伤人也极易自伤。这一切使其更具学术研究的“实用价值”，并使研究更具政治的社会的实践意义。贯穿这段历史的主线是围绕中国艾滋病事件各种势力的博弈，其中必然述及的有：围绕河南艾滋病事件，中国政府面临的内外舆论压力和处于上下夹层中的地方政府所面临的困境，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力量对中国社会的渗透与影响，以及社会转型中那些相关群体与机构在内外矛盾碰撞中的内耗和重组。本书所述全部来自现实中真实发生的艾滋病事件，而事件本身又有其之所以发生的背景、缘由和过程。其间的经验事实所传递出的信息量非常丰富，从中可以发掘发现的东西太多了。而一些潜隐于情节和细节表象之下的信息的意义和价值，也许我们当时并不能完全理解，甚至一时无法发现感知。因此，以历史叙述的方式对这一重大事件作学术的研究，除了可以提供开放式的多角度思考阐释的可能性，其重要的意义还在于：最大限度的保存信息，为之后进一步的认知与深入研究留出空间余地。记叙中原农村艾滋病事件这一大故事，使这一段历史变得清晰可见可触摸可感知，尽可能地保存第一手现场资料，是本书写作的方法，也是本书写作最重要的目的。

### 三 文本架构

本书以银庄发生艾滋病疫情为主线，分为五章架构故事文本部分。第一章，直入故事发生的场境，以一个个艾滋病家庭和人的生存状况，画出故事的“轮廓”；再以一场场事件，勾出故事的“脉络”。它既是事件的“现在”的场面，又是已经发生过的“过去”的结果，同时还在“发生、演进”之中。其间穿插发生的故事尽可能保持原生样态，基本上按照时间顺序，通过当事人的追述，展现事件发生的原由和演变的“线型”轨迹，它是已经发生过的

故事，是银庄故事的“过去进行时”。这一章很重要，厘清银庄这段故事的脉络，也就基本厘清了河南农村艾滋病事件的这段历史。第二章，将银庄村的故事放置于社会转型与全球化的大背景中，讲述“共时态”中银庄外部世界同时发生的故事，在各种力量的交汇撞击中，凸现这场似乎由各种“偶然”“个然”构成的灾难性事件中的“必然”与“普然”，以及河南农村艾滋病人群极端弱势的底边处境。第三章，回到银庄，讲述银庄正在发生的故事，揭示一种规律性的在劫难逃的“轮回”，这是过去故事的演进，银庄故事的“现在进行时”。第四章，讲述银庄之外发生的大同小异的艾滋病故事，漫出银庄乃至河南地界场域之外，是艾滋病故事的拓展，也是在更大的视野中的掂量比较，在纵横交错纷繁复杂的关系中对事件的深层透视。第五章，讲述故事背后的故事。所有故事角色要素，均在这一章登台亮相，是对整个事件“切体”而又整体的把握。在纵横交错纷繁复杂的关系中，被“嵌住”的，何止是“我”？

“大结局”一章，完全在我事先的“文本架构”之外。之所以谓之“大结局”，是因为这个意外得来的故事似乎使整个中国艾滋病大事件一段“公案”“尘埃落定”，之所以“似乎”，是因为也可以说成是“尘埃并非落定”，它使中国艾滋病的故事更像一个大寓言。这个老科学家与艾滋病的悲剧故事，再次向我们发问：历史究竟是什么？历史真实的面目是什么样的？真正认清历史需要时间和距离。也许最重要的，是一些当时看不清楚或者被忽略的细节。我更加坚信，最重要的不是观点、结论和理论，而是事实。观点和结论都可能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唯有事实永存。而理论的建构只能以事实为基础。因此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太重要了！

结语部分，是全书基本观点的归纳，对田野实践中所经验的矛盾和困惑的反思反省，以及对研究方法与研究效验的清理与检讨。

我以“即时性叙事”和“开放式结构”的方法讲述我的故事。全书以银庄故事为主线向事件纵深处延伸，在大背景中通过周边故事展开面上的铺陈。被结构的整个故事处于一种“活”的、“动”的状态。它是一个被讲述的故事，也是一段正在“发生”“进行”“过程”中的历史。这个演进中的历史故事可以一直讲下去，只要历史无穷尽；它也可以随时做新的修订和补充，只要有新的发现。这种方法，也可以称之为“开放性叙述”。

我并不奢望我的故事能够复原一段历史，但是企望能够厘清那段历史的脉络。为了避免布迪厄所批判的将“理论逻辑”强加在充满模糊感和权宜性的“实践逻辑”上的致命错误（布迪厄，1996），我无意将我的故事纳入任何现存的理论框架（理论逻辑），而是尊重故事自身生命力的演进，在对故事情境的分析之中发现认知“社会实在”（实践逻辑）。

田野调查得来的故事材料太丰富了，写作时几乎是顺手拈来。但我必须有所取舍，选择每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故事构建整个故事，表征事件中国家、地方政府、农民百姓、民间力量、以及国际社会不同行动者的行为特征和故事中人的生存状态和命运遭际，以揭示之所以如此的“理论逻辑”。故事虽然由我构建，但它始终是一个按照自身“实践逻辑”独立演进的“自在”，对材料的取舍包含着我对故事的理解，而不是对故事的阉割或是篡改。为了保持故事的原生形态，叙述中尽可能使用当地口语方言，保留被访者的原话。为了保持故事的完整性和当时情境，将必要的补充说明和分析作为注释，以免打断故事情节而影响“即时性叙事”效果。如此，以正文中的故事为主线和现实场景，以脚注中的说明分析为辅线和背景，将事件和事件中人的命运纳入其中，透过自己的观察和感受，展示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揭示其中所反映暴露出来的问题及其内在逻辑关系。调查写作前后6年，人和事都会发生许多变化，对于某些演进中的故事加以“补记”，以尽可能保持“开放性叙述”中的故事的完整。

实际上，中国研究，好的田野故事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我通过以上章节中的田野故事揭示我所要讨论的问题，也许比书斋里的高谈空论更有理论的价值。这些问题包括：国家与地方、官方与民间、国际与国内的关系；权力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操纵法律而不是受制于法律；在中国科层制体制中，一级级权力是如何运作，官僚机制如何通过掌控的“信息资源”操纵制造话语权来控制上层隔绝下层；上层是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沟通上下管道的“堵塞不通”，希望掌握真实的信息；下层又是如何试图冲破这种隔绝，希望得到来自“上面”和“外面”的救助及各种资源；还有，各种力量之间出于各自不同的“利基”，时而对抗、时而合作、时而“共谋”或者“分谋”的既矛盾冲突又相互勾连的复杂关系。这些问题在所有的社会都会存在，但是，在中国，在中原，又有其不同的特色。在这里，身处社会底层和边缘的艾滋病人群，在经济困窘政治敏感身体病痛社会歧视层层压力之下，声音很难穿出重围，在地方基层滥用的权力面前，他们处于极端的弱势；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艾滋病人圈内，河南农民艾滋病人群，不仅经济贫困落后，而且在知识水平、信息资源、话语权利等等方面，都处于不利的地位，在利益表达争取资源的行动中，也依然处于极端的弱势。然而，民主与法制毕竟是世界潮流，民间的力量正在慢慢成长，法律的力量也日益彰显，在这个历史变迁的过程之中，中原文化与历史的经验，社会转型的改革潮流，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都对社会的进步产生着影响。有心之人，都会从故事自身的“实践的逻辑”中解读出“理论的逻辑”。

“河南艾滋病”，是包括所有这一切故事在内的“大故事”。在这个“大故事”的演进

中，“艾滋病”已经不是一个事件，而成为一个符号，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扮演不同角色：时而是一类人群的身份表征，时而是各种势力博弈中的棋子、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筹码，时而是“罪名”，时而是“资本”，甚至会成为一种“资源”。而最难解读也最意味深长的，是在这些故事背后的故事：所有故事背后的力量撞击较量彼此消长，最终变成推动整个政治制度运作的合力。

总之，艾滋病几乎使人类社会的所有问题都显现出来，其中所表征涵盖融汇包纳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艾滋病的爆发流行这一事件的本身，而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和路径直接相关，引发人们对社会公正和公平、人类责任和道义、终极关怀和目标，等等更深层次问题的省思。同样，河南艾滋病事件的意义业早已超越了事件本身，其用于揭示历史的“解释力”和“穿透力”令我着迷。我希望透其壶奥，讲好这个故事。

#### 四 资料来源

本书资料包括：艾滋病疫区现场调查资料，这是本书最主要资料；河南省、市、县各级党政机关相关文件；河南省各级艾滋病帮扶领导小组、驻村工作队、卫生厅、医院等相关部门走访笔记及座谈会资料；国家相关政策资料；联合国相关机构以及国际卫生组织的相关文字文献。

一 田野调查现场资料：包括田野手记、访谈记录、调查问卷、音像资料整理、民间书写上访信件等。田野调查对象包括感染者、乡村干部、村民、政府机构卫生民政部门官员、医院医生、村医等。调查形式有个人访谈、即兴聊天、小型民间座谈会。

二 官方座谈会资料。这些资料一般比较空泛雷同，而且只是个人笔记记录难免有疏误，所以使用很谨慎，特别是一些数字，基本不用。

三 卫生防疫、民政等相关部门的文字资料，包括文件、报告、总结、政策条文等。

四 相关图书报刊等公开与尚未公开出版的文献。包括专家学者论著、各时期相关报刊、联合国有关机构的报告和出版物。

五 互联网资料。谨慎使用。不断有人提醒其有夸大其辞之嫌，结合田野调查认为可资参考之用。在官方主流信息管道不通畅的情况下，民间力量通过网络传递信息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六 书中照片全部拍摄于调查现场，全部不是“摆拍”。尽管受访者说照片可以任由我使用，但是我还是谨慎选择。

## 五 必要说明

当初课题计划设定的是首先自上而下，然后再自下而上的调查研究获取资料之路径。最初参加过一些官方组织的座谈会，走访过一些省、市、县政府相关部门和医疗单位。调查深入之后，几乎一切从官方正式渠道获得信息资料的管道被封死，索性深入乡野采写民间故事。所以——

由于大多真正有价值的档案资料不得见，而收集到的一般性各级相关部门的工作总结、工作汇报等资料大多大同小异流于形式，许多时候，连这类工作总结中的数字都被抹去，所以这类官方资料只能参考使用。文本写作采取自下而上的民间视角固然有方法论的考虑，而正式官方资料的匮乏毕竟使得本研究资料采集受到局限，多层次多视角的考量也会受到影响。不过这一现象本身也已经表明了一种现实情状。文本资料主要是来自田野现场调查：现场调查所得的一手文字记录，配以现场照片。好处是：真实鲜活。不好处是：由于民间记忆的失误，使得一些事件的时间、某些细节等等难免会有误差。因此，调查中对某些比较关键的人事，都会反复核实多方求证，对遇到的官方部门采访机会格外珍视，写作记述中尽可能做到保持还原历史的真实。相信研究文本中的这些不足之处，特别是一些重要事件事实，之后应当有机会从档案文献中得以修正补充，抑或两者互相修正补充。比如最早发现献血员血浆中艾滋病毒的时间（详见第一章之五，“大结局”），希望在正式档案资料中进一步落实——K市卫生官员说，当地疾控中心有全国最好最齐全的关于艾滋病疫情的档案资料，对所有重大事件有详细记录。重要事实的澄清，不单是史记求证的必须，也对这一重大传染疾病的流行病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医学科学价值。我更看重事件当事人的表达表述，还有一些出自村人之手的文字资料，比如当年的“上访信”和其他一些民间书写，也都尽可能进入我的文本写作，因为它们保存着最真实最原本的信息和气息。对所涉及的地名、人名作必要的技术性处理，但绝不失其本质意义上的真实，经得起考证。

没有哪一种疾病可以像艾滋病那样作为表征一类人群身份的符号。一个人患了感冒，不会说他是感冒；但是倘若感染了艾滋病，便可以说他是艾滋病。在河南农村艾滋病疫区，当地干部直接称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农民为艾滋病；在艾滋病村庄，一位妇女甚至自称艾滋病毒，她跟我说，“我们这些艾滋病毒……。”艾滋病成了艾滋病人的直接称谓。书中对这种情形的描述，有时也沿用“艾滋病”指称艾滋病人和艾滋病毒携带者，只是保持一份在地的真实，绝无歧视不恭之意。

## 第一章 银庄故事

2004 年夏秋时节，当我终于有机会进入中原艾滋病疫区进行调研时，我尽可能地走到了我能够到达的地方，最终选定银庄作为我的重点调查村。理由有三：第一，这是一个典型的艾滋病高发村，当年的村支书就是“血头”，周边村庄的人也都到这里卖血，艾滋病以银庄为中心向周围传播蔓延开去，当地人说“银庄是卖血发源地”，银庄村也以此成为当地最有名的艾滋病村；第二，它不像著名的文楼村那样备受媒体关注太像一个舞台，而是处于一种相对自然的状态，是一种比较“自在的存在”；第三，我有条件进入。

### 一 经济地理和即时疫情<sup>①</sup>

银庄是位于豫东与安徽交界处的一个行政村。银庄所属 B 镇，南距县城 9 公里，西接淮阳县，北与郸城县毗邻，省道商<丘>临<泉>公路自北向南贯穿全境，素有“鸡叫听三县，犬吠惊五乡”之说，明清以来即是当地经济文化物资交汇的重镇。这里自然环境不算太差，一马平川，土地肥沃，曾是最负盛名的“淮菜”（黄花菜）之乡，声名远播的槐山羊中心产地。二十世纪 60、70 年代丝网业和劳保手套为龙头的民营企业享誉全国。银庄行政村包括 4 个自然村：栗庄、滩头村、莫庄和小印庄，人口 2500 人，耕地面积 2300 亩。像许多中原地区的村庄一样，银庄村主要经济依靠农业，而人多地少，经济贫困落后。二十世纪 80、90 年代，中原农村掀起“快速致富，献血光荣”的风潮，银庄许多村民被卷入其中。至 90 年代末期，在豫南文楼村艾滋病疫情被曝光的同一时间里，地处豫东的银庄村民也开始大批死亡，文楼村的“怪病”在这里被称为“无名热”。银庄是当地最早发现的艾滋病村，也是省级 38 个重点村<sup>②</sup>之一，艾滋病防治示范村。

### B 镇政府疫情报告

本镇现辖 38 个村委会，97 个自然村，256 个村民组，13616 户，63863 人，自然面积 61.4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59986 亩，95% 的土地为红淤土，地势高燥，旱灾不断，最高海拔 45 米，素称 Q 县“西北高原”。2001 年，栗庄、滩头村等村最先发现艾滋病人及死亡事件<sup>③</sup>。

<sup>①</sup> 此处疫情报告为当时所得文本资料和即时现场访谈资料，其中一些数字在不断变化。

<sup>②</sup> 当时全省确定 38 个重点村。之后省里规定：艾滋病 200 人以上的县是“定点县”，全省 31 个定点县，K 市占 8 个。除了扶沟（40 例），都是“定点县。”扶沟县富，产棉、菜，血站建得晚砍得早。（访谈笔记 20060318）

<sup>③</sup> 事实上村里 1997 年就发现献血员发病，1998 年开始死亡，村医以“疑似艾滋病例”将症状整理上报，并经官方检测确证。而 1992 年即发现献血员感染艾滋病毒。见本章之五。

目前，B镇先后发现患有这些症状的患者3110人：其中危重病号569人，已死亡293人。2002年以来，发现病人年龄段下移至9岁以下儿童，情况十分危急。艾滋病死亡率极高。B镇的栗庄村，曾经一天死亡七人<sup>①</sup>。2002年春节前后一个月，全镇死亡33人，真是地里坟头满，村中无鸡鸣。（20030412《B镇党委政府关于发生艾滋病及救治救助救治管理情况的报告》）

农民卖血始于1993年，盛于1994—1996年，止于1998年前后。据不完全统计：1993—1996年B镇卖血农民有7000多人，直到1998年，当地血站关闭后，仍有一些农民跑到开封等地去卖血。

发病情况 从2001年发现首例AIDS病人至今，B镇原卖血农民中已有3000多名HTV病人和AIDS患者，现有重病患者654人，迫切要求监测的597人，有症状患者1500多人，这些人分布在全镇26个行政村，12个重点村。

死亡情况 AIDS患者不能治愈，死亡率极高。B镇已有310名AIDS患者先后死亡。仅银庄行政村就死亡95人，其中女36人，男59人；栗庄村一天曾死亡4人，2003年春节前后一个月，全镇死亡AIDS患者23人。（20030724《关于AIDS疫情的说明与建议》）

### 驻村工作队报告

Q县下辖21个乡镇，总人口122万余人。经防疫部门监测，HIV呈阳性者遍布18个乡镇，人数达1253人，占全市的一半以上，而这些人又集中分布在B镇，共有784人，全镇艾滋病致孤老人187人，孤儿153人。我们所驻的银庄行政村总人口2492人，HIV阳性患者302人，现症病人224人，因艾滋病致孤老人20人，孤儿40人。（200411银庄艾滋病帮扶工作队《驻Q县银庄村帮扶工作情况汇报》）

工作队另一份调查报告“最新检测”，疫情继续蔓延，“艾滋病感染者遍及全县各乡镇”，B镇艾滋病已经波及全镇所有行政村，进入高发病期和死亡期——

据最新检测，全县艾滋病感染者近1300人，其中B镇的情况最为严重。全镇有偿献血人员6800多人，其中检测呈阳性者为961人。目前，全镇38个行政村，村村都有艾滋病感染者，且已经进入高发病期和死亡期。据有关部门调查，目前已死亡300多人，现症病人893人。艾滋病感染者从年龄结构来看，多为30岁至50岁的青壮年，为主要劳动力，而且

<sup>①</sup> 此言夸张。栗庄有一天之内“出两口棺”的情形，并无一天死亡数人情况发生。

具有家族性特点。(200412 银庄艾滋病帮扶工作队《Q 县艾滋病情高发区社会治安状况的调查报告》)

### Q 县政府报告

2005 年官方资料报告，银庄所属 Q 县艾滋病疫情波及全县所有乡镇——

全县共有 21 个乡镇，556 个行政村，1780 个自然村，总人口 122 万人，是国家重点扶贫开发县。全县艾滋病疫情共波及 21 个乡镇，152 个行政村，285 个自然村，1124 户。

(20051205《二 00 五年 Q 县艾滋病医疗救治工作总结》)

### 民间传闻

一位村民感染者说——

那年麦口跟前（麦收前）外面传言：艾滋病村庄封闭了，死了没人埋，都在沟里扔着，一天死上百人……。那一天我出门回来坐公交车，到北关时候司机问我到哪？我说，B 镇。司机说，那不管去了，封闭了，传染艾滋病哩！我说，我就是艾滋病人，等我下车以后你把车开沟里扔了罢！我就是早上才从家出来，咋就“封闭”了？村里一天死俩人的情况是有，都埋南地了，诊所南边。哪儿一天死上百？谁家死人没埋？把我们说得不成个样……。

村民说——

最严重时间是 2002 年到 2003 年。那时候早已开始发热病死人，有人实在“受不上去”了，上吊、喝药自杀，全村陷入恐怖。畜牲也有灵性，那时候“鸡不鸣狗不叫”，外村亲戚朋友断了来往，村里人出去都不敢说自己是这个村庄的人。有一老干部还问卫生局局长：西瓜是不是传染艾滋病？卖西瓜要看身份证。

### 现场调查

走访 B 镇卫生院长——

本县 1998 年开始发现艾滋病，全县艾滋病人 1200 多人。B 镇 38 个行政村，94 个自然村，13694 户，63939 人。2004 年大检测，全镇参检供血员 2793 人，查出阳性病毒携带者 786 人，发病 474 人（至 2004 年 12 月）。之前检测过五六次，最高多达 850—860 人。通过村支书、医生回忆，全镇大检测之前未确证死亡人数 621 人，确证死亡 54 人。还有一些外地打工未参检的（供血员），估计还有感染者 20 人左右。（访谈笔记 20050123）



银庄 2004 年即时基本疫情是：全村人口 2492 人（工作队报告）<sup>①</sup>，既往卖血人员达 1000 多人（村主任访谈），除了老的小的，几乎所有青壮年都卖过血，检测 HIV 呈阳性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302 人，占全村总人口的 12.5%（工作队报告），这其中不包括已经死亡的“未确证”人数 150 多人（村主任访谈）。同时，我在村里作调查期间，还不断出现“新增感染者”。其中栗庄 160 户，只有三五户没有卖过血，卖血户数达 98%；全村人数 720 人，检测 HIV 阳性 129 人，“未确症”死亡六七十人，共计将近 200 人，约占全村人口的 28%。大普查统计滩头村卖血人员 180 人，HIV 阳性 126 人，感染率为 70%；之后又出现夫妻间性感染，已经确证 2 例。莫庄艾滋病发病集中，疫情同样严重。小印庄是 4 个自然村中疫情最轻的，不完全统计卖血人数也有 59 人，HIV 阳性 18 人，死亡 7 人。当时的村支书栗可昆说，这里发生艾滋病比文楼早，那时上蔡人还来这儿卖血哩。最恐惧紧张时候是 2000 年，33 人死亡。一份当地草根组织的资料报告村庄因艾滋病导致的双亲（死亡）孤儿 40 人，单亲孤儿 120 人，父母双方患有艾滋病的未成年孩童 183 人。<sup>②</sup>

卫生院办公室的墙壁上一张 B 镇艾滋病疫情分布图，标示出疫情已经波及全镇所有村庄。（照片 1）

## 补记

2007 年夏季，我对银庄疫情数字进行了细致调查，方法是问卷调查和座谈会。我一向对问卷调查的方法缺乏信心。但是这一次，由于有卫华、可昆、华中、新臣们的鼎力相助，还有银庄全村人的通力配合，于是在银庄进行了逐门逐户的问卷调查。依然发现，对回收的问卷很难进行“理想”的定量定性分析。同属一个行政村的 4 个自然村，问卷填写却千差万别，对一个个具体问题很难得出定论。我并不是说问卷调查是没有意义的，特别是我们这次调查，对我的整个课题研究绝对有意义有价值。而是说，如果没有对实际情况的基本把握，很难准确解读回收的问卷，也许根本就读不懂它们或者误读。村民们很实在地跟我说：“一说是刘老师的事，大家填写都很认真，只是理解水平有限。过去的问卷，都是胡乱一填，谁给他当真？除了这回对你。”这使我很感动，也使我认识到，问卷设计者与调查对象之间的种种差异。只有认识到这种差异，才有可能克服因差异而造成的“障碍”，认知真实。关于这次问卷调查的其他内容之后会做专门分析，这里只是统计与疫情相关的数字。为了尽可能

<sup>①</sup> 当地的户籍管理混乱，这在许多农村地区是普遍现象。这个村庄人口数字是工作队进村后为发放救助物资登记统计的，之后发现也有误差。关于人口数字情况，详见第二章之四。

<sup>②</sup> 此处所用数字，是即时现场调查数字，不是“确数”，但是应当是接近真实情况的数字，这里只能做如此这般的“事实表达”。关于这场疫情数字的讨论，请见第二章之四。

准确，我又邀请 4 个自然村的“明白人”和村主任、村会计一起召开座谈会，对照名单对数字逐一核实。这是这次问卷调查最重要的收获。

村庄	户数	人口	感染人数	现存感染人数	死亡人数
银庄（总计）	616	2659	417	217	200
栗庄	167	711	186	99	87
滩头村	136	596	130	66	64
莫庄	178	709	82	41	41
小印庄	135	643	19	11	8

注：调查时间，20070607-20070801，村庄户数和人口数字由行政村会计提供，疫情数字逐户核实。

数字是动态变化的。2004 年是重要的一个时间点。从 2004 年到 2007 年全村总人口数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感染者中有人不断死去，也有新增感染者出现。如果以 2004 年驻村工作队统计的人口数 2492 人为依据计算，全村人口感染率为 16.73%。如果以 2007 年村会计提供的 2659 人计算，感染率为 15.68%。感染者至今（2007）死亡近半。<sup>①</sup>

## 二 进村印象

### 坟墓包围着的村庄

我真正进入河南艾滋病疫区，已是 2004 年的冬季。2005 年 1 月，我再次来到银庄时，刚刚下过一场大雪。中原大地银装素裹，远远望去，村庄很美。（照片 2）

走近了，才会发现，这是一个被坟墓包围着的村庄。走在乡间小道上，两边是白雪覆盖的麦田，麦田里凸长出一个个白色的坟包，一直长到村子里边，长在庄户人家的窗前屋后。路边谁家房屋的墙壁上写着两幅标语：“青少年——抗击艾滋病的主力军”、“互相关爱”，标语旁边也是一个个坟墓。这里人们告诉我：其实很多记者来拍的坟头并不是艾滋病人的坟，那是老坟、老祖坟。新坟才是死去的艾滋病人的坟，它们分布在各家各户的责任田里，坟头

<sup>①</sup> 2006 年 10 月，第三任工作队“重新统计摸底，全村现存艾滋病病人 248 名，又出现了 7 户在卫生院统计数目之外的，感染原因不清。”估计包括新迁入人口中的感染者。（见第三章之一，之三）高出这里调查的现存感染人数。

小，有的小得不像坟，有的上面堆着秸秆，就像秸秆堆。“眼下少劳力人，埋得潦草，要一年年添坟上土，才能大起来。”现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坟头连成了片。（照片 3）村里很安静，只有一幅幅标语，仿佛一种沉默的表达。（照片 4）

### “最困难户”

银庄村因艾滋病数年不治，现任村主任栗卫华是工作队驻村后推举出来的一个很实诚的年轻人。村主任领着我走访“最困难户”。刚进村，就被人拦着：“到我们家去，到我们家去看看”，几乎家家都有艾滋病人，一家比一家困难，不知道谁“最困难”。他们以为上级来发救济了。这使我很愧疚。逐家走过去，村主任向我一一介绍情况——

第一家，张春兰家。丈夫栗天臣排行老四，弟兄 4 人全部感染艾滋病，天臣、二哥栗松民、三嫂，已艾滋病死亡。现在 53 岁的张春兰也已发病，卧床不起，她在陕西打工的老三儿子赶回来照顾母亲。躺在病床上的春兰向我诉说：7 年前（1998）六月初一（农历）丈夫栗天臣死了，“当时不知道啥病，症状跟后来说的艾滋病一样，发烧、拉肚子……。死那时小孩小，还不知道哭哩。”春兰说，她不敢服用抗病毒药<sup>①</sup>，副作用反应太厉害，她“受不住。”（当年张春兰去世。）

第二家，栗洪臣家。夫妻二人都感染艾滋病，发病的妻子阎秀荣躺在村头那间屋山墙壁上写着“互相关爱”的破旧的小土屋里。屋里光线很暗，好一会才看清偎在床头墙角的阎秀荣。丈夫抱着 7 个月的孙女，领我进屋后又出去了：“孩子不愿在屋里，光哭。”阎秀荣开始诉说：在庄上男孩儿寻不下，女孩嫁不出去，都难成媒。这孙女是老二儿跟前的，他在郑州饭店打工，自谈一个，女方娘家是太康的。“骗过来哩！”说这句话时声气格外重，直言不讳。去年 10 月结婚，孙女 7 个月了，婚前先怀孕，媳妇生了孩子就走了。说，盖房在这儿，不盖房不在这儿，哭着走哩，说就是要饭回来也得有个屋呀！爹娘都是艾滋病，以后盖房指望谁？媳妇对我咋样？对我也好，走时哭哩啥样。“你是政府”，阎秀荣用手指着我，你说，这媳妇走了，房也没有，他（指她儿子）不学坏，不偷人家？丢人呀，丢中国哩人！你政府不怕丢人？我上北京几趟了，跪几十跪了，跪过政府领导，跪过地铁站、地下道……。反正说不清是哪，跪下。头一回去 20 人，二一回 7 个……。回来后死了几个了。现在？现在房漏，公公抱着孙女，老二儿在家没出去（打工）照顾俺俩，……。刚才出去了。媳妇回来不回来？谁知道哩？……。 “谁叫（把）房子给我盖好，杀了我也愿意！”

2006 年 10 月 15 日，阎秀荣去世。葬礼上见到她面部严重烧伤的小儿子。才知道当时他没有出去打工，又没有在我面前露面，是因为“走炮”（运送鞭炮）被严重炸伤。

<sup>①</sup> 此时村里已经开始实施抗病毒免费治疗，但是依从性教育不到位，效果不理想。详见第三章之二。

第三家，栗立功家。“这一家公公、婆子、儿子、媳妇，全部感染艾滋病，男人死光了，香莲是家里‘顶梁’哩。”村主任介绍说。栗立功的妻子袁香莲还没有发病。“我现在最担心发病，我得为两个儿子活着。”香莲说，“一家男人死完了，都是因为艾滋病。”公爹最早发病，死几年了。丈夫弟兄俩，去年一年里头死哩。弟先死，自杀哩，喝药自杀，31岁。他两口结婚一年就生气离婚了，都查出艾滋病，日子不好过。弟媳胡红回娘家还是没钱看病，死娘家了。老二建厂听说媳妇死了，也没孩子，自杀了，去年二月间，才过罢年。孩儿他爹随后也死了，去年八月二十日。现在8亩地，就靠我一人了，婆婆也发病了。孩子的姑姑也有艾滋病，查出来，上吊了。妹夫也有（艾滋病），查大庄的。那庄上有艾滋病的也可多，都瞒着不敢说，那庄不出名，不像咱庄敢公开。

第四家。60多岁的莫宪友正发病，在黍秸秆搭成的庵棚里躺着。他的房塌了，大冬天，难过去。他老婆花英也卖过血，没敢检测<sup>①</sup>。他俩儿麦前麦后5个月里都死了，都是艾滋病。大儿媳也是艾滋病，小儿媳娘家人领走了。“撒下五六个孙子孙女，大的十来岁，小的还吃奶，孙子辈儿里也有艾滋病——都成艾滋病了咋弄？”莫宪友没检测的老婆花英嚶嚶地说，算是对自己不去检测的解释。随后赶来的莫庄组长莫昭红说：“宪友一家惨到底了。他弟兄4人加一个妹子，一大家子9个艾滋病！宪友是老大，老二两口死罢了，撒下4个孩子，仨大点的出去打工了，最小的闺女在阳光家园，房空了，孩儿们没头偻了。老三，四五十了，单身光棍汉，穷，没寻下。老四现在也是单身汉，寻个瞎子也死了。妹子婆家李竹园，妹夫艾滋病死罢了，又嫁一家，受歧视又拐回李竹园了，跟前仨孩子，名儿起得可好，钱龙、钱虎、钱凤。俩大的打工去了，小的在阳光家园。妹子在李竹园婆家也受歧视受气。回来？回娘家？娘家咋收？还有几个孩子哩！净负担。他一家六七个艾滋病，吃谁的？各顾各还顾不住哩……！都光听上级拨款多少多少，见不着呀……。前两天（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捐赠的又哪去了<sup>②</sup>？麦又着了<sup>③</sup>……。”莫宪友把自己蜷缩在被子里，只露出一个秃顶，听见我们说话，以为是医生来了，头并不伸出来——庵棚里实在太冷，蒙在被窝里哆哆嗦嗦地说，赶快找本儿（艾滋病医疗本），给先生瞧瞧！他很想活下去。（不久莫宪友死去，果真没能过去这个冬天。）（照片5）

第五家，莫昭州家。白发人送黑发人，儿子、媳妇、孙子，两年里头去3口，都是艾滋病死罢了。剩下的老两口也都是艾滋病。昭州本来很能干，当过包工头承包工程，挣钱不少，

<sup>①</sup> 出于各种原因没有检测的既往献血员还有不少，所以究竟多少人因为卖血感染艾滋病至今仍然是个谜。

<sup>②</sup> 工作队组织慰问演出，当场不少人捐款，场面很感人。事后村里艾滋病人问：捐的钱哪儿去了？

<sup>③</sup> 麦田失火，详见第三章之四。

这染上艾滋病算毕了（完了），看病家里花干卖净，没任啥了。（2006年，莫昭州去世。）

.....

就这样一户一户走下去，不知道究竟走了多少家，也不知道谁家最困难。

### “村里资格最老的解放军”

远远的，就见一白发苍苍老婆婆站在风里，身后一所破屋。心头不由一紧。走过去，村人告诉我，这是村里“资格最老的解放军”栗可重的家。栗可重“赶集”去了，这白发婆婆是他的老伴。

真正的残垣断壁，原先的院墙全部倒塌。老婆婆说：儿也死了，啥也没有了，我今年75岁，他82岁了……。跟着老婆婆进屋，差点一脚踏空，房屋地面比院子低很多，光线很暗。伸手去摸电灯开关，婆婆说：电灯掐了，欠100多块电费，没钱。“晚上咋办？”“点蜡。”屋里散发着潮湿的霉气，透天的房顶漏下缕缕亮光，照着一张床，床上胡乱铺着烂棉絮，床头一口破木箱，破木箱上立着半支蜡烛。渐渐习惯了屋内的光线，才看见当门破篱笆墙上挂着一只宰过的鸡，那是他们唯一的年货。院里厨房是缺了一面墙的小土棚，地上散乱着烧火做饭的麦草树叶，灶锅里是黑糊糊的剩饭，锅台上一只黑乎乎的饭碗。（照片6）

有人把赶集的栗可重找回来了，老人背着个小马扎蹒跚走来。原来，“赶集”在这里的意思，也就是扎人堆，晒太阳。栗可重吃了饭无事，就天天背个小马扎出去“赶集”。

搬两个小板凳，我们坐下攀谈。（照片7）老人说——

我1945年参加陈赓第四野战军，到过栾川、灵宝、观音堂，47年过黄河，48年到铁门，7天7夜解放洛阳，又到驻马店、西平……。49年回家来了。鲁学宾是公社<sup>①</sup>头（B镇民政所长），对我不好，跪过他4回。我捣他的门，他儿、他闺女出来审问我：人家都送礼，吸过你一根烟没有？抚恤金也不说该给多少，每回都是“借”，说是一共使了（用了）1900块了。说实话，栗可领安（建）血站，年轻人死光了。你没有听毛主席说吗？人是老本呐，把老本都吃了，还咋立新功哪？人死了，立新功也立不上了。村西头死了100多口。哪是艾滋病啊？是血抽完了死哩！我到现在不理他。谁？栗可领，大队支书！提留款要到一亩地150元，收超生罚款……。那时不敢吭气。后来群众把他勳(weng)下台了。干部杀人不要刀……。农村老年人没有人养活，地没人种，种一年还不够交给他哩，别说吃的了。唉，我老了，儿也死了，媳妇也有病，撒下5个孙子孙女，最小哩是一对双生，交罚款……。

——开始觉得老人谈话有些语无伦次，渐渐就听出了头绪。原来眼前这位老人竟是陈赓

---

<sup>①</sup> 中原农村至今习惯人民公社时期的称谓，把乡镇、行政村还说成是公社、大队。后文同。

兵团的老兵<sup>①</sup>。老人生活相当贫困，抚恤金不能按时得到，他唯一的儿子卖血感染艾滋病，去年（2004）发病死去，53岁。媳妇也因为卖血感染了艾滋病。卖血是为了交提留款和计划生育罚款。以后住在村里，每每看到他去“赶集”都不由得为他担心，这位身材高大的陈赓兵团老兵，驼着背，小马扎用拐杖挑了背在肩上，颤颤巍巍似走似站，好像随时都可能摔倒。

2007年，这对老夫妻相继去世。

### 两个老党员的家

栗可信，1958年入党的老党员。他的三个儿子一年不到全部死于艾滋病。在他居住的两间小破屋里见到他时，只见他满脸的悲苦。一时无语，我便找话说：“儿子的房子没人住了，你怎么不搬过去住？”主任领着我刚刚从他儿子卖血盖起的新房院过来。不想触到了老人的痛处。老人说——

我住着不是味……。一家人零散了……。儿子走（死）了，媳妇走了，就剩下俺两口。问：您今年多大了？73了，老伴72了。我食道炎，这几天过年呐，心里不是滋味，茶水也咽不下去……。到这一步也没办法。问：当初怎么想着去卖血呀？唉，老人管不了，也困难呀！你不让他去卖血，谁管他吃管他花？老人没能耐，要是能管他们吃了能走这条路？也不会到这一步了。大孩子是去年正月二十一死的，俩小的是今年麦时死一个，不到二十天又死一个，今年死俩。不到一年三个儿子都殇了。我有啥办法？哭死也没门呀！主任看我可怜，私底下救济50元，他也没办法呀……。老人朝我望着的眼睛里充满了忧愁。自言自语般诉说着：老二老三媳妇把孩子带走了，也不知道现在在哪儿？老大撇下三个孩子，老大媳妇也有病毒。老三家三个孩子，老二家二个孩子……。8个孙子女啊，谁管呐？没啥活头！说不出来……。过一天说一天，还得干……。问：你都干什么？干建筑，撘砖头、合灰、掂泥兜子。你不干咋弄呀，老婆儿还在床上躺着哩，她身体“瓢”更受不哩……。

过罢年老人去世了。有人说食道癌。有人说，“生生是心疼儿子疼死了。”

莫宪礼也是个老党员，2003年艾滋病发病死罢了，他死时60多岁。同一年他80多岁的爹也死了，紧接着他大儿庆来艾滋病发病死了。2004年他老二儿莫营艾滋病也死了。都说他家一年里头出3口棺，二年里头出4口棺。毛下（剩下）仨娘们：莫宪礼的老婆，是个瞎子，自己过；俩儿媳带着5个孙子女过，老大儿媳有艾滋病，老二儿媳没检测。“庆来死时候还欠着我钱哩！”村民组长莫昭红说，“宪礼也欠账。艾滋病人家都欠账。”

---

<sup>①</sup> 时间久了又听说，他最初是被国民党抓去做壮丁，被俘虏到了解放军队伍里，后来开小差跑回来了。这种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不同的“信息传递”，也很有意思。

## 院墙、房屋山墙被打洞

在去往莫庄的路上，村主任栗卫华向我介绍莫昭友家情况：他仨儿都卖过血，老大两口死罢了。大儿先死，老大媳妇也是艾滋病，领着仨孩子——俩儿一闺女，走了（嫁人），今年五月初一也死了，仨孩子又拐回来了。大孙子才 16 岁，领着大弟弟 14 岁到广州打工去了，跟亲戚一路，小孙子 12 岁上初中，莫昭友带着。刚进村，村人就告诉说，莫昭友家夜里羊被偷了，“院墙、房屋山墙被打洞偷哩”，指看，垒补上的洞口泥还没干。院子里晒着破棉絮，一间不大的房屋人羊共住：西头住人，中间隔出一间“庭堂”，东头养羊。妻子董莲英在家，做炮。述——

大儿子平聚活着也 42 岁了，属兔哩。平聚死后，沥沥啦啦开始（死人）了。滩头村俺亲妹子妮家，丈夫牛德新 2005 年 9 月初四死的，她婆家弟兄 4 个剩 1 个，带 9 个孩子。都难着哩！俺这房子漏，才说想修修，人羊住一块。羊不敢搁院里，偷哩厉害，这搁屋里，还是叫偷了。咋听不见？听见有动静，赶紧起来，一看羊没了，墙打了个洞！门拉不开，外先（外面）门鼻子叫拴住了。好不容易叫门弄开，院里大门锁着哩，一时找不着钥匙，着急叫门卸下来，门外头，眼瞅着羊走远了，撵不上了……。家里没任啥了，就指望着这几只羊值个钱。人老了，不中用了，腿痛，干不了别啥，就辫个炮（把做好的散炮辫成一挂挂鞭炮），一天辫三两块钱，攒聚着买个菜、买双鞋，还得瞧病。走不动咋办？……。

莫昭友回来了，一脸折皱里都是忧伤忧愁，蹲在地上，半天才说出一句：“没想着贼会偷俺……。”泪就下来了，一双粗糙大手赶紧去抹。（照片 8）半晌又说，开门看见门口搁几块砖，要是出来早还砸死我哩……。就想着我老了，贼就是欺负我老了，家里没人。唉，没想着这人老了老了咋恁难哩！快过年了，指望几只羊还账哩，房也漏了……。大儿死了，媳妇带着孙子走了，今年媳妇也死了，孙子又拐回来了，俩小哩过罢年兴许能入上阳光家园？老二在外有媳妇了，一儿一女，不敢对媳妇说（家乡艾滋病情况）。一大家人家就这散了……

## 卖血的女人

几个老婆婆坐在墙角一堆秫秸上晒太阳，彼此谈论着都是如何给死去的儿女们“过七”的——她们每个人都有殇子之痛。（照片 9）她们告诉我，银庄的女人卖血，上至五六十岁的老妇女主任，下至没有出嫁的年轻姑娘。“银庄的女人顾家，比男人卖得还多。”她们说，男人是家里“顶梁哩”，血抽太多还靠啥卖力气？她们还说，女人血多，不卖每月也要流那么多。大检查时，她们中不少人拒绝检测，“不知道不疑虑，真检查出艾滋病，这个家靠谁呢？”她们拼死要撑起自己的家。（田野手记 20051204）

满囤妈今年 73 岁，早年当过妇女主任。当年卖血的时候 60 岁，她说，“不报恁大，报

45岁。”蔡芝荣说，“我娘家村嫁到银庄7个闺女6个卖血，死了5个，还毛1个半人，1个是没卖过血的，我感染艾滋病毒算半个。”张秀兰说，回回卖血回回害怕，害怕合格又害怕不合格。验不上卖不成钱，验上了心里也扑腾跳。头一回卖血，一到门口吓得往后一退！一间房子，四个床，一个床躺俩，你躺这头，他躺那头，抽他的两大袋子，抽他两大袋子，都在那搁住。我看着这一袋一袋子血，不抽都害怕！头一回抽一袋子就晕过去了，二一回两袋子没抽满，50元扣3元给了47元。不去卖血没钱花，小孩要交学费。年轻的媳妇们卖血常常与丈夫结伴而行，其中不少是刚生过孩子不久，带着幼小的婴儿一起去卖血。他们有时一出门好些天，槐店（Q县）、项城、周口、郸城、郑州、开封、界首、杞县……。“一路卖过去，一路再卖回来”；有时早上去晚上回来，“老五更就去，黑了就回来。”小美很爱自己的丈夫，她说，刚结婚发现丈夫卖血心里很害怕，劝他不要卖，后来日子太穷没法儿过，生罢第一个孩子4个月，抱上孩子跟他一起卖。小夫妻“轮换去采血，我看着孩子他去，他采罢回来看着孩子我再去。”再后来“换防了”，他身体不好在家守摊，我出去卖血。

卫华、华中帮我统计栗庄当年卖血的小姑娘，“几乎都去了。”她们有的是感染了艾滋病还不知道，出嫁后传染给丈夫和孩子，有的后来知道了也不敢说。银庄闺女漂亮，都是“一加一等的人才。”全村最漂亮的闺女要数小丽，卖血时才十几岁。后来嫁给县城人，“难产”，没到医院就死了，“肯定跟艾滋病有关，但这不管说，人家家里不愿意说。”新花当年卖血感染艾滋病，出嫁杨集卫桥村，一直瞒着婆家，丈夫也不知道。生二男一女。现在一男孩患病住公疗医院治疗，症状疑似艾滋病。村里“娘家人”去看望，劝说不要再瞒了，不能一错再错了。她还是不敢说。“咱这边名誉赖，说出去那边村里人都不理她了……。”村里最早艾滋病死亡者栗合香的小妹学花，出嫁邻县葛楼村，生4子，3女1男，皆母婴传播感染艾滋病。开始不知道。第一个女儿出生即死亡，二女6岁死亡，直到生第三个孩子时回娘家来，参加了村里检测，才知道自己是艾滋病，检测结果一出来吓傻了。瞒着婆家，又怀孕第四孩子，“想生男孩。”前不久学花死了，她的丈夫带着4岁、2岁两个孩子，来找村里了，问能不能在银庄治疗，因为在当地不敢说得不到治疗。县里不同意接收，说不敢承担这个责任，“生4个孩子还没作母婴阻断。”凡跟银庄结亲戚的村庄都蔓延艾滋病，比方周边的村庄大滩、路楼、胡庙、胡桥、柳园……。（田野手记20070612，20070814）

在银庄我不止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人们忘记或者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死去的妈妈或是妻子的名字。栗庄爱玲的父母皆因卖血死亡：“妈卖血早，分罢地（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就卖了，死在卖血床上，医生说是进空气了。”妈叫啥？“……想不起来妈叫啥，没听谁叫过



她名字<sup>①</sup>……。俺妈死罢以后，我也去卖血，16岁。23岁结婚时还不知道已经得了艾滋病。”最后终因艾滋病婆家不容，她只好回娘家来安身<sup>②</sup>。丈夫跟她感情很好，时常来看她，今年春上查出也感染了艾滋病。滩头村少良的妻子卖血，1998年已经死亡，“那时候还没想到是艾滋病。”问，妻子叫个啥？“……叫我想想，肖……，肖桂英，还是肖玉枝？”他努力回想。我心里不由又一阵叹息：“过了一辈子，名字咋忘了呢？”一扭头，却见他背过身去在屋里暗影中抹眼泪。半晌才听他喃喃道：“这人心乱了，没心思了……。今儿他死，明儿他死，直没心思了，不是没男的了，就是没女的了，家散了……，摊为（因为）计划生育罚款去卖血，这世道就是这……”听了不由人不辛酸。待他慢慢转过身来，我却不敢细看他。一个满脸折皱，看不出年龄，粗粗糙糙的农村汉子，谁知道他心里藏着多少痛苦和幽怨？又有谁知道，在河南农村，有多少个像爱玲的妈妈和少良的妻子一样的女人？她们，这些母亲和妻子，是真正的“无名者”。（田野手记 20051204，20051205）

### 在村卫生室

2001年省卫生厅拨款在村里建了卫生室，后来也算作2004年的“六个一工程”<sup>③</sup>之一。一些村民在窗口取药，或是为自己，或是为家里的亲人。多是妇女，都在抱怨“没药”，有人把手中纸包里的十几粒红药片给我看。问：什么药？答：不知道，这回开哩都是这。渐渐几个人围上来了，向我诉说各自的悲苦，态度却很平和，一副认命认受的样子。

没想到在这里遇上了多次听说的已经死去的“最小年纪卖血”者的妈妈。村主任栗卫华告诉我，“就是她，王秀英。”王秀英一块旧布包着头，脚上两只布鞋一样一只，都破旧了，扎着裤腿。王秀英是来为大儿子领药的。她的丈夫和小儿子已经因为艾滋病死去，小儿子死时才十六七岁，当年卖血时才十来岁，是全村年纪最小的献血员。卫华说，跟刘老师说说罢，先别走。她就安静地等在那里，看别人说，然后自己开始说，不时抹去眼泪——

那时候全家人都卖血，我卖哩还多哩，结婚30年，卖血20多年，不说几十缸，也有几缸，拔了针就像“过阴了一样”，不知道任啥，灌了茶再醒过来。我没去检测，不敢测。也不是不敢，是……。不去不疑虑，不了咋着哩？孩他爸殇了；小儿殇了；大儿这样，床上躺着；闺女婆家是杨庄哩，也不敢去化验。我不去化验，家里看病花那么多（钱）了，还有几个小孩那么小，我再有病，还指望谁哩？这心里头呀，没干净过一会儿。坐都坐不那，这心

<sup>①</sup>不由感叹农村妇女的命真……。贱。

<sup>②</sup>在许多疫情尚未完全公开的艾滋病村，艾滋病人还处于隐蔽状态，一旦暴露即遭歧视。由此可推知整个社会对艾滋病人的隔膜、拒绝理解和歧视。

<sup>③</sup>六个一工程：在38个重点村各修一条入村道路、打一眼深水井、建一所学校、建一个标准卫生室、建一座福利院（后来称之为阳光家园）、建一个党员和村民教育活动室。

里不是味儿……，十冬腊月里，照顾儿子呀……，我这一辈子操的啥心！我看见这……，我心里……，吃都吃不下去。俺大儿子躺了一年，小儿子也没照顾过来，那时也不知道是这样的病。学民（小儿子）开始没有卖血，是邻居栗怀交来喊他。栗怀交光棍一条，全靠卖血生活。卖血多了，到后来化验成阳性了，不好验上了（检验不合格，卖血不容易被允许了）。血站说，“找一个新人可以带（捎带、允许）一个老人采血”，栗怀交就带着学民去卖，“他成天来喊学民，”王秀英说，“学民卖得也不多，就是晚，晚才染上。”栗怀交 2001 年腊月发病喝药自杀。学民 2000 年在牛延东家第一批就化验出艾滋病，第二年正月就死了，“还没有成媒哩……。”村里人都替他惋惜。现在账还没还了。第一批都不敢去化验，听说化验出来就拉大沙漠去，扔沙河里，集中炮崩了！都不敢去，俺栗庄就去了 9 个，都化验出来艾滋病。叫百顺娘去，急哩她直摆手。第二批化验哩多了，全银庄一次查出 300 多。学功（大儿子）媳妇来时不知道艾滋病，“叫我诳（哄骗）来了。”媳妇好，对学功侍候哩好，学功吃不下饭，媳妇劝他，背地里泪不干，有仨孩子哩……。大儿子怕是过不来了，CD4 剩 60 了，啥都不想吃，靠输点水……。唉，有啥药哩？B 镇（镇卫生院）没有，这儿（村卫生室）也没有（也给我看纸包里几片红药片）。急了（病情危机了）就卖点粮食买点高价药<sup>①</sup>。（如果）儿子死了，媳妇再走，我咋熬哩？我不敢化验，外甥也都不敢来……

王秀英是卫生室里最后的诉说者，平静悲苦无奈。天色已晚，我和她一起走出村卫生室，想着她说的“心里没干净一会儿”，不知如何安慰她，只是看着她侧身从卫生室门前的路上迈下麦田小道，穿过一个个坟头，走回家去。冬日的太阳还寒寒地照着，麦田很旷，一个个坟头间，王秀英的身影很小很无助，那情境真是很凄凉。

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们陷入如此悲惨的境地？

### 三 祸起：这里曾经发生了什么？

当时，外县有血站，本县建血站，B 镇的栗庄办有私人血站，献血、卖血成了一些农民挣钱生活的一种捷径，村民疯了似地到血站卖血，连十五、六岁的年轻人也去卖，“想发财，上血站；胳膊一伸一踉，拿回五十大元”，这句顺口溜是当时卖血情况的真实写照。

——《B 镇党委政府关于发生艾滋病及救治救助救治管理情况的报告》20030412

中原大地上勤劳而善良的人们为生活而劳作，青壮劳力一部分外出打工救济家庭。这时

<sup>①</sup> 这种“高价药”，当地百姓也称之为“营养针”“蛋白。”就是以人血提取血浆为原料制成的“生物制品”之一“人体白蛋白。”他们很迷信这种药，当作生命垂危病人的“救命药。”当年他们低价卖出自己的血，现在高价买回来用血制成的药，祈望能救自己的命。

候一个新兴的产物出现了——血站。无知的人们以为不在(再)为挣钱养家糊口、交提留款、计划生育罚款、孩子上学等事犯难了,因为每献一次血可得到五十元钱,一个月献十来次就是几百元啊!总比外出打工钱来的快而容易!很多人把血站当作摇钱树,干部把它当作发家致富的门路,献血的往事每次回想都会使我的心流泪,因为我失去了最亲的亲人……。

——银庄村民栗海华《艾滋我恨你》200604

### 到处兴起血站

村医栗树东说,那时候到处兴办血站,银庄人就到处跑着在郑州、开封、杞县、尉氏、平顶山、淮阳等地卖血。“那时到处的血站都是嗡嗡叫,界首的、项城的……。卖血的人都来回跑,人们都是几个血站跑着卖,为了多卖几次。”听说尉氏有6个血站。1990年,K市防疫站血站开了,还有个部队办的。以后郸城血站、Q县血站也开业了。县长参加剪彩,说“一人献血,全家光荣”,现把献血光荣证发给你,那时都是政府提倡的。上蔡<sup>①</sup>原来都是上K市卖血,所以后来很多人相互都认识,后来他们自己也开血站。以后,各个血站为了争夺血液来源,都办分点,就深入到局部了。1993年、1994年,国家就开始取消血站,但是国家取缔着,下面关着,过一段风声过去了,政府血站就又开了,其他血站一看也跟着开。陆陆续续关关开开。一直到(19)98年还有人去偷采。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听说到一个小黑屋里。采血回来后,就发高烧,让我给他打针。那时我们村有很多发烧的了,都是肺部感染。有很多都死了,知道这病看不到,但没有说是艾滋病。

村民说,开始到处跑着卖血。后来槐店集(Q县旧称)开了血站,村里也开了血站,卖血更方便了,村里人都卖,外面人也来卖。村里多数人开始献血就是1989年、1990年吧,到1993、1994、1995年,卖血成风了。后来是到地下血站卖,大批的血站,项城、K市、郸城……。黑了白了(夜间白天)卖,都是底下(私下)偷着卖,拉上一车人,一车三四十(人)就走了。偷着卖条件更差,有人出去一天卖六七次。真正制止到1997、1998年了。(田野手记20060124)

### Q县血站:“爱站敬业,人人献血”

“爱站敬业,人人献血”是Q县血站的口号。栗海华县卫校毕业后,正赶上县里办血站,受聘在血站化验室工作。血站要求工作人员都要“献血爱站”,不献血就不让在血站干。站长龚志宾自己带头也献了1次,他还有心脏病。本站职工献血免收化验费,1次可得50元,卖3次相当一个月打工的工钱。海华响应站长号召“爱站敬业”,自己献血,还告诉自

<sup>①</sup> 上蔡县是全省艾滋病感染最严重的县。

己的父母也到血站献血。海华的父母都因为献血感染艾滋病死去。提起往事，海华悔恨伤心不已，他含泪写下那篇《艾滋我恨你》。

栗因，1963年出生，初中文化。曾经打工，卖馒头、贩青菜，还开过饭店。1992年7月血站开办后在血站做饭。栗因“爱站献血”感染艾滋病，又传染了妻子，他的3个叔叔和婶子，都感染艾滋病死亡。栗因回忆当时血站情况：血站早上7点开门，8点上班，卖血的人排队挂号，多则上千，少则五六百，采血有时到夜间十一二点，中午也不休息。当时卖血挂号5元，有的人化验不合格，或者是想赶时间早点卖，还找我开后门。1993年9月左右，血站来了两个老外，一男一女，黄头发，高鼻梁，来送血浆袋。血站撤了以后，龚志宾在老血站北边澡堂又开了一个血站，之后还在刘庄店开了一个血站。村里两口一起去卖血的很多，我三叔、四叔都是两口一块去的，我二叔一辈子没寻上媳妇，也卖血，他们全都感染艾滋病死亡。我卖了有十来次，得四五百元。我是内部职工，沾5元的光，不用拿化验费，“沾光沾的可不轻，损失这么大。”

B镇卫生院长说，Q县血站建于1992年7月，有红头文件（照片10）。当时上级要求各县办血站，Q县血站办了五六年，有编制人员，站长龚志宾是县中医院院长。建站时由常务副县长牵头，剪彩，各乡卫生院都去致贺。负责抓此事的张副县长后来调任K市教委主任，现在已经死了。龚志宾有生意头脑，错在不让干了，还暗着干。几千万（元）呐，人都“起眼”（当地方言，羡慕、嫉妒、眼红等含义，这里是见钱眼开，为赚钱不择手段不顾后果之义）了。龚志宾与县委书记关系很好，要查，好多事都有关连，就是不查。1997年或1998年，血站取缔，站长龚志宾进了K市监狱，不久就出狱，任县卫校校长。群众上访告状，2004年上半年省里下文件了，县卫生局才免了他职。（田野手记20050123）。

### **村支书家开血站**

1992年11月，银庄村支书在自己家里开“分站”。项城血站站长王新民，通过老党员的大儿栗连营与村支书的兄弟老六引荐来到栗庄，栗连营和老六都有机动三轮往项城运送血员，认识了王新民。血站分点之所以开在村支书家里，还因为“支书家是栗庄第一大户，兄弟6个，支书是老大，血站办他家，没人敢闹事。”当时大家都把卖血当成一个致富门路。支书的兄弟和儿子们开三轮拉人卖血，车子上写着宣传标语：“要想富走献血路，要想发请到栗庄”，横批是“献血光荣”。还有大喇叭宣传。献血人员在支书家里抽小血（抽血化验），检查合格直接运送到项城采血卖钱。每合格一人血站给提5毛钱，栗连营、老六分利，当时每天来排队挂号三四百人，合格的占一二百人，连营、老六每月能挣1500多元。村支书老大挣房租，月租300元。项城血站在支书家设伙，工作人员6人吃饭。大篷车拉人，每人车

费来回 3 元，开车的每人每天能挣五六十元，除去成本，能挣三四十元。项城血站不单把分站安到栗庄，在其他地方办的还有。

人们描述当时情境——

远近的人都来卖血，栗庄像个闹热的集镇，人们来来往往，拥挤得很。一下雨都穿大胶鞋，泥巴趟到膝盖。远的，比方郸城的人，头天夜里来住下，等着早上挂号。村里有人瞅机会开家庭旅店收住外面来卖血的人。B 镇集上的人来卖熟肉、菜、馍。村里有人每天来两次，提前挂一个早号，然后挂一个晚号。亲戚串亲戚，朋友串朋友，左邻右舍都来。以为是好事，开始还瞒着别人，“肥水不流外人田。”每天一开张就 100 多人。如果有人不合格，给化验的人拿 5 元就可以算做合格。转氨酶正常要求标准 0—40，有人高的到 45—50 都算合格。晕床、呕吐的现象非常普遍，主要是抽血过多营养跟不上，像井的泉眼已干，后边的水还没涌上来就硬抽。当时 Q 县血站龚志宾开车到栗庄来抢生意，说：“项城来是跨县，争血源。”又说“咱县血站有伙（伙房），饭便宜，看自行车不要钱。”大家把他撵走了。在自己村里化验，“不合格还可以干农活，离家离地近。”就在那时，银庄成为献血基地。人们先在村里抽血化验，然后一车车拉到外地抽血卖血，村支书领头。

村里血站开了一年多，撤了。村民说，因为项城血站不要我们的血了，说我们村的血质量下降，不合格的血越来越多了，化验转氨酶，要求双阴性，原来都合格，后来都不合格了<sup>①</sup>。转氨酶化验不合格，有一种药吃吃就又合格了。当时村里许多人抽小血化验时用小孩子的血顶替，卖血时实际上是抽大人的血。后来干脆也不化验了。这个血站撤了以后，项城血站又在项城娄堤乡开分店，大家又到娄堤去卖血。当时 Q 县血站还没撤，许多被撤了的血站转入地下采血，村里人又到处跑着卖血。

#### 当地卫生官员述说当时情况

1992 年左右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开始办血站，如果没有文件，底下不会放开批准建立血站。但是底下还是达不到规范要求。因为赚钱，当时咱们国家市场经济还不太成熟的时候，哪赚钱往哪挤，遗留问题（后果）不去想。但实实在在讲，当时谁也没料到这后果，否则谁也不敢拿群众生命当儿戏，确确实实是认识不到。1995 年，基本各县都有血站。血站暴利。开始一天采一个血型，后来混着采，袋子装得太满，血溅出来交叉感染。后来私人血站更混乱，A 型、B 型乱套了。血站天天轰轰叫，俺单位（疾控中心，过去的防疫站）就办，主要财源。K 市的血走向全国 6 大生物制品所。

河南整顿血站，先从卫生口开始，血站不让办了。但事实上，1995 年关血站，关不住。

<sup>①</sup> 印证了当时《卫生报》献血员中大量感染肝炎病毒报道。

市场还需要血浆：一些生物制品厂才投资那么多建起来，还没有收回投资；一些原有生物制品所能扩大的也扩大了，还没见到收益。因为赚钱，老百姓觉得抽点血，又回（输）过来也没啥关系。这一整顿才乱哩，又整顿出来一部分！“到1995年下半年国家砍血站，（19）95年、（19）96年私人血站开始多了，感染人也多了。”1996年3月14日号才算整体（全面）关闭血站，整体上算是刹住了。但是据说一直到1998年还有大篷车拉着去抽血的，这都很隐蔽了。

### 村中唯一的研究生述说当时情形

栗志是村里唯一考出去的研究生。他的母亲已经因为艾滋病死亡，他在父亲病重时回家来。在他父亲的病榻前，我们谈及村里当年卖血及后来流行艾滋病的情形。他说——

我妈我爸都是这个病。他们卖血大概是（19）92、93年吧，当时我上小学四、五年级。这个地方做宣传做得比较多，说卖血对身体没有坏处，汽车上写着大标语：要致富走献血路！一人献血全家光荣！整个村子特别多人卖血。

你看见了？问他。

确实看见了，大家已经把这（卖血）当成一件平常事了。村里五十多岁六十多岁的人，基本上没有没卖过血的，都卖过血。收手早的好些，卖到最后的都染上了艾滋病。卖得晚的那些人，基本上死完了。在村里就有人排队卖血，也有出去卖的，三轮车早晨特别早，就拉一车人出去。当时整个村子都这样，卖血。当时村里卖血时情景用热闹形容都不为过。有的人一天卖两个，过两天又接着卖。当时我们这边也有采血的，也有好多外地来的人，就住在这家里面。

你们家当时住过吗？

住过。

多少？

挺多的。多的时候住十几个人。

村里疑惑有病是啥时？

当时没有疑惑，一直没有疑惑，它的潜伏期也有六、七年呐。当时有检查的到我们这里，但没有明说。当时我记得有一个学名叫获得性免疫……综合免疫缺乏症，用的是这个名字。大家都不知道这就是艾滋病……。我三叔死的时候，还不知道什么病。然后我二大娘死，先是发烧，摸不太准是什么病。就觉得挺快，不发病不觉得，发病后一个月就不行了。到后来就普遍检查，大部分都有（艾滋病毒）。到了我上高三、高四——就是复读了一年——的时候，我们这里的西瓜卖不出去，传说往里注血，其实没有那回事。外面人邻村都回避我们村

的人，有一个婶子给她娘家打电话，那边电话都不敢接，怕电话传染……。因为都没有文化。附近村子特别怕我们村子人，附近乡镇又特别怕我们镇子人，其他县又怕我们县……。

说到这里，床上一直昏迷的父亲清醒过来了，看着我裂嘴哭，着急说不出话，流泪的眼睛又向儿子望去。我伏下身认真听他，终于听明白他在说：“别给学校说，影响孩子名誉。”可怜天下父母心！我说赶紧说，不说。儿子安慰父亲，说，没有事的，都知道了也没事，不影响我了。

栗志在家里照顾病重的父亲7天，家人催促他回学校去了。两天后父亲去世，家人不忍耽搁孩子学业，没有再通知他回来奔丧。没有为母亲送葬的儿子，也没有为父亲送葬。

来年春节寒假，我看见这个有志气又懂事的研究生，带着两个弟弟在自家门框上贴上紫色对联<sup>①</sup>，然后又一起到父母墓前烧纸添坟。（照片11）

#### 四 银庄村卖血史

尽可能地走访当事人，认真分析梳理调查资料，这个村庄卖血的历史图像渐渐呈现出来。

##### 卖血的历史

调查表明，事实上很久以来，底层社会长期存在着一批专业或半专业的卖血人群，中国的医疗体制中没有相应的供血机制，中国基层县乡医院没有血库，卖血的人就是医疗临床用血的“活的血库”。还有人说，河南农村某些地区有卖血传统，因为解放战争时期那些地方是后方医院，不少人为伤病员输过血。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银庄人就开始卖血。那时是献全血，“全采。”40多岁的栗树东说，打我记事起就有人献血，那时也有血头，叫血队长，医院有病人需要血了，通知血队长找卖血的人，血头知道有谁想献血，就骑自行车来叫你。

1980年代后期，单采血浆使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血液开始作为生物制药的原材料被收购，血液的市场需求急剧扩大。一大批“献血员”队伍应运而生，银庄几乎所有青壮年被卷进卖血风潮。单采血浆在当地叫“单采”。银庄人最早开始卖“单采”是在郑州空军医院血站，时间1980年代后期。1992年7月Q县血站建立，银庄村里又开分店，“卖血更方便了”，卖血达到高潮，银庄成了当地传播艾滋病的“发源地”。对银庄影响最大的两家血站Q县官办血站和项城私人血站转移地下继续非法采血。卖血者从响应号召卖血到偷着卖血；买血者从化验检测到“胡采不验”。局面更加混乱，洗澡堂、私家院落、庄稼地都成了采血场所。在当地，非法地下卖血活动持续到1998年。（田野手记 20050122，20051206）

##### 银庄最早卖血人

<sup>①</sup> 当地丧葬习俗，家有丧事，三年内不贴红对联。

银庄有“献血”的历史。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村里最早的卖血者是栗干臣。他本人已经去世，从他的乡邻对他的回忆中，可以推断出，他的卖血历史最早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村人这样介绍栗干臣——

银庄第一个卖血者是栗干臣。那时献血是不光彩的，是搞资本主义，斗私批修开会斗争的时候，有人就说把你的小本本拿出来！那个本就是献血证。栗干臣“成分高”，地主出身，是当年开会经常被斗争的人。栗干臣十六七岁就开始卖血，专职卖血，1995 年停止，2004 年 3 月死亡，死时 60 岁，献血有几万斤。生产队时候交钱买工分，他一天卖俩仨（血），跑遍全国各地。县里建血站也跟他有直接关系。他卖血早关系多懂得抽血技术，龚志宾找他建血站，说一起干一起分利。血站建好后，龚志宾给一万元把他打发了，他告龚志宾。领着人卖血、办血站是他，后来带头向上反映艾滋病疫情，也是他。那时众人都还不愿叫反映，怕名誉赖。（访谈笔记 20060126）

### **“滚雪球一样”卷入卖血风潮**

银庄行政村的 4 个自然村中，栗庄、滩头村两个村庄卖血人多，疫情也严重。直接的因素是：滩头村有个栗干臣，“带领”村人卖血的历史早。栗庄后来居上，因为村支书血站建到家里，卖血、感染人数更多。很快卖血风潮从栗庄又传到莫庄和小印庄。访谈中，村人细细回忆这段历史，他们认为，村里卖血按时间先后可以分为“好几批”。开始时人们掰着指头一个一个人地计算，算到第四批之后，“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再往后到底有多少人就说不清了”——

滩头村人卖血最早，成批人卖血从 1960 年代中后期就开始了。那时候栗干臣他哥倒插门走了，只剩他娘一人在家，他回来了。他跑出去 8 年，靠卖血吃饭。山西临汾、陕西西安，河南洛阳、宜阳、三门峡，过了黄河，到夏县、运城、绛县，还有好些地方他都去过。回来一说，不少人都愿意跟着他干。他就组织大家到各地县卖血，他人熟。这算第一批。这些人有的年纪很大了还都活着，他们是买全血。第二批，1970 年以后，卖家多了。在生产队干活不挣钱，不胜卖血。卖血有人领着，血头提钱，一人提 5 元。回来干不动重活就用卖血的钱买工分，5 元钱买 10 分，10 分连 2 毛钱也不值。不买工分要受批判挨斗争。第三批，1980 年代。分地以后，地里活也不多，但是上交任务越来越重，不想办法挣钱也不行，只有卖血。第四批 1990 年代以后，政府提倡卖血光荣，血站多了，卖血人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到底有多少人说不清了，几乎家家户户。这时候就以单采为主了。以后几批都买过单采，很多人感染艾滋病，不少人已经死亡。栗庄卖血，是从滩头村传进来的，赶上第二批，栗庄村里建血站，感染人数更多。莫庄卖血“起步稍晚”，赶上第三批，但是疫情发作来势凶猛，“莫



庄穷，卖血凶。”小印庄是最后“滚雪球”卷进来的。小印庄经济状况较好，识字人多，卖血的人少，疫情较轻，“但是脸面看得重，不少人瞒着。”

### 一家三代卖血

诸老二，滩头村人，1955年生。“成份贫农，一等一的贫农，从来没进过学校门，不识字。”访谈中，诸老二多次强调这一点。问：总认识自己的名字吧？答：不认识。那怎么辨认卖血证是你自己的还是人家的？“认识上面的照片。”说的人无所谓，听的人一阵辛酸。诸老二的父亲1960年代开始卖血，是第一批献血员。“我13岁那年（1968）父亲就在卖血。家里穷，不卖血就没有钱。我家弟兄5个，还有一个妹妹，都是吃饭的嘴。”那时候卖血到医院直接输给病人，100CC/10元钱。当时毛主席提倡学习白求恩治病救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献血国家补助2斤红糖票、肉票。外出吃饭要粮票，到年底一个社员（卖血者）可以到粮店换30斤粮票，因为除了在近处卖血，也跑远处卖。到濮阳、项城、太康、界首。有时会卖不上，白去一趟，后来经界首人还介绍到徐州。实际上界首（安徽界内）那边卖血的比这边多，他们跑得更远，跑到东三省。那时候卖血不传染病，都是采全血。有人一天卖1000CC，活到七八十岁。

诸老二18岁（1973）开始卖血，算第二批。“兄弟姐妹们小，父亲有病，不卖血不中。父亲身体不好，现在想想可能与卖血有关。父亲动过三次大手术，我几次到Q县卖血，就是因为父亲动手术没有钱。早先时候，卖血还不是想卖就卖，那一次为给父亲治病，苦苦哀求人家化验室人，最后跪下给人家磕头，才让我卖。”说到这里，诸老二两手蒙脸放声大哭。

诸老二的妻子算第三批，1980年代开始卖血。诸老二说，当时政府提倡“献血光荣”，卖血被当作好事，亲戚串亲戚，朋友串朋友。我串的第一个是栗庄的栗可臣，我老婆娘家就是栗庄的，栗可臣的父亲和俺父亲是莫逆之交，俺俩也好。亲人中第一个串的是我老婆。其实心里也知道这不是好事，但是年年上交任务负担太重，家里老人有病。我26岁那年大年初一我父亲去世，生病的老岳父还得负担，还有孩子们的学费，都得花钱。（19）80年代末期，开始卖“单采”。最早是郑州空军医院几家部队医院的血站，还有啤酒厂私人血站。之后地方医院血站、私人血站都办起来了，开始乱套。检验不合格多掏5元钱就可以采血，许多人共用一个针头，县血站来不及进血浆袋，把用过的袋子自来水泡泡就用。一次2袋50元。一袋说是400cc，有人称过，实际上600cc、800cc都有，2袋超过1000cc。除去挂号费、车钱、饭钱，有时还需要买合格证——就是血化验不合格，需要再花钱买个“合格证”，也就是落个二三十元。诸老二说他最多一天卖过5000CC：一天卖5次，一次1000CC。看我不相信，他说，那一天老五还卖了6次哩！

1990年前后，“人卖血乱串，一天去几个血站。”滚雪球卷进来的也更多了。最终，把诸老二的两个儿子都裹挟进来，算是第四批。诸老二的大儿子1975年出生属兔，十六七岁开始卖血，19岁结婚。媳妇比他大三岁，小孩一岁，儿媳也开始卖血，2004年发病死亡，死时32岁。诸老二的小儿子1977年生，14岁上初中时开始卖血。“他逢星期天跑到Q县龚志宾血站去卖血，卖了七八个以后我才知道。”我吵他，说你还小可不能干这个啊！他不卖了。1997年，他结婚盖房，又开始卖了，当时血站已停，偷着卖。一提这事我后悔死，我对小孩他妈说：“咱该死就死了，孩子还小啊！”（田野手记20060207）

诸老二卖血卖到1998年，是全村“卖到最晚的人”。从1973年算起他卖血25年。诸老二拿出全家6个“本儿”（艾滋病治疗本）给我看，就是说，他家有6人感染艾滋病：诸老二夫妇、2个儿子、大儿子先后两个媳妇——“大儿媳艾滋病去世后，大儿子又找一个有艾滋病的女人，她丈夫也死于艾滋病。”诸老二弟兄5人，除了老大两口，余者4弟兄4妯娌都感染艾滋病。一大家子算在一起共有12个艾滋病人，已经死亡6人。他还说，最后一次卖血两辆大篷车18个人，17个人都死罢了，就剩下他自己。诸老二跟我这话时，是2006年冬天。2007年诸老二本人发病死亡。

### 村医的分析

村医栗昭逐一统计滩头村献血感染人员名单并作了分析。全村献血员180人（已故早期献血员未统计在内），其中夫妻73对。只卖“全采”的5人，都没有感染艾滋病，均为1960年代最早的献血员，现在年事已高，尚都安在<sup>①</sup>。其余175人卖过单采，其中多数人全采、单采都卖。感染艾滋病毒126人，占全部献血员人数的70%（126/180），占单采浆者人数的72%（126/175）。至2006年，已经死亡64人，病死率36.6%。至2007年06月，新增感染者3人，均为夫妻间性传播。分析表明，最早卖全血时期，没有艾滋病毒的传播，艾滋病毒的传播主要是后期单采浆引起的。

栗昭认为，这里除了卖血感染艾滋病之外，艾滋病传播的途径还有，第一是输血传染，第二是性传播。“当时乱得很，想想真吓人。血液传播快得很，说1:10传染是最少的。”采全血一次400CC、200CC，都是直接输到人身上去了，光是输血就传染多少人！不少艾滋病人1995年还在卖全血呢，1996年、1997年已经发病了。我们村就有一个人。谁？栗均臣。他2天800CC血输给了3个人。这还是1995年我在县医院进修时亲眼见的，谁知道他之前之后还输血给过多少人？他那次卖血之后不久就发病了，当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了艾滋病。输血这3个人，100%被传染，跑不了！输了艾滋病病毒血，100%传染！现在村里新发

<sup>①</sup> 村里有献血员说，就是看早先献血那些人都活到七八十还好好哩，心想卖血没事……。

现的艾滋病人，多是性传播，夫妻之间的。也有隐瞒不报又查出来的。检测普查率，大普查开始，献血员接受检测占 60%到 70%，又检测几次之后，现在能达到 80%多。100%参加检测不可能。（田野手记 20060124，200706）

## 五 “无名热”与艾滋病

……我突然意识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社会背景：1990 年至 1995 年间都有献血史。会不会是一种传染病呢？……9 例抽血化验者有 8 例是 HIV-AB 阳性，只有一例孩子的不是。上级要求保密，暂定为“无名热”。

——村医栗昭《救治艾滋病阶段性回顾》200602

### 宣布流行“无名热”，1998 年 5 月

村里最早意识到村里人大批不明原因的发病死亡可能与献血有关的，是银庄村医栗昭。当时，栗庄已经不断有人死亡，栗昭所在的滩头村突然又有 6 例病人不明原因地发热并伴有不同的症状。1998 年 5 月栗昭将病人发病症状一一列表，以“疑似艾滋病”报告县乡防疫部门。两三天后，县防疫站薛站长带医生护士共 4 人来村里抽取血样，检查化验艾滋病病毒，包括以上报告中的 6 人在内，共抽 9 人血样，其中有一小孩，腹泻，他母亲是 6 人之一，怀疑母婴传播。一个月后，结果出来了：其中 8 例 HIV-b（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除了那小孩，8 人确证艾滋病。这才发现村里正在爆发艾滋病疫情。不久栗昭再次向乡防保站报了滩头村和栗庄病例共 13 人，后来检测全部确证是艾滋病。栗昭说，这使乡防疫保健站工作人员感到吃惊<sup>①</sup>，他们说：照这种情况，全乡卖血人那么多，艾滋病得有多少哩？！县里也有反应，但是不急<sup>②</sup>。

按照上级指示，对疫情严格保密，在乡村医生大会上，乡防保站长宣布该病为“无名热”。从 1998 年 6 月到 2000 年 10 月，卫生防疫部门一直按“无名热”对待，其间发病人数越来越多，政府及上级卫生主管部门也没有做过多的干预。

### 最早死亡的艾滋病人，1998 年，1995 年？

在银庄，开始以为因艾滋病而死亡的第一个人是栗庄的栗合香（1998），后来才又意识到，在他之前（1995）死亡更早的栗可顺、栗留成、栗书堂，“好些人，症状都一样。”

<sup>①</sup> 卫生防疫部门的迟钝失职可见一斑，也反映出卫生防疫部门系统内的信息阻塞不通。

<sup>②</sup> 因为县里早已知道本县有艾滋病人从外省遣返回来。见下文。

栗合香，男，30多岁，1998年的4月死亡<sup>①</sup>。“他曾在新疆打工，都耻笑他患了性病。他没出去打工之前就卖血，那时候大家都没往血上想。发病几个月他就死了。症状：身上腐烂，连脚趾都烂了。到死也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村人这样说。只有栗合香的好友，之后不久担任了村支书的栗可昆，知道他已经在市防疫站验出是艾滋病<sup>②</sup>：“他苦恼得很，赌咒发誓自己没有干过对不起人的事，头直往墙上撞。”栗可昆说，“合香老实得很，我们爷们之间关系好得很。本来有病就痛苦得很，还要承受精神名誉上的压力，我相信他。”栗可昆跟我说这话是栗合香去世若干年后。在当时，艾滋病是一种耻辱，栗可昆为朋友严守秘密。（田野手记 20050112，20060124）

当时为栗合香治疗的村医栗昭也不知道自己的病号已经检测出艾滋病，但是栗合香的死引起他的警觉。他在那份《回顾》中写道：“1997年10月份，栗庄村病人栗合香在新疆打工时，患上一种当时难以明确诊断的疾病。很难支付外地昂贵的医药费用，加上病因诊断不明，被迫从新疆回家乡看病。当时由我亲自给他治病，我建议他到上级医院作系统全面的检查。有的医院提示肺结核，有的医院提示支原体肺炎、军团菌肺炎。给予抗痨、抗炎治疗，病人仍胸闷、气喘、间断高热不退，整天靠退热药退热针控制体温。我看病人那种救生的欲望，作为一名大夫，我也非常着急，翻阅了大量的关于发热的临床资料，试着给其用药。经过几个月的治疗，病人的疾病仍未得到根治，病情越来越重，体质渐渐衰竭。一直维持到1998年的4月份，病人终因百法治疗无效而死去。栗合香死后，我银庄行政村的老百姓命运更糟……我就抓紧时间查阅大量的临床资料……从他们的流行病学资料、临床症状，以及辅助检查综合分析，非常符合艾滋病……。”

在村医栗昭家里，我见到了栗合香的妻子。那天我走访栗昭，栗昭指着站在院里来求医的女人说：她就是栗合香家的（妻），董震荣。董震荣，45岁，艾滋病患。她说，他死8年了，死时39岁。钱花完了，治不好，还是死了。到死不知道啥病，村里人背后说“扒鸡窝”<sup>③</sup>，名誉赖……。当时都卖血。啥时候开始卖血哩？人家开始卖就卖，小孩还吃着妈（奶）哩。那时小孩1生（岁），今年17岁了，就是（19）89年、（19）90年吧……。（田野手记 20061029）

2008年8月，董震荣死亡。

由于“上级指示对疫情严格保密”，普通村民处于混沌惊恐之中——

---

<sup>①</sup> 村医记忆为5月。村民习惯于使用农历时间。

<sup>②</sup> 初筛化验，当时当地没有条件“确证”，确证只能到卫生部医疗机构。

<sup>③</sup> 俗语，谓不正当男女关系。

在栗庄：栗合香死后不久，卖西瓜的栗可重也死了，此后村里开始不断死人。这时人们才回忆起，之前死亡的李可顺、李留成、李书堂等人，发病症状有许多相似之处，认定他们也是死于同样的病，比栗合香还早死二、三年，推算大约在 1995 年前后。村主任说：“这仨人死时都正卖血，留成、可顺都是乙肝，全采单采都卖。留成抽罢血下床后吃了 2 斤桔子，死了，说是因此得黄疸病了，治不好了。”可顺妻说：“可顺死时候，还都卖（卖血）得兴哩！他死罢，俺娘仨卖血给他过的‘五七’。”“当时不知道是啥病。症状也是发烧，时高时低，反反复复，医生瞧不出啥病，医院最后也没说啥病。当时还以为是地势不好，请几个风水先生看‘坟先地’，挪了两次坟地。都不防（意想不到）是卖血的事。”（田野手记 20060204）

在滩头村：1998 年 6 月，滩头村牛俊山家里的（妻子）到郑州查出艾滋病，农历 6 月 18 日死了，村里人才知道艾滋病。接着牛俊峰 6 月 20 号也死了——他开开门看到人家送葬“压魂”<sup>①</sup>的人，吓死了。吓死得多，心里“瓢”一点的就吓死了。全村（滩头村）100 多艾滋病人，死一半了，其中有一半是心里“瓢”吓死的。也有不少是瞧不起病，硬“挺”死了。再后来是牛铁亮，他作炮早，有钱，“挺”得时候长些。这病小医院看不了，打针输水药也贵。（田野手记 20060209）

当地一位公安干警还记得当年情景，说：那时候上级让打击血站，不让卖血，但是不知道艾滋病。派出所曾经为 B 镇卫生院调解医疗纠纷，栗庄人总是有病，说是感冒发烧，老是治疗不好，有一次死人了，卫生院赔偿过几百元。后来栗庄的病人 B 镇卫生院不收，治病要看身份证。（田野手记 20061030）

### 艾滋病：村里公开的秘密，1999 年

1999 年 7 月，滩头村村民栗新臣的四叔在市防疫站检测出感染艾滋病，当年去世。栗新臣说：到 1998 年、1999 年，这人都发病，发病不知道咋回事。1998 年俺那庄死几个人，1999 年就挨着俺这一门（本姓家族）了，俺一个兄弟媳妇、一个四叔、一个兄弟，这一年死仨。坏了，我说，就是从那个卖血的引起的。俺四叔一得上病，我就拉着他上 K 市去瞧，到 K 市防疫站给他化验，当时心里已经怀疑是艾滋病——人都传着说是艾滋病。实际上村里到那化验都十几个了，但是他都不说，上级也不报，都在这压着呢！下午两点半上班，三点开始化验，半个小时结果就出来了。防疫站化验室的徐登龙把化验结果往书本子里一加，不给我。跟我说，这个事呢，反正到这个地步了，你只管回去吧，反正治不好，你自己可别再传染上了。我说是肺结核呢？是肝炎呢？他说，不是。我说，这样吧，你跟我说的有半个小时了，啥事我也明白。如果你觉得这事你确定不了呢，你就让 K 市防疫站给我出个信，我

<sup>①</sup> 当地丧葬一种风俗仪式。

上郑州去化验。你要能确认了这个结果，你把化验单给我了，我就不去上郑州了。他说，这个单子（化验单）我给你，回去你得保密，你可不能吭气（声张）。我说，好。我能说啥呢？他说，这就是阳性，阳性你不懂，就是艾滋病，你可不能吭气。他叫（把）单子给我，我就回来了。那一下“摸到”血站了！那一夜我都没睡着。（田野手记 20060501，录音整理 20070204）

时任村支书栗可昆说，1999 年夏天时候栗新臣来找我，和栗昭一起写材料向上反映村里的艾滋病疫情。最早给乡党委书记王超峰反映，又复印了给上级部门邮寄。王书记说：村里情况能理解，也同情。县里不让事态扩大，扩大了对招商引资不利，弄得人不敢来（投资）了，还影响村里男孩子成不了媒。这样，村里人都不敢说了，其实化验结果都出来了，已知道是艾滋病。（访谈笔记 20060129）

1999 年至 2000 年，不少卖过血的村民自己开始悄悄检测。与滩头村栗新臣的四叔发病几乎同时，1999 年，栗庄村民栗可田生病住院，“县医院传染科怀疑他是艾滋病，不让住院了。”他的家人不相信，去项城看（诊断），果然化验出艾滋病病毒。医生说，得上这种病不能活了，嘱咐要保密，说名誉不好影响家属。栗可田同时卖过血的弟兄们也各自悄悄作了检测，检测结果也都是 HIV 阳性，但是都保密不敢说。栗可田病了一两年，2001 年春上死亡，死时 47 岁。（田野手记 20050122）

1999 年，艾滋病在银庄村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大家心知肚明，但都不愿意正视。官方怕“乱了”，百姓怕坏了“名誉”。“害怕，因为艾滋病名誉赖，小孩成不了媒，女孩嫁不出去。”

### **银庄最早确证的艾滋病感染者，外省遣送回村，1997 年 11 月**

但是，早在两年以前，滩头村村民栗海军就知道了村里流行艾滋病的真相。这个时间，比栗合香死亡的时间要早，也比村医栗昭“突然意识到”的时间要早。但是，他不能说，也不敢说。

栗海军，男，1963 年生。1997 年 11 月，在山东烟台打工“顶替指标献血”被查出艾滋病。这是银庄第一个被确证的艾滋病毒携带者，因此也成了第一个知道村里爆发艾滋病疫情真相的人，当时，村里所有人都还“混沌着”，有人还在偷着卖血，对已经来临的死亡一无所知。海军说——

当时正在山东烟台建筑公司打工，公司分配有 6 个献血人员指标，全部由打工的人顶替。打工的也愿意去，顶替献血多给 3 天工资，60 元，算是 3 天的生活费。卖 1 斤血，给三四百元血费。我没有献成，查出艾滋病，没给。那一次 6 人中查出 2 人，还有一个是我妹夫，萧门村人，属汴路口乡，距离咱这村 4 里。他已经死罢了，至今不敢让他村里人知道。

当时从工地把我们接到血站一共查了3次。查第二次时候询问情况，问拔过牙没有，是性传播还是血传播，最后确定是血传播，确定后叫回来了。那是确定后两天，烟台市卫生局送我们上车站回家，车票钱是我们自己付的。当时山东省通知了河南省，省里通知市里，市里通知县里。回来以后市里、县里都有人来家里，问问情况，也没说别啥，都保密。看到村里死人，光滩头村一年死七八个、十来个，最多那年17个。心里害怕也不敢说，名誉背不起，人家看不起你。当初回来，瞧病还得背着医生，这2年才好些，那时候卖菜没人要。前年在平顶山打工时候还听说庄子封闭了，只准进不准出。除了家里（妻子）知道，孩子都不敢叫知道。县防疫站知道情况，也没有措施没药。（访谈笔记20061106）

### 最早发现艾滋病毒的时间，“上海打回来艾滋病血浆”1992年10月

艾滋病死神仿佛是突然降临。当人们惊恐地意识到死亡的阴影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头顶时，死亡已经大面积发生，并且很快蔓延开去。银庄人甚至来不及感知它究竟是什么时候降临的，却发现自己的村庄已经变成了艾滋病村。事实上，艾滋病的幽灵早已在这里流荡，只是人们浑然不觉。

在银庄，关于这段时间的记忆中，一个叫“民”的死去多年的人的名字被人们反复提起。当时在血站当炊事员的栗新臣说，1992年10月Q县血站送到上海<sup>①</sup>的血浆打回来5袋艾滋病血浆，里头有民的。

1992年当地便有艾滋病毒传播！？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也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这是我迄今为止了解到的最早的发现银庄献血员中感染艾滋病毒的时间，也是我所知道的河南省最早发现艾滋病毒的时间。为了确认，我反复询问信息提供者栗新臣，直到最后定稿，我又一次给他打电话求证，他又一次很肯定地确认。电话中，栗新臣说——

是1992年阳历10月份。县血站会计王仕中问我——当时我在血站做饭，把我叫去问我——民是不是你们村的？开始保密，只跟我说是肝炎，把他的底卡（卖血登记底单）撕了，不让他再卖血了。后来血站贴出通知，说这些血浆里有艾滋病病毒。（20080504）

不少当时的献血员都还记得血站贴出的通知，除了银庄的献血员民，另外的是外村人，银庄人已经记不起他们的姓名。“当时大家都不懂，啥是艾滋病啊？一两年后，村里开始死人，半年几个月死一个，接二连三不断，大家都没往血上想。Q县不让民卖血了，民感到很没面子，去问村医啥叫艾滋病？村医栗树东说，艾滋病在美国哩，想得你也得上！他又去其他几个血站去卖，一直卖到（19）95年。民死在2001年11月冬天，受不下去了，投河

---

<sup>①</sup> 有资料表明，中原地区的血浆运往上海、武汉、沈阳等地。Q县离上海更近，有相当一批血送往上海。

自尽。”

Q 中医院县血站建于 1992 年 6 月，有政府批文为证。血站一开办栗新臣就去干炊事员，只干了半年就不干了。这件事发生在他干炊事员这个期间。这个时间记忆应当没有问题。也就是说，血站开办不到半年，便在献血员中发现艾滋病毒感染者。这个血站开办了 6 年，一直办到 1998 年。<sup>①</sup>

“想想，这一个人能传播多少艾滋病，相当可怕！”村医栗树东后来回忆说：“当时很多人卖血回来发烧，浑身发抖。有的高烧到 40 度，有的不间断低烧，低热病人增多，有规律间断性发热，像疟疾，按疟疾处理，过一阵也就好了。”<sup>②</sup>这些发烧的献血员，一边找村医打针退烧一边继续献血，“胆大的挂俩瓶，一边输水一边采血。到后来村里有很多发烧的了，都是肺部感染，有很多都死了。”（田野手记 20050122，20051206）

### 现在村里是公开了，对外还是不公开，2005 年 12 月

村里到底什么时候确定发现了艾滋病疫情？我追问村医栗树东。他说，1999 年。1999 年，就确定是艾滋病了。不过上面不让说。问：那什么时候让公开了？答：现在才让公开……不过我也不能再给你说啥了，现在村里是公开了，也瞒不住了，对外还是不公开，我是村医，是政府的人，得给政府保持一致。不然领导知道了会批评，会说不想干回家！对记者采访要无可奉告，领导跟着时一点不敢说。（田野手记 20051202）

### 事件梳理

根据现场调查资料，有关疫情信息顺叙记述为——

1992 年，上海打回血浆，银庄献血员中已经有人感染艾滋病毒；

1995 年 3 月，当地卫生部门宣布发现第一例农民献血员艾滋病感染者；

1997 年银庄村民在外省确证感染艾滋病毒，送回村里，通知市、县防疫部门；

1998 年，根据村医报告，官方在银庄村 2 次检测分别确证 8 例、13 例艾滋病患，宣布为“无名热”；

1999 年至 2000 年，村民自费检测 HIV 阳性诸多人，“但是都不说”；

……

至今，村里内部是公开了，对外还是不公开。

事实上，河南省 1995 年已经开始整顿取缔血站（还有说 1993 年，1994 年整顿已经开

<sup>①</sup> 这些情况证实当时发现献血员中感染 HLV 的还有血液制品生产厂家的“买方”，并且信息已经到达最基层的“卖方。”但是有关方面关注的只是“市场”和“经济”，没有人关心人和社会。说明当时的血液市场已经非常混乱。

<sup>②</sup> 现在想来当时流行的传染病疟疾，很可能就是艾滋病“窗口期”症状。



始)，而村里人却一直“偷着卖血。” 诸老二说，1995年听说明令禁止开血站，血站实际上还在干。那时就听说过国家明令禁止卖血，也知道国家要打血霸，有的血浆不合格。也听人议论说“卖血有害”，但都是私底下人传说，只是听说。自己心里也早就明白卖血不是啥好事，但是谁知道会传染艾滋病？偷着卖血，1996年以后偷卖去过陈留、西平，通过老的关系户（即所谓“血头”）栗干臣、姚村的姚子刚领着去卖。姚子刚与陈留的血头是拜把子兄弟，他来俺这找（卖血的）人，领着去陈留卖血。一般一次去5天，每次多者50人，少者30人，送到一个院子里关起门抽血，买饭吃。一天采血两回，4袋，一袋有850CC到900CC，不化验，还是给45元。1998年到驻马店西平，正月底，那是最后一次。两个大篷车，去了18人，3天卖了5个。那次去的18人已死17人，只剩下我自己。之后不是不想卖，是后来没有血站了，找不到血站了

诸老二详细叙述了一次卖血被抓的经过——

1996年阴历十月，到陈留卖血，一个中巴载有50人，走出白集被北郊派出所截住了。姚子刚来这找人，栗干臣汇报到北郊派出所，在白集镇东头被截。栗干臣与姚子刚，他俩都是血头，有矛盾——找一个人提2元钱，栗干臣想找人，姚抢人。一车人被带到北郊派出所，姚子刚和我被扣押——我年龄大，与姚子刚熟，姚拉着我一起下车被扣。派出所问：“你们要到哪卖血？”“到陈留。”“谁领的头？”“姚子刚。”“李鹏委员长已颁布国法，卖血违法，你已经违反了国法，罚款5000元！”后来托熟人去请请客，各罚4000元。家里为了“扒”我送钱，卖掉了一口猪1470元，借朋友1600元，几个兄弟又凑凑，凑够了4000元。扣了一天一夜，不叫吭气，不叫往上报，要不罚得更多。“那个时候才知道卖血违法，不好。”这时候诸老二说了一句颇有黑色幽默意味的问话：“咋回事哩？与毛主席那时不一样哩，那时候学习白求恩献血光荣，现在咋违法了？”派出所工作人员说：“现在李鹏委员长已经颁布了法律，卖血违法！”诸老二放出来后继续卖血。他那次卖血是急等还计划生育罚款借下的债，不防又欠下了更多的债，他得更拼命地卖血。如他自己所讲：他卖血一直卖到1998年，可能是全村卖血坚持到最后的人，直到最后，“也不是不想买了，是找不到血站了。”

栗老五从1988年开始卖血，一直卖到1997年。也是说“找不到血站了，才不再卖了。”

就是这样，诸老二栗老五们从响应号召“光荣献血”到偷着卖血“违法卖血”。他们虽然后来知道政府“禁止卖血”，但不知道为什么禁止；他们直到被抓才被告知“卖血违法”，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违法。所以诸老二发出了那个黑色幽默的疑问之后，继续在这条灾难的血路上走下去。

诸老二和栗老五都反复跟我说着一句同样的话：“要是早知道卖血传染艾滋病，要饭也

不卖，打死也不卖！”，后来，我发现，这也是他们的乡亲们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要是早知道……”这样说时，他们都是满脸的懊悔与无奈，就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可是他们“没有早知道”，他们当时只知道需要“资金”（栗老五用语）的地方太多……

但是，他们是可以早知道的，只是，没有人告知他们。银庄卖血的农民不知道危险，因为没有人告知他们危险。以至诸老二们直到 1998 年还在卖血，灾难已经来临他们不知规避而继续向灾难走去。

至今——自始至终，银庄村的村民从未被正式告知过：当年的“献血”可以导致感染艾滋病、肝病以及其他传染病。他们只是被动员起来走上献血的光荣之路。在这条道路上他们出卖自己的鲜血换取“资金”上交农业税、村提留、计划生育罚款，也盖房子娶妻生子，然后带着妻子孩子一起卖血；然后他们又被不告知原由的禁止献血，被指控违法，被扣押被罚款，被打击被歧视鄙视；然后发病死亡，还被嗤之为愚昧无知……。

如果有关责任部门，能够在 1992 年发现艾滋病毒血浆时，引起警觉并告诫人们卖血危险，注意血液卫生安全（尤其令人遗憾的是，发现艾滋病毒血浆的血站，是当地县中医院开办的，并非缺乏医学常识）；能够在 1995 年发现第一例农民献血员艾滋病毒感染者时，引起重视并告诉人们卖血很危险，随时有可能被感染艾滋病毒；能够 1997 年已经确证村里出现艾滋病感染者时，采取救治措施并告知人们……。那么，也许这场艾滋病灾难就不会这么严重。但是，历史没有如果也没有也许。

### “卖血的背景”

**卖血把咱庄害苦了，这一族血脉都背亏！** 德高望重的前任老支书老党员栗可栋找到我，拿出当年村民的献血证和提留收据、罚单等给我看。（照片 12、13）他说：村里人卖血是有原因哩，听我慢慢给你说。税收、提留、计划生育罚款，老百姓负担太重——这是当时全村人“卖血的背景”。村里穷，没经济来源，公粮、提留、计生罚款，农民负担太重，一亩地负担 300 多斤麦。另外还要加上计生罚款。有的孩子没出生就开始罚，一次又一次，连白条都没见。当时的村支书说：“任务派得重，未出生户也得承担一部分，该罚的先少拿部分。”栗可应家，牛卖了 1000 多元，还不够交。收罚款时候，村支书把司法所、派出所、计生办都领来，别（撬）门拉东西、抓人。你说没有钱，村支书当面说，我先借给你！逼着你交。罚完了，再卖血还给他，他把血站开家里。罚款上交多少咱百姓不知道，计生办留多少咱也不知道。支书说，卖血来得快，罚款提留有交，不急恁很了。自从支书在村里办血站，大家都卖血了。外边人也来，每天十里八方来的多了，排队挂号卖血，十车八车拉人卖血，拉走不知道多少车。大蓬车，一车坐十几二十个，坐不下挤着，他压他身上，他压他身上，栗

连营不是叫挤下来腿摔断了！我不赞成卖血。就那，她（妻）还偷着去过几回，亏得卖得早，全采，没染上。后来人都感觉不对劲了，有记者来采访，传说因为有艾滋病。记者来拍照，可能拍的是艾滋病人栗可治，这人去年死罢了。当时轰动得可厉害！政府知道了，撵哩啥样，堵截（记者），没撵上。开车一直找到周口，还是没找着。那时候，文楼还没公开。

老人最后说道：卖血是把咱庄害苦了，背亏大哩很了！年轻孩子成不了媒，小伙寻不下，女孩“不亲戚”。年轻孩子背亏，村子背亏，这一族血脉都背亏！

**农民负担** 在栗可顶家我们一起细算当年（2005）土地每亩投入产出，算清了一笔“农民负担”帐——

投入：麦季

项 目	数 量	价 格	实用价
化肥复合肥	1 袋 100 斤	98-130 多元/袋	用 95 元
农药	2 袋	10 元/3 袋	7 元
种子	20 斤	2.5 元/斤	50 元
耕地			25-30 元
播			7-8-10
打药	1 次		2.5 元
除草剂	雇人工钱 3 元，自己打，工钱不计		7-8 元
收割			35-40 元
合计：个人投工不计			≈235 元

产出（收入）：去年麦子冻了减产，亩产 400 斤，0.65 元/斤，每亩产出： $0.65 \times 400 = 260$  元， $260 \text{ 元} - 235 \text{ 元} = 25 \text{ 元}$

秋季：玉米（大豆、棉花）少量，全按玉米算）

项 目	数 量	价 格	实用价
种子	4 斤	5.5 元/斤	22 元
化肥	用 100 斤	125 元/袋	106.25
除草剂			10 元
打药	2 次		5 元
浇水	电机 5 元 用油 21 元自己用电方便		5 元
收割（机收）			8 元

合计：个人投工不计

≈148 元

产出（收入）：亩产 600-700 斤 0.52 元/斤，产出： $0.52 \times 680 \approx 350$  元 350 元-148 ≈200 元。

栗可顶参军复员后当过工人，家庭经济状况优于一般村民。他说，当年麦子减产，亩产 400 斤，一般情况亩产可以达到 600-700 斤。我们家条件好，水泵、机子都有，自己干工钱不用算，别的户还收不了这么多。每亩地负担 300 多斤小麦，上交 300 多斤，剩不下啥，这还不算投入的哩。当时农业收入，赚钱很少，麦季每亩 150 元，秋季 100 元。夏季好了赚个秋季，不好了，连秋季赔里。光是提留款、农业税负担，每亩 130 到 150 元，户家还能落下啥？还有计划生育罚款哩？

**一笔卖血账** 伴随着那段“血”的经历，农业税、统筹提留、计划生育罚款，这些时代的词汇，深深刻在村民们记忆里。印记最深的，还数计划生育。在银庄，许多人最初卖血的动因，是为了缴计划生育罚款。

诸老二虽然不识字，但是很会算帐。他说，我卖血从 1973 年到 1998 年，一共卖了 25 年，最多一天卖 5 回。我算过，平均每年靠卖血收入 1 万多一点，累计总共将近 30 万元。“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能挣这么多！”诸老二说他自己也感到很吃惊：“这么多钱都花哪去了？”现在家里总财产：两处宅子值 3 万；一辆破大篷车值 1000 元；摩托车值 2000 元，是儿子给买的——儿子孝顺，知道我腿痛走不动了；麦子值 2400 元。总计 4 万元左右。看病花去有 10 万多。其他主要就是交农业税、统筹提留、计划生育罚款了。能记起来的，比方 1992 年、1993 年，全家 6 口人 6 亩地，交麦子 2500 斤。1995 年大旱，每口人春季已交过 140 元，秋季粮食绝收，每口人还要交 20 元钱，外加计划生育罚款，都需要钱。

“最厉害的还是计划生育罚款。”诸老二说，他两儿两女，超生 3 胎，计划生育罚款一个小孩一年 600 元，3 个小孩罚了 14 年，平均每年 2000 多元。有一年因为交不起，家里的粮食、被子都被乡里拉走了，结果罚了 1 万多，“刚好是一年卖血的钱。”14 年计划生育罚款，足足 3 万多元。“计生罚款高峰与卖血高峰相对应。”他说。1993 年乡计生办干部和村支书站在“超生逃跑户”的院子里扔砖头或者棍子，扔到哪里以哪里为界画圈，圈内范围都得联保，少则三四户，多则五六户联保，“联保户”都得交罚款。那一年诸老二家的邻居躲计划生育逃跑了，诸老二“联保”受牵连，被抓到乡计生办关了 4 天，还挨了打，要罚款 4000 元，请客说情降到 1600 元。1996 年又被抓被罚，是为儿子“顶罪”。诸老二的大儿子头胎是个女孩，二胎生个男孩，算超生。儿子在威海打工，就抓诸老二在乡里关了 13 天，

要 500 元现金才放人。就是那一次，诸老二卖血被抓，才知道“卖血违法”。老婆跑了十几家借钱交罚款，说好卖了血就还。结果一个中巴车拉 50 人，被派出所截住，扣了一天一夜，每人要罚款 5000 元！家里卖了一口猪 1470 元，又东凑西借，又找人说说情，交了 4000 元才放人。结果旧账未还又欠下更大的新债。所以，明知违法还得继续卖血。（田野手记 20060208）

## 六 村民记忆中的几件“重要大事”

### “健康体检”

在全省“拉网式大普查”之前，政府在银庄已经以“健康体检”的名义，进行过几次 HIV 检测。除了几人、十几人的小范围抽血化验，规模较大的检测有 2 次。第一次，农历 1999 年十一月初三，在村民牛延东家院子里，参加检测 100 多人，大多是滩头村和周边外村的献血员，疫情最重的栗庄只参加 9 人，“都不敢去化验，听说化验出来就拉大沙漠去，扔沙河里，集中炮崩了！”关于这次检测，官方、民间的叙述有不同的版本。

村民栗新臣说——

那时候，上级有人到村里采血化验过几回了，但是化验单子不给我们，只说是“无名热”。我们向上级反映也不敢说是艾滋病，因为没有证据。所以我四叔在 K 市防疫站查出来后，我说啥非把化验单要到手——有了证据，拿到了化验单，才敢说是艾滋病，才给卫生部打电话反映这里艾滋病的情况。1999 年 7 月俺拉四叔去检查的病，到 1999 年<sup>①</sup>农历十一月初三来村里化验的这个病。以前化验都是个别的，这一回人多。给了我四叔化验单子的市防疫站的医生徐登龙也来了，他见到我给我掏了一根大中华烟，那是 28 块钱一盒的烟。他说：“老栗啊，你可给我弄坏了，你们县里也吵我，K 市卫生局也吵我，说这个单子任何人都不叫给。”我说，徐大夫，你不要怕，他要是吵你，我北京卫生部里有人，我这就打电话弄他！徐登龙说，别讲了！栗新臣，你可别讲了！吵我也不碍事。“那张化验单后来还是叫他们又偷走了！”谁偷走了？防疫站的人！化验单放在桌上，他们趁我不注意把单子给我偷跑了。我要上告，他们说，别告了，得了就了，处理（解决艾滋病问题）不就行了？从那以后，才开始处理。

参加这次化验，满共 128 个人，滩头村最多，有六七十个人，栗庄只有 9 人。其他还有张王庄、黄庄、大滩李、董营、马楼、莫庄、胡桥的、高庄的。都摸来了，一听说来化验病的，都知道是化验这个艾滋病，有亲戚透气儿。结果出来 108 个（初筛 HIV 阳性），都是这几个庄的。最后知道的有 57 人，都是滩头村的人，去问出来的。外面那些庄的都没去，化

<sup>①</sup> 有访谈资料表明此次检测时间似乎为 2000 年。可能民间记忆会有失误，另外，当地村民习惯农历记时，有时与公历混杂也容易造成时间记录的失误。这些可以以官方档案核实。

验结果在县防疫站，他都不给你了。这结果一出来以后，俺都开始给他反映，这个事你给俺咋办？他说，我给你们反映，给你们弄药。又停俩月发的那个药水，郑州中医院研制的。二两的瓶子，一个人两小瓶，喝的药。都愿意喝，有的给了有的没给。又等几个月，发的复康宝一号，还是郑州中医院制的，原来是药水，后来是胶囊，成盒的。这还是不解决问题啊，只有临时治疗，没有抗病毒药不中。那时候发烧是高潮，一年这一半拉（半边村庄）都死十几个。到2001年秋季里才算把药弄过来，那是一万块钱的药，专对这57个人的。以后陆续的，才都开始办本子使免费的药……。那二年死的最可惜，2002年那一年俺庄（滩头村）死的最多，死19人，2003年那一年死17人。（田野手记20051206，20060501，录音整理20070204）

牛延东说——

第一次在我家院里检测，是以“健康检查”的名义，不准说是查艾滋病。栗庄去人不多，只9人，查出8人感染艾滋病毒，“他们还没有想明白哩。”余者都是滩头村、莫庄、小印庄的，也有周边外村的人。查出来也还是不敢告知。其实在我家检测之前就有过抽查，但都不说检测结果。头一回，栗昭上报疫情检查9人，啥结果也没说。在我家检测后，我几次去问结果，开始也都不说。我很多次到县、市防疫站去问，都互相推，也多次打电话问市防疫站赵站长，也不说。可能要汇报请示上级卫生部批准。一直到天快热时候，我传话对大家说都去，一起到市里去问，才个别谈话对说。我可能是第一个知道的。那次去的人，一个一个谈。好像是卫生局窦局长先找我谈，他问：你害怕么？答：不怕。怕又咋着哩？他才告诉我：你是。其他人也都是一个一个单独谈。（访谈笔记20080328）

关于这次检测，一位地方卫生官员这样讲述——

1999年去牛延东家检测。他当过村委会主任、村干部（实则牛延东只是普通村民，没有担任过村干部），人也比较“钻挤”一点，聪明一点，组织能力、接受新事物也比较强，看出艾滋病的危害。如何传播啊，防治啊，知道得比较多，强烈要求政府进行治疗，跑到卫生部嘛，弄（疫情反映）到卫生部，卫生部又弄到卫生厅。卫生厅没法，这样才来。卫生厅带着队，俺组织人，那次检测是卫生厅出面，俺只是配合。1999年春天，天还冷着哩，就在牛延东家，现场采血。去有15人，登记的、采血的，加上我们，有二十几口子哩！还有县里的人配合。检测的人有多少？这个事……。回忆都不好说清了，疾控中心有资料，以单位名义写有报告。（访谈笔记20050318）

2001年，第二次在村医栗树东家院里还是以健康普查名义。栗树东说，那时候还对外保密，不过在村里已经公开了，都知道是查艾滋病，参加的人很多，还有外村的亲戚知道也

来了。最后一批一批下发艾滋病人名单，差不多都是，银庄 300 多。有人整夜哭，不信自己有艾滋病。从那时开始宣传艾滋病传播途径和防治方法。

### 卫生厅长与“一体化卫生室”

村民说，2000 年麦口（麦收时节），省卫生厅刘厅长来了。那一回来五辆车，省里来一辆，地区来一辆，县里来两辆，咱 B 镇加一辆。是刘厅长批下来 5 万块钱盖卫生室。村医说，刘全喜（时任河南省卫生厅厅长）来过好几次，到这建立一体化卫生室。我们把私人诊所的药都搬到一起了。当时 4 个自然村 4 个村医各自开诊所。刘全喜到莫文彬诊所，问一体化需要多少钱？王书记（当时 B 镇镇书记）说 4 万。这是栗可昆（当时银庄村支书）与我们计算确定的。刘全喜说建村卫生室搞“一体化”。卫生室建好后，2002 年刘全喜一年来两三趟。（照片 14）

“一体化”是什么意思？问。就是我们几个村医生合到一起了。那算是谁的？现在是免费的药，以前我们个人的药品，国家按成本给我们作价了。

K 市一卫生局官员说，刘全喜人其实不错，来 K 地最多。到银庄去过，见艾滋病人，先握手，再给他们合合影，照个相。那一次有个艾滋病人眼烂得看着真是“隔臆人”，刘全喜也跟他握手，当时刘全喜也没意识到，我赶紧上去也握手，怼怼他，小声说：“手别再乱摸了。”那人脓啊血啊，身上肯定带有病毒！回到局里赶快叫人打肥皂水洗手！有人攻击刘全喜是出于政治目的。没有这事还会有人攻击哩，政治上的事。

“2001 年 5 月 11 日村卫生室建成，2001 年 6 月 9 日刘全喜带领地区、县卫生局、防疫站前往验收并作了重要安排，表示尽快对感染者进行救助。但是一直没有医生没有药”（村民反映信 2002）栗新臣说，卫生室盖好了 4 个月也没药，有庙没有神。我们又往卫生部打电话，写反映信，慢慢才有了药。

### 小插曲：美国“女记者”与“神药”双汰芝

“2001 年 8 月 1 日美国记者进村，我们打电话给领导，引起领导重视，秋季第一次发药，是国外快过期药双汰芝。那药真灵，很多人眼看快不行了，吃了又活过来了，都说双汰芝是‘神药’，但是太少了。”（村民反映信 2002）

“美国女记者”进银庄，在当地是件大事，惊动上下很多人。栗昭回忆当时情况——那是“冒碰的。”那天，大约是 2001 年七月间（农历）我从 B 镇医院下班回来吃饭，在村西头遇上她在问大队会计栗恩臣，栗恩臣见我过来了就说：这事他了解最清楚。于是她就问我：村里有没有艾滋病人？说有。问多少？说不少。能不能带着看看病人？说不能。我不能断定利弊，就给支书栗可昆打电话。可昆过来了，我们就在桥头上迟疑了半小时，她拍了

几张照片，就是群众围着看的人。她出示了证件，洛杉矶护照，我看得很仔细，说你这护照过期了。她翻过一页，说有续期。我一看，就是有续期。下午牛延东、栗新臣他们一个电话打给地区防疫站，说外国记者访问我们艾滋病人了，村里情况都向人家美国记者汇报（告诉）罢了。地区卫生局立刻打电话给县卫生局长，局长电话镇卫生院长，院长追查到我，问情况，我说给村支书汇报了。问：照相没？答：照了。院长批评我：你还是搞艾滋病的哩，啥水平？警惕性真差！我又说我汇报给支书了啊……。于是把我带到镇政府查问，公安开始查找，我们在镇政府苦等。等到半夜一两点，没找到，消失了。（田野手记 20060124）

之后栗昭又跟我谈起这件事，版本有了变化。他说，其实后来人找到了，并不是记者，是个上海的美国留学生——

……后来地区防疫站又打电话向县负责文教卫的杨县长查问。杨县长说不知道，比较烦。杨县长又打电话给镇长秦国林，说：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干这县长了？！秦国林又查问镇卫生院院长，院长训我，把我拉到乡里盘问作记录，再三追问，问当时啥情况，都说啥干啥了，于是县公安全体干警出动，连夜找，搜查所有宾馆旅店，我们在乡里等消息，找到夜里一两点，打过来电话说找到了，控制起来了，当天晚上就在宾馆找到了，是一个美国留学生。把她所有资料都没收了，刑警队追查她见谁了，都说些啥。问她：哪来的？她答：上海。一个在上海上学的美国留学生。当时村里几个人正发病厉害，真想领她看看。栗绍全家的曹 XX 刚死罢，诸老四媳妇正床上躺着，她（美国“记者”）刚走一两天，老四媳妇就死了。是县里出租车拉着她来哩，那司机还说，都说你们这边都没人了，怎么还见人在打麻将？还说庄稼没人种，这玉米长得还不赖嘛！栗新臣他们给地区打电话说美国记者进村了，随即县防疫站就来发药了。（田野手记 20080318）

栗昭是位很负责很认真的乡村医生，后来他写了《救治艾滋病阶段性回顾》给我，详细记述了村庄疫情，是一份很有价值的见证资料。我更相信两年之后的第二个版本细节上的精准度，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彼此更加信任。有意思的是当地官方、民间都更乐意把来者说成是“美国女记者”，颇耐人寻味。

### 卫生部长与“五个一工程”

“2004 年元旦前的一天，卫生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高强一行人走在河南省上蔡县丁楼村外泥泞的小路上……。”媒体报导了高强到上蔡丁楼的消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报道几天前高强已经到访 Q 县银庄的消息。

2003 年 11 月 24 日，卫生部副部长高强来到银庄，许多村民记得当时情景。

栗新臣说——



高强来共 40 辆车，从董园到 B 镇，三四里路撒几十人岗。车直接进村卫生室，王菊梅（副省长）、董光峰（地委书记）、李留欣（县委书记）、王超峰（镇书记）、于文土（镇派出所长）跟着。卫生室安排挂针（打吊针输液）十几人，乡里、县里都派来医生、护士。还从乡里拉过来宣传牌子，写着关爱救助标语，“使罢（用过）就拉走了。”他们在卫生室说了有十来分钟，走了。高强、王菊梅他们从村卫生室出来，走生产路上北官路。到公路上，两边漫地里警察“围”不住了，一个快死的妇女拦着磕头，那是胡桥的女人，40 多岁，正发病，一脸疙瘩子。高强来村，她就一直偷偷跟着，岗（站岗的人，岗哨）不准她进村，就等在庄西头，见高强过来，她丈夫架着她撵上去了，乡干部拦着，推搡着不叫近前，武警拉住她乱“揉”，离公路有 20 米，她跪下了，磕两次头。老五们上去把她架走了。人轰轰叫，多哩很。高强说：“都不要动，我给他们说说。”说了有 10 分钟。高强讲话地方离一口机井有 10 米远，我护着井，叉着腿挡住，怕小孩掉里。人太多乱轰轰，看不见头里，听不清都说些啥。（田野手记 20060206）

栗老五说——

高强来银庄与我们到卫生部上访有关。高强来的几天前，夏书记跟我说：“老五，等几天我让你见个大官，比省委书记还大。你要好好表现。第一条，来了以后让大家不要乱，要维持好秩序，不能出纰漏。第二，上面首长来了以后，你们有啥要求可以向领导反映。”之后在 B 镇卫生院，夏书记召集我们几个艾滋病代表，安排我们说：“上级领导来了以后，要向首长反映你们的心里话，有啥困难如实说。”再三交待：“领导来说好说差就是你们几个的事，说岔了（说错了，说不得当了）这事我们就不管了。”那天高强来巡视村医疗室后，走到在村西头桥边，胡桥一妇女跪着哭喊，我和栗可运把她搀起来弄一边了。高强上车，去了县委小所。不一会，乡里要我们几个去县委小所，还有胡桥的刘文信。高强说：“你们一个一个发言，有啥问题，有啥困难，我们回去以后尽量给领导反映，再做商量。你们 K 地区是个贫困地区，不太富裕，我回去以后向财政部要求看能不能拨点款，能给大家办点实事就办点实事。”我第一个发言，我哭着说：“我们染上了这种病毒，无法生活，孩子上不起学，我们吃的水被污染，身体不太好，要求建一口深水井。”高强说：“别激动，慢慢说。”第二个发言是栗可运，也提出困难和要求。后来大家都说说。最后把大家提的要求合并一起，总共五条：第一，修一条路：上卫生院看病，路太泥泞，三轮车、架子车过不去，得抬人去卫生院；第二，建一所正规的学校：学生上学太难，房子简陋，早已列为危房，一下雨就放假，沟里都是水过不去，有几次小学生掉进沟差一点淹死；第三，在每个自然村建一所卫生室，吃药，打针方便，当时医院歧视，艾滋病人都不去医院，都是病人给病人打针，看病太难；

第四，建一个孤儿孤老院，年轻人病的病死的死，老人小孩没人养活了；第五，建一口深水井。<sup>①</sup>当时我们几个还为当地政府说好话。说，当地确实困难，也没有工矿企业，但是县领导还关心我们，看望我们，还给我们发米发面。其实他们啥也没有给我们发过，当时说的都是违心编的假话，想着这样说他们以后会对我们好一些。高强说：“你们这些病人，作为一个弱势群体，所提出的问题都不过分，当地政府没有给你们办什么事情，你们还给政府说好话。”副省长王菊梅说：“你们提出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今天我已经切实体会到这条路是多么艰难”，那天她的脚崴了，在村边生产路上，路上都是泥渣渣的。她说：“路一定要修！这些要求如果办不到，可以给我打电话。”市委书记董光峰说，“这些事情就不需要去找王省长了，直接找我就行了，我们四大班子要一对一的帮扶，完成这五项工程。”胡桥刘文信本人没有感染艾滋病，他的家属（妻子）有，他说：“为了治病家里钱花空了，孩子去打工了，家庭确实困难。”董光峰说：“刘文信你这个事情可以直接找我，我负责到底。”高强问：“你们中间有没有党员？”大家答：“没有。”又问：“有没有村干部？”答：“没有。”高强说：“你们中间没有党员也没有村干部，你们还为政府说好话，这种精神是值得敬佩的。”（田野手记 20060209）

市卫生局某官员说——

高强来的时候，市里领导，书记董光峰，市长高太华，都跟着。从“五个一”到“七个一”，在 Q 县委招待所开座谈会，县市领导座谈，这些我都参加在场。B 镇一个艾滋病妇女跪拦高强。当面都说得可好，啥事都答应。事后亲眼见高强拍着 B 镇夏书记的肩膀说：小伙子，事情不是这个弄法……。夏吓出一头汗。他们俩在前头走，我在后头跟着，听得清清楚楚。集体闹事，领导最反感。（田野手记 20060319）

据说，高强此番 K 市 Q 县之行，原本是为吴仪访问河南艾滋病村打前站探路，K 市之行效果不理想，才改道驻马店上蔡。当时 B 镇派出所《告银庄行政村全体村民书》中说：卫生部高部长来，一些人抱腿、拦路，在外界造成了不良影响和无可弥补的损失，影响了你们村的形象。（田野手记 20050322）

牛延东说，高部长来那回，夏书记找了我们 6 人，事先安排好该咋说，来高级领导了不能乱说，要保持一致。这 6 个人里头，3 个都已经死了。

### 建校事件与修路

**建校事件。**兴建学校是“五个一工程”之一。工作队最初进村，遇到的最棘手的第一件

---

<sup>①</sup> 这当是后来河南省在艾滋病重点村搞的“五个一”工程的雏形，以后又变成了“六个一工程”，加上一个党员活动室。

事，便是“建校事件”——

“……在建校工程上，县、乡在综合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后，决定将新校在原学校的基础上进行扩建，并于2月15日开工，但因该行政村栗庄部分艾滋病患者强烈要求搬迁校址，并多次阻挠施工队开工，致使建校工程迟迟不能动工……。在说服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确实无效的情况下，本着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原则，对煽动组织者、幕后策划操纵者和阻工闹事的首要分子，坚决予以惩处。2月27日上午，公安机关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抓捕了多次用广播组织群众阻工、闹事的为首分子1人，治安拘留2人。”（《驻Q县银庄村帮扶工作情况汇报》200411）

村民的说法完全不同——

村民代表栗可顶说：建学校的事不是村民们的错，这事从头到尾我清楚。先确定学校建到栗庄，是你县领导决定的，征地协议书是你领导说的，我写的，连青苗钱都付了，地也圈了，你们出尔反尔，变了，群众有意见。村小学原先是在小印庄，栗庄人多学生多，新学校建到栗庄，小印庄也同意，多数孩子上学近了。县委书记一句话，说在原校址上建新校，事情就变化了，群众反对也是正常的。打地基时候冲突几回，栗永喇叭上喊了，当做闹事头头给抓起来了。当时在老六家说建学校的事（谈判），他们（镇领导）讲不出道理了，就说不在栗庄建学校，因为栗庄啥也不算，地图上没有栗庄。我说：你那话说错了，地图上也没有B镇，你们、还有在你们之前多任乡干部，不都在B镇任职当官？国家给的干的湿的不是你们都拿走了？不都是群众给你们的？群众可没有说地图上没有B镇就不承认B镇不承认你们！你们承认不？他们张嘴没话。（田野手记20051211）

栗老五说：高强来在县委小所座谈会谈到建学校的事。当时村小学建在小印庄，而实际上小印庄、莫庄的孩子上学到大滩李小学，离那里近。银庄小学是栗庄、滩头村的孩子上学，这两村的艾滋病人也多。所以当时众人要求把新学校建到滩头村和栗庄之间，方便小孩上学。说，小印庄太远，他们村里艾滋病人少。高强当时表态：学校必须建到疫情最严重的地方。但是后来县乡政府还是把学校建在小印庄。当时有人塞传单到门缝里，内容是：高强部长、王菊梅省长说学校必须建到疫情高发区，计划建教学楼。但是现在有人用旧砖瓦在老地方建平房，没有按照上级领导要求的办，你们要坚持正义。上面还绘有图纸。村民们都坚持要把学校建在栗庄、滩头村两个疫情重的村。于是家家户户都有人去小印庄看建校工程，看见他们果然在用旧砖瓦下地基，都强烈反对，扒了。乡里张书记、徐书记、派出所所长出面解决，与栗可顶等村民代表商议，达成协议，建在村民马某某家责任田，青苗费都赔偿了。后来夏书记他们又要建在老地方，众人又去不愿意。他们说是“闹事”，就抓人了。现在建的

学校用料都是旧的，旧砖瓦旧檩条。说是造价 90 多万，根本不值！有人用小本记得有账，沙、料、假收条等等。抓人是下的圈套。他们说咱到乡政府去说吧，村民一下去了几十口子，夏书记打电话叫防暴队去抓人。人们见事不好就赶紧跑，跑得慢的就抓住了，见一个抓一个。小美（老五妻）胖跑不动，坐在三轮车上往家逃。夏书记说：凡来说事的，抓住！同她一起抓的还有刘玉英，拘留了 15 天。判决下来没有执行的还有 5 人，其中有我。派出所来家里问谁鼓动的？谁吆喝的？“俺都说不知道。”栗永是上集上买菜，带着儿子，在十字路口被抓走的，“刁住他哩！”

柳桂枝说：听说抓栗永之后，全村一家出一人去公社（镇政府）为栗永请罪，去政府为栗永担保。于安用手机拍照，谁说的多照谁；防暴队来了抓人，扭住拉上车；镇上说谁闹抓谁！大家散了……。（田野手记 20060207，200611）

**修路。**栗老五说，高强走后，乡里夏书记召集艾滋病人到 B 镇大礼堂说“五个一工程”“修路的事”，县委李书记来了。栗庄去有 10 多个人，都是艾滋病代表。县委李书记说：不铺柏油路了，用砖轧更好。大家不同意，说上头领导说修柏油路。李书记说：上头哪个领导说过？我们说，在县委小所高强、王菊梅都承诺修柏油路，你们要不修柏油路，我们就上北京去！镇副书记张华拦住了，说先说到这儿。事情就又搁下了。后来听说上面要来检查，镇上又说先修滩头村的路，那条路直接通卫生室，上级来人都从那条路上过。当晚县里的车连夜来垫煤渣，因为当时县里上报说路已经修好了，现在上级来检查，他们急慌了。他们抓紧买的砖，一毛六分钱一块，已经卸到路边，大家坚持不愿意（修砖轧路），他们又一毛二分钱一块卖了。大家强烈要求修柏油路，并且要求 4 个村同时修，都怕检查过后又落空了。大家不相信他们。最终，因为“五个一工程”还引发了一场上访行动。

## 七 上访与“闹事” =====

过了一年又一年，百姓不提官不谈，  
病毒携带死难免，往年岁月泪连连，苦日无头难到边，  
年年都有扶贫在，至今没有挨着俺，  
耕种就学都困难，左右全靠父母官，  
得到党的阳光时，重见天日建家园，为国为党作贡献。  
另向领导请求，为我们在（再）发放些救命药，使党的形象不断的展现在我村民心中……。

——摘自 2002 年 3 月 7 日银庄村民上访信

我为啥跑艾滋病的事？死人太多了。我没检测出艾滋病，我卖过血。我弟兄仨，俩艾滋病，还有妹子两口都是艾滋病，连外甥一个7岁孩子，也是艾滋病，还牵连着小孩姨一家染上艾滋病。我妹子春花19岁结婚后就卖血，这边有亲戚么，妹夫也一起卖。小孩子姨夫死罢了。还有我小大（叔父）小婶都艾滋病死罢了，小大只比我大几岁，都死了，俺这亲哩，三成去两成了，光毛（剩下）小的老的了，我这一样岁数的，就我一个好人（健康人）了。这因为这，我才一个劲“报复”这一行，“跑艾滋病”，死人太多了……。

——访谈笔记 20051206

面对已经发生的死亡，银庄人终于选择向上级反映疫情求救。这是一个艰难漫长的过程，从1998年到2004年，他们采取了写信、打电话、“跑”各级领导部门、集体上访各种形式。

### 村民最初反映艾滋病的事，“要签名按手印”（照片15）

牛延东是村里早期艾滋病信访的领军人物，他是村民中最早警觉到村庄正面临一场死亡灾难的艾滋病感染者，也是最早“跑艾滋病的”人。当时面临很大的压力，包括乡亲们的反对和不理解。“开始群众还不理解，还骂我、砸我的门哩！都不愿叫人知道有病，嫌丢人。所以最初反映艾滋病的事，同意的人签名按手印，不同意的不说他的事。最早只敢说无名热，不说是艾滋病。”最早“跑艾滋病的”，还有栗干臣、栗新臣、栗松才、莫昭红。栗新臣、莫昭红不是感染者，但是他们都卖过血，他们的亲人和“一门里的好些亲戚”都感染了艾滋病。现在栗干臣、栗松才已经死亡，栗新臣、莫昭红继续“跑”，“反映艾滋病的事。”

### 村医、村支书最早的反映信

《几例无名热病人记录》出自村医栗昭之手，是我所搜集到的所有“反映信”中最早的一份反映疫情的材料。写在几页当地一个初级中学的稿纸上面，字迹很工整，还专门用一页稿纸作了封页，注明：该（材）料是农历（19）99年6月18号，由支书、平均交王书记。当年的村支书是栗可昆，平均就是最早意识到村里流行艾滋病疫情的村医栗昭，王书记是当时的镇党委书记。可以看出，反映人对这份材料十分认真慎重。（照片16）

这并不是最早的反映信。栗昭说，在1998年春上，他已两次将村里“疑似病例”列表上报乡防保站（防疫保健站），比这一份材料还要早一年。栗昭说：“一直压到1999年夏天，发病人越来越多。收公粮时，支书找我商议再次向上级反映。这一次写了好几份材料，我写的，村支部书记以村支部的名义又打印了7份，盖上村委会公章。送往：乡政府防保站、县防疫站、市卫生局、省卫生厅等等，有送有寄。无反馈，一直都没有结果。“我是大夫，得听政府的，站长知道我知底情，不敢扩大影响，不知到底有多大利害。”后来就是牛延东他

们艾滋病人自己往上反映了，牛延东主张反映到卫生部，他负责寄发，与尹大奎保持联系，反映多次。“我有时也为他们写写材料，1999年底还写过一次。艾滋病人兑钱（凑钱）向上级反映。反映多了，乱了，我就‘退出’了，不跟他们搅合。我自己印材料自己掏钱。牛延东他们后来主要是电话反映，写的就少了。”（田野手记 20060124）

### 村民发往各级领导的上访信

村人说当年写了许多“反映信”，但是大多没能保存下来。而那些散乱存留在村民手中的信稿，有手写稿、复写稿、打印稿、复印稿，收集起来，竟然还有满满一大包。牛延东和栗新臣一边翻找当年的上访资料（照片 17）一边向我细数向上级反映疫情的经过：农历（19）99年6月18日，资料交给王书记，还说是反映“无名热”；2000年10月终于在地区防疫站得到检查结果是 HIV 阳性的化验单，开始直接写“艾滋病”；2000年11月23日村委会出证明，群众代表“跑着”反映；2001年元月14日发特快专递寄往北京市西直门南路一号卫生部疾病控制司；2002年3月7日向卫生部民政部等部门同时发资料，也是特快专递……。

中共中央卫生部、民政部领导你们好：

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享受着中国共产党的关怀和爱护，我们多么希望有一个好的身体，为新中国服务，和有病得到诊治和康复，为此，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我地的**无名热病**情况。该病死亡率高，密度大，在发病地方人们恐惧万分，一片凄凉害怕心理。百米地边能有4—5例死亡，发病者多为青壮年，不知不觉间丧失了年青的生命，丢下老小生活不能自理，请上级领导和有关部门见信后，为了人民的生命和国家兴存，如饥似渴的到该地做出防疫、控制传染和预防措施，对我们地方的**无名热**尽快控制，救救我们吧。谢谢为盼……

（村民上访信 19991009）

尊敬的中共中央卫生部、省卫生厅、B镇政府各位领导和我国从事艾滋病研究和预防控制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您好！

辞旧岁迎新年，我心忧畏安，现将我村的情况向领导汇报一番，我滩头村人数500多人，献血人数200多人，自1999年至2000年两年死亡30多人，暂且不讲，且说自2001年2月1日至10月22日死亡15人，其中不计老年死亡人数，情况分别是：

2001年2月1日：胡兰，女，现年32岁，病症：发热，食欲不振，口腔严重反复真菌感染，消瘦，病期较长。

2001年2月6日：海华娘王氏，49岁，发病气喘，皮疹（疹），口腔真菌感染，淋疤（巴）肿大、消瘦，久治不愈而死。夫妻双亡，四个小孩单独生活。

.....

(村民上访信 20011201)

——这些当时村民自己写下的文字，真实形象地记录了当地艾滋病疫情爆发时的情景和人们面对灭顶之灾的惊恐。尽管许多地方文辞不通称谓不当标点语法不合乎规范，但意向明了心情十万火急。它们记录了这里百姓“挣命”的过程，也见证了一段人间灾难的历史。

### 行政村党支部村委会的疫情报告

银庄村党支部、村委会多次直接写信反映疫情，向各级政府有关部门面交或寄发《银庄行政村党支部村委会关于向上级领导申请紧急用药的报告》、《关于要求向我村速派医生、专家给我村患者诊疗的报告》等报告。(照片 18)

这份《特情汇报》是银庄人自己的现场记述——

### 特情汇报

.....

自 1999 年以来，我们村党支部、村委会及本村医生发现了多人病情，立即形成文字向当地政府作了报告，可是拖了几年，我们没有得到政府的解决，因此，我们的病情越来越重，最后，又有栗新臣、牛延东、栗干臣三人向中央卫生部电信联系，上级派出医务人员给我们做检测化验，当时，参加 295 人，经检测携带病毒而办证的 198 人，没有办证的 97 人，因其他原因没有检测的人员 218 人。发现我们的病情越来越多，病情越来越重，于是给我们拨款 5 万元建立诊所，由我们村的村医组成联合诊所，在这期间上级给我们拨款 3 万元治疗该病，结果又被镇医院、联合诊所用去 40% 以上，而我们的患者只享受 60% 以下。我们两村的发病情况多种多样，已经死亡 63 人，现在携带此病毒人员和没有参加献血的人员心情都非常沉重，心里非常担心害怕发病和传染。

如：栗合香，38 岁，经多方求医花费了大量的经济，东拼西借，外债累累，最后医治无效而死亡；栗开臣等二人，家庭困难，无钱治疗，承受不了病毒的折磨，服毒自杀；王桂英，48 岁，病毒现已侵入面部，长期发烧，造成双目失明，多次触电自杀未成(现电路已拆除)；栗海周，39 岁，病毒已侵入头部，右眼已失去了光明，日日夜夜饱受病毒的折磨，痛苦难言，现正在治疗中；栗开香，4 口人，可他的家庭发生的悲剧更让人悲痛心寒，在两年内死亡 3 人，只剩下年过高龄老母一人，生活无法照顾；栗海民与栗海军两人，33 岁、31 岁是同胞兄弟二人，在两个月内相继死亡，而他们的爱人带着孩子再婚，现还有一老母在家独自生活，为了思念她的子子孙孙、造成精神失常，疯疯傻傻；牛俊友夫妻二人，在一年

内相继死亡，只剩下4个孩子独立生活，长子15岁；栗永臣，44岁，因患此病而死亡，可他的妻子又是病毒携带者，精神失常，无法维持生活；栗可锋，其家属因患此病身亡，两个孩子被迫辍学，综上所述，给我们这两村造成经济困难，被迫辍学36人，长期拖欠学费的32人。

因此，我们全体村民，强烈要求政府援助我们防治和预防药品，后来给我们一批“双汰芝”，患者服用以后，病情有所好转。我们两村全体1100多人，衷心感谢党和政府和各级领导及有关单位。但是药太少了，很多人吃不上，现在情况又开始严重。

我们全体村民，跪求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伸（伸）出温暖之手，救救我们，使我们的疾病得到控制和预防，让我们这些患者在党的领导下，重见阳光，早日康复，为强国富民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报告单位：银庄行政村（公章）

村负责人及代表：栗可昆 栗灵山

牛延东、栗新臣、栗松才、牛炎亮

栗庄全体村民

滩头村全体村民

二〇〇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 控告血站非法采集血液罪

2002年7月银庄村党支部村委会对血站提出控告，控告血站非法采集血液罪，将血站告上法庭。

#### 控告状

控告人：

Q县B镇银庄行政村党支部

Q县B镇银庄行政村村委会

Q县B镇银庄行政村村民代表及受害人家属（详细名单附后）

被控告人：

高金顶：原Q县卫生局局长

龚士宾：原Q县血站站长

究国聘：原Q县血站会计

张新民：原项城市血站站长



案由：非法采集血液罪

控告请求：1、依法追究上列被告人刑事责任；2、责令上列被告人赔偿受害人，受害人家属死亡补助费，医方费等共计 万元。

事实与理由：上列被告人自 1991 年始，相互勾结，为谋取暴利，非法开办地下血站，进行非法采血活动。他们不仅不按照上级卫生部门的要求进行采血化验，反而出现只交 5 元钱就可以合格采血的严格违法现象。由此导致卖血者很多，来自好几个乡镇。卖血者是青壮年劳力，但没有意识到严重后果。由于血站违法操作，导致他们中 98% 以上感染上了多种病毒。以 Q 县 B 镇银庄最为突出，仅 98-99 年间就因感染病毒死亡 85 人，染病人数更是无法统计。几年以来，出现无人抚养的孤儿达几十人，因家庭主要劳动力死亡的导致耕种荒芜上百亩，接连不断地从村里传来悲怆的哭声，令人触目惊心，惨不忍睹。2002 年以来因感染病毒又有十多人死亡。

综上所述，上列被告人置卖血者的生命于不顾，在金钱和利益的驱使下，私开地下血站，其行为已严重违反了国务院《血液制品管理条例》，同时在采血过程中，违法操作，造成大面积经血液途径传播的疾病的传播，造成多人重病死亡的特别严重后果，其行为已触犯了刑律，根据《刑法》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因上列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众受害人造成严重经济损失，被告人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此致

二 00 二年七月十九日

### 找血头算账！

村民栗长山说，他们开血站，都发财了，我们有病了。不是这病，我会在家闲着么？那时在郑州黄河路给人开车，一月七八百，在宋寨饮料厂做饭，一月六七百。现在啥也干不成了。得找血头算账！先找项城血站站长张新民，是通过项城县环城路派出所管哩（调解解决），我们去了 7 人，所长拿出 2000 元，张新民出的，一人分二、三百元，谁去谁分钱，不够吃两剂药。再找不中了，派出所不愿俺意，说，净胡闹！也找过 Q 县血站站长龚志宾，他家住河南刘楼，县公安局治安大队长卢峰带队把我们撵走了，没见着龚志宾的面，见着他不会算毕。还找过郑州啤酒厂附近私人血站老板老曹，他后来住同乐小区，要找他问问他负责任不！老曹应当出点（钱），老曹有钱，他俩儿也都中（有钱）。老曹两口没事成天骑着摩托乱转，在郑州街上碰上他一回，撵他没撵上，他开摩托我“地嘣”。我问着一个老婆，说他就在这楼上住，我在门口等一上午没等着……。

### 集体上访省城、北京

许多艾滋病患者由于绝望而心理失衡,加之目前的救治救助工作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艾滋病患者便串联起来,以各种方式向各级政府施压,……。为数甚多的艾滋病患者抱着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心理,有意制造有影响的群体性上访事件。其中最为典型的有500多人围堵县委,100多人围堵K市市委大厅达36个小时,并殴打市委工作人员,数十人到省委集访二次,到北京集访三次,最多的一次达56人,给郑州警方和北京警方造成了压力。北京市公安局曾派专车千里“监护”数十名B镇艾滋病患者回Q县。此类不安定因素已突破了地域概念,其社会影响的负效应目前尚无一种评估标准和评估体系。

——银庄工作队《K市市Q县艾滋病高发区社会治安状况的调查报告》200412

最早向上级反映情况是从滩头村开始的。主要方式是“信访”:从1998年春天起,向当地卫生防疫部门打报告,向卫生部卫生厅写“反映信”、打电话,“跑”的范围主要是当地县、市卫生防疫部门。像卖血一样,栗庄上访也是后来居上,从2002年冬季开始,采取“群访”的方式:“我们闹哩大!”栗庄人说,群体上访,直奔省城、北京。更多的时候,整个行政村是“协同作战”。最早滩头村写“反映信”栗庄也有人参与,后来“群体上访”栗庄人出面挑头,滩头村、莫庄、小印庄,包括周边一些村庄也有人参加。规模比较大的集体上访有5次:省城2次、北京3次。上访的目的,最初是反映艾滋病疫情、要药,之后要求正规治疗,要求检测CD4,要求改善生存环境。

**第一次省城上访,农历2001年11月(农历),“下大雪跪省政府。”**共7人,其中4人已经死亡。说起这次上访,栗庄人情绪很激动,其中有兴奋有悲伤,还有自豪感成就感——

第一次告状,就是跪省政府跪大雪那回,都是栗庄人。目的就两个,第一要药救命。第二反映疫情,叫上级领导知道当地发病情况。回来就拨药(发放药品)了。

那时候在牛延东家检测过以后,滩头村有几十人领上药了。滩头村跑的药,不给我们栗庄吃,他们说“这是俺要的药,要吃你也去要。”激着我们也去跑。那时栗中才病重,也吃不上药。保良发病上卫生室,不给药。他们哭着找支书,说一分钱也没了,吃药不给,看病看不起。支书说,去要,不叫吃药不中!2001年11月间,大冬天,栗庄人上省里了。到郑州,下雪了,白花花哩大雪,我们一身是雪。去要药,可运领着,中才、五营冲锋陷阵。那是头一批“闹家”,给大家要来药了,他们都死罢了。信访局,别人进不去,我们都进去了,只有省委没进去,两车防暴队专门看着我们几个,不让进。我们吆喝着:见个官都不行么?他们出来个人,领着我们上信访办,到信访办领我们的人就溜了。可运一进去,就被信访办的人拖出来了,我们几个人一起上前,拖可运的人也溜了。听说我们是艾滋病,没人敢惹我

们了。我们的问题信访办答复不了，后来就又去省委门口。防暴警察又去了几车，全副武装。中才发病躺倒在省委门口，防暴警察不敢动了。后来跟人家说明情况，防暴队人很同情，说我们是对敌人不是对付你们哩，还给我们买水喝。两天以后乡里才知道（我们上访）。就是上郑州（上访）那一年，光栗庄死了 20 多人。（访谈笔记 20070704）

时任村支书栗可昆说：那回是在村里商量好走的。2001 年末，可运、中才、五营三个人跟我商量，要去要药，“不上省里要不回来药。”我说去吧，不去也没有药，谁都不要让知道。这三个人都死了，他们是第一批上访的头儿。当时瞒着县乡，去了七八个人，另外还有长山、华中、满囤他们几个。去（路上）一天，在那呆一天，第三天乡里找我，说把他们几个叫回来。我说我叫不回来。他们叫我跟他们一起去。一起去的人有洪副镇长（负责文卫）、李广（镇卫生院长），住工业大学宾馆。当天到省委没找着人。第二天他们给了我 100 元，让我自己坐出租车去找人。我一大早 6 点钟找到南阳路上，长山妻在那里扫大街。她说他们找过她一趟，打听地点路线，现在去省委了。我找着他们，打电话给李广。李广说叫他们来住工大宾馆，好一块打钱（付费），好商量。他们几个不去。洪镇长、李广就去省委接待室找他们几个，接待室里人吵他俩，叫他俩出去。他们打电话给县里，县防暴队去了几车人，车停在工大宾馆院里。等可运几个人跟着他们来到工大宾馆时候，见防暴队的车停那哩！不敢进了，怕抓他们。最后说“破上了”（豁出去了），才到宾馆商谈。那次县公安局副局长卢克也去了。在工大宾馆里，关上门谈，怕人家听见是艾滋病。五营大哭，边哭边说，娘啊，不能活啊……。在场的卢克们都含泪，坐那也不敢动了，场面很感人。我踢五营两脚，卢克拉住了。这是事先商量好的，可运说“俺闹你收铺（收场），俺哭你就打。”后来镇上徐副书记去了，问有啥要求有啥条件？就说要药，都答应了，还报路费，1 人给 250 元。怕他们拿了钱上北京，要我一定跟他们一起回村。让他们坐公安的车一块回，他们不坐，怕把他们拉公安局关起来。政府方面也不放心，防暴队去三四辆车，戴着头盔手套，开车把人送到车站，又买车票看着人上车。我跟艾滋病人一起上客车，他们小车跟在后面，一直到 K 市。从 K 市到县里又觅昌河车花 20 元，吃顿饭。回来后，可运把钱分给大家。以后就拨药了。（访谈笔记 20070704）

**第一次北京上访，2003 年夏季，检测 CD4，“人家还不知道我们这里有疫情哩。”**第一次上访北京是两年之后的 2003 年夏季，目的是要求检测 CD4 细胞<sup>①</sup>。挑头的是栗庄的老五、老六，但多数是滩头村、莫庄的人，还有银庄之外的大滩李和卞路口乡的人，共 20 人，都以银庄人的名义，“外村人不敢暴露。”在北京地坛医院做了检测。

<sup>①</sup> 艾滋病检测很关键的一项指标，当时基层医院没有检测条件。

栗老五说：怕县里阻拦，绕道淮阳。到卫生部反映当地艾滋病人数量，贫困情况，说明当地不能检测 CD4 细胞，要求在北京检测。卫生部送我们到地坛医院化验。传染科赵主任，女的，给我们找两个病房，男女分开住下，还给买的盒饭，说：“今天晚上你们都别动，就在这休息。”第二天抽血后，赵主任让我们先回去，说化验结果出来后，用传真打到当地，化验结果要好几天，别在这等。我们说不回去，要去民政部要求救助。这时，镇党委书记、派出所长、县信访局长、防暴大队到了。他们向北京警方报警，说我们在医院闹事，北京出警到地坛医院，问：“谁在这闹事？”赵主任说：“人家没有闹事，是来看病的。”有人在对讲机里说：“就是他们闹事，全抓起来！”赵主任说：“你们抓人不能在地坛医院，出了医院你们想咋办咋办，你们在地坛医院抓人，记者马上曝光。”北京东城区分局警察把我们叫到分局门口，又拍照又录像，问情况。我们把情况详细说了一遍。东城分局的民警很同情我们，拿矿泉水、馒头给我们。当时我们都穿着胶鞋，来的时候发大水，他们又给我们拿鞋子。我们 4 个村选 4 个代表跟书记谈判，书记说，回去再说。我们被劝回来了。半月后北京传真发来结果，有 4 人 CD4 细胞只有五六十了，正常应当是 200 至 800。

莫庄莫昭红说：第一次上北京俺庄有 7 个人，滩头村 8 人，栗庄 2 人，小印庄 1 人。还有大滩李一个，卞路口王庄的一个，也都报的银庄人。总共有 20 人。现在还有十来个人，剩余的都死了。大滩李那个叫李建民，就是上北京打一针活半年的那个，也死了。20 个人，就给他自己打一针。他当时高烧、喘，地坛医院给他打了一针，保持半年多，回来以后，活了七八个月、年把子才死。李建民 39 岁，去时就抱着死的目的，在家又没有人救，那时也没有本子（艾滋病免费医疗本）也没有药。他自己带着药，去时就喘着。本子是回来才办的。夏天，正发水，趟着水去的，水到膝盖深。（录音整理 20050212）

小印庄张建峰说：2003 年，非典之后，老六、老五在他们本村组织不起来人，到外村组织的。到卫生部接待室，老六当代表递上材料，说说情况。当时老六测 CD4 只有 60 了，现在恢复得不错。卫生部办公室主任陈文杰接待我们，让我们住地坛医院病房，是非典后的空房。第二天抽血检测。当天下午 B 镇书记夏新到北京，没找着我们的地方。第二天电话联系上的，是我们给他打的，就跟他回来了。当时北京还不知道我们这里艾滋病疫情，说“噢，你们那里是疫情区哩！”年根儿高强来解决问题了。这是上访最成功的一次，也就这一次成功。其他的都没有达到要求，有的就没有走到地方。以后政策严了，规定上访 3 次书记就地免职。就只好出去了。（访谈笔记 20070617）

**第二次省城上访，2004 年农历正月 12 日，抓捕，“决不再上访”保证书。**银庄人平日不看报纸，也没有报纸可看。这次有人从县里拿回来一张报纸，上面说，K 市艾滋病村实现

了“五个一”，艾滋病人过上了幸福生活。“其实连‘一个一’也没有，我们的生活该咋样还咋样。”村民们说。“当时高强、省里市里县里领导来都表态，说‘今后有问题直接找我们解决’。我们就去找他们了。”这时，第一批上访精英栗可运等已经死亡。新一批上访者加上一个司机，共去 10 人。他们说——

拿着报纸先到市里要求快弄（尽快落实“五个一”），“报上都登出来了，还不快弄？”还要求解决孤儿上学、艾滋病人吃药的问题。市里抓政法的书记接待的，没有结果。从 K 市回到县里，张华（镇副书记）“刁着”我们一起到 Q 县委，找不着人，我们就从县城直接上郑州了。到郑州就天黑了，几人住在南阳路和东风路交叉口一个招待所，一人 15 元一天。第二天上卫生厅，西楼接待室一个女的接待。一说这情况，人家不信，打电话叫镇上对质。夏书记去了。人家问他：这些人反映的是否属实？书记不吭气，光劝我们回去。我们是进去 3 个人谈判，“我们知道上访说事不能超过 5 个人，就推选出 3 个能说的当代表进去谈，我们没有违法。” 3 人出来给大家一说情况，大家不愿意了，说条件不答复不回去。夏书记上卫生厅办公楼上打电话叫县公安局防暴大队。米政委带队，来了三四个人。夏书记捏好的圈，说：“在这受冷，回去吧，给你们解决。一个人补助 300 元，算是花的车费、吃、住的费用。”卫生厅那女的也说：“回去吧，我们给当地打电话了，会尽快解决问题。”我们就跟他们回来了。谁知走到 Q 县高速路口，县公安局 100 多警察在那等着，一下把我们拉到拘留所了。他们叫我们从车上下来直接上警车，俩人拧一个，他们掂着警棍、盾牌，打人。老六慢了一步，被拖倒在地上，一路拖着，衣服皮肉都拖烂。弄到拘留所里，不是代表的 6 人第二天放回去，不超过 24 小时，3 个代表拘留。放人时候都得写保证书，保证今后决不再上访。

代表栗长山被判拘留 10 天。长山说，我刚一到就叫他们踹两脚——他们拧我哩我不叫拧，申辩了两句说：“俺只反映反映情况，不信打电话问卫生厅那女哩”，他们就踹我两脚。在拘留所没法，出来给那女哩打电话，她说：“他们是不合理的，违法的。”从拘留所里出来以后，多长时间都拄着棍走路。本来就有风湿病，里面潮。“之后我再没有去上访了。”夏书记说：“只要去，去一个逮一个！”当时说每个人给 300 元，从拘留所出来，我找夏书记要，他说：“还要钱哩？还拘留你！还想在里边不？这回上级有指标，不信现在就弄你！”用伞把戳我两把子，他打着伞，那天下雨了。这事不能算毕（完），早晚一天要翻，这拘留证我留着呢（从桌上的旧电视机下摸出拘留证给我看）。拘留不为赖（不算丢人），比偷人家叫人家斗着了强……。哪一天还去找他，发病时去！他娘，给他很“糙”！

**第二次北京上访，农历 2004 年 5 月 24 日，接访。**第一次去北京检测之后，人家很快传真过来了化验结果。村里其他人就也想去检查。2004 年，麦收之后，又有 22 人一起上

北京，目的还是检测 CD4。这次以栗庄人为主，也有滩头村人，还有几个妇女参加。阴历 5 月 24 日去的，26 日回来的，县里去接访，在省防疫站做了 CD4 检测。

上访者说：半夜到北京，天明找到卫生部，人都坐门口一片，不走。里头出来两个人问啥要求，就说要求检测 CD4，还有人提要求，说要房子，人家说一人再给娶个媳妇哩！他们第一次去人家待得可好，一人一袋方便面，还给鞋穿。这一次人家给 200 元让买水喝，他们几个领头的分了，其他人见不着。找过住的地方，地下室，预备挤一夜，蹲着，不睡床，一人一夜 10 元。老板说是不是上访的？上访的不叫住，这个附近有通知。也没住。到晌午一两点找地方吃饭去，见到派出所的人，就吓跑散了，说是乡里人在啥啥地方“哨住”咱哩！老四、老五、老六先跑了，男的只剩下三四个，还有六七个妇女们。剩这几个人一碰头，说跟乡里县里来的人谈谈，不行就跟他们一块回去。后来他们说拉回郑州化验，就都回去了。下午 5 点找一辆客车拉回来，半夜 1 点到郑州作 CD4 检测。一次去 3 人，怕惊动司机，人家知道是艾滋病就不拉了。栗现臣一路上自己给自己打针，回来不久就死了。

**最后一次北京上访，农历 2004 年 11 月，规模最大，被“截防”。**这次男女老幼 56 人，半道被“截防”。“县里派车撵到太康，撵回来了，没有成功。那时候工作队已经进村了，老点是‘内线’，给工作队通气报告，半道上司机接到一个电话，车就开慢了，后面县里车撵上来堵住，大家只好跟他们回去了。”（田野手记 20050212）

除了以上几次影响较大的上访，小规模上访还有许多次。栗松才说，艾滋病人上访，主要是要求正规治疗，但是一直做不到。到现在还是不能正规治疗。我到省卫生厅去过两趟。头一回 2004 年正月 12 日去的，三个要求：第一“五个一”工程报上说完成了，实际上没有，要求兑现——这是起因；第二就是要求正规治疗；第三要求发展生产脱贫致富。二一回和栗新臣几个人一起去的，11 月份，那时候工作队已经下来了，村里还是死人不断，就又去一次，主要就是要求正规治疗。全村去了几批人哩，光上北京就好几趟。（田野手记 20060209）

#### **一位接访的县公安局警察：“真的很可怜”**

2004 年 6 月份，艾滋病人上北京，22 个人，我去接防了。县里领导去了好多人，县委常委、统战部长等等都去了。我们公安局去了 3 个人，有副政委。艾滋病人在北京上访，也分几个等次：一等的，有吃的、喝的、住的，就是那些称“头”的；二等的钱少买小吃；三等的没有钱吃饭，自带馒头；四等的没吃的。有的发病了，自己带针打。“我亲眼看到艾滋病人给自己扎针。”（侧身在自己臀部比划着）你不知道，真的很可怜。他们中间有的人就不知道去干啥，有的病得快死了，也跟着去。一说叫回家，都说想回家，说在外头受罪。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求救治。但是不应该卫生部门管的事也反映，反映别的事，包括羊被牵走了，

还有房子的问题……。他们上访想表达自己的意思，但是又不知道怎样表达。要说也够硬气的，见他们没吃的，饿着，卫生部接待他们的姚主任拿了 300 元钱，让他们去吃饭，他们不要，说来是反映问题的，不是为要钱的。其实他们有人真的是饿着肚子没有钱买东西吃。那次最后还是在郑州化验的。化验结果出来了，有一个 HIV 化验结果是阴性，栗庄一个女的，她是跟另外一个人重名弄差了，高兴死了。我们去，县领导主要是让防止失控。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过激的行为，他们也愿意回来。当时几个挑头的害怕回来算账，半道都跑了。

### **主管县长：“他们快死的人了，神经不正常”**

杨副县长专管卫生，说他到北京接待过两次。他说：第二次，我与卫生部负责接待的姚主任谈了 40 分钟，跟她说明艾滋病人神经都不正常。都是将死的人了，说走就走。那次他们是要求检测 CD4。到北京是星期六，医院检测是星期一，卫生部接待部门都安排他们住下了。我跟他们讲，检测 CD4，当时县里市里都不能做，只有省里能检测。这些艾滋病人不到省里，为什么到北京？舍近求远，说明他们头脑不正常。现在你们都给他们安排好了，管吃管喝管住，他们咋不来上访？现在我们把他们接回去，到省里给他们做检测，保证检测好。如果你们同意，我这就去找车，费用我们县里出，也不用你们花钱了。那一次，出去上访的艾滋病人很多，县委很着急，主管副书记都出动了。回去后，我坐在银庄村室等着他们来反映问题，他们一个也不来。B 镇党委书记说问过他们了，说是去看打工市场，有的就说去看看天安门。这事就发生在 2004 年夏天，工作队已经进村了。他们脑子有问题，思维不正常。几个领着闹事的人，都死了，就是因为脾气暴躁。我跟他们说，你们上访脾气暴躁，死得快，不要再闹了。再闹对你们没有好处。（访谈笔记 20060322）

## **八 7.15 事件：“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2005 年 7 月 15 日，Q 县城内一天发生 3 起艾滋病人“闹事”。上午县城里最大一家超市万家乐生活广场被砸；下午城管大队殴打艾滋病人，6 名被打成重伤住进医院；愈聚愈多的群众要求解决问题找不着人，砸了城管大队又一起“噏到”县委县政府。这就是很久未能了结，政府头疼棘手，群众怨愤难平的“7.15 事件。”万家乐闹事主要牵涉的是滩头村，城管大队打人主要牵涉的是栗庄，都是银庄行政村的。

### **一天砸三场**

一位现场人士说，万家乐超市为吸引顾客，推出“买 20 元以上商品免费照相”的促销活动，但冲洗放大照片收费不明说，其实带有欺骗性质。2005 年 7 月 15 日上午，滩头村艾滋病感染者牛俊方的女儿在万家乐超市购物之后，照了照片，被收取 20 元钱，感到上当受骗

骗了，回家告诉了牛俊方。牛俊方带着女儿、儿子一起找商场要求退钱。商场保安推搡起来把牛俊方打倒在地。牛俊方打电话回村里呼救。滩头村不少人一起来到商场理论，要求找经理谈判。一听说是艾滋病人，经理不敢见。人越聚越多，商场打 110 报警，警察到场也只是旁观，僵持有 40 分钟。而这时被打翻的牛俊方在地上已经躺了将近 2 个小时。时候长了，人们开始烦躁，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有人开始拿柜台里的茅台酒、饮料等商品。一个保安用手机拍摄现场，跑来帮忙的牛俊方的外甥杨振廷看见了就去抢那保安的手机。原意应该是阻止他拍摄，并不是抢劫，撕打起来，人群乱起来了。人们砸了监控录像，据说还有一台录像机下落不明。其实当时只要有人出面维持秩序，局面不至于如此。但是无人敢出头，都怕担责任，警察到场 40 分钟不作为。最后说第二天到河北派出所谈判处理。结果第二天到派出所谈判的人都被抓起来了。（田野手记 20051210）

同一天下午，在县城的另一个地方，栗庄在县城蹬三轮载客的艾滋病人与城管大队发生事端。城管大队把 6 名艾滋病人打成重伤住进医院。其中一人挨打时还带着 4 岁的女儿，小女孩被吓得发烧几天。当天下午 3 点，被打者家属到处跑着喊人，银庄村喇叭也在喊：滩头村、栗庄人被打了！银庄人一听说村里人挨打，4 个庄人都去了，开着大蓬车。还有刚砸了万家乐超市的人，一听说也直接就去了。当时传得厉害，说是打死人了，肠子都打出来了。来到打人地点青年广场，没见到人，大家很着急。听说在县医院，就直接上县医院。见几个人在门口躺着，春营被打得最重，还有人鼻子、脸上流着血。大家去找院长，说正开会，让等一会。又找到城管大队，里面没人了，都吓跑了。人们砸了城管，又涌向县委。也没敢进门，只是喳喳着，要求反映情况，县里也没人出头。乡里去人了，刘镇长带着，让人回去。几个村干部和艾滋病人代表上医院去看病号，刘镇长和乡里干部也又去医院看看，又劝大家回去吧！县里、乡里都去人调查情况，说第二天再处理解决问题，村人就回家了。

### **没想到会“捺人”**

第二天，7 月 16 日。栗庄、滩头村兵分两路，一路去医院看望病号，一路到河北派出所谈判解决万家乐的事。

栗庄一路到医院看望病号。4 个村干部去了 3 个，加上家属和村民代表，共有 20 多人，乘坐一辆昌河车。医院一次进不了太多人，村干部和家属先进去，余者先在外面等候。村主任说，到医院正看病人哩，只听有人喊：医院叫防暴队围住了，抓人哩！我赶快到门口去看看，腰里挨了一棍叫堵回去了，警察说：“回去，不叫出来！”出来时才知道在外等候的几个人被抓跑了，连司机也被“闷”起来了，当场“捺”了 5 个。没想到会“捺人”。

滩头村一路到河北派出所。去了 8 个艾滋病人代表。一进门就说“分别谈”，一个个隔



离开，全部都叫抓起来了。

医院、派出所俩地方共抓起来 13 人，最后批捕了 7 人。除了牛延东保外就医，关押 6 人。（田野手记 20051203）

### 万家乐“闹事”升级到“案件”，6 人判刑

2005 年 7 月 16 日，万家乐“闹事者”牛俊方等 7 人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聚众扰乱社会罪于被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05 年 7 月 27 日经县人民检察院批准，于 2005 年 7 月 28 日被公安局执行逮捕<sup>①</sup>。艾滋病感染者押于县行政拘留所非感染者押于县看守所。2005 年 11 月 24 日，县检察院提起起诉。2006 年 2 月 12 日县人民法院以“刑事附带民事”做出判决：分别判处 6 人有期徒刑，并赔付万家乐商场经济损失 98849.4 元。首犯牛俊方判刑 3 年，其余分别判刑 2 年半、1 年、8 个月。

我走访了相关律师和司法部门。牛超云律师是当地人，自学考取了律师证，在县城开办律师事务所，在万家乐案中担任被告方辩护律师。他说：“本来有理的事，结果弄砸了。”这个事本来是商业欺诈。他们欺诈在前，打人在前，事情是由这引起的！说是商场 9 万多损失，证据不足，这是他们单方面说的。因为万家乐一方施加压力，县委要求严判，完全是行政干预，政治因素。现在虽然说成是艾滋病犯罪了，但是可以虚判，监外执行。都穷得丁当响，往哪放他们？原来与法庭都做通了工作。结果我到上海去办案，接到通知说还是判了，实判。已经判了，还可以反诉，但意义不大。不过，啥事都可以变通。看看能不能变更变通执行。能改成监外执行就好，少受罪。农民也不争求啥政治名誉。

他向我建议：你可以找一找庭长，再了解了解庭长的态度看法，法庭具体审理，最了解案情。你是上面来的，他们总会听听你的意见。你是有身份的人，应该到检察院、信访办反映反映。这事，艾滋病人不服，还要闹。媒体一旦介入，对当地政府形象影响不好。（访谈笔记 20060321）

于是又走访审议庭庭长。庭长说，案发 5 个多月的时候，法院有个意见，认为都是农民，不懂法，教育为重。因为已经都 5 个多月了，就研究决定，一般的判 6 个月，严重的判 1 年。可法院领导说，这事必须请示县委政府，因为县委政府打招呼了，要求这个案子必须通过政府。政府那一段事多，就先压那了。等他（政府）想起来过问的时候，已经 7 个多月了。只好最少判 8 个月。为区别轻重量刑，还有的判 1 年，两年半、3 年的。最后庭长说，就这算是“宽大处理”了，原先说的量刑还要重，“顶级判，全部判 5 年，坚决打击严惩！”说是因为艾滋病群体犯罪，一定要重判。（访谈笔记 20060322）

<sup>①</sup> 其中牛延东拘留期间发病，拒绝治疗并绝食，“保外就医”。

## 城管大队打人事件不了了之，1人死亡

2005年岁末，距离“7.15”事件已经快半年了。当时被打成重伤的6名艾滋病村民，找县委、县政府，找打伤人的城管大队，“想讨个公道讨个说法。”奔走求告了将近半年，不是无人理会找不着人就是被来回踢皮球，一直没有得到答复。这种“找”是小心翼翼的，每次都向镇派出所报告，派出所长是默许甚或是支持的。他说：城管是块肥肉，打伤艾滋病人，赔偿三万二万，过个肥年，比救济三二百元强。那一天眼看着几个上县里“讨公道”的人，是从派出所说好了走的。所长说要抬着已经发病的栗留安去县政府，倒是留安家人不忍心，留安妻代替留安去了，留安躺床上已是奄奄一息，“折腾不起了。”当天镇里接到县里电话，说B镇艾滋病人大闹县政府，影响办公了。问从县里回来的艾滋病人，却说，根本没去县政府，到城管大队都没见着人，“照不着头，就回来了。”“好话还没人听哩，敢说别啥？”那次之后，他们又找了好几次，只有一次说是见到了人，说“两三天之内给答复。”他们以为有了希望，但是后来就又“找不着人”了。终于，有一天（20051212），他们真的拉着重病的留安到县上“讨公道”去了。仍是无人理睬，留安喘着说：就把我放那算了……。晚上，大家还是抬着他，都回来了。第二天（20051213）派出所接到上级指示，通知他们：“不要再去找了，再去就抓人哩！县领导下命令了！”这一天他们找到我，说：我们准备明天就给派出所说，也不再找他们了，要直接上北京去。“打了我们的人，不信找不着说理的地方，留安都成这样了，如果早点能赔他2000元钱（要求实在不高，一条人命）买点蛋白营养药，输输就能缓过来了……。”他们问我：刘老师，你说那说理的地方在哪？回来他们会不会再抓我们？我劝阻了他们。那一年中原农村的冬季格外寒冷肃杀，天寒地冻他们没有钱只有病，在这种境况下上路，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我离开村庄几天之后，卫华电话告诉我，留安死了。“家里没任啥了，悄悄埋了。”

### 是非曲直黑白莫辨

按照走访时间顺序，“7.15事件”相关内容整理如下：

一位当地执法者说——

“7.15事件”处理不公。完全是政治因素。县里提出治理经济投资环境招商引资，万家乐是全县最大一家投资商，县委书记直接的联系户。万家乐关系到书记的政绩和仕途升迁，为了要跟商家搞好关系，县委要求对艾滋病人严判。选择“扰乱公共秩序罪”对艾滋病人定罪，是很动了一番心思的，开了2次局长办公会。这样定罪最利于官方操作，最不利于艾滋病人一方辩白。内部消息，万家乐被抓6人要全部顶格判刑5年。对当天城管大队打伤艾滋病人事件却不追究。当时6人被打成重伤送进了医院，在万家乐的一拨人听说后，忽一家伙

又涌去了。第一批人到时很平静，接连来几批也都还平静，就是没人出来作疏导工作。艾滋病人“照不住人”开始躁动，砸了城管大队又开到县政府去了，还是没人出头！——这就是所谓“7.15事件”，艾滋病人闹事一天砸三场。（田野手记 20051202）

B镇派出所长说——

现在“万家乐”有案卷在，已经开庭审理，家属不知道。家属没有接到通知，“派出所没有接到通知他们的通知。”重判5年，轻了也会3年，万家乐财产损失比较大。被抓的人都很“瓢”，牛俊方、牛存章两兄弟，分别关在南院（拘留所）和北院（看守所），当地人戏称为南开、北大。艾滋病人关在南院，不是艾滋病的关在北院。砸城管局（城管大队）没立案，也没有调查报告。要不是有城管打人这一出，万家乐会判得更重。（田野手记 20051203）

保外就医的牛延东说——

万家乐、城管大队、县政府，说是一天“砸三铺子”，也就那点事。上哪讲理？判就判吧，硬弄抗不住政府。我这是政府替我说话了，不然也还搁里头哩！政府的命令，找谁讨公道讨说法？谁组织，谁花钱，谁出头？抓了我8天，不是病严重回不来……。万家乐的事我在场，但没砸东西。当时他们电话叫我，头一次没去，第二次又叫不去不中了，去是正义的。杨县长、卫生局郑局长、市政府赵秘书长都知道我跑艾滋病的事。谁都心知肚明为什么抓人为什么拘留我。杀鸡给猴看哩！在县拘留所问我，去过北京没有？我说去过，反映问题要求治病也没干别啥。拘留所长说，反正你没少给政府找麻烦！

牛延东曾经不无自豪地跟我讲述他当年带头反映疫情的经历，说“不仅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国家民族。”而这时他整个人很“灰”，脸浮肿着，气色大不如前。这次他在拘留所里面发病，并且绝食拒绝治疗，才被保外就医。他一直重复说，判就判罢，不想再反映什么了，这么些年，只落得如此结果……。（田野手记 20051204）

银庄村主任说——

抓人后，我们村干部找过万家乐老板肖某，谈得不错。他也表示很同情，说原先不知道是艾滋病人，商场损失十多万，你们也赔不起。我们请他出面说情放人，说就是判个三二年，他们出来跟你也不算毕。老板说，人已经拘了，我再出面保也不好，人家会说当初是我叫抓的，现在又叫放，面子不好看。说将来牛俊方出来后，可以对他个人适当照顾。牛俊方这回惨了，弟弟也进去了，还牵连别人。为出钱“扒”人家帮忙的人，家里卖光了，没钱了。他自己家没人去看他。听说在里头不想话了。（田野手记 20051206）

7.15事件判决后，K市市委领导说——

万家乐事件，艾滋病人一、二、三，三天，连着三天每天砸三场。对他们定位在打砸抢

犯罪团伙，还不只是扰乱社会秩序罪。不能姑息迁就，不能减刑，放出去麻烦。砸城管的事，跟砸万家乐商场是同一件事，警察去维持秩序，见一个打一个。问：谁打谁？答：艾滋病打警察。又说，“上面宣传部说了，艾滋病的事，不准宣传不准报道不准调查不准研究。对艾滋病的打击力度要比平常人大。”（田野手记 20060328）

首犯牛俊方，因患有艾滋病判决后监外执行。出狱后的牛俊方说——

（7.15）那天万家乐保安几人打我一人，把我打倒在地。县医院验过伤，万家乐老板还带补品来看望。后来反倒又抓我们。开始一共抓了9个人，原来还要抓满囤，没找着，他们说“要弄够10个人。”牛延东病重保外就医，牛五堂他们几个“出几个钱”放出来了。我的弟和外甥还在北头关押着，他们不是艾滋病人，不能“保外”。弟媳天天来跟我拼，找我要人。我找人说情，想让弟在服刑时不要送到外地，就在本地服刑好照应。法院鲁振方说要2500元办个假艾滋病证。我找不够恁些，给了他1500元。当时应许得可好，结果还是送外地服刑了。卫华、老党员来找我，让我还去找万家乐。万家乐聘请的刘经理是县里老公安，我去找他，还是说不下。我到沙北派出所，叫他们还把我也收进去。所长用脚踢我，又把我抓进去了，说是拘半个月，8天放出来了。（录音整理 20061104）

牛俊营判刑1年。出狱后的牛俊营说——

那天上午我在地里揽化肥，牛俊方的弟弟来喊，叫一路去。去到时候群众很多，已经砸罢了。110警察孙庆华、胡主任受围攻，没挨打。我把群众劝开了。河北派出所指导员赵明勇说，老牛，你把人劝走。人出去了就赶紧把门关上。卷闸门，群众在外面掀门，我和赵明勇在里面一人一头按着。赵明勇说，你把群众支走！群众说，给饭钱！赵明勇给我2000元要我代为分发。开庭时说3000元，还有一条烟。我当时有申诉，问那多出来的1000元和一条烟谁贪了？都有笔录。当时的2000元到最后分不够，我还赔了10元钱。我一直在起劝导作用。事先说了让第二天去谈判，结果到那里直接拉110，说调查情况。当时派出所几个人还说，胡主任很感谢你，给老牛别断了烟，下饺子吃！凭啥判我？心里一直打结。当庭问我：认罪不？答：不认！问：赔钱不？不赔！我还搭上10元钱哩！我一出来就去找他们，找胡主任、赵明勇。赵明勇说，俺没良心，俺不讲良心，中不中？（录音整理 20061105）

### 村口的麦草人（照片20）

2006年的春节我仍然在银庄村度过。这一年银庄人的处境更加艰难。人们围上来向我诉说：稍有不满意就说你“闹事”，一“骨融”（动）就抓人。那些“7.15事件”被抓捕者的家属，妻子、母亲、老人、孩子，说着说着哭作一团，这几家为“扒人”全都花干卖净负债累累。其中一家只剩下5个孩子，最大的姐姐13岁，最小的弟弟5岁，奶奶、妈妈都感染艾

滋病死亡，爸爸被抓时，他们的外爷可怜“孩儿们小没头佷”，曾带着姐弟5人齐刷刷给工作队长跪下，请求对他们的父亲“法外留情。”他们得到一句生硬冰冷的答复：“依法办事！”

腊月十五和正月初一，银庄村的村民们在村口路边扎起一个麦草人，烧香磕头放鞭炮指名道姓诅咒。万般无奈，深陷社会底边的人们只能用这种古老传统的方式宣泄他们心中的悲愤。有人说：我这命不值个啥，活着也是“受”，跟他拼了！有人说，再发病就上天安门，非死到天安门不行！甚至说：“惹急了我腰里缠上炸药平了他，一分钱不花就平了他！”“整个Q县如同坐在炸药包上，看吧，早晚得弄出大事！”这并非危言耸听，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在非法生产烟花炮竹，他们随时可以配制炸药。

## 九 在历史中行走

昨天埋葬了栗建军。今天一早接卫华电话：老四不行了。赶到老四家，一进门，两个带孝的孩子冲我当院跪下。当屋一口黑色棺材，老四昨夜走了。赶快扶起孩子。刚起身，却见另一个更小的，才刚刚蹒跚学步的小小孩童，也冲我单膝跪下，一脸稚气地严肃地仰面望着我，真是令人心惊心痛！身不由己也跪下了，一把将孩子抱住。孩子的奶奶老三家媳妇赶忙过来扶起我们，说这孩子送他四爷哩……，见人跪多了，学哩……。说着背过脸去拭泪。这孩子是老四的三哥家的孙子，老三早已不在了，是村里最早死去的艾滋病人之一。

——田野手记 20051210

## 艾滋病村的春节

2005年，原本计划年三十赶到银庄，观察这个经历了艾滋病灾难重创的村庄如何度过中国民间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此时外出的人都回家过年，村里会有许多故事。但是道路不通，说是因为大雪封闭了高速公路。同时又获悉，已经考评结束回到省城的38个工作队，奉命全部返回驻村，等待中央来人<sup>①</sup>。后来知道，是温家宝总理亲来河南艾滋病疫区视察，到了上蔡文楼。及至开放道路，已是大年初三。初三我来到银庄，在这里度过了这一年春节期间之后的时日。走访了感染者栗老五和他的弟兄们；走访了银庄临危受命的年轻的村主任栗卫华和他的母亲，年迈的老支书栗可栋和村中老党员；走访了阳光家园、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

中国旧历年的大年初三，公元2005年02月11日。通往银庄的道路的两旁，是白雪覆

---

<sup>①</sup> 某工作队员说，工作队年前全部从驻村撤回来了，被褥、锅碗勺盆送给老百姓了。结果温家宝来了，全班人马立即返回村，重新置办全套用具。（20051122 田野手记）

盖的田野。田野上一个牧人和他的一群山羊，背后是连成一片的坟茔，寥廓天地一片静寂。银庄村里人都在过年，家家户户包饺子，堂屋条桌上摆放着祭司的“枣山”<sup>①</sup>。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都回来了，平添许多生气。孩子们穿得花花绿绿，虽然不一定全新，但是干净鲜亮。大人的服装显示出一种整齐划一——工作队发放的绒衣裤，不少人套穿在外面，清一色军绿。这里那里不时响起鞭炮声，虽然不算闹热，也弥散着节日的气氛。只是许多人家门口贴着蓝色、绿色、紫色的对联，见出这个村庄不同寻常的奇异：当地风俗，家有丧事三年内不贴红对联。（照片 20）

**感染者栗老五家** 相比之下，老五家大幅鲜红的新年对联格外惹眼：红纸金字，大门正中还有一个很大的“福”字。老五说，过一年少一年，今年买的对子比往年的都大！老五妻子小美对着院子里墙上的小镜子化妆，说：化妆对皮肤好，我害怕起疙瘩，得了这种病脸上起疙瘩。

我跟老五家人一起包饺子。小美笑说：年三十我俩还说，今年的年是要过了，明年是不是还能过这一天？明年这一天的饺子是不是还吃得上？小美说，我就是好说好笑，从来不哭，得病到现在也没有哭过。于是夫妻俩开始叙说当年抱着吃奶的孩子一起去卖血，如今双双感染艾滋病。老五说，当时不清楚，不知道什么病，腿疼，风湿病的症状，成夜的疼，疼得哭，受不了。小美说，我发病是喘，胸口憋得透不过气，难受得很……。说着说着，小美不笑了。他们想到了死去的亲人。老五说：“我三哥先死，接着是我家二嫂……。我二哥是个秃子，二嫂是个残疾，家里穷，二哥领着残疾二嫂卖过 4 个血，我三哥死罢接着二嫂就死了。”小美说：“二嫂死罢接着四嫂。四嫂就卖过一个血，其实才半个，得了 20 元，她身体‘瓢’抽一半抽不出来了……”夫妻俩说着说着，声气越来越低越来越慢，他们 13 岁的儿子埋头包饺子始终一声不响。“三哥不是最早死的，最早死的是合香。”话头就从家里说到了村里：那时人们发疯一样卖血，有个妇女死在卖血床上。“几乎家家户户都卖。早上三四点起床排队献血，像做生意一样。县中医院血站开着车来吆喝，喊献血光荣！单采治疗贫血对身体好！开始卖血感觉挺丢人，后来都卖血，谁不卖血，就受讽刺耻笑，他自己也认为别人卖血咱不卖丢人。”后来开始发热病死人，有人实在“受不上去”了，上吊、喝药自杀，全村陷入恐怖……。最后，老五说我的愿望是能看到 2008 年奥运，看国家能得多少金牌，我能活到 2008 年，国家能把治疗艾滋病的药制出来。

栗老五的四哥家，对联是紫色的，四嫂不在了。发病的四哥已经奄奄一息，他的正在读研究生的大儿子和辍学的小儿子守着他，还有两个外出打工的儿女没有赶回来。在另一个房

<sup>①</sup> 卷裹着大枣的蒸馍，用作过年祭司供品。

间，老五跪在母亲面前，说，娘啊，今年春节我再跪下给你磕个头吧，明年不知孩子能不能活到这一天。老母亲当时眼泪就掉下来，哭道：儿啊，不能，我要饭也要治你们的病！……几个孩子都是一身的病毒，全家没有一个好人了，老的老，小的小，没吃的，粮食卖干，这过年那，没有钱买肉，我心里啥味，还活着有啥用？……

**村主任栗卫华家** 村主任栗卫华家大门口是紫色对联，厨房门上是绿色对联。村主任的母亲正在烧火做饭，我坐在灶火前听卫华妈说话。“我会理解事，”卫华妈说，“我在娘家18岁就加入共产党了，我的老父亲是老干部。”那时农村大队都有妇联，现在都没有了。现在家家户户都是这了，有的孤儿寡母，没爹没娘的孩子可怜得很，我也同情他们，我也顾不了了，俺自己也很难顾及自己了，没办法，到这步了。俺们家当年“忍住忍住没有去卖血，熬过来了”，是村里极少数没有卖血的户。但是那一年丈夫胃出血，在县医院治疗输了一次血，还是感染了艾滋病，“到底没有逃过这一劫。”去年四月间，孩子爸去世了。现在四个孩子都长大了，也没让他享福。最惨的是开祥一家，他两口都走了，他俩都卖血，三个儿子去了两个，媳妇带着孙子都走了，一家都亡了，三个坟头埋四口。（照片21）老两口埋一个（坟墓），两边埋老大老二俩儿，老三没死，也有病……。和在老五家一样，卫华妈说着说着从家里说到了村里。

吃罢饭，卫华兄妹4人去给父亲上坟。一路上几乎家家户户门口都贴着绿色、紫色的对联。走过村庄泥泞的道路，村头是一片白茫茫的坟地。4个儿女在父亲坟前一字跪下，燃香、烧纸、磕头。大女儿边哭边念叨：活着时候没钱，死了都是大钱，爸，拣钱吧，看好你的钱……爸，给你磕头了，拜年了……守着你的钱和小屋，啥时没钱了再给你送，活着没钱，死了给你送大钱……。“这是一块过去的老坟地，现在新坟已经占了三分之二。加上埋在责任田里的，新坟大约有一、二百座，都是青壮年人。”村主任栗卫华幽幽地说，“今年工作队进来以后又死了17个人，才过罢年又死了3个。工作队进来后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假如没有药物治疗死人还要多。”

回家的路上，卫华跟我说“基层工作很难作”：过年乡里每亩地有3毛钱的补助，按人头千分之十照顾，每人只是30块钱。千分之十，我们行政村是2600多口人，按2700口算，总共给了810块钱。俺这困难户多，不能公开救济，给这家没给那家不行。我每人按50块钱给他们，30块钱够干什么？顾不了眼前的急用，每人50，就是减少救助人员的数量，增加钱数，能照顾几个算几个。过一个春节，我家的门槛都被踢破了，也不知道上面给了多少救济，这个要那个要——说实话困难户太多了，救济不过来。乡里就给那么一点点，我给哪一个不给哪一个？没法办。暗地里不声张送到“特别困难户”家。栗庄和滩头村各给了8

家，按 50 块钱给，这俩村情况严重，都是特别困难户。

### 阳光家园 （照片 22）

走进阳光家园大门，就见教室内正在看电视的几个孩子和几位管理人员。互相问候“过年好”，与管理员聊几句，知道大部分孩子和老人都被亲戚们接走过年了。

上楼去看望上次来时见到过的一位老人。老人是李园村人，距银庄四五里，他的 3 个儿子当年都到银庄卖过血，后来都感染艾滋病，当时老大老三已经不在。“老大，老三是一个月死哩，前后错（相差）10 天。”老人上次跟我说，老二、老二媳妇也都染上了，在镇医院躺哩，住院，没出来过，都“呼歇”哩厉害。说到这里老人两手在胸前比划：“出不来气儿。”年下扁食（饺子）吃嘴里吃不嘴里还不知道。老大媳妇也是这病死哩。还有一个闺女，闺女是最大哩，早已出门了，也卖血，跟女婿一块，都卖，都死罢了。

现在，老人独自一人在床上织渔网，没有人接他回去过年。他的二儿子两口也已经不在，撇下两个孙子女跟他一起住在阳光家园。老人并不看我，边织渔网边说：唉，就毛俺爷儿仨了。老大跟前俩孩子大，打工去了。老三跟前俩小，媳妇带走了。“老三媳妇没检测，不知是不是艾滋病。走了，寻北边王庄，孩子带走了。”……俺卖血时都交给国家有相片，卖了几年。原先要外边哩，末了要里边哩……。啥意思？就是抽出来再回给你。（我明白了老人是在说“单采血浆”）……国家想办好事办坏了，国家拿血到外国换东西，两下都有利。

问：这是谁给你说的？

老人愁苦的脸一下松开了，没牙的嘴咧着，脸上笑成一朵菊花：“……想着两下都有利……，都说完了。”立即又是一脸愁苦相。

没有人发问，他却又说下去——

我从文革到现在，成天跟药打仗。先是爹娘有病躺床上，接着是老婆、儿、媳妇……。俺家里（妻）是直肠癌，跟陈毅一样。从我一打结婚，孩子五六岁，一散大伙（大食堂），她就得这病。到郑州去治病等公共汽车……，钱花干花净，开了刀回来，又躺三年才死。困难第一户……。

阳光家园的园长来了，说开饭了。一同上来的还有住在阳光家园的三个小姐妹。以后我每次来也都会遇到她们，她们已经成了这里的“接访明星”。她们还有两个弟弟，姊弟 5 个孤儿，是媒体采访的热点，外地某单位领导与她们“结对子”搞救助，上面来人也总与她们合影，他们已经很会照相，很老练地冲着镜头笑。一个小男孩远远站着，园长告诉我，他是这里年龄最小的孩子姚军，爹卖血得艾滋病死了，娘是个疯子，无人照顾，在阳光家园和一个致孤老人一块住。



午饭大锅菜熬肉，馒头，味道很好。

**B镇艾滋病定点医院** B镇卫生院在旁边一个小院里开设了艾滋病专科门诊和艾滋病住院部。春节期间医院原来住满的病号大都回家过年了，只有一对夫妻住在这里，吴营村的。还有一人是高庄的，来为5岁的儿子取药。他告诉我说：“儿子母婴传播，他妈死罢3年了，死时38岁，她卖单采血了。我也卖血了，是全采，没染上。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属羊哩。那时穷，都没啥吃的，才想这个（卖血）点子。”问：你怎么知道去卖血的？答：听银庄人说的。

那对夫妻，住院的是妻子，艾滋病并发疱疹、多发性脑瘤。因车祸双腿致残的丈夫照顾她，拄着双拐从病房角落里烧得黑糊糊的锅里盛出一碗黑糊糊的面条，喂她吃饭。这时值班医生来查房，发现女人后背生了褥疮，碗口大一个洞，淌着脓血，五颜六色。女人开始大声哭号。男人说：她还是家里的主劳力，一躺到这就啥也不啥了，成天哭，哭得我心里难受。说着说着，男人和女人一起大哭：这到啥时是尽头呀？把我也占住了，家里还有老父亲80多岁了……。医生说，你就别哭了，你一哭她不更难受了！男人止住哭声，说，她检测结果出来的早了，头一次在银庄大队，一次在郑州。化验的结果早就出来了，一直都瞒着我，不告诉我，小孩的舅舅也没告诉我，我也不知道她感染艾滋病了。今年4月她身上起了疱疹，腿疼，身上烂了，在县医院作了脑CT，多发性肿瘤。医生接口道：这时她才承认以前献过血，今年（2004）4月份检查才说，就住院到现在。

问：当时为什么不说不呢？丈夫：她怕对小孩影响不好，成不了媒，知道你有艾滋病别人都不与你在一起，俺那一个村就暴露我们自己一户。

问：你们村知道自己有艾滋病的有多少？答：我也不知道，现在都是保密。

问：不是都检测了吗？答：都出去打工了，他们不承认。

问医生：你们估计还有多少没有被发现的？答：不好说。

丈夫：她的病要是不发作我也不知道。村里卖血的有不少。

问：卖血不瞒人吧？答：隐瞒。当时献血时，如果这边医院有重病号需要血，一打电话就过去了，他还叫别人？自己挣钱！

医生：隐瞒的肯定有，有的就是不来检测，通知也不检测。还会有一小部分，不会是大部分了。像她这样是发病才知道的。

丈夫说，她不能回去，孩子都歧视，不让她回去，回去她夜里不停地哭。在这里住院的都一个一个死了，就剩下她了。除非我照顾得好一些，我饭不吃也要喂她，家里几个小孩还需要她干活呐！现在是说啥也不行了……。说着男人又开始痛哭：家都交给一个80多岁的

老头了，农活都是我那老爹干……。

后来知道，女人名叫栗秀兰，栗庄的闺女，几天后死在镇卫生院，43岁。

### 艾滋病人的葬礼

在银庄，我亲眼目睹不幸的人们一个个死去，和乡亲们一起埋葬他们死去的亲人。

那天一早接卫华电话：老四不行了。赶到老四家，一进门，两个带孝的孩子冲我当院跪下。当屋一口黑色棺材，老四昨夜走了。赶快扶起孩子。刚起身，却见另一个更小的，才刚刚蹒跚学步的小小孩童，也冲我单膝跪下，一脸稚气地严肃地仰面望着我，真是令人心惊心痛！身不由己也跪下了，一把将孩子抱住。孩子的奶奶老三家媳妇赶忙过来扶起我们，说这孩子送他四爷哩……，见人跪多了，学哩……。说着背过脸去拭泪。这孩子是老四的三哥家的孙子，老三早已不在了，是村里最早死去的艾滋病人之一。

老四是6弟兄中第二个死去的艾滋病人。现在除了已经去世的老三，老大、老二、老五、老六，都来为兄弟送葬，他们都因为卖血感染了艾滋病，老五一边烧纸一边哭泣。80多岁的老母亲躺在床上，向我诉说老四临终情景：“……他脖梗硬着，动弹不了，眼看着一口痰憋得出不来气，我就给他擦嘴，想叫他多喘一口气。他一口咬住我的手指头，死活不松口，咬撕下去一条肉，到B镇医院缝了十来针。……他那脖梗咋就又能扑楞了呢？他难受，他舍不得走……。”老人给我看她包裹着的手指，血迹透过棉纱。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感染艾滋病毒？似乎没有人顾得上考虑到这个问题。老四在外打工的女儿没有回来。前几日因为父亲病危回来过的正读研究生的大儿子已经回学校了，家人说：孩子才走，没有再对他讲，怕耽误他学业。

东南地4个人正在打墓，远远望去，打墓人身小如蚁，但目标清晰，冬日空旷的麦田里，只有这4个人。还有散落在各家各户责任田里的坟头，格外扎眼。为我领路的栗献彬说：“就他几个能干动了，每次打墓就他们几个人，村里没有劳力。小的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都有病，不能干。抬棺的都是些上年纪人，年轻些的人身体都有病毒。”“你呢？也有艾滋病吗？”问他。“没有艾滋病，但是有乙肝。没卖过血，因为验不上，卖血时查出乙肝。”不是说乙肝血更贵吗？又问他。“乙肝血也验不上，达不到人家的指标……”他很熟练地说出一串乙肝血指标要求，就像当地艾滋病人熟练说出一串有关艾滋病的检查指标。然后问我：“国家光管艾滋病，不管乙肝么？我这病也是不能干重活哩！困难哩很，不然也不想着卖血，还卖不上……”他给我指看一片片坟头，说：“都是这几年死的，都埋在各人的责任田里，原来这地里哪有坟哪？这些、这些，那里、那里，都是艾滋病死哩！……外边记者来了不知情，拍照的是老坟，这都是艾滋病新坟。”后来有人告诉我，这栗献彬实际也卖过血，卖单采，也

卖全采，“后来不用化验了，‘胡采不验’，没有感染艾滋病是他运气。”而此时的栗献彬却似乎因为不是艾滋病感染者而懊恼。<sup>①</sup>

走到跟前才看清4个打墓人中有栗永。他依然那么一副调皮玩世不恭的姿态，一边挖土一边对我笑说：“刘老师来看我们战天斗地……”大概看我表情太严肃了，他神情也黯淡下来，说：“俺人已经习惯了……”刚挖开的墓坑留着半边坟头，墓穴里，已经有一口棺材在等待着，是老四的媳妇，她已经在这里沉睡了5年，现在，她的丈夫就要来跟她团聚了。都说老四家人品好有文化，贤德友爱，高中毕业，都为她惋惜：“只卖了半个血，舍了一条命。”

这一天，风很大，顺风，远远听得村子里老四家下葬前的仪式正在进行着：喊魂、开棺、开封、起椁、摔老盆……。远远的，送葬队伍缓缓走向墓地。前面有人漫撒纸钱开路，女眷们哭天抢地，男人们默默前行。道路泥泞，这支黑白相间的队伍走走停停，渐行渐近哭声雷动，惊心动魄。下葬时，老四的儿子在父母的坟墓前长跪不起，陪伴一旁的婶娘说：“可怜孩儿们，正该成媒时候没有了爹娘……。”送葬归来，一个满脸沟豁的老婆婆候在村头：“几个孩子没爹没娘了，咋着（怎么办）哩？奶奶80多了，日子咋过哩？”（田野手记20051210）

在栗老四的葬礼上，我拍下了第一张艾滋病疫区送葬现场的照片。照片上，年轻的村主任驾辕，双目紧闭，任凭送葬的人群簇拥着棺木前行；老五似乎已经傻了木然跟在他四哥的灵柩之后，老五妻小美走在送殡队伍的前边迎着寒风泪流满面。就这样，中原冬季的旷野上，男女老幼一群人惊天动地哭号着行走在茫茫苍穹之下，那场面至今令我震撼。我给照片命名：《悲怆》。（照片23）

老四坟墓不远处，小路的北边，也是一座新坟——埋葬老四的前一天，2005年12月9日，我们刚刚埋葬了他的乡邻栗建军。建军死在我看望他之后的第三天。当时他靠在老母亲的怀里。他病发咽喉，发声已经很困难，他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我，迸出一句黯哑的话：我舍不得孩子！建军的妻子已经因艾滋病2年前死去。昨天埋葬栗建军的坟墓，也是半边土干半边土潮湿着，标示出是夫妻合葬的新坟。栗建军死后，他6岁的儿子尽人子之孝，第一天这小小人儿眼泪汪汪跪在父亲灵柩前为吊唁的人叩头（照片24），第二天在长辈的帮扶下为掩埋父亲培上第一锹土。两家都是“合葬”<sup>②</sup>。他们的妻子都已先他们而去，她们都在地下等待与丈夫的相聚。他们和她们，身后都留下年迈体弱的亲娘，和未成年的儿女。就是这一年的冬季，我在银庄第一次看到人们挖开已经埋葬了一口棺木的坟墓，把另一口棺并排放下，再用木楔使他们“牵手”。重新封起来的坟墓半边干半边湿，仿佛一双双夫妻在诉说他们阴

<sup>①</sup> 在贫困疫区不只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卖血者为没有感染艾滋病不能享受“艾滋病待遇”而遗憾懊恼。

<sup>②</sup> “合葬”，当地风俗，夫妻合葬一座坟墓。先去世者的坟包已留有后逝者的位置，埋葬后逝者时，只挖开原有坟墓的半边，将后逝者葬入。

阳两界悲惨的故事。举目望去，周遭连成一片的坟墓间，干湿两半的坟墓不止一座两座，不知又有多少孩子没有了爹娘？（照片 25）

第二年，2006 年春节前夕，我又连续参加村里两场葬礼。1 月 26 日埋葬褚家最小的兄弟褚老五，死亡时 36 岁，身后留下 2 个未成年的幼子和也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妻子。就在此时此地，我第一次听到中原民间那个令人辛酸心碎的词语：“佷头”——褚老五的英年早逝，不单使他自己的一双儿女没有了父亲，还使他原先扶养的已经先他而去的三哥嫂、四哥嫂家的几个孩子，也没了“佷头”。（照片 26）第二天，1 月 27 日，农历腊月二十八，除夕前一天——这年没有年三十，我又和村民们一起埋葬了他们的乡邻栗继臣。为父亲送葬的儿子抚棺呼嚎痛哭不已，儿子和父亲一样，也卖血感染了艾滋病。（照片 27）

生死患难中最讲情义，人们相帮相扶着才能把日后的人生旅程走完。没有卖过血的村主任一下说不清经自己的手埋葬了多少因为卖血死去的乡亲，他说：“我们村的红白事我都到场，埋人需要抬棺材，像过年这时候年轻人都回来了还好些，特别到天热时间，身体好些的都打工去了，剩下的都有病，不能出力，我们这些没有感染的健康人就为他们打墓，抬棺材，下葬。”村子里三、四十岁的强壮劳力已经不多，每次送葬，几乎是全村出动，“到场的人不少，能出力的人不多，到场是尽心意，每次抬棺打墓的力气活，差不多都是靠那几个人。”感染艾滋病毒的人不能出力，一出汗就容易发病。每逢丧事，村民小组长都会在村里吆喝：埋人哩，老少爷们都来搭把手罢……。无论力气大小，能到场的都会到场，一起把先走的人“送到地方”。退休老教师诸恒昌认真登记礼单，记下邻里乡亲送上的 5 元 10 元“祭礼”，年长者手把手帮年幼的孩子铲下第一铤土，把年轻的父亲或者母亲安葬。礼桌前，人们向我讲述着这里发生过的故事……。（照片 28）

几天后，村口碰到放羊的老教师。他唤住我，送给我一首写在香烟盒纸上的诗：

#### 赠访者

科学滞后顽疾先，

艾滋猖獗人命惨。

新坟连着新坟起，

遗弃老小哭苍天。

人间恰遇英明主，

派来天使访灾难。

安得玉宇尘埃净，

万民顶礼颂德行。

### 走过历史，记录历史

从 2004 年那个寒冷的冬季，到 2009 年炎热的夏天，6 个年头的的时间里我许多次往返于这个中原大地上的村庄，和村里的人们生活在一起，倾听他们的声音，感受他们的感受，亲眼目睹不幸的人们一个个死去，一次次行进在送葬的队伍中，和乡亲们一起埋葬他们死去的亲人。期间去世的有建军、继臣、栗老四、诸老五，还有栗长春、栗献臣、栗中臣、留安和留安妻、松才和他的哥哥、顾艳萍、阎秀荣、花荣、玉花、老歪、诸老五的哥哥诸老二、莫宪友和他的两个儿子、陈赓兵团的老兵和他的妻子、春营上吊自杀的父亲、老四的母亲、建军的母亲、莫昭周、王化学……。行进在乡间送葬的队伍中，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体会到一种“历史感”，我清晰地意识到我正在历史中行走，我正置身于一场人间灾难，一场人类的大事件。行走中我一遍又一遍追问：历史到底在诉说什么？人类到底在期盼什么？同时追问自己：你到底为了什么？（照片 30）

我决定记录这段我正在亲身经历的历史，体察它厘清它。记录历史为了反思历史，返观历史为了不再重蹈覆辙。走过历史，记录历史，书写真历史，研究真问题，这是我对自己的期许。

## 第二章 在大的时空背景中

一般认为艾滋病在中国大致经过了三个流行阶段：1985 年至 1988 年为国外病例传入期，关键事件是阿根廷艾滋病人阿斯克莫西在中国的绝命之旅；1989 年至 1993 年为艾滋病散播期，关键事件是 1989 年 10 月云南省中缅边境检测发现了 146 名静脉注射吸毒艾滋病感染者；1994 年以后进入艾滋病高速增长期，关键事件就是后来被媒体称之为“中原血祸”的河南省艾滋病疫情爆发。这期间——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极为关键重要的时期。艾滋病在全球与中国的传播蔓延，与这一大背景密切相关。

### 一 在世界大格局中的河南艾滋病

河南艾滋病疫情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抗击艾滋病的局势发生着重要影响。河南艾滋病疫情和艾滋病人群的生存状况一直受到国内外的关注，成为舆论的焦点。艾滋病的爆发暴露出

人类社会存在的许多问题和矛盾；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流行几乎使中国所有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显现出来。让我们首先从相关文字文献和调查资料中理出艾滋病在中国流行的脉络轨迹，在大的格局背景中把握河南艾滋病流行情势及其在社会发展中无法回避无法忽略的影响。

### 世界-中国-河南

**世界：1981? 1979?** 1981年6月5日，美国亚特兰大市疾病控制中心，首次在《发病率与死亡率周刊》介绍了他们发现的五例艾滋病病人的病史；1982年9月，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以“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为这种复杂的疾病命名；1983年，从一名同性恋艾滋病患者的淋巴结中分离到新的病毒，研究证实这种病毒就是引起艾滋病的病原体；1986年7月经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命名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omImmuneDeficiencyvirus)”，即艾滋病病毒，缩写 HIV。有资料表明，艾滋病发源于非洲，1979年在海地青年中也有散发，之后由移民带入美国。

2001年，联合国大会召开以“全球危机—全球行动”为主题的艾滋病特别会议，通过《艾滋病承诺宣言》，为遏制艾滋病流行提供了全面性的框架。从此，每年各国政府都会报告他们在实现承诺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还通过发布《艾滋病政治宣言》，为应对艾滋病做进一步的承诺。

**中国：1985? 1983?** 1985年6月，在中国境内发现第一例艾滋病。艾滋病患者美籍阿根廷青年由上海入境到中国旅游，病发后在北京协和医院会诊初步诊断为重症肺部感染免疫缺陷，两天后死亡。这是出现在我国的首例艾滋病。而中国科学院院士曾毅的研究发现，早在1983年，一批美国生产的名为第8因子的血液产品已使浙江省4名血友病人感染了艾滋病毒，从那时艾滋病就已经敲开了中国的大门。

此后，据中国卫生部统计数据显示，从1985年到1988年中国每年有大约几十例 HIV 阳性报告，但发病者寥寥。感染者绝大部分由国外归来，是国外打工者，劳务输出者和一些海员。当时，中国医学界对艾滋病很不了解，许多医生连 AIDS 这个词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艾滋病被认为是资本主义世界腐朽生活方式的产物。在这期间国家颁布实施了《检疫法》，加强对出入境人员的检疫，“要把艾滋病拒之国门之外。”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禁止进口血液制品，并对外国来华者与长期生活在国外的中国居民进行艾滋病病毒检查。1989年10月云南省卫生防疫部门在中缅边境检测发现了146名艾滋病毒感染者，感染原因是静脉注射吸毒，而当年卫生部 HIV 感染者统计数字是171人。此后云南各边境口岸均检出 HIV 感染者，每年均有 HIV 阳性报告，且呈递增趋势。1997年一份公开发表的采血“原浆”分

析报告表明，早在 1993 年艾滋病已在河南献血员中蔓延流行，中国进入艾滋病高速增长期。

（苏惠存，1997）

2000 年 8 月 23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公布了中国艾滋病感染状况。殷大奎说，我国自 1985 年发现首例艾滋病病人，截止到 2001 年 6 月底，全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26, 085 人，其中艾滋病病人 1111 例，死亡 584 例。传播途径以吸毒者为主，占总数的 69.8%，经性接触传播的占 6.9%；年龄构成上以青壮年为主，占 94%；性别构成上以男性为主，男女比例约为 5:1；疫情涉及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据专家估计，到 2000 年底，全国实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超过 60 万人。2003 年卫生部公布的报告说，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进行干预，2010 年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将达 1000 万人，这一警示在公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在 2003 年联合国的艾滋病问题特别会议上，中国代表高强承认，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并公布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达 84 万人，艾滋病患者约 8 万人。并代表中国政府承诺，对经济困难的艾滋病感染者，中国政府将提供免费的药物治疗，这不仅意味着政府将在艾滋病防治上投入更多的资金，还意味着政府愿意承担更大的责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告诫说：中国正处于艾滋病大面积爆发的前夜，必须赶紧行动，才能在整个国家遭到致命性打击之前，遏制艾滋病的蔓延。

联合国中国艾滋病专题组 2002 年的 HIV/AIDS: China's Titanic Peril、2003 年《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和《2004 年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连续三年关于中国艾滋病防治的报告，可以看作是国际社会对中国艾滋病问题的正式介入和评估。报告估计“中国现有 HIV 感染者 84 万，其中艾滋病人 8 万。”联合报告中写道：“这场灾难到底有多大仍未明了，河南 HIV 估计感染数从 15 万以下（卫生部）至 100 万以上（高耀洁）不等。至少有 9 个地市受殃及，从北到南依次为鹤壁、开封、商丘、许昌、平顶山、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包括上蔡和新蔡）和信阳。一位上蔡的流行病工作者认为当地感染者超过 10000 人。”国内官方信息透露：在河南、安徽等重点乡村，2001 年起病人开始出现集中发病和死亡。（卫生部，2003）在云南、新疆、河南等部分地区，艾滋病的流行已达到较高的流行水平，按 UNAIDS 的划分标准属广泛流行阶段。（国艾办，2004）据中国政府申请全球基金的报告，在 150 万农村献浆员中，至少有 25 万人感染了 HIV/AIDS，疫情严重影响了 7 省 56 县中的 600 个村庄。（俞志元，2005）（转引自高燕宁 2005，《血殇》）

**河南：1995？1993？**<sup>①</sup> 官方公开说法，河南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是在 1995 年。1995 年

---

<sup>①</sup>这里是引用已经公开发表的文献资料的时间。本人田野调查资料中，献血员中最早发现艾滋病毒时间为 1992 年 10 月。见第一章。

3月8日，河南籍农民工郭广生，在云南昆明防疫站血站卖血时检测 HIV 阳性，云南省卫生厅上报卫生部并电传通知河南省卫生厅。而一份医学界公开发表的医学报告表明，河南早在1993年已经发生大批献血员感染艾滋病毒。文章中明确写道：“在献血浆人群中，不仅存在着甲肝、乙肝、丙肝的感染，还存在着严重的艾滋病的感染”，仅对濮阳等“七浆站”“部分献血浆人群血源性传播疾病监测”就发现“542人份的血液 HIV 阳性”（苏惠存，1997），这一数字大大超过了1993年全国的 HIV 阳性报告数274人。河南艾滋病疫情爆发导致中国艾滋病疫情形势风云突变。

2004年之前，河南省卫生厅曾在河南地区开展过几次疫情调查，但是未见有确切的数字公布。2004年6月，在十五届艾滋病大会召开前夕，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到河南，敦促河南省尽快查清有多少 HIV 感染者。7月，河南在全省迅速展开了大规模的艾滋病现状调查，对既往献血员进行“拉网式”筛查。9月11日，卫生厅厅长马建中公布：河南省共筛查出2.5万名感染者，1.18万现症病人。有关报告称，调查摸清了艾滋病疫情：河南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主要集中在1995年前后的有偿献血员中；驻马店市是全省艾滋病疫情最严重的市，上蔡县是全省疫情最为严重的县；目前全省艾滋病疫情整体上处于低流行水平，根据是，本次调查统计全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为2万多不足3万人，按3万人计，全省艾滋病感染率为3/万，而全国为8/万。

一份根据河南境内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同时期的艾滋病监测哨点的官方研究报告结果认为：①河南省艾滋病传播途径呈现“一多两少”特点，即经血传播者多，母婴传播者少，性传播者少。②人群分布呈现“一高六低”特点，即既往有偿献血者感染率高，性病病人、暗娼、孕产妇、长卡司机、无偿献血人员、吸毒人群等6种人群感染率低。③河南省艾滋病流行趋势预计在今后几年呈低水平缓慢上升。（刘学周等，2006）

### **河南与艾滋病的传播蔓延**

一些观点认为“各地到河南卖血”是导致中国艾滋病传播的重要原因。从分子流行病学来看，从泰国传入云南的一株 HIV 毒株，在国内传播路线之一是从云南飞奔河南，然后再向四周播散；从“地缘政治”来看，安徽（阜阳）、山东（菏泽）、陕西（商洛）、湖北（襄樊）等疫区均与河南接壤；从流行病学来看，河南周边省份如湖北、四川等贫困地区，1995年前后有大批农民扒火车去河南卖血，一些体检不合格的献血员在本省卖不了血，跑到河南就能卖了。（夏国美，2002）广西献血员感染者绝大多数是流动到河南的卖血者，而只在本省卖血者极少感染（高燕宁，2006）。卖血者双向和多向流动，在广东献血员 HIV 感染者中，河南籍献血员比例最大（程谨，2003）（冯志阶，2003）或发现最早（曹序春，1996）。田



野调查中，河南基层卫生官员中有说法与上述观点暗合：河南最早的感染者是从云南回来的打工者，性传播感染了艾滋病，回来卖血，又传染了别人。（田野手记 2005）

个案 四川 男 28 岁 HIV 感染者——

我父母都是农民，靠种地养活全家，但这些年种粮连成本都不够，所以我 22 岁就跟父兄去卖血。先在本地卖，一段时间后被查出丙肝就不能卖了。这时，有老乡说可以到河南去卖，那里血站很多，不用检查，于是我们仨就去了，在南阳、开封、焦作轮流卖血。我基本上是一个月卖 20 次，一次抽 800 毫升血，全血分离后将 400 毫升红血球还给我。我在那呆了四五个月，卖了上百次血，每次收入 40 元。后来，我的身体越来越差，连爬楼都爬不动了……。父亲、哥哥和姐夫都因此得了艾滋病。（高燕宁，2006）

河南艾滋病疫情和艾滋病人群的生存状况一直持续地受到国内外的关注，成为媒体的焦点。原因在于：第一、河南省艾滋病疫情爆发之突然迅猛令世人震惊；第二、经由“卖血”导致疫情大面积流行的传播途径；第三、大批被艾滋病毒感染的人群是处于社会弱勢的贫困农民；第四、当局的态度。以上几点也构成中国艾滋病流行的重要特色。

### **社会信息真空期 1985—1999**

卫生部疾控司提供的报告显示，从 1985 至 1999 年底，全国累计报告艾滋病毒感染者 17316 例，其中艾滋病人 647 例，死亡 356 例。其间，1995 年，HIV 的感染者人数由之前的几百例突增至 1567 例，其中有相当数量来自河南农村 1995 年以前的卖血人群。血液传播问题一下子突显出来（戴志澄，2005）。但是，当时正在发生的一切，对于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来说都还是未知。尽管上个世纪 90 年代伊始，河南农民卖血已渐成风潮；至 1990 年代中期各种经血液传播的疾病已经暗流涌动；从 1995 年起，官方不断采取行动打击查封血站；至 1999 年我国“艾滋”上报数字连续第 5 年大幅增加，河南农村局部地区艾滋病疫情大规模爆发；当年官方资料分析表明，河南艾滋病流行所显现的特征是簇状分布、家村为主、多途径感染、青壮年占 80% 以上……。等等。但所有这一切，外部社会毫不知情，河南农村疫区普通百姓，也大多处于蒙蔽状态，与外部社会完全隔膜。这一时期，河南艾滋病疫情，处于社会信息真空期。

### **非同寻常的 2000—2001**

2000 年至 2001 年，无论对于河南还是整个中国，在挑战艾滋病的历程中都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期，民间和官方、国内与国际，都开始了必然要开始的抗击艾滋行动，期间发生了许多非同小可的事件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

国内外媒体的报道，使河南艾滋病公诸于众。国家卫生部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调查显示，

公众对于艾滋病相关信息的了解，95%来自大众传媒；国家计生委的同类调查显示数字是89%（李清川，2003）。

2000年1月18日《华西都市报》发表记者张继承、子尚关于河南艾滋病的报道《河南某村“怪病”惊动高层》之后，国内外媒体跟进。

2000年5月11-17日，河南《大河报》以十个整版的篇幅推出了《艾滋病在河南》的长篇报道，这是记者王丽经数月走访文楼、东湖等村，用在当地病人围攻、干部阻挠中得到第一手资料写出的迄今为止河南省内媒体艾滋病报道的绝响<sup>①</sup>，也是《大河报》前副总编马云龙平生“做新闻以来干得最漂亮的几件事之一。”（刘志明，2004）

2000年8月18日，《中国新闻周刊》发表《艾滋病：新国难》的长篇报道，报道写道：“假如不迅速采取措施，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艾滋病的流行将成为国家灾难。”“目前中国出现大批死亡的地区，是血源性感染的重灾区，比如河南、河北、安徽和湖北几省的一些乡村。欧美国家基本断绝了血液感染这一途径，这使得因卖血、输血而染上艾滋病，几乎成了中国特色。”

2000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发表记者罗琳采访高耀洁<sup>②</sup>的报道和题为《In Rural China, a Steep Price of Poverty: Dying of AIDS》的文章。中国河南因为卖血流行艾滋病的情况为世界所知。高耀洁不但接受了美国记者罗琳的采访，还帮助罗琳深入到河南省新蔡县艾滋病高发区的东湖村采访。高耀洁遭到指责，说她“被反华势力所利用”；罗琳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出境。

2000年11月30日，《南方周末》重头推出该报记者甄茜《正视艾滋病》和李玉霄《怪病》两篇有关河南艾滋病的报道，还刊登出河南省新蔡县艾滋病感染者的照片和某村艾滋病死亡名单登记表。至此，通过血液买卖，艾滋病在中国河南省蔓延的情况为国人知晓。

2000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前夕，一篇署名何爱芳的文章《揭开河南省传播艾滋病的“血痂”》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文章将河南传播艾滋病的责任原因归咎于河南省卫生厅。文章写道：1990年代，河南省卫生厅为了经济的目的，在全省大建血站组织了农民卖血，从而导致艾滋病在全省范围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广泛蔓延的悲剧，言之凿凿，措辞激烈。

2001年09月05日，《三联生活周刊》发表高昱、于彦琳《血祸——走访河南“艾滋村”》长篇报道。报道中写道：“1995年对官办血站的查封是坚决的，尽管一些血站一直

<sup>①</sup> 至今河南媒体关于河南艾滋病疫区现场报道，唯此一篇。有关报道，在河南一直受到严格限制。

<sup>②</sup> 高耀洁，妇产科专家，被誉为“民间防艾第一人”。

延续到 1996 年，但艾滋病大规模血液传播的蔓延之势被掐止了。”“可是，另一些事情又有些让人费解了。在大力推动中心血站建设和无偿献血的同时，因为卖血而传染的艾滋病疫情却被冷冷地掩盖了起来。”“即使到今天，在河南采访和报道艾滋病仍然是一件讳莫深的事情。”

2001 年 11 月 17 日，《参考消息》转载了外电的报道，国外媒体在报道中公开指责河南省卫生部门，对于河南省艾滋病的发生与流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期间，河南农民艾滋病感染者群体抗争事件明显增加：

2001 年 5 月 9 日，5 名来自河南上蔡县的感染者来到武汉，一方面接受医学专家的体格检查，一方面走向媒体，寻求公众理解和帮助。

2001 年 5 月 30 日，河南省文楼村 7 名村民进京上访，并带来一封请愿信，寻求帮助。其中有两名父母因艾滋病死去的孩子和一名因艾滋病丧失两名儿女的妇女。

2001 年 11 月 10 日，9 名河南睢县感染者和北京的社会工作者、记者共同签署“致全国艾滋病大会组委会的一封信”，呼吁即将召开的全国性病艾滋病大会、中央政府和河南地方政府，关注河南农村艾滋病，给予紧急的医疗救助。

几乎同时，河南睢县数十名感染者及其亲友包围了当地政府办公室，呼吁释放被政府扣押的中央电视台记者、北京的一名医生和陪同村民；河南上蔡县 4 名感染者到县卫生局寻求帮助，被当地警察拘留。

就在这一年，在媒体上悄无声息的河南银庄农民感染者，也在不断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疫情呼吁救助 2 年之后，对当地血站提出控告。（详见第一章之七）

.....

### **形势急迫而又关键的 2002-2003**

河南艾滋病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2002 年 1 月 14 日法国《解放报》发表在中国河南省“艾滋村”上蔡县后杨村现场采访的长篇报导，详细报告了法国记者组于 1 月 9 日“亲眼目击村民愤怒砸击卫生局官员汽车和警车的暴动场面”，同时在中国问题专版刊发社论《警告》，提请中国领导人注意历史的教训。这是最早深入报道河南艾滋病村现状的国外媒体。文章透露，法国记者组七个月前就已经访问过河南后杨村。

2002 年 8 月 13 日香港《文汇报》发表记者周启尧从香港到河南，行程上千公里，历时 20 多天完成的长篇报道《世纪的哭泣》，直击艾滋病村双庙集，首次报道河南省商丘地区这个 3000 多人人口的村庄，“至少已经有 123 人死于艾滋病，另有 301 人被查出感染了艾滋

病”，报道当地因野蛮采血传播疾病，艾滋病人的生存困境和愿望，以及政府对艾滋病人的救治救助。

2002 年联合国驻北京机构联合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以《艾滋病：中国的巨大灾难》之醒目标题告诫中国政府：中国已经有 100 多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而不久的将来会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患者最多的国家。这一标题中的“巨大”一词是英文“Titanic”的意译。换言之，我国艾滋病流行趋势被比喻成为当年驶向灾难的“泰坦尼克号”客轮。虽然我国卫生部随后断然否定了这一判断，该报告的主要内容还是在国内媒体纷纷刊登，引发了公众对艾滋病问题关注的升温。（景军，2006）

2002 年 12 月 26 日，卫生部长张文康在向第九届人大常委会报告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情况时说，目前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累计已达到 100 万人。艾滋病的流行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危害已在局部地区逐步显现。张文康说，1995 年前后因不规范和非法采供血活动造成的艾滋病传播，涉及全国 23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重点村供血浆人员的感染率一般为 10%~20%，最高达 60%。目前发病和死亡病例已相继出现，给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安定造成不良影响。（《健康报》2002 年 12 月 27 日）

2003 年 9 月 27 日我国政府做出了“四免一关怀”的承诺，即向贫困地区艾滋病感染者免费提供抗艾滋病病毒治疗药物、免费匿名检测、免费实行母婴阻断，对艾滋病患者的孤儿实行免费上学，使孤寡老人得到照顾关怀。

2003 年 11 月 6 日，在世界经济论坛 2003 年度中国企业高级峰会上，卫生部长高强再次承诺说：“今年将有约 5000 名符合条件的艾滋病感染者接受免费药物，明年这一计划将对所有符合条件者实施。”在高强宣布国家这一决策的同时，也公布了中国艾滋病疫情现状：“目前中国有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 84 万，其中病人 8 万例，感染人口约占中国总人口的 0.06%到 0.07%，感染人数位居亚洲第二位。”对这一数据，高强解释说，“许多国际和国内组织统计出的中国艾滋病感染者数字是累计数据，没有将艾滋病感染者、患者和已死亡的艾滋病人区分开来，所以卫生部这次公布的目前仍在世的中国艾滋病人群数量要比其他组织公布的低一些。”

2003 年 11 月 10 日，在清华大学 AIDS 与 SARS 国际研讨会上，以国际防治艾滋病基金会主席身份与会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告诫说，如果有一千五百万到三千万人得了艾滋病的话，中国的经济成果将毁於一旦。世界银行发表的报告也指出，如果继续对艾滋病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艾滋病就会在三代人的时间里毁掉一个社会。

2003 年 12 月 1 日世界艾滋病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北京地坛医院看望慰问艾滋病

人并与艾滋病人握手。2003年12月18日，吴仪总理亲率卫生部官员、专家及相关人员奔赴河南，就河南艾滋病问题进行专门调研。吴仪走进河南艾滋病村走进艾滋病人家庭，在基层大量接见一线医务人员，并单独约见了民间防艾知名人士高耀洁。国家高层领导人的一连串举动引起媒体广泛关注，国际媒体评论：温家宝总理的这一次“不寻常地握手”，宣布了这个拥有13亿人口正面临严重威胁的国度，正式进入全民对抗艾滋病时期；而吴仪走访河南艾滋病村显示出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艾滋病在内地扩散的严重程度。有媒体评论吴仪此次河南之行“如闪电般撕开了长期以来遮蔽在中国、尤其是河南的艾滋病黑幕。”

2003年底，中国卫生部公布艾滋病评估报告，披露中国艾滋病疫情已波及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 紧张激烈充满玄机的2004

2004年河南省委省政府开展大规模艾滋病防治帮扶行动，其中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举措，就是由省委组织部出面牵头，2月18日向艾滋病疫情高发区派驻38个驻村工作组，（照片31）在国家承诺“四免一关怀”的政策基础上，再在38村实施“六个一”工程<sup>①</sup>。8月下旬香港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及行政总裁刘长乐来到河南，由副省长亲自陪同前往实施“六个一”工程的艾滋病村庄，现场参观考察后表示惊讶赞赏。当晚凤凰卫视报道一举改变了河南当局在艾滋病问题上的不良形象，国际舆论发生逆转。对此，桂希恩表示佩服，高耀洁潸然泪下。

38个驻村工作组进驻全省6市13县艾滋病疫情高发区的38个重点村。38个重点村分布在中南6市：驻马店市24个，其中上蔡22个，新蔡1个，平舆1个；商丘市2个，其中睢县1个，柘城1个；信阳市1个；南阳市2个，其中卧龙区1个，镇平1个；开封市1个；周口市5个，其中沈丘、郸城、商水3县各1个，西华县2个。

2004年3月12日，高耀洁被中央电视台授予“感动中国”奖。

2004年4月6日至7日召开的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是自1996年以来最高规格的相关会议，并第一次邀请国际组织代表参加。

2004年5月8日新华社受权发布《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这是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吴仪指出中国艾滋病的防治工作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目前艾滋病疫情正在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我国艾滋病疫情呈

<sup>①</sup> 最初是“五个一工程”，即在艾滋病疫情高发村建设村庄基本公共设施，包括修一条柏油路、打一眼深水井、建一所学校、建一所标准化卫生室、建一所孤儿孤老养育院，最后又加上一个“一”：建一个党员活动室。

快速上升趋势，其传播和蔓延的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通知》甚至将艾滋病防治上升为关系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民族兴衰的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把是否有效防治艾滋病作为判定地方政府官员全面工作业绩主要标准之一，这对中国政府来说还是第一次。

2004年6月，卫生部敦促河南尽快查清有多少HIV感染者。卫生部副部长、国务院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陇德向新闻界坦陈：“疫情漏报瞒报情况严重，由于信息失真，给国家制定行为干预、患者医疗、经费投入、药物生产等相关政策造成很大困难。”

2004年7月26日至8月31日，河南在全省展开“拉网式”艾滋病大普查。

2004年8月25日，全球基金与中国卫生部以及一些NGO组织签署协议，中国将在未来5年内得到近1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在7省58个艾滋病高发贫困县开展以社区为基础的治疗、关怀和预防的综合性活动，以建立可在中国其它地区推广应用的治疗关怀模式。有媒体评论，对艾滋病“泛政治化”的放弃使国际合作成为可能。

2004年9月10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卫生厅厅长马建中公布，河南省共筛查出2.5万名感染者，1.18万名现症病人。

2004年10月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奉省委省政府之命进行《河南省艾滋病防治与帮扶工作课题》研究。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走进了河南农村艾滋病疫区。

## 二 相关文献研究

很长一个时期，艾滋病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尽管河南艾滋病的流行早已引起国际社会及国内有关方面的关注，但是关于这一事件的研究受到种种局限。卜卫、刘晓红选择《人民日报》《健康报》《北京青年报》研究中国传媒对艾滋病的报道，发现这一时期从消息来源看，三家媒体的相关消息主要来自外电、外国机构或组织，其次是政府卫生单位或官员及本报评论员文章。NGO、专家学者、艾滋病感染者或病人、志愿者等很少作为消息来源，1999年至2000年很少有报道正面报道协助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的医护人员，也很少有报道正面描述艾滋病感染者或者病人。（李清川，2003）。

### 卫生系统的“问题”报告

艾滋病作为“问题”的提出，最早散见于医疗系统内部的报告、报道和各种医学、流行病学的专业论文。1990年代初期就有文章指出，由于发展过快和政策滞后，部分地区机构设置与管理失控，血源与血液质量混乱……。所采血液质量低，交叉感染机率大。这些情况

均在当时《河南卫生报》相关报道中有所反映：“开封医科所，在改革大潮中集科、工、贸于一体，勇敢地走向市场，年创产值从 1986 年的不足 1 万元增加到今年的 1000 万元，居全省医学科研机构之首……。经过六年尤其是近 3 年的努力，他们已先后建立起了“血液回输站”，“生物制品经销部”，“康达科技公司”等六个经济实体。（《河南卫生报》，19921225）。

“周口市地区卫生防疫站自 1990 年以来，坚持以科技兴‘防’，以‘副’补‘主’，3 年创办了 3 个实体，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991 年 12 月办起了中心血站，1992 年 12 月与省生物制品所联合创办了‘白蛋白生产线’，积累资金达 70 亿万元。”（《河南卫生报》，19931203）曾经在河南得以控制多年的疟疾，梅毒等疾病卷土重来，许多村级医生发现在献血者中肝炎、疟疾、梅毒等传染性疾病的出现上升，并引起有关方面关注：“1993 年 8 月 9 日，在沪闭幕的全国采供血机构管理与评审会上传出信息，在献血员的体检中将增加丙型肝炎抗体和 HIV 检测项目，同时宣布旨在加强血液质量管理，保证献血者和受血者安全的全国血液质量管理委员会成立……。”（《河南卫生报》19930903）；“省卫生厅今日针对血源性传染病上升的趋势，发出《关于加强血站、单采浆站传染病预防工作的通知》”（《河南卫生报》19930827）。这些情况表明，当时血站管理非常混乱，已经成为传染病的一个源头。当初没有发现 HIV 和丙肝病毒的报告，是因为当时的血液管理中并没有检测 HIV 抗体和丙型肝炎抗体的规定。

### 孙永德和苏惠存

在医学界，关于艾滋病问题的发现与研究，河北的孙永德和河南的苏惠存有着特殊重要的贡献。

**孙永德** 河北省防疫站主任医师孙永德是最早提出血源传播肝炎、艾滋病警讯的人。他 1983 年即上书卫生部，报告单采血浆传播丙肝。1980 年代初，国内一些生物制品厂家开始在河北省廊坊市固安、永清等县设立血浆采购点，1983 年固安等地发生献血员“非甲非乙型肝炎”流行，孙永德前往调查，并设法将一批病人血清带到日本、美国 CDC 检测，确认丙肝流行。他将研究报告呈交省厅，同时写信给卫生部领导，坚持以事实和科学道理说服当地卫生部门采取了一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采血操作，抑制了采血点在河北的蔓延。有人分析当时情形指出：河北、河南开始采血的时间可能相近，当采浆在河北受限后，大批血站转移河南……。1988 年孙永德再次上书卫生部，明确指出不规范采集血浆将可能导致我国艾滋病的流行。这是关于血源性传播艾滋病的最早预警，在当时很容易被看作是危言耸听。（高燕宁，2005）

**苏惠存** 在众多医学专业论文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郑州 CDC 苏惠存 1997 年发表于《疾

病监测》第12卷第7期的《河南省部分献血浆人群血源性传播疾病检测结果分析》。这是一份河南CDC连续3年(1993-1995)对本省境内经省厅验收合格的4县3市(包括濮阳县、兰考县、宝丰县、永城县、许昌市、洛阳市、开封市)7浆站单采浆站所采的“健康原浆”进行二次复检结果的分析报告,报告河南“7浆站”在1993年-1995年期间共有588人份的血样呈HIV阳性。文章写道:93年-95年3月河南7浆站献血员HIV感染率为1.1%(588/54396)。HIV阳性率从时间上分别为:93年1.2%,94年0.2%,95年0.5%;地区分布分别为:县区血站平均为1%,市区血站平均1.2%。这7家原经省厅统一验收合格的浆站已于95年3月关闭。作者分析认为,HIV阳性问题出在浆站技术操作不规范所造成交叉污染上,市区感染率明显高于县区则是因为市区献血员多为外地打工和干杂活的流入人员,易一人多次反复单采,而县区血员多为当地农民,居住地相对稳定,频采机会少。结论是:我省献血浆人群中不仅存在甲、乙、丙肝感染,还存在严重的HIV感染。(苏惠存,1997)。

这篇文章值得关注之处在于:第一,这是国内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有关采供血传播HIV的专业论文,并且具有省级视野;第二,是迄今见到的公开发表的河南发现艾滋病时间最早的文章,确证早在1993年艾滋病已在河南献血员中蔓延流行,<sup>①</sup>比“河南1995年3月发现了首例艾滋病人”的公开说法,早整整2年;第三,虽然这是把河南,也是中国采供血感染HIV的开始时间确凿地提早到1993年的第一篇文章,但是它的公开发表已经是在4年之后的1997年,而且至今一直未曾引起应有的关注;第四,河南CDC这项对“部分献血浆人群血源性传播疾病监测”是对7浆站单采浆站所采的“健康原浆”进行二次复检,而不是初检;“7浆站”,多数并不在官方锁定的重灾区“豫东南6市13县”地域范围,更不属后来所规定的重点村“20乡38村”。这不能不使人担心河南艾滋病情势或许更为严峻。

### 张可与高燕宁

这是两位深入河南艾滋病疫区腹地的两位外地医学界人士,并对河南抗击艾滋的事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们一位来自北京,一位来自上海。

**张可** 北京佑安医院传染病主治医师张可,是最早从事河南艾滋病流行及防治工作专题研究的医生。张可从1999年开始来到河南,深入近百个“艾滋病村庄”展开医疗救治和调研,接触大量的艾滋病病人和当事人,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完成《河南艾滋病五年调查报告》(张可,2005)长篇报告,分析记述了这场灾难的发生,发展和现状,提出存在问题和政策建议,寻求应对这场灾难的办法。他的《农村、农民、艾滋病——2004-2006河南、

<sup>①</sup> 实地田野调查资料发现河南艾滋病最早时间是1992年10月,更早。见第一章。



安徽农村艾滋病调查》(张可, 2006)是在对农村艾滋病疫情高发区感染者的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研究报告,主要探讨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实施后,农村地区艾滋病感染者的生存状况、疫情变化、目标人群对政策的反响及政策效验。文章认为:农村地区艾滋病感染者的生存状况与2004年以前比较,已经有显著变化,尤其是在大规模的ARV(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推广以来,病人死亡率开始下降,农村地区的感染者已经从艾滋病的死亡恐惧中逐渐恢复过来。同时指出:国家的政策在这些地方的实施出现了不同的障碍。

**高燕宁** 2002年6月,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高燕宁带着复旦的研究课题进入河南艾滋病疫区,从社会支持体系入手研究中国艾滋病问题,成为高校公开进入河南艾滋病村进行研究的第一人。随后跟进的复旦公卫学院程华博士,住村调查完成了中国第一份艾滋病村的全人口流调普查。河南之行结束后,高燕宁在复旦大学医学院开课,主讲两门:一个艾滋病,一个同性恋行为干预。之后在研究生中开设艾滋病社会支持的课程,在复旦大学开办“艾滋病健康社会科学”系列讲座,将中国的艾滋病救助拓展到了社会学的领域,并将国内外知名人士围绕艾滋病所作的系列演讲集录成册,出版《复旦大讲堂系列——艾滋病的“社会免疫”》(高燕宁, 2005),内容涉及:伦理道德、国家法律、公共政策、社会行为、社会性别、艾滋孤儿救助、青少年性健康、性工作者与静脉吸毒、艾滋病“社会免疫缺陷”与艾滋病的社会流行病学、弱势群体与感染者参与等,基本展现了一个时期艾滋病领域的研究成果。他的未发表文稿《血殇——中国单采浆危机不完全报告》(高燕宁, 2006)站在医学和社会学的信息口上,对大量相关文献资料进行分析汇总,将单采血浆传播HCV与HIV关联起来,系统看待“血传播事件”,对血源性感染艾滋病事件作历史性回顾和分析,从源头到后果,几乎把与河南艾滋病相关的重要事件和涉及到的问题一网打尽,信息含量很高,极具学术研究参考价值。

### **社会科学界研究**

中国艾滋病的现状现实向中国社会科学界提出一项重大研究课题。尽管学术界很早就意识到在中国艾滋病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呼吁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对艾滋病研究的介入,但是很久以来关于艾滋病的研究大多数仍然局限在卫生领域与专业技术操作层面上。2001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社会科学与中国艾滋病防治研讨会”上,社会科学界几乎没有发言权,甚至很少有人了解中国艾滋病的现实。2003年9月第二次“社会科学与中国艾滋病防治研讨会”上有了24篇社会科学家的文章(景军, 2003)。其中李楯关于艾滋病防治中公共政策与法律问题的研究;邱仁宗关于艾滋病防治中伦理与政策研究;景军关于“社会差异决定风险程度差异和伤害程度差异”的观点;夏国美关于中国艾滋病的“社

会免疫缺陷”的论断，是当时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这些不多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也主要是针对预防艾滋病工作中具体问题的分析或者对策研究。这类研究虽然给“艾滋病问题”掺入了社会文化方面的视角，或者从“艾滋病问题”反观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李银河，2003），但是缺乏对艾滋病“问题”形成机制的分析及其学理内涵的深层探讨。2004年李楯出版《艾滋病在中国》，收录4篇与艾滋病问题相关的研究报告，从法律评估、制度化结构、全球化语境的角度分析中国艾滋病，其中就与艾滋病相关的中国法律所做的评估，是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委托。（李楯，2004）

2005年社会科学界开始发表关于河南艾滋病的田野研究。研究者从田野考察入手讨论河南农村的艾滋病问题，从对疾病与社会歧视的分析，讨论底边人群理论，指出中原农民有偿献血者中出现大批HIV感染是一种特殊意义的流行病学现象，同时也是新的经济文化中出现的社会现象，并通过对此一现象的分析，理解认识中国经济改革所带来的深远社会文化变更（邵京，2005，2006）。以田野作业的方法研究河南省艾滋病流行特点、社会影响及相关政策效应；以叙述的、故事的方式展现河南农村艾滋病人群的生存境况和灾难性事件的发生过程，从而揭示国家、地方政府、农民百姓行动中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研究在社会经济体制转型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双重背景下的河南艾滋病事件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刘倩，2005，2006）。这种学者的出自研究现场的研究，凸显了研究本身的社会人文色彩和来自田野的理论视野。

总之，从中国目前所见文献来看，生物医学、流行病学以及公共卫生学的话语依然是艾滋病研究中的统治话语，而被屏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话语之后的社会科学研究相对滞后。相关文献中，官方主流话语与民间非主流话语表达泾渭分明，对于中国艾滋病的事实表述及其必然涉及到的社会道德政治责任法理伦理认知判断，主流观点与民间观点存在着很大差异甚至严重对立。这些现象本身表明，艾滋病之所以目前在中国被认定为一个“重大问题”“敏感问题”，的确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与人文内涵。厘清艾滋病在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认知这个“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的过程以及其中所存在的学理冲突，发现这些冲突对于“问题”的构成所发生的作用及其背后的逻辑，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非常重要和必要——这是中国艾滋病的现状现实向中国社会科学界提出的重大课题和要求。每一个时期的研究都受其时代的局限同时具有时代的价值，也都对后来的研究具有启示的和奠基的意义。显然，相关研究远远不够。

### 三 影响河南艾滋病局势的关键人物和事件

1994 年底，河北琅坊地区发现数百名卖血人员感染艾滋病病毒，当地卫生人员只是将这些人遣送回家，并不深入追踪调查卖血人员感染情况，更不通报公众。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地区。卫生部门只是逐层上报，科学家们则进行课题研究，但公众受到蒙蔽（高燕宁，2006）。之后河南省出现的一些人物和事件使艾滋病事件逐步公诸于众，可以说，这些人物和事件拉开了中国艾滋病的帷幕，对河南乃至中国艾滋病局势发生着至关重要作用——

### **王淑平：第一个报告河南艾滋病疫情的医务工作者**

王淑平曾经是河南省周口地区（现为周口市）医院临床检验中心的负责医生，1994 年起，在本地区开展肝炎和艾滋病流行病学调查。从 1995 年 5 月到 9 月，王淑平等 4 人在周口市商水县西赵桥村抽取了 900 多人的血样，其中卖血者 300 多人，检测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率 20% 以上，卖血者感染率将近 50%。王淑平感到情况严重，写详细报告递交当地卫生局。报告称“单采浆还输血球献血员中已有 HIV 感染，甚至酿成流行之势，成为迫在眉睫非解决不可的问题。”当时的卫生局长说，全区人民会感谢你的。但是，之后王淑平却受到不公正处理。王淑平的报告引起了河南省卫生厅的注意，派专家前往周口市医院临床检验中心“调查处理”，认为王淑平的实验室不合格，她的调查报告不准发表。报告在省市卫生系统受阻后，王淑平将血样送至北京全国艾滋病检测中心。1996 年 1 月 10 日，艾滋病毒血样得到验证，中科院院士曾毅将王淑平的报告呈送卫生部。1996 年 11 月，王淑平所在的临床检验中心被关闭。1997 年初，王淑平离开河南，到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学习和工作。2001 年，为谋生计和继续科研，王淑平只身去往她十分陌生的美国。半年之后，2001 年 8 月 23 日，国务院新闻办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开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的艾滋病疫情。王淑平现在供职于美国血液中心，仍然从事血液和病毒研究工作。“她对来自故土的消息一如既往地关注，河南省数十个艾滋病村庄正在得到来自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帮助，病人正在得到药物救治，这些消息让她曾受伤的心稍稍欣慰。”（参考喻尘，2005，田野手记 20060319）

### **高耀洁：民间防艾第一人**

引起全社会和国际舆论对河南艾滋病问题关注的，是河南省中医学院退休教授、妇产科医师高耀洁。1996 年 4 月，高耀洁教授受邀会诊的一名妇科肿瘤患者，被查出 HIV 阳性不治身亡，患者生前输用的是血库里的血。高耀洁意识到血源性医源性传播艾滋病的危险，从此开始了她的漫漫“防艾”之路，不遗余力全身心投入艾滋病防治教育工作，开展艾滋病防治宣传和对艾滋病人群及其孤儿的救助，“以知识和母爱温暖着弱者的无助冰冷。”（2004 年央视“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词）

2000 年 10 月，高耀洁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罗琳的采访，将河南艾滋病疫情公诸于世，

被誉为“民间防艾第一人”、“中国的德兰修女”。但也有人因此指责高耀洁为反华势力所利用。2001年4月5日，Jonathan Mann 全球健康和人权奖委员会将 Jonathan Mann 健康和人权奖<sup>①</sup>授予高耀洁，在某种意义上这意味着国际社会对中国艾滋病问题的表态。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出席了颁奖典礼并高度评价高耀洁医生的贡献。高耀洁的代表宣读了她的演讲文章《打破艾滋病长城里的沉默》。之后，高耀洁多次获奖，奖金全部用于抗艾宣传与救助。但是，由于地方政府拒绝发给高耀洁护照，她一直未能出国领奖和参加国际会议。虽然2004年央视公开播放了对高耀洁的采访，但是河南省内一直控制媒体对高耀洁的报道。2007年高耀洁获得美国“生命之声”<sup>②</sup>奖，出境领奖再次受到阻挠，并因此被软禁在家中<sup>③</sup>。消息传出，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直至“生命之声”荣誉主席，美国前第一夫人、时任民主党纽约州联邦参议员的希拉利-克林顿致信国家主席胡锦涛，胡锦涛特批，高耀洁才得以前往美国参加颁奖典礼，受到极高的礼遇。

高耀洁认为，艾滋病是关系到全民族的大问题，力主血传播是中国艾滋病流行特征，强调知识是防治艾滋病的最好良药。著有《艾滋病与性病防治》、《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万封信》、《中国艾滋病调查》等。高耀洁在整个中国抗击艾滋的行动中具有旗帜的意义。这面旗帜不单是一个虚指的符号，还成为一个实在的“点”：联络点和据点。高耀洁的呼吁促使河南艾滋病疫情的公开，从而挽救和延长了无数人的生命，许多艾滋病患者从高耀洁那里得到帮助。同时，几乎所有关注河南艾滋病的人来到河南都会去拜访高耀洁，从她那里出发奔向抗艾第一线。

### 桂希恩：一个教授做的5年，可以影响中国500年

桂希恩教授在他所著的《我所知道的艾滋病》一书扉页上很简单地介绍自己——

湖北武汉人。1960年武汉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志愿赴青海从事地方病防治及临床工作16年。1976年开始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工作。1999年发现我国中部某村有偿供血员携带艾滋病病毒。先后20余次深入艾滋病疫区为高危人群免费检查、诊断，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sup>①</sup> Jonathan Mann 是全球艾滋病行动的先驱者，曾经担任世界卫生组织全球艾滋病规划首届主任，随后担任哈佛大学艾滋病中心主任。1998年在瑞士航空公司的空难中，Mann 夫妇不幸遇难。为了纪念 Jonathan Mann，也为了鼓励世界各地在健康和人权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全球健康理事会等三个国际医学保健组织设立该奖项。

<sup>②</sup> “生命之音”，是一个倡导发展中国家妇女领导作用的非营利妇女权益组织，每年都要授予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作出突出贡献的妇女以“妇女领导者奖”，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前第一夫人、现任民主党纽约州联邦参议员希拉利-克林顿是该组织的荣誉主席。

<sup>③</sup> 高医生说，“2月2号起就把我软禁在家，直到16号才说同意我去。”

自称“湖北武汉人”的桂希恩，母亲是美国人，奶奶是法国人，女儿在美国工作，家里大部分亲戚在国外。他的父亲桂质廷是武汉大学教授，中国著名的地球物理学家，电离层物理的开拓者，母亲许海兰也是武汉大学教授，他们都以友善、淡泊名利著称。如今武汉大学还设有桂质廷—许海兰奖学金。桂希恩继承了父母的品格，生活清贫而充实，性格温和而坚定。

桂希恩多次下河南，足迹遍布文楼、后杨等艾滋病村，后来还两次来到我的重点调查地银庄，为艾滋病患诊病治病，“偷偷地做光明正大的事情”，被河南农村百姓称为“当代白求恩”。1999年7月，武汉大学桂希恩教授初下文楼，起因是一位进修医生的求助，说当地近年有很多人死于一种“怪病”。桂教授第一次下文楼时采了11份血，10人HIV阳性；10月28日，再抽检155名卖血者，HIV感染者96人，阳性率61.9%。（靳薇，2005）。知识分子的责任让他发现了艾滋病的冰山一角，拉响艾滋病在中国大地上蔓延的警报。桂希恩教授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意识到艾滋病防治必须有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协调指导。1999年10月31日，桂希恩教授致信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报告他在文楼村的所见所闻及自己所做的大量调查。李岚清很快在桂希恩教授的信上作了批示，并要求河南省处理。从此文楼村成为全国第一个免费治疗艾滋病的村庄，桂希恩被誉为“发现中国艾滋村第一人”。

桂希恩教授积极参与社会对艾滋病人的关怀活动。2001年5月9日，桂希恩教授将5名来武汉治病但受到歧视的河南艾滋病人接到家中同吃同住，一时轰动全国。从来不与媒体合作的桂希恩教授，第一次站在记者面前，讲述艾滋病人的种种悲剧，呼吁人们能宽容、关心他们。2001年底，桂希恩和高耀洁同时成为《南方周末》年度新闻人物。桂希恩更注重对艾滋病的医学病理学研究。桂希恩与鸡尾酒疗法的发明人何大一、著名艾滋病防治专家田波院士合作，启动“湖北省艾滋病母婴传播干预项目”，旨在形成一个艾滋病母婴传播干预的有效模式，向全国推广，以最终保护更多的儿童免受艾滋病病毒的侵害。（李煦，2005）

2004年，桂希恩获艾滋病的国际最高奖项“贝利—马丁奖”，当选央视十大感动中国人物、武汉市十大新闻人物。2005年，桂希恩名列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出的全球18名“医疗英雄”，当年央视“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词盛赞桂希恩：一个教授做的5年，可以影响中国500年。

#### **曾毅：最早对中国艾滋病发出警示的权威专家**

曾毅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医学病毒学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科学家，国家预防和控制艾滋病专家委员会委员，是最早对中国艾滋病发出警示的权威专家，呼吁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中国艾滋病防治事业。

曾毅 1984 年即预测到艾滋病对我国的威胁，开始了对获得性免疫缺损病毒（HIV）的研究并取得重大突破。他在研究中发现，实际上艾滋病最早传入中国是在 1983 年，“一批美国生产的名为第 8 因子的血液产品已使几名中国血友病人在不知不觉中感染艾滋病病毒。”1985 年与浙江医大协作查出了因使用进口 VIII 因子而感染 HIV 的病例。1987 年分离了我国第一株 HIV 病毒，发展了一系列检测方法，包括简单易行的酶免疫法和最终确诊的蛋白印迹法，制备试剂供应全国，并在病毒所成立了全国艾滋病检测中心。1989 年与云南合作，从滇缅边境的瑞丽县毒隐者中查出了大批 HIV 感染者。

1996 年曾毅将王淑平的重要发现报告中央，引起高层领导对河南艾滋病的高度重视。曾毅也从此长期关注河南省艾滋病流行状况，支持保护基层卫生科研人员，亲自深入河南艾滋病疫区调查研究，4 次到河南指导艾滋病防治工作。但也有消息说曾毅在河南的调研受到阻挠，“院士曾毅来河南，好吃好喝安排，哪怕是到你到我办公室拍桌子，就是不让你接触基层。”（何爱芳，2000）曾毅于 2002 年 11 月 27 日在中科院第十次院士大会学术报告会上作了题为《艾滋病的流行趋势、研究进展及遏制策略》的重要演讲，警告中国正处在艾滋病泛滥的前夜，“能够用来遏制这种致死性传染病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不采取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措施泛滥期马上就会来临。那时候，艾滋病将会在中国制造一场空前绝后的灾难，后果将不堪设想。”他认为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存在三个严重不足：对于艾滋病出现大流行的估计不足，对于艾滋病严重危害的认识不足，对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投入不足，这三个不足带来的后果是，广泛深入的预防宣传不够，支持开展防治措施的政策不够，开展有效干预措施的力度和广度不够，科学研究的投入不够。并坦率指出，中国一些官员的观念也是影响防治工作的一个症结，有些地方对于本地的艾滋病发病情况欺瞒遮盖，甚而对调查研究者持排斥态度。“曾毅院士举了一个例子，和他一起进行艾滋病研究的某地方学者被停职停薪，因为地方官员认为，透露出该地艾滋病病情有损政绩和地方形象。”他强调，各级政府和各部门的重视并采取有力措施是遏制艾滋病流行的关键。2003 年 11 月 5 日曾毅、韩启德、陈竹、何祚庥等 22 名中科院院士联名呼吁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中国艾滋病防治事业，支持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 121 联合行动计划。121 联合行动计划是政府领导下由多部门、多单位、多团体和社会各种力量共同协作和参加充分利用社会各种资源，共同对抗艾滋病的一种有效形式，对中国政府出台艾滋病相关政策起到十分重要和关键的促进作用。

### **“3.14 案件”**

1996 年 3 月，全国开始取缔以采浆盈利为目的的大小血站。河南卫生厅和公安厅联合发文，严厉打击非法采集、倒买倒卖血浆的犯罪行为，从 3 月 14 日夜刮起血站取缔风暴，

后称“3.14 案件”。（喻尘，2005）

“1996 年 3 月，根据省委、省政府安排，省卫生厅、公安厅联合在全省集中开展严厉打击非法采供血（浆）犯罪活动的专项治理，惩处了一批非法采供血窝点和犯罪分子，非法采供血犯罪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关于全省艾滋病工作的汇报》2002）

一位河南卫生官员说到河南当时整顿取缔血站的情景——

河南整顿血站也有一个背景。当时李长春是河南省委书记，负责医疗卫生的省长是李志斌，负责公安的是王明义，卫生厅长刘全喜。国家生物制品所一个专家，听说河南艾滋病情况，来到黄泛区，以购买单采浆的名义得到血浆带回去，测出 HIV 阳性比例很高，写信给中央反映。这大概是 1996 年。当时全国人代会在北京召开，李长春在北京，中央问李长春，李长春即刻打电话叫李志斌、王明义、刘全喜 3 人到北京。这 3 个人在火车上见面还不知情况呢！到北京后开会部署，1996 年 3 月 14 日，王明义、刘全喜带着公安厅、卫生厅处以上干部，连夜到西华血站抓人。当时 K 市专员曾锦成，也是连夜开会布置，省里到西华抓人，市里到各县抓人。就这样整顿先从卫生口开始，血站不让办了。但市场还需要血浆：一些生物制品厂刚投资那么多还没有收回，一些能扩大的也扩大了还没见到收益。这一整顿才乱哩，又整顿出来一部分（血站）！当时卫生部长是陈敏章。他胰腺癌死的，可能与血液传播艾滋病有关，心情精神受到刺激有压力。（访谈笔记 20060318）

事实上，河南整顿关闭血站的行动早在 1995 年就开始了，但是正如这位卫生官员所说，由于种种因素，整顿引起更大的混乱——

1995 年 3 月，卫生部全国卫生厅局长紧急会议之后，我厅立即传达贯彻卫生部紧急会议精神，1995 年 3 月 31 日发出明传电报，关闭全省所有单采浆站和血站的单采浆业务……。1995 年 5 月 4 日，省政府在驻马店市召开 7 重点地市防控献血员 HIV 传播现场会，以政府名义下文在全省关闭单采浆站，但仍有少数转入“地下”非法采浆，成为我省献血员 HIV 传播的关键因素。（《关于全省艾滋病工作的汇报》2002）

1995-1998 年南阳捣毁的 12 个非法血站多设在阴暗潮湿隐蔽处，卫生条件极差，离心机和操作台血污到处可见，无防护措施，无检测设备，来者不拒（主要为正规血站淘汰者，吸毒者，性乱者，赌博者），旨在谋取暴利，通过黑市“血头”收购到地下血制品厂高价销售。（李生旺，2000）

1995 年 3 月，河南省卫生厅和公安厅突然发布通知，开始大规模取缔已经泛滥成灾的血站。这次行动是强有力的，到 1996 年初，几乎所有的县级血站都被关闭。这之后虽然有一些血站经营者继续私下采血，但在半年之内，这些地下非法血头即遭到严厉打击而销声匿



迹。然而，悲剧已经酿就。（高昱，2001）

南阳关闭 10 家非法采浆站点（1994 年 9 月 23 日《河南省卫生报》），但有超过 5 家采浆点一直到 1996 年才停工。据一些村医生回忆，由于部分血站关闭和利益巨大，大量地下采浆站主要是这时冒出来的。紧急关头措施并未到位。大量有政府背景的血站根本不理睬当时的通知，因此地下私人血站就有了存在的理由。曾问一位当时负责办血站的卫生局负责人，为什么没在 1994 年就停下来。他说，血站是（19）93 年看到别人挣钱后刚建的，确有通知不让办，但单位两个血站投资太大，所以一直坚持开下去，直到 1995 年底停办时投资也没收回来。其他地区也大多如此。许多血站是 1995 年底、大多数血站是 1996 年才停办的，这是不争的事实。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埋下了巨大的灾难，说明当时并未真正遏制大办血站的势头。（张可，2004）

### 文楼村的标示性意义

文楼村对于河南艾滋病事件具有标示性意义。文楼村虽然不是河南疫情最严重的村庄，但是第一个被公开报道的河南艾滋病村庄，也是全省 38 个艾滋病重点村之一。

2000 年，文楼村艾滋病疫情经国内外媒体报道之后，河南省艾滋病疫情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河南省对待艾滋病的态度在 2000 年前后有 180 度的转变。自 2000 年起的 3 年间，河南省迅速关闭了全部单采血浆站，与此同时，投入 1.6 亿元专项经费加强血站规范化建设，大力推行无偿献血制度，有效切断艾滋病经血液传播途径。（喻尘，2005）

2001 年 5 月 30 日，河南省文楼村 7 名村民来到北京寻求援助，并带来一封请愿信，其中有一名父母因艾滋病离去的孩子和一名因艾滋病丧失两名儿女的妇女。法新社报导说，全村百分之六十五（笔者注：当为卖血者中的比例）的人感染了艾滋病毒，两年前开始死人，至今已有四十多人死于艾滋病。国际媒体纷纷报道这个事件。孤儿们无助的形象震撼着世人的心。

2001 年 8 月 4 日上午，中央艾滋病防治工作组的汽车驶进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健康报》报道说，1995 年前后，由于不规范的采供血活动及非法的地下采浆活动，这个 3000 多人人口的村庄出现了较严重的艾滋病流行。此次由卫生部、民政部组成的工作组，在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率领下，并会同河南省副省长李志斌等地方党政领导一同入村，开展慰问与医疗救治工作。2001 年 8 月 23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由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公布了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的艾滋病疫情，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开了河南血液污染造成大面积感染艾滋病事件。从此文楼村成为河南艾滋病村的“样板”和“标本”。

卫生部门相关资料显示，1995 年至 2001 年，河南省卫生厅对上蔡县文楼村开展艾滋病



疫情专项调查 7 次，根据疫情调查情况分析，文楼村是艾滋病疫情较为严重的村庄。文楼村共 6 个自然村，全村 3170 人，1995 年前有偿献血员大约 1310 人。1999 年 11 月，河南省卫生厅调查有偿献血员艾滋病病毒阳性率 43.48%；2001 年 4 月，卫生部再次组织对文楼村艾滋病病毒感染情况进行调查，调查 1645 人，阳性 318 例，阳性率 19.33%，其中 1995 年前有偿献血员 568 人，发现阳性感染者 244 例，阳性率为 42.96%，此项调查为初筛阳性，与以往调查人员有重复，具体确认结果卫生部尚未统计。当时实际发现文楼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241 例，其中，确证 101 例，初筛 140 例。据调查，从 1995 年以来共死亡 31 人，其中经确证的艾滋病人死亡 8 人，初筛阳性死亡 22 人。2001 年以来，全村死亡 5 人。

### 马士文与“机密文件”

**第一个涉嫌泄露艾滋病“机密”被逮捕的河省卫生厅的官员** 河南基层卫生官员说，了解河南艾滋病一定要了解马士文。很久以来，艾滋病疫情被视为“国家机密”，马士文是第一个因涉嫌泄露艾滋病“机密文件”被逮捕的河南省卫生厅的官员。

1962 年，马士文出生于河南省新野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86 年毕业于河南省医科大学，分配到河南省结核病防治研究所工作，之后担任研究所办公室主任。1996 年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河南省卫生厅工作，任河南省卫生厅疾病控制处副处长。2002 年末，因涉嫌向外界透露一份标有“秘密”字样的有关河南省艾滋病情况的文件，被河南警方逮捕，至 2003 年 10 月无罪释放，前后共 271 天。马士文初遭逮捕时，河南卫生官员中曾传言，他将被判超过 10 年的监禁，罪名是泄漏国家机密。也有说，审查中马士文始终不承认那份文件是由他透露的，因此有关部门束手无策，不得不作罢。现在，这个所谓的“泄密”案件，已被撤销。“检察院的说法是，即使这些事是你干的，你公布的是老百姓的知情权，没有给社会造成危害，即使造成了危害，危害性也小。所以案件就撤了。”尽管马士文没有因此被定罪，但最终还是受到了处分：卫生厅疾控处副处长的职务被撤，留党察看，开除公务员。“不堪回首！”马士文感叹。他说，若干年后，他退休了，也许会写一本书，“算是给自己做一个总结吧。”（刘志明，2004）

现在，失去公务员身份的马士文回到他当初工作过的河南省结核病防治研究所担任临时负责人。

关于马士文，实地调查中我听到各种不同说法和评价——

马士文就是因为有朋友要了解艾滋病疫情，将一份报告发了电子邮件，这只是一方面。主要问题是向联合国卫生组织通报了疫情，被国家国安局拘留 2 个月。（田野手记 20060318）河南基层卫生官员说，马士文是前车之鉴，省卫生厅对自己人还那么狠心下手哩，何况我们

这些底下的人员，他受伤害太大了，让人心寒。（田野手记 20060324）对马士文的评价也各不相同。有人说马士文是当地卫生系统少有的异数与良心；也有人说马士文“是保卫艾滋病秘密的受益人”，“既得利益者”，“刘全喜（当时河南省卫生厅长）的贴身走卒”。（何爱芳，2000）高耀洁说，马士文是卫生厅唯一一个头脑清楚的人，又说，一个“马士文案件”镇住了河南整个卫生系统，从此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了。（田野手记 20050303）

**被泄密文件里的秘密** 那份被泄密的文件，全称为《关于全省艾滋病工作的汇报》（见附录一），是 2002 年 8 月卫生厅向中共河南省委作专题汇报的材料，后来被公布于众。这份看似标有“机密”字样的文件其实早已不是秘密，却是一份多灾多难的文件。事实上，抗艾人士万延海一年前就因同一份文件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拘留，当局指控他涉嫌非法获取并向他人、媒体和境外提供国家机密。只有在他“承认错误”并答应配合调查后，才得到释放。（博讯 20031007）

关于这份“秘密文件”的背景，有消息说，河南周口的一个县因为艾滋病死的人太多，县里领导实在不敢承担责任，但是也不敢到省里汇报，因为都知道反映到卫生厅等于白说；他们越过省里到北京反映了情况。卫生部决定进行秘密调查，消息传到河南省委引起震惊，卫生厅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下了这样类似于给卫生部对着干的文件。”对于这份“机密文件”的内容，众说纷纭、看法各异。甚至有人说它是一份“官话十足”的文件，没有什么机密之处，是“一篇自我表扬的自白”，目的“是要挟卫生部；要挟各个生物公司和部队；要挟基层卫生局；要挟献血农民自己。附带有转移目标和嫁祸给万延海，让他做个‘榜样’杀鸡给猴看。”（何爱芳，2000）。

值得关注的是，这份文件清清楚楚表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有关责任部门早已发现艾滋病在河南流行，比桂希恩 1999 年发现艾滋病村、高耀洁 1996 年警觉血源性医源性传播艾滋病、甚至比王淑平 1995 年 5 月至 9 月调查发现河南艾滋疫情，1996 年 1 月通过曾毅“震惊中央”，都要早。王淑平、高耀洁、桂希恩、曾毅们，他们都不是“发现真相的第一人”，但是，他们是“说出真相的第一人”，他们的行动有力推动了中国抗击艾滋的进程。

所有人都相信，没有人有意拿百姓性命当儿戏，都知道“人命关天”的分量。正是因此，这些故事背后所揭示出的体制机制的问题，更加发人深省深思。

#### 四 几个基本“概念”的事实描述

以事实描述阐述这场事件所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是非常必要的。观点、角度可以不同，但是事实永远不变，以事实说明概念，会帮助我们认清概念。

## 数字：统计数字与关于数字的现场调查

河南省有多少人参与卖血，有多少人感染 HIV，又有多少人死于这场灾难？——这是人们很容易提出的问题，也是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因为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

2004 年 9 月 11 日，卫生厅厅长马建中公布：河南省共筛查出 2.5 万名感染者，1.18 万现症病人。许多人不相信这个数据。一些基层卫生官员私下说，至少超过 10 万人，有位防疫部门官员说实际艾滋病人数 20 万左右。有人认为至少有 100 万，有人甚至认为超过 200 万。中国医学科学院艾滋病研究中心一位副主任说：“我去过不同的省份，包括艾滋病高发区。我知道，感染艾滋病的人大大高于报告的数字，但是，我们没有进行整个地区的检查。因此，我不认为有谁能准确地说出到底中国有多少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全国数字也不清楚，2005 年，全国累计报告艾滋病感染者 89067 例，估计数字 84 万，差距很大。报告数字是层层上报统计出来的，估计数字是用数学模型推出来的。作为统计依据的抽样和监测哨点是否能够全面反映全国的情况？连那些实际决策和具体操作的人也并不清楚。实际上，不只中国，其他国家的数字也无法准确搞清。在这种“基础事实”不清的情况下，关于数字的争论已经失去了意义。而关于数字的现场调查，会给我们一个感性的比较切近真实的把握，这些来自一线的事实和观点，应当更真实可靠。如果真需要一个数字，这些现场资料也许更具统计学参考价值。

**“这里面缺少两块”：2004 年之前死亡人数和输血感染人数** 也许卫生厅长的话没有错，他说的是“筛查出”的数。问题在于这个“筛查”的方法是否科学可靠。K 市一位卫生官员说——

K 市“大普查”截止到 2005 年，筛查出艾滋病感染人数 5129 人。“这个数应当比较实在，上级要求县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人，我们都是挨门挨户亲自统计哩。”但是他又说，“这里面还缺少两块。一是缺少 2004 年大普查以前死亡的人数。就算从 1996 年算起也有 9 年了，何况还可以往前推，1994 年也可能有，期间死亡人数，估计至少有现在统计数的 20%左右。二是还有“不敢招不敢惹的一块”：当年在医院作手术，输过血的这一块。这个数字厉害，情况严重，这一块将来“发了”，政府才被动哩！“这个费用才不好办哩！”<sup>①</sup>

**筛查不可能没有遗漏** 各地县乡卫生部门都认为筛查不可能没有遗漏。驻马店一位基层卫生官员说，驻马店市报告 2005 年新增 100 例，其实是 1000 多例，其中多数是大检查遗漏的。去年（2005）中国公布是 84 万，今年（2006）又公布说是 65 万。实际上艾滋病感染人数正以天文数字翻番。这么草率，咋对外交代！实际上 84 万也不止，当时就认为是保守数

<sup>①</sup> 这大约正是高法通知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医疗事故不予受理的原因。详见第四章。

字。（田野手记 20060326）

此外，地方卫生官员认为，性传播艾滋病状况，在河南还属盲点。

**疫情数据的现场调查** 以K市的Q县为例：全县下辖21个乡镇，总人口122万余人，2004年官方报告，HIV呈阳性者近1300人。而现场调查表明，仅Q县下属B镇的不完全统计，艾滋病感染者人数就已经超过以上全县的统计数字。B镇是Q县疫情最为严重的镇，全镇人口63863人。卫生院长说，据不完全统计，卖血人员6800多人，2004年大检测筛查出阳性病毒携带者786人，最多时检测出961人。2004年大检测之前未确证死亡人数621人，这是根据各村支书和当地医生回忆的统计，确证死亡54人，还有一些外地打工未参检的，估计还有感染者20人左右（卫生院长访谈）。亲历当时混乱场面的乡村医生说，献血员100%参加检测不可能，开始接受检测占60%到70%，最终能达到80%。他也认为输血感染情况相当严重，“1：10传染是最少的。”据此说法，大普查之前死亡人数几乎与大检测筛查出的人数相当，K市卫生官员20%的估计还太保守了。B镇下辖38个行政村，村村都有艾滋病患者，据B镇党委政府2003年一份报告，“B镇先后发现患有这些症状的患者3110人”，这一数字更加惊人。（刘倩，2005）而疫情还在扩大，Q县官方2007年报告，艾滋病已涉及全县所辖所有21个乡镇。现场调查表明，河南疫情的确要严重得多。

**“捏”出来的数字：人口统计与计划生育** 影响疫情数字的关键因素，还有人口统计与计划生育。2006年9月一次有关艾滋病研讨会上，一位权威人士认为河南艾滋病疫情“不像有些人说得那么严重”，他说“没有死多少人嘛，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数字表明，这几年没有发生大的人口波动。”他不知道单凭人口统计数字是不足以对这场灾难做出判断的。现场调查表明，多年来农村户口登记非常混乱，人口统计数据并不能反映实际人口的真实情况，其中很重要一个原因是计划生育。

B镇负责户籍管理的副所长说：每年上报统计部门的人口数字都是按千分之二的增长率“捏”出来的，实际上人口准确数谁也说不准。艾滋病高发村死得多生得多，现在计划生育不管他们，象银庄艾滋病村每年死二三十人，都能“捏”进去。电脑里的数（本地掌控数据）高于报表数（上报数据），但是电脑数也不准确。正常情况下，2000—3000人口的大村每年自然死亡人口7—8人，1000—2000人口的小村每年自然死亡人口4—5人。2000年—2004年是艾滋病疫情死亡高峰期，“银庄村主任2004年一次销户口100多人，这事我记得很清楚，每页10人，共十几页。就那，驻村工作队进村重新统计人口，村里还又多出100多口人，因为之前计划生育超生不报户口。”而从历年人口统计报表上看，该村人口2003年546户2500人，2004年547户2508人，2005年565户2517人，变化不大，的确“没有发生大

的人口波动。”（田野手记 20061030）

**“隐瞒不上报户”** “隐瞒不上报户”是当地有关计划生育的一个特殊的专用术语。当时一方面是严格控制出生人口的计划生育国策，“该扎不扎株连九家，该流不流扒房牵牛”是很概括的口号也是很典型的做法。另一方面计划生育罚款已经成为县乡财政的重要收入，必须有人“超生”才能有计划生育罚款“进项”。罚款指标作为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一级一级分派下去，最终落实到每一个最基层的村庄。“隐瞒不上报户”便是在这一情势下应运而生的“新概念”：**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名义下，“动员”超生。**至此，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进入一个悖论的怪圈：效果完全背离目的，也使当地的人口统计成了一笔难以说清的糊涂账。

**个案举例** 银庄村民留枝连生 3 个女孩，只有大女儿报上了户口。留枝自己对生男孩已经死心，感到应当“打住”了。而村支书却找到她说，为了分摊乡里规定的计划生育罚款指标，村里“照顾”她为“隐瞒不上报户”，可以再生一胎。于是留枝交钱“买别人的结扎指标”，自己被允许“合法”办了“假结扎”，又生了老四东东，是个儿子。但还是不给上户口。2004 年，“村里多年不添户口了，叫添户口，没艾滋病的户，报一个户口交 50 元，有艾滋病的户不交钱。”留枝 4 个孩子的都上了户口。留枝夫妻都因卖血感染艾滋病，丈夫已于 2003 年去世，户口没有注销。2004 年，注销丈夫户口，添上以往超生未报的 3 个孩子的户口。这个当年的 7 口之家的户口簿上登记人口只有 4 人：夫妻二人，婆婆、一个女儿。2004 年重新登记户口后，户口簿上人口数变成 6 人。这个艾滋病家庭的人口，单从统计数字上看，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像留枝家庭这种情况在当地非常普遍。我历时数年田野调查中访谈过的许多艾滋病家庭，不少人已经死去，都没有注销户口。

**人口数字变幻莫测** 此外，一些围绕计划生育的临时性“土政策”，比如“超生集中罚款”、办“终结证”<sup>①</sup>，以及艾滋病疫情数字漏报等等，也都造成这几年村庄人口统计数字的混乱。仅以银庄为例——

2005 年，B 镇派出所人口统计报表显示，该村人口 2517 人；而之前 B 镇 2004 年政府《关于殡葬改革的 32 号文件》中银庄人口已经 2749 人。村支书说，这个村庄这些年的实际人口从来没有低于过 2700 人，过去计划生育统计数字“捏”在 2200 多人。2000 年以前，因为计划生育罚款，出生人口不申报，特别是女孩不报。2001 年至 2003 年艾滋病人口生生死死根本无人过问。2004 年工作队进驻，按人头发放棉衣等救济物品，重新统计人数，人口不

---

<sup>①</sup> 详见第三章。

断上升，越来越多。至今还是有不少漏报（户口）户，“现在不罚了，谁知道往后罚不罚哩？”新婚、外出打工生孩子，到底多少新增人口谁知道？一些出嫁的女儿户口未迁走，因为工作队发东西按户口人数，在艾滋病村还可以享受一些优惠政策。

### 全采与单采

当年卖血，有“全采”和“单采”两种形式。“全采”是卖血人员向医院直接卖血，用于病人临床输血。1980年代以后，开始引入“单采”技术。“单采”是卖血人员向血站卖血浆。血站把采到的血用离心机分离，只要血浆，把红细胞回输给卖血者，采到的血浆卖给生物制品公司，作为生产用的原材料，可以制造成生物制品如白蛋白、球蛋白、血小板、第八因子等。全采传染 HIV 的危险性相对较小；而单采因为回输血球，同一批卖血者中只要其中有一个 HIV 感染者，就很可能再传染给其他几个人。

当年的农民献血员介绍全采与单采——

一开始是卖全采，闲就去，忙就不去。到本县或者外县市里的医院。住在那里卖，有时去一次能卖好几个，有时一个也卖不了。运气好了，最多能卖四、五个，医院有病号急用血哩，又没别人了，就多干几个。运气不好，有时呆几天一个也没有（机会）干……。最早卖血不传染病，都是采全血，有人一天卖 1000CC，活到七八十岁。单采坏事了。原来 159 医院只有后院一个血库，后来，前后 3 个点。要我们先卖全血，后卖单采。单采时间很长，一次一小时。分离时还得先喝盐水，要反复 4 次。一次抽 400cc，一共抽 800cc，然后分离出来 400cc，剩 400cc 再回输给你，价格只有 45 元。

村医说，按书本上说，人失血 200CC 就有危险，后来人们卖血不少人都是早晚各卖一次 800CC，真不可思议。血抽多了，走路直摇晃。卖血晚的都是单采，几乎都感染艾滋病。（田野手记 20060209）

### 艾滋孤儿与艾滋病孤儿

艾滋孤儿指父母感染艾滋病死亡，留下的孩子，孩子本身并没有感染艾滋病。艾滋病孤儿，父母感染艾滋病死亡，孩子本身也感染艾滋病毒，他们大多是母婴传播，或者母亲在生产时输血传播。河南农村艾滋病家庭，绝大多数孩子是健康的，母婴传播感染艾滋病毒的是少数。

### 血价：中原农民的血，是价格最低廉的

“一个血” 当地村民将每采血一次，叫做“一个血”。常常会听到他们说，某某一天最多卖 6 个血，或者说，某某只卖过 1 个血就感染了艾滋病，还有人卖“半个血，身体太瓢（弱），抽不出来了。”最初直接在医院临床卖全血，每“一个血” 200CC，300CC、400CC



不等。每 100CC/10 元。“鲜血，现抽现输给病人。”“那时血便宜，钱主贵，除去花费，卖 500CC 能落 40 元。”大规模卖血风潮开始后“一个血”有了定量定价标准，全采“一个血”400CC，50 元。单采“一个血”抽取 800CC，离心机沥浆后，将滤下的红血球还输给卖血者，依然只有 50 元，或者更少。当地民谣：“胳膊一伸一蜷，拿回 50 大元。”实际上扣除化验费等，农民根本还拿不到 50 元。据悉这其中的暴利是：除去给卖血者的 40 多块钱外，血站还能净赚至少 70 块钱。（高昱等，2001）

各地血价不同，中原农民的血，是价格最低廉的。甚至还有卖血拿不到钱的、有抽血致命的——

我从 82 年就开始在四川境内卖血，92 年到河南焦作卖，卖了 12 次以后查出有丙肝，就卖不出去了……。到了 95 年，我听说河南谁都可以卖血，于是就带着儿子去南阳，在市郊 20 多里一个村庄卖了 2 次血，正好碰上派出所抓人，被没收了 70 元卖血钱。我当时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了，左说右说，他们放我时才给 10 元钱。我就用这 10 元钱，带着儿子赶车到了市区，在另外一个地方卖了一次血，得了 45 元。但这次卖完血以后，身体开始发冷发热……。呆了 20 多天以后，我又到郑州卖了 5 次，地点在一个学校后面，只管吃饭记账，没给钱。后来，我看到一个湖北人抽血时死了，被扔在沟里，很害怕，就混车逃回来了。当时，在南阳有几十个地下血站，每个都有成百上千的人在卖血，除了四川人，我碰到过湖北人、湖南人、安徽人。有的人血抽不出来，就倒挂在梁上抽。（夏国美，2002《别梦依稀》，转引自高燕宁《血殇》）

**比较效益** 血价如此低廉为什么还要卖血？虽然给予献浆员的“营养费”最初仅为 50 元，但对当地人尤其农民而言都比种田划算。那些挑进县城来卖的大头菜，一斤只挣一毛钱（沈亮，2008）。滩头村卖了一辈子血的诸老二说，那时候在生产队干活不挣钱，棒劳力一天 10 个工分，10 分连 2 毛钱也不值。在窑场打坯，脱一块砖坯子一厘钱，一年干下来脱一万多块，才 100 多元，不胜卖血。银庄村民牛俊营 1979 年第一次卖血 380CC 挣了 58 块钱，“我卖乙肝血，贵。那个高兴劲就别提啦！当时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在此之前我在轮窑干三个月活才挣 58 块钱。”栗一交说，刚开放搞活以后，我在 K 市修车。人家说，人家都卖血哩，你还在这修车哩，卖血赚钱快！……马上去卖血去，不干修车了去卖血去！在那（卖血地）住了 22 天拿回来 1800 块钱。这时候在这厂里头一个月工资才几十块钱。我原先（体重）181 斤，不到一个月卖掉了 30 斤肉，又不干（卖血）了，还去修车了。

22 天拿回 1800 元与一个月工资几十元的“比较效益”是显而易见的。但是，1800 元是“36 个血”的价格，这期间要付出的“成本”还有 22 天的食宿费用和往来的交通费，也就

是说，他平均每天至少要卖“2个血”才能有如此“收益”。“2个血”800CC，每天被抽取将近1公斤的血，于是22天后，他“卖掉了30斤肉。”好在他当时卖的是“全采”，又好在他还有修车的技术可以再“修车去了。”栗一交没有感染艾滋病。而如诸老二一般的绝大多数村民就没有他这么幸运了。他们没有一技之长，只有几分土地。都知道当年种地赔钱，没有一技之长的农民打工，只能干那些体力重挣钱少的活，老板还拖欠工资，打工挣钱不易。于是“卖血致富”就成了他们的梦想。诸老二全采、单采都卖，最终死于艾滋病。

**有偿？无偿？** 在省卫生部门的座谈会上，一位卫生厅副厅长说到，他的女儿在银行司工作，因为无偿献血，休息两周，司里补助2000元，部里补助3000元。事实上，如今许多单位每年的“无偿献血”指标，是由中原农民打工者心甘情愿地顶替完成，因为此时“无偿献血”得到的报酬尽管不能与国家单位正式人员相比，但比当年农民“有偿卖血”所得收入却高得多。银庄村民栗海军1997年11月，在山东烟台打工“顶替指标献血”，被查出艾滋病。“当时正在山东烟台建筑公司打工，公司分配有6个献血人员指标，全部由打工的人顶替。打工的也愿意去，顶替献血多给3天工资，60元，算是3天的生活费。卖1斤血，给三四百元血费。”尽管大大低于单位正式人员的“补助”，但是远远高出每800cc/50元的血价。河南不少早期确证的艾滋病感染者，都是在打工单位替人“无偿献血”时被发现的。有报道说，现在的无偿献血者中，农民占50%，还有说占80%。

### **血头：一个内涵和边界含混不清的概念**

“血头”（包括“血霸”），是一个内涵和边界都含混不清的概念。无论官方或是民间，都指控“血头”是血液传播艾滋病的罪魁祸首。那么，究竟谁是血头？迄今有什么样的血头受到了惩处？事实上，许多后来的“地下血站”都是由之前的官办血站“转入地下”而来，随着有关方面将导致疾病病毒传播的原因，从“不规范采供血”变成了“非法采供血”，“血头”变成了一场应当归咎却无以归咎的灾祸的“虚拟责任人”。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个不好指称或不便指称的“代名词”，或是“替罪羊”。

**众说纷纭话血头** ……由于血液（血浆）被“血头”、“血霸”，作为商品经营，于1995年初，在我国中部地区发现有偿献血员HIV感染，局部地区较为严重……。由于我国血液（浆）的需求量大，并且由于价格差问题，一些“血头”，“血霸”仍非法进行地下采血（浆）活动，给艾滋病传播造成极大的隐患。（郑锡文，2000）。中新网北京（2001年）8月17日：河南省政府要求，对非法组织、强迫公民卖血及非法采集、供应血液、制作供应血液制品等案件要严厉查处，不仅要捣毁黑血站、黑窝点，对血头、血霸还要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从重从快严惩。而另有媒体评论：把责任推给那些非法血站也是不负责任的，它



们存留的时间太短。在 1995 年之前，地下血站更少之又少，原因很简单，就像烟厂和电信公司一样，根本轮不到他们吃那块肥肉。（高昱，2001）一些地方在小“血头”的组织 and 怂恿下，多组成 20-30 人的队伍，长期游走于河南各个血站，以卖血为生，他们也成了艾滋病最大和最快的传染源。河南郸城县刘老家的刘世行和冷庄的冷长金，便是当时卖血的活跃人物，在他们的率领下，20-30 人的队伍，长期在河南各个血站卖血，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致富，而成为了艾滋病感染者。（张可，2005）

如果说卖血的农民是无知无辜的受害者，那罪大恶极者当是那些骗农民去卖血的“血头”。政府是这样说的，跟政府意见很不同的人也这样说……。在一个病人很多的“艾滋病村”，我费了不少周折，找到了一个当年干过“血头”现在遭人痛恨的农民，跟他谈了很多。他当过兵，见过世面，也做过建筑包工头。后来自己卖血，在一个血站帮工，让老婆也去卖血，也给本村人卖血不少方便，还收了人家的钱，人家的礼。最后国家不让单采血浆了，他就让血站的人把机器搬进自己家里采。他和他老婆都没有逃过艾滋病感染。讲完他的故事，他把我带进他家里屋，她老婆已经有了艾滋病脑病，脸上总是挂着让人发怵的微笑，这时，这个“血头”的脸上流着两行泪。（邵京，2006）

在河南农村，最早的血头也叫血队长，就是最早卖血的人。他们因为卖血跟医院很熟，县医院需要血了，他们去叫人，想卖血的人就给他们“上礼”（送礼），时候长了，就成了“头儿”。“大卖血”时候，他们联络组织人到处跑着卖血，一人次提 5 元钱。（田野手记 20051202）

在银庄，人们公认的“血头”有 3 个：县血站的站长，在家里开血站的村支书，最早带领大家卖血的村民栗干臣。人们这样向我介绍他们——

县血站站长，原县中医院院长，有生意头脑。他人不错，错在不让干了还暗着干。几千万呐！他与县委书记关系很好，要查，好多事都有关连，就是不查。得了（感染）艾滋病的村民把他告上法庭要求惩办，打上门去要求赔偿。他进过几天监狱，不久就出狱任县卫校校长。群众又上访告状，省里下通知，县里才将其免职。至今卫生局领导那里有他的通讯地址，红白事都通知他参加。他也有许多牢骚苦恼，艾滋病病人找上家里闹、砸门、要钱、讨血债。逢年过节他都躲到郑州置买的宅院去，免职后干脆找不着了。

血头村支书弟兄 6 人，包括他自己，全部感染艾滋病无一幸免。后来他也加入了“上访”的队伍。

那个“大集体时就卖血，又带领大家卖血”的村民血头，后来成为最早向上级反映疫情带领大家上访告状的“艾滋病人代表”之一，已发病死亡。村民们给我指看他的坟墓，说：

开始领着卖血，后来领着告状，都是他。他领大家卖血挣钱，心是好的，也不怨他。上头领导都想不到，他平头百姓咋能知道？

### “房子”：话语表达与理解的错位

第一次进艾滋病村庄，由驻村工作队陪同，遇到艾滋病病人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房子问题”：房快塌了，政府能不能帮忙盖个房？一个病恹恹的艾滋病人说。当时工作队，也包括我在内，都感到这要求太过份了：人都快死了，还要房子！也屡屡听到艾滋领域一些医界报界的朋友们抱怨河南农民艾滋病病人素质太低，要求太高：到卫生部告状，说房子塌了，要求盖房子！他们根本分不清场合，不知道到哪里应该要求什么，应该说什么。到卫生部嘛，就该说疫情，要求救治，要药，首先要活命嘛！这些人素质太低，要求也太高。村里感染者也说，那回到卫生部上访，人家问啥要求，有人说要求盖房。人家说，还一人给你发个媳妇哩！说到这里，他们自己也感到很不好意思。

但是，这个明知过份的要求却在不断地坚持不懈地被提出来。我在疫区做调查，最经常遇到的还是“房子”问题。一次我刚进村，便有人赶过来找我：你快去看看吧，我家的墙已经歪了，房顶透天，漏雨还漏雪，你政府管不管？他把我当成“政府的人”。我在艾滋病村里长住，眼见村里一些艾滋病病人，人快死了，还在张罗为儿子盖房子。丈夫死了，妻子继续。那位陈赓兵团的老兵，儿子已经因艾滋病死去，为了帮也感染艾滋病毒的儿媳妇凑足砖头为孙子盖房，老人拆去了自家院墙和灶房的半边山墙。村民组长栗松才临终前说：我本人是不说啥了，小孩成不了媒，死了放心不下。不是提出建设新农村五个规划么，能不能叫农村城市化先走一步，建新房改变村庄面貌？就为小孩们着想，为他们能成媒……。在艾滋病人的葬礼上，人们围向我诉说各自的遭遇，话题最终竟然也集中到“房子”。他们说，这病反正是治不好的，政府不如把给我们治病的钱给我们盖房子。他们当年不少人卖血就是为了盖房子，有些人家房盖好了却人去屋空。后来人们又冒着极大风险非法制作烟花爆竹，一旦手里有了几个钱，立马盖房子。做炮被炸死的一个外乡人和本村村民栗现灵，生前都说过：给孩子娶媳妇的房子盖好，就不干（非法生产烟花爆竹）了。而他们都未能看到自己的心愿实现。村人说，盖房子娶媳妇，是农村人总要办的大事，“这些事，没有病早一天晚一天不怕，有病就可怕了！要抢在活着时候挣点钱把事办了，不安排好儿子的事死了不放心。”“咱村名誉不好，得叫环境搞好，起码叫房盖好一些，人家女孩才愿意来。”总之“得有房，才能把媳妇娶回来。”

2009年8月，我又来到村里，村里不少人家都盖起了新房。村民牛五堂的新房很气派很漂亮。他一度收养死去的兄弟们的孩子一共9人，现在几个大的已经外出打工。我说，现

在孩子们长大了，日子应当好过了。不料他却说：压力更大了。小时候操心他们吃喝，现在还得操心他们成家，光几个子侄盖房，得多少钱！咱村这情况，孩儿们成媒全凭房子……。

就是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渐渐听懂了关于“房子”的话语意义：盖房子关系到娶妻生子传宗接代香火延续。——这几乎是中原农民一个人一生的终极目标，人生价值的全部追求和生命意义的体现。生命最后关头，更突显出房子意义的紧迫和重要，他们最惦念的就是盖房子。他们真的“分不清场合”，好不容易找到卫生部，他们以为见到了中央“最大的官”，要提出的“最重要最要紧的要求”，自然是房子。至于医药救治，个人生死，都不重要了。他们拼命要活下去，原本也还是为了孩子。不是亲历，不可能理解“房子”在中原农民生命中的意义和价值。——这种理解，需要生命经验的会意与默契。

由此及彼，其实许多时候，人们之间的不理解或者误解，都是这种“话语错位”导致的误读。理解沟通，需要用心。这种理解于决策者尤为重要，只有真正了解百姓的需求，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

### 艾滋认知的误区

至今社会一般人对艾滋病的认知存在许多误区。从1985年国内发现第一例艾滋病，至今已经20多年，但是许多人对艾滋病的无知一如当年。他们不懂得艾滋病、艾滋病人、艾滋病毒携带者是不同的概念，不知道一般接触、蚊虫叮咬不会传染艾滋病，不懂得艾滋病人也是人。社会人心浮躁，人们没有耐下心来认真思考，没有耐心认真听取艾滋病预防知识的宣传。一些艾滋病领域的项目活动，成为少数项目人的自娱自乐，每年一度的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的宣传，也大多是“圈内人”的自话自说。社会上一般人对艾滋病人、对艾滋病疫区的了解，依然极为肤浅表面“想当然”：“那些艾滋病村都封闭起来了吧？不能让他们乱跑传染别人！国家花那么多钱对他们进行救治救助值得吗？他们活着还有什么价值？应当把他们集中到无人区，大沙漠或是孤岛上，让他们自生自灭……。”我不止一次听到这种说法，包括我的一些一向深明大义的朋友。在从北京回郑州的火车上，我邻座的一位年轻姑娘也是这样说。她留学东欧归国不久，现在北京某研究所工作，这次是回家休“无偿献血假”。她告诉我，他们单位对无偿献血者的奖励是：3000元健康补贴、一大堆营养品、15天休假。“没有人愿意献血，虽然知道科学献血对身体没什么影响。我是看上这假期了，我刚到单位报到不久，不好意思请假，刚好利用这次机会回家看父母。”她说。于是很自然我们就谈到了中原农村因为“献血”流行艾滋病的事情，引发她说出以上那些话。一路上她的手机响个不停，她的妈妈不断在问她身体感觉怎么样？火车运行到哪儿了？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家里已经炖了鸡汤等着为她补身子。我想到艾滋病村庄那些“不知道自己抽了多少缸血”的“有

偿献血员”。同样是人，却如此天上地下。直至 2008 年，河南省人民医院一位身为省政协委员的主任医师黄某，竟然还在政协会议上发言说，艾滋病患者从事一些“不该从事的工种”，比如餐饮、幼教、家政、旅游等，就会对周围的人群造成危害。提议对确诊的艾滋病患者实行“人性化的监管”。（2008 年 01 月 18 日大河网-河南日报报道）

尽管国家政府和国际社会对中国艾滋病投入巨大，但是由于过分政治化和媒体化，除了被制造出来的少数“典型代表”，这场灾难性事件中受害最深、人数最多、最弱勢的农民卖血感染者人群，几乎无声，没有话语权。几年前被炒作得沸沸扬扬的“艾滋病西瓜”和“扎针事件”，已经被证实皆属于虚乌有，但是社会上关于“艾滋病人心理变态恶意指报复社会”的传言依然不断。谣言得以产生并能传播开来，原因在于人们对艾滋病的无知和对艾滋病人群的妖魔化。这只会加深对他们的羞辱、歧视甚至敌视，加深这一弱勢群体的底层化和边缘化。在艾滋病已经蔓延开来的今天，真正导致社会报复的根源已经不是艾滋病，而是人们的无知、自私和同情心的泯灭。我们什么时候失去了对弱者对苦难的同情心？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自私冷漠麻木不仁？

## 五 河南艾滋病与 NGO（非政府组织）

1995 年 11 月，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在北京组织召开了“中国首届 NGO 预防控制艾滋病工作联席会议”，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 23 个国家级非政府组织及 18 个省、市、区的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筹备组的代表参加了会议，通过了“中国 NGO 预防控制艾滋病共同行动纲领”，并建立起全国的非政府组织工作网络。事实上，NGO 是跟随国际组织进入中国的一个概念。NGO 在中国艾滋病防治上扮演了特殊的角色。有评论说，中国艾滋病领域 NGO 的发展历史，在相当程度上映射出了整个国家在艾滋病防治事业上的进步。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国家协调员雷诺舟博士说：“中国艾滋病防治领域让世界瞩目的最大新闻不再是河南农民因为卖血患上艾滋病，而是一群曾经因惧怕死亡和社会歧视而处于社会边缘的艾滋病病人勇敢地承担起新的社会角色，动员社会力量抑制艾滋病的传播。”本节记述我在田野工作中遭遇到的几个艾滋病领域中的 NGO。

### 智行基金会

智行基金会于 1998 年成立，在 2002 年 6 月成为香港注册的合法慈善团体。旨在通过为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和弱勢群体提供帮助和关怀来创造一个平等、和谐、健康的社会。“智行”的含义是把智慧付诸于行动。智行基金会的理念是运用知识于行动，帮助不幸的人。

——<http://baike.baidu.com/view/1391271.htm>

**上蔡县的智行基金会办公室** 2005 年夏天我在上蔡县做调查，很意外地发现了智行基金会的办公室，设在县卫生局二楼尽头的一个房间，没有挂牌子，不是有人告诉，无论如何想不到。办公室负责人武廷秀，上蔡人，上海医大毕业，部队转业回来后，任县卫生局机关党委书记 3 年，县防疫站书记 17 年，现已退休。智行基金会办公室就是武书记原来的办公室。当地人称智行基金会为杜聪基金会，杜聪是智行的老板。知情者说——

2002 年 7 月，智行基金会“尾随”复旦医科大学高燕宁课题组进入上蔡县。复旦大学课题组项目题目是《中国未来 10 年艾滋病对策研究》。“高燕宁跟武书记是校友，武书记帮助高燕宁跟县里讲，说明他们只是搞社会支持，做流行病研究，不会造成威胁。这是复旦大学立的项目，不是单单盯着河南和疫情，容易说得通，县里批准了他们在当地搞课题。再说，到 2002 年 6 月底，高燕宁已经在王营村医侯学义家住了一周，当地政府也想清楚了，知道反正什么也瞒不住了。”7 月上旬，高燕宁带领复旦大学课题组正式进入上蔡县艾滋病村庄搞课题调研。7 月中旬杜聪以“高燕宁老师课题的延续”跟进，8 月启动助学项目，首先资助课题组所在的王营村。同时高燕宁介绍武廷秀帮助智行基金会工作，当时武还在县防疫站书记的任上。2003 年初武廷秀退休，全部精力投入基金会工作。

智行基金会办公室人员告诉我：现在我们基金会做事不全部公开，“因为当地政府要面子，这些事你做了，他的成绩在哪呢？”杜聪的活儿就是资助受到艾滋病影响的孩子学费。基金会办公室本应该放在教育局，担心教育局挪用资金，基金会不与官方联系。艾滋病家庭的大学生没学费找县政府、找教育局，都没法解决，现在杜聪基金会资助了 50 名大学生。如果教育局出面解决学生学费问题，基金会就退出。只要是艾滋病家庭的孩子要求支持学费，都能解决。资助标准是，每学期小学每人 100 元，中学 240 元，高中 1000 元，大学按学年，每学年 3000—5000 元。全县艾滋病感染者说是 6000 多人，实际上有 7000 多人，基数大。最开始（200207）基金会资助两所学校，几百人，现在（200508）发展到 3119 人。除了小学 126 人，大学 50 人，主要是中学。光是城南中学，全校学生 1700 多人，就资助了 500 多人。艾滋病家庭的高中学生学费基金会全包。还挑出了 20 名小学生，负担每人每年生活费 1200 元，就是找那些家庭困难的孤儿。对上蔡艾滋病人的外援，杜聪是大头，其次是民政部门。智行基金会还资助新蔡的 100 多名学生。一年总计费用 100 多万元人民币。现在杜聪基金会与当地政府没有关系，原来打交道的副县长调走了，现在的县长知道也不问。（田野手记 20050819）

**现场观察** 2005 年 8 月 20 日，周六。智行基金会上蔡县办公室人来人往，家长们来问，

钱啥时到？也有人来办申请。办公室人说，要开学了，杜聪明天到。

张莲英，66岁。乌龙乡半屋村人，她只有一个女儿，出嫁到熊村，艾滋病死了。留下一个孙女，今年高一新生。“学习好，差4分没考上一高，上的二高。”她丈夫癌症死了。借了邻人960元给孙女交学费，邻人的老婆死了，让她还钱。“我没办法，让人说情把学费退了，去还人家钱。”她现在等着智行基金会把钱给了她，再去交学费。张莲英哭诉说，要不是党和政府，俺咋活哩……。智行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小杨，一个年轻姑娘，跟她说：这是人家基金会做好事，是私人的钱给你哩。张莲英说，那私人咋拿得出那么多钱？咱得跟人家写个感谢信。又说，孩子争气，要是上不成就不说了，要是上成了，让人家巴结着我过。高中差点考不成，没有钱报考，是老师看着孩子学习好，说服乡民政所长给出了100元报考费。武书记说，没想到孤儿也要交报考费。张莲英说，她姥爷死了，就是活着也供不起啊……。说着说着又说，要不是党跟政府……。

张德中，丁楼一组，72岁。来给孙子申请资助，孙子上县一高。张德中的儿子患脑瘤开刀，儿媳艾滋病死亡，孙女送养姨家。原来全家6口人，6亩地，现在老两口种2亩，种植玉米、豆子、麦子，趁旁人的车到李斯楼去卖，收入1000元。4亩让给邻居。“原来缴公粮，人家还不愿种哩，现在不缴公粮了，一亩地给20元。”孤儿补助160元。家庭困难，去年工作队免去孙子学费一半，450元。现在智行基金会给1000元。

朱秀云来给女儿办助学申请，户口本丢失了。武书记说：“我给你出个主意，到派出所盖章出个证明。你办不好，买两包烟找村干部去替你说。”办理申请需要户口本、HIV化验单和填写好的申请表，所有文件需要复印10份，“这些由基金会负责，不给老百姓增加一点负担。”武书记说。

丁中华，男，23岁，高燕宁的“公共卫生”研究生。现在正参加杜聪的全球基金项目“针对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心理支持和心理关怀”调查。参加项目调查的还有杜聪办公室人员。项目目的是鼓励孩子上学。“现在普遍厌学”，为了让孩子们明白有人关心他们，搞校园活动，绘画、作文评奖，做家访问卷。做调查只能在文楼、王营，其他地方拒绝外人进入。做问卷调查，有当地大学生帮助。办公室的小杨也参与家访问卷调查，她作家访时，到过很偏远的大路李乡郝坡行政村疙瘩李。小杨说，据村民讲：全村360人，吃药（抗病毒药）31人（武书记插话：CD4细胞200以下者，一般占感染者50%），已经死亡30多。乡里瞒着不让上报，国家政策享受不到。智行基金会资助那里的孩子学费，大路李中学5人，郝坡小学36人，其中疙瘩李村的中学生3人，小学生22人。

如此看来，智行基金会在上蔡县的工作已经做得很深入了。

2006年3月，我在驻马店遇到前来参加会议的上蔡县卫生局的小D。他说，智行基金会已经被撵走了。当年同意智行进入上蔡的副县长险些受到处分。“作艾滋病工作不出政绩，反而影响政绩。这位副县长已经调离了，他早已是副县长，至今依然是副县级。没办法，他们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说境外援助。”（田野手记 20060324）有知情者说，当年高燕宁、杜聪进入现场实地，如何带进去，并且在“眼皮低下”做了2年？许多故事不能讲，人事还在进行中。只能说，下面人为了做一点事情，用自己的方法，保持自己很不易，“体制与个人是两码事。”

2008年3月，春节后不久，我在银庄遇到智行基金会来给艾滋孤儿发放慰问品。一行4人：河南地区负责人丁浩、香港方面的财务总监简先生，还有两个年轻人小张、小王。市慈善总会王科长、县慈善协会孟主任、李科长到场。丁浩言语很少，不像武书记那么健谈。他说：“我们现在只跟政府合作，不与任何宗教、草根组织联系，否则合作不长久。”这与当时武书记“基金会跟政府没有关系，只与民间合作”的说法很不相同。这一次进入Q县，他们是通过K市慈善总会的管道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可。而开展具体工作，寻找目标人群，提供孤儿名单、协助放学费，则直接依靠“希望家园”负责人栗可昆。——不是草根组织又是什么呢？栗可昆一语道破：“不过是踢踢政府的门槛，做事还得靠咱自己。”此时，智行基金会已经在B镇发放助学金大、中、小学生学费计4.9万元。2008年夏季，银庄“希望家园”参加智行基金会和关爱之家共同组织的暑期艾滋孤儿夏令营活动。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第一次上海，希望家园刚刚成立，只参加了2名。第二次郑州，第三次武汉。每次活动都有智行基金会的资助。

### 台湾关爱之家

关爱之家是在台湾合法注册的非营利组织。它致力于保护艾滋感染者已经超过二十个年头。关爱之家在2002年底进入大陆工作以来，从广州一个办公室、一个接待站及河南两个关爱之家收容艾滋遗孤进展到七个省二十余据点，且由个位数艾滋病友的照顾到如今1000多名分散在五个省内五个艾滋病友中途接待站；儿童方面则有1000多名贫困儿童资助、100多名艾滋宝宝照顾，而在河南服务的病患也接近河南省三分之二的县市。

——[http://www.hhat.org/index\\_c.htm](http://www.hhat.org/index_c.htm)

2006年5月，我在台湾参加学术会议期间结识了关爱之家负责人杨婕。杨婕很干练，她带我前往台北文山区收住艾滋病患和艾滋宝宝的台湾关爱之家，一手抱着艾滋宝宝，一手握方向盘开车，途中还下车采买午饭所需之食品果蔬。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当时商定在银庄

开展艾滋孤儿救助意向。7月，关爱之家前来银庄考察，初步商定有关事宜，不久签订合作协议。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协议书中“台湾”两字隐去，村里的孤儿院也不叫“关爱之家”，而是叫做“希望家园”。当时我和这个村庄都正处于一种极度敏感的困境。那天晚上村庄停电，卫华、可昆、栗昭、华中，我们摸黑爬上栗可昆家的屋顶平台。大家就坐在后来成了“希望家园”的那所房子的屋顶上，在夏季夜晚的星空下，讨论未来的计划。大家满怀热诚和期待，希望这是开始“自己的行动”的一个契机一个起点。两天后，关爱之家派员前来为入住孩童拍照建档。当时上海复旦大学志愿者，通过我的关系在村里做暑期社会实践，便配合着逐家逐户拍照填表整理资料。尽管十分小心谨慎，村里来了几个外地人还是惊动了镇党委政府，B镇一位副书记和派出所长前来查问。复旦女研究生随机应变，自称上海某企业秘书，代表老板前来考察投资环境，准备在村里投资项目。副书记立刻来了兴趣，相邀请客吃饭，“好好谈谈”。那位关爱之家大员即刻配合“表演”，充当司机角色，催促“秘书小姐”：时间不早了，该回去了……。两人配合默契蒙混过关。这一戏剧性场面，直看得在场的栗卫华们目瞪口呆。由于不允许接受海外援助资金，希望家园的资助者，一直被说成是栗可昆外地打工时结识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老板。

希望家园第一批收住孩童20名，之后增加到32名，还有数名孤儿“家外补助”。

### **爱德基金会**

爱德基金会成立于一九八五年四月，是一个由中国基督徒发起、社会各界人士参加的民间团体，致力于促进我国的医疗卫生、教育、社会福利和农村发展工作。爱德项目遍布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每年有数十万人从中受益。

——[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volunteer/1/4247.shtml](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volunteer/1/4247.shtml)

2006年夏天，我走访南京爱德基金会总部，拜会了两位秘书长。当时爱德基金会已经通过基督教协会的管道在K市资助一家福音医院。2003年出资40多万元购置医疗设备，捐赠一部汽车。同时开展孤儿救助，其中包括银庄一些艾滋孤儿。彼此谈得很好，初步动议，基金会在银庄开展建沼气池配合养殖项目<sup>①</sup>：为了保证沼气池有充分的粪便发酵产气，同时搞养殖。当时约定，他们将在考察河南项目时邀我同行，一起到当地有关部门联系相关事宜。不久我随同爱德基金会一起到访了许昌、临颖、商丘、周口等地的爱德基金有关艾滋病的项目点，又一起来到银庄考察，引荐爱德基金会见了B镇党委书记。B镇党委书记很谨慎，说

---

<sup>①</sup> 当时建议搞沼气项目，是因为村民多次向我说起县里和工作队曾经计划在村里建沼气，并派村里代表到外地参观过，村民心向往之。



这事得汇报上级领导决定，“只听上级一定听上级的，请示之后再答复。”几天后，书记说，鉴于爱德基金会已经在K市开展过项目，“前有辙”，请示上级后，说可以接受。还说前不久爱德基金会介绍的香港救助当地艾滋孤儿的很大一笔资金被拒绝了，“海外资金不能接受，只接受爱德基金会直接资助的项目。”我“牵线搭桥”完成任务之后便退出了，B镇党委政府与爱德基金会直接联系运作。后来开展的不是建沼气配合养殖的项目，而是单纯的养羊项目。爱德在当地已经开展过养殖项目，效果似乎都不大理想。为这次项目开展，B镇政府还在银庄成立了艾滋病理事会——原则上基金会直接对民间机构合作项目，要求“五户联保”并上报名单。据村民反映，此次项目开展效果也不尽如人意，“爱德基金会资助12万搞养羊，结果场光地净，没任啥了。靠人家的钱，‘不痴心干’，弄不成事。”村人很调侃地谈论这件事——

不是发的有羊么？羊哩？

分了（生小羊了）。

生的小羊哩？

吃了。下半夜睡不着，怕人家偷了。

爱德基金会资助银庄部分艾滋病家庭养羊的12万元，平均每户1000元，到户家手里变成800元，扣去200元“经纪人费”。一年后爱德基金会按照协议检查项目回收资金。B镇书记说，受灾了，冬季降温，羊死光了。镇长说，艾滋病人，有病，没钱，还不了，你能咋着他？！

爱德基金会还通过基督教会银庄资助若干名艾滋孤儿生活费。每人每年1340元，由县三自教会主任亲自发放，每次由监护人带着孩子领取。“发钱时要亲眼见到孩子，一回不见孩子就‘上报退学，取消资格’。孩子要写感谢信，感谢信要按规定写，写不合格也取消资格。每年发两次，一次发半年的，扣20%“跑路费”，也叫“介绍费”。2005年每次发550元，2006年530元钱，2007年520元。最近一次（2008年04月）每人500元，又少了20元。主任说，这些钱是从各方面运筹的资金，除去办公费用，出差费用等等，剩余就这么多。如果上面有人来调查此事，就说每人每次发放670元。“信主也得吃饭。就是像介绍对象，你看人家大姑娘怪好，不给你介绍你就谈不成对象。这事我还不想要管哩，看谁能管？我也得给爱德送礼，买月饼送去，里边夹的有东西，金项链金镏子。”“中间‘捣鼓’得很，他那庄告状捣鼓他的人多得很。”

县慈善总会介绍说，爱德基金会在全县救助586名孤儿，其中B镇只有17人，“B镇情况特殊，上级有安排让少报点，其他乡报得多。”基金会在当地搞的养猪养羊项目都不成

功，早期支持资助的福音医院是他们至今的亮点。

### 正生学校

在远离城镇也远离村落的地方，有挺大一块圈起来的土地，门口歪斜着“正生爱之学校”一块牌子。人们告诉我，这是香港林老板租用某林场 200 多亩土地，租期 70 年，办起的艾滋孤儿学校。现有孤儿 40 多名，其中感染病毒的有十多名。正生学校刘校长是当地一位农民，“也是个能人，在老家注册了一所孤儿院，乡里拨给他 20 亩地。”院里一所两层楼房上下各十几间房，分别挂着学生寝室、教职工住室、办公室、教室等牌子。学生寝室摆放着双层床铺，十分拥挤，床上被褥很脏乱，一些也不干净的大小不一的孩子坐卧其间，吵闹着。教室里，稀稀拉拉几个学生在上课，有一班大概是作文课，女教师伏在学生的课桌上睡得口水直淌……。听到有人叫孟瑶，认出就是曾经在襄樊无国界医生组织那里见到过的死里逃生的小姑娘，回头又认出了陪伴她的奶奶，我在郑州关爱之家也见到过她们。感觉怎么到处碰到同样的人？

办公室里，刘校长正在接待一位北京客人。据说这位客人将要介绍“国家扶贫办的”过来，同时带中央电视台来“拍片子”。听来听去，所谓“国家扶贫办”，大约是“挂靠”某部级单位的一个 NGO，名称很大，叫做“中国扶贫基金会”。北京客人说要帮助艾滋病人，“但是第一步是首先要搞宣传，你们把资料给我，我用这些资料募捐。”他是先来打前站的，明后天要来的“中央电视台”记者，也不过是过去在中央电视台干过，现在自己开广告公司的什么人，“中央台对题材有限制，拍了也不能播出，只能用私人拍片子搞宣传找资金。”他对刘校长说，香港的林总是老板，福建总部负责人是掌柜的，你正生学校校长是包工头，我是你们手下干活的。现在我把基金会给你领来了，能不能忽悠到钱，看你们的本事了。刘校长回答说：今年目标 50 万。你再想办法给我拍几张名人合影照……。上次已经跟相声演员×××拍过了，再找机会跟冯巩合个影……（田野手记 20070622）

不久，听说正生学校校长易人，刘校长“50 万资金对不上账，被赶走了。”

正生学校一度与银庄希望家园往来频繁，林老板游说希望家园负责人栗可昆到正生学校担任校长，将希望家园搬往正生学校，由于栗可昆的拒绝没有成功。栗可昆曾经帮助正生学校做过一些工作，也送过一些艾滋孤儿到正生学校上学，但是效果不尽人意。村人说，他们常带香港客人到村里拍照，把希望家园当成他们对外宣传的基地，家内和孩子们都没有得到过他们一分钱的资助；他们要求帮招收学生，却不注重教育质量对孩子不负责任。村民认为“他们一直是在利用我们”，“利用我们的孩子骗好心人的钱。”之后，正生学校一些负面消息在网上曝光，香港方面发生官司纠纷，香港总署调查正生公司两千万元善款去向。

有人说他们是最聪明的商人，打着慈善的幌子搞商业运作谋取私利。

### 无国界医生组织

总部设在比利时的无国界医生组织是世界知名的 NGO，长期为贫困人群提供医疗帮助。2003 年开始，无国界医生组织尝试着在中国的艾滋病高发区进行工作。该组织有一个规定，无论是在哪里工作，都以取得当地政府的许可为前提。经过努力，无国界医生组织在湖北省襄樊市开设了第一个艾滋病门诊。

据悉，2004 年春，无国界医生组织北京办事处试图联系在河南某县建立艾滋病治疗机构。开始该县的反馈很积极，无国界医生组织按照惯例提出由该县政府以书面形式确认许可，但县政府和卫生部门经过反复研究之后认为，如果允许无国界医生组织开设治疗机构，是否会使当地的艾滋病真实情况公诸于世？无国界医生组织北京办事处最终没能等到该县的邀请函。（喻尘，2004）

2006 年 6 月，我拜访设在湖北襄樊的无国界医生组织。与河南一些县城艾滋病定点医院人满为患的情况相反，这里的艾滋病医院住院部有不少空床位。据说襄樊市艾滋病患者不多，无国界医生组织之所以选定这里，是因为这里与河南省交界，他们还是希望能够为河南省的艾滋病人群提供医疗救助服务。也的确有河南省的艾滋病患者到这里就诊，台湾关爱之家还在襄樊市建“中途之家”，为前来就诊的河南艾滋病患者提供食宿服务，但是知道的人不多来的也不多。当时中途之家已经准备撤回了，因为前不久无国界医生组织已接到襄樊市政府通知，不允许再接收河南省的艾滋病患者，“担心影响当地的安定团结。”

### 李丹与东珍

李丹：男，生于 1978 年 1 月 20 日，中共党员。1996 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2000 年考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太阳物理专业研究生班。李丹没完成在他的研究生学业，而成为一名中国艾滋病活动人士。2003 年 10 月在商丘市梁园区创办“东珍艾滋病孤儿救助学校”，2004 年 3 月被商丘市梁园区教育局取缔。李丹将“东珍艾滋孤儿项目”整合为一个健康教育研究所，在北京市海淀区工商局注册为东珍纳兰儿童心理研究所，后更名为东珍纳兰文化传播中心、北京东珍纳兰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2006 年 5 月李丹获美国锐步人权奖。

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 2006 年 12 月世界艾滋病日活动中，我第一次见到李丹，一个清瘦高挑的年轻人。当时北师大学生社团“农民之子”邀请我就河南艾滋病问题举办一场讲座。彼此交谈起来，才知道李丹由刘子亮<sup>①</sup>带领，曾经到过我当时正在做调查的银庄，他去的那一天，村里有一个艾滋病患者自杀。在此之前，我从高耀洁教授那里已经听说李丹，2004 年

<sup>①</sup> 最早公开面对媒体的艾滋病患者，详见第三章之六。

我在商丘做调查，也听到关于李丹在当地活动的情况，知道他处境很困难，但是很勇敢。之后我造访李丹在北京的东珍纳兰文化传播中心，了解到李丹还开始关注满族文化研究，李丹是满族人。2007年初李丹到河南，约我匆匆一见，他说还要拜访高耀洁教授，临走留下一份他刚刚开办的艾滋维权刊物《惟谦》，希望我为之撰稿。之后又收到他邮寄来的两包关于艾滋病法律知识的小册子，我已经带给艾滋病村庄的村民。只是关于撰稿之事，由于手头事务已使我焦头烂额，一直无暇顾及。

再之后，无意间在网络上见到两则信息，一则来自高耀洁教授的博客，另一则是李丹的声明。摘录如下——

“东珍”的创办者李丹，早期投身防艾事业，还是做了一些事情，所以他在各地高校组织防艾巡回演讲，我在体力许可的情况下都参加了。2006年11月初，我在南京10天进行了12场他们安排的讲座后，再到上海继续11天10场讲座时突发胃出血，不得不取消了原定的广州之行。我后来也陆续听到防艾圈对他所作所为的各种恶评。我想年青人没经验，出现错误也是难免的，所以一直告诫他要真正为艾滋病感染者和孤儿做些事，但这次李丹让我彻底失望了。据有人证实，李丹在国外以救济艾滋孤儿的名义募捐，但拿到某基金会的捐款后，并没有用于尉氏县的孤儿。至于这笔钱用到了何处，我就不得而知了。有人向我反映，李丹目前遭遇经济危机，我不知道他此前获得的国外捐款、奖金等究竟是如何使用的。

……

我再次重申“三不原则”：一，不成立任何组织；二，不接受任何组织或个人的捐款；三，不与任何组织和个人合作。如果有组织或个人以我的名义进行任何违背“三不原则”的活动，均为假冒，我将采取必要的手段。

高耀洁 2007年4月26日写

### 东珍河南艾滋项目暂停声明

8月15日下午，开封市公安局、工商局及相关部门人员来到东珍开封办公室，以“无照经营”为理由，责令东珍开封办公室于2007年8月17日上午“停止营业”；警察还提醒东珍员工说：开封治安不好，小心社会上的人，最好尽快离开开封。

8月16日，在尉氏县阮家村东珍乡村活动中心实习的5名学生和1名带队教师，被县公安局人员带至县城进行盘问，之后被遣送到郑州并送上返校的火车。

同时，在东珍曾进行资助的各村，已经有地方领导的工作组进驻，外人难以进村；数名曾经帮助过东珍的艾滋病感染者被盘问和拘留（已经获释）。

以上事实虽然令人愤慨，但是，为了避免2004年夏天与商丘政府冲突的重演，特别是避免给当地村民和感染者带来伤害——2004年7月，有8名感染者因为帮助东珍艾滋孤儿学校而被地方领导以扰乱社会治安等罪名刑拘——东珍在征求各方意见后讨论决定，暂时停止河南艾滋病项目（AIDS 孤儿资助项目和艾滋病高发村活动中心项目），并开始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就此事进行沟通。东珍希望，通过沟通妥善解决艾滋孤儿的资助和活动中心图书的善后问题，并希望地方政府相关部门能够理解东珍服务社会的单纯性和诚意，消除误解和担心。

东珍相信，民间组织和政府部门的目标是相同的，都是为社会公众服务。因此，我们有信心最终能够得到地方政府部门的理解，并在不久的将来重新开始一线的艾滋项目。

最后，向因为东珍项目暂停而受到影响的艾滋感染者、艾滋孤儿、艾滋家庭致歉，向各位爱心资助者致歉，希望能够谅解。

东珍纳兰文化传播中心 东珍艾滋项目 李丹

2007年8月29日

### 亚洲博爱救助基金会

亚洲博爱救助基金会是一家美国慈善机构。2006年，卫明接手亚洲博爱基金上海办事处的工作，负责在河南开展艾滋病救助。卫明了解到我在作相关研究，跟我通过几次电话，多次相邀同往K地。博爱基金会的老板麦克留给我很深的印象。

2008年3月，按事先的约定，司机小王来接了我，往新郑机场会齐卫明、麦克，直奔K市。此时博爱已经通过K市基督教会联系市宗教局，在当地开展活动。他们根据从县民政局得到的救助名单，对B镇17名艾滋孤儿实施救助。小王是某旅游公司的司机，K市人，卫明每次来河南都是租用他的车。麦克是美国人。卫明介绍说：博爱基金老板，可以直呼其名麦克，也可称他为“陆老师”。这次大家是第一次见面。卫明在电话中已经告诉我此行日程安排：为期3天到访3个地方：K市福音医院，计划与K市教会的合作，以福音医院为平台开展艾滋病救治；Q县B镇，看望基金会在B镇救助的17名艾滋病儿童；X县，落实即将在X县开展的艾滋病孤儿救助名单。时间观念很强，提前计划按日程行动，这是西方人办事的风格。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次参与观察的机会。

从机场往K市的一路上，卫明与我聊本次行动相关情况，而麦克则一直斜靠在后排座椅上睡觉，他说：“我很会利用时间休息。”午时抵达K市，下榻K市饭店。稍事休整，下午2点半到福音医院参观座谈。福音医院原是K市基督教会的一个诊所，2001年7月经K市卫生局批准。2003年在K市民政局登记注册为非营利性一级综合医院，医院设备大多由爱德

基金会捐赠资助，并在爱德基金会帮助下，开展“爱心直通车”活动，通过农村基层教会进行义诊。现在希望通过与亚洲博爱救助基金会合作，提升医院的利用率。

晚餐时与麦克聊天。麦克能说一口地道中国话，他说他还会“根据不同地区谈话对象变换语调。”麦克说他很爱中国，“很喜欢中国的生活方式。”他和妻子在中国生活过很长的时间，主要在东北。麦克是一位农场主的独生子，麦克自己有3个孩子。麦克的父亲热心慈善，说他的财产，将来给3个孙子女每人100万，余者全部由麦克用来作慈善事业。麦克说，他愿意帮助孤儿，因为他的太太就是孤儿。如果按太太的主意，他们家里就会收养几十个孤儿了，麦克不太赞同“那种帮助的方式”，于是以“这种方式”来中原大陆帮助中国的孤儿。晚餐后，麦克要回房间写作报告书，这是他“每天的功课”。我也回到自己的房间整理一天的笔记。

次日一早出发前往Q县B镇看望基金会救助的艾滋孤儿。先到县城，接民政局干部小杨。博爱基金会每次行动都跟当地政府打招呼，并一定请县民政局派人一起下去探访。卫明说：“这在双方都有要求。干什么事情让他们知道，不要让上边问起来时他们不知道，那样会使他们感到被动。”每次到K市活动也都由市基督教会知会市宗教局，“这样才便于协调开展工作。”而在Q县的具体救助工作，实际上还是依靠银庄希望家园的栗可昆。基金会救助B镇17个儿童，都是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孩子，他们分散在若干个村庄。基金会对他们每月每人资助100元生活费，由栗可昆负责发放。麦克们先到银庄探访“希望家园”，把糖果分给孩子们，参观了卧室、厨房。然后由栗可昆带领去探望那些分散在其他各个村庄的艾滋病患儿。这些村庄，房屋更显破旧，显然情况比银庄更差。银庄是重点村，国家政策惠及较多，又由于艾滋病患众多，感染者在自己村里不受歧视。而这些村庄的感染者，大都隐瞒着，不敢让外人知道，歧视严重。我们悄悄走进受助者家庭，栗可昆发放当月的每人100元救助款，请家长或者监护人签字。他们大多不认字，就唤过孩子来签。每个受到救助的人都千恩万谢，开始脸上挂着感激的笑容，但说着说着，都会眼泪汪汪。我习惯性地举起相机，麦克走过来阻止我：不要拍，NO，NO！他说：“不要拍照。不是为了你，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他们。不能让他们认为是在‘利用’他们，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他们。”麦克不明白我收集资料记录历史的动机。也许是两种文化背景的原因，也许是我们各自的出发点不同，无所谓孰对孰错。但是我尊重了他的意见。内心也在反省：我们的文化中，是否太少对人的尊重？包括我自己。什么使我们的心变得粗糙、麻木，使我们对人人心人性最深处的情感不再敏感？或者是无暇敏感——我们没有条件去“脆弱”去“敏感”。其实，我时常也会感到自己的“残忍”——记录人间不幸，记住人间不幸。但是为了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记住”。

在另一个村庄，村里人远远观望着我们这群外来的不速之客。当我们从一户人家走出来时，隔着坍塌的半壁土墙，有人指着相邻的一处院落喊说：那一家也难哩很！孩子大了打工去了，就剩老两口没有人管……。卫明上前去问，家里有没有孩童？村民显然不明白他问话的意思。栗可昆上前跟喊话的人解释：这是好心人作善事，他们光管救助小孩，就象铁路、公路、各管一段，别的不归人家管。那人听明白了，笑说，知道了。乡里乡亲话语容易沟通。

晚餐在 K 市饭店，K 市基督教会会长马牧师做东，宗教局张科长作陪。席间谈到麦克 2003 年即到 K 市作过环保救助，当年曾捐赠 4000 个净水器给 Q 县水污染区的农民家庭。这使我想当年有关沙河沿岸癌症村的报导。麦克说：“也听说了癌症村，但是我们不说癌症村，那样政府会不高兴，我们只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不问癌症村，只‘提出项目’，找厂家定制水处理器，帮助污染地区农民用上净化水。”马牧师补充道：那地方叫黄孟营乡。他说，Q 县污染问题，味精厂是替罪羊，真正的污染源在郑州。郑州污水全排放到 Q 县来了，沿贾鲁河流下来，从教会边上过去，水质污染超标 2000 多倍，600 米以下的地下水才能饮用。“小时候，20 年前，放学后常跟父亲去捞鱼。家里来亲戚客人，到河里用篮子捞鱼请客人吃。有时候部队炸鱼，一炮崩一吨多鱼，大家都去捞点吃。那时水好鱼多。现在水受污染，鱼少多了，变得头大身子小。”

之后百度搜索到一则信息：和黄孟营村相邻、同样遭受水污染的东孙楼村，获得亚洲博爱救助基金会的支持，基金会为首批 300 个肿瘤病患者家庭免费安装滤水机……。

第三天，本次行程的最后一天。一大早由 K 市基督教会焦牧师陪同，驱车前往 X 县，路况很差，一路颠簸。卫明手里已有事先通过教会渠道报上来的 30 个孩童救助名单。最先见到的是 30 个名单中的小 F，一个 14 岁的男孩。他的父母都死于艾滋病，他和弟弟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这男孩接待客人彬彬有礼，搬凳子倒水，显得特别老练成熟。他问麦克：你是美国来的吗？答：是。问：能帮我到美国去吗？问话直截了当，“直奔主题”。麦克说：好好读书，以后考到美国去念书，那时候我会帮助你。最后走访的一家，见到的是两个美丽的小天使，一个 5 岁，一个 7 岁。小小两姊妹从屋里走出来时，头发上别着彩色发卡，小辫子上插着鲜花，显然是尽其所有“披挂”在身上的花花绿绿的衣裙，却意外地展现了一种异族风情的效果。谁给你们梳妆打扮的？问。她们的母亲闻声从灶房走出来，用围裙擦着湿漉漉的双手。她不好意思地笑说：“我在一边洗衣服，她俩自己在屋里瞎闹腾……。”这份来自稚嫩孩童的爱美天性，感动了所有的人。麦克惊叹道：这么漂亮！最漂亮的！我赶紧说，给你们合影？麦克欣然。那 5 岁的小妹妹感染艾滋病毒，因为输血。我没有录相，因为麦克。但是，真想把这人性中的天真美丽留下。临别，忍不住拥住她们的时候，心里一阵感动。一

扭脸，却见她们的母亲又是泪水涟涟。她们笑着面对前来帮助她们的人，可谁真的能体察她们内心深处的痛楚心酸？麦克，一个“老外”，深入到中国偏远乡村农户家庭，满怀爱心对待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照片 32）此情此境，不由令人生出许多感慨。

时间很紧张，麦克、卫明要赶下午 1 点的飞机返回。X 县路边一家小餐馆吃过饭后，大家依依惜别。麦克、卫明直奔机场回上海。我则跟随焦牧师返回 K 市，傍晚时抵达银庄，继续我的田野调查。（田野手记 20080314-16）

### 国际 NGO 的渗透与“阻隔”：全球基金、武汉会议与其他

全球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基金（简称“全球基金”）是在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倡导下，于 2002 年成立的，旨在为抗击世界上最具灾难性的三大疾病增加资源，并将这些资源送往最需要援助的地区。全球基金作为政府、群众团体、私营部门及受影响社团的合作伙伴，全球基金代表了国际卫生融资的新途径。

——摘自《全球基金项目介绍》

确保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以及公民社会更加全面地参与中国的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防治工作还需要作大量的工作，为此，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以及其他全球基金中国国家协调委员会成员在 2006 年 12 月 7—10 日在湖北武汉召开非政府组织会议。

——摘自《武汉会议通知》

至 2007 年 3 月，我国已成功申请到 10 个中国全球抗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项目，申请资金总额约 4 亿余美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全球基金目前在中国十个项目的中央执行机构 (PR)，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非政府组织参与是全球基金第三轮艾滋病项目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全球基金和国际社会的一个关注点。据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办公室《全球基金项目介绍》，在第三轮艾滋病项目<sup>①</sup>七个项目省都有草根组织<sup>②</sup>在自发地开展活动。草根组织的成员很多为艾滋病感染者，在全球基金项目省主要成员是农民，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因此，在对国家政策的理解、对全球基金项目的了解、撰写活动计划和开展项目活动等方面存在较大的不足。于是在 2005—2006 年度项目申请中根据 CCM 成员单位研讨会形成的意见，允许未注册草根组织申请项目，获批准项目委托合法注册机构管理；设定了额度 1—3 万元的小项目来支持草根组织开展活动。考虑到草根组织活动的现状以及由于人力资源方面不足导致无法提交合格项目建议书这一客观情况，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办公室根据专家

<sup>①</sup> “加强中国中部地区社区为基础的艾滋病综合治疗、关怀和预防项目” 第三轮批准。

<sup>②</sup> 对于草根组织，不同的机构有不同的界定。这里中国性艾协会定义为：成员在 3 人以上，具有明确的活动目标，在过去的 1-2 年间从事过艾滋病防治工作。



建议，委托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于 2005 年 12 月 22 日至 24 日组织了一次培训。其主要目的是：1. 提高草根组织撰写项目建议书的能力；2. 使草根组织更好地了解全球基金项目的实施特点；3. 使草根组织了解国家艾滋病防治方面的法律和法规以及“四免一关怀”政策。最终的目的是使草根组织了解国家政策，借助参与全球基金项目工作加深与当地政府部门和卫生部门的沟通，使其工作纳入当地艾滋病整体控制规划，使工作融入到本地艾滋病控制工作中，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共同服务与艾滋病控制的总体目标。通过张可的帮助，银庄村主任栗卫华和艾滋病人代表栗可贤参加了 2005 年 12 月全球基金在北京的项目培训班。这是村里人第一次走出去参加培训，并在培训班的帮助下填写了项目申请书。但是他们回来后申请项目的行动受阻，B 镇政府警告他们“外国的钱不能花”，并拒绝为申请书盖章，因此银庄未能获得项目资助。——许多基层社区艾滋病草根组织遭遇这种情况。也许正是因此，促成了武汉会议的召开。

武汉会议的正式名称为“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防治工作非政府组织会议”，因在武汉召开而得名。银庄有 5 个草根组织的代表参加，我则作为观察员与会。银庄人第一次经历这种场面，会议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新奇：大会报告、分组讨论、举手表决、填写征询意见书，还包括入住的宾馆、会议用餐。特别是，在会议上他们作为草根组织代表的“主角”地位和所享有的权力，使他们感受到从未有过的被重视、被尊重。分组讨论时，他们因为“第一次参会”受到格外的关照和优待，主持人热情鼓励他们发言表达自己的意见。举手表决时，他们不像其他代表们那样果决地高高的伸出手臂，而是犹疑四顾着慢慢地慢慢地举起自己的手来，好像有些胆怯有些不好意思。他们正在经历着的这一切，使他们感到陌生、惊讶、不习惯。他们还带了一些红丝带，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摆出来义卖，不少参会代表都给予了支持。

在武汉会议的最后一天，所有议程完成后，大会宣布圆满结束。这时台下感染者突然聚集一起，呐喊着涌上前台，全场皆惊。银庄村的感染者代表站在这群人的最后面。台上每个人都激动地讲述了他们的艰难处境，他们的愿望和需求。话筒最后传到了银庄感染者代表栗华中手中，半晌无语，静场。突然，华中哭喊道：“俺那，俺那死多少人啊……！都没人管俺们哪！”气氛推向高潮，台上人一下拥抱在一起，台下人无不动容。走下台后的华中依然不能平静，他抱着我痛哭失声，仿佛心中有一百年的怨愤委屈翻江倒海滚滚而下。

会议结束后，一位河南籍的武汉大学的女同学自告奋勇带领我们这些“老乡”游览武大校园。几个人在武汉大学的学生餐厅里用餐，驻足大学操场观看大学生们踢足球、打篮球，登上山顶图书馆参观。一路上，华中欢快得像一个孩子，他爬上一株花繁叶茂的不知名的树，

要我给他拍照。说，我这一辈子是不说了，不知道我的孩子能不能出一个大学生？31岁的栗华中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

武汉会议之后，参会民间机构受到安全部门盘查，据说有上级“内部明文电传”指令。“非政府组织”对于现时的中国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在某些人看来，“非政府”就好像是“反政府”。

2007年2月，银庄草根组织代表又参加了西安“关于中国全球基金项目非政府组织类别代表选举培训和社区意见征询会”。另外两场内容相同的会议在北京、昆明召开。有人说西安会议是3个培训中办得最有特色的，以至于用“实在，实在，实在，实在太棒了”的措词来形容。然而银庄参会代表对会议的反映似乎很冷淡，也许他们根本对会议宗旨缺乏理解或者没有兴趣。之后，银庄的草根组织又参加过北京、沈阳、驻马店、哈尔滨等地举办的各种类似会议和培训班。但是，他们越来越失去了参会的兴趣和热情。他们感到自己没有从中得到帮助，会议所讲的一切，离他们很远，项目很难拿到，他们的作用只是在选举时充做选民。他们说，“只拿我们说事，不为我们办事”，这不是在“擻”（chou, 向上推举）我们，是在“摔”我们。2008年沈阳举办的一次项目培训班，一些接到会议通知的银庄代表没有参会，当时正值农忙麦收，主要是他们已经没有了原先的热情和兴趣。而会议组织方也根本拒绝考虑“农忙”的因素，尽管全球基金说很注重支持草根组织参与，也关注到一些项目省主要成员是农民。

全球基金用于支持资助中国抗击艾滋病的项目资金很多，但是很难下沉到底层。在这个层面上，“外面”的力量一直没有“走进来”，银庄人也很难“走出去”。很多情况下，底层草根组织只是上层少数大的NGO寡头消费采撷的对象。

### NGO的作用与困境

一般认为，一些具体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如果由政府机构出面，可能会造成工作不畅。在这方面，国际通行的做法之一是通过社区的非政府组织(NGO)来执行。“可以说，防治艾滋病，帮助病人和病毒携带者，必须有NGO参与。在艾滋病防治上，如同环境保护一样，政府不可能将所有工作包下来，首先资源有限，而且，政府也没有足够的精力将艾滋病的工作全部包下来。”卫生部伦理委员会首席专家邱仁宗说，NGO还可以利用它的优势，获得为防治艾滋病所必需的补充资源。在世界上，凡是在艾滋病问题上发挥NGO作用好的国家，那里的艾滋病蔓延的势头就得到了控制。

但是在中国，从官方到民间对NGO的认知理解都还需要一个过程。在一些人看来，“非政府”几等于“反政府”。因此在中国NGO面临着一个难题：如何在得到政府许可的前提下

开展工作？不被认可，不被理解是大多数在艾滋病高发区开展工作的 NGO 所遭遇的共同难题。20 世纪 80 年代末，民政部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照此条例，NGO 必须有民政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的双重管理。1998 年，此条例重新修订后出台，仍坚持对社会团体须有业务主管单位的要求，同时，对团体的活动场所、资金来源等硬件要求更加明确。然而，很多 NGO 难以找到可以挂靠的单位，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在工商部门以研究所等名义注册，但这样很难获得社会捐赠和减免税待遇。

一些专家认为，政府之所以对 NGO 管理一直偏严，主要是担心民间活动失控，公益捐赠立法的滞后则与税务、财政等部门担心税收减少有关。有关方面认为，目前 NGO 管理如果放开，确实难免混乱，NGO 本身也存在很多问题：很多 NGO 过多照搬西方的价值观念，过多依赖少数的精英人物，较少利用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前任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主任雷诺舟认为，中国艾滋病防治的当务之急是在政府高层推动的基础上，鼓励个人和企业树立公益文化观念，主动参与公益事业。“中国的艾滋病运动已经进行到了突破瓶颈的阶段。”这个瓶颈就是政府与民间力量的合作。（喻尘，2004）

NGO 是跟随国际机构进入中国的概念，国际社会的介入与援助对中国抗击艾滋的行动所产生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但是一些具体做法也值得商榷。本来，国际组织有着一些非常好的理念，比如：不应将艾滋病只作为医学问题来对待、尊重人权、尊重生命，重视支持底层草根参与等等。但国际组织在中国的官员的机会主义倾向，使他们在实际运作中一步步放弃了本应坚持的立场。目前在中国成立 NGO 还有很多限制。中国现有的经政府批准成立的 NGO，除由党政机关自己举办的，大多为技术的或行业的组织，真正属于公共部门、从事公共服务的数量有限，且多有政府背景。国际组织无视中国国情强调“发挥 NGO 作用”，空洞地不切实际地倡导人权和公众参与，然后就和中国的防疫部门一起玩起了“NGO 游戏”。耗费大量资金做“项目”搞“活动”，而规则模式由外国人设立，不符合既定规则模式的申请得不到资助。其结果是放弃理念，追求形式，几乎一切有独创性的思考和行动都被遏制。至 2004 年中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国外政府及其他机构在中国用于艾滋病防治相关领域的资金投入大约有 30 余亿元人民币，2004 年以后，每年的相关投入应在 10 亿元人民币左右。此前，在中国从来没有任何一种疾病有过如此大量的资金投入，但是绝大部分资金并没有沉入社会基层惠及那些最需要的感染者。中国人，包括中国的高层专家，成了在世界艾滋病防治流水线上的“打工者”。有业内专家指出：在中国的国际组织派驻机构中，负责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官员不懂中国话、不识汉字，无法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交流。而比不懂中国话更严重的是，他们不懂中国事。但他们却处于对中国的艾滋病防治政策法律制定有影响的地位，在一定程度

上把握或是影响着国际社会投向中国防艾资金的使用方向。艾滋病哨点监测无视中国数以亿计跨越千百里流动打工的农民工，却以“长途卡车司机”为流动人口的代表，就是国际机构专家的建议；他们迁就、迎合中国的旧有体制，和中国的防疫部门共同主导了一个“过于狭窄和过于医学化”的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李楯，2009）很多情况下，大笔善款被不负责任地浪费在一些不必要的、低水平的重复上，投入巨大收效甚微。世界各国情况不同，中国需要国际援助需要借鉴国外的经验，但中国必须有自己的真正适用于中国国情的艾滋病防治的积极策略。

## 七 政府行动

### 来自上层的声音与政策思路

要切实解决好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基层领导干部的认识问题，进一步打开防治工作局面。要认真落实“四免一关怀”政策，切实加强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的救治、关怀。

——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电视电话会上的讲话（20051128）

从1985年中国第一例艾滋病病人出现，中国针对艾滋病问题的公共政策思路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把艾滋病拒于国门之外；第二个阶段始于1989年发现云南一个因吸毒而传播艾滋病的村落，应对策略是由公安部门主导严厉禁毒、禁娼；第三个阶段始于1995年前后，卫生部发现全国23个省因卖血传播艾滋病，国家制订了《献血法》、《血站管理规则》等，从此将艾滋病的预防与控制作为关系到民族兴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战略问题。在中国，艾滋病预防控制工作，若没有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将很难取得成效。中国政府总结出的艾滋病防治原则是：“预防为主，宣传教育为主，防治结合，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并出台一系列应对措施和政策。

1986年，国家卫生部成立了艾滋病预防工作小组。

1988年，颁布《艾滋病检测管理的若干规定》。

1990年，成立国家预防和控制艾滋病专家委员会。

1994年，中国政府在全球艾滋病防治政府首脑会议的《巴黎宣言》签字。

1995年，下发《关于加强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工作的意见》。

1996年，建立“国务院防治艾滋病性病协调会议制度”。

1997年，出台《关于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管理的意见》、《传染病防治法》、《献血法》、《预防艾滋病性病宣传教育原则》等规章法令。

1998年，出台《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2010年）》。

2000年，出台《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1—2005年）》。

2001年，中国政府在联合国艾滋病特别大会上承诺，中国艾滋病防治经费由原来的每年1500万人民币增加到1亿元人民币，提高了近7倍。《华尔街日报》评论说，1亿元人民币离开实际需要还很遥远。但是，对于一个长期漠视人民生命的国家来说，中央政府提供1亿元人民币还是显示了某种积极变化。当年11月13日，中国第一届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会的召开。但是，会议要求所有“来稿须经单位审查同意并加盖单位公章，若有大量血源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文稿请作者加盖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公章。”这意味着血液传播艾滋病，在中国仍属“敏感问题”。

2002年，国家在疫情严重的地区建立100个县级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从2002年起至2004年，每年投入2200万元用于河南上蔡县等地的艾滋病病人救治工作。

2003年，卫生部副部长高强在联合国艾滋病特殊会议上向世界作出“中国四免一关怀”的政策承诺，当年组织生产抗病毒药物5000份用于河南、安徽等重点地区艾滋病病人的救治。12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前往北京地坛医院看望艾滋病病人并与艾滋病病人握手，外电对此高度评价：“中国握别了一个艾滋病暧昧和被动的时代。”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前往文楼村探望艾滋病病人，并会见了高耀洁，有媒体评论：吴仪对高耀洁的信任是一个信号的传递，是“政治腐蚀科学精神”的结束。

2004年5月新华社授权发布《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11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卫生部关于艾滋病防治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上批示，要求坚决遏制艾滋病的流行和蔓延。1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前往北京佑安医院看望艾滋病患者。

2005年2月7日至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一行察看上蔡县艾滋病防治工作，并与艾滋病病人共度春节。随后，河南省加强疫情高发地区乡、村两级卫生院(室)建设，提高县级综合医院传染科救治能力，建立艾滋病医疗救治数据库和报告系统，建立艾滋病医疗救治质量控制和疗效评价体系。

吴仪2005年11月28日在《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电视电话会》上的讲话，传达出来自中国政府上层的声音，同时也反映出，在中国一级级科层制体制中，国家各项艾滋病政策策略在贯彻实施的过程中存在相当的阻力。

2006年2月12日，国务院颁布《艾滋病防治条例》。

### **河南省政府部门：困境中的“标本”**

中国对艾滋病的应对政策长时间受到“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影响。在相当

长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对于地方当局，还是民间百姓来说，艾滋病都不单纯是一种疾病，而是一个暧昧和不光彩的字眼。地方当局认为承认艾滋病事实就是给政府抹黑，而普通民众则将艾滋病与不良道德品行混为一谈。在中外媒体对河南艾滋病作出各种各样报道长达两年之后，为了澄清某些事实，2001年11月下旬，河南省政府部门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主要被访人是时任河南省卫生厅副厅长刘学周。<sup>①</sup>文章写道，从对媒体的回避到发出自己的声音，河南省走过的是一段异常沉重而痛苦的心路历程。刘学周说：“我们愿意做一个标本。只要对国家和人民有好处。”

**焦点与压力** 2001年8月23日，中国政府公布，中国存在着经血液传播艾滋病的事实。河南省的文楼村作为这种传播艾滋病类型的代表，无可回避地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11月17日，《参考消息》转载了外电的报道，文章中公开指责，对于河南省艾滋病的发生和流行，河南卫生部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感到了极大的压力，”河南一位官员说，“河南卫生部门的肩上，可以听到肩膀咯吱咯吱响的声音。”

河南省卫生厅副厅长刘学州，是河南省具体负责艾滋病工作的官员。一年来他和他的下属，以及政府高级官员经常进出于疫区的各个村庄。他本人已经到艾滋病高发村14次。“文楼的广为人知，使中国对艾滋病防治的步伐比原来更快些，也促使河南更急迫地投入这场战争中。”刘学周说。

负责全省艾滋病疫情控制和预防日常工作的疾病控制处的马士文说，“文楼”这个名字的广泛传播也改变了河南许多人的生活轨道，使河南的形象雪上加霜。河南省卫生厅提供的关于本省艾滋病的最新数据是：河南目前估计的高危人群有200万人左右，2001年的调查发现，感染艾滋病的比例已经达到了40/万人；至2001年9月底，全省累计发现并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495例，其中发病236例，死亡106例；文楼村(含6个自然村)共有村民3170人，参加过卖血的人数有1310人，现在已被确认感染艾滋病病毒者241人。

然而，外界对河南省官方提供的艾滋病疫情数据并不充分相信。一些艾滋病专家认为，河南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可能有10万人甚至更多。

河南省卫生厅副厅长刘学州说：“我们不敢隐瞒、也没有理由隐瞒一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因为这是犯罪。我们正在力争全面掌握疫情，发现一例，上报一例。作为主要负责艾滋病工作的长官，我要对自己的使命和荣誉、对河南的历史负责。”刘学州说，经过河南省专家的7次流调、3次普查，河南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实际人数应在1万到3万人。他向记者

---

<sup>①</sup> 刘学周，1974届河南医学院工农兵学员，1977年毕业后分配到家乡郾城县孟庙卫校教书，2年后调郾城县医院；当时要求领导班子知识化，内行当领导，刘学周被提拔为副院长，院长退休后接任院长；然后升任郾城县卫生局长、漯河市卫生局长；2000年调任省卫生厅副厅长，分管防疫。

勾画了艾滋病在河南分布的基本轮廓：河南共有 18 个市，艾滋病群体主要集中在有偿献血者十分集中的豫东南驻马店、周口、开封、商丘、信阳等 5 个市，具体又集中在这些地市部分村庄，文楼，即是这样的代表村庄。而在豫西、豫北的广大范围内，则很少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有些地区没有一个。刘学州说，有人说当年河南的有偿献血人员有 100 万，我们在全省范围内对有偿献血人员进行了普查，人数是 161651 人。他强调，河南政府的这个数字是严肃的，每个村的调查数字都要有村干部的签字。

河南省的一位政府官员认为，由于许多农民不愿意去检查艾滋病，因此政府掌握的数字和实际情况不能完全相符。

**多做和少说** 刘学州说，河南坚持一个观点：多做，少说。自从文楼艾滋病被公众所知后，河南已经采取了许多切实的做法。一年来，在河南省政府档案局可查的关于艾滋病工作的很多记录：

今年（2001），当中国艾滋病 5 年行动计划颁布之后，直到目前，河南是全国各省第一家制定实施意见的省。

10 月下旬，卫生系统“一票否决”的艾滋病常识考试在全省展开，如果考试不通过，职称评定和晋升就没有希望的工作已经进行。

河南拿出 1400 万元的投入，建设五个市的防疫机构和医疗机构、村卫生所救助病人，国家卫生部也认可这是全国拿出资金最多、最有力度的省份。

河南要求公安部门负责对强制作性病检查治疗的卖淫嫖娼人员进行组织管理；在艾滋病感染者比较集中的地区，对申请结婚的男女婚前的健康检查，必须进行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

民政部门对因患艾滋病死亡者，造成家庭成员成为孤老或孤儿的，对孤老实行“五保”，对孤儿实行“六保”，对家庭主要成员因患艾滋病丧失劳动力、被抚养人和被赡养人无生活来源的，进行“五保”。

河南省首次发现本省的艾滋病病例，是在 1995 年的 3 月 8 日。在河南发现艾滋病之后的第二天，1995 年 3 月 9 日，河南省政府转发了卫生部关于加强血液管理的紧急通知，加强采供血机构的整顿。

1995 年 3 月 31 日，河南省政府发布命令，要求全省关闭所有的单采浆业务。

1995 年 5 月 3 日，省政府批转卫生厅关于迅速控制艾滋病的紧急报告。

1996 年，在河南私下采集血液、血液市场取得良好的整顿和控制之后，卫生厅和公安厅联合发文，严厉打击非法采集、倒买倒卖人体血浆的犯罪行为。当时河南的力度之大是令人惊讶的，因为血站的复杂成分，他们甚至没有动用公安力量，而是协调调动了武警部队。



1995 年上半年，一次在有偿献血者中悄悄进行的血液检测，发现病毒阳性。为慎重起见，这些血样被河南送往北京复检，仅有约 20 份血样被认定误检。

**沉默与期待** 然而，1999 年文楼村艾滋病疫情被媒体披露以前，绝大部分河南人并不知道本省艾滋病疫情严重，甚至不知道河南会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河南省有关政府部门对此一直采取了沉默的态度。

“这里的原因是复杂的，”河南省防疫部门的一位官员说，“首先 1999 年以前省级部门发布疫情需要卫生部授权，而河南没有被授予这种权力，其次，河南当时并不是惟一发现存在经血液传播艾滋病情况的省份，别的省不声张，我们能吗？”

考虑疫情声张后可能带来的压力和难以找到完善的解决办法，多年来，河南省政府不得不面对来自各方的指责——河南的说法是“没有对艾滋病的疫情遮遮掩掩，而是在期待权威部门的声音和政策。”

“说实话，我为那些村庄哭过，”刘学州说，“但我们只能埋头干活。”

在对艾滋病存在的事实保持沉默的状态下，艾滋病病毒在不知不觉中传播，形成了河南艾滋病肆虐蔓延的现实。

**困境中的“标本”** “经媒体曝光后，文楼，已在中国和世界成为艾滋病疫区的标本，也因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刘学州说。

2001 年夏天，上蔡县组织大批劳工，到边疆某省份采摘棉花，但是当地发现是上蔡县的劳工时，立即采取了极端而激烈的反应：不要。上蔡的县委县政府主要官员急了，这可是农民花着对他们来讲是巨额费用的车费去挣钱的啊！他们立即奔赴边疆，说服，解释，企图让民工能够得到宽容的对待。文楼村的村民，已经成为不受欢迎的人。随着文楼村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文楼村在外打工的数百名村民，几乎都被雇佣者赶出门，回到了他们的故里。上蔡县的官员在外出公务的时候，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解释他们目前的现状和实际环境，不得不面临其他人对他们的白眼和距离。

“我们的经济正在走下坡路。”当地的官员说。艾滋病带给上蔡的损失是可见的。在今年夏天，一个谣传从这里开始弥漫全省，“注射过病毒的西瓜”的说法，人为地制造着经济的损失。卖不出去的还不仅仅是西瓜，在一个时期，主要种菜为生的文楼，蔬菜似乎也得了艾滋病。“艾滋病的标签贴在了身上，贴在文楼、上蔡甚至驻马店市有关联的东西的身上。我们无法揭下来了。”不止一个官员忧虑地认为。

上蔡县的政府官员说，县里已经竭尽所能对文楼给予了关怀，县政府对艾滋病家庭的孩子，减免了所有应该缴纳的学杂费，减免统筹、提留 9 万元，免义务工 18000 个。而在这个



国家级贫困县里，老师和公务员的工资还不能完全按时发放。目前，这个国家级的贫困县，投入到防治艾滋病力量，已经占据了整个县正常工作的一半以上。防治艾滋病，已经成为这个县的中心工作。

“我们透支着我们的精力和财力。我们希望得到道义的和财物的支持。”上蔡县的政府官员呼吁。上蔡县的主要领导曾到国家的一些部委求助，到一些机构(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等)游说，企图寻求资金的援助。但是除了得到同情，无法替他们解决一分钱。一些部门说，如果是自然灾害还可以考虑，但艾滋病是一种病。

成为关注焦点的文楼，更让政府头疼的问题是，村民们开始有些焦躁，他们总是认为政府做得不够，一些人开始和政府讨价还价。

截至(2001)10月31日的最新数据，文楼村已经死亡的艾滋病人达37人。“文楼的将来和现在，可能是一个永远伤感的话题。但是我们目前的确有这样的困境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位官员说。

河南的高级官员说：河南，现在有勇气面对艾滋病对我们的攻击；我们也需要勇气，来承担艾滋病防治史中我们应该履行的那份责任和义务。河南和全国人民需要的是共同的东西，尽管有人认为，河南的艾滋病应该是过去的旧账，要清理。但是我们呼吁其他地方政府：和国家一起，正视艾滋病，把全社会的目光注视到像文楼村这样需要帮助和抚慰的艾滋病群体中，踏踏实实地为了他们的生存和将来考虑。

刘学州说：我是负责目前河南艾滋病防治的行政官员，我不能替那些人得艾滋病，但是我无愧于我目前从事的工作。艾滋病带给河南的副作用将会持续，我们希望和关注艾滋病的人们一起，弥合艾滋病人心灵的创伤，给河南和其他地区弥补过失、遏止悲剧的机会。

刘学州说，“我们愿意做一个标本。只要对国家和人民有好处。”(参考江华《河南政府部门：我们愿意做艾滋病防治的一个标本》《南方周末》20011130)

2000年，文楼村艾滋病疫情经国内外媒体报道之后，河南省艾滋病疫情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自2000年起的3年间，河南省迅速关闭了全部单采血浆站，与此同时，投入1.6亿元专项经费加强血站规范化建设，大力推行无偿献血制度，有效切断艾滋病经血液传播途径。2003年，河南共安排3958万元救治救助艾滋病人，为4352名病人提供了免费抗病毒治疗；投入3000多万元，为疫情高发村修路、打井，建卫生室、学校和孤老院。6月，在河南省卫生厅的建议下，河南省政府建立了“河南省人民政府防治艾滋病性病协调会议制度”，对下设的30多个成员单位在预防控制艾滋病性病方面的工作职责作了明确分工。2004年，为加强艾滋病防治帮扶工作的力度，河南省委省政府由组织部牵头，开展大规模艾滋病

防治帮扶行动。

### 第三章 银庄故事继续

现在，让我们从“大的时空背景中”回到我们小小的银庄村。

第一章记述的主要是艾滋病疫情中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银庄故事的过去时，本章则是那些故事的继续，是银庄故事的现在时，其中许多故事是研究者亲历。

#### 一 村庄的行政

河南是全国人口大省，K市是全省人口大市，因此K市说：“全国稳定在河南，河南稳定在K市。”Q县是K地疫情最严重的县，B镇是Q县疫情最严重的镇，银庄是B镇疫情最严重的行政村。疫情爆发以来，艾滋病一度成为一切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各级领导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因此，当地还有说法：“K市稳定看Q县，Q县稳定看B镇，B镇稳定看银庄。”疫情非常时期，银庄行政一直受到县、市领导格外关注，乡镇政权直接插手村庄事务，公安、卫生部门在村庄行政中发生着重要的作用。期间在银庄村的行政中发生特殊重要作用的，还有驻村工作队。

#### 三任村支书

在中国，行政村是国家科层制中最末端的一级行政单位。行政村的领导班子由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组成，简称“两委”。银庄的政权结构很单纯，说是“两委班子”，实际上是党支部书记说了算，也就是“一个人的政权”，在某种程度上“村班子”就是村支书。但单纯并不意味着简单。银庄行政村最近的三任村支书都出自栗庄，栗庄在银庄4个自然村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三任村支书都与艾滋病事件紧紧纠葛在一起。

**被“劬”下台的村支书（1983-1997）** 栗可领，1970年代参军入党。复员后1983年至1997年担任行政村党支书近15年。周边村庄的人都知道，当年银庄村支书是“血头”，他把血站开在自己家里。2005年春节期间，我走访了这位以前的村支书。他说——

我当时是行政村的村支书，卖血在俺家设了一个点。因为为什么要设这个点呢？这个村的群众穷，不卖血生活维持不了。为什么血站要设在咱们家里？因为那时我们村卖血要到开封、郑州，到周口市、项城、郸城等外地血站。群众卖血坐车跑到外边血站，检查合格的可以卖血，不合格的就要打回来卖不成血，白搭上路费就亏本了。在咱家里检查，不合格的，就不白跑了，所以群众都迫切要求设个点在咱家。那时Q县有个张如仕县长，号召群众献血光荣，

说献血不损害身体健康，献血是发家致富的门路。咱县里也有血站。所以我当行政村支书的时候，我得听上级的呀，我也认为不损害身体，是发家致富的好门路，胳膊一伸就 50 块钱，拿 5 块钱的本（挂号检测费）能赚 50 块钱。交各项提留、计划生育罚款，群众不焦急了。我那也是响应号召，发展经济……。（录像场记一，第 9、10 本）

在一所破败的院落里，一对老夫妻哭诉——

老婆婆：那时他是支书，罚钱，没有钱，就逼我们卖血呀！他说：“人家都能卖，你们就不能卖吗？”都卖。有的小闺女也去卖。俺孩子死完了，没有了。怎么死的？有病死了。什么病呀？艾滋病。那时候不敢吭啊……

老爷爷：说实话吧，那时俺村里有个栗可领在这办的血站，卖血。死的多了，这里年轻人快死完了，就剩下寡妇女人了……。哪是艾滋病啊，是卖血死哩！……（录像场记二，第 1、2 本）

但是，银庄人“劬”支书下台的直接原因，倒不是因为他开血站，而是他“加码盘剥群众”，“计生罚款、提留款太重。”村民说——

1996 年，那一次收缴提留款，村支书擅自一亩地加收 50 斤麦。村里 6 人到县里问清了底数，状告村支书加码盘剥群众。去县里的 6 个人还没回来，县里电话就已经打到乡里了，说有人来告状了。乡派驻村干部王超立马告诉了当时的村支书栗可领。栗可领在喇叭上喊：小毛孩想告我哩，胆子不小！王超等在村口，见 6 人回来了，开口就骂。全村人围观。老党员老队长栗可贵不愿意了，说：骂人哩，打他（王超）！见全村人的火上来了，栗可领赶紧说好话，把王超放跑了。栗可领是栗庄的，栗庄人先组织起来告状，两个大蓬车装不下。第二天银庄全行政村（4 个自然村）的人都去了，又加两个四轮车，全村人几百口都去了。那天朱镕基来 Q 县了。县委书记刘广全说：赶快安排他们回去！明天处理。栗可领老婆的近门哥在县里任副书记，姓王，说：有哥撑着，他们告不赢。县委书记说：牵扯到谁处理谁！事后才知道，当时朱镕基已经去到李步口了。县里命令乡里：无论啥办法，不能告状！乡书记李申来村里，在 B 镇路上，车被抽（掀）翻到沟里。县里派人在马村，距县城 10 里的地方，截住告状群众，什么条件都答应。派出所出面劝阻，群众又要抽（掀翻）派出所的车。他们赶紧派在乡里当干部上班的本村人回来劝阻，才算没有出大乱子。当时村班子就瘫痪了，一年多没“头儿”。（访谈笔记 20060129）

**坚决辞职的村支书（1999—2003）** 栗可昆当村支书的那几年，正是艾滋病发病最严重的时候。这位前任村支书口碑不错：“群众很拥护他，都愿意让他干，是他自己坚决辞职不干了。”为什么？“太难干了，家里困难，他得给孩子挣学费……。”栗可昆忙于外出打工，

一直到2006年春节期间，我才在他家里见到他。栗可昆自述——

1964年出生，1983年入伍，1985年入党，1986年秋从部队复员。复员后多数时间在外打工，“扛包、装卸、下煤窑、杆炮捻，生活逼的，啥能挣钱干啥。大罪没受过，小苦没少受。”1998年春上，县里派人来村里组织选举村干部，那时我在外打工没在家，被选上了，回来当支书。

上任不久，很快发现艾滋病。这里发生艾滋病比文楼早，那时上蔡人还来这儿卖血哩！最恐惧紧张的时候是1999年，那一年全村32人死亡。几次“闹事”我都知道，“跟庄上人‘一势’，通个气。”最早向上反映情况“造福”村民的几个艾滋病人死了，五营、中才、可运，几个人都不错。他们见过高强，上访也有结果，能给大家要回来钱。当时还说是要修路，图纸都规划了。后来为建学校的事，栗永被抓了，修路的事也不敢问了，也不修了。本来也很想好好干一场，给村里人办些事。写过一份“党员计划项目书”，想发展经济挣钱，搞坑塘改造，建校修路，栽果树办养鸡场。项目书一式三份，发给了卫生部、县委、乡党委。从1999年干到2003年，勉强强干了4年，推了3次，最后一次，坚决辞掉不干了。

为啥？

首先是因为各项征收太重了，对艾滋病人强征，真看不过去。回来当支书第一年（1999年），夏季完成征收任务291899.50元，欠2600元，困难户交不上。当时全村人口2240人，实为2168人，人均100多元，按地平衡每亩征收134.64元。加上秋季，全年收上来32万多元，还差6000元收不齐。第二年差2万元；第三年差6万元；第四年不交了。在任4年共差（少交）公粮款40多万。乡里干部让我带路“突击”挨家挨户收粮款，我不干。我说你们收罢走人了，我离不了这庄。他们说“有你五八，没你四十”（有你没你都行），让计生办“突击”。计生办有人手，都是些赖孩子，恶人。扒房拉人，弄不了的事（不好办的事，棘手的事）就上计生办。公粮、提留、计生罚款，太重了，这是卖血原因。

辞职还有一个原因，家里经济太困难。当村支书每月150元工资，孩子上学交不起书钱。人要有自知之明，当村支书得为村民造福。看着都是病人，不忍心，顾又顾不上，没能力。最后连自己家都顾不住了，只有不干。当年女儿考高中差4分，交不起高价。孩子只要愿上学，我得支持，得挣钱。当村支书之前，我在县城作纸扎社火<sup>①</sup>，生意正好哩，每月平均收入1400元。回村当支书，生意耽误了。我现在“华锋网业”打工，月工资从400元起步，现在升到1200元了。老板是作大生意的，飞机来飞机去，愿意让我长干。他说，我找好伙计不易，你找好老板也不易。叫我“河南大个儿”。

<sup>①</sup> 祭祀用纸人纸马纸屋等。

村里事不想管了，难管。可是又一直操心村里……。（访谈笔记 20060129）

栗可昆常说，“钱短人长”，钱不能看太重，得先做人。他到底放不下村里的事。2006年，栗可昆成立Q县红丝带自救组织，把自己家的房子腾出来开办“希望家园”，收养村里的艾滋孤儿。之后辞去华锋网业的工作，全力从事艾滋救助工作，成为实质意义上的民间草根力量的带头人。

### 工作队推举出“两委”班子（2004——）

由于银庄行政村多年处于无组织、无政府状态，情况复杂，人心涣散，部分群众特别是一些艾滋病患者组织观念差，选举行政村党支部书记比较困难。为此，工作队向镇党委建议，采取非常措施，委派分管组织工作的镇党委副书记张华兼任银庄行政村党支部书记，同时按“两票制”选举产生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把有较强组织能力、热心集体事业、群众支持、为人正派的栗卫华等五人（其中3人为艾滋病患者）选拔组成村“两委”班子，结束了该村3年来工作无人抓的瘫痪局面。

——《省驻Q县银庄村帮扶工作情况汇报》 2004年11月

从栗可昆辞职到工作队进村，其间银庄村又是整整一年不治。2004年工作队进村，首先组建村领导班子。这种情况，银庄并非特例，当时许多艾滋病村庄的领导班子都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工作队进村，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组建村政领导班子。因此艾滋病村庄的村级领导班子与驻村工作队的关系十分密切。当时有一个普遍的说法：留下一支不走的工作队。这“不走的工作队”，就是指在工作队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村政领导班子。

栗卫华是第一任工作队推举出来的银庄村委会主任。2年之后栗卫华被批准入党，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在银庄村民们看来，村主任与党支书没有什么区别。而最初村党支部书记由B镇党委副书记张华兼任。也就是说，当时银庄没有党支部。“村委”成员，除了村主任栗卫华之外，另外3个自然村也就是村民小组各出1人：滩头村组长栗松才、莫庄组长莫昭红、小印庄组长银华德。栗卫华所在的栗庄不再推选组长。银华德还担任村会计。遇上繁忙事务，单靠这4人忙不过来，滩头村的栗新臣、莫庄的一位识字的退休村干部也常常参与。显然，这不是一个健全的领导班子。村委会对工作队依赖很大，全凭工作队协调村里与镇党委政府、派出所、卫生院、民政所等机构的关系；村务中的许多事情就是执行工作队的任务，比如向村民发放救助物资、组织修路等等。

村中长者栗可顶说：当初村委班子基础就没打好。他们推卫华出头来干，是用放出他

兄弟栗永<sup>①</sup>作条件的。卫华干村主任，他们又不敢让组建村委班子。村民要求健全村民委员会，选举村民代表，名字都报上了，兼任银庄村支部书记的镇党委副书记张华对卫华说，选村民代表，还要你村主任干啥哩？他们就怕群众有组织、怕闹事。村室墙上有村民代表名单，那天我走到那，看见还有我的名字哩！我是村民代表，我自己根本都不知道。“是虚哩，挂那叫看哩，应付上头检查。”（田野手记 20051211）

栗卫华是我接触到的最早的银庄人。这是一个很实诚的年轻人，受命于危难之际，上任后工作尽心尽力，很想为村里作些事情。他自己没有卖过血，没有感染艾滋病毒，但是他亲手挖坑打墓抬棺送葬已经埋葬了几十个因艾滋病死去的乡亲——一个时期“打墓埋人”是村委一项重要的村务。他很热心地向我介绍村里情况，带领我走村串户。还给我写过一份“村情材料”，题目叫做《我的家乡银庄》，写在从小学生作文本上撕下的两页纸上。看到那题目，我很感动。看得出，卫华很爱自己的家乡。

栗卫华年轻，第一次担任村干部，没有经验。但是有工作队支持扶持，第一年（2004）工作开展顺利。能为村里办事，卫华很高兴，而且满怀信心。他说，工作队是我的后台，是我们村委会的后台！2005年至2006年，应当是栗卫华上任后最困难的一段时期，曾一度提出辞职。当时推举他上任的第一批工作队回去了，村委班子与新来的第二批工作队关系始终磨合不好。原本没有工作经验的他一下失去了依靠，感到很苦恼。当时村里发生两件大事都很棘手：一是“7.15事件”，一是非法生产烟花爆竹。村民群众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很紧张，卫华作为村主任夹在中间，正处于矛盾的交合点。他说：我不是不想为乡亲们干些事，但是干不了。不怕掏力，不怕吃亏，就是干不了。比方说，作炮是违法哩，派出所随时可以抓人、罚款、拘留。过去A处（第一任工作队队长）在这时候他们不敢。现在他们到村里抓人从来不给村委打招呼。村民遇到这事只有找我去说情。但我与派出所长不会沟通，说不下情，面子还不如某些普通村民。我最初接这个村委会主任时，有工作队支持我心里踏实。现在B处（第二任工作队队长）不像原先A处，能替我撑住，协调各种关系。现在办不成事，在村民面前就没有面子，没有威信，工作不好作。

卫华还跟我说，当初杨县长说：你能在这个关键时期站出来，真是不容易！“我当时有领导这句话，感觉很值！不管怎么着，我觉得值，领导能看得起我，器重我，感觉值。”后来我见到这位负责文卫工作的杨县长，说到栗卫华这番话，她一脸茫然。她不记得这件事，更不知道她说过的这一句话对一个年轻农民的影响和作用。

---

<sup>①</sup> 当时情况，村中无人愿意出头当村官，栗永因“建校事件”被抓，以放出兄弟作为栗卫华出任村主任的条件。

对于这位年轻的村官，成长的道路还很长。

### 三任驻村工作队

按照河南省委、省政府的部署，2月18日，向全省38个重点村派驻工作队。各驻村工作队由同一系统的省、市、县机关派员组成。一般是省里两名干部，其中一名处长或处长级以上干部担任队长，另一名队员，再配备一名省医院的医生随队。市、县各派一名干部。

#### 第一任工作队

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帮扶工作队认真落实省委“落实六个机制，突出两个重点，搞好两个加强，实现一个目标”的要求，紧密结合该村实际，制定了“以强力推进‘六个一’工程建设为契机，从维护稳定入手，围绕改善疫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促进经济发展这个中心，整体推进各项帮扶工作”的总体工作思路，积极开展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理解和支持，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充分肯定。（《省驻Q县银庄村帮扶工作情况汇报》200411）

2004年冬季，快过年的时候，我来到B镇。到达的第一天，便与驻村工作队员们聊了好久，他们都有很多感受。疫区的环境是艰苦的。他们说，工作队第一天进村的感觉就象进入白区。当时下着雨，地下都是泥水，全村艾滋病人出动，二三十人包围一人，靠近你身边，口水乱飞，都喷到你身上。工作队进村，开始是下车步行。看到这种情况，镇党委书记说赶紧上车，住到乡里！一百多艾滋病人也立即赶到乡里，要求见工作队，要选派代表谈判。十几人围上来乱问，口气带着明显的敌意、挑衅和不信任……。整整乱了一上午。这是多年的积怨。现在情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群众情绪基本稳定了……。看得出来，河南艾滋病疫区一年的驻村工作，给工作队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如年轻的工作队长在工作总结中所写的：“这一年在我的人生之中是最难以忘怀的一年，也是承受巨大压力、面临严峻挑战的一年。”（《银村驻村工作队队长个人总结》200412）

银庄驻村工作队住在B镇税务所。开始工作队自己开伙，唯一一位女工作队员姜大姐负责为大家做饭。中原农村的冬季是寒冷的，院子里的水管裹着厚厚一层枯草，水龙头还是上冻了。工作队员们只好到镇政府食堂搭伙。

那天一早到镇食堂用餐。早饭有稀饭、馒头、大白菜炒豆腐，还有咸菜和豆腐乳。陆续来吃饭的都是工作队员，没有镇干部。人们呵着手进来，都是先捧起热乎乎的稀饭碗吸溜几口，连声说好喝好喝。伙房做饭的小李就说：“熬稀饭的水好，帮了银庄艾滋病的光。”由于上游几家造纸厂味精厂，当地水资源污染严重。自从银庄打了深水井用上自来水，镇政府食堂就到银庄拉水做饭。

早饭后请求队长带我进村。他略一沉吟：只要你不害怕。队长人很年轻干练，办事很沉稳很周到。他说一般不要求工作队员们进村，“我要求不高，把该做的能做的做好，把大家平平安安带来，再平平安安带回去，就是完成了任务。”他自己倒是时常进村，像这次一样，只带着小林。小林是县派工作队员，当地人，熟悉情况了解本地风俗习惯语言也通，“遇上情况还可以保护你。”队长说。我问会有什么情况呢？队长说那难说。

踏雪步行在通往银庄的乡村公路上，路边杨树的叶子早已落光，寒风中摇晃着光秃秃的枝桠。道路两边的麦田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白雪，延绵着凸显出一座座坟茔，白雪覆盖不住的地方露出点点碧绿。一路上赶集的村民跟队长打着招呼，都很亲热。“刚遇上的5人中4人是艾滋病。那个高个儿，前一段发病，眼看快不行了，服用了抗病毒药，又过来劲了，看着跟好人一样了。”“那骑摩托车的是建学校领头闹事的人，被抓起来过，现在关系都不错……。”队长一路走一路跟我介绍，可以看出来，工作队跟村民相处不错关系融洽。刚刚下过一场大雪，空气清新，大地晴朗，大家心情很好。

银庄距B镇不远，大约一二里之遥，出镇东行，然后南拐。一条新修的柏油路，南北横卧连接着乡村公路和银庄。道路两边栽种整齐的小柏树塔立着，很像列队的哨兵。这是“六个一工程”新修的道路，笔直进村，然后蜿蜒贯通下属的4个自然村。（照片33）

来到村委会，一所围墙圈起来的两层楼房，上下十几间，也是“六个一工程”之一。（照片34）其中最大的一间摆放着课桌，还有一台远程计算机，都是捐赠的。

村主任已经等在这里，由他带着我们走村串户，“户家都养有狗”，队长说。村街上没有什么人，大都房门紧闭。一些大门洞开的房屋显然无人居住。一处落锁空宅倒是新房，院门旁的墙上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太（泰）山石敢挡。“这些家都没人了。”村主任说。队长阻止了村主任去敲旁边一户关着的大门，说尽量不惊动村民，随意走走看看。

这一户新修的门楼，还没有装大门。队长说，就这一家，进去看看。村主任走在前面喝住吠叫的狗，一边问谁在家哩？上级领导来看你们了！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婆婆从屋里迎出来，很亲热地说：赶快进屋，这么冷的天！又跟队长说：媳妇有事出去了不在家，孩儿们上学去了。进屋，屋里地面比院里凹进去好多，比外面暖和不了多少。这是一个三代六口之家：奶奶、妈妈、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儿子是最小的，7岁。爸爸不在了，死于艾滋病。奶奶80岁了，看上去还硬朗。她还有三个出嫁的女儿，全都死于艾滋病，她的儿女们没有一个逃脱这场灾难。好在儿媳妇孝顺能干，虽然“也带病毒”——当年夫妻俩都卖血，这个家现在全凭她“顶梁”。孙子女都听话懂事。大孙女初中毕业打工去了，今年十七岁，走那年才十四。三个小的上学。——队长对这家情况很了解，向我做着介绍。三间屋都不大，冲门一间一张



床一张小桌，墙上贴满了三好学生奖状。东西两间各一张床，就几乎占满整个房间，西屋窗下一台缝纫机。平素奶奶睡外间，现在和孙子、媳妇睡西屋，“挤着暖和。”东屋门上写着“宿舍”两个字，是女孩儿们住的房间，屋里墙上贴着过期挂历上的明星照片、女孩子手工制作的纸花、布艺图案，上面有手写的字：“生命重于泰山”、“随缘”，使人沉重中不由慨叹生之顽强之美丽。临走，队长嘱咐婆婆：叫你媳妇赶紧请人把院门安上，快过年了，注意安全。婆婆连声应了，又对我说，工作队没少操俺哩心！脸上流露着真心实意的感激。

这是一处颇显荒凉的院落，隔着半截土坯的院墙可以看到一个老太太坐在当院插炮捻。村主任说，这一户就剩她一个老奶奶带着几个孙子过。她丈夫不在了，俩儿去年又都殇了，相隔不到两个月。媳妇殇一个走一个。“她脑子受刺激了，人不太‘清气’（头脑不清醒）。”走进院子，只见一辆没有车轮的大蓬车框，说是当年卖血的儿子留下的遗物，现在谁也不许动，“留给孙子哩。”老人的身后是3间低矮的房屋。我埋头走进去，好一会才适应屋里的光线，当门一间胡乱码放着鞭炮，西边里间一张床，东边里间关养着几只小鸡。“三个孙子姥家去了……”老人说，一直不安地望着队长。队长说，小心点，不要做了。声音不大，但透着威严。老人赶忙应道：“不做啦，不做啦，年前就毛（剩下）恁些啦……，过年给孩儿们交书本费……”一个一直尾随我们的村童，这时大概以为自己看明白了，突然跑开去，口里喊道：“查炮哩！”

工作队队长面色严峻走出院落。一个女人等在路边，一条黑红相间的围巾把头包裹得很严，走到跟前才看清楚，她的脸红赤赤地烂着，嘴唇很厚地翻肿着，样子很可怕。“到家看看吧，床上躺着哩……。”她嘟囔着说。队长不看她也不作声，就那样神色严峻地径直往前走。女人跟了一段，折回去了。艾滋病？我问小林。小林说：是的，不过那脸上是做炮炸伤的。“她两口都是艾滋病，男的发病躺好长时候了，前儿做炮爆炸又伤一伙，快不中了……”村主任补充道。走在旁边的队长一声不响，脸色愈加凝重严峻。

似乎没有发生进村之前队长担心的“情况”。但是“遇上的情况”，村庄的情境令人感到压抑难过。大家心情变得沉重起来，回程的路上没有了来时的清朗明亮。

小林说：快过年了，村里不少人家作炮（鞭炮）。这也是队长不让大家下村的原因。明知生产炮竹不允许，可这是他们挣钱的一个门路……。见了管是不管？出了问题谁负责？工作队来后，村里硬件明显变化，软件，村民心态，生活的信心变好了一些，但是缺少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无能为力。“那一家的女孩子们那么爱美，那么穷那么困难，那么多人挤住在那么狭小破旧的房子里，墙上贴着布艺。屋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也要先把门楼盖起来，撑起门面不让别人轻视，有志气……”我说。我想使话题轻松一点，打破这沉重。“那一家

的门楼是我让她们建的，家里没个男人不安全。”一直沉默着的队长冷冷地打断了我。他的话击碎了我诗意的理解，把我拉回残酷的现实。我顿时感到自己的浅薄虚饰，感到羞愧。工作队队长继续说，“她也常找工作队要钱，一个女人也不容易，上有老下有小，几个孩子上学。我说情让村里把计划生育罚收她家的缝纫机修好后还给她了，她会作劳保手套挣点钱，自谋生路也少找我们一点。”

实事求是地讲，第一批银庄工作队不负使命。工作队驻村一年，艾滋病村庄情况前后发生很大变化，银庄工作队《帮扶工作情况汇报》中写道：“目前，投资 8 万元的标准化村卫生室共计 8 间，使用面积 210 平方米。投资 65 万元的入村公路，四纵二横共计六条，路基宽 4.5 米，路面宽 3.5 米，总长 5.5 公里。投资 95.8 万元的供水工程，打 380 米深水井一眼，无塔供水器一套，供水农户 698 户，管网铺设 31090 米。投资 100 万元的阳光家园，共建两层楼房 53 间，建筑面积 1550 平方米，成为全省仅有的三个投入使用的之一。投资 25 万元的村学校，砖瓦结构 26 间，建筑面积 585 平方米。投入 21 万元修建的村党员村民教育活动室两层楼房 13 间，287 平方米，院墙、地坪、图书、报刊及各种配套设施齐全，银庄村的村容村貌也为之焕然一新。”工作队为群众办了实事好事，成效显著。最重要的，是改善了与群众的关系，缓和了社会矛盾和冲突。

春节即将到来的时候，市委组织部受省委组织部委派，前来对省派工作队员进行考核测评，当地群众代表要当场填写考评组带来的测评表。考评会上工作队对一年的工作作了汇报，村镇领导和村民代表、艾滋病人代表都对工作队一年的工作表示感谢。市委考评组对银庄的驻村工作很满意，考评结果为优秀。该市有 4 县 5 村派驻了工作队，全部考核工作要在春节之前完成，银庄考核一结束，市委考评组便匆匆赶往另外 4 个工作队。在疫情高发区坚守了一年的银庄驻村工作队胜利完成了任务。两天之后，他们凯旋而归。（田野手记 20051122）

**第二任工作队** 第二任工作队与村民的关系似乎不太和谐。村民们常常把他们与第一任工作队进行比较。他们说，那时候 A 处长常常下村里来，见人说话和气，到村里去给人打个招呼，村民就知足了。现在的 B 处长，从来不下村，他不认识村民，村民也不认识他。村干部也说，“这一任工作队不支持我们，跟我们不一势。”那时候烟花爆竹已经成为最耗费精力的事，派出所抓人罚钱，警民关系严重对立（详见本章之九）。几个村干部跟 B 处反映这情况，希望他做做工作调解和派出所的关系，他们说：“我们是工作队推举出来干事的，当时 A 处在时，能协调好关系，工作开展顺利，现在关系紧张，工作没法做。”这话让 B 处很烦，说：“你们跟人家相处不好，人家给你不留情，我也没办法，谁知道你们咋相处哩！”

其实 B 处长们也为村里办了一些实事，比如逢年过节发放慰问食品，救助特困户等等。

只是做事的方式与态度不同。那年春节工作队为村民们发棉被，几名工作队员大呼小叫只动口不动手，很威风地监督着村干部们装车卸车，只听他们喊说：少一条你们负责！几个村干部被他们吆来喝去直忙到半夜。结果被子分到最后还是少了，因为统计人数出了差错。村主任说，被子共 3199 条，按人头每人一条，村里 2000 多人，还多出来几百条。村里登记人数少了 29 人，因为户口不清，有的新生人口不知道，没有登记上，也许还有抄漏的，孙某（工作队员）输入电脑漏掉的。我说对对名单，孙某气势汹汹说，还想检查我吗？！没有领到被子的村民坐我家里等领被子，我找工作队补发，说半天，只补 17 条。我说一条也不要了，你们看事办吧！最后算是补给 25 条，还差 4 条，叫我和松才（另一位村干部）各出 2 条。我同意了，三两条被子赔得起，无非我们一家少领 2 条，太多了赔不起，总不能再去买被子赔他吧？问：多出那么些被子哪里去了？答：他们送人情了。

有知情者说，A 处在的时候，派出所听工作队的，“工作队在党委的领导下独立工作。”A 处说话很有水平，话不多，但很在理。他协调关系，村里工作就好作些。而 B 处完全依赖派出所，听任摆布，派出所长把他天天灌得晕晕乎乎的。他们与村民严重对立，完全站在乡镇政府一边。村民不信任他们，没法开展工作。工作队的门被群众砸两次，艾滋病人找工作队反映情况，他们不见。

**第三任工作队** 2006 年，派驻银庄的工作队已是第三批。“十一”国庆节前夕，工作队放假回到省城。我电话联系工作队队长 C 处长，约请他做一次访谈。他很热情，说工作队一起见个面吧，我请你吃饭！于是约定晚间聚会。我来到约定地点时，他们正在兴致勃勃地欣赏驻村工作时拍摄的一些照片。工作队在村里搞“双节（中秋节、国庆节）慰问”，发放大米、食油、月饼，拍了不少照片。照片中多数人我是认识的，于是互相说起他们的情况。入席后才做正式介绍，第三批工作队，除了队长 C 处长，还有队员老孙、乔大夫，司机小李。大家边吃边聊。

C 处长高大魁梧，看上去很豪爽，很热情地跟我谈他驻村之后的工作和感受。他说，他出身农家，深知农民的艰辛不易，他的家乡在兰考县，很穷。“想不到银庄比兰考还穷！”他说在任期间他一定竭尽全力为乡亲们办好事办实事。现在重新统计摸底，全村现存艾滋病人 248 名<sup>①</sup>，又出现了 7 户在卫生院统计数目之外的，感染原因不清，这次也都按艾滋病家庭对待发了救助物品。计划做的几件事是：办艾滋病家庭低保，争取每个家庭成员每月补贴 20 元，现在只是艾滋病人才有补贴；监督落实艾滋病医药费政策的落实，上级政策规定艾滋病人每人每月 390 元医药费，其中 90 元管理费，治疗本上每人每月用 150 元，另外 150

<sup>①</sup> 比我入户问卷调查统计的数字 217 人还要多。可能是增加了后来的“迁入户”，见本章之三村庄的变迁。

统筹费用在哪里了？“要查实，不能都建卫生局大楼了”；争取资金修村庄内的 4 条路。C 处说，工作队进村时县里没有人出面，是镇上书记接的。而其他县不同，都是县领导亲自出马欢迎，“Q 县是最差劲的！”老孙爱好书法文艺，说，他的任务是搞文化建设，计划在村里建立文艺队活跃村民生活，建立村民组织自查安全生产，开展十星级文明户活动。乔大夫不大说话，跟他聊起村里疫情，老孙替他说：“他的任务是对我们 2 人（省派工作队员）健康负责，不是一线医生不负责艾滋病治疗。”这时我才知道，原来工作队医生只是为省工作队员服务，并不是为了疫区艾滋病患。乔大夫说，国家对艾滋病防治很重视，拨款 3 个亿在河南中医院设点搞中医治疗艾滋病项目，派精兵强将参加，以往驻村队员优先，“因为没有恐惧心理了。”司机小李是太康县人，省内公布的第一例艾滋病患就是太康县的。他说，“那里更穷。”（田野手记 20060929）

及至村里再见面，果然在修路。我很高兴地跟 C 处长们打招呼，C 处的态度却客气而冷淡。他说：我很想接待你，但是你的研究省里不批准，市里不欢迎，我们不参与，请刘老师理解。这是第一次有人这样明确地直截了当地对我表明态度。尽管我早已感觉到省里市里对我的研究“不欢迎”，现在这么被人点明，还是有些惊讶。我没有说我的研究是经国家批准立项不需要省里“批准”，也没有问他的“接待”和“不参与”是什么意思。只是说，我能理解。卫华们不止一次跟我说，C 处长说刘老师是好人，但是他不能接待你。

C 处很注意群众关系，常到村里走动与艾滋病病人说话打招呼，使一向遭冷遇歧视的村里人很感动。C 处也确实为村里办了不少实事：逢年过节发放米面食品、冬季发棉衣、夏季发水杯、秋季召开运动会，特别是，为村里修路。C 处说：“我为大家办实事不是一定要你们给我立块碑送块匾，上级来问，你们可不能说不认识我了！”路修好后，村里果然在路边立了一块碑铭记工作队的功德。（照片 36）

### **大家族与村中长老**

家族力量对银庄行政的影响十分明显。在任命或者选举村干部时候，无论上级领导或是基层群众都认为，首要条件是“门里人多势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压得住阵。村民说，俺这里讲“门头风”，遇事比拳头，谁家弟兄多谁赢，不管你是村干部还是“光棍眼子”。还有一条“潜规则”，就是镇领导和村民都尊重村中老人意见，这些老人包括村里老党员老干部和辈分高有见识的年长者。他们德高望重，常常以“村民代表”角色出现，参与村庄事务，村里许多矛盾依靠他们在矛盾双方或者官方民间之间协调斡旋做工作。

人民公社早期，银庄的主要领导大队党支部书记在小印庄。小印庄读书人多，有文化，经济状况也比较好。那时候，栗庄的栗可栋担任副支书。栗可栋的父辈弟兄三人，他的父亲

是老大。1980年代，老三的大儿子栗可领复员回乡，先担任民兵营长，不久接堂兄栗可栋的班，担任大队副支书。栗可栋说，栗可领是我推举的。一般情况下，村班子换任，上级一定会听取前任的意见，这在当地也是一条约定俗成的“潜规则”，“否则前任不下台。”不久，栗可领又取代了小印庄党支部书记的位置。有人说他买通了公社书记的“路子”，而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他有弟兄六个，是全村最大的“门头”。栗可领在位15年，一度干得热火朝天，领导银庄大队成为全县有名的先进大队。

栗可领被“劬”下台后，上下一致推举出来的栗可昆，固然因为他的个人品格优良深得村民拥戴，而人们更看重的还有，是他有弟兄四人，而且都很有出息，在村里都是有脸面的人：大哥当兵复员后在城里企业当过国家职工；二哥是小学校长；三哥在县城做生意，还是种庄稼一把好手；栗可昆本人当过兵，而且在特务连——这些条件，足以支撑栗可昆在这个位置上站稳脚跟。

工作队进村组建银庄村班子，人选上很费了一番心思。工作队与镇党委一起研究，到村里征求德高望重的老人们的意见。此时村庄行政的主要工作和主要矛盾就是艾滋病，栗庄是四个自然村中艾滋病人数量最多的，也是最会“闹事”的，是银庄行政村工作的重点、矛盾的中心，因此村班子“一把手”必须出在栗庄。当时村里情况一片混乱，除了栗可领六弟兄，没人愿意出头，可村人不信任六弟兄，而有六弟兄站在那里其他人不敢干。最终，多方考虑，推出栗卫华。栗卫华，亲兄弟二人，堂兄弟六人，而且跟栗可领是“一个门的”，栗卫华的爷爷跟栗可领的父亲是堂兄弟。村中老者栗可顶和老支书栗可栋说：栗卫华是我们推出来的，当时工作队、镇上领导征求我们意见，想来想去只有他合适，虽然卫华年轻没有经验，但是为人忠厚实在，真遇事有他兄弟栗永敢替他拼，栗永个头大不怕事，抡拳头一般人不是对手。栗卫华上任后对这些长者也很信赖。另外三个村庄各推选出一名村干部，也都是在各自“门里”说话算数有威望的人。

### 村民代表与艾滋病人代表

疫情爆发以来这一时期，银庄村的主要事务就是艾滋病事务，“村民代表”与“艾滋病人代表”在与艾滋病有关的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所谓“代表”，并没有经过正式选举的程序，这是一些村里的活跃分子，热衷于“跑艾滋病”的人，是“自封”的，大家也“认可”。他们本人或者家人感染了艾滋病，有一定的胆略和办事能力，比较能说会道。上访之类的事情，村干部和村中长者不便出头，而由“代表”们出面，通常三五人，有时候会是十几人，以栗庄和滩头村人为主“挑头”，莫庄和小印庄人为辅“跟随”。那一时期的上访信件等一些文字资料上，落款署名常常出现他们的名字，如果是感染者，就属“艾滋病人代表”，

否则属“村民代表”。即使以村委会党支部名义写给上级部门的“反映信”，落款处也必有村民代表或者艾滋病人代表，更多的则是村民自己的独立签名上告信。以下几份当时的村庄文书资料，可以表明“代表”们在有关艾滋病事务中重要的角色地位。

### 标准卫生所建设报告

关于诊所按合同实施主体基础已经完成，请领导检查验收。另外：

- 1、关于建造厨房，用水消毒室两间。
- 2、水井1眼（包括电机、水管、水池、水塔）。
- 3、建造公共厕所。
- 4、入村的土路整修。

请领导审批，再作预算。

2001年5月4日

牛延东

感染者牛延东是当时最活跃的“跑艾滋病”的领袖式人物，在建村卫生室问题上，俨然一副“主事者”姿态，通过“跑艾滋病”他认识了市卫生局领导并且建立了密切关系。

### 合同书

甲方：栗金臣

乙方：银庄大队行政村

1、由乙方为新建村标准化卫生诊所，向甲方栗金臣租地皮包产量500斤小麦，由交公粮时一次付清。

2、路边树木如乙方不用地，永远归甲方所有。

3、本合同从签订之日起盖章生效。双方互相监督。

共同遵守，不得违犯，由乡政府公证。

甲方：栗金臣

乙方：银品德

经办人：牛延东 栗干臣 栗正显

2001年9月24日

这是为修建银庄卫生室占用村民栗金臣的责任田而签订的“合同书”。且不论行文措辞是否规范，有意思的是合同书“由乡政府公证”，乙方签字人银品德是银庄村副支书，3名“经办人”则都是艾滋病人代表。

### 关于诊所两村<sup>①</sup>代表协商意见

- 1、病员用药自费 30%。
- 2、诊所由莫文彬，银建玉两人（两村村医）护理服务，他们二人有权开处方。
- 3、收款人由牛延东、栗可贤二人（艾滋病人代表）协商分工。
- 4、药品收款，由两村代表监督执行。
- 5、药品购进由院（镇卫生院）领导和代表共同采购。
- 6、药品价格属批发价，到诊所不能加价。
- 7、药品伪劣，出现假药，由院方负责。
- 8、药品、帐目问题，日清月结，两村代表有权查诊所经济帐目。

透过这些非正式的民间文书文件，可以想象出“代表”们当时积极主动的主人翁姿态。他们认为药品、卫生室都是他们“跑”回来的胜利成果，理当由他们当家作主。

#### “管闲事”

“管闲事”是当地一个有特殊含义的专用语，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民间行政”的方式。“管闲事”的人，有时类似地方裁判官的角色，出面处理解决民间纠纷；有时充当民间矛盾调解人角色，为当事人打通某些关节。能“管闲事”的人都是有能耐有“面子”的人，或者凭借威望威信，或者凭关系权势，有村干部，也有“光棍眼子”。银庄人这几年还依仗着艾滋病的“优势”，到村外“管闲事”，比如讨债。通过“管闲事”可以化解一些民间社会矛盾；也会使矛盾激化升级，一些原本不大的“闲事”被“管”大了。在“管闲事”的过程中，官方的、民间的各种因素被裹挟进来，反映出各种复杂微妙的关系。

银庄因为非法生产烟花爆竹，货物被罚没或者人被抓住的情况常常发生。带上钱物到派出所替人“说情扒人，管闲事”，一度成为银庄村干部的日常主要工作，也成为另外一些人的专门“行当”，一种“营生”。在这里“管闲事”，业已演化成了各种势力利益的较量博弈。当时的村主任栗卫华常常被这种“管闲事”搞得不胜其苦不胜其烦。

那天一见面他就说，刚刚滩头村走炮，在安徽利辛叫斗住了，货也卸掉了，叫我去说情，我外头也不认识人，不胜叫几个艾滋病去。前天莫庄的炮，叫B镇派出所小印庄查走了，找我去找人说情，要不回来，只好推了。栗可喜的炮，在大王楼（距13里）斗住了，派出所李春峰去的，可喜打电话找我。这是一个庄的爷们，闲事不能不管，正吃饭哩，碗撂下就去了，说说（情），销毁三四十饼子，共二三百饼子。派出所白指导说不销毁点不中。上回

<sup>①</sup> 指栗庄、滩头村两个疫情严重的村庄。

在莫庄抓了3个外村插捻子的，叫村干部去说说（说情）。派出所说，你们既然来了，面子也给你们，原来要拘留7天，现在5天，交复议金一天一人200元，5天1000元，3人共3000元。你们给主家说说，这是最低的了。主家又找老点去说情，结果是只交了1500元。村干部莫昭红气得蹦，说这不是给我们办难堪么！我们村干部的面子还不胜那些光棍眼子，别看是一般村民，人家能说下的情，我们说不下……

## 二 治疗的管道：摸着石头过河

疫情爆发以来，艾滋病的治疗成了村里的头等大事。发病伊始，村民们一面向上级政府要求救治，一方面也寻求民间救治的途径。事实上，一些民间医生进入疫区更早，银庄不少感染者早期治疗全靠民间医生，服用“试验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有官方和民间两条治疗管道并行，真正的“摸着石头过河”。当抗病毒治疗逐步走向正规之后，民间“游医”少了，而一些来自正规医疗机构的“药物试验”一直不断，这是一条非官非民、亦官亦民的管道，其背后的支撑力量或者可以归结于市场因素。

### 救治政策与药品的流失

走访河南重点地区卫生防疫部门及相关政策资料表明——

从2001年起，部分地区对艾滋病人实施限定的免费治疗，这可以说是政府救治行动的开始。但是各地受到救治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比如对于媒体报道较多的文楼村政策最优惠，艾滋病感染者就医医药费全免；对部分疫情较重地区的部分“重点村”提供一定的救治；大部分感染者得不到救治。

最初实行代金券购药和限额取药两种制度。驻马店地区的上蔡县实行“代金券”制。艾滋病感染者分为轻、中、重三类，每人每月分别发放100元、200元和300元的代金券，病人持券到所在的村卫生所、乡卫生院或者县级医疗单位就诊。至2004年6月10日废止购药券，该县共发放购药用代金券1652万元。周口地区的沈丘县，重点村病人每月限额领取66元药品。村医开出处方，病人到乡卫生院取药。不过很多病人表示，并不能领到该数额的药品，每月实际领到20元钱的药品就不错了。（新京报20041127）

银庄属于“提供一定救治”的重点村。当地卫生官员讲：2001年感染者每天人均药费2.2元。那时是“谁找给谁”，银庄人找得多，就给一点，别的地方不说，就没有。

村民说：最初的治疗和药物管理都非常混乱。2002年上级每月拨给村卫生室1万元药品，县卫生局规定艾滋病人用药按30%收费，用于村医工资和办公经费。村医乱开药拿提成，7个月，拨款7万元，村医得30%就是2.1万。艾滋病人不愿意了，锁上卫生室的门，不叫



开门，跟村医算账，向县卫生局、乡卫生院提意见。最后说：分！于是栗庄、滩头村分成两摊子，村医开单子，平均每人每月 60 元<sup>①</sup>，“药头”到镇卫生院领药。到 2003 年春上，都乱的不能行了，吵架，打架。镇卫生院提出来，几个本子联合到一块开药，艾滋病人直接到镇卫生院去领药。十个或者二十个本子结合好了就去领。栗庄分 10 摊，滩头村也分好几摊子。每摊子当“药头”的都是“铁”人，有的不是正经人，里外哄，领了药不给人家，都拉走卖了。那时候人越化验（检测 HIV）越多，化验一回艾滋病人多一回，外庄化验出来的艾滋病人，在本庄不敢暴露，都挂在栗庄、滩头村的名下。外村人的本子，领回的药不给人家，药头都卖了。最后艾滋病人都直接上卫生院去要药，不叫“药头”管了。说实话，那个时候，领药吃家不多，都为卖药。（20070204 录音整理）

2004 年，感染者用药不再限制金额，按规定有 100 种药品可以免费服用。但是，普遍抱怨没有药：“领不手里药，药品供应还不如以前。”艾滋病人譚（编）成快板（顺口溜）“一啖（jue，大声咒骂）一骂，三支庆大，不啖不骂，两句好话。”村卫生室经常没有药。村医说，以前是每个月 60 元你要什么药都有，要保健品也有，只要吃够 60 元就行。现在不限制金额，但是有药品的限制。有的药确实供应不足，如阿莫西林，一天只有几盒，一个人开阿莫西林，其他的病人也跟着要，一个不给就不愿意。村主任说，那时候，病人没事干，天天都到医院开药，反正都是国家免费药，不开白不开，开了不白开。三块钱开的，一块钱卖了，不管咋说都换几个钱。也有互相“借着使使本子”看病吃药。村医也有问题，但是你查不出来。他那儿一个底，你这儿一个底，他可以随时再写，用复写纸，药已经加上去了，但你那单子上没有。这一时期药物管理更混乱了，一方面有人吃不上药，一方面是药品的大量流失。好药都被村医和那些“光棍眼子”分了、卖了。“好药”就是好卖的药，人们都争着开阿莫西林，因为阿莫西林好卖，有人开不着，有人成盒子开。医院开药看人，“你是‘糙家’来好药就通知你去领，光棍眼子‘大糙家’本子搁他那儿，天天开药，得钱两下分。”人们都承认，“药吃的不多，都卖啦。”有专门收药的人在村里转悠，找艾滋病人收药。“村中间十字路口变压器那地方就是交易地点。”村人说，药品如果不浪费，50%就足够用。还有说，三分之一就够用。

2006 年元月起，银庄所在地区实行个人账户。上级拨款艾滋病患治疗费用人均每月 390 元，其中 90 元用于管理。B 镇防疫站长说，现在比以前好多了。艾滋病机会性感染治疗实行个人帐户，一人一卡，注入资金 150/月，另外统筹资金 150/月，定额帐户，不够再用。实行“年底兑现”制度，每年每人医药费共 1800 元，如果没用完，兑现 300 元，余额转下

<sup>①</sup> 当时规定，检测出艾滋病毒感染者，发治疗本，每月用药限额 60 元。

年。如果死亡，余款一次付给家人，如果家里还有艾滋病，可以接着用。主管县长说，建立个人账户，平等了，没有“光棍眼子”了。

村民说，啥时候也公平不了，分着等级哩！一般人开药，随便给点打发走了；“糙家”，他惹不起的，给好一点的药；还有几个“有头脸”的，本子存医生手里，一天4支菌必治，就是头孢去松纳，人不用去方子就开好了，月底结账，每逢月底，连夜把药拉回家。好点的药，医生和“糙家”合伙分了。有的“糙家”直接从村医手里“使钱”，开方子不领药，直接算钱。4个村医都在里面挣钱，村医就是吃艾滋饭哩，不了他会愿意挨骂？说是年底算账，药费使不完的，最多可以返还300元，实际上，有的使“冒了”（超额），照给300元，有的有节余，也不给。吴小妮一次也没有开过（开药），不给她也不说啥，老实头子，就不给她。啥时候都平等不了，还是老实人吃亏！

感染者最不满的是，建立个人账户后，艾滋病病人用药都比一般病人贵，心电图一般人10元，艾滋病病人20元，输液扎一针4元钱，开药还加几元处方钱，每月规定的150元不够输两回水。村医也说发卡之后药价高了，比如阿莫西林市场价4.8/盒，B镇卫生院进价就5元/盒，卖6元多一盒，比市场价高2元多。事实上，抬高艾滋病患者用药的药价，是许多基层卫生部门解决财政困难的“思路”，此口一开，后患无穷，引发许多矛盾。<sup>①</sup>（田野手记20061103，20080707）

### 艾滋病五级防治体系：形同虚设

2004年河南省宣布建成全国第一家“艾滋病五级防治体系”，在省、市、县、乡、村分别建立艾滋病定点医疗机构——

省级定点医疗机构：包括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大学淮河医院、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负责指导全省危重、重症机会性感染、有伴发其他疾病或合并症的艾滋病患者的治疗。同时，河南省依托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成立河南省艾滋病临床技术研究指导中心和河南省艾滋病临床治疗中心。

市级定点医院：全省共21所，分别为18个省辖市的传染病医院或有传染科的综合医院和3所中医院，负责辖区内HIV/AIDS的抗病毒治疗、抗机会性感染及中医药参与艾滋病治疗工作等。

县级定点医院：河南省卫生厅规定，每县必须设一所艾滋病定点医院，负责派医务人员进驻村医疗所，并接受乡卫生院转院重度患者。乡级医疗机构：乡卫生院设置的原则是本着方便就诊、参考发病人数数量多少，视情况进行选择设置。乡卫生院负责救治非重点村患者，

<sup>①</sup> 详见第三章之四“药价风波”。

同时接收救治村医疗所较重的艾滋病病人。

村医疗所：最初全省 38 个艾滋病防治重点村每村一个，之后相继发现的疫情比较严重的部分非重点村也开始建设村医疗所。村级医疗所是五级防治体系中的重点。

按照规定，村级卫生室负责本村艾滋病人的救治，如果病人病情严重，村卫生室无力救治，转院乡卫生院就治。对于非重点村的艾滋病病人则直接集中到乡卫生院救治，乡卫生院救治不了的再转县卫生行政部门指定县级综合医院，直至市、省级定点医院。官方报道称，河南省各艾滋病高发县（市）均建立了疫情数据库，并实行疫情报告制度，对所有已确诊的艾滋病病人建立档案，发放了病例卡。原则上，病人只需要携带病例卡、身份证等相关证件到相应的医疗机构，就可获得免费治疗，目前河南省规定已有 100 种药品可以免费服用。

而事实上对于绝大多数河南农村艾滋病感染者，医疗仅限于乡村两级。即使在一些省级重点村，感染者的治疗也主要依靠患者自己在家“输水”<sup>①</sup>，病重送往乡镇卫生院，不批准再转往县和县以上更高级医院。艾滋病晚期治疗需要会诊，乡镇卫生院根本作不到，“人进去就出不来了。”郑州第六人民医院是河南省唯一一家传染病医院，2001 年开始收治艾滋病患者，成为全省艾滋病定点中心医院，设有艾滋病区，在所有的定点医院中，收治艾滋病病人最多，所有到这里治疗的艾滋病病人都是自费。郑州六院艾滋病病区主任说，政策定得不错，但是没有配套资金，光说艾滋病治疗免费，实际连自愿检测免费也做不到。县、市、省级定点医院治疗艾滋病全部自费，农民感染者无力承担费用只有中断治疗。所谓“五级防治体系”对于农民艾滋病患者形同虚设。

新京报报道：（2004 年）11 月 25 日，上蔡邵店乡卫生院艾滋病病人病房观察室，高李村 40 岁的患者张换躺在床垫子上输液，不停地打着哆嗦，因为屋里实在太冷了。邵店乡卫生院针对艾滋病病人设置的病房共有 4 间，每间应安放床位 4 个，但实际上每屋只放了两三张单床，床上除了一张沾满泥巴的垫子，再没有任何的被褥枕头。地上则散着烟头等垃圾。沈丘县白集乡反映出来的问题则更为严重，病人从该院领取的输液用药，不配备针管等器具，病人还需要向院方购买。而病人将药品带回家，很多人自己扎针输液。该县并未建立由乡卫生院到县医院的转院制度，即使病情再重，也没能享受到县医院免费治疗的待遇。11 月 26 日，河南省沈丘县尹庄，新建起的一体化卫生室坐落在村东头，两名医生在药房值班，两间病房锁着门，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村民们说，只有到检查的时候，才会把门打开。卫生室里挂在墙上的“工作人员编制”中，共有“编制”13 人，除有本村 3 名村医，县医院和白集乡中心卫生院分别派有四五名工作人员到该卫生室工作。但事实上，只有县医院的鲁来丰医生

---

<sup>①</sup> 输生理盐水加一般消炎药。

在最初几天到过卫生室几次，其余派驻医生几乎没有到过尹庄卫生室。甚至3名村医也不能按照规定按时值班，卫生室常常铁将军把门。“只要他们穿上白大褂到卫生室来了，肯定是上面来检查了。”实际情况就像村民说的一样。该卫生室医生李树东说，目前他们主要的工作是发放口服药和注射用药，“发放”是众多乡村医生所担负的主要工作，治疗则成为一句空话。——这基本反映了疫区乡、村两级医疗机构状况。

处于五级体系中的第四级——乡卫生院面临的种种矛盾尤为突出。在中国卫生体系中，乡级卫生院属于自筹资金的事业性单位，自负盈亏，在国家没有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使其投入到具有公益性质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本身就是个矛盾。首先是资金的困境，由于接治艾滋病人，病员流失，乡卫生院的收入锐减。一些担负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乡级医疗机构面临财政危机。对于资金方面所面临的困境，当时上蔡县卫生局副局长余发斌说，他的想法是，把15%进行核算，由财政支付该部分加价，算作县、乡两级参与艾滋病救治工作的医务人员工资。由于“政绩”的因素，基层的许多实际问题和困难，不是采取公开提出讨论解决的方式，而是采取私下“开口子”、“变通”的方式，直接后果就是层层作弊作假。<sup>①</sup>

巨额的国家救助资金和外界资助流失严重，很难到达底层。直接面对大批艾滋病患者的乡村医疗机构条件堪忧。由于条件差，乡镇卫生院难以接收重症病人住院治疗，河南农村疫区，除了上蔡县，其他地方并未建立重症病人从乡卫生院到县医院的转院制度。资金困境，严重影响到乡卫生院对艾滋病人的救治水平和服务质量。不少乡级卫生院成了专门发放输液药品的“药房”。（新京报，20041127）

### 抗病毒治疗：依从性教育不到位效果不理想

抗病毒治疗管理极为混乱。除了地方政府缺乏相关知识外，农民缺乏教育和基层技术薄弱也是重要原因。结果非常令人震惊，超过40%左右的患者自己停止服药，最为令人头痛的是应该服用药物的停止服药，而目前还不需要服用的病人在坚持服用。在抗病毒治疗使用不好的地方，死亡率仍居高不下。

——张可《河南艾滋病五年调查》

遏制疫情起关键作用的是抗病毒治疗。有关资料显示，在2003年发放抗病毒药物治疗后，病人的死亡率已经从高峰的2002年的6.78%下降到2003年的5.58%，截止到2004年

---

<sup>①</sup> 而“给艾滋病人免费发放的药品加价以解决医务人员待遇问题”成为基层卫生部门解决“资金问题”的通行惯例，口子一开，漏洞百出。又造成一个贪污腐败的巨大黑洞，上蔡县——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当地官方自称典型的“要饭财政”，居然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敢贪污老百姓的救灾救命款，发生“杨半亿”县委书记重大贪污案！

10月底统计病死率仅为2.53%。但在抗病毒治疗不到位的地方，死亡率仍居高不下。

我接触到过一位省中医院的医生，他作为工作队员进驻过3个艾滋病村庄，据说是38个工作队中唯一一个自愿报名的工作队员，当时正在参与一项中医药防治艾滋病的试验课题。这位专业医生说：艾滋病是不可治愈的，病毒“嵌”进了基因里，没有办法“捡”出来了，唯有用鸡尾酒疗法进行抗病毒治疗。现在的抗病毒药可以维持生命10多年，再有新药再维持10多年，也差不多了，“心脏病、高血压也是不治之症，也没人自杀。”如果不治疗，概率5年内死光。治疗费用：抗病毒药4000-5000元/年人，机会感染用药4000-5000元/年人。河南现在（2005）已经服用抗病毒药的人有7000至8000人。（田野手记20050216）

银庄人始终不知道，2001年使一些人起死回生、被他们视为“神药”的双汰芝（见第一章），实际就是一种进口的抗病毒药。临时供给的少量的双汰芝用完后，2002年村里又开始大批死亡，“2002年到2003年，村里死50多口，气氛恐惧，卖菜没有人买，连话都不说。没有抗病毒药，只有临时治疗药不中。”村民们说。

银庄正式开展抗病毒药物治疗是在2003年。那一年中央承诺给予河南艾滋病病人免费抗病毒治疗，当年7月药物发放到部分感染者手中。抗病毒药物的服用有严格要求，对医生和患者都需要进行依从性教育培训。但是，当地村医反映他们得不到培训，更不要说患者。由于依从性教育不到位，效果很不理想。

感染者栗华中说，银庄第一次发放抗病毒药，大家都到县防疫站排队领药，说是外边捐哩，一人“两条子”，20盒。领药未必服药。都去排队领药，领了以后吃不吃不一定。没人讲解（服药知识），很多人领了药是看人家吃不吃，再决定自己吃不吃，不懂药理。那时候县、乡防疫站也不懂，还没有我懂哩！他们有任务，一人包10个人，动员加强迫，非让我吃。我知道我当时不能吃，因为我跟刘子亮一起到北京佑安医院“搞科研”，人家给我检测过病毒载量和CD4，当时我的CD4细胞还有500多哩！刘子亮给我讲过，200以下才吃。劝我吃药的是防疫站长萧峰，我归他“包”。萧峰管这一片，只管领药、发药，该吃不该吃他说不了。还是我跟他讲为啥不能吃，我说我不管吃，CD4高着哩。他说你说CD4高你把化验单拿过来！我拿啥呢？你又不化验CD4，人家北京医院的化验单又不在我手里<sup>①</sup>。俺俩还争吵，桂枝在一边帮着我。刘子亮在可昆家院子里讲过防治知识，是可昆坐车到刘子亮家请他来村里，叫村人都来听讲解。桂枝听过，所以也知道。那时防疫站光劝着叫吃，都不懂药理。也没有人指导服用，有人贫血快死了也不知道及时化验，化验一次30元，一般3个月需化验一次，开始时要求每半月一次，都不知道。那几年死亡率确实高。

<sup>①</sup> 不检测CD4细胞指标，这种“抗病毒治疗”根本缺少最基本的程序。

村医栗昭说，滩头村直到 2006 年死亡率持高不下，主要原因就是抗病毒药服用不好。栗松才发病时抗病毒药才服用 2 个多月，如果早些及时服用，他不会死，他哥也是一样。这也跟村医水平有限有关。他们不会对症治疗，诸老五发病每天就是给他输 10%糖水，不会对症调药。我回来了找我，给他又开了药调调，但是太晚了，不然也有救。

抗病毒药物有不同的组合配方，应根据病人不同的身体状况确定是否服用，一旦服用必须每天定时定量终身用药，不能中断，依从性要求很高。用药的标准，除了 CD4 值以外，还要求具体细化，针对肝功能、血常规等的结果进行药物采用的指导。这些对医生和患者都需要进行抗病毒用药之前的教育培训。但是，在银庄，显然做得很不够，那些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防疫人员尚且不了解最起码的用药知识，更何况一般农民感染者。个别病人的一知半解，是通过非正式的渠道偶然获得，不系统不完整，往往似是而非。连自以为“懂得”的栗华中，到了该服用抗病毒药的时候，用药一两个月后才发现“吃的不对”，一次一片误用为一次两片。全村最早被官方确证感染艾滋病毒从外省送回来的栗海军，很早就是当地防疫部门关注的重点对象，在服用抗病毒药时，也错误服用好长时间才自己发现。其他病人服药情况就更加混乱不规范。而抗病毒用药不规范，会造成造成耐药抗药的严重后果，治疗更加困难。

村医也认为“这里抗病毒药服用不好，宣传力度不够。”银庄 2004 年存活感染者人数 304 人，其中 145 人服用抗病毒药，当年艾滋病死亡 19 人，病死率 6.25%，大大高出当年的平均病死率 2.53%，甚至高出 2003 年的 5.58%。2005 年，又死亡 14 人，病死率仍高达 4.91%。其中滩头村最多，死亡 7 人，都是因为没有及时服用抗病毒药。莫庄死 4 人，也都因不坚持服用抗病毒药。2007 年感染者存活人数 201 人，服抗病毒药 150—160 人。其中多数人服用毒副作用很大的国外已经淘汰的初期抗病毒药物“大白片”，只有有 35 人用上了拉米夫定，其中栗庄 17 人，滩头村 8 人，莫庄 6 人，“栗庄‘糙家’多”，还有 2 人服用“更好的”的施乐宁。小印庄感染者少，不敢“糙”，公开的 4 名感染者中，只有 1 人服用抗病毒药，还是“大白片”。而在其他非重点村，一些感染者连最一般的初期抗病毒药物也用不上。

初期药物方案欠妥副作用大，也是造成病人退出治疗的重要原因。好在中央政府一直为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断努力。2006 年，从 B 镇防疫站得知，配伍基础药已经增加了拉米夫定和施乐宁，6 种成分可组成 4 种配方，其中拉米夫定是治疗艾滋病大骨干药物，可以有效降低药物的毒副作用。但是当时这种疗效较好、副作用较小的“好药”，只有少数人能够享用，他们是艾滋病人群中比较强势的人。拉米夫定一直比较紧缺，需要上报批准。从开始少数人服用时就常发生断药情况。按说有计划的供给，不应当断药，断药的原因在于中途流失。拉米夫定不单是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的关键配伍药，还可以治疗乙肝，所以原本是国家无偿供给

的，在基层医疗部门却可以有偿卖出。由于担心中断，一些服用拉米夫定的艾滋病人，就想方设法多领取一些“备用”。后来发现这些“备用药”可以卖钱，于是加倍储备。这样层层截留，使得供需之间更加紧张。

2007 年我拜访桂希恩大夫，谈到当地抗病毒治疗状况，他很吃惊，说国家已经投入巨额财力物力，不应如此。2008 年，桂希恩来到银庄为感染者义诊，才发现他们多数人真的已经耐药，并及时向卫生部反映，提请解决河南艾滋病疫区二线药物用药。（田野手记 20070619, 20070720, 20081202）（照片 39）

### 民间“游医”：评价不一

所谓“游医”，指民间行医者。事实上，民间“游医”进入疫区比官方要早，村民称之为“私人医生”。当时的村支书栗可昆说，最早到村里的私人医生都是刘子亮带来的。“刘子亮是最早公开曝光的感染者，和尚庄的，离咱村不远，跟濮存昕一起照过相。”村里很多病人都吃过私人医生的药，都说效果不错，特别是对拉肚子、疱疹很有疗效。“那时候来村里的私人医生好多，看病吃药都不要钱，也有一定疗效。国家当时也没有什么治疗办法。”

**洗澡治疗：截然不同的说法** 张可在他的《河南艾滋病五年调查报告》中写道：由于农村没有正规化的中医治疗，“游医”便在这个地方泛滥成灾。各种近乎愚昧的治疗手段在农村大行其道。一名“游医”在河南省某艾滋病村说能治疗艾滋病，让病人在一个非常肮脏的大缸中长期洗澡，说能治疗艾滋病。这些近乎愚昧的治疗手段不仅不会治疗艾滋病，反而耽误了患者的病情，延误了患者的治疗。究其原因，因为没有正规的医疗机构和专业人员在这里为患者服务，才使他们大量的相信了这些“游医”。（张可，2005）同时还附有“用于泡人的大水缸”的照片。

在栗华中家院子里，我无意间见到了这个“大水缸”。实际上是一个特制的浴盆，玻璃钢材质，循环水装置，通电烧水控制水温。才知道华中也参加了“洗澡治疗”。华中说——

当时张可、张洪峰（中央电视台记者）都劝我不要洗，但我治好了眼睛，要不是就瞎了。那是 2002 年，我一只眼已经看不见，瞎了，另一只也感染了快瞎了。以为就是害眼，自己上公疗医院去看（医治），花了 200 元。到医院不敢说是银庄的，说是北郊的。打一针眼瘀血了，打两针眼肿起来了，还疼得厉害。花 5 元钱买个眼镜戴上回来了。回来以后天天输液，那时候村里已经有了免费治疗。这时候刘子亮来村里了。他来村里找到辽宁大连“搞科研”，我去了。先到北京化验，确证艾滋病，说这害眼就是艾滋病的事！看我那样，刘子亮开始还不想带，怕治不好。投资人叫赵猛，在北京赵猛见了我也害怕，怕治不好担责任。在北京检测以后坐船到大连，住在赵猛私人别墅里，吃他那“科研药”，洗他那澡，用那水洗眼皮。

头7天效果最明显，一天一个样，效果很好。一起去治疗的人都是看我的眼哩，效果好，大家才敢下缸里洗澡治疗。一起去的还有新蔡的，效果都不错。我去大连治眼，半年去了（往返）三次，人家是一次去半年。我治疗到一半，家里打电话说叔叔艾滋病死亡，要我回家奔丧，叔家儿子艾滋病死罢了，没人了。那时住在那里治疗已经一个月了，大家都想家。我回来时他们都哭了，也想回家。当时回来时人家就不想让回来，回来后人家又打电话来叫去继续治疗。半个月后，我又回来一趟，带着几个艾滋病人又去了。其中有一个叫张春，女的，县城的人。她也是病毒感染到眼睛，先瞎一只，单盲，后来又瞎一只，双盲，眼是一个一个瞎哩。她最近才死十来天，她没有我治疗得及时。在那有专人治疗，管理生活，还有北京记者跟着采访。就这样在那又住了3个月，眼保住了。后来大家还是想家，都回来了。赵猛把澡盆运回村里继续治疗，栗庄3个，新蔡东湖村5个，还派护士跟踪治疗记录。两人洗一盆，那水不坏（不腐），不断往里续水续药。这一家现在散了，说是药没特效。研究者金项生，投资者赵猛。前些时候还邮资料过来。

当时的村支书栗可昆说，赵猛人不错。要不是他，华中不死眼也得瞎。

赵猛当时来村里是住在村民栗可杰家，栗可杰的妻子卖血感染艾滋病，正求治无门。栗可杰说——

乡里说他非法行医江湖骗子，我不管他们咋说。他愿看，我愿治——那时候政府又没有啥法儿。都冒着风险哩！派出所、乡干部找家来问，说以为是记者来了，乡党委书记让来看看。我说出啥问题我负责，治死治活不给政府找麻烦。对赵猛我也得负责，人家来咱这了，得保证人家的安全。人家赵猛图啥哩？不收一分钱给咱看病，管吃管住管路费，还担着风险。栗可峰的二姐，快不行了去的，死了送回来。去之前给赵猛签定协议，治好治不好不怨人家。她丈夫羊癫疯，3个儿子，最大的才十六七岁。家里确实难，不去也没别啥法儿。去的人治疗效果都不错，就死她一个人。人家赵猛也真够意思，人死以后开专车送回来，停村外给我联系。有人想扣下人家的车，我说那不行，这事是经我办的，做人得凭良心！

2007年7月，我和栗可杰、栗华中一起到大连拜访赵猛。赵猛亲自到车站接我们，他们老朋友见面分外亲热。赵猛开车带我们到大连郊外开发区的金石滩。金石滩某小区里的两栋别墅，就是当年华中他们治疗生活的营地。华中故地重游，非常激动，拉着我楼上楼下介绍，这是做饭的厨房，这是住的宿舍，我住这屋，那屋放澡盆，就是洗澡治疗的地方……。别墅外面的花园里，花开得正好，两排垂杨柳是当年华中们栽种的，翠绿的枝叶在风中摇曳。小区外面就是海滩，一处海边旅游胜地。“这么好的地方，那时候就是住不住。想家，就是想家！……”华中说。



赵猛说，就是“非典”那年，做实验治疗艾滋病投资 100 多万。“迷上了，手下人都说我异想天开，疯了。”起因也很简单。我常年患皮肤病，苦不堪言，到处求医问药。后来遇上金大夫，用他的药水，我的皮肤病洗好了。他说艾滋病也能治。我一听这么好的事，为什么不不做？就到北京寻找艾滋病病人，没有找着。后来遇上了刘子亮，刘子亮说“多的很！”就通过刘子亮联系。先上商丘，联系红十字会，他们很欢迎，说县医院后面不用的楼房给我们用。我说房租我出，我招的病号在医院看病我出费用。结果他们请示领导，说上级不批准。这才又联系 Q 县、新蔡。还是刘子亮领着，不再通过政府机构，直接找病人。第一批 9 人，第二批 6 人。效果基本上都不错。治疗性传播的艾滋病效果更好。北京的一个艾滋病病人，外号“死不了”，下身溃烂，药水一抹上就好了。这种药提高免疫力。银庄栗立功病很重，7 天不吃饭，拒绝治疗。他是治疗组特意选的两个重病号之一。给他先灌肠，再治疗，又活了 2 年。当时很想让他们在这里安心治疗时间长一些，天天做他们思想工作，就像部队里指导员做战士的思想工作。但是他们就是想家，想得哭，只好送他们回去治疗。当时从北京雇了两个人专搞摄像，资料保存在电视台王台长那里。王台长联络了 4 家电视台：凤凰卫视、健康时空（卫生部）、中央二套、中国网络，都到村里去拍摄。他们拍的很细致，发病起的疙瘩、如何治疗、日常生活和护理，都拍下来了。还带去了医疗专家，地坛医院传染科主任、中国中医学会会长都去了，《卫生报》记者也去了。2005 年，光为请他们 4 家电视台、8 个专家，花了 30 万。最终报不了批号，只好停下来了。报批是走中医绿色通道，卫生部设的，每天三四十人排队报审。

投资这么多，后悔吗？问他。答：没什么后悔的，100 万对我整个企业也不算什么。就是后来新蔡医院不发给参与这次试验治疗的艾滋病病人药，“这让我挺后悔的。”

**药酒治疗，效果不错** 栗可昆说，乐国球是江西东风乡农民，他以本地一个老中医的配方为基础调配出一种药酒，“有病治病无病防病”。为使大家放心，吃饭时他先喝。他的药酒治疗拉肚子疗效特别好，当时立功拉肚子都拉得白脓，喝了他的药酒止住了。乐国球“心气很高”，一心想搞出名堂。当时与刘子亮和我商量成立艾滋病研究所，刘子亮名气大，负责对外联络，乐国球负责研制开发，我负责内部管理组织病人，当时还制了一块招牌挂在我家里。他往村里送过三四次药酒，都是免费发给病人，希望服药后检测 CD4 和病毒载量，了解疗效，但是没有钱做不起检测，他也维持不下去了。最后一次来送药，说他两个儿子辍学，老婆生气。那次临走我们几个人给他兑了 200 元钱路费。

栗可贤说，我主要用山西晋城老周的药酒。老周是一个工厂的干部，大学生，业余研究治疗艾滋病。药酒口服，一天两次，一次保持一两，一壶能用 2-3 个月，用完就再送来。不

收费，说话还客气得很，连饭都不吃，烟也不抽。十来天来一次电话问用药情况。听说我起疙瘩，又特意送来了喷用的药。村里还有栗华中、长林家王凤兰也用他的药酒，效果都不错。

**邯郸 IS71-y 药液 HIV 灭活实验** 我在村里见到过从邯郸来为艾滋病人治病送药的“游医”。他们一行 4 人：一人身着白大褂，当是医生，一位自称负责人张尚斌，还有一男一女正扛着摄像机在给一艾滋病人录像，大约为了宣传疗效。张尚斌自我介绍：K 市人，当过兵、教师、记者，在党史研究室干过，54 岁，32 年党龄，“在部队就入党了。”他说，“我是本地人，1998 年就知道这里有艾滋病，与 B 镇有亲戚，这是公开的秘密。”从 2000 年起，已经救治过五六十人，第一次就救治 18 人。这次到滩头村已经是第 10 次临床治疗。使用的药物名称为“IS71-y”，没报国家审批。“但是治疗范围达到全球范围。”哪里？津巴布韦、台湾。“邵一鸣签字，明知好用，但是不批……，你知道，医药界很复杂……”他拿出一份中国预防医科院艾滋病研究与检测中心《邯郸 IS71-y 药液 HIV 灭活实验》报告的复印件给我看，报告结论称“IS71 药液在体外对 HIV 有直接杀灭作用。”

栗长山参加了这场治疗。他说，听说郸城那儿有人治艾滋病，免费，我就去了。治疗效果很好，我的 CD4 从 150 升到 647，没给咱要过钱。药用完还给，也不要钱。还给提供住处，提供煤火炉、茶水，自己买面条下着吃就行了。治病光指望国家不行。我现在主要依靠这药 IS71-y。另外还有乾坤丸。重时多服，轻时少服。那一次只去我们 7 人，人家只要 7 人，其中还有一个小孩，效果基本不错。只有栗树臣死了，他只用了一回药。我用两回了。栗树臣怨他自己，有病烧到三四十度了，不瞧（看病治疗），打麻将。昨天他们来滩头村调查治疗效果，问用药效果，身体变化。他们叫我再找几个人，一共要再找三五十人。我在胡桥找人，拉出名单就齐了。（田野手记 20060110）

**拿咱性命让人家搞试验，不定搁谁手里吃好呢** 银庄人把来自非正式渠道的药称作“试验药”或者“科研药”，参加这些药物治疗试验称作“搞试验”或者“搞科研”。感染者栗华中说，早期求医问药，可是艰难得很。我吃过十几家的“科研药”，是十几家的实验品。“拿咱性命让人家搞试验哩，不定搁谁手里吃好呢……。吃点人家的科研药，死马当活马医。人家也没害咱的心，国家也是试验哩，抗病毒药也有符合哩（适应的）就好（效果就好），不符合就不好，是不是？”栗可贤也说，我是抗病毒药一次不漏，还用其他药。外面来村里治病的不少，都试试。效果有的好有的不好。有一家的药，是吃了叫人发烧，外村有一个人吃死了，他很亏，原先身体看着还不错。还用过村医栗中祥从北京弄来的膏药块，掰不成丸，吃了胃发胀，村里有几个人用，有的不适应。（田野手记 20070623，20070727）

## 现场采访

**走访镇卫生院长** 李广，B镇中心卫生院院长，52岁（2005），中共党员。述——

我家就是B镇人。1986—1990年在B镇卫生院当主任。之后调任陈寨乡卫生院院长6年。1997年调Q县赵寨营中医院，3年后调县中医院。2000年调回来致力治院，当时B镇卫生院全县倒数第一。那时就在医院治疗过54名确证艾滋病人，有不少是我过去在B镇卫生院坐诊看过的病人。老病号知道我回来了，就又找我看病，其中一些患者已显露艾滋病症状，我当时用中医扶正法治疗，有一定疗效。现在可以断定，他们当时已感染艾滋病，但未经检测确证。一个毕业于郑州医学专科的学生（栗昭）提出，会不会是艾滋病？建议地方防疫部门检测，果然。之后他就负责艾滋病防治工作，派到郑州六院进修半年，还到开封集中学习过。

我治疗过的病人中有我村（大滩李）闺女李桂荣，出嫁外村，症状是舌胎溃疡，按湿热症治疗，开始效果还好，冬季突然恶化。2001年死亡，48岁。类似情况有四五例。还有的症状是肺部感染，中西药结合治疗，开始有效，最终衰竭死亡。国强2001年肺部感染，高烧不退，借钱到郑州六院确诊，当时还没政策（艾滋病医疗救治政策），自费治疗。2002年医药费减免一部分，2004年2月死亡。赵英，女，40多岁，1999年找我之前，显现病症已有2年。

全院医生职工60人。现设艾滋病专科专门负责艾滋病治疗，共12人：医生、护士、行管（统计、发药）、药房各3人。镇卫生院工资没有财政拨款，靠提成。现艾滋病专科人员有补助工资，人均每月300元，太低。看其他病的医生靠提成收入每月约600—700元。艾滋病科每天就诊400多人，现在住院6人，最多时有20人。每天药费4000元左右，经费不足，病人要求日高，互相攀比，反映用药不充裕。病号CD4细胞减少了，他自己知道了，觉得活不长了，脾气暴躁，医务人员没有安全感，希望加强治安管理。（访谈笔记20050123）

**走访镇卫生院医生** 栗昭，医专毕业，大专学历，镇卫生院医生，郑州中医学院进修。

栗昭是当地第一个发现艾滋病的乡村医生，银庄滩头村人。1995年自己开诊所，2000年进B镇卫生院负责艾滋病治疗，但一直是临时工，“不在编制”。2003年10月到郑州六院学习艾滋病治疗3个月，“当时是非典时期，是北京佑安医院委托六院办班，否则就到北京学习了。”学习回来专门治疗艾滋病，是B镇卫生院第一个接治艾滋病的医生。栗昭说——

那时候真不好干，混乱得很。最初，B镇卫生院治疗艾滋病由我一人负责，很长时候其他医生不敢接触艾滋病，来了病人就说去找栗昭！一直到2003年时，他们（B镇医院里的医生）还不敢给艾滋病人看病，都说：找李大夫去看。都不了解艾滋病。

我刚从六院学习回来时，雄心勃勃，想大干一场，想搞艾滋病治疗试点，规范化管理。

但是干不下去。领导要的是稳定、是政绩，“汇报时的好效果。”开会时说要按规矩办，真有事院长、副院长都“不撑”（不撑腰，不支持）了。为了规范管理，咱坚持原则，领导还批评“你死脑子”，他要的是“稳定”。当时真是很混乱，一个病人几个本子开药，刚开罢，转一圈又来开。开药不是为了吃，开出去卖钱。“糙家”药开走了，老实人没药吃。银庄的栗庄、滩头村艾滋病病人“形成规模”了，其他医生不敢接触银庄人，都挨过打，除了我没挨过，好赖是一个村的爷们哩！

李竹园的李西京，前院、后院开药。有的医生乱开药，“落得好。”李西京在前院开过药了，又到后院我这里开药，好长时间才发现，我不给他开了。他要找事，说“一刀穿死你！”头一天用砖头砸我，砸到门框上，咱村的艾滋病人在场，用凳子砸他。第二天，他两口找到我家里找事，一刀戳过去，扎破我的西装，幸亏上衣口袋里装有工作证，没伤到人。报案，乡里要抓他，我看他可怜，又讲情没让抓。后来他又跟乡民政所长打，弄到县拘留所关起来了。出来后又来跟我“糙”，说这回抓他是新帐老账一起算，与我有关。我脱了工作衣说：“走，出去打，不讹医院。把我打死了抬回村里也不讹你一分钱！”出门我就给他几拳，正遇上咱村里几个艾滋病人中臣、毛孩、栗旺臣来医院，一起上来揍他一顿。以后老实了，怕我看病难为他，来认错赔礼。说心里烦躁，弟兄几个艾滋病都死了，家里难得很。我也能理解同情，说以后该咋瞧病咋瞧病，不会难为你一点。以后关系一直不赖。不多时候，他死了。

咱村栗均臣来胡乱开药，我不开，他找院长告状。院长批评我：你咋不给他开，人家告到县里领导郑清林那了，栗均臣跟郑清林是亲戚。立功死过两天了，他娘来开药，没给她开。过两天他老婆又来开药，我让她找萧峰（防疫站长，卫生院副院长，负责艾滋病）签字。她骂人，大骂。我怪烦。萧峰说：“你死脑子，开了不算了！”领导不撑，职工看笑话。艾滋病病人找别的医生开药，他不敢不开，他们不负责任。为了规范管理，咱坚持原则，领导不支持你。再后来，胡天理家（妻子）死后，他来找我：“兄弟，再开点药！”我就给他开，开药还不容易！原来想着有那么多人等着看病，开这些单子太耽误事，这会儿谁来开都开。一万多块钱的药很快就开完了。几天后萧峰找来了。我说你当时咋说的？不是你说开了不算了？萧峰指着胡天理说，“这就去你家查（药）去……。”胡天理家死半月后，才停止开药。他说，“医院欠着俺那一份哩！”这样越整越乱，老六砸医生，满囤开药最多。到后来，老五、中才、长山、万里直接上医院要钱。牛炎东也去，不过他能，不动手打人，说“打了还得赔。”我跟万里也冲突过一回。后来他也找着说说，咱也能理解……。

2004年镇卫生院为艾滋病起一个专科医院。我要求不干艾滋病了，说脾气不好不管干。李广说：“你不去谁敢撑起来？”撑摊，就得坚持真理，胡弄，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哄

死你!”乱,没人当回事,胡弄着过,你坚持原则,没人支持你。我提出来两个办法,第一,开药 30%—20%打钱(自费),第二,当场输水(在镇医院输液,药品不准带出去)。没人支持你。医生只管开药,不输,图省事,也怕传染。领导不支持,别的医生误解。就这样,干了几年艾滋病,又出去学习心血管。

问:你临床接触艾滋病那么多那么早,放弃艾滋病专业不可惜?

也可惜呀,但也没办法,干艾滋病没前途。待遇太低,领导不重视,没人愿意干。现在待遇:月补贴 600 元(相当正式工的基本工资),开方核算提成,每月收入 1500—1600 元。当初干艾滋病月工资 500 元,开免费药没提成。真有外出学习的机会,也不叫你去。那年“确山班”,专门的艾滋病治疗学习班,萧峰自己去了,他当兵出身,没有专业知识,去是为了看薄山湖水库风景。汴路口卫生院院长两口都去了,都不懂医,更不懂治疗艾滋病。萧峰还评上抗击艾滋病劳模。我是临时工,一直转不了正,报了劳模上级也不批准评不上。非典时期申报劳模,经我手整理 2 份材料,李广和我自己的,李广说栗昭最辛苦。因为不是正式人员,县里驳回,换成正式人员。

要说,在当地我是接触艾滋病最早的,也想搞,但是条件太差,没发展前途。乡村医生就是这,条件环境太差。很想搞好一点,提高一步,在郑州六院实习时候,一块 8 个进修大夫,都没我肯学。原先学的艾滋病知识也不白学,有用,综合治疗。除了 B 镇,外乡的艾滋病人也找我治疗。其中有一个姚琴,是六院赵主任介绍她来找我,治疗效果不错,现在集上开服装店。她又介绍一个外乡艾滋病号,很危险了,皮下瘀血,鼻子都青了,我守了三天三夜不回家,配合心血管、艾滋病综合治疗,好转了。我让他回去治疗——外乡在这治疗不免费,他回去可以免费——他不回去,又在这住了八九天,情况稳定才回去。前一阵来一个女病人,淋巴肿大,他们诊断淋巴瘤,商量着作手术。我一看就问她卖过血么?说卖过。是艾滋病合并淋巴瘤,他们不敢手术了。艾滋病病人手术镇医院不敢做,负不起责任。还有一个艾滋病人子宫瘤需要手术,请示县医院作,县医院不答复。我们镇卫生院说该手术了,汇报给你们了,你们不做,出了问题你们承担。到最后才到县里去做了。

镇卫生院为什么不做?

那不管做,这是“小公家”,那是“大公家”,出了问题,小公家承担不起。

现在艾滋病人不去医院闹了,实行个人账户了。以后会更好一些,实行“新农合”,70%报销,说以后还要报 80%,再乱开药卖不了了,就不会再乱开了。(田野手记,2005,2007,2008)

**走访村医** 2005 年冬季,老四病重,村医栗树东给他进行家庭病房治疗,访谈就在老

四家里。栗树东说——

那时候不少人不知道原因发烧，到处看，就是看不到。“那时考虑不到是艾滋病，以为是白蛋白缺少，身体没有抵抗能力，那时提倡补充白蛋白，打点增强身体免疫能力的药。”

“我个人考虑献血采的是要白蛋白，离心机分离出去的白蛋白，在上面像一层油一样。但是白蛋白是促进身体免疫功能的。没有白蛋白，免疫功能丧失。”那时没有往这方面（艾滋病）怀疑，凭着（感觉）离这病还很远着里。村里都说艾滋病在美国里，咋会在中国呢？到1999年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到2000年，滩头村的栗新臣领他叔到K市去检测，说是艾滋病，那时还不让公开。最早发病就是发烧，出汗，肺部感染，那时认为是感冒。栗合香死的最早，他去K市去检查几次，检查结果我们看了，是支原体，给红霉素，抗支原体治疗。栗可东最早是按结核治疗，拍片子有半截子的阴影，按支原体治疗，红霉素治疗一段，到最后还是消瘦死了。到哪都去看过，但是瞧不好，才怀疑是艾滋病，好多都是这样的。其实1999年，就确定是艾滋病了。不过上面不让说，我们（村医）开会时说是艾滋病，但不让说，怕民心不稳定，下面乱了。对村民说是无名低热。有的低热，有的高烧。反正就是无名发热。

问：上级知道后，采取什么样的办法？

答：上级就开始印发大量的宣传单，开始宣传艾滋病血液传染。

问：没有给予药物上的治疗？

答：到2001年才开始有药物上的治疗。俺是村医，得与政府保持一致，这事主要是牛延东跑（向上反映情况）哩。头一批发药是双汰芝，外国进口药，近期失效药（即将到保质期的药）。我们村一共3个大夫，县里派的有一个。我们现在都是免费药，老四这个病重了无法去医院了，镇医院的院长安排我，需要什么药在用药范围内基本上要保证用药。尽量满足他的要求。

问：为什么有的病人反映药不够用？

答：艾滋病药就是按照艾滋病常规基本感染的情况制定的。

问：你作为医生，你觉得国家规定的药够用么？

答：基本够用，以前是60多种，现在是100多种，咱河南还继续往上添（增加药品）。

问：你行医的过程中，接触的艾滋病人最多，离他们是最近的，你觉得困难在哪？

答：有啊，我们村是高发村，病人多，在下面扎针，护理不过来。有的艾滋病人老婆死了，小孩小，住院没有人伺候（护理）。俺这就是家庭病房，你看这个老四就交给我了。我作为一个乡村医生，尽自己的职责，交给我的病人，我保证用药，其他人用不上药，咱（我）不负责任。

这时围在门外的人群中有人插嘴：啥及时用药？都是人快死了，才赶紧让医生给瞧瞧。

（录音整理 20051202）

**村卫生室、村医和艾滋病患** 村卫生室，村民们也习惯称之为医疗室、诊所、村所。据说有规定，感染者 20 人以上的村庄政府建卫生室，50 人以上市县派驻工作组。银庄属于省重点村，村卫生室 2000 年春开建，麦后启动，时开时停。2004 年 3 月，工作组进村后，逐步正规。2006 年 5 月起，村医工资从 300 元/月升至 500/元。卫生室挂在墙上的“工作人员编制”中，共有“编制”13 人，除有本村 3 名村医，县医院和白集乡中心卫生院分别派有四五名工作人员到该卫生室工作。但事实上，派驻医生几乎没有到过卫生室。甚至 3 名村医也不能按照规定按时值班，卫生室常常铁将军把门。“只要他们穿上白大褂到卫生室来了，肯定是上面来检查了。”

银庄村里艾滋病患的治疗主要依靠村卫生室，病重到镇卫生院。他们没有被批准转到更高级别的医院去过，除非自费。治疗的方式主要是“输水”，感觉发烧了，“哪儿不得劲了”，就到村所开药输点水。这“水”，就是盐水或者葡萄糖水加消炎药，多数病人自己在家输水。

据村民说，当时高强来，答应的是银庄 4 个自然村每村建一个医疗室，现在的这个卫生室是滩头村人“跑来的”，从开建施工到前期一个时期的管理，都是滩头村几个“跑家”管事，最初的命名叫滩头村卫生室，跑来的药也只给滩头村人吃。从当时一些村里上访文字资料来看，情况的确如此，滩头村的村民代表和艾滋病人代表还组成了“滩头村卫生室管理小组”，订立了管理制度。后来这个卫生室还是属于银庄行政村，管理小组中增加了栗庄代表。莫庄和小印庄，在这些“民间”事务中从来都处于随从地位，早期这两个村庄的艾滋病人还不敢暴露。从 2002 年到 2003 年，卫生室的“管理”主要是“领药分药”，村医服从“代表”们的管理，负责开药从中拿提成。最后“分几十铺子领药”，卫生室的功能更体现不出来了，只算是若干“铺子”中的“一铺子”。

2004 年工作队进驻后，村卫生室逐步走上正规，4 个自然村每村有一名村医在卫生室工作，卫生室由所长负责，“艾滋病人代表”们的“领导”作用淡出。

村民与村医的关系一直不太和谐。村民抱怨卫生室时常不开门，领不到药。早期还发生过“砸诊所”现象。艾滋病人栗留安发病，去卫生所看病，几次找不到人，情急，砸开门锁自己进屋取药。村医说是吃饭去了，但几个人都证明是打牌去了，还能指出和谁一起打牌。但依然说留安“砸卫生所”并警告说要拘留他。“7.15”事件被抓捕的人中，有 2 人的量刑中，“砸诊所”是罪名之一。后来村医自己协调轮流值班，以保证每天村卫生室有人，但是

依然常常不按时。村医说相邻的刘楼也有诊所，“他们的诊所没开过门”，大滩李只有 50 名艾滋病病人，也有 3 个村医，银庄病人多，比大滩李村医辛苦，待遇却一样。药物供应不足，是因为上级配药不足。

我曾问过，能不能请村医给村民上课讲讲防治知识？村医说，村民素质差，发东西才去，讲课没人愿听。村民说，谁给你讲？从县里到村里，死一个少一个。都死了就不操蛋了，也不要药了。艾滋病病人栗松才说，光说病人乱胡吊捣，跟医生“糙”，还不是找不着人开药？我是村民组长，发病了找他几遍还不来哩，更不要说一般村民。医生天天不上班，说是 24 小时值班，就是找不着人，病人烧得乱蹦，找不着人开不着药，说“砸诊所”，也就砸个玻璃出口气，叫我还不砸哩！

有知情者说：当年发双汰芝，谁报名给谁，栗庄报了 40 人，村医领了 60 人份。每人 4 板，只发 2 板，剩下的村医自己卖了，每板 200 元。病号常常会领到“近期过期药”，就是村医手里的“存药”换的。“有面子的人”能多领多开药，再便宜卖给村医，村医都有“存药”。村医每人各自开有药房，有的还在镇上开有诊所。他们的精力主要在自己的药房经营上，实际上在卖艾滋病人的药。

村医中口碑好的是栗昭，但是栗昭的工作岗位在镇卫生院。栗昭下班回到村里，常常被村民请去看病，“反正闲不住，都是乡里乡亲，只要有时间谁叫都去，给他们瞧瞧调调药，他们几个村医不懂得对症治疗，只会千篇一律的输水。”栗昭说。

### 历年病患举例

**2005 年，莫宪友父子 3 人发病死亡** 2005 年初冬，60 多岁的莫宪友发病躺在秫秸庵棚里，当时他的两个儿子海峰、海民，在外地打工病发，回到村里在镇医院治疗无效，已经死亡。不久，莫宪友死亡。

**2006 年，栗松才弟兄 2 人发病死亡** 2006 年，快过春节时候，我来到村里。一来就听人说栗松才病了，但松才要强，自己说没事，还一直在村里忙着发被子。那天到他家去，家里人说他“睡哩”，看来真是病了，就没有打扰他。第二天在村头小铺买一筐鸡蛋去看望他。栗松才在里屋床上躺着，说：好了，没事。麦前开始发烧，时断时续。从昨天开始已经不烧了，就是蛋白低，输点免疫球蛋白，今天又买去了。这一回已经又花了 5000 多元了，自费，靠 B 镇卫生院，死罢了。拉 B 镇（卫生院）没一个活着回来的，就不给你用好药，得靠自费花钱用药。唉，先前从十七八岁当劳力就没“瓢”过，谁怕过啥？现在不说了……。后来向村医问起栗松才的病情，村医说，打针都不好扎了，肉都“糟”了，情况不好。恐怕活不过今年。松才自己显然不愿正视这一点。当年 3 月 19 日，栗松才的哥哥死了。松才的哥哥



身体看上去还很强壮，“很快，发病十来天就不行了。”那时候，松才倒是像缓过来了。及至10月间我再次来到银庄，栗松才也已经不在了。我没有能够参加他的葬礼。我还记得以往的每次葬礼，村民组长栗松才都会在喇叭上喊：老少爷们，出殡哩，出来帮帮忙吧……。那喇叭就安在松才家的房顶上。

**2007年，王化学出院回家等死** 村支书栗卫华说：7月间莫庄王化学病重，村委会出面替他要求转院治疗，镇卫生院不同意，说“从来没有转院的先例。”王化学的家人送他到郑州六院，住了2天，花了几千元，钱花完了，只好回来。又拉到B镇卫生院住了一天，出院回家等死，过一天就死了。莫昭红（莫庄村民组长）找栗华中（艾滋病自救小组组长），想以艾滋病小组的名义出头，管王化学的“闲事”，让B镇卫生院报销王化学在六院的治疗费，卫生院要转院证明。你卫生院不给开转院证明我们咋会有转院证明？最终，以村委名义，给王化学家送去200元，从村办公经费里出。今年（2007）又死好几个，老歪、诸老二都不在了。

**2008年，发病在床的诸凤枝** 滩头村诸凤枝，55岁，发病在床。她说：年前头十月（农历）发病，现在二月，4个月了，喘。上个月病重了，正月十九不能走了，今天二月二十，整一个月。输点蛋白好点，不输心里难受，输五六个（支）了，一个680元，涨价了，最早时候200多元一支。今儿才输罢一个，不哩（不然）跟你说不成话。光到镇卫生院瞧不管乎，“天天挂那水，西林、头包曲纳、皮条针管，没其他啥药。好药开方子去买，自费。生麦、黄芪、阿其美素，都得自己花钱买，花了600多元。国家是好国家，电视上演的，没少拨钱，没用到咱身上。”丈夫牛俊光，1998年死罢了，正月十六号，那时候没有“本儿”，才没有人管哩。栗新臣他们告四五年才“揭开。”他爸死时，闺女才10岁，现在初中毕业出去打工2年了，挣的钱为我看病花完了。娘家兄弟也都给钱，说给我买个蛋白。（发病）一阵上来，热得不行，汗啦啦流，输上蛋白，“大功起来了”（药效起作用了），不出汗了。（田野手记20080327）

这里人们说的好药、蛋白、“营养药”，就是血液制品白蛋白、球蛋白，当年他们廉价出卖自己的血浆，现在又高价买回这些用血浆制成的“蛋白营养药”救自己的命。

### 北京大医院的药物临床试验：官耶？民耶？

**现在主要是到大医院作试验** “下星期三北京医生来采小血<sup>①</sup>搞临床试验，刘老师你说是不是可以呢？”栗可贤问我。他说：“是北京四家大医院共同搞的。国家开展抗病毒治疗后，病人对游医的兴趣减少，游医来得也少了。现在主要是到大医院作试验。”说这话时，

<sup>①</sup>采小血，也称抽小血，即抽取化验血样。相对于卖血的大量抽血。

是 2006 年初冬。

“怎么找到你呢？”问他。

他们委托郸城县一个血队长，也是艾滋病人，当地的地头蛇，联系上我。说是郸城已经搞了，想叫我再找 150 人，检查合格了到北京免费治疗。阴历七月就联系了，我当时不太相信，吞吞吐吐没找人。八月十五，郸城俩人带着月饼来了，说开善心，给大家办好事。当时忙着收庄稼、种麦，又搁下了。后来他们又来了，我说还没顾上哩！他们催我快办，一切费用都是人家出。于是我找黄庄的一个艾滋病人，俺俩一块去找人，一共找了 123 人，全乡范围，找的人都愿意，有的是听说了主动找来的。咱庄董 XX 走亲戚回来还跟我吵，说咋不跟我说！但是不知道还行不行，她没有参加肝功化验。人家要求先作肝功，转氨酶 150 以下，年龄 18 岁到 60 岁之间。肝功化验分三批作罢了，人家觅车来把人接到县卫生院作。化验前空腹，作完了人家管一顿饭，到街上小馆吃包子。后一回是每人发 5 元早饭钱。现在又联系说，专家小组再来一次抽小血，化验 CD4 和病毒载量。这两项合格后，本人再上北京作全身检查，合格后就能参加药物治疗试验了。如果住北京治疗，人家全费负责，如果不想住北京，人家送药在家服用。这次他们北京来人的目的，就是抽小血拿回去化验，血样必须在 6 小时之内化验。郸城的 150 人，已经完成了。下周三来咱庄。

“这么多人抽血，在什么地方？”来栗庄村室。“卫华知道吗，乡里知道吗？”给卫华说了，卫华同意，说这是治病哩，他（指乡领导）不叫干咱勳他。

“为什么要给我说？”想问问你这事管干不？管不管（能不能、可以不可以）组织这些事，违法不？怕乡里阻止不允许，说我们又上北京告状上访，怕去不成，怕他们说北京咋会知道这里有艾滋病？还不是你们告状……。

几天后，北京佑安等 4 家医院三辆车十六七人，直接到栗庄抽血样。早上 7 点半至 9 点抽取 80 人血样，抽完走人，“速战速决”。9 点半在镇上被派出所和镇卫生院截住，扣留五六个人在卫生院。栗可贤说：怎么扣住了？我们愿意让人家检查。B 镇派出所说：没通过当地政府和卫生部门。对方说：通过省卫生厅了。镇上要求追回血样才能放人，说：“我们化验过后，结果送过去。”他们只好送回了 11 个血样，只说是一共抽取 17 个。“镇上放了他们的人，也没有找村里麻烦。”栗可贤说。（田野手记 20061103）

镇防疫站长说，搞药物试验有程序，应当从北京上级部门安排省卫生厅，再一级一级安排下来，最后安排到我们乡镇卫生院。但是他们都是自己搞，“背着”我们。

2007 年夏季的一天，我在北京开会，接到华中电话。他很兴奋，说，刘老师，我们也在北京呢！“来搞科研，抽血试验。”我赶到 302 医院去看他们。他们已经抽完血样，吃过饭，

正准备被送往火车站。他们一行 30 多人，前一天出发，日夜兼程，先乘汽车再乘夜间火车，一大早赶到北京被送进医院“抽血试验”，“管一顿饭”，即刻被送往北京火车站返回。跟来时一样，没有卧铺，硬座。连续几十个小时路途颠簸，而他们全是身患重病的人，其中一对年轻夫妇还抱着一个 3 岁的孩子。华中们却很知足：坐车不要钱，还管一顿好饭。一群人被送到北京西站时是午时 2 点，离开车时间还有 4 个多小时。他们没有进候车室，被带领着坐在火车站地下大厅的地上（照片 38），平和安详，有人实在累了，躺在地上睡着了。还有那三岁的孩子，包裹在父亲的上衣里，在地上睡得很安静。过往者不知道，他们是正在为“拼命”拼死一搏的艾滋病感染者。他们衣着干净整洁，表示着对首都北京的尊敬。

此事经办者告诉我，这是最后一次检测化验了，一共检测过 4 次。以后实验药“三黄散”就算成功了，可以进入市场销售了。以后还会给这些人用药吗？问他。答：“那不会给了，这是最后一次给他们用药。”成功了就算完事了？不知道有没有法律规定保障这些参与试验者的权益。

**“搞科研”的队伍，又出发了** 2008 年伊始，村里又有人去北京“搞科研”。还是通过栗可贤联系的，这次有一定“补助”。栗可贤说：联系人是 K 市的李科长，市人民医院退休干部，65 岁。北京方面委托他，他找到我。搞不清是官方还是民间，可能是民间行为。上次是四大医院：地坛医院、302 医院、广安门医院、佑安医院，吃三黄散，用药的人都反映不赖，感觉身体很好。这次是 302 医院和佑安医院两家，这次用的药主要是治病毒载量，也有说是打疫苗针，我也说不清。抗病毒药不停，观察效果。一共 13 人。302 医院 8 人，每月发误工费 1000 元，管住不管吃，每天发 20 元生活费。佑安医院 5 人，发误工费每月 1500 元，管吃住。先体检，合标准才让去。要求标准是，CD4 在 50 至 400 之间，病毒载量不低于 5000。第一批体检 10 人，第二批 24 人，共 34 人，合格 16 人，后来又打下来 3 人，末了剩 13 人。我属于 16 人，最后打下来了。打下来 3 人原因，栗来增说在家服药时断时续，牛炎亮查出肝癌，让回家治好了再去。我是因为带领大家跑得多了，受了风寒有些发烧，也说叫我治好病再去。村里病人都愿去，老五在佑安医院拿回来一本书，找村医看了，说中（还可以）。老五打回来是因为病毒载量 50，不够高。我的是 5300 多。合乎标准参加试验治疗者，还要签名。都不识字，也不知道人家那上头都写些啥，反正都签名同意。医院要求参加的人要遵守制度，不能乱回来。到那里抗病毒药依然服用，查第一批服用抗病毒药的效果。佑安医院的张主任（女）说这次药物很紧张，接收不了很多人……。

栗可贤跟我说以上那些话时，看上去人很瘦，眼窝深陷，他说正准备去“输水”消炎。几天后，2008 年 03 月 26 日，栗可贤病好了，又带 22 人去北京“搞科研”“作试验”。他来

找我借照相机，说想拍点照片“留下证据”。这次村里去了不少人，又是住在北京，家里人都很关心这件事，不断有消息传过来。有人说效果不错，作“腰穿”，抽骨髓查免疫功能，“比在家时候吃饭好。”也有人说，在腰上打个眼抽骨髓哩，某某人瘦得很了……，言语之间似乎很有些担心疑虑。

### 三 村庄的变迁

这里所谓“村庄变迁”，主要是指村庄人口和婚姻家庭“显在”社会结构的变化。<sup>①</sup>

#### 婚姻

村民说：现在村里“成媒难”。当时没赶上卖血的小一茬的，现在二、三十岁的，都出去打工了，回来成不了媒。在外“自谈”的有几个，不敢跟人家说实话。有一家媳妇怀孕了领回来，全村帮着瞒。从2004年至2005年，这两年这样出生的孩子大约有五六个，户口还都“黑着”。“现在村里年轻人成不了媒，生的没有死的多。”

在银庄遇到过2次婚礼，一次是嫁闺女，一次是娶媳妇。都是“迁出”。

2006年正月初八，瑞雪。滩头村一家女儿出嫁。新娘家里宾客满屋洋溢着喜庆的气氛。新娘白白净净，穿一件大红羽绒服，很幸福地笑着。新郎是湖南衡阳人，长得很帅气。这是一对在广州打工恋爱的青年。一辆中巴车载了一对新人和娘家宾客，一起到城里饭店参加婚礼婚宴。连包车加酒席，大约化费一千多元，由新郎拿出。婚后新娘就要跟随新郎远走湖南，那是一个跟自己家乡完全不同的地方。“以往的闺女，从来没有出嫁到那么远。”

两天之后，正月初十，栗庄栗可良的儿子娶媳妇。新媳妇不进栗庄村。“咱村名誉太坏了，不敢来。”栗可良是栗庄的养子。栗庄人对可良评价很好，说他尽了养子的孝道：可良的养父母都不在了，是可良为他们养老送终。他又养了叔叔，直到为叔叔送终。栗可良原本是栗庄的“迁入人口”，而现在他的儿子结婚，要结到栗可良原来的老家X村，不回来了，“迁出”了。响器吹吹打打把宾客彩礼都拉走了，婚礼待客也都在X村，新房也盖那里了，从此在那安家了。对此，栗庄人都能理解。（田野手记20060207）

#### “组合家庭”

“都是艾滋病人，一家男的没了，一家女的没了，合拢一起过，相互有个照应，谁也不嫌弃谁。”银庄人将这样的家庭叫做“组合家庭”或者“重组家庭”。最早的组合家庭，是女方死亡，男方在村里再重新“组合家庭”。而男方死亡，女方为了能够生活下去，只有选择“走了”，嫁往外村，孩子有的被带走，有的被撇下。有的“走了”又“拐回来”了，她们

<sup>①</sup>这种变化必然对村庄“潜在”的社会文化变迁发生深刻影响，但是现在讨论“潜在影响”似乎还为时过早。

不忍心撇下孩子，或者无法忍受新家庭的歧视。渐渐，丧偶的女方也开始在本村“组合家庭”，叫做“招夫养家”或者“招夫养子”。她们“不好走了”，家里有老人、孩子需要照顾。她们自己也大多有病，留在本村，可以享有外村一般享受不到的优惠政策，最重要的是，不受歧视，乡里乡亲知根知底，有困难互相帮衬。最初，是本村破碎了的家庭重新组合，后来外村人开始被“娶进来”或者“招进来”。双方都是感染者，“谁也不嫌弃谁，也不再‘祸害’别人。”

见到滩头村牛延东时，他正在盖房子。他的妻子因艾滋病去世，弟弟也因艾滋病去世，他与弟媳“重组家庭”。正盖的房子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兄弟 13 岁的儿子。他说，1999 年老二发病，2000 年死了。小孩妈 2001 年发病，当时治疗条件不好，发烧控制不住，当年就死了。老婆死后，她（现在的妻子）那边有想法，想让我管她的闲事……。“啥是管她的闲事？”问他。就是帮她干活，操她的心，共同生活。盖房就是帮她。我说你该走就走，那怕帮你几千块钱哩……。后来爷儿们家也都劝我，撮合，就“组合家庭”一起过了。从 2001 年起，在一起三四年了。她不用操外面的心了，种子、化肥，都是我管。我不做饭，她管。她也有艾滋病，互不嫌弃。我们都发过病，症状就是干咳、肺部感染、皮疹、抓烂流脓……。村里还有组合家庭，马恒和金贵，也都有艾滋病。（访谈笔记 20051204）

栗庄的栗长山和刘玉花也是“组合家庭”。刘玉花，30 岁，一个漂亮的年轻女人。手里在编织一件毛衣，这在中原农村不多见，她说是在广东惠州学的。那时候她还跟前夫在一起，他在惠州打工。刘玉花的两个儿子都因母婴传播感染艾滋病，“大的 7 岁时死了，不在已经 4 年了。”说着她眼圈红了，“小的今年 6 岁，发病几回了，差点死了。”刘玉花与前夫长期分居，“他嫌弃我们娘们，不管孩子。”现与栗庄栗长山同居 2 年多了。刘玉花跟长山是看病时认识的。“他帮助我上医院领药，领最好的药。不认识人领不到手里，他成天在那‘糙’惯了，能领着药，不给怕跟他们糙。我的孩子小，有病，我现在就为这孩子活哩，有人叫妈也是一种幸福。”说着，眼圈又红了。他（前夫）不愿离婚，又想要孩子了，我不要他的钱给孩子治病，不想跟他“搀合”了。

他们各自原先的配偶都还在世。长山前妻也感染艾滋病，在外地打工，据说也有相好。长山说他和玉花一路到汴路口法庭问过。人家说离婚还得花钱，400 元。不胜这样慢慢过吧，谁知道活到啥时候？要是离婚，俩人得 800 元，结婚还得待客花钱……。

类似这样的“组合家庭”，栗庄当时还有 5 家，这些“组合家庭”大都没有办理婚姻登记手续。（田野手记 20060208）

### “迁入”与“迁出”

这一时期，银庄人口的迁入与迁出大多与艾滋病疫情有关。以上两场年轻人婚姻，无论嫁娶，都是“迁出”，而“组合家庭”都是“迁入”。“组合家庭”迁入的人口不单是对方，还有对方的子女。一些本村出嫁的女儿，由于感染艾滋病在婆家遭歧视，或者婆家不容，带着孩子回娘家村定居，也有举家迁来银庄。

个案1 与栗可峰“组合家庭”的秀玲，婆家慧庄，距栗庄8公里，带来两个女儿，栗可峰与秀玲又生一个儿子，已经6岁了，身体健康。

个案2 栗爱玲，因为感染艾滋病婆家不容，带女儿回娘家栗庄，夫妻感情很好，丈夫时常来居住，据说已被感染艾滋病。

个案3 栗满囤夫妇都是艾滋病患者，自己有3个子女，又收养外村妻妹家的3个孩子。其妻妹因艾滋病已经死亡，连襟也是艾滋病患者无力照看孩子。

个案4 莫昭红之妹春花一家3口艾滋病：夫妇2人和8岁儿子。举家迁来莫庄投奔娘家哥哥，住娘家侄子的房，种娘家叔的地。叔婶艾滋病死亡，子侄们外出打工。春花婆家李宋庄，距莫庄15里，更穷。春花家挖土卖地治病，一亩多地卖了3000多元，土卖完了，现在无房无地，生活无着，只好来投奔娘家。春花的丈夫弟兄3人皆感染艾滋病，死亡一人，另一人在家领着几个孤儿坚守。

这些“迁入”人口，大多都将户口转入银庄，以便享受艾滋病重点村的优惠政策。村支书栗卫华说，他们当地艾滋病少，遭歧视，没有政策，穷，过不下去。咱这艾滋病多一个也不多，少一个也不少，发东西，吃药如同本村人待遇，享受低保，将来死了，子女还能享受单亲政策，这些在别处享受不到。享受的政策待遇都是国家给的，不影响本村人利益。像莫昭红的妹妹一家，住房、种地都是自家外出打工的弟兄匀给她的，也不影响别家。（田野手记20070624）

### “流落在外的人”

晚饭后，村人常常会聚在我住的小屋里聊天到很晚。他们悉数“流落在外”的乡亲：早年流落在外的是那些出身成分不好的人；后来不讲成分了，流落在外是为了逃计划生育；再后来，是艾滋病流行以后外出打工。

栗新臣说自己早先一直在外到处“流窜”。“成分不好，跟现在的艾滋病一样，赖（名声不好），不好成家。”31岁才在贵州结婚。改革开放不讲阶级斗争了，回来在县城一家小厂打工，后来“跑艾滋病”才算回到村里。栗新臣还有一个孪生兄弟，倒插门入赘外村当上门女婿。因为计生罚款不敢进家，急眼了用剪刀捅死了村支书的儿子，枪毙了。两个侄子跟着栗新臣在栗庄长大。栗新臣死去的堂兄弟栗干臣更是多年流落在外。

“计划生育跑出去的，最多的是到山西晋城。太原、侯马也有人。在那干建筑队、开饭店、拾破烂。在那咱村的人可多，那时候计划生育罚款太厉害！”牛俊营 5 个孩子，卖血不够交罚款，携妻带女历经 9 年“计划生育大逃亡生涯”，在山西晋城打工，最小一个男孩出生在晋城，他说，乖乖，爹终于在这儿等着你了！当时与牛俊营一起打工的弟弟牛工应，后来入赘打工地山西晋城。牛俊营的父亲也多年流落在外，后来就断了音讯再没有回来，村里传说他“犯了事”死于非命。还有最南头那一家，缴不起罚款，计生大队用推土机勦倒了他家的房，都有十几年了。人到新疆打工，再没有回来过。

艾滋病以后，村里人的“流落地”是山东威海，“跑去在船上给人家打渔。”华中说，我二哥和老支书的儿子在那里合买一条船打鱼，女人养貂。在那里的还有满囤的弟、树东的弟、进才夫妇，诸老二的俩儿子，莫庄的莫红军等，都是艾滋病。华中一度也想到威海去，“想让二哥给办个貂场，去看看，说买房子不如租房，最少可以租 10 年。”村里不少人到那里看过。“咱村人都在那哩，都在一个码头，他拉巴（帮助）他，他拉巴他，互相拉巴。住处离海几里，打渔开小手扶过去，半小时路程，小搭拉头（小手扶拖拉机），必须带斗子才能开的那种。住的都是炕，冬天不冷。”每逢夏天，有人会从威海回到家乡银庄“歇暑”，“7 月 1 号那里放假歇暑，海里鱼繁殖下子，渔民补网修船。咱村人回家‘玩’几天再过去，一般会住到月底。”此外，还有年轻人小姑娘到上海、广州、深圳打工，还有人在北京搞服装。浙江黄石也有艾滋病，咱村里有人在那里摆摊卖小吃。

至今，银庄在外的最大的两个流落地点，一个是山西晋城，一个是山东威海，不少人留下安家。（田野手记 20070606）

#### 四 故事经典

##### “艾滋病你想得也得不上，艾滋病在美国哩！”

“民”是一个死去多年的银庄人的名字。这个名字被他的乡亲们反复提起，成为银庄历史中抹不去的记忆。

民是银庄第一个被查出感染艾滋病毒的人。1992 年 10 月，民的名字出现在 Q 县中医院的“通知”布告里，说他以后不能再献血了，因为他的血里有艾滋病病毒，上次卖出去的血浆，已经从上海打回来了。当时村民们都说，胡蒹（胡说八道）哩，咱中国哪有艾滋病！第一咱不搞性交，第二不和外国人接触，咋会传播艾滋病？民去问村医栗树东，栗树东说，能（逞能）哩你，艾滋病你想得也得不上，艾滋病在美国哩！民因为献血验不上，觉得很没有面子，就到邻县血站，又让干（卖血）了。回来挺得意，对人说：“这不（血）又合格了？”

后来民多给 5 元钱挂号费，县血站就也让他干了。关于“民”的故事，栗老五、诸老二们都对我讲起过。

栗老五说——

县中心医院贴出来的有告示，说有 3 个人的血有艾滋病病毒，其中有滩头村的民，说以后他们不能献血了。民就拿 10 元钱挂号费（原定 5 元钱），龚志宾的妹妹（血站站长的妹妹，负责挂号收费）就又让他上床采血了。当时大家都不懂，咋有这种病啊？。人们知道民血里有艾滋病，都耻笑他，说他想女人了啥的，都不知道艾滋病是咋回事。当时还想，不是说他的血不能献了，咋还献啊？（访谈笔记 20050122）

诸老二说——

早年在郑州啤酒厂卖血时，就知道民的血有问题，但不知道是啥问题。以后民还到郸城、项城、Q 县、周口继续卖，还有开封。2001 年民投坑塘自杀死了，身上长满大疙瘩，已溃烂，死时 45 岁左右。（访谈笔记 20060208）

“民”的近邻向我讲述民的死亡——

“民儿”那天夜里投塘，塘里水很浅，他搂着一棵树不上来，冻死了。他女人半夜敲我的门，说民找不见了，找我借灯找他。他近门的几个人打着灯找民找了很长时间，坟地、树林都找罢了，不见人，最后想起坑塘。找到时人已抱着树死了，用棍子硬捣开，拉上岸。死时是 2001 年。（田野手记 20080318）

“民”就是发烧受不了了，浑身起疙瘩，受不上去了，自杀。那时候没有钱，“民”（病中治疗）连一分钱都没花，清等死，连一针退烧针都没打。蹲坑里树跟前冻死那了。（田野手记 20080327）

### **“打哄哄去卖三四个，染上艾滋病”**

栗华中，1975 年 3 月 21 日生。最初告诉我他开始没有去检测，因为身体好，想着不会有事。后来又说，其实检测出来了，但是不相信，直到差点眼瞎了……。“我献的少啊，打哄哄去卖三四个，染上艾滋病！”他说——

我小学毕业就出去打工，回来看村里有血站，俺这“一行伙”（一伙）人多，赶集看人家干得“起眼”，几个人玩哩一样，也卖了几个。除去挂号费、路费，几个人一起吃吃喝喝花光了。“一吃一喝啥也不落，落了个艾滋病。还不胜不回来！”村里办血站时候，热闹得很。办小旅馆（村民家里收住外村来卖血的人），开小饭店，卖茶鸡蛋、卤肉，吆喝着。都传着说，谁谁谈了对象——外村大姑娘小媳妇都来卖血。我也认识了好几个来卖血的外村姑娘，寻了这个（妻子桂玲）。我二哥也卖了，他没检测，在威海打渔。



栗华中不大说自己的病，倒是常常说起他那些已经死去的堂兄堂弟父老乡邻。他说，卖血，传染艾滋病，还有肝病，多少人都死罢了，比起他们，我活一天赚一天。华中也不抱怨命运不好，反倒说自己的命不算赖，因为卖血，他认识了他现在的妻子，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女双全，“好命啊！”华中甚至说。闺女、儿都有了，按农村风俗，“想啥来啥”，我……，命不算赖，命真不赖！一次张可医生和我一起来到村里，华中要张可替他“查查”。张可伸进他棉衣下摸查腹部，说：肝不好，要注意营养休息。华中说：“咦，毕了！赶紧干，得给孩子多留几个……”他拼命做炮捻挣钱，为了妻子儿女。村里有人怀疑他的妻子和孩子已经感染艾滋病毒，“他那儿子光长肚子不长个儿。”但是他的妻子、孩子都没有检测。“不检测，真要都成了艾滋病了还有啥过头哩？！”华中一家5口，日子过得艰难，但是相亲相爱。

### **“我卖血能卖得不要命……，差一点还卖皮哩！”**

牛俊营是村里少数卖血而没有感染艾滋病的幸运者之一。他15岁开始卖血，他的父母、妻子，也都卖血。母亲和妻子感染艾滋病，已经死亡。牛俊营说：“我卖血可值，比任何人都值。值过（值得）！”此话怎讲？“第一没感染艾滋病，第二置办家具（家当）不少，西边、东边盖房都是卖血置下的！”“我初卖血时，胳膊一伸，人家说不中！没长成人。就这，卖了十几年！他们十个八个也没我一个卖得多！”牛俊营说话很自信很自豪，他甚至说“我卖血卖得不要命。卖血算啥？我还差点还卖皮哩！那一回在驻马店烧伤医院……。”村里人说他“吹呼。”

牛俊营自视甚高，“要是家里不是那么穷能多读几天书，我应当是有所作为的。”他说。就是卖血，他也自认比别人卖得“精彩”，比别人“有水平”，“会打时间差，比别人卖得多。”他形容自己当年卖血卖得“神采飞扬，出神入化！”牛俊营没有感染艾滋病，但他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当年卖乙肝血更贵，作疫苗。他两种血都卖，“当时乱套了，胡采不验。”他一个人办了多个献血证，一下摊开在妻子面前说，这是咱家的银行存折！有人说他就是因为后来逃计划生育在外，最后几年没卖血，没感染艾滋病。可他自己说后来还是断断续续卖过，只是卖得少了。牛俊营好像总是憋着一股子气，每每慨叹自己怀才不遇，时运不济。他看似很谦虚实则很得意地说：我对生活要求很低，不漏房、不断顿。18岁盖起5间房，置下架子车、自行车，还喂个牛。“干得不赖！”他评价自己。“我最多一次一针抽1500CC，全采！”我说诸老二说他一天还卖过5000CC呐。牛俊营很不屑，说：“他那是单采，还回输回去，而且不是一针抽的，我这是一针！”他很为这次壮举自豪：“清一叠子5块钱的新票子数给我！”但是接着又说：“出了医院门车都骑不动了，一个小孩子都管叫钱短（抢）走……。”可他还

是说：就这，值过！

牛俊营亲自动笔描述他当年卖血的经历送给我。这是一份难得的当事人亲笔之作，除个别错别字和标点符号略加改动，原文录下——

刘大姐好！见字如面。

现在就我开始卖血及到结束这中间的一些情况给你作一叙述。

牛俊营，男，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出生于 1965 年 2 月 11 日，身份证号码 4127819650211\*\*\*，住 Q 县 B 镇镇滩头村村，现年 41 岁，农民。<sup>①</sup>

我于 1979 年 10 月开始卖血。当时我还是个孩子，由于生活的压力和家庭的因素，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不得不选择卖血。第一次卖血是在淮阳，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那天血队长对我说有一个手术需要血，我去县医院配血合格后就在手术室门口等着，过了四十分钟左右，护士就把我叫了进去。当时我害怕得要命，心跳得咚咚叫自己听得一清二楚，感觉自己马上就要晕过去了。采血后他们给了我 58 块钱，我手握着自己第一次卖血的 58 块钱，也不知道自己卖了多少血，事后他们告诉我是 580CC。那个高兴劲就别提啦！当时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在此之前我在轮窑干三个月活才挣 58 块钱。在那种情况下我开始了漫长的卖血生涯，这一卖就是大概 20 年。我卖血去过淮阳、Q 县、郸城、许昌、郑州、上蔡、B 镇、鲁台、大连、新站，从开始到结束，一共卖有 2000 斤血。

我卖血疯狂的时候几乎不要命，高峰时我卖得头重脚轻，一个小水沟有半米宽我就跨不过去，睡觉的时候头颅耷拉到床底下。最严重的一次我卖得几天不能吃饭，心里想吃荷芭蛋，就让人给我去买，结果吃了没有十分钟就拉了出来，吃进的是鸡蛋拉下来的还是鸡蛋。队长说你回去吧别死到这了！我说没事，如果叫我走可以，你再让我卖一次。就这样我又卖了 300CC 才回来。那时卖血每顿我只吃 3 毛钱的饭。

我卖血能卖得不要命，为改变我的生活状况。我经常往脸上抹胭脂，以免脸色难看，别人不买我的血。后来我卖血卖出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可以说出神入化！无论病人病情怎样，我一看就知道他（她）是啥型血。有一次我去鲁台卖血，当时说妇产科要 500CC。我配血合格后在正准备采血的时候，又来了一个急诊病号，是服毒药的。当时医生说叫队长赶快找血源！正值麦收，队长说，等血型出来后就去。我和队长说咱们去看看他是啥血型的！队长说化验结果还没出来。我说还化验啥，我看看他的脸就知道他是啥型的！队长不信，我说咱去看看不就知道了？俺俩去一看，当时我就说别去找了，我就行，百分之百是 B 型的！队长不信，结果过有十分钟，结果出来了，就是 B 型的。那一次是我卖血最多的一次，我一次卖了

<sup>①</sup> 这番自报家门的开场白，大约来自“7.15”事件被捕关押时写交代材料的经验。

1500CC，整整三瓶！别说是病人，就是正常人，我一看也知道他（她）是啥型的。不说看脸色，就是看风向看天气，我也知道啥样的病人多。据我自己的实践经验而论，每逢刮东北风我就赶紧去淮阳，到那一定收获颇丰，一定是个满园彩。

以上所说的都是我卖全采血的经过。

单采浆是从淮阳体检才开始的。那一年我和妻子为了自己有个窝住，挖了一个春天的砖坯准备盖房子。当时手里只有700块钱，我和妻子商量着等砖坯挖好后再借一点钱买车煤，自己烧一窑砖就够盖房子用的了。可是人算赶不上天算，一场大雨把我们一春天的辛苦劳动化成了一堆土，房子成了泡影。只好又去卖血。到了淮阳才卖了一次却赶上了体检身体，因我有乙肝只好回家。那时候我感到世界已经到了末日，天快要塌下来了，已经到了绝望的地步。第二天我心情灰暗地去淮阳西关搭车，到那车还没来，就顺便吃顿饭。饭吃到快完的时候，来了一班郸城到许昌的班车，当时我脑子突发奇想，反正事就是这样了，希望也没有了，不如拿手里的钱出去溜达溜达，碰碰运气。内心想溜达和卖血各占一半的分量吧！于是我就去了许昌。到地方大概是下午四点钟左右，我找了个2块钱一夜的旅社住下，然后到外边溜达，就见路边一块牌子写着：专收乙肝血！我高兴坏了，当即坐1路公交车去了光明路口，下车后，我到魏都区防疫站乙肝运输站一打听，人家真的说是收乙肝血。“但是今天不行，今天是星期天，你明天来吧！”有了这个消息我深深地感觉到了，上天有好生之德，天无绝人之路，绝处逢生的真正含义。我赶回旅社，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的睡不着，不经意间在床下摸到一本书，是本杂志。这一夜我几乎把这本杂志看了两遍，同时脑子里、心里也有了希望——房子。第二天我早早地等候在血站，一检查，合格，当天我就挣了90元钱。就这样我卖了一个多星期。腰里鼓胀到700多块钱的时候，我急不可耐（耐）地回家，想让我妻子也分享一下这个喜悦。一到家，掏出钱，妻子一看眼就直了，她不相信这是真的！数过钱后妻子就说：“这钱你不是偷的吧？咱再穷也不能干丢人的事。”我把事情的经过和妻子一讲，她也非常高兴。就这样，我卖血的事业又一次达到了高潮顶端。

我这个人无论干那（哪）样的事，我都干得精益求精。我很会投机。卖着卖着我就不满足现状了，于是又一套好方案在我的心里形成。我第一天从Q县坐早晨四点半的车去许昌，到许昌早了正好是11点半左右，不耽误采血上最后一轮床；第二天早晨我从许昌乘4点48分的火车去郑州，在郑州上第一轮床采血，下床后赶快赶往许昌，赶到许昌上最后一轮床。就这样我往返于Q县—许昌—郑州，打这个时间差。

在短短的八个月的时间里我足足挣够了盖房子的钱，2万元左右。我的房子是1992年2月动工，4月20号左右竣工。这期间我卖血也出现了麻烦，因为早不晚的出现了不合格的

现象（乙肝指标达不到）。经 Q 县医院医师王秀巧介绍，说吃西药胺茶碱可以损坏肝脏。于是我就拼命吃，只吃得浑身上下懒得不能动，到最后也还是不合格，也就不吃了，反正房子也盖好了。

就在房子盖好，住了新房 3 个月以后，一场计划生育大逃亡也降临到我的身上，于是我携妻带女开始了历时 9 年的山西逃亡生涯。在以后的时间里也断断续续地卖，不过是偷偷回来卖，直至血站停。

以上是我卖血的经过。谢谢。

俊营

2006 年 5 月 23 号

### **兄弟情深：“我手上拴根绳子，要我哥拉着……。”**

2005 年冬天，在广州当兵的栗扩军赶回来为哥哥栗建军奔丧。他说——

5 号接到家里电话，是堂哥打来的——还欠堂哥 5000 多元，这次哥哥治疗又花了 1 万元，没有钱又借堂哥的，才跟我说——我才知道哥不行了。我 5 号接到电话，7 号下午 4 点赶到家，就是前天晚上回来的。哥哥等着我回来，我回来的第二天上午哥哥就走了。这次哥说：“以后孩子拖累你了。”两年前嫂子走时说：“兄弟，实在不好意思，把你花空了。”嫂子死在广州，我在广州当志愿兵，哥嫂一家来广州卖水果，发病治病没少花钱。这几年大约补贴哥哥 3 万元。嫂子病在广州，治病花了 8000 多。我老婆说：“你对你哥比对我还好。”“那没办法，他是我哥。”我守我哥一夜，我妈让我去睡一会，我不去，我就是回来守哥哥他哩！坐一路车、火车、汽车，实在太累了。我在手上拴根绳子，要我哥拉着，我说我要睡着了就拉我。我一直守在床边。现在我哥不在了，他终于解脱了。

我不能忘了哥哥，给我寄过 500 元，虽然我当时又寄回去了，因为知道家里穷。那是 1993 年我考上了徐州空军后勤学院中专班。家里的老宅可以说是全中国最烂的。我父亲 1989 年死于冠心病，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穷得很。1985 年盖房子，一头驴卖了 160 元买瓦，还差 60 元买不起砖，盖成土坯房，3 间，之后又盖了偏房，我当兵前就塌了，倒掉了。我上高中一年后当兵。我初中时是重点中学前三名，88 元学费全免，一位老师替我说话，我感激他一辈子。但当时我什么都没说。当兵后考军校，前几名。现在是 7 级军士，业余在广州中山大学学习法律，我要报考律师，我一定能考上，一定要考上。

在广州有几个老乡朋友，过去常一起聚聚。自从嫂子在广州生病，电视台采访之后，大家都知道了，他们都不与我联系了。现在我不知道能不能把老母亲带走，她高血压、心脏病，

我要照顾她。但她走了，这几个孩子怎么办？都带着我负担不起，我这几年没有积蓄，我自己还有一个小孩。临走时要给几个孩子作艾滋病检测，起码以后他们到舅舅家去人家放心。

（田野手记 20051209）

在栗建军的葬礼上，扩军看我在抄写礼单，就说刘老师需要就把礼单拿去吧。礼单写在小学生写大字的练习本上。临行，扩军又找我抄礼单，“人情要记下，日后好还礼。”他要回部队了，走前还要和窠楼村的舅舅一起给 3 个孩子作艾滋病检测，一个月前已查过一次了，都没事，再查一次好放心，“我放心，舅舅家也放心，以后孩子们好去玩。”

后来，听说扩军转业了，本来想回到县里谋一份差事，离家近些，好照顾家事，但是终于没有谋到，“现在都靠关系靠钱，咱没有关系也没有钱。”于是又回到南方打工。

2008 年春节后不久，我又在村里见到他，他回来给母亲奔丧。他说，冬天冷，今年接母亲到广东惠州去住，生病了住当地人民医院治疗，花 1 万多元，那边看病太贵。实在是拖不起了，才花 5000 元包个车送回来看病。回来看病又花 1 万多，一共花了 3 万多，一年挣的花完了。母亲回来住姐姐家，十五（农历二月）病重，“不中了”，从姐姐家送回来，当晚咽气。十六埋了。“解脱了。”扩军又说。他要接哥哥的儿子小云鹏到他那里上学，“这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在这里逃学，上网，接到那边看紧点。”

扩军说：“还想继续考律师，大专证交到中山大学法律系办自学考试本科证，搞丢了。想继续考，但是现在生活负担重，净顾着开车打工挣钱，精力不比从前了。”（田野手记 20080325）

银庄很重亲情，很多兄弟们都像扩军建军兄弟这样重手足之情。春营的二兄弟干大修厂，收（安置，用工）老表们多人，每年挣几万元。春营说不是有病也管去干。春营 2005 年开始服抗病毒药，“起先副作用反应很大，难受哩很，真是生不如死，想喝农药死了！”春营说，村里自杀好几个了，都因为“受不上去了”（受不了），南地的全喜，北地的国臣……。二弟听说春营要喝农药自杀，专程赶回家看他，劝哥哥不要烦恼，说“哥你安心治病，家里事放心，一切有我安排。”临走撒下钱，又交代他嫂子说，看好哥哥，只要哥好你日子就好。春营现在为儿子盖房，弟弟给拿钱，儿子“不透”（智障），“人家不图人就图房，咱人条件不好，房子得好。”春营夸女儿懂事孝顺，在广州伞厂打工，过年车间只剩她一人了，不回来，为多挣钱。年初三才回来，回来时稍回来近 1 万块钱，也交给家里为给她的兄弟盖房。说“说啥也得为弟把房弄起来娶上媳妇。”

**天天是给艾滋病“打仗”哩，“它天天跟着我，打倒我几回了”**

他大号李铁印，村里人叫他老歪，40 多岁。2005 年冬天在一场葬礼上第一次见到老歪，

我一下就记住了他，体态特征太明显了：人很瘦，一张瘦脸总是歪向一边。他披着一件军大衣，除了他，村里没有人穿军大衣，他说人家送给的。他很主动地跟我说话。他说：卖血、艾滋病的事我最清楚了，你要想知道就问我，他们谁都没有我清楚。我16岁就开始卖血，跟我一块卖血的，好些人都死了，几个上年纪的人只卖过全采，有几个还活着，他们太老了糊涂了说不清了，我单采全采都卖过，就我能说清！

之后我真的去找老歪。老歪和他的哥哥住一起，弟兄俩都是光棍，也都感染了艾滋病。两兄弟都不在家，只有一人在配药做鞭炮，以为我们“查炮”，赶紧说：我是外村的，是他们“觅的”打工的。为我带路的栗新臣说，这是老歪的侄子出钱，在老歪家雇人生产，“老歪是艾滋病，有事好说点，这事（生产烟花爆竹）搁一般人不敢做。也是侄子‘帮衬’（帮助）老歪光棍两兄弟。”于是我们走访别的人家。路上碰到老歪从镇卫生院回来，他说，这一发（一时）不好受哩，今儿去输输血就好受多了，输蛋白更好些，就是太贵。过两天有钱了再去输两袋血！他又说，你明儿来找我吧，我领着你转我住的那一片，叫你看看那一片的房子都空了。该死的都死了，剩下的小的都出去打工了，没“傻头”，孩儿们都不回来了。第二天，他果然带我转了一天。（田野手记20060131）

来年秋天，老歪病重，我去看他。老歪正在输水，躺在院子里的病榻上，一只点滴瓶吊在旁边的树干上。他更瘦了。他的哥哥像往常一样沉默着，蹲在另一棵树下抽烟，旁边有几个人在做鞭炮。

老歪看见我，却见出一丝笑意。他说，刘老师，我这一回是真被打倒了。我被打倒好几回了，都没有死，这一回，恐怕不中了。我知道，老歪已经发病多次，“死几回了”，都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也算值了，多少比我卖血少的都死罢了！”说着，他目光转向正在干活的人：“侄子做炮，买药，不欠人家账。”老歪声音很小，听上去很虚弱。我怕他说话太累，但是他执意要跟我“说说话。”于是我搬一只小凳坐在病榻旁边，听老歪说话。（照片39）老歪慢慢地轻轻地说，间或能感觉到他些许吃力的喘息——

自从知道得了艾滋病，就天天是给艾滋病“打仗”哩！“它天天跟着我，打倒我几回了。”老歪又一次说。这次他又这样说时，我清晰地听到了“它”，突然很质感地感觉到了“它”——仿佛“它”正俯身压向“被打倒”的老歪。我一下体会到了老歪“天天”与“它”为伴与“它”打仗的含义。——那是怎样一种生命的挣扎与搏杀？老歪回忆当年为了活下去如何向外界联络求救——

……那时候天天守着个破电视，光看电视新闻，找疾控司办公室电话号码哩！有一天还真找着了，一打还真打通了！才算联系上了上面……。那号码，新臣那记哩有。那时候，栗

干臣、马炎东、栗新臣俺一起跑……。来个记者，一下撵到太康，黑了才找到人家，才知道有个疾控司……。后来还是从上蔡知道了到疾控司找谁。上蔡找（上访）得厉害，他们那抓了 28 个人……。

大哥一家对我不赖，侄子一直帮我。侄媳妇有病了需要输血，我说输我的吧，我也没有别啥能给他们。谁知道又祸害了侄媳妇，传给了她艾滋病，那时候还不知道有艾滋病……。

“说过一个女人。”老歪的话题跳跃得很快。说到这里，他干枯的脸上泛起一片潮红，眼睛发着光，分明流露出对生命的无限依恋——

那一天在乡卫生院，院长说给你说个女人吧。有病，开刀不打钱（不给钱），你替她出了，人归你。我替她打了两回钱，第一回 3000 元，第二回 2000 元。刘庄店的女人，安徽边界，还带一个小妮儿。我比她大 10 岁。领回家过了几天，她嫌我父亲 26 年半身不遂，娘老了，跑了。我要找公安去她娘家踩门，非消灭她娘家完，还有她娘俩！有人说情，说算了罢！就算了……。我 16 岁就卖血，父亲（19）58 年“扛不住”落个半身不遂……。

我一句不问，只听他跳跃地断断续续地说下去。这时候具象的事实不重要了，一种很真实的来自生命深处的气息正在聚拢来包围了我。直到老歪说累了，睡着了。（田野手记 20061029）

老歪不想死，就这样病着，他又熬过了一年。2008 年春节将至，我再见到老歪时，他已经消瘦到皮包骨。六十多岁的哥哥“学会了打针”，正在家里给四十多岁的弟弟输水。两弟兄都是艾滋病，互相守望生命最后的历程。这次老歪流泪了，他躺在床上一动不动，骨头一样的胳膊掩不住他流泪的脸。（照片 40）他说，公家给的只有柴胡一般药，哥给买了“营养药”螺旋藻。我立刻想到高耀洁说有人在艾滋病人中推销螺旋藻骗钱，说螺旋藻可以治疗艾滋病。老歪拒绝我的帮助，他说“我不能再要你的钱，不要你的工资。你给说说叫张华（B 镇以前的副书记，主管银庄，老歪显然不知道他已经调走）给点啥吧，没有面了，麦都焐了，不能吃了……。我走了还有俺哥哩……。濒临死亡的老歪，放不下生命里最后一份牵挂。

屋里墙角的板子已经拉到院子里准备作棺材。

告别老歪弟兄俩，路过一处空屋破院，院里胡乱扔着一些破衣服。新臣说这里是春营的老爹的住处，“七八十了，艾滋病，受不住，前几天上吊自杀了……。”（田野手记 20080130）

这一次，老歪真的被打倒了，他再也没有站起来。他走了。老歪的生命很顽强，他与体内的艾滋病毒作战到最后。

### “演电影”

2005 年 12 月的一天，虽是冬季，午时的太阳很好，照得 B 镇政府院子里很暖和。B 镇

党委夏书记、刘镇长和我坐在镇政府院子里谈话。通讯员走过来，用拖鞋换下书记、镇长二位领导的皮鞋，把皮鞋擦好晾好再过来替他们换上。整个过程挺自然，丝毫不影响他们与我的谈话。夏书记说：“下午3点县里来拍电视剧，是县妇联作的宣传防治艾滋病知识节目。”电视剧由一家广告公司制作，下午来拍摄一些镜头，夏书记要参加，“亲自给艾滋病人发放宣传资料。”夏书记说：“刘教授你一定要来啊，来捧捧场。”因为需要到艾滋病村拍一些镜头，夏书记打电话给栗卫华，要他召集村民到村委会当群众演员。没打通：“家里没人，手机欠费停机。”夏书记让通讯员想办法通知到。我很高兴地答应了去“捧场”。于是下午进村便没有步行，而是坐上摄制组的一辆吉普车。夏书记说：“为啥不坐我的车，怕和我一起村民说跟我一势？”我说：“先去现场替领导开路。”我希望看到村民的反应，看到全过程。

来到村委院内，几个老人带着小孩子在院里玩健身器材，几个年轻人在室内打扑克。显然他们已经得到通知，因为平时院内几乎没人。见我们去了，村主任栗卫华迎了出来，顺手捡起地上到处散落的烟头纸屑，吩咐旁边人说：“扫扫！”其实知道说也白说，村里没钱买条帚。旁边女厕所里堆满豆杆，显然长期不用，男厕所门口脏乱不堪。

村室广播响了：现在广播个通知，广播个通知，村里没事人到村室来演电影，演电影哩哦！人们告诉我说：“这是栗永，上次学校闹事就是因为是他广播的，抓起来了。”听着广播，几个年轻人开心大笑。广播也更起劲了：快到村室来演电影哦！缺男女主角！来得早当主角，来晚了当配角哦……！年轻人更是大笑。稍停又广播道：来时背住条帚！哈哈……！更是笑闹做一团。

老五媳妇骑着摩托过来了。绿花袄黑裤子，脸上依然擦着厚厚的粉，眉毛是纹过的，又粗又黑，嘴唇鲜红。一阵嘟嘟嘟来到村室门口，两脚点地跨在车上停下。一群小伙子一下围了过去：女主角来了，过来拍电影吧！老五媳妇笑道：拍啥电影哩？我还有事哩！却不立即离开。一阵调笑声中，她只跟我说话：“你看我胖成啥了，我身体不行，虚哩！就是今年夏天，老五发病可厉害了，瘦哩不成样子，你别看他现在怪好，那时候不能看。不怕丢人，身上都烂了……。我说啥也得给他瞧病！宁可不盖房也得瞧病，买高价药，营养哩，只要打听哪有卖的就去买！不是一盒两盒，是十几盒，一次二三百、一百多元，从来都不是只买一盒两盒。早上一顿喝鲜奶，集上有卖哩，一天5个荷包蛋。就这样，又过来劲了……。”说着眼湿了，还笑着。“来演主角吧，下来下来！”小伙子们又起劲了。老五媳妇：真哩有事哩，走哩！踩油门，屡踩打不着火。踩一下，小伙们轰笑一次，再踩，再哄笑，终于一阵黑烟，她在一片轰笑声中骑车走了，还回头笑骂回应着身后并无恶意的调侃。

柳桂枝来了，笑对我说：“正搬（运）黍秸呢，听见广播过来看看，放啥电影哩？”小



伙子们说，这回不放电影，演电影！正缺女主角哩，你来了……。柳桂枝笑着回应年轻人的玩笑，她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真笑。她笑着跟我说：“我现在是真的高兴，感恩，活一天感谢主一天。日子虽然苦，看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感谢主。过去是天天忧愁，现在信主了，知道感恩，去忧愁。我过去上中学，天天从教堂门前过，从来没有注意过。要是早些信主就好了！”她真心地遗憾着：“早些信，早就知道感恩，就不会那么忧愁了……。”我很喜欢柳桂枝，聪明、勤劳、善良、通情达理，特别是乐观开朗。

人们陆续聚过来了，三五十人，老人、妇女、孩子。大人们互相开着善意的玩笑，孩子们在人群中穿梭嬉闹。老六媳妇、满囤媳妇也来了，还有山岭的老父亲，村里百岁老人的儿子、孙子……。这些人都是很有“情绪”的人——他们本人或者家里人感染了艾滋病，还有的家里人被抓了或者被抓过，但是他们到场了，而且表现得很配合，没有人“闹事”。

“夏书记来了！”人群中有人喊了一句。夏书记果然来了，他自己驾驶着一辆黑色轿车，门口的人群自动让出一条道来，车停了，夏书记满脸严肃走下车，给我打招呼。县妇联主任和两名演员从另一辆车上下来。“拍电视”开始了。夏书记手拿艾滋病宣传资料准备发放作宣传状，妇联主任指挥演员和群众演员一排站开，作接受宣传状。这位县妇联主任原来担任过B镇镇长，任职在1985年-1987年，她说：“当时就有人卖血，问过栗干臣，卖血能赚钱不？他说赚钱。”

很快地拍摄完毕，不过是要个镜头。摄制组和夏书记们开车离去，说是去阳光家园拍镜头。

群众演员们似乎不过瘾，围上来问我：“就这就拍完啦？”老六媳妇声音最高：“这不是作假吗？”于是向众人解释，拍电视片是为了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是好事……。人群中依然嘈嘈声一片，有人指名道姓地骂“当官哩”，山岭爹在说儿子被抓了，“到底多大罪？自古以来栗庄没人犯过王法，现在一开口就抓人……。”人们骂着发泄一通之后，又开始相互逗乐玩笑。柳桂枝说：“有一回我去找夏书记，碰见娘家村的表舅，他是矿主，喊声舅。夏书记说：咦，这是你外甥女？天天跟我闹，上北京那回事不替我拦着，还跟着去……。我就说，我不能跟你一势，我跟村民一势……。”她始终笑着叙说。沉寂的小村难得有的欢乐。

天色渐暗，村主任说都回去啦，回家去吧！人们笑骂着散去。山岭爹一直跟在我身后重复着儿子被抓的事，问我能算犯多大的王法？我无法回答老人，不敢停下脚听他说，又不忍不听他说。他一直跟我到老远，村主任过来解围：“回家吧，明儿再说。”走出好远了，还听老人在说：自古以来……（田野手记 20051208）

### 红丝带的故事

这个故事一波三折，有点曲折。

2006年9月，在北京的一次防艾会议上，有人送给我一枚用丝带编织的红丝带。我想到银庄正在寻求生产自救的门路，便说，如果村里人编织红丝带……？送我红丝带的肖先生，是全球企业抗艾滋病结核和疟疾联合会的主席，他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说，编了给我，每年开会都需要，一个2元。

这本来只是一个偶然的时机，却引发了一连串并非偶然的故事。

我把这枚红丝带带到村里，栗卫华、栗可昆两个大男人开始琢磨它的编织方法。当时他们正在为村庄的出路发愁，村里多数人从事的鞭炮生产非法且危险，时常发生爆炸事故，急于转产却苦于没有合适的生产门路。他们想过先通过几户人家合办养殖场，但是因为资金等等问题，困难重重。这时卫华不知从哪里拆下一截丝带，可昆拿去试着编结。半个小时后短信发给我：成功了！看他们真的感兴趣，我开始联系那家企业联合会和一些大学生社团，希望赶在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搞活动能销出去一些。于是卫华们商量着先少编一些试试，因为不知道销路如何，参加的人也不可能太多。结果，那家企业联合会并没有要多少，倒是郑州财院、北师大、上海复旦、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些学生社团<sup>①</sup>热情很高，借助世界艾滋病日搞宣传活动义卖了一些，武汉会议上，村民自己义卖一些。据我所知，经济收入没有多少，倒是社会影响不小。北京、上海都有媒体跟进，报道河南农民艾滋病人希望生产自救，倡导要有尊严地活着。（照片41）

一天B镇党委张书记到村里来，碰上村民们在编制红丝带，说，好事，让乡干部每个人都买了戴身上，10块钱一个献爱心！栗卫华、栗华中们很受鼓舞，说政府支持俺！于是合计着是不是可以找找县市领导取得支持，由村里艾滋病人自己出面搞宣传义卖活动。他们曾经在电话里很兴奋地告诉我他们的计划，说，我们不能光依靠外界替俺们销售，俺们自己也应该想办法！我觉得他们的想法不错，但是提醒他们要谨慎行事，见了领导好好说，要求不可过分，要讲道理，一切谈好了，有把握了，再根据可能的销量进原料编制，可不能陪了本，村民们都不容易，输不起了。很快他们又很高兴地打来电话，说市里领导很支持，一位秘书长亲自接见他们，他问你们有多少红丝带？我们赶紧说有四五万个。秘书长说，“也没多少嘛，你们也不用跑了，凭你们这样跑也不好销，这样跑着对你们的身体也不好。我压到市里各机关单位，叫底下各部门都要点就解决了。秘书长又说，不过，你们说你们是艾滋病人，谁能证明？回去让乡里县里开了证明再来找我。”华中们简直喜出望外。说其实红丝带没剩多少了，他们要赶在12月1日前赶制出来至少4万个红丝带。乡里很支持，还让村里写了

---

<sup>①</sup> 见本章之六

个计划书，并主动给县里打了报告。看来事情进行得很顺利。

11月29日，柳桂枝和我一起赴京参加北师大“农民之子”举办的讲座，村支书栗卫华还特意让她带上计划书和盖着镇政府大红印章的报告给我看。在演讲和义卖活动中，柳桂枝也很高兴地告诉人们：当地政府帮助支持俺搞生产自救！计划书和报告原文照录如下——

### 计划书

各位领导您们好。

我们是银庄行政村村民艾滋病病人代表，现将我们的情况简述一下。我们银庄行政村是一个贫困村。多年来，由于受贫困的影响，受到了献血来钱快的愚昧，走上了献血的道路，以至于感染上了谈虎色变的艾滋病。成为很受歧视的艾滋病病人。我们生活受到了限制，不能外出打工，不能干重活，累活，只能干些力所能及的活。这二年来，由于生活所迫，一些艾滋病人选择了生产爆竹，以谋取生活所需，但生产爆竹不是长久之计，况且又是政府禁止生产的危险性物品，于是我们想另某（谋）出路，经艾滋病病人代表商榷，改手工制作工业品和禽畜养殖，我们集资选择了场地，进来了砖头，但由于资金短缺，建场停了下来。为了宣传艾滋病知识减少艾滋病的传播，使更多的家庭幸福美满，又让人们关爱艾滋病病人，迎接今年12月1日的世界艾滋病宣传日，我们组织了艾滋病受害者以及家属，编织了一些红丝带，一是为宣传艾滋病防范知识，二是能筹备一些资金继续建场，以减少政府负担，望社会各界人士给与（给予）支持关爱和帮助。

2006年11月13日

### 镇政府关于我镇部分艾滋病患者编织红丝带的

#### 情况报告

县委办公室：

县政府办公室：

我镇共有38个行政村，63939人，现有艾滋病毒（HIV）携带者693人，症状病人484人，涉及34个行政村。其中疫情高发村银庄现有人口2483人，有偿献血861人，阳性患者278人，发病258人，死亡64人，现症病人194人。

由于艾滋病患者不能从事繁重的劳动，无收入渠道，家庭生活十分困难，尽管党委政府在艾滋病问题上做了大量工作，进行了必要的救治、救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他们的生产、生活问题，基本上稳定了他们的情绪，但相当一部分患者为了多增加收入改变生活状况，冒

着生命危险非法生产烟花爆竹，虽经党委政府多次组织人员排查取缔，但由于他们是特殊群体，收效甚微，安全生产问题成了党委政府的一大心病，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新一届党委政府立足本镇实际，针对当前存在的突出矛盾，把困扰党委政府各项工作的艾滋病问题作为切入点，着力做好救治、救助及稳定工作，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与省公安厅驻村工作的同志多次深入到艾滋病高发村，先后召开党员会、群众会及艾滋病人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走村串户，认真调查研究。广泛了解艾滋病人的思想状况及救治救助情况，积极教育，动员引导他们放弃烟花爆竹生产。拓宽致富门路。积极动员艾滋病人编治（织）红丝带。目前大部分患者积极响应，热情高涨，已编织红丝带 40000 余个。

12 月 1 日是世界艾滋病宣传日，为广泛宣传艾滋病知识，动员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关心支持艾滋病救治、救助工作。我们认为应对艾滋病人的这一做法予以肯定、鼓励和支持，并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特此报告。

B 镇人民政府（盖章）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2007 年 1 月的一天，我们研究所的所长转交给我一封“情况说明”，说人家下面镇里书记和民政所找院里来了，扛了一麻袋红丝带来院里告状，直接找到院党委书记。“这不是”，他指着桌上一个红丝带，“他们都拿了很多，一把把抓，我只拿了一个。”今天民政所还打电话问院里怎么解决，想让院里把钱拿出来。竟然发生这样的情况，我没有想到。便简单解释事情的原委。所长说，你就搞你的科研，不要让人家下面一弄就找来。书记很烦，说科研人员做调研不要参与下面的事情惹麻烦……。（20070115）

“反映信”写道——

### 关于“红丝带”有关情况说明

省社会科学院领导：

您们好！我们是 Q 县 B 镇民政所阳光家园的同志。我们把贵院刘倩老师帮助我们艾滋病这一弱势群体搞项目，解决困难情况向你们作以汇报，来帮助我们解决红丝带问题。

刘老师到我们镇银庄行政村（该村系全省 38 个艾滋病高发村之一）搞课题研究以来，非常关心、关爱艾滋病人。经常走村串户与艾滋病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一是帮助艾滋病人选项目、找销路，搞好生产自救；二是组织建设艾滋病协会；三是联系社会各界及大专院校对艾滋病人实行捐赠；四是帮助艾滋病人搞好政策宣传咨询，解决他们在政策方面的模糊认识。现在她已成为我们的贴心人和艾滋病人心中的女神、救世主。

今年世界艾滋病宣传日前夕，她广泛动员银庄艾滋病人编织红丝带并承诺：“你们放心编，编多少我销多少，每个5-10元。”可当艾滋病人把红丝带编织好后，她却推辞，不见她的身影。部分艾滋病人带着红丝带多次找市、县、乡政府，要求给予购买解决。否则状告政府不作为。因艾滋病人是一特殊群体，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责令镇政府处理解决，镇政府动员镇直各单位伸出援助之手，每个单位少则200元，多则500元。但由于数量大，这只能是杯水车薪。最后镇政府把此项工作压给了我们民政所，让我们想法解决。我们只好在镇财政借支办公费34000元购买红丝带17000个。

春节将至，阳光家园的孤儿、孤老需要安置，我们赊的面粉、油、蔬菜等生活用品21000多元需要还帐。这几天债主要帐使我们无法正常工作，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们只好向刘老师所在贵院求助。请你们奉献一点爱心，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我们销售红丝带，筹集资金，摆脱困境，渡过难关，让我们的老人和孩子们过上一个快乐祥和的春节！

Q县B镇民政所 阳光家园

二00七年元月十五日

第一份“报告”贪天之功据为己有。第二份“说明”推卸责任嫁祸于人。仅仅两个月时间，B镇政府对事实的陈述和态度发生如此迥然有别的变化，背后一定有故事。我当即打电话问卫华情况。那边说：红丝带卖完了，“眼下人大选举，他们怕闹事，剩下的乡里解决了，给3万多元。”（20070115）看来卫华们不知道镇里来我们院里的事情。既然问题解决了，我们院里也没有再说什么，我也就搁置一边，事情算过去了。息事宁人，是我这些年面对这类“复杂”事情最简单的处理方法，否则会没完没了。

之后我来到村里，才知道这件事情不仅没有过去，还牵出一连串其他的事情，真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事情复杂到超出我的想象力，只好借用一句说书人语：“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由此牵扯出的其他旁枝错节的故事且放一边，这里只将这一段红丝带的故事讲完。

栗华中是村里感染者自救小组的组长，跟我讲述他们“出去卖红丝带的事儿”——

俺们先找市政府。在市政府门口跟丁门卫说明情况，他很同情。进里头找出来一个秘书长，我们又跟秘书长说了。他们说四五万个红丝带，没多少，不叫我们自己跑了，他们能包销。秘书长叫我们回县里乡里开个证明。回来给县里乡里说了，乡里很支持，县里不出（证明）。俺们又去了市里。他（秘书长）说叫他出个证明都不管给出？市里又往县里打电话，俺又跑到县里，县里还是不给出，最后乡里砍了章（盖了章），出了证明。我们又赶去市里，他们说现在开两会哩，人都不在了，晚了。眼看12月1号快到了，再晚红丝带就卖不出去了！我们着急了，就写材料，信访，告县里不作为，不出证明耽误了我们的商机，要求包赔

损失。材料递上去了，县里压到乡里，乡里才买下了。

华中拿出他们的信访材料——

### 情况反映

反映人：Q县B镇银庄行政村218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编织者签名附后

反映请求：要求Q县人民政府赔偿反映人经济损失。

我们均系Q县B镇银庄行政村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共218人。多年来，上级领导对我们这些病人进行了必要的救助和帮助，生活上给了一定程度上的照顾，为了缓解政府经济上的压力，改善病人及家属的生活状况，我们全体艾滋病人自发组织起来，编织红丝带，以拓宽致富门路，我们的行动得到K市委、市政府的支持，并受到镇党委、政府的许可。但由于我们这些人是社会上的特殊人群，K市领导要求我们开具镇、县两级政府的证明，以证明我们的身份以及基本情况，帮助我们解决红丝带的销路。镇党委政府了解情况后，积极参与并支持我们的工作，为我们开具了证明，并与县信访部门领导数次到县政府反映情况，让县政府为我们开具证明，但县政府一直拖延推托不办。因县政府的不作为，及对我们艾滋病人的歧视，延误了在12月1日世界艾滋病宣传日前的销售商机，导致我们编织的产品不能销售，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四万余元，使我们这些困难户雪上加霜。为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我们要求上级领导及有关部 门追究Q县政府的不作为行为，赔偿我们的损失。

二00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华中继续说——

俺几个最后去市里那回，真是“卖着脸”，也真急了！雇车花了1000多元，县里市里来回跑，折腾五六天，市委、市政府、市公安局都去了。要不是他们说可以包销，我们也不会又投资编那么多。这时候找这个这个推，找那个那个推。没法，跑了几天，想着总得弄个吃饭钱，就上食堂（饭店）试试。俺几个往那一站，老板待理不理，我们说了说情况，想推销红丝带。

问：说你们是艾滋病人了没？

答：说了，俺都戴着（胸前佩）红丝带哩。

我由衷赞叹：“真了不起！”在那种场合敢于亮明身份，真的需要勇气。

华中继续说：人家拿了（给了）5块钱。胜利说，你打发要饭的呀！我说咱不嫌少。胜利是跟着看的，不是俺几个里的，他家原先是咱村哩，现在住市里了，我们年龄差不多，在一起关系不错。又到了一家饭店，人家一分钱不拿。俺就说，不拿就算了，俺几个在你这儿

吃饭，该给你多少钱给你多少钱。人家说不行。因为身份亮明了，是艾滋病病人，不让吃。最后也拿 5 块钱打发了。俺们几个人说出去要饭打工，一天也不会只给这点钱。我说，既然赔了，就赔了，回去想想怎么办吧！回来还上县委，这一回人家县委说红丝带他们要了。可乡里不让俺们去县里了，说是红丝带他们乡里买了。算没赔。

问：谁领着你们去的？

华中：就俺几个。不去也没法。也真急了。买原料的钱是山岭垫的，他还投资买砖建养殖场，都砸里了，他最急。卫华说砸了，卖不出去了！我说我参与了这事儿，这个“闲事”我得管！我准备拉着他们往火车站去卖。

可峰：我说我也去！他（县镇领导）不叫去。我十二点多到萧峰（乡防疫站长）家拿艾滋病卡，说是往北京检查病。艾滋病卡可以证明我们是艾滋病患者，准备带着艾滋病卡去卖红丝带。最后他们怕闹事，叫民政所出了 34000 块钱。

最终是市里“压”县里，县里“压”镇里，镇里“压给”了民政所。一级压一级。

镇民政所长托人捎话给我说，上社科院告你刘老师不是他的主意，是乡里的主意，想找你解释解释。

我说：事情明明白白，不用解释。

**补记：**

互联网消息一则——

黑龙江爱之丝路义卖红丝带： 2007 年 4 月 21 日，风和日丽。黑龙江爱之丝路工作组的同志们在黑龙江省疾病控制中心全球基金项目办的支持和协助下，在哈尔滨的百年老街——中央大街上进行了艾滋病知识宣传和红丝带义卖活动。当天，省疾病控制中心的赵东辉和哈尔滨市疾病控制中心的温迎春，刘婷，李连杰等领导都到现场进行督导。并且在 20 多名大学生志愿者的帮助下将活动进行得非常圆满成功。许多市民都表现出对艾滋病的关注并且积极在 30 米红丝绢上签名留念和献上了非常可贵的一片爱心。在这些好心人的爱心支持下，义卖所得 2000 元。同时在义卖的过程中，涌现出 130 多名社会各界人士志愿加入我们今后的红丝带义卖活动。这是感染者勇敢的走向新生活，在省市疾控领导的关怀和志愿者的帮助，市民的积极响应下共同努力和参与所取得的成果。在义卖和宣传过程中，虽然遭到一些冷漠和白眼，但是我们感受到的是更多的支持和关爱的话语，让我们体会到更多的人间真情，温暖着我们每个人的心田。

华中桂枝们在武汉会议义卖红丝带时，有一位黑龙江参会代表找上来说，这编织的红丝带是他们的专利产品，不允许他人“仿冒”，争吵起来，被人劝走了。此时华中们看到这条

消息，说，他们黑龙江人是跟咱们学哩！看人家领导多支持，咱这里领导要是跟人家那领导一样就好了。

## 药价风波

这个故事很长，有点复杂。

### 愤怒控告 Q 县卫生局 B 镇卫生院

#### 坑害艾滋病患者

我们是 Q 县 B 镇银庄行政村的 197 名艾滋病患者。我们愤怒控告 Q 县 B 镇卫生院赚黑心钱坑害艾滋病患者的不法行为。强烈要求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查清账目，追回多收我们的药费。全镇 600 多名艾滋病患者没有计算在内。

我们银庄行政村是艾滋病高发村，2000 多名村民深受其害。党和国家给与（给予）了我们深切的关爱。我们行政村现在有艾滋病患者 197 人。自 2004 年起至今，国家指定 B 镇卫生院为我们行政村艾滋病患者的定点治疗机构。我们所遭受的身体和精神的损失是常人不能理解的。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B 镇卫生院不但对我们没有丝毫的爱心，反而昧着白衣天使的医德赚黑心钱，在对我们接诊施医时，擅自提高药品价格，坑害我们 197 名艾滋病患者的具体事实如下：

自 2004 年至今的三年来，我们按国家的指定一直在 B 镇卫生院治疗用药。我们近日才发现，他们向我们提供的头孢曲松钠、糖盐水、川琥宁、左氧氟、环丙沙星、阿莫西林、青霉素钠等常用药品高于市场批发价格的 2.3、2.5 倍，50%、20%、100% 不等。如头孢曲松钠市场批发价为 1.3 元/支，他们按 3 元/支，高于市场价的 2.3 倍；阿莫西林胶囊市场价为 4 元/盒，他们按 5 元/盒，高于市场价 25%；糖盐水市场价 31 元/件，他们给我们 60 元/件，高于市场价的 95%；川琥宁市场价 3.2 元/盒，他们给我们 8 元/盒，高于市场价的 2.5 倍；左氧氟市场价 1.4 元/瓶（100 毫升），他们给我们 5 元/瓶，高于市场价格 3.5 倍；环丙沙星市场价格 1 元/瓶，他们给我们 2 元/瓶，高于市场价格的 100%；青霉素钠市场价格为 1.2 元/支，他们按 1.8 元/支，高于市场价的 50%。另外，B 镇卫生院无视医德医风，昧着良心收取我们的所谓手续费，注射费从 4 元到 9 元不等。三年来，不知 B 镇卫生院赚取了我们行政村包括已故艾滋病患者 239 人的多少黑心钱。

综述以上控告的事实，B 镇卫生院擅自提高药价坑害我们艾滋病患者的行为铁证如山、国法不容，有关负责人员依法应受到追究，多收我们的药费和手续费等应全部退回，以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

Q 县 B 镇银庄行政村 197（名）艾滋病患者（签名略）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银庄村民早就发现，卫生院给艾滋病病人看病用药收费比一般人的高，比如一般做一次心电图 10 元，而艾滋病病人则 20 元，“本子”上每月 150 元输一两次水就用完了。武汉会议回来后，感染者栗华中、栗可峰们有了争取自身权益的意识，着手调查卫生院药价的事。他们到县医药批发门市部查清药品的价格，与他们在卫生院得到的药品价格进行对比。然后请人写了以上“控告材料”，加上收集到的证据，就是卫生院开出的票据、处方等等，一并交给了村支书栗卫华。他们事先已经商量好，这是艾滋病病人反映问题，把村支书栗卫华“撇开”，“让支书充当好人，我们艾滋病病人当坏人，控告卫生院。”

村支书栗卫华拿着这些材料找卫生院长李广说：李院长，栗可峰反映的问题交给我了，要求答复解决。我也不想跟你们发生矛盾，可我也不能不管，不然在老百姓那儿我很难交待。现在我很为难。你说我咋弄？栗可峰说让我交给驻村工作队哩！李院长说：你等等！这是卫生局的事，我回去再问问。

李院长私下找栗可峰“私了”。说给几个钱，这事你别说了。栗可峰说，那你就给多拿点，拿十万二十万，我们把 4 个村里的下水道修修。另外俺还有一千多个红丝带，给解决了吧。又说，俺材料已经写好了，如果不同意，俺就往上反映。

李院长一边跟栗可峰“谈判私了”，一边报告给镇党委张书记，说艾滋病病人跟他要 20 万，拿红丝带 10 元一个敲诈他。张书记找工作队 C 处长，C 处长找村支书栗卫华，说村里有人找医院要钱哩！卫华心下明白，跟栗可峰说咱得去找处长谈谈，别误会了，弄得跟咱私自“糙事”的一样。当天晚上栗卫华跟栗可峰一起找处长说明情况，同时反映药价的问题，把写的材料也给了处长，6 张处方、4 张药笺也都给他了。说，俺也不上访了，你给个答复就行了。第二天，C 处长去镇上找张书记。镇上说这个事工作队压下来了，要镇司法所、信访办介入调查。

这一下，“药价问题”惊动了县卫生局。主管县长亲自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卫生局正副局长、一位主任，卫生院正副院长、药物主任，镇上正副书记，加上主管县长，共 9 人，相关领导全部到齐。村民到场有栗华中、栗可峰、栗因、栗保国，4 名村里“艾滋病病人代表”。

“9 个对俺 4 个”，栗可峰说。会议从上午 11 点开到下午 1 点多，3 个多小时。卫生局长说，周边县市艾滋病病人用药价更高，咱这跟他们比较还是低的。让卫生局副局长宣读周边地方对艾滋病病人用药的药价，有 K 市的、项城县的、郸城的、界首的，等等好些地方的。“念

得栗因都睡着了，我晃晃他才醒。”华中说。副局长念完，主管县长开始讲形势，讲国家政策对艾滋病照顾得很好，说，药品是通过卫生局招标采购的，周边乡内都按这个药价，B镇比别的地方还都便宜哩。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说，我向上级反映，我有车跑着方便，你们不要乱跑了，影响不好。张书记说县里领导对B镇很照顾对艾滋病人很关爱，做了许多工作，批评我们，说不要再胡闹了。李院长也说县卫生局领导对咱镇卫生院不赖……“那是他们顶头上司，他们能咋说哩？”

你们没有发言吗？

咋没有发言？发啦。“我们事先一个人记一样，专为抬杠（争论，这里当理解为辩论、谈判）用。”华中说，我问他们，为啥一般人做心电图10元，艾滋病处方就20元？他们说，艾滋病人处方，因为医院得不到现金，所以都开得高。栗可峰问，为啥同样厂家编号的药，非得“招标”进高价？还有人问其他的，说开处方收取手续费不合理。开会开到1点多，各自回家吃饭，说明天再说。

第二天，俺们到镇上给他讲了三个条件。第一，药价应当按照市场价，不能给艾滋病人开高价。第二，收取手续费不合理。第三，多收艾滋病人的药费要退赔。张书记专门说了这事儿，说要退，该退多少就退多少，他说这是医院的事儿。后来卫生院药价降下来了，“他们说药价是通过‘核定’的，为啥这个药价降下来了？咋不按原来开？说明还是承认高了嘛！”4块到9块的手续费，也降下来了，收3块了。

但是，退赔的事一直不解决。栗可峰去找李院长。李院长说，卫生局招标，他们赚得多了，可咱这卫生院还是穷单位。李院长要栗可峰“做工作”说服大家，他出钱，“说‘补助’两千，这事不要再讲了。后来涨到五千，后来一万，跟搞生意一样。”栗可峰说，“我提出八万，最后谈到三万。”

问：就你们俩？

答：还有王晓霞、萧峰，李院长安排他们俩给我讲价的。萧峰是副院长、防疫站长，王晓霞是管药品的。三万就三万。三万走两批（分两次付给）。先给一万五，说再给我补点成药，就这样解决了。萧峰写个收条，要我签字，收条不提药价的事，写的是，收到卫生院献爱心红丝带款3万元。签字时李院长在场。说，这事都不能说出去，他们三个都能保证，问我能不能保证？我说你们保证我就保证。先给了15000元，之后又给了5000元。

后来，这事突然被说成了敲诈。张书记在全村艾滋病人会议上说，有人拿红丝带敲诈卫生院，开口要十万八万，最后说到三万，我看谁敢接这钱，谁接这钱谁就是敲诈，只要他不怕进去！会场一下乱了，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当时栗华中、栗可峰两人，正带了这钱到山东烟台贩苹果。“正考察价格，还没有买下。”听说“敲诈”的消息，感到事态严重，没敢再买苹果，回到村里，几个人一起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当时我刚好也在村里。

栗可昆虽然没有参与这件事，但是很关注这件事，建议他们讲究策略，说在村里要让村民知道这事，理解这事。“不能把这几个人孤立起来。”几个人都开始感到压力，因为村里多数人不知道这事，张书记这么公开讲出来，他们很被动。他们说，这是乡里一贯使的手段，“挑着下面的人闹矛盾互相斗”，“想叫村里的人恨你、骂你，没办法把药价的事儿跟底下人挑明，再不敢追查下去。”

压力最大的是栗可峰，因为事情主要是他出头。开始他还说：“我装着不知道，先要钱再说，还有1万元没有付清哩。”听了栗可昆的话，他有些紧张了，说，不让讲，我不讲好了么。过一会又说：“现在张书记替我说出来了，村里都知道我使人家的钱了，要把我弄进去以敲诈罪论处。还得告李广！谁叫他给镇上汇报，是他们说都不能说出去，现在他先说出去了！他想把我弄进去，我也得叫他弄进去！”

那一万元继续要吗？

“不可能了，没指望了。”栗可峰说，“真不行了，我自己承担罪行。”

几个人一起分析，看如何把这件事摆平。栗卫华分析，张书记可能不知道这三万的事儿，说：“我觉得他不知道，给钱没给钱他（李广）不会给张书记说，也不会给工作队说。卫生院会瞒着上面。这只是艾滋病人跟卫生院的私下交易，张书记没想到底下的事儿这么复杂！”栗可峰说，“我过去看看再说。”

第二天，事情发生戏剧性转机。栗卫华说，李广找栗可峰说情。李广说，他有一身病，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五十多岁了，快六十了，弄一辈子了，明年都要退休了，因这事儿，你非得抓住一点不丢，叫我送到监狱？栗可峰说，再告李广，我得挨骂哩！李广是本乡人，邻村。在村里有亲戚，都是“爷们儿”，有人找到栗可峰替李广说情。如果由于他的原因把李广弄进去，爷们儿会说他，“会骂我。大家该说为了几个钱儿，把人家弄进去。”栗可昆很能理解，说：他压力大得很，各方面的关系、亲戚都来找。搁着我，也有这么大压力。这事儿第一步就错，发生以后，就该放到桌面上，共同商量这事儿，如果村里人都知道药价内情，这都不存在思想压力了，也就没这个说情关系网了，现在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了，下面气，上面恼。

栗可峰说，要是告卫生局我绝对不怕，要是镇书记夏明我也敢告到底，可是李广……

卫华说，拿人的钱，与人消灾啊！你承诺人家了，人家说得也可怜。

那张书记那里？

栗可峰：他就是耗子，洞里横，出来说不行。我没啥信心给大家（村里人）说清楚，把苹果拉回来给大家分分就清楚了。

栗卫华：手心手背都是肉，哪地方出乱子，书记都不好整，哪儿出事儿，他也脱不了干系。只要不出事，他就没事。

华中：我是这样想的。这两万也没动，除了花掉的一千多路费。咱们也公开，给大家个交待。你给俺不承诺（都不说出去），俺也给你们不承诺。俺说的是过了这时间再给你公开。说年关了，以艾滋病小组的名义给大家点补偿。我们就是这样想的。艾滋病小组成立了以后一直想给大家办点事，现在弄了点资金，给大家表示表示，让大家感到成立小组还是有好处，小组给大家办好事了。

可峰：最好的表示就是给大家拉苹果！药价降了，再买点苹果给大家分分。一家一袋子。这事情就算解决了。

那年春节，可峰、华中拉了二十多吨苹果，卖一些，分一些，艾滋病人家庭每家发一袋。

事后栗卫华说“算是看透了。”他说：有些事可难，涉及到方方面面。你明知道里面有猫腻，你咋说呢？人的社交关系、复杂的情面，我算是看透了。你就是再想公正，再想弄好，也弄不好了。牵涉的人太多，药价这事肯定牵涉到杨县长，他是直接抓卫生的。可是这是救命的钱呐，他们竟然加价挪用！B镇这儿，工作队在这里住着，他们多少得有些顾忌，还算比较好的呐，我老岳父那村马楼的药价比咱这儿还要黑得多！

一年之后，栗可峰跟我说，那一万块钱也要回来了。“一万块钱拉扯一年多，最后一千两千分几回给的，春上才付清。李广调到县卫校当副校长了，临走交代给新任的王院长认下付清的。”

新院长认账？

咋不认？不认搞得他干不成！

李院长为啥调走了？

不知道。他说他自己也不知道，突然就宣布调走了。他说不想走，他给医院垫资，借亲戚的钱还没有还清哩！那次药价的事，不单李广，县卫生局长郑明也托人找我说情。“县防疫站党组书记栗奇是咱庄的，郑明是他老婆的姑父。栗奇跟我叫哥哩，栗奇找我说，哥啊，卫生局药品招标就是郑明的事，郑明原来就因为药的啥事上过《大河报》，他经不起事了，你放他一马吧，我混也靠着哩！”

那3万元到底是谁出的？镇卫生院，还是县卫生局？问。

栗可峰说，我也问李广了，我说，卫生院穷，就不要了，要出就让卫生局出。李广说，别讲谁出的，给你不妥啦！

3万元是这样分配的：知道（参与）这事一共有8个人（可峰、卫华、华中、保国、连营、林山、海岭），出力贡献不一样。第一次先给的15000元，8个人分了5000元，10000元拉苹果，分给了全村艾滋病人家庭。第二次给的5000元，3个主要的人分了。最后沥沥啦啦要回来的10000元，是我自己要回来的，不分了。

最后栗可峰说，还得告他们，“药价降下来一两个月，又涨上去了。”

## 麦种的故事

### 情况反映

人民政府：

我们是Q县B镇银庄行政村300余名农民（签名附后），下面，我向你们反映河南天存种业科技有限公司、K市农业科学院、Q县B镇人民政府生产销售周麦19号小麦品种，造成我们种植的500亩小麦现发生几乎绝收之事实，恳请政府抽调农业专家实地考察后，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并赔偿我们经济损失。

2006年9月份，Q县B镇人民政府根据上级粮种补贴的规定，与K市农业科学院协商，以农户每购一市斤周麦19号补贴0.5元现金，强令B镇银庄行政村购买其小麦品种，不买他的种子就不给补贴。300余户农民（其中90%为艾滋病患者）购买上述品种约一万多斤，并依照其栽培要点进行种植。2007年4月份，我们行政村种植的其它小麦品种长势良好，而通过B镇政府强令购买的周麦19，因其自身品种不耐寒，而发生冻害，出穗率只达20%，80%以上的不出穗，致使500余亩小麦大面积减产已成定局，我们这些农户看从政府购进并享受补贴购进的小麦良种几乎绝收真是欲哭无泪，随向有关部门进反反映。

K市农业局对我们所反映的情况组织部分专家乔国宝、王士杰、王西成、海燕、康明辉进行了考察，他们无视周麦19号种自身的缺陷，提出了因气象因素和栽培因素的所谓客观理由，作出了冻害由上述原因造成，但是小麦自身有很强的调节补偿作用，对于发生冻害的麦田，只要加强管理，还能获得较好的收成建议，为河南天存种业科技有限公司、K市农业科学院、B镇人民政府开脱。

眼下，我们这些农户眼看别人种植的小麦长势良好，丰收在望，而我们种植的这些小麦几乎绝收，心急如焚，我们这些艾滋病人既无发家致富门路，又不能到外地打工挣钱，都是靠种地养家糊口保命，现出现此种情况，咋能安心，今明两年我们吃什么？故依上述事实进行反映，万望政府查处。

情况反映人：(略)

2007年5月

华中说——

这是花50元请律师写的材料，“这是最便宜的了。”那时候也想自己写，正是麦扬花的时候，出穗率只达20%，80%以上的不出穗，有证据。“当时和可昆两人对着墙上的汉语拼音表在电脑上打字，弄到半夜，弄不成。”卫华还写了一份“更有力的”，他两口也写到半夜。栗可顶为这事也写的有反映信。这事村里人都很着急发愁，但是C处压着不想叫从银庄告，说他在这哩，这里不要有事，要表现得安定稳定。

麦种事跟乡里有关系吗？

有！上级政策良种补贴，一斤种子补贴5毛，不买他的种子不给补贴。乡财政所长出面采购种子，他认识种子公司的人，从中牟利。外乡有发钱（良种补贴）到个人手里的，也有买了他的坏种子的，全K市都有告家（上告的人），咱这是告得最晚的。咱全乡都看着银庄哩，说银庄告不下就都告不下了。咱村村干部、老党员都参与了，不过他们在幕后，我们群众在前头。卫华、可栋（老支书）、可顶、华德都开会，每村出四五个人，一共20来个人，上乡里、C处那里都去反映情况。麦扬花时候上头来人看几回。我们写了材料，村民都签名按指印，材料上写了“签名附后”。C处阻拦，最后都不愿跑了。他们找省农艺师为自己开脱责任，说怨气象和栽培因素。我们要越级上访，找C处说要到农业部去。C处说，这事别跟我商量，我的意见不去，最好银庄不出面，让别村出面。还在大会上说，哪里不包（赔），也得包咱们银庄！说得大家都不跑了。我看这情况，也不敢再往里瞎投钱<sup>①</sup>了，不去就不去吧，搁下了。到现在一分也没有包赔。人心不齐办不成事……。好在麦子后来慢慢又“返劲”过来一些，没有“颗粒无收”。今年麦季丰收，一般亩产千斤，用他们麦种的也收了六七百斤。（田野手记20070611）

### 最“过瘾”的两场事

“7.15”那回砸城管，是真砸了。城管一向横行霸道，一听说咱的人挨打，4个庄人都去了，开着大蓬车。立马就找到城管大队，门关着不开。有人说把门别了，有人不同意别。村里来的车都停在那里，有人就鼓励大家都不要走，砸了城管！有人问：砸不砸？有人答：砸！都拦着不让走，赌咒谁不砸谁是耍种！喊着都上啊！一人上前，就都围上去了，几人一

---

<sup>①</sup> 每次“跑事”费用开支，或者由组织者出钱，或者由参与者对钱，事成之后，若有补偿等“收入”，再酌情“算账”。

冲劲，先上，就都上了！进去一看，里面没人了，都吓跑了。人跑了砸东西！进门就砸，门、窗，砸！桌子腿在地下焊着，也薅（拔）起来，砸！饮水机，砸！“看家”（看热闹的人）是些卖东西的小贩，也恨城管，也跟着砸！有人拿着城管的帽子，砸不烂，上嘴咬着撕！（比划）走廊最西边一间门锁着，砸锁踹门！门没掉，在门框上侧歪着，人钻进去，砸！见啥砸啥！最“过瘾”就那一次！“砸完趟一边，到人群里头了。”开始还说要拖城管的执法车哩，“拖到一边砸了！”，只说没敢砸……。这事不能说，现在也不敢乱说，除了给你说。

还有一回是打北关窦先锋。那是个地痞，北关一霸，人称“第一赖”。村支书栗卫华到乡里修村里水泵，回来时开车碰着他的四轮车了，他的车停在街当间挡着路。他开车在后头撵上来，差点把卫华的车挤沟里，俩人争执动手。卫华打电话给村里弟兄们说：你哥我挨打了！一喊村里人就去了。到集上店铺先借一棒子，铁锨把子，朝着窦先锋“恶扑”过去，三杆子没“擴”他身上，他扭脸逃跑，我们把他四轮车开回来了。北郊派出所开始还横，后来不敢管了——谁叫咱是艾滋病哩！最后他们托人说情，赔 900 元钱，车还给他了。还从路边骑回来一自行车，窦先锋的，他也不敢要，都骑二年了。

这是最过瘾的两场事。

### “卧底”与“奸细”

栗可峰说，于安把我介绍给县国保大队长鲁峰当卧底哩。

怎么回事？直接就说你给他当卧底？

那还用直接说？那天我在卫生院输水，碰见他俩都在那。于安给我们互相做了介绍，说以后有啥事给鲁大队长汇报。鲁峰说，村里有情况给我反映反映。

有工资报酬？

不定啥时候给拿盒烟，给 100 块钱，有时候给手机上输 100 块钱电话费。那回林山要到县城闹事，我就反映他们要上访。这都事先给卫华、林山他们说好的，对咱自己人有利，把咱的人有啥要求给他先“递个话”，对咱不利的話不说。每回反映事情，就给拿盒烟、100 块钱。拿过四五回。那回武汉开会回来，13 号，问我开会情况，问都谁去了。其实他啥都知道，谁谁代表啥组织，他都知道，说网上清清楚楚。

那你是双料间谍了？

可以这样说。得对咱有利。不管让他知道的，绝对不能让他知道。

你从于安那里拿过钱吗？

八月十五，派出所打电话让我过去，给我 500 元。说，这是所长的意思，跟俺（派出所工作人员）一样的过节补助。

那你也是于安的卧底了？

不是。他的卧底是老点。实际上这 500 块钱算是还我的炮钱，还不够哩，那回跟栗一交 10 多户一车拉走的。他们乱罚款乱抓人，村民告了，他们害怕了，这是堵我嘴哩……。（田野手记 20080706）

村里人知道栗可峰当卧底的人不多，但都知道老点是派出所的“奸细”。知情者说，他们不一样，栗可峰绝对跟村里人是“一势”。国保大队鲁峰那人也不错，不像派出所于安跟村民那么对立。上访的事归他管。谁没事想上访哩？都是实在没法了才走这条路，真遇着没法的事了，可峰“带给他话”，说不行就上访。他就说不要上访，我给你反映反映。有时也能起点作用。他们就害怕老百姓上访。（20080708）

也有人说，是官刁似民（官比民刁），“造假打假”，乡里、派出所叫村里人自己斗。啥内奸？是他们的的方法手段。这边叫你举报有奖，那边给被举报的人说，某某举报你走炮哩，在那那正装货哩，你说我们管不管？我们也不想得罪你……。挑着两边有仇气。村里也的确有人太奸滑，心术不正。村里人不一心，上面啥情况一点摸不着，村里啥情况人家一清二楚，他在暗处，你在明处，有一点动静人家就知道了。人心不齐，咋会不收拾你？

#### **“管闲事”：谁来主持公道？**

2007 年 6 月间，一进村，华中就告诉我，正管闲事哩——

“黑脸”栗可应在高布袋炮厂被炸断一条腿，还有一两万工钱、7000 元货款在高布袋手里。日前栗可应与兄弟媳妇去厂里要钱，高布袋一分不给。还说，别在这耽误我生意，抬了撂坑里！想打官司我破上 10 万，不服气叫他爷几个都来，来几个撂倒几个！村里人很气愤，想找几个人去“勐”他，拉他的东西。老党员栗可栋、栗可顶不同意，说那样干违法。想告他，又没有证据——当时医院检查的单子都在高布袋手里。栗可栋说找乡里说说，要回来万儿八千，别的指望不大。村支书栗卫华对这件“闲事”的态度犹犹豫豫，说，老点跟高布袋又勾连一块了，叫老点出面管这个闲事，老点跟黑脸一个门里关系也更近，他不管了再说。又说，先礼后兵，先给乡里派出所打个招呼，不行了再说。还说“栗可应不是艾滋病人，高布袋是艾滋病人。”

老点，点子多，脑瓜子聪明能办事。有一年快过年了，去人家金丝猴糖厂“想点子”，说是找工作打工哩，给人家掏身份证，“不小心”掏出了艾滋病人证，人家赶紧给他两箱金丝猴糖打发他走人。高庄炮厂老板高布袋看中老点的才气，聘请老五在炮厂当经理，年薪 1 万元。高布袋跟派出所所长于安是干亲家，所长在高布袋的炮厂有股份。开始银庄人通过老点找高布袋“管闲事说情”，再后来，老点跟所长的关系也好得很了，可以直接跟派出所“说



情管闲事”，不必再通过高布袋。他们三人关系一直很好。（20051210）

一个来走亲戚的外村人，看起来跟华中、卫华关系很熟很近。大约实在看不过，说：天下还有没有公道正义？没了王法了，还是不是共产党的天下？旧社会恶霸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啊！高布袋平时不敢承认自己感染艾滋病怕失身份，现在想拿艾滋病耍赖讹人？栗可应不是艾滋病人，可是他弟兄仨死了俩都是艾滋病，现在他养着一堆艾滋病弟兄留下的孤儿还有一个老娘，一大家子老老小小全指望他养活，一家人的顶梁柱断了，这些人高布袋养活？炸断一条腿事实清楚，还要什么证据？！你们栗庄名声在外，还替别人要帐哩，自己人受这种欺负，丢人败兴！老百姓的命也太不值钱了，一条腿至少还不值10万？卫华你就当一回可应的爷们，把支书的身份撂一边！现在形势比前几年那时候好得多，于安不敢咋着，C处是生怕“闹事”，村里人遇上难处了不指望你指望谁？你在这位子上站着，不给百姓办事百姓平时维护你干啥？于情于理于法你们都占着，不主持公道没有道理，卫华，这闲事你得管！

华中说，我去通知他们几个？

卫华还是犹豫着，“拉他东西犯法不？他们几个不叫我出面……。”

正说着卫华手机响了。

乡司法所长诸建营打来的：先找律师写个状子，要求赔偿二三十万，30万赔偿不算过分，说说（说合通融）最少也得10万。这样去找高布袋有个依据，省得咱说5万还像讹诈他了。状子给乡里派出所也送一份，不越他门槛。诸建营是滩头村人，自己村爷们。

卫华才算稍稍打定主意管这个“闲事”。想想又跟C处打电话说这件事。当时C处在省城郑州。电话中C处问，啥时候事？跟乡里说了吗？说就这两天的事，找过陈镇长。C处说，反了他了，想欺负咱庄哩，把他炮厂封了！叫他干不成！不过接着又说，等我回村里再说。

（20070621 周四）

最终，据说，栗可应还是没有得到赔偿，只是讨回了部分工钱。

### 一些事不大，“管”大了

栗可昆一向与侄子国民关系很好，侄子对可昆的依赖信任超过对自己的父亲。听说侄子的儿子小刚出了车祸，栗可昆即刻赶过去，下车就被对方打得住进了医院。原来跟小刚相撞的是县城北关的回民。两个人骑摩托相撞，都受了伤。村里人听说栗可昆挨打，想“管闲事”，可昆不愿惹事，想息事宁人。可对方反倒不依不饶，要求赔偿，放出话说，找几个人瞄着小刚，要把他腿扭断。北关派出所出面调解，要侄子国民家出几个钱，把事平息了，说对方是回民，惹不起。国民在镇上开个缝纫店，两口子胆小，吓得晚上不敢睡觉。栗可昆说惹不起躲出去做生意。可是想躲都不行——老点又出面“管闲事”了。开始老点找到国民说：官的

私的都不用管，不用怕，1分钱不用出。之后又找国民说，人家打听清楚了，“瞄住”你住哪了，要收拾你，知道你没病毒（如果感染了艾滋病毒，别人就不敢惹了）。他们不一定敢下手，勾结镇上地痞找事。派出所通知栗可昆跟村支书栗卫华一起去B镇派出所。北关派出所来俩人，老点，于安都在。老点让烟让茶，就象在他自己家一样，于安学习了，一说事就出去了，回避。自从省里派调查组查他的事（详见第五章之四），他就不敢缠银庄的事了。老点说，出3000元摆平。栗可昆说1分没有。

村人都知道，老点难缠没人敢惹他，说他勾着派出所利用艾滋病人中的弱智“糙事”，到处插手“管闲事”。他跟北关回民勾结得紧，前几天还说县城北关回民找他，想打刘楼闫新华。闫新华也是个混家，不好惹，他掂量以后，没管那档“闲事”。现在插手这档事了，以为有利可图。栗可昆说，有些事不大，“管”大了。他们是眼气我，想着我这些年开办孤儿院为大家办事得着多少好处有钱了，想讹诈。我是不想找事，这些年给大家办事，能管一家算一家，大家日子好过些不找政府麻烦了。这些年没求过他们（政府）没给他们添过麻烦。这一回如果真闹大了，我就“破”上了，把家里一摊子安排给侄子，给他打！逼着人造反！就凭我的为人，找百八十人“管闲事”松松哩。已经叫栗可峰给国保大队长鲁峰递话了，说不中就上访，鲁峰管上访的事，他说不要上访，他再给问问。

一年前，华锋网厂老板窦全胜与投资方老总发生纠纷，找人打了人家老总。人家当时不吭气走了。春节前高速路上两个小车挤着当时的打手怀长，挤到路边说是要问路，用棍子把他的头捣了几个洞，打完走人。大年初一又有几个人找到家把怀长又打一顿。都传着说，怀疑是那老总找人干的。

“公安不公，民间私了，助长黑社会势力。”栗可昆说。

### 一场全村艾滋病人座谈会

时间：20070130 周二

地点：银庄村委会

参加人员：工作队C处长、B镇党委张书记、李副书记、银庄村干部、银庄村艾滋病感染者。

我到场时会议已经开始，便在后边门口坐下。只见工作队C处长、B镇党委张书记、李副书记三位领导坐在前台，C处正在讲话——

……今年春节，艾滋病人每人一件大衣，一家一床被子，都是最好的，军区仓库直接调拨的。8月15发了月饼、油，除了艾滋病还发给了30多户贫困户。给了你们这么多好处，应当记住！不要总是不满足，不要乱放炮！上级领导来了，冒一炮，上级会认为多少年了你

还这样，不管你了！咱不就是哄领导哩么，哄得好，该有啥好处就有啥好处！张书记俺俩不会喝酒，还去给人家喝酒，还不是为了春节时候能为大家争取点药，抗病毒药。另外孤儿院也给点。可以理解吧，大家都有孩子，过年了没有父母了，孩子心里咋想的？压岁钱我一定要给，公家不拿钱我个人拿钱也要给！人得讲良心。给老张（张书记）商量一人认养一个……。这些孤儿，平时买个书本，谁给他一个钱呀？讲到这里 C 处很动情，拭泪，台下女村民也跟着流泪。

这时的会场非常安静，人们认真听工作队长讲下去：（春节救助）保证大家都有点，看开一点，多一点少一点不要太计较。我不搞平均主义，除非都是穷人。大家要相信我。银庄的事，我会管，孤儿院我也要管。我相信 99% 群众是好的。群众给我们立碑送匾我很感动。我们工作队来之前，省委组织部就说这是代表党的，碑是必须立的。我背后有省委省政府支持，要钱打报告，主管副省长亲自批示必须支持。我是代表党和政府来的，来之后领导一次次来看我，好多领导关心我支持我，要不是一分钱也要不来。

我只是过客。老张（张书记）跟我不一样，是本地人，干工作要顶住多大压力？！在这里台上坐的 3 个人都是好人好官。包括这次查炮，一拖再拖，光宣传不动作，也是为咱争取哩。他在县里，家都在这里，要顶住多大压力！……你们要感谢乡党委，今年春节一定要过一个安定团结的春节！春节前电影先演两天，正月十五还是唱大戏，坚决高高兴兴过个年！花几个钱算啥？我跟张书记出钱演 3 天，谁想再花钱就再演，一家 200 块钱算啥？大家如果认可我的工作，就多帮忙，希望大家多帮忙！对我，对张书记，多多帮忙！……

C 处讲完，张书记接着讲话。张书记说，讲讲国家政策——

孤儿孤老每年将要增加救助 300 元。享受单亲救助政策必须火化，这是国家政策，必须按政策来。问过能不能下不为例？民政局回答，不存在下不为例。

村民问：火化没钱咋办？能不能不要钱？

张书记说，没有这政策。老辈封建迷信，火化了再埋，占用耕地。大城市、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埋，一人一个骨灰盒，有专门藏盒地方，我们也可以这样。

这时村干部栗新臣问：上级都有啥政策，能不能再给大家讲讲？

不知为什么这话会惹得张书记突然发火了：啥政策？你们村干部要清楚！问谁？你们使的工资虽少，但这是你们的责任！你不能推到镇政府！

C 处显然是想帮助张书记，他说，这些政策，都是张书记一张一张跑到民政局给你们要的……。

张书记说：你提的问题首先你应该明白的，你不明白是你没有尽到责任，你们 4 个干部

就是代表你们4个村的群众。

C处：你不能代表群众，相信群众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好的。你不能负责就不要干，我到B镇不是1分钱不多拿？……哪儿都有矛盾，公安部长发东西还吵架哩！

张书记：就是西方资本主义也是各人站到各人立场上，私心大于公心！

……

遭到这样莫名轮番“轰炸”，栗新臣不再说话。

张书记换了话题：烟花爆竹，利润高生产简单能挣钱，但是与上级政策不符，必须取缔。

老六媳妇说：夫妻都是艾滋病，不帮助（不救助，没有救助政策），不死都活着咋弄？不做炮没有别的门路。

张书记说：养羊么！资金已经到位了，在会长手里，现在已经成立了艾滋病理事会。养羊，按户，艾滋病每户1000元，买三五只母羊，星星之火发展经济。这是扶助政策，不搞平均主义。这是跟爱德基金会第一次合作（见第二章），如果搞得好还有第二次。这是聚宝盆，你们要利用聚宝盆去生金。人家爱德基金会是对全世界各国搞养殖、孤儿救助，在咱县还扶持有孤儿。你提出的问题，就可以养羊解决。

村主任栗卫华：艾滋病户还有得不到羊的哩？

张书记：12万，胡院、柳院还没有开展，银庄已经先行，合作好喽，人家包B镇。5万大棚款，除去已经给村里用过的7000元办公经费（见本章之五），剩下的作配套，养羊搞防疫。这个养羊项目，村委、艾滋病理事会操作，镇党委协助。春节前后协助选羊买羊，每户900元—1000元，要防疫，耳标编号，照相寄回给爱德基金会。人家爱德基金会，国外国内资金很多。烟花爆竹不能再搞，一旦出事，各级负不了责任，事情大了要坐监啊，判我刑啊！养羊205户，第一次120户，款已到位，每户1000元。五户联保已经成立了，组长征求乡里意见，买羊年前年后？乡党委政府不表态。第一现在羊贵，每斤6.5元；第二过年时小偷多；第三会不会杀吃过年？

章月英的丈夫艾滋病去世，本人也是感染者，一个人带3个孩子，大儿子还患有肾病，生活十分艰难。眼看会议就要结束了，她就走到台前，低声问：俺家的事，困难得很哩……。

张书记高声说：个性问题不要再提，上级没有专项资金！现在找得少了，大家有事干有钱挣了，以后不要再找了！

章月英满面羞惭退回去了。

## 五 “造假”

## 假药

2002 年发现假药阿莫西林。先发现包装盒不一样，颜色发暗，村医栗中祥尝了，无味。然后又寄出去化验，人家化验单快件寄回来，也证明是假药（村民拿出快递信封给我看，但是化验证明没了）。艾滋病人写一份材料到卫生部上告，被拦住了，每人赔偿 120 元，这事不让说了。几起假药事都压住了。

老五说，2004 年我用艾滋病治疗卡开出地奥心血康是假的，我吃了有反应。又花 9 元钱到卫生院买一盒，留着发票当证据。我拿着发票找栗学广，问：“给我们治病的药是假的，为什么给正常人用的地奥心血康也是假的？”栗学广怕我揭露他，给我 1000 元，说是补助，叫我写条，我说不会写字，按个手指印。春节给 200 元，打电话叫去他那里拿，给 2 个春节了。每年还给我送挂历、茶叶。

今年（2006）2 月 9 日下午，萧峰到我家，我拿出假药让他看，问他：“这药是从哪里进的？”萧峰说：“不能用，咱调。”“我不给你调。”萧峰说：“药是从卫生局进的，投标进的。”我让他看小美的化验单：“子宫肌瘤还出血。”萧峰说：“过了十五，我请两个专家来给你们俩会诊，一人一个，该吃药吃药，该手术手术。”2 月 10 日上午 9 点，萧峰来送两盒拉米夫定，又跟我要假药：“你留着有啥意义？”他说。“你拿去有什么意义？”我说。这些假药，我专门留住，“有用，可是有用！”（田野手记 20060210）

万里说，2005 年 10 月，我从 B 镇卫生院领取免费药穿琥宁注射液，这药控制使用，“厉害了才给用。”我领取 4 盒，一盒 10 支装，标明有效期至 2007 年。当时就发现有沉淀，我自己用针管抽出上面清的，自己扎针输用，用后心里憋得出不来气儿，难过得很。不敢用了，才去找医生问，胡医生说，使热水烫一下就行了。回家真烫了，还是不化，输用了 2 盒，还剩 2 盒不敢用了。今年（2006）正月间拿着一盒药又去找他们，见萧峰说：这药是假哩，纯（都是）沉淀，我要找院长，到卫生局告你去！萧峰说：“别慌，叫我看。”我递给他，他不还给我了，说：“再进粉剂的给你，效果会好一些。”到现在也没有给我药。我还要再去问问县卫生局，这一回头夸了也不给他了，还有一盒得留着。（照片 44）

## 假本子

当年卖血，有人用别人的血作检测“造假”冒充健康人，卖血挣钱；现在又有没有感染艾滋病毒的人用感染者的血化验检测“造假”，冒充的艾滋病人，为享受艾滋病人救助政策。于是出现一批“假本子”。村里人说，开始都不敢检测，第二次检测回来，有病毒的发了一袋米，到第三次检测，人就多了。第四次检测时，带病毒的到年底给 100 块钱。后来检测的越来越多了，结果发现有假哩。第五次检测时，就盯住了，假的罚款，发现假本子罚 1000

元。“查住的都是胆小的，胆大的查不住。”那次借着检测 CD4，说“打假”，并没有检测 HIV，根本没法鉴定真假，这里人都不懂，胆小的不敢去了，就露底了，胆大的只管验，没事。现在村里还有十几个假本子哩。假本子多了好嘛，上级拨过来的好处多，药也是上级拨过来的，本子借着使（用），基本全村吃药不花钱了（田野手记 200706）

### 造假连环套：户口的故事

艾滋病村不火葬。他们说：“这几个村（艾滋病村）上头不追究。栗庄不兴火化，至今没有一例，火化还多费一项开支。”在老四的葬礼上，我很实用主义地告诉老大，这会影响到以后对孩子的救助，四嫂已经不在了，有火化证明才能报批双孤救助。建议他们算笔账，看看怎样才合算。于是老大开始找户口本，打电话找村主任栗卫华。

村主任栗卫华来了，并不急于动员他们火化。待找出户口本一看，我明白了。户口本上登记的年龄不实。两个最小的孩子，晶晶 15 岁，庆华 14 岁。而户口本上登记为双胞胎，都是 1988 年出生（实际出生于 1990，1991），为了逃避计划生育罚款，谎报了年龄。按照户口本年龄，再过一年，他们超过 18 岁就不能享受孤儿救助了。“报单孤时没有对照户口。这再一报，户口本上年龄一对照出来，怕连单孤也享受不了了……。”卫华心里有数。“就这，哪一天查出户口了还没法。”

老大问现在能不能改户口，年龄再改回来？卫华：难，现在都联网了。

在银庄，许多孩子户口簿上登记的年龄不实。直接原因来自当年一份 B 镇人民政府文件。这份《关于（19）97 年度开展计划外生育“乡征县管财政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长达数页，洋洋 2000 余言，主旨“加大力度，强化措施”罚款，时限是 1990 年 7 月 1 日—1997 年 12 月 31 日。于是 1990 年 7 月 1 日，成为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在这个时间段内，银庄村超生的孩子，在户口簿上的出生时间几乎全部登记在 1990 年 7 月 1 日之前，还出现不少“双胞胎”。还有人索性不报户口。现在，年龄“造假效应”日渐显示出来，眼下会影响艾滋孤儿享受政府补助金的年限，以后还会影响到他们的升学和就业。到时候又会有无数的“谎言”被制造出来。在这个五花八门的“造假”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是行贿受贿腐败之风。一个谎要无数个谎补漏，一环套一环，这是“造假”的“连环”效应。而当下，村主任卫华说，“现顾眼前，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2008 年 3 月乡里又开始抓计划生育了，开会布置流产任务，没有流产的要“买”，一个指标 500—1000 元，价格要看形势“急不急。”村干部开玩笑调侃：“大队支书都要找几个情人，好完成任务。”

最近关于户口的故事又以另一种版本的形式在发生：艾滋病人栗可兵的面子很宽，这一

回为村里人办户口，“一下拉出来8个！”乡里规定办户口必须计生办签字，栗可兵就找计生办主任签的字。怎么签？签“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为什么给他签？闹，不签不回来，往那一坐，栗可兵是艾滋病人，“闹”出名的，曾扬言要杀萧峰一家，他死过一回了，老衣都穿了，啥都不怕了，他们都怕他。“按说都是不合规定的”，新报的户口有栗可交的孙子，都15岁了，栗可询的外孙，外庄的。有人抱养外庄超生的孩子也托栗可兵办户口，“连村主任都不行，派出所不给办。”栗可兵说得很轻松：“找他们去说去，孩子上学，得有个户口。”华中户口簿上登记4个孩子，有他哥家一个。他哥没有艾滋病，有乙肝。艾艾姐弟二人，户口簿上多出来一个妹妹，是叔叔家的孩子。现在不少艾滋病家庭户口上都有亲戚家孩子的户口，“在这上户口好办，弄好了还能享受优惠政策。户口主家不一定能得住好处，该享受的好处乡里民政上扣下，反正有人得好处。”（田野手记 20080601）

### 习惯性造假：艾艾的演讲

艾艾是一个聪明可爱的女孩子。她6岁失去妈妈，8岁又失去了爸爸。“北京慈善行动”到村小学为艾滋孤儿捐赠学杂费和文具，在捐赠仪式上，艾艾朗诵《慈善行动 爱心无限》，感动得很多人落泪。艾艾把“演讲稿”拿给我看，的确，写得很感人。特别是其中写到艾艾和弟弟一双小儿女失去妈妈爸爸的悲惨经历，不能不令人难过。但是讲演稿中艾艾爸爸的死亡时间被提前了一年——艾艾的爸爸去世时我在场，并且参加了葬礼，所以知道。那是一个非常悲惨催人泪下的场面。艾艾说讲演稿是老师写的，演讲时间是元旦，当时爸爸刚刚去世不久，老师说让时间提前，跟妈妈死亡的时间近一些，这样更感动人……。艾艾的老师我见过，是一位很有爱心的年轻女教师。那次专程拜访她，就是因为看到了她写在孩子们成绩单上的极富爱心的评语。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撒谎？也许这是一件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但是，一个老师对一个孩子，制造一个毫无必要的谎言，完全没有必要的说假话，有什么意义又意味着什么呢？为了逃避计划生育罚款，户口簿上艾艾的出生时间被提前了整整6年，她一出生就降临在一个谎言的世界里，现在她的爸爸死亡时间又被无端地提前一年。连生命都可以任意“造假”，对小小年纪的艾艾来说，她将如何面对自己的人生如何理解这个世界？我非常难过地自问：难道，说谎真的已经成为习惯，成为我们国民性格的一部分？

### 造假的惯性：“旋耕”着火麦地

莫庄组长莫昭红说，今年（2005）收麦子时间，着火了，莫庄着了40多户的麦地，将近300亩。他们把地旋了。怎么回事？造假么，掩盖现场！大型收麦机在晌午头收麦，不知道是小孩不懂事玩火，还是从机子上燃烧的火，反正麦地着火了。我们报告给公社（镇政府），想着领导能给群众点补助。麦子着火了，有的人家就没吃的啦，都在那盼着。公社去人看了，

当天下午。黑了，来了两个旋耕机，把地旋了，麦子都旋下面了，清（全部，竟然）旋在地下了！乡里派的旋耕机，还要了俺村里 7000 块钱旋耕费，把俺村的办公费都给扣完了，俺村干部算是白忙活一年，群众也没有得着任啥。连卞路口乡的麦田也都给着了，也没有包赔。唉，就像那 7000 块钱补助给老百姓不行么？把地旋了！（录音整理 20051206）

### **真真假假：一级哄一级，一级压一级**

老 K 说，开始艾滋病人去上访，那真是活不成啦！逼得，就是为了要药，是真去要求解决问题。到后来很多时候是“假去”，是为了威胁上级，好提要求谈条件，乡里哄县里，县里哄市里，一级哄一级。有时候，是镇上支持叫艾滋病人去“闹”哩，镇上让到县里去闹，县里让到市里去闹，不闹不解决问题。不过说了不能“真闹”。2003 年 3 月，上级拨给镇卫生院的 20 万救助资金不到位，被截留了，艾滋病人吃不着药。镇党委书记到银庄来了，要银庄村支书安排组织人去找市委“闹”，他说“闹是闹，不真闹，找可靠人去，能放出去还得能收回来，不能出大乱子。”镇书记临走又说，这件事不能对任何人说，“出了这门我不认账，我啥话没说。”村支书当时就找栗可运几个艾滋病人去了市政府。“事先安排好，说见好就收，不可真闹。”只有老六不听话，叫回来不回来，费了点劲。当时栗广平已经病重，回来时拉了一裤裆。就这么几个人到市里真真假假一“闹”，市委秘书长立马打电话给县卫生局长，下死命令要县里解决问题。很快，镇卫生院 20 万资金到位。但是艾滋病人真闹起来，就不行了，打压得厉害，不能影响他们的乌纱帽。

老 K 说罢，老 Z 接着说，底下的事就是这，真真假假假真真。不光一级哄一级，也一级压一级。有时候你不说假话还真办不成事！刘老师，我还借过你的威力哩！咋回事？2006 年 6 月，收罢麦，我妹夫与乡邻发生斗殴被派出所抓了。妹来找我去说情——老 Z 是小学教师，算是有“情面”的人——老 Z 说，想着出四五百元钱摆平，叫人先放出来。我到派出所说，你们出警辛苦了，拿几个出警费吧？他们说，不中。一块请吃顿饭吧？他们说，不去。我又说，出汽油钱，拿几个钱？钱也不要。他们说：“于所长说了，非抓人！”这样说了几个小时“摆不脱”，我还急着上班。实在没法了，我就想点子。那时候省调查组才来过不久，正说（追查）于安的事哩。我就说：“前几天到郑州见刘老师和省调查组的人了，他们问于安现在老实不老实，我说老实多了，他们说老实了打电话来！你快汇报吧，看这事咋处理，我等三分钟，还等着上班哩……。”这边叫我妹买一条烟搁下。一会儿，回报的人回来了，说：“烟不能要，人先走吧，以后再解决。”就这几句瞎话管住了（起作用了），不然清摆置（摆脱）不掉。一句瞎话，省几百块钱。“现在的人，吃哄不吃敬，逼着你造假。”“官大压死人，你们是省里的，官比他大！”老 Z 在镇小学教书，



平素印象，他是很守规矩一个人，他说出这番话让我哭笑不得，也感到很吃惊。

## 六 “走进来”与“走出去”

### 走进走出的通道，并非媒体记者

一般都会认为，艾滋病村庄与外界的联系依靠媒体。而银庄的经验不是这样。的确有记者到当地来过，最早的也已是 2001 年，那时候银庄村里艾滋病发病死亡已经整整 4 年（或者更早），艾滋病之于艾滋病村早已不是新闻。银庄村民记忆中最早的那位“美国女记者”，不过是当时的一个传奇故事。村里与记者交情最深的要算村医栗中祥，他与媒体的联系是在 2004 年认识张可之后，几家媒体记者顺着这一条线跟踪而来，于是他上了几家报纸，2005 年还受到邀请做客中央电视台，而媒体对银庄的了解也到此为止。中央台的张洪峰是村里人最多提起的记者的名字，“很多材料都交给张洪峰了，但是后来他不来了，也联系不上他了，他的电话号码也打不通了。”听得出，人们对这位记者的希望和失望。据张可说，张洪峰做的艾滋病村的节目台里不用，他也不干了。在中原农村，一切外来“文化人”，都会被看做记者，对于村民们来说，记者是一个既熟悉又模糊的概念。银庄真正与外部世界建立起关系的，是另外一条走进走出的路。

### 刘子亮：最早“走出去”与最早“走进来”

2001 年 12 月 1 日世界艾滋病宣传日，刘子亮成为国内第一位敢于公开亮相直面社会的艾滋病感染者。刘子亮的家乡和尚庄，距银庄约 40 华里。他是银庄人的老乡，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当地最早“走出去”的人；2002 年秋天，刘子亮来到银庄，对于银庄来说，他又是最早“走进来”的人。当时的村支书栗可昆回忆道：收罢秋正种麦时候，村民领着一人来找我，说有人要找艾滋病村哩。那天村里李可臣因艾滋病死亡，出殡办丧事待客几十桌，我正帮忙“掌勺”。来者自我介绍：我叫刘子亮，也算是个名人，世界上都知道我这个名字。不过像本拉登一样，不是啥好名人，作为艾滋病人在电视台上公开亮相，跟演员濮存昕一起照过相。说着拿出了和濮存昕的合影照片。刘子亮说，他希望了解艾滋病村的情况，想帮助村里的艾滋病人……。听刘子亮说罢，我解下围腰，说，走，家去！两个人谈了个把小时。刘子亮问清了村里情况，说他成为名人后，与社会有了许多联系，一些医生主动找到他为他治疗，还有一些民间医生希望通过他寻找艾滋病人。他想把这些关系介绍到村里，还希望把自己了解到的关于艾滋病的防治知识告诉大家。而这，正是村里当时最需要的。以后他不断带人来村里，有医生有记者。乐国球、赵猛，都是刘子亮介绍来的，人家治病不收费。每次来人我们瞒着乡里，村里自己接待，再负责送走。以后我两次到刘子亮家中请他来为村民讲

解艾滋病防治和抗病毒药物服用知识，每次他都很热情。刘子亮还带李丹来过，李丹办学校想招收孤儿，那一天遇上学功喝药自杀。乡里去人拦截，可运、中才几个艾滋病人用大篷车把他送走的，人家都是来帮咱哩，一定得保证人家安全。

### 张可的“点”与“联系人”

刘子亮第一次进村带给银庄一份杂志，从杂志上银庄人知道了北京佑安医院专治艾滋病的张可医生。栗庄村民可喜、平军到佑安医院找张可医生做检查，张可医生也就知道了河南栗庄并且来到栗庄，栗庄成为张可医生巡诊网络中的一个“点”，村医栗中祥和病人栗可贤是张可的“联系人”。张可通过联系人与村庄保持联系，进入村庄巡诊，收集疫情信息。栗中祥参加过张可在北京举办的乡村医生培训班，栗可贤参加在北京举办的与艾滋病相关的培训班。村里许多艾滋病人还记得张可，“那时候他来多次，一月一次，来过有十几次，集中4天休假自己过来，免费为艾滋病人看病，官方不欢迎，张可说‘我象作贼一样。’”张可还应村民的要求，给村里的艾滋病人讲过一堂课，题目是如何正确使用抗病毒药物。

现在张可很久没有到银庄来了。但是张可还是和村庄保持着联系，通过“联系人”了解村里情况，记录每年死亡人数。栗可贤到北京参加“药物试验治疗”，也会想到联系张可，“看看有啥机会啥项目。”

### 上海学子对艾滋病村的一线调查

2006 春节正月初二到初九，由于参加一个国家社科基金的研究项目，我来到河南艾滋病村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田野调查。这是位于豫皖交界处的一个村子。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河南农村相当多的农民，迫于生计，开始了大规模有组织地卖血……。也就在这个过程中，中原一带的农民开始大量感染艾滋病毒。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之后，这些 HIV 感染者纷纷进入发病期，大量死去。银庄就是其中的一个悲剧。

——《银庄六日》

日记作者丁骋骋，是第一个来到银庄的青年学子。开始我的学界朋友推荐小丁给我做助手，当我了解到他正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专业是国际金融时，我以为是不合适的：学历太高，专业相去太远。小丁本人跟我直接联系，为了说服我，发来简历和一篇论文《美的经济学与经济的美》“请刘老师指教”，以证明他的诚意与实力。我才了解到年仅 31 岁的丁骋骋已经是浙江财经大学的副教授，且论著甚丰。小丁老师让我感动，那时候，自愿到艾滋病村庄的人不多。事实上，现在也不多。

2006 年那个寒冷的冬天，大年初三，小丁来了，拎着一包送给孩子们的衣物和学习用

品。当时我正在和村民们一起埋葬一个死去的艾滋病人，接到小丁发来的短信，便赶到村头去接他。在村里走访一遭之后，他决意为村里作“实实在在”的事情：帮助村里的孩子读书。他说，这个村庄的希望只有依靠下一代了。他当时就资助了两兄妹学费，还计划着回去发动大学生开展“结对子”活动帮助村里的孩子。小丁在银庄住了整整一周，走访艾滋病家庭、走访学校、走访教师，拟定被资助孩子的名单并走访他们的家庭和孩子们交谈，送他们笔记本并在上面写上鼓励的话。

小丁离开银庄的那天大雪，交通堵塞，但是他必须赶回学校上课。他在县城汽车站被困一天一夜，遭遇失窃和欺诈。回到学校，小丁给我发回短信：

哀粟庄村人间惨剧热泪盈眶，  
敬刘老师为人治学感慨万千。  
回忆这一周银庄之行受益很多，  
愿有机会还能见面向刘老师请教。

我请丁骋骋记录这一段经历，他作成《银庄六日》发在自己的博克里，自己说是“流水账”，我以为很好。它们是当时场景的真实记录，也为我们提供一种当代年轻学人的视角。小丁把在村里拍的照片作成幻灯片，在他读书和任教的大学里作了几场演讲，反响十分强烈。

暑假，小丁又带两名年轻人来到银庄，一名是上海复旦大学他的学妹胡佳彦、一名是浙江大学他的学生杨晓慧。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把同学们捐赠的二十多个编织袋装起来的衣物和书籍通过货运公司运到村里，还有一些孩子收到了大学校园里大哥哥大姐姐“结对子助学”的来信。他们的到来给我的课题研究、给这个村庄带进一股新鲜的活力。这一年村里有两名艾滋孤儿参加了复旦大学红十字会协助智行基金会举办的夏令营，协助方负责人就是复旦大学红十字会外联部长胡佳彦；而杨晓慧的艾滋病村庄调查报告获得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优秀论文奖。当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上海复旦大学和浙江财经大学的学生社团都发起红丝带宣传活动，并帮助银庄义卖红丝带。

这些来自上海的青年学子，把艾滋病村庄的信息传递出去，也把外部世界的科学文明之风和大学校园的青春激情向上进取之心带进这个村庄。

### 北师大“农民之子”与登上大学讲台的农民感染者

2006年11月，北师大学生社团“农民之子”邀请我到他们学校做一次讲座。我建议村里的感染者同台演讲，这样的现身说法更真实更有感染力，同时也使人们近距离感知一下“艾滋病人”，有利于消除对艾滋病和艾滋病感染者的莫名的恐惧感。由于“农民之子”的这次活动，河南农民艾滋病人第一次登上了大学讲台。北京几家媒体做了报道。

北师大学生记者章美玲对此次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图文并茂——

11月30日晚八点，由农民之子主办的“红丝带系列讲座”第二讲——“河南艾滋现状及村民生产自救”在教八307举行。主讲人刘倩老师是河南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从2004年

下半年到2006年走访了4市9县数十个艾滋病村庄，到场的还有一名来自河南“艾滋病村”的艾滋病受害者刘阿姨（化名）。另外，《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教育报》和教育电视台的记者也来到了现场。刘倩老师回顾了这几年来她在艾滋病村做科研的经历和她的亲身感受，介绍了村民们的生存现状和他们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刘阿姨动情地讲述了她的家人和乡邻们与艾滋病所作的抗争。（照片46）

12月1日——国际艾滋病日，北师大中北楼后的道路上吆喝声一片，由农民之子主办的“红丝带”系列活动——义卖红丝带火热进行中。“红丝带”是河南艾滋病村村民开展生产自救活动的第一个项目。此次义卖的红丝带均是村民亲手制作，其精致的外观吸引了众多同学。村民刘阿姨也来到了义卖现场，热心地教同学们制作红丝带。“红丝带”系列活动是农民之子为关注艾滋病村而筹划的，包括三场讲座、义卖活动和艾滋病村展板宣传。此次爱心活动受到了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国青年报》等多家校外媒体的追踪报道。

北师大“农民之子”凭着热情和爱心举办这次活动。他们满怀同情倾听刘阿姨讲述自己的故事，并尽可能地向刘阿姨表达他们的爱心。活动日程中专门安排时间带领刘阿姨看北京天安门、故宫，参观大学校园，还安排同学中的“老北京”带领刘阿姨逛北京老街吃北京最有名的传统小吃……。几天交往之后，他们已经把刘阿姨看做自己的亲人，告别时依依不舍，争着与刘阿姨拥抱，大家的手交叠在一起，完全没有了开始的疑虑和距离。

而感动最深的，还是“刘阿姨”柳桂枝。艾滋病夺走了她的丈夫，家里上有80多岁的婆婆，下有4个正在上学读书的孩子，她虽然也感染艾滋病毒，但是家里“顶梁的”，一天到晚忙碌劳作。在这里，她受到所有人的爱惜呵护和尊重。坐在北京的公交车和地铁里，看着天安门、纪念碑和纪念堂，走在前门大街和中山公园的林荫道上，她都会说，我把人老几辈子没有看过的都看到了；在北京老城的名吃店里，同学们请她坐上座奉若贵宾，端来一道道美味佳肴都先请她品尝，她一遍遍重复了又重复地说，人老几辈子的福都叫我享了；12月1日那天义卖红丝带，桂枝“隆重出场”，现场教授大家编织红丝带。那日风很大，她穿着我的大衣，同学们还是怕她冻着累着，早早送她回房间休息，而他们自己却顶着寒风呼喊着义卖红丝带……。这一切都深深打动她。回程一路上桂枝都在说，人家孩子们这样帮助咱，我以后也不能只顾自己家里，还要帮助村里人一起搞生产自救。

那次三场演讲，另外两场的主讲人是东珍的李丹和智行的杜聪。同学们都说，最感人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这一场。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的王巍先生听了这场演讲，事后找到我一定要资助村里失学的孩子，一名品学兼优的中学生在他的帮助下重返课堂，至今他们一直保持联系。

### **编织希望与上海学艺**

与此同时，上海方面的红丝带行动也在有声有色地进行，并且延伸为“编织希望”项目继续下来，由手工编织红丝带，编织中国结等手工饰品，发展为缝纫制作环保袋，在村里形成一个小小的生产作坊。（照片 47）

这件事主要缘于《解放日报》记者林颖。我是在高耀洁先生家里认识的林颖，之后她联系我，就有了交往。2006年10月，林颖利用周末假日到过银庄，从此一心想帮助村里寻找生产自救项目。林颖信息很多社交广泛，又很上心，曾与我讨论过许多生产自救的门路，比如养殖槐山羊、种植青蒿，等等。村里要我帮忙寻找编织老师，她听说后联系到上海一位好心的民间编织艺人，自愿免费向村里人传授编织技艺，并且联系一位热心公益的企业老板免费提供食宿，要我带几名村里女孩到上海学艺。从此上海与村里结缘至今。林颖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于是又联系上了丁骋骋、胡佳彦，上海方面的红丝带行动，就由她们联系上海红十字会共同运作，声势搞得挺大。选用“积极画面”的照片，做成七张巨幅海报。上海好几所大学参与这次行动，还由上海戏剧学院的同学排演一个约15分钟的小品舞台剧，讲述大学生志愿者为一位来自艾滋村的孤儿过生日的故事。

目前，村里在“编织希望”项目的基础上开展环保购物袋生产。这是一项有市场需求的环保生产项目。这种已经不单依靠“义卖”而是纳入市场运作的生产自救，如果能够持续开展下去，当有长远发展的前景。而依靠自己的力量增加收入改善生存环境，其“环保”的意义就不仅仅在自然社会环境，还在人们的心里。

### **狭窄的甬道与被“屏蔽”的世界**

一天上午，接到乌辛堃电话，说他人是在郑州，希望一见，“在一起吃个午饭，谈一谈。”我说，太好了，刚好村里有人在我这里，大家可以见面认识了。当时栗可昆等村里人为寻求生产自救项目的机会来到郑州，就住在我家里。电话中乌辛堃说，好啊，我们乘坐某某的汽车，到你们那里怎么走？我告诉了他地点方位。听到电话那边另外一个声音在说，时间不够，道路不熟，找不到地方。这次乌辛堃似乎很有主意，只听他说，那我们就换乘出租车。

乌辛堃（Humphrey Wou），美籍华人，“中国艾滋援助基金会”（AIDS Relief Fund for China）项目执行主席。如果从2006年第一次与乌辛堃见面算起，已经整整两年，项目书、

预算计划写过无数，而且每次都是乌辛堃主动跟我联系，我也越来越按照他的意图设计修改项目计划书，越洋电话更是接过不知多少次，但是没有一次实质性进展。当初朋友们把乌辛堃介绍给我的本意，是希望他能对身陷困顿中的我施以援手。乌辛堃的兴趣在于“尝试进行一种试验”，“建立一个可以推广的艾滋援助模式”，“扩大项目在中国的农村贡献范围。”这很合我意，虽然听上去有些乌托邦。他是支持艾滋病人生产自救项目的不多的资助者之一，而我也认为生产自救是当下河南农村艾滋病人最紧迫的需求和愿望。再者，很实际的一点，乌辛堃特别强调基层直接救助的重要性，这点很难得，就是他的援助项目，不必通过政府部门批准，直接面对受助方，虽然资助金额有限，但有较大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乌辛堃们是真心实意提供帮助的，栗可昆们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但是，从资助方到受助方，像有千山万水阻碍重重，看得见，就是“接”不上。对于乌辛堃这样比较小比较灵活的国际 NGO，最大的障碍，不是来自官方，而是来自非官方的艾滋圈内的精英。这些精英出身底层，熟悉底层艾滋病社会，因为他们原本就是其中一员。他们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走出来，最早接触到国际国内艾滋救援领域，“占尽天时地利”，从受助这一端占领外边涌进的救助资源特别是信息资源。他们是国际机构进入中国民间草根世界的手杖和眼睛，一些国际机构受助于他们，也受限于他们。一条被打开的通道，又被堵塞了。堵塞通道的人，就是早先打开通道的人。这些外来者，被手杖和眼睛带领着行走在一条狭窄的甬道中，而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空间被“屏蔽”了。

这次，终于，提供帮助的和需要帮助的双方，直接见面了。乌辛堃是真的很想帮助河南农村艾滋病人的。他不止一次满怀同情地讲到张可讲的一个故事：张可为一名濒临死亡的艾滋病人查病，而病人说，我已经几天没有饭吃了……。乌辛堃说，首先要解决的是他们的吃饭的问题。他曾经跟我谈到过的项目中就有这一类的计划，比如帮助艾滋病家庭养奶羊，让艾滋病人喝上羊奶，喝不完还可以去卖；养鸡，鸡蛋由基金会收购后再分给艾滋病人，让艾滋病人喝上羊奶吃上鸡蛋补充营养增加免疫力。这次他又说到，他在下去家访时看到一个妇女在吃面条，只有面条和青菜，油水很少。他说，其实感染者最需要的是蛋白。这时他正跟栗可昆核计，在村里加工豆浆销售，对病人少收费，大豆含蛋白最高。前期小额贷款，如成功再向其他村推广。

那天，送走乌辛堃们 20 分钟之后，乌辛堃又来电话，希望栗可昆到上蔡参加明天的“五户联保试验模式讨论”。栗可昆欣然，说还可以趁机看望生病的朋友抗洪。“五户联保”之类的生产自救项目，是乌辛堃们的“理想模式”。他们的认识误区来自异国的经验和自己的乌托邦想像。他因为不懂得什么叫做“中国特色”，而被淹没在中国特色的汪洋大海之中。但

愿他们这次合作的道路畅通,但愿“走进来”“走出去”的道路越走越宽。(田野手记 20080720)

不久栗可昆 E-mail 告诉我,乌辛堃已经决定资助他们 2000 元买豆浆机做豆浆,让村里艾滋病人喝上豆浆,其他生产自救的项目也在讨论之中……。

就是在这样那样看似偶然的机缘机会中,在与外部世界“走进来”“走出去”的联系互动中,银庄村存在着,变化着。

## 七 “上头来人”

2004 年 6 月,卫生部派专家组到河南检查三个示范区临床救治工作。某庄为应付检查,事先做工作,让病人只说好的一面,不要说坏的一面,使专家得出错误结论,认为该县工作不错,要求实际上工作较好的新蔡向其学习。不巧我正在当地巡诊,发现其实救治工作非常糟糕,药物使用非常混乱,村民对地方官的工作非常不满。检查组刚离开,20 多个村民便进京上访,反映村里存在的问题。

——张可《河南五年艾滋病调查报告》

### 上头来人与下级对应的程式

以上张可遭遇到的是一种“常态”。自从银庄成为艾滋病重点村,常常会有“上头来人”。“上头来人”是一定要认真对待的,这是下级向上级汇报的机会,“干得好不如汇报得好”,这是基层干部的切身体验和经验,而且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基层部门对应各级“上头来人”已经形成一套圆熟的程式。村人跟我讲述银庄村“上头来人”——

一般省里来检查的多,他们都是到村室(村委会)院里一转,到镇上阳光家园看看就走了,工作队跟着,主要看“六个一工程”。有时候也到村卫生室看看,这提前都有安排,领导要来就准备,不来就不用准备。怎么准备?村医穿上白大褂,安排病人输水“配合检查”。要是中央来人,还得有市里领导跟着,就主要看村卫生室,有时候也到村里走走,派出所有人跟着。

昨天(20070605)副省长来了,也有人说是来的副省长的秘书,反正是“上头来人”了。头一天村里大喇叭点着名吆喝:谁家路边麦秸赶紧收了,不收勳沟里去!提前安排两个人在村卫生所输液,他们一个是滩头村村医的二叔,一个是栗庄村医的堂兄,得保证是他们自己人不乱说。他们都是艾滋病人,但不是重病号,都正干活哩,安排他们输水,每人给 500 元钱,事先交代好咋回答领导问话。真正的重病号打发在另一屋里输水,没人去看也没人给钱。来十多辆车,路口站着警察,工作队长跟着从村室到卫生室,一共有二三十分钟。卫生

室一般都叫镇卫生院医生栗昭带 2 个护士去“配合”。这一回栗昭代表乡医院出现，鲁来丰代表县医院——鲁来丰是县里指派来的医生，照片名字挂在村卫生室墙上，平时从来不来。栗树东现在是所长，以前没有所长时是叫栗昭充当所长。人家问村医待遇多少？栗树东说月工资 500 元，其实是 300 元。又问栗昭，栗昭只好说是 600 元，乡里总得比村里高点，其实当时只有 400 元。“对上头来检查的都是胡乱说应付他们，他们走了还是地方上当家，你还不是得听地方的。”（田野手记 20070606）

### 省里大验收

2005 年 12 月，我在银庄遭遇过一次“省里大验收”。几天之前工作队、阳光家园都在紧张准备汇报材料，“迎接省里检查三项工作。”省检查团大队人马来到的当天，由工作队陪着，进村在村委院里转了一下就到镇上阳光家园去了。计划中没有安排检查村卫生室，卫生室像往常一样锁着门，病人看病依然找不到医生。当时村里“非法生产烟花爆竹”成为一切矛盾的集合点，上下关系十分紧张，矛盾一触即发。省检查团进村的前一天夜里，村里险些发生“暴乱”。“派出所到村里查炮，半夜两三点，男女老少都起来了，铁锨、抓钩、砖头都上了，如果他（派出所）真敢动手，村里人非拼命不行了！”但是，白天到村里来的省检查团，却对当天夜间村里几乎酿成事端的“骚动”和白天村里群众激烈的情绪没有丝毫察觉；而村民们对检查团的到来也很漠然。双方都在“黑暗”中，谁也看不清对方。“大验收”的第二天，一些被抓被罚的艾滋病人，家里剩下的孤老孤儿，到县公安、信访办要求解决问题，要上北京上访。（田野手记 20051206，20051211）

### “做局”：不要只相信你的眼睛

我也被当作过“上头来人”，体验过“上头来人”的滋味。2006 年 3 月间，我在 K 市的调查访谈结束后，按照惯例，下一步就是带我“到下边艾滋病村庄看看”。这也是我那次访问 K 地的重要目的之一：当时我已经在村里做过一年多的调查，希望当地领导在带我一起进村时，能够看到我在村里看到的一些问题，跟村里群众直接见面，听听群众的声音。第一站就是银庄，陪同我下去的是一位卫生局的副局长，我很高兴，因为访谈中我已经了解到他是一位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基层领导人，一位陪同接待我的年轻干事不止一次悄悄跟我说到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头天晚上局长与我约定，次日一早从 K 市出发。局长说：“谁也不打招呼，直接进村！那村前两年我常去，很熟。”这正是我希望的。但是第二天局长姗姗来迟，说，等司机哩！9 点半才上路。果真除了司机只有我们俩。上车之后局长说：“直接去村卫生室！”又解释说，为啥晚点去呢？免得卫生室没医生他们有借口。“咱半晌午，10 点以后到，如果没人，看他们咋说！”看来他对村里情况并不陌生，知道村卫生室常常演空城



计。

轻车熟路，10点多到达，村口下车，车停村外，人直奔村卫生室。只见两个村医身着白大褂等在村卫生室，镇防疫站站长萧峰也赶来迎候。而我在村里那么久，从来没见过村医们穿过的白大褂，他们也很少在村卫生室里，村民抱怨说，瞧病找不着大夫，他们忙着做炮哩！而现在他们还特意告诉说，县里派驻村里的鲁大夫到镇卫生院给病号看病去了，“他经常来，就今天不在。”这位名字照片被贴在卫生室墙上的鲁大夫，我一次也没有见到过。牛延东带着孙女蹲在村卫生室门口，感染者牛俊方愁眉苦脸蹲在一边。这时牛俊方站起来拿出一叠处方给卫生局长看，问药价为啥这么高？局长说，这事我不清楚，他们不敢给你乱来。牛延东“随风倒”说一些话，他在早期上访时已与县市卫生部门的领导们达成某种默契，现在显然是事先接到指示前来“配合检查。”因为“7.15”事件被判刑，刚刚保外就医放出来的栗中臣，坐在小三轮上，由老婆拉着过来输水。夫妻两人都感染艾滋病，说，听说上级领导来了，卫生室开门了，过来瞧病哩。被村人称为“铁嘴”的栗新臣极力向局长反映问题：抗病毒治疗不规范、缺药断药、药价太高……。村医栗树东“保驾”，栗新臣说一句，他顶一句，两人对垒，“铁嘴”显然不是对手，更突显出民间话语表达的弱势。栗新臣摆脱村医，直接对局长说，滩头村，现有70多艾滋病人，只有20人用抗病毒药，今年又死人不少。局长王顾左右而言他：CD4指标200以下才能用药，有的人不能用。现在CD4定期检查，有检测仪器，特批给Q县的……

村主任栗卫华来了，打个招呼，被冷在一边。过一会栗卫华走过来告诉我说，松才的哥哥去世了，就在今天。于是跟他一起去看。路上他才说，昨天晚黑，萧峰来村里转了，早已通气安排好了。又拿出一些药单子给我看，说艾滋病人都叫反映药价问题。我说，卫生局领导来了，你直接跟他反映多好啊。卫华迟迟疑疑地说，听说他（局长）不是管事哩，办不了事，反映问题也没用。又说，昨天还没药，今天有了，有了还咋说哩？平常卫生室大门老锁着根本找不着村医，现在都穿着白大褂在那站哩，还咋说哩？才又意识到，村主任栗卫华也已经接到指令“配合上级领导检查。”

从松才哥哥家里出来再回到卫生室，局长说：“村委会、户家，都不用去了，咱去县里，他们县里等着哩。刘教授看还有啥，就在这儿再给大家谈谈问问。”才感到自己完全落入布置好的圈套中，被动而无奈。原本是希望有一个上级了解下层的机会，能够帮助村里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结果是这个“上级”布了个“局”给我这个“上头来的人”看，根本无法触及实际问题。这戏剧性的一幕说明，他们其实比我更了解基层情况。知不可为而不为，跟随局长坐车走人。Q县新落成的县委招待所宾馆里，午间宴会等着我们去开席。

我原来说过，我只相信我的眼睛。现在才知道，不要只相信你的眼睛，在某些时候，你看到的也不一定是真实的。我想到了刘长乐、凤凰卫视、世界舆论的转变，想到一片赞扬声中，高耀洁孤独无奈的忧伤的眼泪。

## 八 轮回？

整理调查日记，常常感到吃惊：许多之后发生的事情，其实之前已经有了征兆，事情背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是当时很难觉察，所谓“只缘身在此山中”罢。

### 非法生产烟花爆竹：“宁可炸死，不愿饿死”

制作烟花爆竹，是一种流行在中国乡间的传统手艺。许多地方的老百姓，在冬季农闲的日子里制作鞭炮，新春时节出卖，补贴家用。这是一种危险的行业，很容易发生爆炸事故，国家明令禁止私自生产。而现在，这里的艾滋病人把它当成了救命的稻草——由于村里没有其他生产门路，艾滋病人到晚期不敢出力，一出汗就发病，加之只能在本地就医才能享受免费抗病毒治疗政策，也不能到外面打工了。——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在非法制作鞭炮，就像当年卖血，是全村人的“生意”。

2004年冬季我第一次进村，杜俊梅是我碰到的第一个被炸伤的艾滋病人。她用围巾把头脸蒙着，只露出一双眼睛和红赤赤的肿胀着的嘴唇，一双手也包裹着，抱在胸前。2005年秋季，我又遇见杜俊梅。她的头不再包裹，袒露着满脸伤疤，她脱下破旧的手套，向我展示一双完全变形的手。（照片48）她当时病重的丈夫已经死去。问：你现在干些什么？答：“安炮捻子。我这手安不了多少了。闺女手快，今天星期不上学，闺女安炮捻，自己挣个书本钱……。”跟随杜俊梅走进邻家院子，这里是一处安装炮捻的作业工场。一群孩子在院子里安炮捻，杜俊梅的女儿坐在其间。只见她双手动作飞快，神情专注。我走过去问女孩：安装一盘多少钱？一毛三。你一天能安多少盘？三、四十盘。能挣多少钱？女孩不直接回答，而是说：十个（盘）一块多……。这时，孩子流泪了，却并不停下手里的作业。女孩用沾满炮药粉末的手背抹去脸上的泪水，脸上也沾满了黑灰色的炮药。旁边，女孩的满脸疤痕双手变形的母亲说：够她使书本钱了，闺女安炮捻的钱，平常买菜买盐也用……。女孩继续插炮捻，低着头流着泪，双唇紧闭，插得极快。这所院落的女主人也在安炮捻，跟她围坐一起安炮捻的是几个妇女。

隔壁另一家院落里，也有两个小学生模样的孩子在安炮捻。再过去是一处无人居住的空房院落，现在也成了安炮捻的场地。村人告诉说，男的死了，女的走了。“丈夫将（刚刚）把房盖好，就毕（死）了。”空房子的门楣上几个大字：鸿程万里，喜禄寿福；两边对联写着：霞光映照幸福家，彩虹降临新宅院。村庄西头、南头的空地里，是更大的炮场。一个个

用玉米秸圈成的“围子”里，是一群群做炮的村民，杆捻子、配药、摔炮饼子、装药……。

村主任栗卫华说，村里找过镇领导。想申请办一个合法炮厂，村民自己集资，以消除家庭小作坊。这样安全生产，有个稳定工作，有个挣钱门路，减轻国家负担。但是申请报告一直未批……。“村民作鞭炮挡不住，合法不合法都要干，说是让我干我也得干，不让干也得干，我得活。宁可炸死，不愿饿死。”（田野手记 20051203）

### 卖血与做炮

村里非法生产烟花爆竹，爆炸事故不断发生，而且情况一次比一次严重。村里人说，现在在做炮的情形和前几年卖血差不多，“基本上是家家户户都在做的生意。”由于做炮的收入高，现在村里和以前比起来确实富起来了，眼看着一些人家盖起了新房，也跟卖血一样，“是拿命换的”。不少人也是看人家干也跟着干，“打轰轰……。明知危险、非法，人家都做哩，你不做，人家割肉吃你家受穷。他炮查住了，还说是你起眼（嫉妒、眼红）举报的，怀疑你奸细。”当地公安部门并不认真制止这种危险的非法行为，而是以查处为名敛财，抓人罚钱从不写任何字据，而且胃口越来越大，矛盾一步步激化，导致民间百姓与基层政府关系的恶化。如果说前几年银庄村主要问题是卖血导致艾滋病引发的种种社会矛盾，那么现在，非法生产烟花爆竹，又几乎成了所有矛盾的集合点。

在村里经常会碰到一些因为“做炮出事”被炸得面目全非的人（照片 49），村里爆炸事故也越来越频繁。村民向我讲述接连不断发生的爆炸事故，我请他们帮我记录下来——

春节前夕，高喜家炮药爆炸，一声巨响，高喜被冲击波撞击到墙上鼻孔出血，一个塑料大盆被炸得粉碎，自家和邻家的窗户玻璃被震碎。这是他家第二次发生爆炸，第一次炸伤了他的妻子。

2007 年 4 月 1 号，中营家做炮，小孩玩打火机引燃炮捻，孩子被烧伤。

2007 年 4 月 2 号，栗可交修理炮捻子机电打火燃爆，栗可交面部、手部烧伤。这已经是他家第三次出事。

当天晚上，莫厂工夫妻二人生气，把自家的炮点燃响了好久，惊动四邻，好多人都跑去看情况，生怕出事。

2007 年 4 月 6 号，华中做炮捻，捻子机电开关打火引爆炮药，三声巨响，场棚炸飞，邻居家玻璃被震碎。所幸华中人跑得快，没有伤到人。

当天晚上高庄炮厂爆炸，厂房、院墙炸塌，死一人伤多人。

已经记不清日期的爆炸事故就更多了：

平安家捻子机出事，平安受伤；

长春家捻子机出事，夫妻二人受伤；

栗留安家捻子机出事，留安妻重伤，治疗无效死亡；

栗洪臣家走炮车爆炸，洪臣的小儿子重伤；

栗可勤捻子机出事，可勤重伤；

栗可宇家鞭炮爆炸，可宇炸伤；

卫华家鞭炮爆炸，重伤四人，花钱十几万元；

中良家捻子机出事，晒药爆炸；

中良四弟家捻子机出事……。

被炸伤的人还有：庆峰、俊民、喜华、马伟、宝国、前强、可应、老五家的儿子……。

栗可珍、莫学磊好些家做炮都爆炸过，幸亏没有伤着人，后怕，但是还在做。

对于银庄人来说，卖血，和做炮，都是以命换命，死里求生。当年，他们伸出自己的胳膊，说：“一只是化肥，一只是尿素”；现在，他们说：“宁可炸死，不愿饿死。”那时候，一边是严厉打击地下黑血站，一边是偷偷非法卖血，结果是感染不治之症艾滋病；现在是一边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烟花爆竹，一边是偷偷非法生产，结果是被抓被罚被炸伤炸死。也许，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卖血与非法生产烟花爆竹，性质是一样的，都是拿生命冒险与市场交换，用血和命换取“资金”。卖血和做炮，是一种特殊环境下维持人们生存的经济基础。就像当年人们以卖血为业维持生计一样，银庄人这一时期赖以活下去的，是冒险从事烟花爆竹生产。

卖血和做炮，都是人们在极度贫困下的自救行为方式。不是好的方式，却又别无选择。二者的不同在于，当初卖血，他们并不知道后果，不知道会感染艾滋病，从理论上道义上他们被认为是无辜的，可以要求政府承担责任；而现在非法生产烟花爆竹，却是明知非法、后果严重，而且一切后果必须自己承担。但是他们选择了“宁可炸死，不能饿死。”是一种什么样的环境条件，才使人们做出这种不顾死活的选择？如果当年的卖血还属诱导被动的选择；而此时的做炮，却是主动选择，选择空间更小，由此导致的灾难，悲剧的必然性意味更强。

### 在劫难逃

这祸，咋真就躲不过哩？！卫华妈不止一次说。

栗卫华家是村里极少数没有卖血的人家之一，卫华妈曾为此而感到侥幸庆幸。后来被鞭炮爆炸事故重伤的卫华妈反反复复跟我诉说她“做炮”的无限懊悔，就像村里许多感染了艾滋病的人无数次对当年卖血的懊悔。卫华妈每次都这样开始她的诉说：当年村里人都去卖血，我们家“忍住忍住”没有去卖，想着躲过了艾滋病，谁知道卫华爸输血感染个艾滋病，人也

走了。不管咋说，寻思总比别人好些，家里没有那么多病人拖累。不防又出这么大一场事，为我治病把孩子们都花干了，早知道这样，说啥也不做这炮！……。这祸，咋真就躲不过哩？！

2005年，村主任栗卫华家的院子里也成了鞭炮作坊。卫华的母亲，这位18岁就入党的当年的妇联会主任，也在插炮捻。母亲护儿子，她说：“卫华是村干部，不叫我做。我做炮跟他没有关系。”卫华妈年轻时当过村干部，比一般村民能讲出更多道理。她说，我也知道做炮危险，也知道做炮违法。可是不叫做炮能干啥哩？村里一家一家都是艾滋病，都难哩很。这两年艾滋病发病后，这些人出去打工也去不了。没有人要，人也没有劲，也干不了了，歪歪动动一出汗就发病。一家人要生活，没有办法，只能做炮。不让做就偷着做。没有做炮的前两年，治安也乱，都去偷，偷鸡偷羊。去年就因为有人来偷羊，贼把俺卫华打得半死。过去做炮的少，人没啥事干，天天都到医院开药，“糙事”。现在去家少了，一天开不了几块钱的药，还去弄啥哩？都在家做炮哩，赖好弄弄，都挣个三十五十。现在都想办法做炮，才稳定下来，也不到乡政府闹事了。（田野手记 20051210）

卫华妈说这话时，她无论如何想不到一场灾祸正在窥伺着她。2006年春天，卫华家走炮发生爆炸。房屋炸毁，卫华的母亲、妻子、妹妹，还有一个前来帮忙的邻居，4人烧成重伤。卫华的妈妈险些丧命，至今浑身伤口没有愈合。卫华的妻子、妹妹也都被烧得面目全非。这是当时村里最大的一场爆炸事故。

2007年初春，刚刚能够下床走路的卫华妈来希望家园找我“说说话”。她用烧伤的手撩开裤腿，要我看她烧伤的腿：（照片50）跟天塌了样啊，俺仨一下子挺（躺倒）那几个月！你想想，啥味啊……。我说，孩子啊，叫我给你摆置干（钱花光了）了，沾亲带故的都借过来了。我几夜几夜睡不着。这祸，咋就躲不过哩？……。（音像整理 20070204）

乡亲们安慰卫华妈说，钱花光了再挣，不管咋着咱人保住了。看看那么多人卖血得艾滋病死罢了！说那不好听的，咱庄不是艾滋病也躲不过那些年的计划生育罚款提留，再看看他们外村日子也好不到哪去，想做炮还不敢哩！“咱农民就是这命，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2008年春节之后，连续发生两次伤亡大事故。第一次，一个在村里打工做炮的人，在配炸药时被炸死。因为是外村人，对银庄人刺激还不够大。5月17日，村里又发生一起更严重的爆炸事故，被炸身亡的当事人是银庄本村村民，全村断电，所有房屋都有损坏。才震惊了村里每一个人！都说，这炮是真不敢做了！但是，没有其他生路，明知危险却“收不了手”，稍稍停息一阵，村里的“非法生产烟花爆竹”又开始继续……。

## 九 草之根

## “草根组织”之于银庄

“草根组织”是艾滋病领域里的一个热门话题。而只有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中讨论中国的“草根”，才是有意义的。草根组织的“根”当在社会的最基层。而这个“根”的力量在中国基层社会非常薄弱。中国社会已有的内在体系是：几千年的传统家族文化和“门头风”，几十年党领导下的行政机构和意识形态。而“草根组织”对中国来说是舶来品。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不需要草根组织，而是这个“根”的力量是隐没的、零散的、很难聚集起来。由于长期以来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全面渗透，历次政治运动和村党支部的组织化贯彻，消解了传统乡村社会的宗族—乡绅纽带，国家权力直达个体农民。其结果是：单个的农民与强势的政府处在严重的不对等位置，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缺位，在利益分配中毫无谈判能力。这是造成农村社会经济严重滞后、城乡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根本原因之一。河南艾滋病领域中许多草根组织是“被组建起来”的，目的都是为了向外寻求资源。而更多的时候，是被动地作为大的 NGO 机构寻求资源申请项目所必须的“采撷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的“草根组织”在中国少而又少。在中国，“草根”的时代远远没有到来。但是“外部力量”的介入，对中国的草根组织起到了催生促进的作用。

观察银庄爆发艾滋病事件的全过程，民众中“组织起来”的冲动十分强烈，从早期的“卖血”，到后期的上访“闹事”，都可以看作是这种冲动的反映。但是，这些行为只可以称之为“集体行动”，而不是“组织行动”。他们有“组织起来”的冲动，但是没有“建立组织”的意识。准确地说，这里的“组织起来”不过是“集合起来”，绝大多数时候都是盲动。银庄的“草根组织”与这个时期其他艾滋病领域里的“草根组织”一样，是为适应“申请项目”的需要而建立的，是外界的要求，而缺乏内生的动力和生存基础。

在银庄最早提出成立艾滋病小组的，是村主任栗卫华。2005年12月，由于张可的关系，村主任栗卫华和艾滋病病人代表栗可贤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全球基金项目培训班”。回村后他们即向当地政府部门要求成立艾滋病小组，因为那一次的全球基金培训班，是为专门资助民间非政府部门参与举办的，规定只能以民间组织的名义申请项目。卫华说：“要想获得全球基金项目，必须建立民间组织。但政府不批准。说，胡闹！外国钱多啦，那是收买人心的，不能用！”但这使银庄人意识到建立民间组织的必要性，也意识到取得政府批准建立合法民间组织是不可能的。于是村主任栗卫华不再出面，而是由栗华中等几个村民感染者出面，分头串联感染者，发起成立艾滋病病人小组。华中说：“一开始成立艾滋病小组，二十来个人。我说你们谁参与，都把电话、姓名报上来。谁有啥事儿，咱都去。不报都不承认你是小组的人，有啥好处也不给你。”他们的想法很简单：“遇事大家一起参与，谁有啥事互相帮助。”2006

年 12 月，银庄村 5 名代表以 5 个民间组织名义参加武汉会。因为会议规定，每个民间组织只能参会 1 人。2007 年，为配合爱德基金会资助的养殖项目，B 镇政府安排银庄成立艾滋病理事会，依然没有登记注册。银庄这些民间草根组织，多数徒有虚名，没有资金支持，很难持续，自生自灭。

### 关爱之家与希望家园

看到希望家园写给资助方关爱之家的“工作总结”，我突然意识到银庄的草根组织正以这样一种方式扎下“根”，慢慢成长——

……经过我们不断和外界的爱心人士联系和沟通，使我们的孤儿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得到了很好的改变，使现有的困难户和孤儿孤老在现有的条件下得到了帮助。在大家的努力下：一、创办了孤儿院，已收养了三十多名孤儿；二、帮助一些慈善基金会寻找救助目标人群；三、协助基金会开展工作，组织发放救助物资和资金；四、在当地开展艾滋孤儿助学助养活动……。

这里的“外界的爱心人士”，主要是指台湾关爱之家。后来还有香港智行基金会和美国亚洲博爱基金会。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这些慈善机构的名称“不方便说出”，冠以“爱心人士”。在“关爱之家”资助下建立的“希望家园”，成为银庄草根组织发展的载体，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开去。无心插柳柳成荫，关爱之家无意之间成就了银庄的草根组织。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这是一个组织机构得以生存的最起码的条件。（照片 51）

希望家园的负责人栗可昆，为人正直，处事公道，只低调做事，“不图别啥。”2006 年 09 月希望家园在银庄正式开办，第一批入住孤儿 20 名，每人每月生活费 120 元。2007 年 10 月增加到 32 名。2007 年 12 月辍学 3 名，2008 年 02 月辍学 1 名。4 名辍学孩子外出打工，他们走后又补充 4 名，保持 32 名。栗可昆的妻子和另外一名聘用的妇女负责为孩子们做饭，凭着这不算多的生活费，维持着比一般村民稍好一些的伙食水平，“顿顿有菜，鸡蛋常吃，隔些天有肉。”除了照顾这些“家内”孩子，栗可昆还负责发放“家外”补助费，他们是升上高中的孩子，每月生活费 100 元。

2007 年起，栗可昆开始协助智行基金会开展助学活动，从开始寻找救助对象并把名单提供给基金会，到后来负责发放学费和慰问品，救助范围不单单是银庄，还有周边其他村庄，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栗可昆凭着自己在当地的亲友人脉关系，收集统计各村名单，并按照要求填表造册，第一批上报 234 人，批准实施 205 人。所有这些全是尽义务。可昆很高兴地说：“只为给乡亲们争取点利益，不图别啥。”2007 年 12 月智行基金会助学项目实施：“一共发放了 49000 多元，不少，给咱地方村民办好事了。就报销过 50 元话费。一开始就说了，

没有报酬。我说我不图钱。”助学资助标准，小学 100 元，中学 200 元，高中 800 元至 1000 元。大学报名 2 人，标准 3000 元至 5000 元，尚没有批准。春节期间基金会发给希望家园里孩子们的食品，食用油、香肠等等，原本是可以留在“希望家园”的——孩子们在这里吃住，栗可昆也统统让孩子们“拿家去”，即使孩子们的父母不在了，也拿回去给他们的婶婶大娘姑姑，“东西不在多少，是份心意，那是孩子们现在的家，逢年过节是他们的‘馒头’。”栗可昆是个重情义懂人心的人。

2008 年 1 月起，栗可昆又开始协助亚洲博爱基金会在当地开展艾滋病孤儿（艾滋病患儿）的生活救助：B 镇第一批 17 人，每人每月 100 元，2008 年 02 月增加到 18 人。之后“又发现 2 人，已申报待救助。”7 月，K 市基督教会通过栗可昆落实天邻基金会资助高中生的情况，每人每年 4000 元。栗可昆还牵线搭桥，帮助 8 名家庭困难孩子进了正生学校，其中 7 名艾滋病至孤孤儿和艾滋病患儿，有银庄的，也有周边村庄的。还有 1 名虽说与艾滋病无关，但是家里太困难，母亲痴呆，父亲瘫痪，也送正生学校去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希望家园”成立一年后，关爱之家为之配备了一台电脑。这在当今信息时代，对银庄草根力量的成长，意义非同小可。华中告诉我，他们如何对照着贴在墙壁上的拼音图表一点一点学习打字。“整到半夜，为给你联系，一封信花了半个月时间才发出去。”学会了使用电脑，大大加强了他们与外界的沟通联系。银庄的草根组织就在这些工作学习的过程中扎根土地发芽生长。

就这样，凭着诚实诚恳与勤奋努力，栗可昆逐渐建立了与外界的联系，同时得到乡亲们的信任与拥戴。栗可昆的“希望家园”逐渐成为一个汇通资源交流信息的网络据点，连接着村庄内部和外部的世界。

中国的草根组织还需要一个漫长的成长与成熟的过程。“外部力量”的介入，催生促进了这一过程。（田野手记 20080321）

### **“草根”的民间往来与社会支助**

村民柳凤英带着外孙牛永强来找栗可昆寻求帮助。柳凤英的女儿卖血感染艾滋病于 2004 年死亡，留下两个孩子，永强是老二，母婴传播感染艾滋病。“女儿婆家村庄艾滋病人少，都还瞒着，在那不敢说，这些年全凭咱村帮忙。”柳凤英说。可昆说，眼下有三条路可走：一、亚洲博爱基金会；二、关爱之家想在郑州收养艾滋病孤儿；三、正生学校。这三个机构都委托栗可昆帮助他们寻找需要救助的艾滋孤儿。第一条路，一月领 100 元生活补贴，“100 元搁家里，能吃到孩子嘴里多少呢？”第二条路，不知道到要等到啥时候。不如走第三条路，送孩子到正生学校，生活、学习都可以受到照顾了。姥姥柳凤英也愿意外孙去正生



学校，就是有些不放心，问能不能按时吃药？“孩子服用抗病毒药已经二三年了。”

牛永强是个让人看了又爱又心疼的孩子。模样很周正，两只大大的眼睛里总噙着泪，又不掉下来，看人怯怯的，问啥答啥。栗可昆与孩子一问一答——

几岁了？

7岁。

叫啥名字？

牛永强。俺哥叫牛富强14岁。

上几年级？

一年级。俺哥上初中二年级。

在家跟谁一起吃饭，吃啥饭？

跟奶。早上糊涂，中午面条，晚上糊涂。

奶对你好不好？

不好。（姥姥解释，奶是个傻子，在家全凭爷爷照顾。小永强查出艾滋病，他爸不要他了，姥姥接回来，户口也迁栗庄了。之后他爸也查出艾滋病，又想要他了。孩子在这里住三年，该上学了，他爷来把他接走了，回去上学。）

学习好不好？

不真好……。考不到90分。数学87，语文79。

老师，同学好不好？

好……。有一个同学知道了我有病，他是二年级的，邻居，跟人家说了，同学不跟我玩了。（姥姥解释：咱庄闺女那时都卖血，玉花，永强妈妈，两口都卖。那庄就这一户艾滋病，歧视，压力大，不敢让人家知道，知道了亲戚邻居都不搭腔。）

学校远吗？

不真远，走路不到半小时，是王庄小学校，在村哩后边。

送你出去上学，你愿不愿？

愿。

愿到远处还是近处？

近处。

那是愿去县城，还是愿去郑州？

郑州。

为啥愿去郑州？

.....

启发：是想去看高楼，还是为去吃好哩？

.....吃好哩。

最后决定送牛永强去正生学校。姥姥又问吃药有没有人照顾？还有穿衣，“早上穿衣裳都穿不好。”可昆告诉她，学校有“爱心妈妈”专人照顾，不用担心。又叮嘱孩子，自己也要记得吃药，千万不能忘了。孩子很乖地答道：好。

小小年纪太懂事了，懂事得让人心酸心疼。

于是栗可昆电话联系正生学校，对方说第二天来车接：“学校有车，方便。”栗可昆嘱咐柳凤英，回去准备换洗衣物，到卫生院把药备齐。

第二天，正生学校新上任的余校长一行来接牛永强，姥姥、爷爷来送永强。可昆曾经说到过这位余校长：“福建人，32岁，作为招聘教师进入正生机构，我们谈了很久，谈得来，人不错。”这时候余校长自我介绍说，多年跟随林老板做慈善事业，工资从100—200—300—500—800—1000元慢慢长上来。后来来到正生学校。余校长与栗可昆说起学校一些事情：上次借全国扶贫基金会名义来的那几个人，孩子们的资料都拿走说是搞募捐，后来给了点破衣烂鞋，“就是募到钱也不会给你。”有一家基金会捐赠给正生学校30万元，委托周口慈善总会转交，就再也要不回来，说是转给县里慈善总会了，去找县慈善总会，还是要不回。

### **博弈与磨合：草根-政府-NGO**

事实上，民间与官方都在小心翼翼地审视对待彼此间的关系。

作为民间机构的负责人，栗可昆踏实做事谨慎做人。初中文化，当兵、打工、做过各种各样小生意，阅历广见识多，用在外面的“历练”操作农村事务，有独立见解和自立能力，识大体顾大局，不“出格”不胡闹。他在艾滋病疫情爆发期间担任村支书，有应对处理非常时期紧急情况的经验，最重要的是，在处理这些非常情况的过程中公正无私深得村民拥护，在与当地政府交道接触中懂得把握分寸，在群众中口碑很好，当地官方对他印象也不错。这种经历和威望，使他可以运筹帷幄组织人马，也可以坐下与官方谈判，还有能力接待关爱之家、智行基金会等等这样的“谨慎的资源提供者”，为村庄争取到利益。栗可昆很注意做事的分寸。奥运期间，有人要带一些做慈善的外国人访问希望家园，“想帮助孤儿”，栗可昆婉言谢绝了，他说，奥运敏感时期，一群外国人太招人眼。有人找上门推销“艾滋病特效药”，“价格优惠有提成”，栗可昆说坑害老百姓的事不能干。正生老板看中栗可昆，几次聘请他到正生学校，找他谈“模式”合作，“按照英国的模式开展孤儿救助，申请英国基金”，可昆

没有答应，他知道自己的根在银庄，他不能丢下这里的孩子。

实际上，不单栗可昆，凡能够进入当地的外界 NGO 机构也很注重与当地政府的沟通协作。有基督教背景的爱德基金会和亚洲博爱基金会通过 K 市宗教局与当地基督教会合作，每次进入 K 市，宗教局张科长都会出面。教会为博爱接风，宴席上会长马牧师对博爱老板麦克说，张科长很支持我们工作。张科长说，宗教界的事就是宗教局的事，我的工作就是协调，“有些事，他们（教会）出面不方便，宗教局出面协调，”“一个巴掌拍不响，互相补台，不是拆台。”进入银庄的香港智行基金会、亚洲博爱基金会、爱德基金会，都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可，每次活动都“经过政府门槛”，虽然具体做事依靠的还是草根组织希望家园的栗可昆，偶尔县慈善总会会派人到场。在“做事情”的过程中，民间草根、官方政府、外界 NGO 互相试探着“合作”，这是一个博弈与磨合的过程。

### **银庄经验：草根组织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

在这个过程中，银庄的草根组织正在慢慢地扎下自己的“根”。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他们对艾滋病领域里争吵不休的是是非非不感兴趣，而是踏踏实实做自己的事，依靠自己的力量寻求生路。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地方当局不再过于担心“草根组织”的“不安定因素”而慢慢对他们放心，也尽可能避免自己沦为某些“艾滋病消费者们”牟利的工具。银庄的草根组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步争得自己生存的空间，生根发芽成长。

银庄经验说明，草根组织真正能够立足民间扎下“根”来，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逐步培养自身生存的能力：第一在民间号召的能力；第二与官方对话的能力；第三向外界争取资源的能力。这对组织领导人本身的品格能力要求很高，他必须具有协调各种关系的能力。他不是“闹事者”，而是可以与政府谈判对话、协作或者合作的民间力量的管理者。可以组织调动也可以抑制掌控民众情绪，不是不跟政府打交道，而是可以坐下来谈，并从而提升自己在民间和政府眼中的地位。在艾滋病领域中，草根组织负责人更多的角色因素不是上访领袖，而是居中斡旋，关键时刻可以化解民间与官方的矛盾，协调双方关系，但是立场始终在民间，立足民间草根维护草根利益。这需要良好的个人品格、做事能力、政治智慧。

### **可昆的愿望：生产自救，有尊严地活着**

栗可昆一直在寻找生产自救的机会。他说，人靠自己活着才有尊严才硬气。

2008 年春节，希望家园的孩子们过得不错。智行基金会为孩子们送来了食物、文具等慰问品，还有两家慈善机构为希望家园捐赠棉衣，“孩子们一人两套新棉衣，不冷了。”但是栗可昆心里并不轻松。可昆说，有了现在的基础，即使没有了外边人的帮助，“希望家园”也可以维持下去，“本乡本土，这些孩子我自己就可以想办法养活，孩子都会长大。问题是

今后的出路。”他最希望促成的一件事，是一个种植项目。但是没有成功。正生的老板找到栗可昆，说是愿意扶持艾滋病村庄搞种植项目。征集100亩到300亩土地种植药材，每亩给400元钱加200斤麦子，种植药材的收入用来帮助艾滋病人。可昆跟村里、镇里联系，都认为好事情。镇长愿意与正生方面见面商谈；村里召开了动员会初步摸底，村民都乐意，当场报名可以征集到400亩土地。正生要求跟县乡签协议、注册“爱之园”。结果县民政局不批。他看到智行基金会发放慰问品用的手提袋，问我，可不可以向基金会提出，由村里人来做？那次他专程来郑州，目的是为促成智行1万个无纺布手提袋制作订单，就是那一次遇上了乌辛坤。

实际上，在银庄村最早提出“生产自救”的，是第一任驻村工作队。2004年工作队一份“帮扶工作情况汇报”中写道：“在帮扶工作实践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帮扶”不仅要定位在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上，更要把工作着力点定位到发展生产、增加其“造血功能”，增强群众生产自救能力上……结合银庄村、特别是艾滋病患者的特点，努力帮助群众选建一些符合该村实际，投资少、见效快的项目，吸纳本村劳动力，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致富，引导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切实帮助群众脱贫致富。”这份报告还具体提出了几种生产自救的门路：一是结合当地是烟花爆竹传统生产基地的特点，在坚决查禁非法生产烟花爆竹的同时，采取堵疏结合的办法，引导群众规范生产，使之真正成为艾滋病患者生产自救的路子。二是到鹿邑县等地考察尾毛加工业，吸引投资、引进技术，把尾毛加工业作为致富项目之一，现已立项。三是工作队正与上级农林等部门联系，积极争取项目，争取把银庄村建成育种、育林基地。工作队真的从林业局为银庄争取到5万元大棚种植款。但是，5万元大棚种植款最终也没有落实到银庄，当时提出的烟花爆竹、种植、养殖、劳保手套和尾毛加工等多种生产自救的门路中，在银庄村发展起来的只有烟花爆竹，但始终是“非法生产”而且充满危险。

“生产自救，有尊严地活着”，是银庄艾滋病人代表义卖红丝带时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栗可昆们强烈的愿望。经历了病痛的折磨、死亡的恐惧之后，银庄人逐渐从最初的惊恐混乱中镇定下来，他们知道自己只能接受现实面对现实，“只能自己靠自己”，单单依赖别人的救助或是施舍是靠不住的。他们说，“救急不救穷”，依赖别人不是长事，就是别人好心帮咱，花别人的钱心里也不踏实。他们希望依靠自己的力量有尊严地活着。但是，这条生产自救的道路艰难而曲折。几年过去了，银庄人还在生产自救的这条道路上摸索。他们希望生产自救的愿望很强烈，尝试过养羊，当地是著名槐山羊产地，村民有养羊的经验。还试图尝试养兔、养牛、养鸡、种植香菇、大蒜等等，但是都未能开展。主要原因缺乏得力的组织引导。这些生产项目，如果个人干，治安环境太差不能保证安全，“看着在你家里，可不是你哩”，随时

可能被偷盗。如果集中干，“一盘散沙人，心不齐”，缺少启动资金。非法生产烟花爆竹屡禁不止，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们没有其他生产门路，以此“生产自救”，实在也是无奈。如果有更好选择，谁会拿自己的生命冒险？最终使多数人摈弃了这项危险且非法的行当的原因，是爆炸事故愈演愈烈，直至2008年连续发生两次大事故，当事人被炸死，房倒屋塌，全村房屋受到震动损坏，人们被“吓住”了。真所谓“物极必反”。不少人家想“转产”，“靠做炮挣下的几个钱扎本，想做点‘正经生意’。”（依靠“做炮”完成“血腥的原始资本积累”？）

至2008年，村里陆续兴办起了几家小小的“企业”：2家小锯木场、1家水泥板场、1家面粉厂、3家小饭店、3家小卖部、1家小超市。从编织红丝带到上海学艺，银庄与上海建立了联系，一个七八个人的缝纫小组“接上海的订单，加工环保袋。”但是订单常常不足，订单多多干，订单少少干，按件计酬。这些人都是作过炮的。村里人说，“都在自找生路了，炮是真不管干了。”但是，一直也还有少数人在偷偷做炮。

生产自救，对于一个艾滋病村庄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也是一条唯一可行的出路。这不是一件简单的孤立的事情，需要多方合作和长期持久的努力。

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中原大地上经历了艾滋病浩劫的村庄，正在一点点复苏自己。这就是中国中原农村民间的草根社会。只要有一点点泥土，就扎下自己的“根”，慢慢成长。草根的力量很弱小，草根的生命很顽强。

### **华中的愿望：拍一部片子，叫全世界感动**

我在电脑上整理在村里拍下的照片，可昆、华中站在背后看。开始他们很新奇很兴奋地评论着发表意见，渐渐变得悄无声息。一回头，却见俩人眼里都含着泪。也许他们第一次这样看见自己，认识到自己的处境。

华中说出一番我意想不到的话。华中说：刘老师，不能叫咱这些事拍成“片子”么？叫外头人都看看，知道真相，明白我们艾滋病人不是像别人说的那样。也叫下一代记住长辈的事，讲起艾滋病、卖血，也能说出一段真实情况。拍好了管叫全世界感动！当年卖血、治病、上访、有人自杀……，都是我们亲身经历的，不用找演员，我们自己表演自己。“学功发病走路是这样哩，走走歇歇，没有气力……”华中喘息着表演学功。“春营爹是坐着上吊的。”华中又开始表演春营的爹，“我想他没有力气一次完成上吊过程，得分为几次完成。先把绳子找来在门框上拴好，在绳套下面放一个凳子，人坐上去喘息半天才用力把绳套够下来套进自己的脖子，再喘息半天才有气力叫自己从凳子上滑下来让凳子倒下，让绳索把自己套紧……”华中笑着比划这场想象中的自杀，说完了已是泪流满面……

“做出片子，就不能像以前一样稀里糊涂过了。得有个活法。既要对得起先人，也要对

得起子孙。让下一代记住长辈的事，不能叫他们为咱抬不起头感到丢人。”这是华中说出的又一番惊人之语。

华中说到做到。他家里发生爆炸事故之后，华中是决心洗手“不干炮”了。他说，得为孩子老婆好好活着。他在亲友帮助下“干板场”，就是制作建房用的水泥板。在村北头的工地上找到华中时，他和他的妻子正忙得满头大汗，两人满身满脸都是灰土。他们的两个女儿已经上学读书了，不像原来做炮捻时全家上阵，现在只有“扛大旗的”小儿子还跟在他们后面。制作水泥板这活儿很累很辛苦，华中干得很吃力。这种重体力劳动不适合华中，但是，还有更好的选择吗？华中自己很有信心，他说，争取一年把本钱捞回来！累是累点，但比干炮强，不用天天提心吊胆了，心里踏实。

华中、可昆、卫华，还有许许多多的银庄人，让我感动。这是经历了死亡的人。他们在自己“面对死亡”的命运中发现生命的意义，在这种“发现”中照亮自己，升华生命的意义。

当人们用生命用灵魂发声，全世界都将为之动容。“叫全世界感动！”能够说出这样话的华中们，将会让自己的先人后代骄傲，而不会使他们蒙羞。（田野手记 20070625）

## 第四章 相同和不同的故事

### 一 银庄周边村庄的故事

#### “村小人口少，感染比例高。”

乘一辆小三轮车去胡村。胡村属田营乡，距银庄约 10 里。都说那里疫情比栗庄还严重，“村小人口少，感染比例高。”

“全村人口二三百，60 多个艾滋病人，不包括已经死亡的。全村大约 50 户，每户五六口、十来口。”村人告诉我。全是大概数，这是当地人表示“数量”的习惯说法。而在这个小村里，确实没人能说清，“村里没有村干部，没有人管事。”按当时（2005）经验，艾滋病村庄感染者存活与死亡的比例一般是 2: 1，推断死亡人数 30 人左右，一问果然。这样算来，这个大约 300 人口的村庄，感染艾滋病大约 90 人，感染率约 30%，比起银庄，果然疫情更严重。这里偏远更显闭塞。村人不大出去（上访），怕丢人，乡里没来过，县里更不来。村里曾推举出 5 个代表到民政部反映情况，也找过河南公安厅，找过卫生部，答复说修路，建自来水。问：现在有什么要求？答：有药吃就行了。想想又说，打个深水井，现在水污染太厉害。

到村诊所，门上锁。据说村里的诊所也属“六个一工程”，墙上挂的牌子上写着数名医生的名字，村人说都没见过，实际上只有本村一个村医，就是被喊来开门的这位，他说“有诊所，有病人，就是条件差了，没药，有时给艾滋病人输点水，输水的多……。”村民说，感冒通都没有，有病到私人小诊所掏钱买。张可到过这个村庄讲课，辅导抗病毒药物的服用方法，抗病毒治疗效果不错，2005年艾滋病人只死亡一例，“免费火化，补300元。”重点村银庄倒没有这项政策。但是，火化后依然土葬，“死人各埋各地（责任田）。”艾滋病人在本村不歧视，到外面不中。有人领来一个11岁的孩子，张小峰，看上去只有七、八岁，母婴传播。村人告诉说：父母艾滋病双亡，哥哥15岁已经出去打工2年了，老乡带着在山西太原。张小峰上二年级，老师撵后头去坐，同学谁也不肯跟他一个桌，不上学了，现在跟大伯过。村里孩子在学校都受歧视。高中校长当众问村里去上学的孩子：你父母有没有艾滋病毒？孩子们在学校受孤立，受歧视。村里10年没娶媳妇了，只有一个在外打工的去年带回来一个，瞒着人家。

为我带路的张春运，40多岁，兄弟5人，春运排行老四，因为穷，他本人和二哥未娶妻，加上3个妯娌共8人，除了老五，7人卖血感染艾滋病毒，已死亡4人。张春运领养“近门的”3个孩子。没有通过有关部门办理领养手续，也不知道这档事。“领养就领养了，这么长（用手比划）就抱来了，对我可亲。”现在3个孩子都在上学，大女儿放学回家能帮着做饭了。他的房子墙裂缝顶漏雨，不能住了，他打开门锁指给我看，空房墙壁上贴着孩子们的三好学生奖励。现在张春运带着3个孩子住在老五家的房子里，老五两口在外做生意，也算是替他看家。春运很欣慰自己是3个孩子的父亲，“他们都叫爸，要不是这几个孩子，我也一身病毒，活着啥盼头？”春运说，胡村人当年许多是到栗庄卖血，有车来拉。最早卖血的鳖肚，死罢了六七年了，未确证，他媳妇娘家就是栗庄的。70多岁的钱美荣说，她有5个儿子5个媳妇，8人艾滋病，已死亡6人。只有老五夫妇“卖血时在山西打工，没赶上。”她的家中正当门挂着耶稣的画像，村里不少人都信了主。（田野手记20061102）

2008年3月，在栗庄遇见胡村的张春喜，他就是我上次去胡村见到过的孤儿张小峰的伯父，他作为张小峰的监护人来栗可昆这里领取博爱基金会救助孤儿的100元生活费。从他那里知道张小峰已经13岁了，“又上学了，四年级，时去时不去，功课就那样……。”他本人也是感染者。他说，我卖血连5回都没有，就去槐店、刘庄店，“打工挣不了钱，盖房急，也回来卖血，想着去几趟吧，弄几个钱。都最后了，最多四五回。最晚最坏事……。该死脸朝上，不死慢慢晃，命就这样。有钱又咋样？有一个板厂老板，干二三年挣100多万，29岁肝硬化，30岁死了，又咋着？咱比他还强着哩！咱谁也不比，干点、吃点，能过妥了。”

问起收养别人 3 个孤儿的张春运,才知道他们原来是亲兄弟。张春运收养孩子的那一家,也是弟兄 5 人,五弟兄全部卖血,只有老五卖的是乙肝血没有感染艾滋病,“卖乙肝血,100 元一个,一个顶单采俩,县城没有,得上市里血站。村里几个卖乙肝血的,都没有艾滋病。”那弟兄 5 个,4 个哥哥都已经死亡。二嫂娘家是栗庄的,原来就是长山的姐姐,也卖血感染艾滋病。大嫂、三嫂卖血感染艾滋病已经死亡。张春运收养的就是三哥嫂家的 3 个孩子,现在大女儿已经不上学了,初中没有毕业打工去了。村里从来没有人进过高中。四嫂也有病,带着 4 个孩子改嫁,开始婆家不知道她有艾滋病,知道后遭歧视,发病没人管。欠账太多,也不敢回村看病,“本子还在,不敢回来使药。”“现在的丈夫已经被传染艾滋病,住院了,人瘦得很了。那一家也有 4 个孩子,宋楼村的。”

张春喜说,胡村现在还是没有村干部。张可以前常去,跟张春祥联系,当年张春祥他们 4 个上访北京时认识了张可。前年争取了一个项目 10500 元,张可讲讲课,讲服药依从性,到饭店吃了几顿饭,艾滋病人也都去了,“改善了生活,增长了认识。”张可说他赔了 1000 多,再不管这事了,有 2 年没去了。(田野手记 20080325)

#### **“妻输血感染艾滋病,又感染了我”**

王来印,39 岁(2008),王庄寨人。王庄寨也属 B 镇,距银庄 7 里,全村 800 口人。王来印说,村里没人卖血,一是不知道,二是都作生意。“我换大米,一天跑五六里,能挣四五十元,不使这(卖血)钱。”他的妻子陆敏生孩子输血感染艾滋病,“妻输血感染艾滋病,又感染了我。”村里还有一个妇女输血感染艾滋病,子宫瘤手术输血,去年 11 月死的,48 岁。她没领“本”,始终瞒着,在外打工,她自己知道,发病到最厉害了,9 月才回来免费治疗,一个多月就死了。来印说——

1995 年腊月十九(农历),妻子生孩子大出血,剖腹产,手术输血。献血的人就蹲在门外,随当即抽出来就输上一袋子,后来又上血库拿的也有,输血一共花 450 元。1998 年时就发烧,到处看,先是上小地方诊所、县医院,瞧不好,又上周口、郑州。1998 年在郑州六院查出艾滋病,不敢说,瞒着她,悄悄在县医院给她治疗。大妮今年 13 岁了。到有小妮时(2003),妻子发病烂嘴。防疫站焦站长知道,都是打(从)他那拿药,他在结核科上班。自费治病花了五六万。2003 年,她娘家又让查一回,到省防疫站,查一次 HIV 要 120 元。查 CD4 要 500 元,没作。二妮两个月时姥姥抱走了。直到 2003 年 10 月,医生问是不是卖过血,哪儿人?才想起来得这病是因为输血的事。住院时,邻床有个赵德营乡的,也是输血感染艾滋病,跟着他找医院要证明打官司。我父亲去的,父亲比我有文化,我只上二年级。还找一个姓楚的律师,当地人,还交 400 元律师费。结果律师收了医院的钱,不帮我说话了,



说“不管这事了”，400元律师费要回来300元。我们自己到县医院理论，给了（赔付）15000元。

她查出来一年后，我的腿发痒，心下疑惑，悄悄到县防疫站花50元检查，不敢去领结果，后来是镇医院通知我了。2002年领的“本”，是爹办的，他明白，来回跑着问。当时找到肖峰，他不给办，给他“糙”，赖也得赖一个“本”，爹清给他讲理，给他要，“有这病，不给不中！”瞧病钱花干了，亲戚邻居借过来完了，不要“本”不中，这本用6年了。输血的证明，办准生证时被计生办收走了，后来找他要，他不承认，不给，又找出证明人给他要。见俺不愿意，他主动提出来包赔15000元，还是不给证明，俺不“糙”了。“妻不在三年了”，说着泪下来了，赶紧低头抽烟掩饰。爹去年得紧病，脑瘤，死了。成天操我的心，操出来的病。原先都是爹来B镇替我领药，顾及我的脸面。现在靠我自己了，艾滋病政策，自己操心打听，单边户（单亲死亡）的钱自己来领。年前三个月的还没给哩，不找不给，找也不好给。曾经瞒着病情找过一个女朋友，相处2个月，人家不放心，又让上郑州去查，查出来人家走了，分手时双方都很难过。我从此也不找了，不苦害人家好人。

### **“俺庄散，没照住，最后才叫吃药”**

鹿娟，38岁（2008），刘楼村人。刘楼是个大村，人口1000多。刘楼村跟栗庄紧紧相邻，“地块都挨着哩”，政策覆盖情况却相差很大。鹿娟说，她当时卖血到最后了，也说卖得连5个都没有，“没死着，不哩才亏死哩！”鹿娟是大检查时查出感染艾滋病。当时医生也通知了，有人不愿意去，“去的、不去的各占一半。”村里感染艾滋病可能有100人，说出来的有50人，病没发作都不想招摇。死亡20多人。死的人，有一半子是吓死的，“看到别人卖血死了，想着我也卖了，心里害怕。”上几年光死人，不知啥病。现在有的知道了吃药（抗病毒治疗）不至于死，就说出来了。银庄是重点，服药早，“俺庄散，没照住，最后才叫吃药。”没想到这么厉害，东半截都不毛（剩下）几家了。大检查时没查孩子，2006年4月才查出来俺的小儿子感染艾滋病，今年14岁，吃寿赖（吃饭少），长得矮。

## **二 周边县市的故事**

### **全省唯一注册的艾滋病民间组织**

南阳西峡县艾滋病病友联谊会，是全省唯一批准注册的艾滋病民间组织。会长宋书宇多次相邀“去看看”，2007年5月，宋书宇来郑州办事，“陪同当地一家企业的副经理到郑州六院看病。这位副经理2004年查出艾滋病，担心影响提拔副厂长，隐瞒病情，自费治疗。”又电话联系我，于是请他在楼下小烩面馆边吃边聊——

南阳地区艾滋病多分布在南阳市卧龙、宛城 2 个区，镇平、邓县、西峡等县。西峡县感染者 130 多人。西峡县经济发展不错，人均土地 1 亩多，全县发展香菇种植，还有几个企业，是全市最富的县，在全省县级排名 32。

西峡县艾滋病病友联谊会成立于 2006 年。机构设置：5 个理事，每人每月工资 100 元。分工：会长兼会计，副会长兼出纳，1 个秘书长，2 名理事。

经费来源：县乡各机构筹集。2006 年筹款 1 万多元，来自：民政局 5000 元，财政局 3000 元，卫生局 1500 元，防疫站 1000 元，五里桥乡 1500 元，丁河镇 1000 元，回车镇 1000 元，协和医院（原五里桥乡医院，卖给私人了）500 元。联谊会成立后，“上级发给河南省行政事业性会费专用发票 1 本 50 份，用于找钱。”开用了 19 份，其中 1 份作废，实际用 18 份：公路收费站 500 元，超限罚款 500 元，烟草局 300 元，村石子厂（私人合开）500 元，高速公路桥公司两个标段，分别给 300 元、200 元……。地区统管的单位，工商、税务、烟草、金融等机构，财务不好报账，就都没有找他们。“没人跑，就凭我一人跑。”发票本一年作废，2007 年又领了一本。

会长宋书宇个人收入每月约 500 元，包括：联谊会月工资 100 元，手机费 30 元，办公电费、摩托车油费 60 元；乡里每月发艾滋病人生活补贴费 208 元，五保生活费每年 800 元（月均 67 元）；3 口人的土地 3 亩多，包给别人，每年收入 600 元（月均 50 元）。“够花了。”宋书宇说，多跟政府沟通，搞好关系，“他们少吃一顿饭，少喝一回酒，就够咱使了……。”元月外调菌材结束时，有人说外调柴禾（就是外调菌材，用于种植香菇）很赚钱，我到林业局要了 200 方计划，2400 元卖给了私人张建设。我个人没有气力去干，卖给别人去干，他也赚钱。明年想多要点“计划”。

联谊会覆盖全县艾滋病最多的 4 个乡，感染人数占全县 80—90%，“只管这 4 个乡，与其他乡不来往。”每逢端午节、春节、中秋节，联谊会给会员发食品。“艾滋病人谁有困难就找我。”加入联谊会的艾滋病人，死亡补助 200—500 元，根据每个人的经济条件、入会时间，给的钱多少不同。病重住县医院半月以上者，补助 100 元，买点营养品去看望慰问。艾滋病人靳小青，喝药自杀了，她是又找的丈夫，她们全村只她一个艾滋病，压力大。死后村里给 300 元，乡里给 1000 元，会里给 200 元。这样艾滋病人互相劝解安慰，不封闭，不然没人理，心里烦得很。这也是个艾滋病人互助的“模式”。

联谊会还为单身艾滋病人“牵线”。他们很多人还很年轻，才三四十岁。不找外人（非艾滋病感染者）减少传染。“最近我本人也经人介绍一个卧龙区的女艾滋病人，办了结婚登记，女方户口迁来，解决了生活医疗方面的补助，她们当地没有这些政策。”“我 1961 年生，

女方 1970 年生，带一男孩 15 岁。现在有能力了，能照顾她娘俩。”宋书宇只有一个女儿，在乡卫生院工作，一年万把元收入，女婿在县里最大一家企业跑销售，一年收入 10 多万。亲家老两口都是退休人员，一年收入二万三。“他们经济条件不错，不用我操心了。”

宋书宇说，地方政府对联谊会还是支持的，原来还想在全省推广，这是县防疫站长的打算。但是后来“出问题”了：成立不到 2 个月时候，有人背着我上访，到国家信访局去了。阴历 6 月，正热，伏天。国家信访局发文，省、市、县一级一级传下来，副县长、防疫站长到北京接访，这时候上访的人已到郑州，接访的人又找到郑州。双方商谈，县里同意全县艾滋病每人每月增加补贴 100 元。艾滋病一方要求每人给 20 万元，“少一分都不中。”双方僵持不下。10 个艾滋病代表返回北京上访，这是不到一个星期上访北京 2 次。县政府的人也住在北京，还花几万元买了防护服，派去了公安，“看住，只要不上天安门。”这样双方都住在北京，人家是公家花钱，这 10 个艾滋病代表花个人的钱，坚持不住了，只好回来。结果是每人给报销了 600 元路费，那每人每月 100 元也没有了。这事之后县里开会，县长问，谁让办的联谊会？已经办了也就算了，但是“宜散不宜聚。”此话一发，一些想支持我们的单位也不敢给钱了。这是防疫站长说的，他跟我关系不赖，去年还想在电视台宣传联谊会。但是武汉会议后，腊月二十九，内部明文电传，上级让调查我们联谊会是何性质，我见原件了，县里给了卫生局防疫站。答复是：“他们是一个艾滋病病人自发组织，经主管县长同意，民政局批准注册的，成立以来没有发现违法乱纪。”这事要说没啥影响，但是想以联谊会名义在电视台搞宣传，就不行了。不知上头啥意思。

宋书宇说，他原先打牌赌博，1 万元赌光了。现在作联谊会工作，感到自己有用处，很高兴。开始“闹”，县领导都知道我，现在原则以内，张嘴都没事（原则以内的要求都会得到领导认可）。宋书宇希望我帮助他沟通艾滋病病人与政府的关系。他认为当地艾滋病病人“要求过份了，不知足。”现在联谊会租了一个小院，年租金 3000 元，今年涨价到 3500 元。宋书宇说下一步想盖一座小楼搞艾滋病临终关怀。“今年多弄点木材批文，多找点钱。”（田野手记 20070526）

### 河南最后通过法律途径判决的艾滋病医疗纠纷案

木子，44 岁（1953 年出生）新郑公安局副科级干部。自述——

1995 年元月 8 日，上班途中遭遇车祸，伤右臂，右肱骨骨折，住新郑市公疗医院治疗，手术缝 11 针，医生说：“输点血补补吧”，输了 400cc 血。一个月后出现症状。乏力、咳，拉肚子，发烧。2003 年起消瘦，体重从 175 公斤下降到 110 斤，先后在市公疗医院、省人民医院、河南医学院、郑州市中医院、人民医院治疗。2004 年 03 月 19 日于省人民医院查

出 HIV 阳性，在省防疫站确证。医生建议妻子检查，次日确证也已感染。从此夫妻二人闷在家里发愁，想想日子不能过了，抱头痛哭，甚至想跳楼、撞车。2 个月之后，2005 年 05 月，告知单位领导。局领导表示同情理解，但是要求不能上班了。局领导主张打官司，一是减轻经济负担，二是还一个清白，就是死，也知道咋死的。

于是请律师找法院起诉。2004 年 06 月 17 日在新郑法院立案，09 月 22 日开庭，09 月 30 日下判决书：认定新郑市公疗二院责任，赔偿 47.3 万元。包括：1、夫妻二人 3 年抗病毒治疗费；2、检查费（每年抗病毒治疗 3 万，检测费 1 万，机会性感染不判）；3、妻子的误工补助费，4、3 个孩子（13 岁—18 岁，2 个大的女孩，最小的是男孩）的抚养费；5、父母赡养费；6、治病的路费、陪护费。另一例禹州高国强，也是输血感染艾滋病人，也是夫妻双方，也是 1995 年。他 2004 年 08 月发病，是我住郑州六院治疗时认识的病友，我劝他打官司。禹州法院判决：赔偿治疗费 8 万，加上以往治疗费用，共计 10 万多元。判决稍晚一点，对方不服上诉到许昌中院，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可能是河南最后一例通过法律途径判决解决的艾滋病人医疗纠纷案。

再往后就不立案了。郑州市中级法院“大接访”，新郑艾滋病人去了，要求法律支持。立案庭副庭长说：“就是不立案，有法请生了（有办法尽管使出来）！”问为什么？说：“法院不是我开的，只是执行上级命令。”要求给予有关司法解释，说没有。现在新郑市活着的确证艾滋病人 130 多人，估计隐性不敢暴露者不少于此数，死亡的不算。但是听说去年黑龙江还立案，北京周彬律师代当地某农场 19 个集体感染者索赔 3000 多万，人均 150 万。（田野手记 20060717）

### **办血站的副院长得了脑溢血**

郾城县医院一位医生说，河南艾滋病是 1994 年卖血开始的。当时我在县医院，说不了该谁负责。血都卖给上海一些血液制品厂制造白蛋白球蛋白。当时县医院一个副院长出头负责搞血站，收入交回院里一部分，他们几个开工资分一部分，当成发财门路。别人看着赚钱，都跟着办血站，没人管。血站竞争很激烈，哪里给钱多人们到哪里卖，当时云南靠近缅甸边界的一些人也跑过来卖血。当时谁也想不到会是这样，那时都还不知道艾滋病。几个人的血放在一起在离心机里一转，上边血浆提走了，下边红细胞再分输回人们体内。农民不懂，还以为血又还给他们了，伸伸胳膊疼一下就赚 50 元，有的全家都卖血。我当时还说过，怎么没有人管，这样会出问题的。

郾城县最早出问题是丙肝，丙肝发病快，半个月，20 天，不像艾滋病潜伏期 2—8 年。前年一个村开着整小拖的人上访告状，几十上百人围着县医院，最后公安出面，判决一人赔

偿 3000 元，说，不准扰乱医院正常秩序，3000 元不要就没有了！那一次县医院赔了好些。献血有检测，但是管理不善，有人明知有病不能献血，但是拿着别人的检测单冒名顶替，财迷心窍，血头和老百姓都是财迷心窍。当时全国都那样，都办血站，政府没有下文件号召，但是也没有制止，省里卫生厅没有制止，国家卫生部也没有制止。村里一说谁谁家卖血房子盖起来了，就都去卖血了……。当时一些说法口号比如“要致富建血库”“献血光荣”是血头提出来的，他们为了赚钱。办血站的县医院副院长后来得了脑溢血，现在半身瘫痪，紧张吓的。（田野手记 20050801）

### “制造打倒”、“碰碰”、“讨债”

一位很活跃的河南农民艾滋病草根组织负责人说，有些事，有时怪政府，有时不怪政府。

比如，艾滋病人“制造打倒”，敲诈勒索。我们村艾滋病人王峰到批发市场买大葱，把人家打捆大葱打开除泥，又不买了。双方发生争执，打架。王峰躺倒在地，打电话到村里，村里一下去 30 多人，把人家一车葱拉回村里，派出所怕“动乱”，不敢管。经中间人说合，人家赔 5000 元，留下些葱，车开回去了。“打一拳 5000 元”，那是 2005 年的价。到 2006 年，升级涨价，打一拳 1 万元，后来又涨到 13000 元，15000 元。村里 20 多辆昌河车，跑运输拉人，都没手序（营运执照）。有事电话一打，去几十人几辆车“捧场”，每人 50 元。一般单位、个人都经不起这种折腾，都“认栽”，去财免灾。为此当地政府拣出头的人，法办 2 人，一人判 3 年，一人判 5 年。

2006 年冬天大雾，几个聪明的艾滋病人，专等在公路上“碰碰”。有一个艾滋病人和他父亲、弟弟驾个昌河车在公路上等着，见外地来一辆大货车，把自己的车推到官路大壕沟里，用钢筋在车上划痕，再骑摩托车追上大货车，在相同高处划痕，说人家把他们的车撞沟里了。外地车来不及交涉，包赔 2.7 万元“私了”。——这是当事人自己讲出来的。我知道他得一笔钱，问他咋整理？讲的。

现在还是常有艾滋病人外出替人“讨账”。有人通过关系找来雇他们。上海、南京、山东、广州都有，多了。条件：管吃住用车，讨回账按 30-50%提成，讨不回管工钱每天 100 元。这些讨账的艾滋病人“临时组合，基本固定”，收入不一定，高的一次收入一二万，一般四五百元。

赵口村 100 多艾滋病，他们敢与国保大队武警发生冲突，把派出所长打成轻伤。一拨艾滋病人与一客车发生冲突，另一拨接到电话赶来“增援”，刚到，遇到派出所长拦截，加足马力逃跑，派出所长不及躲闪，一头撞碎挡风玻璃“钻进”了车里。当时抓了艾滋病人，经郑州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交涉，释放了。艾滋病也被打成轻伤一人，现在又反过来起诉公安。

这些事，你说怪谁？（田野手记 20070708）

### 我认识的一个“血头”

第一次见到老楚是在一次外省召开的有关艾滋病的非政府组织会议上。河南去的一些参会代表中，老楚显得很落寞，因为老楚当过“血头”。在此之前，我只是听说过血头，“血头”还只是一个概念，还没有真的见到过血头。老楚满脸褶皱，看上去跟中原普通农民没有什么区别。他找到我似乎有话要说，但是会议时间很紧张，未及细谈。不久，在郑州又遇上老楚，老楚说，你要是去俺县调查，可多故事。于是攀谈起来，比较多的了解了老楚。

老楚是太康县人，跟公开说起的全省第一个被发现的感染者郭某是老乡。老楚当过乡村民办教师，1970年代时教过5年书，“公办教师每月30元，给我6元，不管干（干不下去），顾不住家，不干了。”老楚说。不教书了，除了种地，就去打工，建筑、卖菜，都干过，后来，大家都卖血了，就去卖血。再后来查出感染了艾滋病。老楚有3个孩子，1个儿子、2个女儿。大女儿38岁、儿子33岁，都卖血感染艾滋病，女婿因为艾滋病死去3年了。“俺那感染艾滋病的可多了。”老楚说。老楚大哥家的大儿子俩口感染、二哥家大儿子两口、女儿都感染了，还都不敢说。“你可要保密。我不害怕，一检测出来就亮明观点，人家怕受影响。”老楚特意叮嘱我。

老楚不隐瞒自己感染了艾滋病，他从县里到省里跑着上访。他说，我大女儿家就塌（毁）到这艾滋病上。女婿2003年死的，那时候没有一点“政策”，2001年开始治病花钱，都是自费，症状皮肤病、发烧。钱花干了。上访找卫生局要求解决困难，卫生局说找民政局，民政局说找教育局。他们根本不接材料，说这包东西是你的？拿走！省信访局态度还可以，说材料看了，给你们县信访局写过信了，找他们去吧！俺说县里领导根本不见面。他们说，俺也见不到。现在我每星期都去县卫生局，他们只说好话，不办事。

说起“血头”的事，老楚也并不隐讳，他说，在开封卖血时间，给卖血的人“办单子，办一个使一个钱。”单子，就是临时献血证，跟正式献血证没有关系，卖血的人想多卖一次，就临时办个单子。后来不正规了，不用“证”了，我直接带人到血站卖血，直接到血站使钱（领钱），带够50个人领一回钱，一人次给3元。这些钱用于来往路费、吃住、买针管。

买针管？我一时不明白老楚说话的意思。

老楚解释道，我领的一群人卖血，我负责买抽血用的针管，他们（血站）只管“抽小血”（化验）。后来也不化验了，啥都不说了。规定每次采血400CC，太康血站采550CC—600CC，每份可以分出半份，多赚钱。后来每次采2袋，说800CC，实际900CC—1000CC。

问：对献血者没有健康体检？

答：没有。

“1994年、1995年时候，太康防疫站的人找我，想通过我把血站搬到村里，后来事没有弄成，亏得没有弄成！”老楚说。

眼下老楚正忙于跑着“督促落实艾滋病救治救助政策。”他说，县卫生局，我拿住他的把柄哩，他们管理全县艾滋病治疗，应该把上级政策宣传下去，各种政策规定，艾滋病人都不知道。我们县里许多艾滋病人不知道有免费药物，治疗卡能不给办就不给办。有一回在卫生局碰上一个人，他老婆艾滋病已经死了，他领一个小孩11岁了，就这么高（比划，很低），有艾滋病。一问，说是吃药花了多少多少钱，根本不知道吃药免费、有生活补贴。我带着他去卫生局，他们问我有事么？我说11岁孩子都快死了，一年多了吃药没有免费。办公室主任专管这事，立马给办了治疗卡，比我办的时候还顺畅哩！但是如果不碰上我，这个人还是不知道。检测也是靠自己，自己不检测就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感染了艾滋病。防疫站六七岁的孩子不给检测，说“孩子太小，抽不出血。”不检测就没法办治疗卡。我给站长打电话，他说等到麦罢（麦收之后）。一把手都说不通！我又找卫生局上级领导，电话里说了半小时，那边又说是没有试剂了，没法检测。初筛检测，一般人跑几趟都不给做，他们卖过血，希望检测的人，都叫住我一起去<sup>①</sup>。防疫站对国家政策落实的是啥？全县确证只有300多人，俺乡（毛庄镇）只有50多人，其实远不止这个数。就这，2005年发救助每人60元，说是每月每人12元，发5个月的，只发给了毛庄的不到50人，其余的都没有给——这是我找的多，不得不给。他们烦我也怕我，现在我去拿药啥都给，下边人还是不给。前天防疫站的一把手二把手说我：你不要以为你是农民我管不住你，下达你有宣传任务。我说，宣传资料多的很，都在办公室放着，光盘也有，你们为啥不给群众看看放放？

老楚来郑州是找卫生厅、民政部上访，要求卫生部门落实抗病毒治疗，要求民政部门落实救助政策。他说，省里规定每县要有一个艾滋病重点医院，太康县没有。乡医院不转院，熬死算了。来的一群人中，有人已经中断治疗四五个月了，在县里治疗一段停了，因为没钱了。原来在县中医院治疗，后来转到乡医院，病情恶化。到郑州六院治疗自费，前天来一人，花了六七千，回去了，没好转，实在掏不起钱了。“昨天才有意思哩，我找到卫生厅反映这些问题，卫生厅有人想替他们说话哩，省厅想替县里拦起来，说咱河南省2004年没有免费政策，52号文件不就是2004年的？”

后来，收到过几次老楚节日祝贺的手机短信。

再后来听说，老楚到广州去了，“替人讨债。”

---

<sup>①</sup> 这种情况表明，河南疫区有些地方“拉网式普查”很不彻底。

### 三 上蔡县的故事

2005 年夏天，我走访了这个全省艾滋病疫情最严重的上蔡县，走进了当地一些艾滋病村庄。

#### 后杨村：疫情最严重的艾滋病村庄

后杨村卫生所长程普，60 岁。文化程度小学 6 年。1967 年当村小学教师，1972 年负责建村里的合作医疗建诊所。1982 年分队，诊所垮台，务农。2002 年 03 月 12 日，受村委、乡政府委派担任村卫生所所长。程所长介绍村里疫情——

全村 3861 人，1000 多户。现有艾滋病人 563 人，今天增加 1 人，564 人，“最少还要增加三四十人”（遗漏未报的）。有两口，外出广州打工，当时不检测，7 年之后发病回来，没法了才回来哩，小孩也是，起先都瞒着。死亡人数，诊所成立后死亡 380 人左右，以前死的说不清了，不完全统计有 435 人，共计感染人数有 1100 人<sup>①</sup>。死亡最多一年是 2000 年，一个组一年死 13 人，全行政村死 103 人。2001 年死 40 多人。最早死亡在 1999 年，是个妇女，死时不到 30 岁。“除了老小，青壮年都卖血，平均每家 1 个艾滋病人还要多。”程所长的 2 个儿媳都卖血感染了艾滋病，二儿媳 2002 年死亡，儿子也卖血，但是检测不是。

周卫东 29 岁，一家 4 口都是艾滋病。他吃喝嫖赌吸，坏事干完好事不干。在城里敲诈，在赌场跑腿，后半夜替人买盒烟给 100 元。派出所来人问他情况，我答复说：弄到监狱跟死刑犯关一块，关半年，保管他服服帖帖。现在他一分钱没有了，相好也不管了，讹诈政府，“国家政策对他这号人来说，宽大得很了。”话说回来，艾滋病人 95% 以上是好的。老实人一分钱得不住。像你见到的，昨天送到县医院住院那人，老实巴交的，发病多时住不上院。医院说床位紧有困难，不让住院，我说非赖孩（坏人）你才收不是？咱（我）让人家转的院，为这事我跑了五六趟。

正说着，一个孩子来拿药。程所长说，这孩子，11 岁，小学 2 年级。父母都死了，母亲死的早了，可能是 1999 年，父亲去年（2004）10 月死的。他自己来看病拿药。这一家毁得很，父亲弟兄 3 个，死 2 个了，也是出名的赖货，活着的时候来这里药闷拿（狠着劲拿药），青霉素一次抱走 12 盒。现在我们村卫生室发药时撕掉标签，防止（他们领回去）再卖。撕掉标签不影响“挂”（输液使用）。“原来是（在标签上）盖章，可以洗掉，现在只好撕标签。”开始乱，现在顺了。

村医月工资 500 元，共 9 人，一人是上级派来的，月工资 650 元。所长多 50 元电话费。

<sup>①</sup> 县卫生官员说：后杨村疫情最严重，确症有六七百人，加上死的有 800 多。



本所工作人员不准开私人诊所。不乱开药，医生挨骂。有人能一天开 1200 元钱的药。村卫生所每月药费 2.8 万元—2.9 万元，500 多病人，供应的药够用。针剂一次开一天量，口服药一次开 2 天量，各不超过 5 种。该自费的病人也接受。全所办公经费一月 500 元，包括电费、冬天烧煤、买拖把、出差、拉药的车费。“出差从不花多钱，只来去花 2 元路费，我自己一人出差从不在外面吃饭。都说我尖（吝啬）。”我只吸 2 元一包的烟。夏天（发给村卫生室的工作人员）每人 5 斤白糖，40 斤西瓜，大家也辛苦了。问题是医生少，平均一人管 60 多个病人，待遇低。2004 年评上先进工作者，发一张奖状，一条毛巾被。“发病高潮还得 7 年。”程所长最后说。（田野手记 20050818）

不久，周卫东因艾滋病死亡。

### **王营村：情况最惨的三家**

王营村卫生所侯所长介绍村庄情况——

全村 1970 口人，330 人艾滋病，已有 104 人死亡，其中确证只有一二十个。高峰期是 2002 年和 2003 年，一年死几十个。1999 年死第一例艾滋病人，开始怀疑肺炎。2000 年文楼艾滋病发病，2001 年桂教授来上蔡，也到王营村看了 7 个病号。“俺孩子也抽验了，因为做疝气手术输过血，担心被感染。”

村里 3 家情况最惨：

第一家，韩莎莎。韩莎莎父母双亡。父亲弟兄 4 人全部感染死亡，老大、老二媳妇也死了，只有老三媳妇没有感染。韩莎莎是老大家独生女。

第二家，梁巴。梁巴的 6 个儿女全部感染艾滋病，两个闺女是大的，出嫁了也死罢了。4 个儿子还剩最小的老六。老五死得早，2000 年死的，儿媳改嫁了。

第三家，林马虎。林马虎有 5 个儿子，除了最小的一个外出打工没有检测，4 个儿子都确证艾滋病，死了 3 个了。3 个媳妇——老三没寻上，也都感染，死了 2 个了。

### **疙瘩李：偏远小村，疫情反映不出来**

侯所长说到他的妻子的嫂子的娘家，疙瘩李村，是个偏远小村，艾滋病人很多，村里“没人”（没有有能耐的人，有头有脸的人），疫情反映不出来，得不到利益（政策救助）。那里属黄阜，黄阜是卖血窝点。太偏远，发不出声。侯所长说，这样的村还有，但是不会多。

后来了解到大路李乡郝坡行政村疙瘩李村，全村 360 人，当时吃药（服用抗病毒药）31 人（一位当地防疫站官员说，CD4 细胞 200 以下者服抗病毒药，当时一般占感染者 50%，可以推算尚存感染者约 60 人），已经死亡 30 多人。全村人口感染率约 30%。村民说，乡里瞒着不让上报，国家政策享受不到。

### **张宇村：那时候不让卖血都制止不住，卖血的钱就手交罚款**

一位张宇村驻村工作队员说，全村 2400 多口人，500 多户，从 2002 年起，几乎每周都死人，一年死五六十人，村里人心惶惶，都说“下次该轮着我了。”信教拜神都不行。现有艾滋病 104 人，发病 90 多人，今年（2005）已经死了三四个。那时候不让卖血都制止不住，村里猪圈、野地偷着采血，后边追着，前边瓶子吊着跑，有人一边打牌一边卖血，一卖就是几个。村民说，不卖血不中，有的妇女，一手抱着孩子还烧着锅，那一支胳膊伸着抽血，这边抽罢接过来钱，就手交罚款，计生办人站门外等着哩！（田野手记 20050216）

### **南大吴村：村民状告村支书**

走访南大吴村实属偶然。那天上午在县医院和县中医院，都有病人把我团团围住，反映诉说各自的情况，陪同我的陈股长担心出事，催我快走。出得医院大门，有人从后面追上来，要我到他们村里去看看。我也正想进村，便随口应了。不想下午一出县招待所，便见两个人已经候在那里，旁边停着一辆三轮，说是来接我的。上了车才知道他们是南大吴村的。我知道，他们又把我当成了记者。这里许多艾滋病村都很羡慕文楼村被记者曝光，享有更多的政策优惠。我告诉他们我不是记者，但是他们认定我“跟记者是一样的人”，“是上边的人。”南大吴也是艾滋病重点村，据村民们说，全村 2300 人，现有艾滋病人 404 人，已经死亡 370 人。2003 年死亡最多，一年死亡 57 人。但是他们找我主要不是反映疫情，而是反映他们村支书的问题。

南大吴村支书雷某，44 岁，高中毕业。1989 年进村委，先是团委书记，后来管计划生育，当村秘书，就是会计，1993 年当上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反映他的主要问题，第一是贪污，第二是专横跋扈打击报复。村民们先把我领到一个废弃的砖窑场，说这里曾是村里的窑场，占地 58 亩，但是多年来雷某霸为己有，只交假票不交钱，直到把地吃完了，2004 年窑场停了。窑场雇工干活，不发工资发代金券。代金券是上级政府发给艾滋病人看病用的，2002 年开始执行。全村四五百名艾滋病人，最初每人每月 50 元，后来增加到重病号每人发 300 元，中等的发 200 元，但是村支书只发给 20—30 元，钱没到群众手里，就被克扣了。他还找人冒名按手印领取代金券，开村委班子会，说一个人可以代替 10 个人领取代金券，代替的人领回 100 元，对半分，他用代金券支付窑厂雇工的工资，或者倒卖掉。有人看见他媳妇（妻子），在县医院卖代金券。上级拨付的扶贫救灾款，他不发现金，也是发给代金券。2002 年 11 月，他收村民每人 15 元修路费，25 元小红河治理费，说有艾滋病的可以用代金券抵，不是艾滋病的要交现金，都没有收据。2003 年国家每亩免征公粮 100 斤，雷还是照样收，全村 2340 亩土地，当年每斤小麦 0.72 元，光这一项，算算他贪污多少钱？3 年期间，雷某

光吃喝款报账 12.7 万元，其实村干部也没敢吃，是他报假帐，贪污了。他收计划生育罚款，一下就要 5000 元，人家问了句应该交多少，就把人家打了一顿。不少人都挨过打。对反映他问题的人打击报复，他们现在不光是赖，已经成黑帮了。有人被他逼得不敢回家，现在北京一边打工，一边找纪检委上告。打官司得交钱，老百姓哪有钱？还有一人躲到山西去打工，被车挤死了。

这些问题，群众早有反映，上级也调查过，但是县委书记包庇他。这些村民说，他们已经整理了材料要上北京去告状，因为这些问题没有办法在当地得到纠正，“他的后台是县委书记杨松泉。”杨松泉前一天已被双规免职，这些村民显然还不知道。

### **上蔡贪得最严重：出租车司机放鞭炮，县委书记被双规**

上蔡县本地干部说，与周边县相比，上蔡贪得最严重。“在外县万把块钱能摆平的事，在上蔡得翻几倍。”1999 年小吴毕业分配，主管人事县长签字费 2000 元，报到入编费 2000 元。“正常，这是当时价，现在成十倍翻。”某乡干部为提拔，托乡书记，送 5 万元，事不成，气疯了。公开买卖官，都知道，百姓已经麻木了，告也没有用。“走个肥猪，来个壳驢<sup>①</sup>”，不胜不告。是官都贪，无官不贪。有一个年轻孩犯事，关进了新乡监狱，其父托新乡公安局长（老表）放人。这老表没当回事。这位父亲又找徐向前过去的秘书（老乡），这秘书已经 70 多岁了，曾经被推荐当山西省长，因为没文化留北京了。这老乡秘书找中央某领导，说孩子年轻不懂事，放了吧。这中央领导之弟任新乡市长，就写了个条子转给公安局长了。这局长生气了：越级，没面子。说，有本事还去找他吧！中间人原话给这位中央领导学过去，公安局长立马被免职，到下面所里当差。

——白天听人聊天说到以上一些故事。

晚上出租车司机放鞭炮，县委书记杨松泉被双规了。据说起因是因为金土地出租汽车案。金土地公司在上蔡县搞出租车运营，经县城管局批过了。这项业务批准部门有两家，工商局和城管局。因为没有经过杨松泉的手，没有捞到好处，这位县委书记就说，没有经过工商部门批准，不合法，不算数！金土地老板赶紧给送上 16 万，嫌少，说要美金，8 万。老板兑换美金需要时间，送上时，说没按时，晚了，批准也作废！不料金土地后台硬，告官司，杨松泉被双规了。出租车司机们早已租下了车不准运营，不能赚钱还要交租金，警察在路上堵着罚款，正气急，所以听说杨松泉双规，放鞭炮庆祝。8 月 20 日杨松泉被抓起来当天，县委连夜开会，安排布置只说金土地不准说别的事，“牵扯人太多。”最终，班子里许多人还是牵扯进去了！（田野手记 20050820）

<sup>①</sup> 壳驢，尚未养肥的半大猪。

## 马深义<sup>①</sup>：人活着要争口囊气，要把家庭弄好

带领我去文楼村马深义家的人这样介绍马深义：马深义是2004年十大最有影响的艾滋病病人之一<sup>②</sup>。他其实也没做啥好事，也不会说话，就会要钱。原来把孩子放在政府桌上要钱，现在是自食其力。现在又找了个老婆，她的前夫艾滋病死了，两家住的不远，自动结合。现在不跟政府闹了，在街上开三轮车。上蔡街上开三轮车的三分之二都是艾滋病病人，拿着艾滋病病人证政府不收污染费和运管费。

马深义不在家，“拉三轮出去了”，侯棉说。侯棉的丈夫艾滋病死了，现在跟马深义一起生活。“两头顾，过一天，讲一天。干活互相帮助，吃饭各吃各的。”马深义帮她干地里重活，她帮马深义做饭，一起过了三年多。马深义之妻雷妹，2001年08月28日（阴历）去世。“一起生活，是为了互相帮助干活，孩子大了就不这样了。”侯棉说，我跟马深义住邻居，看着他作难，他跟他爹妈没缘分（缘分）。雷妹死了以后，他几个孩子，爷爷奶奶一眼也不看，雷妹有病也不管。从来都是马深义一车拉着娘俩去看病。雷妹落气时才惨，临死那夜雷妹都不中了，喊马深义去给她穿衣服，死在病床上。雷妹那时在卫生所住，马深义顾不上她。他只顾家里孩子几顿饭菜，他还得洗，还有不会走的孩子。雷妹死的时候，躺在屎尿窝里。在卫生所住着，有人扶，去上个厕所，没人扶，都是拉尿在床上。马深义一家逃计划生育跑出去多年，我跟雷妹不熟。我跟他住个邻居，总是看着他抱着孩子来回走。时候长了就合伙了。2002年2月在一起了。小孩的衣服鞋我不会做，找人给做。马深义他爹是剃头的，包着几个庄子，可挣钱，多铁多排场（非常能干非常体面）一个人。马深义现在一天到晚拉三轮，公安不管他。年三十的时候，还有人来拍片子，马深义包着饺子，还拍哩。——在马深义家里，侯棉慢慢跟我聊。

晚上，马深义到宾馆来找我，聊了好久。说到他对自己家庭现实的考虑和对孩子未来的安排，说到陈为军到他家里拍片子，他很平静地叙说着，他爱说“我有一个想法”，这是他的口头禅——

我有一个想法，人活着要争口囊气，要把家庭弄好。现在很难，我一个人领3个孩子加上她的共4个孩子，加上我们两个大人，一共6个人，日子得我一个人负担。这个病也不能干啥体力重的活。我还有一个想法，想把房子翻一下，你也上我家去了，就那两间房，想翻一下又没那个能力。手里没啥钱。当年是逃计划生育，在山西煤矿打工，一月1000多元，

<sup>①</sup> 记者陈为军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从2001年的春末夏初开始，历经盛夏、深秋、严冬，一直到春节，近距离地拍摄了马深义一家面对艾滋病和死亡的人生经历。该片曾获2003年圣丹斯电影节世界纪录片提名、2003年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最高竞赛单元提名、2004年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和2004年英国国家最佳纪录片奖。

<sup>②</sup> 《南方人物周刊》命名马深义为英雄父亲，从2004年起，每年都派出记者访问马深义一家。

也没有攒下钱。那时候雷妹身体不好，小孩发高烧，不敢回家，雷妹先回她姥姥家。过了两个月，我也回来了。桂希恩来，检测出雷妹有艾滋病。到武汉曝光以后（文楼村艾滋病人住在武汉桂希恩教授家里治病，媒体有报道），才知道我也有艾滋病。我想要想干也能干，但也不敢干体力重活。一个人不能干活，坐那光等着吃，心里也苦恼。我想过，搞点养殖业，养点猪啥的，想过这些事，但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我给村里工作队说了这些情况，说想养点猪呀什么的，他说你要想养猪得先把猪圈搭起来，我说我没那个能力，扶贫款下来，他先给有能力把猪圈搭起来的。

我有一个想法，我们俩口已经得上这个病了，小孩得上这个病是我们给他们造成的。现在他们没有母亲了，他们母亲已经去世了，我做为一个做父亲的，对孩子一定得护理好。马占曹，5岁了，CD4有400多，没化验上吃儿童药（当时上蔡县正在实施克林顿基金会的儿童治疗项目），现在吃大人药，服用四分之一的量。我不想叫他吃抗体素（抗病毒药），他的CT4还高。但是他时常发热，十冬腊月天雪下多厚，我抱着他来回去打针，后来吃了抗体素他不经常发热了。他的肠胃不太好，我想上省人民医院给他看一下。他的眼有角膜炎，给我们诊所挂了几天针也治不住，听说省人民医院花钱不多，点点眼药水就治好了，但不彻底，说是病毒性的。我准备到星期一去，别把孩子的眼给弄坏了，到省人民医院挂个专家号给看看，当天去当天回来。从我女孩方面来看，我有一个想法，我的大女孩，她上学成绩不好，我想把我这个女孩嫁到离家里近点的地方，她能照护家里。我有这个想法，可是她是个女孩，小孩大了我是个父亲能当她的家吗？

当时陈为军拍片一个月来一次。下午两三点来到就拍，拍到6点，到西头永华家住一夜，永华没有艾滋病。从2005年5月，拍到2006年8月，拍了一年多。村里人认为我拍片以后，手里有很多钱。其实我没啥钱。陈为军过罢春天才能过来，他半年来一次送钱来<sup>①</sup>。

.....

马深义就这样很平静地叙说着，好像是要把心中的想法和盘托出与人商量，又好像是一切都已经做出决定。这是他天天翻来覆去思考的问题，是他盛在心中的全部。他的平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很爱自己的家，他的一切付出都是为了这个家。家是他全部的世界。他说的要把她“嫁到离家近一点的地方，她能照顾家”的大女儿，是这个家庭中唯一没有感染艾滋病毒的人，当时最多才12岁。他很少说到他的已经死去的妻子雷妹，即使说到，也感觉不到他的情感。问到现在和他一起生活的侯棉，他也只是淡淡地说“搭配到一块，有个活

---

<sup>①</sup> 由于《好死不如赖活着》播出，当时一家基金会通过陈为军送钱资助马深义。

时互相照顾一下。不了解她的心，想不到一起……。”他说的最多的是他的5岁的儿子马占槽，儿子是这个家庭的中心，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他没有说到也感染艾滋病毒的小女儿。马深义的平静传达出一种坚硬的执着。

当地对那部感动世界的纪录片似乎没有反应。（田野手记 20050819）

#### 四 走访市、县卫生部门和定点医院

田野调查中走访政府相关部门的机会不多，即便有机会，大多也只停留在一般程式化的“接待”，所得资料也不过是一般的工作汇报、年度总结。但是一旦有机会接触那些工作在市、县级卫生部门的官员和医院医生，做比较深入的访谈，就会有很大收获，他们熟知当地情况，亲见艾滋病在河南农村的发生蔓延，比“上层”更实实在在地接触到“基层”，又比底层百姓具有“全局、全面”的眼光，具有身居一线才会有的真知灼见，提供了一种业内行家的视角。这里所记述的，是我的重点调查村银庄所属的K市、河南省疫情最严重的Z市和S县，以及艾滋病定点医院。

##### K市

**疾控中心座谈** K市新盖的疾控中心大楼，高大得显得空旷。2003年“非典”后建成，国务院项目投资1000多万，地方配套200多万，地皮43亩无偿占用。座谈会由市委组织部安排，中心副主任带领我们径直来到艾滋病性病科，科长已经等候在那里。座谈内容整理如下——

K市包括8县1市1区。省里规定：艾滋病200人以上的县是“定点县”，全省31个定点县，K市8个——7县1区，除了扶沟县（40例），都是“定点县”。扶沟县富，产棉、菜，血站建得晚砍得早。全市5个省级重点村派驻工作队：西华红花镇龙池头村——省计委，西华艾岗乡半截楼村——省委宣传部，商水汤庄乡西赵桥——省委组织部，郸城城郊乡王楼村——省科技厅，沈丘县白集镇尹庄村——省公安厅。现在不叫说救助，要说帮扶。分三大系统：救治归卫生口，救助归民政口，两免一补归教育口。感染人数，沈丘县第一，西华县第二。全省豫南6市情况严重，感染者人数占全省百分之七八十。现在漯河、平顶山感染人数也上去了，临颖也不少，是定点县。1995年3月8日，发现全省第一例艾滋病就是K市的，太康县高郎乡郭广生，男，当年42岁。省防疫站长王哲说过他，十多年了不发病，单身汉，活得很自在，在云南昆明防疫站血站卖血时被发现。云南省卫生厅电传通知河南省卫生厅。派去人调查，写有报告。

问：能看看吗？

……找不到在哪放了。当时资料保密，谁也不能看，除了疫情库可以调。当时绝密。K市主要感染者是献血员，死完就差不多了。现在全市每月“新发现”三四十人，都是大检测漏掉的献血员，不能等同于“新增病例”。国际艾滋病流行惯例是性传播，血传播是中国特色。这里卖淫、吸毒少，同性恋少，国家哨点监测出来的就是少，包括监狱。

问：哨点如何运作？

国家下达计划，与公安系统联系，对长卡司机、同性恋作体检。全市只发现在监狱中1例吸毒者艾滋病人。本地吸毒是口吸，不是群吸。这些人的情况正常人想象不到，北京有教授深入到同性恋人群，说“想象不到的混乱。”

1995年，全市各县都有血站。1997年出台献血法。血站暴利。开始一天采一个血型，袋子装得太满，血溅出来交叉感染。后来私人血站更混乱，A型、B型乱套了。血站天天轰轰叫，俺单位（疾控中心，过去的防疫站）就办，是单位的主要财源。K市的血走向全国6大生物制品所，阳性血也收，做疫苗。这事一时完结不了，前不久到沈阳去送血浆时，他们还要血，川汇区血站砍了，但是防疫站长几十万血钱还得去要啊。

艾滋病人统计市里与省里相差1480人，全市现症艾滋病人5129人。卫生部叫卫生厅“限令核清”，姓名、身份证号，几对照，2006年3月20号结束。死亡高峰在2001—2003年，一个村庄一年死十几个。市里原统计确证死亡人数600多人，核查后可能上升到800多。现在全市有2300多人服用抗病毒药，每人每年3000—5000元。90%有副作用反应，80%以上能够慢慢适应。有依从性，一旦停药、换药就“出情况”。在偏僻村庄还是怕歧视，不敢暴露，病人直接上“点”治疗。

对艾滋病，1990年代末以后越来越重视。1998年以前危害性没有显示出来，社会上不宣传。省卫生厅马士文逮起来了。王淑平后来当了曾毅的研究生，离婚，女儿带走了，丈夫也出去了。当时对于艾滋病，除了内部人谁也不操这份心，认识不到危害性。现在性病减少了，人们知道防护了，老百姓防治意识有提高。

座谈结束后，疾控中心主任陪同在新盖的大楼前合影，再三表示“全力支持。”但是档案资料始终不给看，保密。（田野手记20060317）

**建单采血浆站的国内外背景** K市卫生官员说，有一种说法：“中国艾滋病是外国传来的，内地艾滋病是沿海传来的，造成大面积流行是当年单采浆献血引起造成的，——底下还有一句：单采浆是国务院卫生部搞的。这话咱不能往外讲，但确实确实是上面引起的。”这是河南省内卫生官员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说法。

河南传播艾滋病是因为办单采血浆站。当时为啥办血站呢？有一个背景。艾滋病在非洲、

欧洲、美国流行比较严重的时候，是在（19）80年代。国外就看好中国血液市场，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这个病。过去国际艾滋病流行惯例，都是由性传播。我国这一块（传统性观念）相对好一些。中国传统文化，不同于外国西欧一些国家性开放。西欧保健品市场很大，利润很大，制造保健品原材料就是血液。那里的血液不敢用了，检测 HIV 成本太高。加上保健品，血浆、蛋白这些生产利润比较大，国外看好中国这个市场。另外国内还有一个背景，就是那些相对比较落后地区解决温饱之后，当年拐回来发展经济。经过动员，讲解一些血的基本知识，卖血或者说献血是老百姓能够接受的，进行单采血浆工作，可以开展。所以当时国外，世界上一些国家都在中国建立生物制品所。国外一投资，国内一看收益好，也盲目投资建厂，猛建，厂建起来就需要原料，就大量开发、动员建立血站，单采浆，卫生部出文件，要求一个县建一个血站。一开始这生意都好作，都建血站，也不需啥高新尖技术，抽了血以后搁离心机里一回就可以了，血浆抽谁的血（红血球）回给谁，然后蛋白卖给厂家。

问：卫生部出这个文件是啥时候？文件呢？

1992年左右。文件应在医政，医政口管文件。1996年3月14日号才算整体关闭血站。文件肯定有，如果没有文件没啥东西哩，底下不会放开批。当时咱们国家市场经济还不太成熟的时候，哪赚钱往哪挤，遗留问题不去想。但实实在在讲，当时谁也没料到这后果，否则谁也不敢拿群众生命当儿戏，确确实实是认识不到。现在也有血站，批准过的血站。但现在机器跟当时不一样。比如抽我的血，直接离心，封闭的，回输给我。以前是抽了以后，几个血袋子，往离心机里放，叫谁谁（写上名字），离心以后，再剪开口，回输给本人。就这“剪开口”，就是消毒也可能感染上，那病毒血沾上一点都不得了。如果再互相交叉着输，更不得了。咱国家当时对这一块不是太了解。

**发生这两件事，才意识到艾滋病是单采浆引起的。** 艾滋病不单单是河南的事。当时河北最厉害。河北发现问题更早，是老干部体检验血，发现几例 HIV 阳性，追问出原因是输活血——1995年左右输血还带有保养性质，血源出自河北省廊房。一查血源，查出廊房献血人员中有艾滋病，HIV 阳性。之后才发现河南艾滋病感染者太康农民郭广生，1995年3月8日，是河南第一例。这两件事，一是河北老干部发现艾滋病，还有就是郭广生一例，才意识到艾滋病是单采浆引起的。引起国家重视。开始整顿了。整顿先从卫生口开始，血站不让办了。这就是单采浆过程：卫生部提倡这样办，地方上受利益驱动，一些生物制品所扩大，另外各个国家也投资，看好中国市场。当时河南也与比利时谈一个建厂项目，要在河南建一个生物制品所的嘛，没谈好。这就是单采浆献血这一块的历史。

**早就发现单采浆传播丙肝** 艾滋病传播方式与肝炎相似，但艾滋病病毒本身毒性没有



肝炎的毒性强。1993年，我们就发现献血人群中丙肝病毒感染比较高。凡是办血站，献血员例行检查身体，一开始没有丙肝，后期开始发现丙肝。开始发现少数，个别人有丙肝病毒，几个月后，这一批献血员就基本上都感染上了。90%感染。丙肝病毒感染也是交叉感染。但是没有艾滋病可怕，不致人死命，一时不要人命，当时就无所谓，还只管采血。过几个月后相当一部分，可以说90%左右都感染了。但当时不碍事，一时不要人命，吃吃药又过来了。但过几年以后后果也很严重，肝硬化呀，其他病等后果，都是因此造成的。艾滋病吓人，当时等于判死缓，得住都害怕。当时，在丙肝期间，已经有专家就说起艾滋病，当时我接触到的，有人说：单采浆这事非造成艾滋病流行不可！他是医学专业出身，我们卫生局的，他给我说：“现在丙肝的这个感染法，将来艾滋病也不会轻喽！”说这话就是1993、1994年时，当时艾滋病还没有呢。1995年他就调走了。

**最初艾滋病疫情的发现都在外面** 艾滋病发生以后，一开始也没想到像2004年那样一个普查。当时检测很复杂，非得到北京作（确证）。就是外省，最后也得到北京去做确证。省里只能初筛，认为差不多，才到北京确证。K市最初艾滋病疫情的发现都在外面。还有一例是在东北大连献血检测出来的，是K市在那的一个清洁工。那里单位每年有献血指标，机关人员不愿意去，就让打工的人去顶指标，高价补助1000元。献血前要检查身体，检测出他的HIV阳性，这只是初筛，血样送到北京确证，之后反馈当地，把人遣送回当地。当地要调查其基本情况，进行献血史、性史等流行病学调查。调查后就“搁下”了，保密，没有什么治疗方法。1996年以后，有“干预措施”，就是向患者介绍艾滋病防治常识，使用避孕套等等，过一段查访一下，死了也就死了，当时无法可治。以后新闻媒体炒作，艾滋病人找政府，上蔡文楼、Q县银庄。政府拨出经费到定点医院救治——这情况从2000年开始。

**艾滋病检测从1998年开始，估计当年单采感染艾滋病不在少数** 其实1998年以后对艾滋病的检测，上面就已引起重视，同时也提出对特殊人群要采取一些救治的方法，也是上面要求的。2000年开始，新闻炒作达到高峰。有外国人到疫区去，Z市厉害些，我们这儿来的也有。上蔡曝光多，艾滋病人找政府。K市就是Q县银庄。也从2000年开始一些救治，在定点医院。1998年—2000年摸清疫情。这些事，有布置，有方案，方案结束以后都有统计有登记，1995年以后的资料，都有。市疾控中心档案室是国家一级档案室，资料保管很好，在卫生系统里，全国都少有。挨住（有关）艾滋病这方面都留有大事记。年年都有。查资料直接找艾滋病防治科，找疾控中心就行。检测1998年以后就开始重视，估计当年单采感染艾滋病不在少数。这些都有记录。

**关怀理解沟通很重要。他们的过激行为，也是因为对他的歧视** 我们经常下去。银庄

去得最多。他们也经常来，坐一块吃个饭，找人陪陪他喝个啤酒。有几个人，逢年过节还给他拿点钱、酒。三百五百的，给他拿点，他很高兴。前两天牛延东还打电话，说他一个侄女要上电脑学校，我说我给他们打电话说说，叫校长给你免点钱。那时是尽力地能作啥工作就作啥工作。噢，那时候 K 市艾滋病能够稳定，不象 Z 市那样闹恁很，与我们工作有很大关系。我们作很多工作。K 市这一块与艾滋病的关系那一段处理得还是比较好的……。他们精神思想上有压力，对他们不理解，歧视。他们的过激行为，也因为社会人群对他的歧视。沟通呀，对他们的关怀呀，很重要。我那时候是防疫站长，我说，你们啥时找我啥时见我。跟工作人员说他们啥时来都叫见，有时我没时间，就让艾滋病科长见他们。春节时艾滋病人几个给我掂小磨香油，对他们来说，觉得见到我也很高兴。小磨油对咱不算啥，是他们的一份心情，咱理解他，“放那罢。”有时间就一家一户去看看、转转。

我一个人上他庄都好几次。咱在这儿说哩，我害怕一些事他们底下落实不了，我管着这个事，不放心。车停路上，我自己一个人进去，跟他们唠唠嗑，问问情况。村里大部分人对我也是比较熟悉的。那一次同去的还有几个人。我给村里人握手——你跟他握手说说话，他感到你真的不歧视他。你光说不歧视，一到跟前儿你翘开，人家不信——过来以后给他们几个说，刚才那几个握手的，给你跟跟儿的，都是艾滋病人。他们说，噢，你不怕传染么？你咋恁胆大！我说，不是胆大，是这方面知识你们太缺乏。这些人就是知道（艾滋病知识）也不行，心里有障碍，隔臆。

**卫生部敦促河南查清艾滋病疫情** 初步估计中国艾滋病有 84 万，感染率万分之六，结果河南估计是万分之二点六，万分之三，连全国平均数都赶不上，但你河南又老出问题。卫生部长来了，带着卫生部几个人来的，在中州宾馆开座谈会。卫生部长他第一句话就是，我这次来是代表卫生部来给河南沟通艾滋病疫情问题。他底下性艾处的一个处长说，你说你河南少，你理由是啥？——当时我在场——他说，你河南，艾滋病上访的人多，你河南在外面打工的检测出来反馈到卫生部的多，你河南新闻媒体炒作的多，你河南打电话直接往卫生部咨询的多……，他一下子弄了几个多！你说你河南少，那这些事情咋数你这多呀！……这多方因素，促使河南省得一下叫这事了断清楚。再一个新闻媒体也炒作太厉害。从 2004 年春天里，3 月份开始，从省卫生厅开始的，首先下决心把疫情弄清楚。就是卫生部门一家弄。一家弄到 7 月份时，效果不满意：推不动。也弄了一部分，我们 K 市也是下决心弄，市里意见也是统一哩。但光卫生部门一家弄非常难。没法弄。就在这种背景下，省委态度突然转变：由省委组织部挂帅，开会动员，大概就在 7 月 20 几号开会动员。陈全国书记讲话，王菊梅省长讲话，省委亲自布置这个事，要求省不漏市，市不漏县，县不漏乡，乡不漏村，村不漏

户、户不漏人。单采浆献血人员 100%得查清，献血人员的感染率得 100%查清，要求几个 100%，都得查清，一个一个查的，各个县、市都是一把手挂帅。K 市书记、市长都亲自抓这个事，一个月时间搞完。从上到下都有方案，措施也比较得力。都设的暗访组，我们这里也设的有暗访组，一天情况当天都汇报过来，汇报到省里去。这样查了一个月，叫（把）当年的献血人员统统的都弄结束了（查清了）。然后逐个抽血检查。夫妇一方是阳性的，另一方没献过血，也得抽血检测，看是不是阳性。特别是女方，如果不是阳性，小孩子就不查了，如果是阳性，小孩子也得查，全部给你弄清楚。2004 年这样一弄把这个疫情全部搞清楚了。截止到——因为外面打工的还有一些人——一直截止到 2005 年，陆陆续续，春节回来一部分，包括今年收麦回来一部分，是献身员，没有抽血（检测）的，回来还得补抽，延续到去年一年，这整个 K 市疫情是 5129 人。

**输血感染情况严重** 河南艾滋病疫情，Z 市第一，K 市第二。受血（输血）感染是很重的一块。举个例子。有个妇女患子宫瘤，择期手术，选在（95 或 96 年）春天做。她认识医生，说要找健康人输血。手术在 3 月。6 个月后，9 月份，这个给她输血的献血员测出 HIV 阳性。医生怀疑这个做手术的妇女输血会被感染，通知她检查，一检测果然发现她已经感染艾滋病。从 3 月到 9 月，这 6 个月期间，这个献血员又献了多少血？多少血输给了多少人？在 6 个月之中，这传染了多少人？还有没有发现之前呢，他自己究竟什么时间被感染了？这种情况，怪谁呢？还有一个我认识的市直机关干部，也是手术输血感染艾滋病，开始按肝炎治疗，现在也只好认了。至今没有公开，不愿暴露，说是肝炎，一直服用抗病毒药物治疗。一直坚持服用抗病毒药，效果不错。

在 K 市我们采血这一块基本弄清楚了，其实我们 K 市 2000 年就给省政府写过报告。这一次（2004）我们亲自都下去了，入门入户，逐个登记，我想着，这个数应该是实在的。但这里面也有问题。里头还有两块。缺少 2004 年大普查以前死亡人数的这一部分和当年在医院作手术，输过血的这一块。一个县多少输血者？！这个数字厉害，情况严重。这一块，将来“发了”，政府才被动哩！如果说这两块（已经死亡的和输血感染者）加上了，那这个疫情就 100%的，就这样了。

问：吸毒和性传播呢？

K 市的吸毒，从调查情况来看，大部分，90%多都是口吸。静脉吸的，极少，可能几乎没有，它的依赖性得达到这个程度。性传播，咱原来监测过，感染率也是极低。以前多次检测，都是夫妇两个人，一个是的，也给他干预了，但他没采取啥措施，多年后检测，另一方还是阴性。这次普查以后，（有的感染者）他只是不承认他当年单采浆献过血，但他实际

上是献血造成的。俺这个 5129 的数字，性传播的数，与卖淫嫖娼的性传播，不是一个概念。中国与欧洲人生活方式不一样。另外从统计学上说，性传播机率就是低。但是国外为什么大部分都是性传播呢？因为他的生活方式，普遍都存在这个事。

但随着艾滋病已经发生，这个覆盖面已传播起来了，恐怕下一步，性传播也该成为防治的一个重点了。这方面咱国家也在重视，宾馆里，公共场所推行避孕套，搞一些宣传。老百姓，我们这里的，对一些知识，你要问他传播咋回事，他一般也都知道。多少年了，年年都弄这个事。

我们不管人家咋看这个事，我们在基层工作的同志，实实在在来讲，抱着对群众负责的态度，对上级负责的态度，这个事，从客观情况来讲，就是这样。说假话自己没法弄。到后来还是你背住（承担），还是麻烦。

**艾滋病工作三大体系：疾控、救治、帮扶** 疫情从不认识到认识，各项医疗制度、政策逐步健全，现在分疾控、救治、帮扶三大体系。

**疾控：**发现、检测、宣传、干预，防止二代病人发生。艾滋病日宣传效果好。有一个小孩，输血感染艾滋病，但是不敢公开承认。直接找到输血的头，让拿钱看病。开始政府也不予受理，说是丑闻。现在管理方面文件规定：死亡报告，夫妇检测，母有孩测，初生婴儿随访 18 个月。搞孕检，只有极个别的人不配合。全省重点县从 13 个上升到 31 个（全省共有 89 个县），K 市占 8 个，开始是 3 个。2005 年有 14 个母婴传播。重点县要求所有孕妇都检测 HIV，实际上没有必要，也太浪费，建议盯重点检测就行了。

**救治：**在救治方面，省厅出台文件有规定，要多详细有多详细。这些都有个认识过程。开始捂，作为卫生部门，也不能超越政府。帮扶这一块，救助政策，体现了以人为本，是英明的。有一段，还需要打假，疫情不落实，冒名顶替。现在建立数据库，名册上有登记的人，才给治疗。这一块，医政开始一点不管，2004 普查以后，逐步交给医政。也要搞宣传。首先宣传普及服用抗病毒药的依从性，长期服用跟正常人一样。每人每年平均抗病毒药费 5000 元。宣传以人为本，讲生命权。用中药，需要规范。机会性感染治疗浪费大。

**帮扶：**政府救助为主，进驻工作队，K 市 5 个重点村，国家有“四免一关怀”，省里有“四有一补”，内容差不多。由当地民政贯彻执行。帮扶：政府救助为主，进驻工作队，K 市 5 个重点村，国家有“四免一关怀”，省里有“四有一补”，内容差不多。由当地民政贯彻执行。

“天是一个天，地是一个地，为啥他那就比我们这好？”这中间，有攀比心理。互相攀比。驻马店市外面都知道，上蔡钱多得很，吴仪项目一次给 1000 多万，省卫生厅扣下 500

多万，县里上告到卫生部，省里又返还上蔡了。省里全力保那里不让出问题，这面都不认（不认可，不满意），说：“天是一个天，地是一个地，为啥他那就比我们这好？”政策不一样，群众有意见。老百姓吵闹，我们尽量作工作。其他地方也跟 Q 县比，他那儿不声张，咱也不好说，不知道的，就没有（救治）……这种事情，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2004 年，李克**强**书记还在这，当时省政府下决心要把这个事弄好。建立和谐社会，不公平才出问题。K 市一直都实事求是，我都给你说实话，你这是组织部通知的，更是实话实说。（录音整理 20060318）

## Z 市

Z 市是河南艾滋病疫情最严重的地区。2006 年春季，我走访了 Z 市相关部门，其中包括卫生局、防疫站、医政科、民政局，Z 市下属县乡的卫生室、阳光家园，访谈对象有这些部门的领导，也有普通工作人员，他们工作在最基层，有的还是早期驻村的工作队员——由于疫情严重，该市派驻工作队进村更早。访谈中，有人显然顾虑很大，但还是接受了访谈；有人则无所顾忌，放开了谈；还有人说到激动处，言辞颇为激烈。访谈时我尽可能少提问。对于访谈对象，无论顾虑重重的还是无所顾忌的，我都顺其自然耐心倾听，只是在他们发问的时候，我才顺势引导谈话内容。为时一周，了解到许多当年发生的故事。

**“打破坚冰”** Z 地艾滋病 2000 年—2002 年死亡率最高，实际上 1999 年已大量死亡，2003 年底才开始搞“确证”。2002 年 11 月，“非典”之前，河南艾滋病拉开序幕。这跟当时河南省省长李克**强**关系很大，是他打破了河南艾滋病的坚冰。卫生厅报假数字，隐瞒实情。李克**强**要求政府领导部门合作搞清实情，动用省长储备金开展艾滋病救治。当时 Z 市 4000 多名现症病人，人均每年救治需要 6000 元。李克**强**一口答应，一下拨给上蔡 1800 万对艾滋病病人进行救治。在此之前，一直掩盖，没药没救治。当时也没有开会，就 3 个人——疫情最严重的 S 县的县委书记、县长和主管卫生的副县长，向李克**强**汇报情况。听完汇报，李克**强**当即做出上述决定。Z 市的卫生官员因此很怀念李克**强**。

而当地人们都说，实际上最早“打破坚冰”的，是那位 S 县年轻的副县长聂勇。人们这样介绍他：原是某县中医院医生，非党人士，当年提拔任用知识分子，竞选当上 S 县副县长，主管卫生，年轻，敢说真话，越过省里直接向卫生部上报疫情，对当地艾滋病防治贡献很大。但是他也因此受到排斥，险些受到处分，调任 Z 市卫生局任艾委会（艾滋病防治委员会）副主任，没有了实权。也有人说他在 S 县受过处分，经济问题，挪用公款，“又没装私人兜里，有啥？主要是受排斥。市里把他调来，还是保护他哩。”还有人说，S 县的县长对艾滋病防治也立下汗马功劳，他支持聂勇的工作，也很有些想法。

Z市卫生官员们认为，Z市为全国艾滋病防治事业做出了贡献，《艾滋病防治条例》的原型，就出自Z市，Z市艾滋病的防治救助影响了国家政策出台，卫生部也承认，从队伍建设到宣传策略，吸收了Z市的经验。

**吴仪来河南很生气，说血头血霸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是杀谁呢** 官方最早办血站是1987年，一直办到1993年。Z市光部队就有11个血站。159陆军医院，是有名的烧伤医院，开始是济南军区后勤部的供血站，后来提供制造白蛋白原材料。在血浆缺失期自己生产，建蛋白加工生产线，然后再收走，为此还专门成立输血科。159医院之后生物制品厂多了，那时候大量批准成立血液制品厂家。军分区也建血站，然后又发展到武装部。最后全地区建了33个。原来全国只有8家，后来发展到几十家，翻几番。这些，都必须经过国家卫生部批准才能建。再以后需要血浆量大了，乱收血浆，要求不严了，不合格也收。上蔡用血都是从血站来的，临床输血用血，都没有检测手段。上海莱氏公司，是外商办的，也是用这里的血。

1993年Z市血站先停，当时没有说艾滋病，只说是因为卖血的人都干不动活了，从保护生产力的角度提出来，行署让血站停了。当时其他各地还没有停。卫生部派人到豫东，悄悄买血浆化验，发现艾滋病毒，全省才停了。以后，是在1993年下半年或者1994上半年，让一县只能办一个血站，不准单采。1995年卫生部出文件，让查HIV，“以前都没有让检查过。”

办血站赚钱太多了，办血站就跟拾钱一样，净赚！那卖血的人群黑压压的，血站的人忙得很。有个小孩，天天忙着给他姐送饭，他姐在血站给人采血，忙得吃饭都回不来。采血的人手上的茧子磨得跟铜钱一样厚。当时采血混乱得很，老百姓有人是一手烧锅一手采血，庄稼地里、猪圈里，哪里都是采血哩。公安去查，群众把公安的车都砸了。确山县，一个卖血的拖拉机，一早拉人去卖血，天灰蒙蒙看不见路，对面来一个车队，把一拖拉机的人都撞翻到河里，都没人伸头看看，17个人全淹死。人都麻木了。

后来就发现有了艾滋病。有个老生产队长，年纪大了，3个儿子都不管他，为了给老婆治病，只好卖血，感染上了艾滋病。在十里铺村，一个放羊的妇女，她父亲还是县里的副局长，也是卖血感染艾滋病。上蔡下岗职工卖血的不少。2002年乡镇查出艾滋病涉及的干部不少，芦岗乡一个大学生，他家是南大吴上堂村的，才分去时当宣传秘书，2001年当上乡长。后来老是发烧，检查出来艾滋病，喝药自杀。这种事太多了，说不完。感染艾滋病的太多啦……。

当时河南卖血，的确很乱，杀猪一样。卫生厅医政处副处长王传宗，看见血站洗手池里溅得到处都是血，说简直就是屠宰场！吴仪来河南很生气，说血头血霸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卫生局高局长说杀谁呢？都是部队的。

**摸清底子 救治救助** 最初要摸清底子。Z市原来的重点县是确山、新蔡、上蔡3个县，共24个重点村，其中上蔡22个，确山、新蔡各1个，后新增了遂平、平舆、汝南3个重点县。Z市1999年暴露的早，比较乱。当时省里没有明确规定。老百姓情绪大，影响了社会秩序。省里是2004年下半年才开始行动。又全部挨户调查建立档案，县、市、省，逐级上报。数字是动态的。救助省里有政策规定（省里定政策参照上蔡县）。开始药品不足，艾滋病人家为了治病卖粮食买药。2005年以后，救治救助政策落实了。以往的乡镇医疗体系基本瘫痪，现在艾滋病定点村建村卫生室，另有77个乡镇卫生院设立了艾滋病诊室，负责散在的艾滋病。现在（2006）比2004年强，那时候，真有大乱的感觉。

救助工作比较单纯，市民政局下设艾滋病科，主要是完善制度，严格发放程序，保证上面会议精神政策的落实，保证艾滋病人的基本生活不出现大问题。。财政直接发到县里，市里不过手。全市致孤人员1129，孤儿999、孤老130。单亲1939人。艾滋病困难家庭7426户，28222人。至孤儿童分散寄养的有800多人，爷爷奶奶养的最多，其次是叔伯。集中供养的200多人。人均160元，每月25日前由乡民政编制下月计划，汇总上报，县民政10号之前下拨款项。各种补助加起来，艾滋病家庭生活水平超过当地一般家庭。致孤报批半年一次。艾滋病火化免费，人均700—800元。上蔡县是2001年或者2002年开始免费火葬。

这次在Z市调查期间，2006年03月24日，看到Z市电视台报道，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到遂平、西平搞新农村建设，河南省副省长王菊梅到确山、汝南搞农村医疗保险。“今年（2006）是重点解决农村社会医疗保险。每人一年交10元，最多可以报销1万元。”民政局长说，“农村医疗，包括艾滋病救治，慢慢就走上规范了。”

**河南艾滋病性传播情况尚属盲点。**艾滋病传播三个渠道，母婴阻断和血传播可以控制，性和吸毒不好控制。Z市吸毒传播只有两三例，性传播问题严重。Z市设有艾滋病性病咨询站，但是来咨询者很少，都不敢，不好意思。今年春节期间，从南方广州等地打工回来的一群小妮，搭伙（结伴）来咨询，在她们中间发现艾滋病感染者10多例。目前全市已查出1000多例经卖淫途径传播感染艾滋病，其中很多是从广州回来的小妮。有一个16岁男孩，长得可排场，感染艾滋病，查出以后找不到人了。全市所有宾馆、发廊无一处没有小姐，这已作过排查。河南有那么多轻壮劳力、流动人口，现在的卖淫者大多都是农村姑娘，上蔡艾滋病村庄有年轻离婚妇女外出卖淫，这方面问题很大。甲乙丙肝病毒就更多了。1994年，有一次确山抓非法血站，公安抓住一个，检验二三百袋血，100%有病毒。甲乙丙肝病毒，还有梅毒。专家估计，全国艾滋病感染者65万，数字统计是13万，隐性占80%以上。“性传播很隐蔽，十年中会发生多少性行为，后果非常可怕。”

**连省里医疗队都不敢接触艾滋病 社会总体上对艾滋病缺乏认识** 驻村工作队包括工作队的医生，进村进户他们都害怕。工作队员从艾滋病村回到家，家里人都不让进门，要脱鞋换衣服。了解艾滋病，就得接触艾滋病，可是连省里医疗队都不接触艾滋病，害怕。公安厅、卫生厅的副厅长到澳大利亚，住宾馆住了3天以后才由官方接待，接待人员告诉说，那里的厨师服务员都是艾滋病，把他们吓懵了。要提高各级领导的认识……。他们都怕艾滋病的问题影响政绩。大普查的时候，还有些领导不让弄，现在也没有完全转变过来。从广州回来的小妮中查出那么多艾滋病，不能只在Z地宣传，全国都得宣传。艾滋病宣传不到位，工作都是表面的，社会总体上对艾滋病缺乏认识。

**要落实基层医生待遇，否则艾滋病病人用药就划价高** 基层医生待遇太低，乡镇村医每月500工资。药品价格受利益驱动，要落实医生待遇，否则艾滋病病人用药就划价高。“不划（高）也不行，人家医生也要吃饭。”如果按照级别套，中级医生得有1000多元的工资，基层医生待遇远远达不到。遂平有个定点村村室，每月300元工资。一些重点村的村医，一天光输水就是几十人，累得很，工作量很大，待遇很低。

**上面来人，不能理解我们基层人员的苦衷** 说到河南艾滋病，一些基层卫生官员常常会说，“已经过去了，再说也没有意义了，不想说了……。”显然顾虑很大。即使是一般工作汇报年终总结资料，出示时也常常会很谨慎地涂掉所有数据。他们很抱歉地跟我解释，以身边发生的事实为例：2002年北京来了一位专家，我们都很尊敬他。那时每天死人，情况很惨。当时底下有位副县长，年轻没有经验，实事求是对待他，告诉他实情，领他进村。但是他出去不分场合乱说，险些给这位副县长带来灭顶之灾。还有人竟然偷偷把人家的谈话录音，也不告诉人家，在国外电台上播放。他们只顾自己出风头，轰动，不管基层人的死活……。要不是后来河南艾滋病公开，形势发生变化……。那可是牢狱之灾！做艾滋病不是出成绩出政绩的地方，都不愿意你说实话，“说实话就会与马士文一样，没人欢迎你！”领导怕你“捅出去”影响他的乌纱帽，同事埋怨你影响了科室评先进拿奖金。为河南防治艾滋病做贡献越大越不能受到提升，反而受到排斥压制。这是个怪圈。“不是不愿跟你说，是不能说。上面来人，不能理解我们基层人员的苦衷。”

**一部未出版的小说创作** 负责接待我的办公室王主任很热心地替我约见一位当地卫生部门的科长，谈他自己的小说创作。“记述艾滋病，写了四五年了，已经数易其稿。”王主任说。这位写小说的科长，Z市人，1995年毕业于河南医学院，工农兵学员。是一个热情坦诚的人。他说——

当年我是市里下派的工作组成员，叫做“三个代表”工作组，当时驻村也是为了稳定艾



滋病人，驻村时间在 2003 秋至 2004 春。<sup>①</sup>然后接续的，就是省派工作队。我所驻的村庄艾滋病疫情很严重，全村人口将近 4000 人，艾滋病死了 300 多人。驻队时统计全村人口 3210 人，1800 多人卖血。普查时，还有感染者 570 多人，感染率 30%。小说创作就以此为背景。

书中写一个卖血的老婆（河南农村地区对老年妇女的称谓），1991 年，领着 15 岁的小孙女去卖血，女孩父母都死了。结果化验是丙肝，人家不要她的血。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为了坐车、挂号，她借了 10 块钱，卖不了血咋还人家啊？遇上大毛借给她 20 块钱。两年以后这老婆托人，把这个小女孩说给了（做媒许配给）大毛了。“我写小说，都是真实的故事。写彩礼、换亲、喝药（自杀）、上吊，都是真的发生过的故事。南大吴高桥庄，20 多岁的小姑娘上吊死了多少？社会就这，咋就卖血？！”书中的主人公很辛劳，要不是卖血，原本农村平平淡淡烙馍稀饭也能过。日子虽然清苦，但是有天伦之乐，女人脸上可以看出来生活的困顿压抑，但是“子子孙孙无穷匮矣”，有苗不愁长。看着孩子长大，五男二女，平淡一生，有小老鼠上灯台的歌谣，苦中有乐。后来分田到户，买化肥买工具需要钱，就去卖血。大毛就是这个时候碰上这个卖血老婆，这些事都是真事。村里的老六进城卖豆腐，看见人家大姑娘小媳妇都卖血。回来问村医，啥是血浆？啥是红细胞？500CC 是啥意思？村医说就比如米汤，有米有汤。500CC 就是一斤。于是他也去卖血。不卖不中，啥都涨价。人们流动卖血，男女混住，关系复杂。白天流红的晚上流白的，人能受得了吗？卖血人的车上，一个小车挤三四十人，男人用手摸小女孩的腰，一圈都是手。这些情况卫生局李局长也知道。村里 4 个人卖罢血出来，就去买猪蹄喝酒。吃完了喝完了油手往电线杆上一捋，见个小广告：治疗阳痿，卖金枪不倒药……。“这些细节反映了一个朝代的风气。过去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现在是经济发展过热，大力推广安全套，工业废水，高离婚率，性大解放……。”

艾滋病灶状流行，流行到一个个村庄，散布在已超过万人的县城乡村，然后流向全省。若不及时采取措施，传播很快。我从村里回来就开始写作。有人说我写得好，像秋菊打官司一样很实在。“我这是文学作品，不怕，退休了，怕啥呢？我这还是写得温柔呢，很多不敢写。”老家过年时来说，有一家 80 岁的老娘死了，偷偷埋了。过两天，县民政局又把她扒出来，泼上油，烧了再埋。一家人去哭得一团糟。这就合法了？当年伍子胥鞭尸，就恶心的，这比那还令人发指！

最后，这位科长感叹道：河南每次运动首当其冲，受罪的都是农民。现在搞市场经济，

---

<sup>①</sup> 2003 年 6 月，在河南省卫生厅的建议下，河南省政府建立了“河南省人民政府防治艾滋病性病协调会议制度”，并对下设的 30 多个成员单位在预防控制艾滋病性病方面的工作职责作了明确分工，此次下派帮扶工作组，是落实该协调会议制度的一次具体行动。

农村人男的干重活，女的卖淫。再后来就卖血。

问：现在取消农业税，农民的日子也该好过了吧？答：农业税没了，但是原材料涨了。化肥农药都成倍涨。税费正好抵消涨价，农民的日子好啥呀？！

在场的另一位基层县卫生局长说，某些大官是铁石心肠，凡稍有良心的人，看到天天死人都不会无动于衷，可有些人就是无动于衷！省厅有的领导，在 Z 地口碑不好，隐瞒疫情，还不直接说，一次次让下面重新报数字。河南情况特殊，献血光荣……。血头血霸政府官方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那些责任人至少要有行政处理！建血站的批文谁能干？国外不了解情况，否则……唉，凭个人良心吧！

## S 县

更早些时候，2005 年夏天，我已经走访了 Z 市属下的 S 县卫生防疫部门。S 县是河南省疫情最严重的县。县卫生局、防疫站、艾防办、县医院，几个部门多人现场访谈笔记整理如下——

**即时疫情** S 县全县 29 个乡，都有艾滋病毒感染者。全县将近 600 个行政村，上报 528 个，实际上大于这个数。其中 226 个村庄有感染者。2004 年 8 月底全省普查数字，S 县献血者 41886 人，初筛感染者 5332 人。这个数字也是经常变化的。最近统计报上来的感染户数：1 人 4389 户，2 人 1042 户，3 人 52 户（计算感染人数 6629 人）。上月（200507）新检查出 25 例，多方面原因罢，实在包不住了，每个月增加 20—30 例，按 25 例计算吧，1 年增加约 300 例……。 （20050818）

艾防办的工作人员给我画了一张 S 县艾滋病村分布示意图。说，高发村 22 个，中度村 28 个。感染者大多集中在县城南部，多为当年献血员，居住集中；县城北部感染艾滋病，多是因为输血，比较分散，全县已经发现输血感染艾滋病 230 多例。

河南省最著名的艾滋病村文楼村就在 S 县。S 县一位负责艾滋病工作的卫生官员说，S 县艾滋病感染人数最多的不是文楼村，而是邵店乡的后杨村。文楼在全县排到 6、7 位。后杨村包括 6 个自然村，全村 4000 多人，1200 多户，560 多人感染，现症病人 460 多人，确证死亡 60—70 人，实际上死亡近 300 人。当时县里还没有检测室，只知道“怪病”死亡，没有检测确证的，没有统计。村中卖血人员 1800 多人。据村干部说，几乎家家都有人卖血。这位县卫生官员说，各村情况不一样，他是本地人，他自己的家乡某村，距县城 30 里，只发现 1 家感染艾滋病，这一家的妻子、孩子因艾滋病死亡，只剩下了丈夫。

一位当地退休卫生官员说，他最早带领做抗病毒治疗。当时是进口药，用药很盲目，与村干结合着搞，当时存在认清问题，没有检测手段。当时全县艾滋病感染者 6000 多人，全

部算有 7000 多人。患者女多于男。中国艾滋病流行情况不同于非洲和欧洲，病状也不同。

(20050819)

防疫站工作人员说，1999 年底，数据库（艾滋病）已经三四百人了，一直严格保密不报。后来记者来了，县委班子建议书记上报，报了 3 例。其实省里也瞒着。2001 年县里向省里报告，全县卖血人员 3—4 万人，可以按 20% 感染率推算感染人数。省里没上报。当时负责卫生的主管副县长带着数据直接上了卫生部，卫生部大吃一惊。省厅因此对 S 县很有意见。2001 年卫生部来到县里，县里汇报“全民卖血运动”情况。陪同卫生部的省卫生厅副厅长不听汇报，说“找数据来！”那位主管副县长受到排斥，现在调任 Z 市艾委会主任，有职无权。（20050822）

**卫生系统搞第三产业，美国也要咱的血 全地区建 30 多个血站** 当时（卖血当年）的风气就是卫生上“砸三铁”，断粮断奶，让自己创收。卫生上搞啥产业呢？建血站吧。慢慢由血头招募血源，之前也有血头，找附近的献血员卖血，有病号了，打电话找某某过来，配对，直接输血给病人。后来演变成现在这样，就靠办血站赚钱。就这样卫生系统搞第三产业，美国也要咱的血，从上海装船运到美国。乙肝血还贵哩，生产乙肝疫苗。那都 10 年前的事了。Z 市当时共 30 多家血站，排大队抽血，交叉感染。记忆当中，当时献血的人清早排大队。边上放个大桶，大桶上贴个盐字，路边小贩卖饭卖包子。Z 市老防疫站中心血站，放着两个大桶，就是医院用的保温桶，上面写着很大的“盐”字。新蔡东湖村离医院近，搞垄断，还不准其他村人献血。后来政府血站不办了，打击血站。政府血站关闭后，地下血站起来了。1995 年至 1996 年秋，这一时期很猖狂，艾滋病传染多了，血头赚大钱，这些情况，公安局有备案。血头私下里采。不让卖血，那些人还聚众闹事，说为啥不让卖？收他们设备，采取措施打击，举报有奖。有个举报的人，直到 2005 年 2 月还找胡局长要奖励，举报了没给他钱，后来解决了 400 块。

全地区 10 个县市，当时共建 30 多个血站。现在全地区只保留一个，其他的器械收缴了。这事政府是有责任的，当时建血站，千方百计找人批，又千方百计找市场。卫生局派人到处跑，找血市场。上海莱士公司、生物制品研究所，北京、广州、深圳的人民医院，都跑过。尼书信，解放初在上海，跟莱士公司有“铁”关系。北京生物制品处处长说，河南这么胆大！当时号召搞三产，否则没工资。北京上海很多艾滋病感染者，医源性根源都在河南。医生开一袋血浆提成 5—10 块，所以不管是否需要都动员病人输血，都是受利益驱动，结果输血又感染一批。艾滋病人现在就说是政府批的血站，政府让卖血，闹。文楼人到卫生厅去堵厅长，不给药不起来，让从身上跨过去。后来越闹越凶，出租车司机不敢去城南。

### “最初发现艾滋病人，跟红灯记一样，单线联系”

1、1995年4月上旬，邵店乡袁寨村村民黄伟在广州打工，缺钱卖血时，在广州中心血站检测出HIV阳性。他此前在上蔡有卖血史，是献血员。广东省卫生防疫站用飞机把他送到郑州机场，由省防疫站通知S县防疫派刘俊民（地方病科科长）接回，送回家中，告诉他，有情况及时联系。这是上蔡首例确症感染者。人还在，但不是重点村，现在在村里不承认自己有艾滋病。

2、李建东，杨集前李村人，1995年4月中旬，通过省卫生防疫站转回来，他当时在河北打工被查出来的，在家的名字李×保，已死亡。

3、1995年4月28日，这次发现多了！从省防疫站一批转回来十多人，都是从献血员中发现的。这一批十多人，只落实了3个有名有姓的。省防疫站王春俭带工作组来上蔡作流行病学调查，将县人民医院血站库存的52袋血清送往省中心血站检测，其中4袋呈阳性，但已查不出姓名。当时管理混乱。查了以后“撂那了。”县人民医院、县卫生局血站关闭。查出姓名的艾滋病人有程东善，文楼人，献血员，好象是个包工头；李献国，程老村人；还有一个孟妹的妹夫。告知他们注意事项，发生情况及时联系等等。

4、卜新会，邵店刘岳村人，27岁。1996年春，在广州中心血站查出，人家卧辅送回来。他1995年还得了一对双胞胎男孩。

5、西平血站查出更多，100多人，报省里。省里发出通知，防疫站组织人，对照户口本接回当地去。很多人查不出来，“查无此人”，好多假名，一个人几个身份证，一天卖血三四次。凡查出来的，对他们说：“保护个人，保护他人，要洁身自爱。”

发现后采取的措施是：全家血液检测，在Z市地区防疫站做化验；派出所收了身份证，不让外出；告诉其预防措施。当时咱没检测条件，都是从外边发现的，发现的也保密，“跟红灯记一样，单线联系。”黄伟外出打工还打招呼，他人老实忠厚，跟一伙人一块出去，没身份证没事。他有俩闺女一儿，大妮儿该出嫁了，家庭不错。县防疫站一直随访最早发现的5人，给“套”（发安全套）、发给宣传单。他们当时都没发病，现在死了李建东一人，其他几人都好好的。防疫站一直作宣传，从1995年12月1号“艾滋病日”起，每年搞宣传活动，制宣传版面、发传单搞宣传活动。科长刘俊民负责，他是主治医师。

**桂希恩来政府不喜欢，郑锡文采血样底下人也糊弄他** 1999年，孟超当书记，百姓中传说得了“怪病”。县中医院医生雷×在武汉进修，跟着桂希恩学习，把情况告诉了桂希恩。1999年11月，很冷，桂希恩来了。抽血11人，查出10人艾滋病。桂希恩发现艾滋病，建议当地政府搞清楚疫情，卫生局把情况反映到县里，被压下来了。他们歧视老百姓，搞愚民

政策，百姓知道越多越难办。桂希恩这才写信给李岚清，桂希恩直接发内参给李岚清。李岚清批示给卫生部，卫生部转给省委书记马忠臣，省委转给省卫生厅，卫生厅最后还是落实到我们基层卫生工作人员。我们防疫站领着桂希恩 3 次去文楼，吃方便面，很艰苦。为放幻灯片，帮着他借县医院白床单。“说实话，当时政府不喜欢，不多乐意他去。”反正，这事叫桂希恩揭出来以后，省卫生厅防疫站、国家疾控中心来人了。郑锡文由马士文、张更荣（省疫控处）、王哲（省防疫站长）带着来采血化验，重点村文楼普查。有的人不愿查，作工作，那时候医疗队就进驻了文楼。郑锡文采血样，底下人也糊弄他，把一份血样分成 3 份给他，图懒省事。

“对桂希恩、高耀洁的看法？咋说呢，政府都肯定他们了，我们能咋说。温总理都肯定桂希恩了，他们都揭了盖子。其实不揭也是这，底下的情况早都知道。”

**政策很难到位，关键在于可操作性，经费不好落实** S 县艾滋病定点救治机构 50 个，其中 3 个县级医院，13 个乡镇级定点医院，其余是村级卫生室，其中 22 个是重点村的。县防疫站 2000 年 6 月建“初筛室”，2004 年 8 月建“确证室”，入户普查。S 县对艾滋病的救治是比较早的。免费抗机会感染药物从 40 多种增加到 60 种、80 种、100 种，现在已经 115 种，又增加了 15 种抢救药品。但是政策很难到位，关键在于政策的可操作性，经费不好落实。

比如《健康报》2005 年 4 月 22 号刊登一篇文章，说母婴阻断手术费、接生费全免，奶粉供应 12 个月，计 1560 元。报上登了，好经（和尚念的经文是好的，这里指空谈），经费不落实，没有正式文件。现在计划生育难搞，谁再管？无休止的生。原来阻断是产时服药，产后供应奶粉，每月发 6 袋，供应 6 个月，用儿基会的资金，儿基会专家说，供 6 个月就行——现在联合国儿基会正在 S 县搞“母婴阻断项目”，由省防疫站掌握。现在报纸说 12 个月，有没有依据？报纸的话能信？现在艾滋病治疗药物已经控制不住了，还提出要增加药品。艾滋病什么病都能得，按规定 100 种药品之外的不能免费，患者又没有钱，怎么办？比如，前天公疗医院收治的一名艾滋病儿童，需要输血，按规定输血需要自费，没有钱一直拖着，最后终于决定输一二百 CC，配血还需要时间，到后半夜，病情恶化孩子死了，血没有输上。患儿家里人租了水晶棺把尸体放在医院大厅，也不上告，也不让解剖化验，就问“为啥死了？”医院只好以“影响正常工作秩序”报警。公安出面协调，医院赔偿几千元，加上公安费用、水晶棺费用，共 1 万多元才算完事。这种事时有发生，县医院、中医院、县红十字会等 5 家医院都有“停棺不走”的。现在正有一件棘手的事情不好处理。克林顿基金会开展的“艾滋病儿童服用药物”项目，在全国有 200 人份，给了 S 县 100 人份，柘城又告状，说为什么

只放在 S 县？本来是好事。后杨村周卫东的女儿周妞要求服用，经筛查符合条件，签了协议。只服用 1 次，出现抽搐、振颤状况，父母说是服药副作用。省里专家何云、赵博来会诊，诊断不是服药引起的。两口子把孩子扔在防疫站走了。防疫站把孩子送到县医院，觅了两个人看护，然后汇报到县里。县里认为他们的行为构成遗弃罪，通知乡里、村里来解决问题，但是都没人管。公安也不敢以遗弃罪论处。后来两口子来了，提出来要转到郑州六院治疗，转院后（公家为其）交住院费 3000 元，他们又提出吃喝花费怎么办？只好又每天给他们 100 元。3 天后他们抱着孩子回来了，又住进县医院。县医院来电话说，情况不好，要求输血、输蛋白。两难。现在郑州六院、县医院、还有看护费，已经好几千元进去了，死了 1 万元打不住。（几天后孩子死亡，放在县卫生局办公桌上，家人亲戚来一群要求赔偿。）前天一妇女到艾防办闹。她不愿意检测，不能算艾滋病人。她看病到村卫生所医生不给看，她挖（抓）医生一把，自己挂上吊针找到县委反映问题，说卫生所不给挂针。县委说这事该卫生局管。卫生局通知艾防办“接人处理去。”艾防办去人觅了个三轮接她，她不愿坐，“才仙（过分，不合乎常理）哩，要坐县长的车！”大热天穿个棉大衣，显得更痛苦嘛！接到艾防办堵住门不让艾防办主任走，打 110 报警也没法，最后给她 200 块钱，走了。

**医生没有安全感，公安部门不愿管** 村一级医务人员待遇不能落实，队伍不稳定，管理混乱，医生没有安全感。省里要求到村里卫生室 5 人，没有办公经费，县里只负担 2 人工资，每月每人 500 元。实际上村卫生室只有 2—3 名人员，只有工资没有办公经费，工作无法规范。医生也就是轮流打针值班。南大吴村陈贺松医生，病人酒后要药，超出规定，没给，衣服被撕得一缕一缕的，报警也没法。王营村，艾滋病人要药，要啥给啥。一个女医生没有给，用刀戳她的电动车轮放气，女医生气得直哭，碰巧县委一把手杨松年遇上了，打电话让公安去人，仍旧没有处理。医生没有安全感。医生忍气吞声工作，公安部门搞艾滋病也没钱，还有风险，都不愿管。

**县乡医院生存发生危机** 免费治疗艾滋病人，增加了医院工作难度。乡级卫生院由于有“政治任务”，必须收治艾滋病人，其他病人就不去了，收入受到影响。现在有 3 个全部收治艾滋病人的乡镇定点医院，芦岗、其海、大陆里。原来乡镇医院都是靠卖药医疗的收入来发工资，现在治疗艾滋病是免费的，医院没有收入，国家也没专项资金拨款，这些医院生存发生危机。大陆里 30 多人，人均月工资不到 200 元，还不能保证。菜沟医院也是个乡镇卫生院，有任务收治散在的艾滋病人。为了不影响一般病人来看病，只好发动全院一二百名职工集资，在院外盖房，固定人员（专人）负责艾滋病治疗。在县医院，一个艾滋病人加队（加塞儿）拿药（取药），打了一个 50 多岁的老婆，说：你看我是谁啊？我是艾滋病！这

老婆也是艾滋病村的，就叫人来报复，闹起来了。这种事常有，一般病人不来看病，医院就没有了收入。后来单独建了艾滋病人药房，情况好一些。政府只关爱艾滋病人，医务人员吃饭都成问题。

**用药无制度，浪费大。“闹人孩子多吃奶”，是误区** 一位卫生局官员说，现在全县的医疗资源 50%都用于艾滋病了。艾滋病是无底洞，管理无制度，造成很大浪费，还延伸出很多问题。他 2001 年 7—9 月在文楼驻村 3 个月。他说，当时人是疯狂的，从卫生所拿药，药扔的满地都是，好一些的药就转卖。大夫乱开药，病号关系好的，有人一天开了 26 个方子，提着篮子取药，一年全村药费花 100 多万，猪也吃这些药。安眠药青霉素一支几块，进口药 1 支 50 元，拿去换一包方便面吃，拿去送亲友。村里人吃完饭，上班就是开药，输液瓶成垛。有一个老头拉了一麻袋输液管，还带着血，去卖废品。艾滋病人拦县长、厅长的车。对那些闹得凶的，就给些好处，文楼村王恒强，艾滋病人，他的子女、包括他的外甥女的学费，一万多元，都解决了。因为是温家宝来了，做他的工作，让他不要闹了。有个艾滋病人，半年不到，花了 8 万多。老红军还花不了这么多哩，形成攀比。艾滋病儿童罗军旗，他姐与温家宝一起吃饺子。他的监护人罗学也是艾滋病，专门自费拿药给罗军旗吃，目的是要挟政府，攻击政府——艾滋病孤儿，敏感，拿着发票造舆论，结果全给他报销了。文楼还有一个艾滋病人住在卫生所住着不走，因为陈全国要来，卫生厅没法了，答应给他 1 万元盖房，没落实，现在他在卫生所住两间。文楼还传说，那一回有一个妇女弄了 1500 块。政府为了稳定，会闹的给钱，老实人该得到也得不到。“闹人孩子多吃奶”，是误区，好人也得学坏。

**由艾滋病引发的社会震荡** 一些基层卫生官员还说到，借艾滋病名义敲诈闹事，扰乱社会，引起民愤。他们说，“干这些事，假艾滋病串联真艾滋病。”“现在假艾滋病还多着哩。交警队派出所备案多得很。东街南街都有备案。”全县人口有 130—140 万，加黑户（没有户口的人口）有 170 万多。以艾滋病为由，搞敲诈的有数十人。南关做生意的人多，经常受到敲诈，他们自称艾滋病人，闹事，砸店、打人、吃饭不给钱、当门（在门口）大小便。大部分小生意人都被敲诈过，群众不敢揭发，因为打 110 也没用，政府抓了也没办法，抓了又放，放了又抓，形成恶性循环。南环路过往车辆都不敢来，汽车司机说宁走阎王店，不走 S 县。新蔡那边情况一样，艾滋病人带着车辆闯关，免交过路费，得 10 块分 5 块。替人要账，搞诈骗。艾滋病人拿着“本”（证明艾滋病人身份），拄着棍，截路，三块五块放人。这些公安掌握得都有情况。

现在（200508）艾滋病敲诈还时有发生。麦收的时候，打麦的车也不敢来。春节之前，有个送玻璃的车，遭艾滋病“碰碰”，“碰碰”的人住到医院里，让人家包赔，人家不给，

觉得是敲诈，艾滋病病人聚集了 200 多人闹事，还带着猎枪棍棒。砸了大玻璃店，评估损失 20 多万。公安局长挨打，也制止不了。抓了几个头目，送了些钱，又放了。一家旅社还被敲诈 800 元。旅社老板常水法，居委会副主任，转业军人，共产党员。他说，那天晚上有两口来住宿，管他们要身份证，他们说跟公爹生气，就住一夜。半夜这两人说手机被盗，值 1200 元。当晚南关派出所去了，问，说是后杨村的人，后杨是个艾滋病高发村，刑警将两人带走了。第二天，后杨来了一群人，人越集越多，说是不给钱不走人，派出所不敢管。后来找亲戚协商，给了 800 块，吃饭花了 200 多，下午 4 点多才散。像这种情况在当地见怪不怪。一个兽医店卖给艾滋病病人药，艾滋病病人拿着他的死猪娃要求赔偿损失，兽医店赔了 4000 多。

大刘庄没有艾滋病病人，去年（2004）游行抗议艾滋病病人欺诈抢劫，政府太软弱，自发组织起来对付艾滋病。大刘庄刘五做生意，说是邵店乡艾滋病病人去他那里闹事，双方各聚集了二三十人，看力量差不多，散了。第二日，艾滋病病人来了 50 多，大刘庄亦有准备，100 多人拿锨板、锄头把他们打跑了。刘玉川是刘五的大哥，也是生意人。他的店卖玻璃，被艾滋病病人砸光了，损失几十万。他们也自发组织起来，把艾滋病病人打得不轻。

南边卖水果的都被敲诈几十次。群众自发组织起来 300 多人，看热闹的更多，艾滋病病人来了 200 多人，被吓跑了。那次报警到县委，警车去了，但不敢行动，公安局长封某挨了几棍，还是不敢抓人。小区超市，店主刘某是居委会主任，把各家做生意的召集到一起，每家拿 500 元，成立个棍棒队，说是只要艾滋病来闹事，出钱的家，棍棒队都来帮忙。后来艾滋病病人来了几十人，棍棒队有 100 多人，把艾滋病病人打跑了。

有的基层卫生官员认为，艾滋病病人形成了一个群体，应该建立艾滋病管理条例，“立法”打击胡闹违法的艾滋病病人。“弄他三个两个绳之以法，不能总心慈手软，得提供个救治环境。”甚至有人说：“真想搥死他们，他们就是全县人民的公害。”“叫我说，就给他们说送到更好的地方治疗，装到车上，一车鏗到大沙漠，死了就给埋到沙里。”（田野手记 200508）

输血感染艾滋病引发上访。塔桥乡沈寨村王胜利的儿子 11 岁，他妈 1995 年生他的时候，在县医院输血，两人都感染艾滋病。他娘 2001 年死了，儿子 11 岁发病。塔桥没有定点医院，就到菜沟医院治疗，太远。后来打官司，找县医院找法院，法院不受理，就写信给温家宝，温家宝有批示。王胜利扬言要炸掉医院法院不活了。要求赔偿 40 万。他有艾滋病本不用，偏偏自费看病，要挟政府。给他解决问题他也不配合。现在正在调查，按信访程序处理。

刘庄杜赞松 12 岁，也是输血感染艾滋病。他父母到南方去打工不回来，儿子交给爷爷奶奶，天天上访。2005 年 6 月，治疗无效，死在县医院了，120 拉回家。爷爷精神失常，天



天上访，协调红十字会解决了 1000 块。现在可能还在省里或是北京上访。

**我们现在是忍辱负重为政府分忧，是政府的一道墙** 县防疫站卫生官员说，我们现在是忍辱负重为政府分忧，是政府的一道墙。艾滋病人把小孩往政府开会的会场上一扔就走，都得我们去解决。县医院，50 张床，不免费的时候只住 3、5 个人，现在免费，住院的艾滋病有 160 多，不死不出院。中医院 60 张床，以前住不到 10 人，现在住 200 人。现在正请省专家会诊，确定出院人名单，写“告全院病友书”动员出院。现在是会哭的儿多吃奶。心里感到亏欠了那些老实人，真正可怜的人。不管不闹，越管闹得越凶。去年（2004）工作队支持力度大，闹得凶。今年力度小些，闹事也少些。啥办法？没办法。艾滋病人不敢惹，一弄捅到外国了。叫我们说，三天三夜说不完。

### **走访定点医院：“最基层的医生治疗最复杂的病症”**

在艾滋病高发区，县人民医院、中医院等主要医院都指定为艾滋病定点医院。省城最主要的治疗艾滋病的医院是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某县人民医院** 住院部的病房里和走廊上全是躺着坐着的艾滋病病人，其间还拥挤着照看病人的家属，来回走动查房输液的医生和护士。闹闹哄哄，空气混浊。一位 40 多岁母亲，守着艾滋病发病的儿子，病床上的儿子已经是皮包骨。母亲告诉我，她的儿子 27 岁，“在他十四五岁时，放暑假，替我到机砖厂干活，一个媳子（血头）领住孩子去卖血，一共 4 个孩子，两个验上了，两个没验上，我儿子验上了，卖血了。这个孩子一直在广州打工，长得又高又排场，老板很喜欢他，就在高尔夫球场工作，7 年都没回来。最近查出了艾滋病，回来了。”

邻床一对年轻的夫妇守着他们幼小的孩子，这一家 3 口都感染了艾滋病，孩子发病住院，医护人员正在给孩子输液。

**某县中医院** 这里病房也住得满满的，病房角落里堆放着锅碗瓢勺。一个女病人又黄又瘦，举着输液瓶追赶着我说：你一定给俺反映反映，俺叫王华，谢庄村 7 组村民。俺 3 个孩子都长得可排场，上学没学费。老三尿道结石，再不手术就晚了。俺两口都住院了，死了也没啥，小孩咋办？公爹叫王满粮，80 多岁了还管（向）我要钱嫖娼，政府咋也不管了不打击了？还光说发套……。王华全家 5 口人，夫妇两人和 3 个男孩。2004 年大普查，查出感染艾滋病，是 1994 年输血感染。她说，当时也想卖血，血管太细没卖成。后来生病输了血，想着不会有事，谁知道还是个艾滋病。

这家医院的一位医师说，基层医院条件太差，他很同情艾滋病人，但是医生也不易。他更同情村医，他们待遇更低，每个月才 200 块工资，除了春节回家一天，天天值班，没有安

全感。现在的村医，大多是些新毕业的学生，没处就业，只好去当村医……。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郑州第六人民医院是全省唯一的传染病医院，国家卫生部艾滋病临床专家组成员单位，卫生部临床培训基地，省艾滋病定点中心医院，也是河南省最早收治艾滋病人的定点医院。2005年夏季，我走访了六院艾滋病区的主任、医生、病人及家属。

艾滋病区赵主任，原医政科科长，2001年调艾滋病房任护士长，现在负责病区工作。赵主任说，六院领导很有眼光，从1999年底就开始关注艾滋病，当时省里还很忌讳艾滋病。院长们从报纸上看到关于曹韵贞教授、何大一教授艾滋病实验室的报道，意识到六院是全省唯一的传染病医院，要为艾滋病治疗提前作准备。2001年1月开办首期培训班；3月派大夫到北京地坛医院进修3个月；7月筹建艾滋病区，建门诊、病房、咨询电话，当时只有1个医生（何云，现调卫生厅医政处）、4个护士；9月接治病人，开始病人由省防疫站送来，后来病人自己找来了，就运作起来了。之后病人逐步增加。2002年是发病死亡高峰期，病人最多，门诊部每月收治病人100多人次，20多张病床，住十八九人，还有一些住在其他病区。1999年之前，河南的艾滋病人都是上北京治疗，本院也有很少数的艾滋病人分散在其他病区治疗，不明说。那时候少，一年有一两个，1999年以后就都收过来了。有个病人是某市干部，症状典型，肺部感染、口腔真菌。当时HIV检测是在省防疫站查，病号检测出HLV阳性之后，在半道上把标本扔掉，不送病房，不愿意暴露病情。之后规定检查结果直接送医院，防止流失。2001年开始使用抗病毒药物治疗，国外进口药，很贵，每人每月7000—8000元，1年需要10万元。2003年降到每月200—300元，付得起的还是少数。2003年国产药出来了，用者多了。2003年4月，免费在农村治疗，发病率开始下降，效果明显。这里病号减少了，最少的时候只有6—7人了。最近又多了，输血感染者、性感染者（配偶）出现，现在约有15人左右住院，农村转来的病重的、城市患者都有。农村疫区病人就地治疗免费，到六院治疗自费。光说自愿检测免费，但是费用无出处，试剂一次性损耗、人工费用，都从哪里出？只好收费。艾滋病科付出最多，待遇很低，没有专项拨款，人员工资、补贴、损耗、房屋设备折旧，全靠自己挣出来，如何才能稳定队伍？乡村医生更是任务多待遇低……。最后赵主任说，河南特点是大量病人在基层，“最基层的医生治疗最复杂的病症。”全省大批艾滋病病人在农村，灶状分布，高度分散。而专家集中在上头。六院负责基层医务人员的培训，每年办培训20多期，每期10人。

病区小丁医生，2002年7月新乡医大毕业，曾作为第一批驻村工作队员进驻文楼村。她说，上高中时就听说过文楼，当时只知道艾滋病很可怕，没有想到自己会接触。我接受组织分配，家里也支持，只是嘱咐“要小心。”第一天到艾滋病区时很害怕，不敢进病房，主

任讲了艾滋病知识，打消了顾虑。现在别人问我的工作也只说传染病，不敢说艾滋病。非典时期，别人都认为我“脏”，不敢接触我。其实并不那么可怕。我救治的一个孩子10多岁，感染了艾滋病，他妈跑了，跟父亲相依为命，住院治疗效果不错，是一个K市病人。工作队驻村，村里人原来不理解，唾我们。我入村时，局面已稳定，没有人身攻击（骂，动手），药费下降了。那里不是想象中那么可怕，村里病人也劳动，种地。

在这里（六院）艾滋病治疗全部自费，国家没有任何补贴。一般人均每天200元左右，一般一个疗程住15—60天。来到这里的艾滋病人都是重病号，或者是为了保密，怕别人知道。4、5、6月人最多，住院20人，门诊每天20人次。一般每天12—13人次。病区住院床位30张。农民在当地治疗免费，但是条件有限。国家有救助政策后，病人明显减少。这里住院氛围好，都是艾滋病人，没有歧视，心理关怀，互相理解。病人情绪，在乡里医院和在省城医院表现不同，来这里很恭顺，多数心态比较平和，接受病情。也有暴躁的，喊着要杀人的。那是在实行政策之前，2003年，一个人30多岁，病情恶化，肺部感染、头疼、老婆离婚了，住院10多天，好一些就回去了。其他没见过抱怨政府的。2005年有一个女病号，30多岁，文学专业，丈夫是教授，有一对双胞胎孩子，上小学四年级，优等生。她生孩子时输血，自己心下怀疑感染艾滋病，反复检测，别人说她“精神病”，最后真的在省防疫站查出来感染艾滋病，一出结果就住院了，轻度肺部感染。丈夫来她不叫坐她的床，日记上写：两人像放飞的风筝，突然远离了航线。她家里人很好，可能是安阳的。病人初来时不了解这个病，心理恐惧，要作好多工作。火车站、绿城广场都定期宣传，艾滋病日、创文明城市活动，利用各种机会，还有热线咨询电话。但是多数人还是不了解艾滋病。有个当医生的姐姐来看生病的妹妹，带着手套，离多远，之后还要洗手，再说也没用。（访谈笔记20050805）

病人家属张俊梅，女，50岁。商丘梁园区侯庄大队冷坑庄人，陪护儿子住院。小丁医生介绍她来见我，半天哭不出声，然后是号啕大哭，眼泪几乎是喷出来的。边哭边说：

我的一个16岁男孩，因为心脏病输血，感染艾滋病，心里啥味啊！成天不吃东西，吃不下，不敢让孩子知道，老的七八十了，也不敢让老的知道。想找医院理赔，法院不受理，俺两口急得都想跳楼。1995年3月，孩子六岁时输的血，在商丘专医院。2004年开始经常发烧，就是艾滋病发病了，当时不知道。现在16岁，去年中学毕业。2005年5月25号，在商丘三院看病，三天不退烧，下病危通知书。坐救护车到省人民医院，化验过来化验过去，查不出来毛病。医生问做过手术没，说做过心脏动脉手术。又问输过血没，说输过。后来化验说是有艾滋病。到省卫生厅去化验的，卫生厅说没你们的名字，不免费，化验费花了500多元。后来到六院住院。姥姥从商丘家里掂着馍来看他，亲戚来看都不在这里吃饭，怕我们

花钱。住了半个月花了1万多，承受不了，又回到当地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基层医院不行，只好又到郑州，又一星期了，花了4000多块。商丘说是3个艾滋病定点医院，市第一、第三人民医院和中州医院。实际上只让住中州医院，从前的郊区医院，很远，来回车费20元。荒草湖坡的，只有个铁皮顶的房，是从前非典病时的简易病房，没用没人打扫，俺是第一病人。没药，最好的就是先锋。医院说，就这还是献爱心呢！说115种药免费，但是没有经费进药，卫生局没拨给一分钱。输氧的设备也没有，小孩昏过去，一个破氧气瓶拉过来，不能用。天气很热，铁皮房里只有个风扇还是坏的。孩子受不了。住六院收费很高，一天最少三四百元：住院费28元，护理费20元，卫生间消毒一次10元，空调费一天10元，扎一针10元，换针2元，还不说药费钱……。现在没钱了，也不打针了，16个小时还得押4000块，现在还欠800多。想出院了，一天几百元，住在这也没啥意义了。

花了几万块，查出个艾滋病。想找他们打官司。到当地医院找证据，就说是上北京作心脏病检查去，把当时看病材料复印了一份，又复印了当时输血的单子，交给法院。朱院长说，中级法院通知说不受理。又找中级法院，中级法院的立案庭庭长说周二是院长接待日，你找院长吧。田副院长是个女的，她说省里口头通知，输血感染的艾滋病案件不受理。卫生局医政科王科长说，找医院协调解决，我们只能协调。医院寇科长说，血是从血站拿的，到血站说去。血站的孙副站长说，这单子是1995年的，我们1997年才成立。医院又说是地区防疫站送的血，查不出卖血者是谁。说查不出还好哩，要是查到卖血人无此病，你们就是诬告！商丘专医院院长是市人大委员，当年就是他参加做手术。开始态度还好，怕我们告他。后来说，告去吧，想去哪告去哪告，只要能打赢，该包（赔）多少包多少！他现在知道法院不受理，我们没法了。还到哪去找啊？都把几道门，根本都找不着人。也找过卫生厅。卫生厅工作人员说，只要有钱，这官司能打赢。我要有钱，我都不打官司了！现在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算啥了，说是农民没有土地，说是市民没有工作。队里的地都卖了，换了个城镇户口，分了几千块花完了，自己找着个杂活干干，成了无业游民了，哪有钱呢？

第二天在病房看到了张俊梅的儿子，瘦瘦小小一个男孩躺在床上，很乖，看上去根本没有16岁。守在床边的是张俊梅的妹妹。她怕孩子听到我们的谈话，拉着我到病房外的小路上悄声说，姐姐回家借钱去了，她们想到北京上访。梁园区卫生局下了处理意见：医院没有责任。说输血是正常手续，无违规操作。当时没有规定检测艾滋病，不怨医院，有文件。如果去找街道办事处解决，可以解决些困难补助，每月给40元。家离办事处只有200米，怕人知道、怕歧视，所以没找。钱给得也少，如果只活三两个月，还让人知道了，划不来。也找过信访局。他们说找市长签字，再找卫生局，孩子就近上学免费。孩子还咋能上学？我姐

体重原来 150 斤，现在剩 100 斤，跪下哭着求医院。现在实在没有法了，除了上北京。“报纸上登过，有官司打赢赔偿的……。”这时候，报纸上黑龙江省北安建设农场感染艾滋病民事赔偿案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 **高法民事审判庭口头通知，输血感染的艾滋病案件不予受理**

我走访了业内律师，了解到：高法民事审判庭口头通知，因输血造成艾滋病感染要求赔偿的案件，已经立案的调解解决，调解不成的中止审理，没有立案的不再立案。“不可能有书面文件，因为与法规相抵触。”

不怕人上访上北京告状？

不怕，这是政府行为，政府与法院联手行动。

怎么会这样？什么时候的事？那百姓怎么办？

就是最近一个月的事（2005 年 6 月或者 7 月）。没办法。咋办？不好办。

这位律师说，他正接手一个这样的案子，调解解决，调解结果，医院退回 2000 多元手术费，患者当然不接受，就中止。“说是一揽子由政府专门机构解决，省政府决心很大，出面承担费用。”

于是我又走访了民政厅、信访办等相关部门，没有人知道“一揽子解决”这回事，找不到谁是一揽子解决的“政府专门机构”。（田野手记 20050812）

## **五 黑龙江省北安建设农场艾滋病民事赔偿案**

这场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艾滋病案件终于以受害人满意的结果结案。而更令人关注发人深省的是这一案件审理的过程和案件背后所发生的故事。

### **黑龙江输血感染艾滋案受害人获逾千万元赔偿**

黑龙江省北安建设农场职工医院输血导致 16 人感染艾滋病民事赔偿案，在开庭近一年后以逾千万元赔偿条件和解。2005 年 6 月，北安建设农场职工医院非法采供血案刑事审判在北安农垦法院审结，法院判决涉案的医院院长、副院长、门诊部检验室负责人构成非法采集、供应血液罪，分别判处 3 人有期徒刑 2 年、5 年和 10 年并处以相应的罚金。

具有华西医科大学医学本科、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研究生学历、副主任医师职称的山西龙盛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周斌亲自援助 16 名艾滋病感染者。周律师介绍说，黑龙江农垦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本案后，法院和代理人在当事人间大力斡旋，终以逾千万元的赔偿条件达成当事人自行和解：每一受害人从被感染时起算，每月获得 3000 元的各项补偿费用，并将终身给付，另外每人还将获得 10 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初步测算，责任方需支付的前期赔偿

费用达 400 余万元；日后定期支付费用累计将超过千万元。

### **刑事审判北安农垦法院宣布开庭，民事赔偿立案黑龙江高院受阻**

2004 年底，被感染的 16 个人找到山西律师周斌，请求代理受害人讨公道。

2005 年 5 月份，周斌律师率队第一次北上。5 月 10 日，在哈尔滨，代理受害人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 3000 多万的赔偿诉讼，但并未被受理。

6 月 11 日，周斌律师一行二次北上，再赴黑龙江北安，代理非法采供血感染艾滋病受害人参与本案刑事诉讼活动。

6 月 14 日 8 时 30 分，黑龙江省北安建设农场职工医院非法采供血案刑事审判在北安农垦法院宣布开庭。合议庭由主管院长为审判长组成。公诉机关是北安农垦区人民检察院，其主管检察长出庭主控。被公诉机关指控犯罪的被告人分别是：王军，长期担任建设农场卫生科科长兼职工医院院长，案发时已退休；李志勇，长期担任建设农场职工医院副院长，案发时已继任院长；杨旭，长期担任建设农场职工医院门诊部主任兼检验室负责人。公诉机关的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军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施行后，明知本单位不具备检测艾滋病病毒抗体的条件却采集、供应血液，致使多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和一人死亡，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非法采集、供应血液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涉及此案的建设农场职工医院的 3 名相关医务人员因非法采集、供应血液罪分别被判处 2 年、5 年和 10 年有期徒刑，并被处以罚金。

此次刑事审判开庭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各方人士云集北安争相参加旁听，农垦法院审判大庭座无虚席。案中艾滋病感染受害人，除病重住院治疗者外，多数都与他们的亲人一起到庭旁听了庭审全过程。庭审持续了一整天时间并进行了全程实况录像。6 月 15 日，周斌律师一行又赶赴哈尔滨，到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本案受害人的民事赔偿诉讼问题进行交涉。相应窗口无人接待，经电话联系到一位负责农垦方面具体立案工作的薛法官，他答复说此案已经请示领导，要求回农垦中院立案。当被问及原因时，法官显然不愿意正面回答，只是说肯定不能在高院一审立案。有人推断，黑龙江省高院的有关部门想把这起在国内具有重大影响的医疗诉讼第一案，控制在省内的范围解决，更有可能是希望在农垦系统内部解决掉。

对此，周斌律师表示，黑龙江省北安建设农场职工医院非法采供血导致 19 人感染艾滋病的严重后果，不仅在省内就是全国也是具有重大影响的医疗诉讼大案，完全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条由高级人民法院一审立案审理的法定条件，黑龙江省高院不予立案一是没有道理，二是没有依法。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收到起

诉状后经审查认为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在 7 日内裁定不予受理，原告对裁定不服可以提起上诉。黑龙江省高院既不受理又不裁定，严重损害了受害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周斌律师表示坚决不能退让，并准备必要时向全社会公开本案例对此问题进行讨论。

随后，此案在黑龙江北安农垦中院立案。就此，一场由于医院非法采血导致至少 19 人感染艾滋病的案件，转换成为了一场农垦人内部的官司，农垦职工状告农垦医院，向农场索赔，要由农场所领导下的农场法院来审判。（参考 2005 年 11 月 30 日公益时报记者 赵冠军）

### 了犹未了：“和解”，究竟谁埋单？

虽然 2005 年，16 名受害者（包括已故受害者杨某某家属）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黑龙江省建设农场职工医院、黑龙江省建设农场连带承担非法采供血致原告感染艾滋病及其他经血传播疾病的各项人身损害赔偿赔偿责任，总额约 3000 万元，但是，因为农场效益不好，对该官司的公正性，当事人均表示并不乐观：“对于官司的公正性我们无法把握，农垦法院的财政支出都是靠农垦局来支配的。作为农垦人，我们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保障，现在还是个未知数。”

现今“终以逾千万元的赔偿条件达成当事人自行和解……”。初步测算，责任方需支付的前期赔偿费用达 400 余万元；日后定期支付费用累计将超过千万元。”如此巨额赔偿，由一家小小的黑龙江省北安建设农场职工医院执行赔付，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那么，究竟由谁来埋单？这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建设农场的 19 名被感染者，全是由两个人供的血：“孙老四”夫妇。他们感染别人最早是在 1997 年，也就证明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成了艾滋病患者。据悉孙老四夫妇并不是仅在建设农场职工医院这一家医院卖血，他们跟附近的医院都有联系，甚至民间传言，建设农场职工感染艾滋病事件发生后，附近有部分医院都将相关病例予以销毁。而卖血者孙老四夫妇在 2004 年案发前的一个月内，已经相继去世，他们到底都在哪里卖过血，已经不可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信息了。那么，除了这 19 名感染者外，还有多少人被感染？

### 医院再也不敢收治危重病人：在以前，这样的病例我们完全能抢救过来

据说，在北安的 14 个农场里，并不富裕的建设农场的职工医院是其中医疗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的一家。这家一级甲等医院，副高职称的医生有两名，即先后担任院长的王军、李志勇。据北安建设农场医院现任院长周晓梅介绍，在别的职工医院只能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的时候，这家职工医院可以对一些危重外科、妇科病人进行手术。另外，相对于北安市级医院，这里的收费低，手术质量好，家属可以就近照顾病人，开销小。“比如做一个阑尾炎手

术，在大型医院至少要 4000 多元，在我们医院，500 到 600 元就可以了。”建设农场职工医院也因此曾被评为农垦系统的标兵单位。

做手术需要输血，在《献血法》颁布之前，建设农场职工医院采取的是号召全场领导干部职工无偿献血以确保患者安全。根据王军的笔录，“医院有个传统，凡是来的危急病人，需要输入血液的，就由单位领导集合人，统一拉到场部医院，给病人献血，或其家属为病人输血。这成为不成文的惯例。”到了王军之后的李志勇时期，“失血性休克和大出血的病人，严重外伤病人需要输血的，由家属自己寻找献血人。有的家属相互间不愿意献血的，就找朋友，花点钱或者送点礼。”在这种情况下，孙景玉和黄秀英，以及另一名经常献血的农场职工成了相对固定的血源。

北安建设农场离市区有 180 多公里，除了 2000 年后修的一条 40 多公里的柏油路，剩下的都是沙石路面，“一到夏天下了雨，烂泥满地，农场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进不来。”交通的落后导致了信息闭塞，“没有接到《献血法》和《黑龙江省献血条例》，我是 1999 年在《健康报》上看到实施办法的。1998 年李院长参加农垦总局举办的院长学习班后回来说，新的《献血法》即将出台，医疗机构不准私自采血。”王军的笔录上这么记载，“后来抢救病人，给(北安)血站打电话，他们离农场有 30 公里，走到一半实在送不进来，让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医院的 3 名化验员有 2 名没有参加过培训，其中一名叫王岫凌的化验员说，“2004 年 7 月和王丽芬去北安采血站开会，才知道《献血法》和《献血条例》。那天车晚点，会没开上，领回了一堆笔记本。”

因此，职工医院输血前检验科要做的工作就是“根据临床医生化验单，检测患者血型，供血者血型，受血者与供血者之间进行主副交叉配血试验。”1998 年，医院要求每次采血必须填写一个北安农垦分局卫生科下发的输血协议书，医患双方签字，到 2004 年，手续变为“三单一书”，三单为“输血记录单、临床输血申请单、输血不良反应回报单”，一书为“输血治疗同意书”。

王军在接受调查时把此次事故归咎于：技术水平有限，检验设备不全，不清楚《献血法》有关采、供血的操作规定。“当时认为黑龙江没有艾滋病，所以就忽略了。”说这话的他十分懊恼。医院不少人在对艾滋病的认识上，存在着与王军同样的误区。周晓梅说：“以前一直以为艾滋病主要在南方城市有。像我们农场到现在连个商场都没有，更别提歌厅舞厅和酒吧，唯一的招待所曾经有个洗浴中心还因为没有顾客而关闭了。而且，我们这里特别传统，要是今天搞个舞会，第二天准没人去。农场并不大，职工之间都认识，你要和同一个异性连续跳两天舞，马上就有风言风语的。上哪儿得艾滋病呢？”



输血感染事件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医院再也不敢收治危重病人。一是需要开刀做手术的危重病人必然要输血，农场居民点分散，最远居住点离农场医院有 70 里地，病人送到医院后需要马上手术，但距医院最近的血站——1998 年后设的通北血站也有 35 公里，来回需要一个多小时，病人等不了。而且血一经送出，必须在一个月内使用，因此，血站存量有限，像通北血站每种血型最多储存 400 毫升。二是即使能解决血的供应，医院能做外科手术的两位医生都已经被判刑，医院在事实上已经无法提供此类医疗服务。周晓梅说，“就在一审判决后，居住在 8 队六里庄的治安员杨占的儿子因翻车事故导致肝脾破裂送到职工医院，医院只能采取止血措施，同时做好转院准备。当晚 23 点，还没来得及转院，这个 18 岁即将参军的孩子停止了呼吸。在以前，这样的病例我们完全能抢救过来。”

### **被告方律师：和解而非判决的方式使这一案件并不具备法律上的标本意义**

2005 年 6 月，北安农垦法院以非法采集供应血液罪分别判处原职工医院院长王军、李志勇、杨旭有期徒刑 2 年、5 年和 10 年。2006 年 12 月 4 日，这起因输血导致多人感染艾滋病的民事赔偿案，在开庭近一年后以逾千万元赔偿条件达成和解。赔偿金额是惊人的，也是独一无二的。但是，被告代理律师黑龙江省孟繁旭律师事务所詹志坚认为，和解而非判决的方式使这一案件并不具备法律上的标本意义。这一观点同样得到了原告律师周斌的认同。

据建设农场办公室杨主任介绍，建设农场人均低保为 120 元，即使在哈尔滨，也只有 200 多元，因此，每月 3000 元的各项补偿费用已经非常高了。周斌说，和解的时候确定赔偿金额的依据主要是《民法通则》第 119 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如果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达不到这个金额。和以往《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做出判决的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官司相比，詹志坚认为，答辩人有义务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义务依照《民法通则》第 119 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原告承担民事责任。詹志坚说，由于答辩人是在对原告人进行医疗活动中因过失而造成了原告的人身损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第一条，“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的解释，本案的基本事实是答辩人是在对原告进行医疗活动中由于过失造成了原告的人身损害的结果，因此，依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之规定，属于医疗事故范畴，应当依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进行赔偿，不应当按照《民法通则》进行赔偿。另外，对于间接感染艾滋病毒的原告也应当比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赔偿，因为，发生艾滋病病

毒的直接原因是在医疗活动中输血所致。而如果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伤残生活补助金及抚养人生活费均根据伤残等级计算，原告没有鉴定是否构成伤残以及构成伤残具体的等级，所以其请求给付伤残赔偿金及抚养人生活费的诉讼请求应当依法驳回。

对于原告方以人身损害为由向农场职工医院提起的民事诉讼，詹志坚认为缺乏法律依据：“答辩人由于非法采集、供应血液之罪过，原任院长、检验科长已经被处以刑罚。按照《刑事诉讼法》第 77 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之规定，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给受害人造成物质损失的，被害人有权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损害赔偿之诉，但不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也不得在刑事诉讼案件审结之后再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之规定。”

此外，詹志坚认为原告以建设农场疏于管理为由，请求农场对其职工医院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因为作为企业中的事业单位，黑龙江省建设农场职工医院是事业法人，应依法独立地承担民事责任。周晓梅说，“农垦中院一直在做工作，说高院不同意判，希望我们能和解。”而职工医院的财政来源小部分是农场补贴，剩下的经费主要靠医疗服务性收费和药品差价解决。“职工医院服务的群体以农场职工为主，仅能做到收支平衡。”农场方面出于“不影响社会安定”的大局考虑，成为职工医院高额赔偿债务事实上的承担者。从詹志坚的角度来看，他宁愿法院依法做出判决，“真正判的话，不可能赔偿这么多。”因此，对于农场方面最终同意和解他并不认可。（资料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 **深层背景：事件背后的另一面，“血鬼”？**

农场 19 名艾滋病毒感染者，感染源无一例外均指向献血者孙景玉（孙老四）夫妇。当时媒体称他们为“血鬼。”孙氏夫妇常年靠卖血为生，案发时已相继病发身故。在开庭审判北安建设农场职工医院非法采供血案的一年前，2004 年 8 月 31 日，42 岁的孙景玉死在回家路上。当他在黑龙江省通北站上了绥化到齐齐哈尔的 6274 次列车，挣扎着度过 4 个小时的旅程到达克山火车站时，再也没有力气走完剩下路程。3 年前，他妻子黄秀英已经死在老家辽阳，死因不详。孙景玉夫妇的死引起人们注意是在一个月后。2004 年 9 月，黑龙江省北安建设农场职工小杨被省疾控中心确诊为艾滋病，随后查出他们夫妇是感染源。

事隔两年，铁路值班民警依然能清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当时的孙景玉，“面色铁青，眼窝深陷，枯瘦如柴，一身臊哄哄的”，“搀他下车的时候，他身子直往下坠。”72 岁的梁淑清一直陪在孙景玉身边，她是孙景玉在北安建设农场认的干妈，也是他的房东。“他有病，让我送他上克山他大哥家瞧病。”6274 次列车是一趟慢车，孙景玉买的是通北到克山的票，8 元钱一张。“下车后，他就坐地上了，围过来很多人看。我喊他，他也不起来，然

后过来几个人一看，说他已经死了。”梁淑清说她当时“一把扯下孙景玉身上的烟色夹克，蒙在他头上。”

北安农垦公安分局负责调查孙景玉在齐齐哈尔地区的情况，据他们回忆，孙景玉的大哥已经去世，他和其他亲属之间基本上没有往来。他的亲属所能提供的唯一信息就是1995年左右他曾在北兴镇富裕砖场打过工，一年后砖场倒闭，他就离开了克山。在知情人的描述中，孙景玉“1.7米左右个头，身体很结实，200多斤的麻袋胳膊一搂就走，右眼有点斜视，长得挺惨的。但能说会道，有点吹拉弹唱的歪才，所以很能博得女性的欢心。”

据公安部门的调查，孙景玉和黄秀英是在外省市献血结识的。相识时候，孙景玉离过一次婚，有一个3岁的孩子孙林(化名)，前妻是山东人。黄秀英当时也有一个读初中的女儿，叫郑波(化名)。严格说来，没有办理结婚手续的他们并不算夫妻，但据郑波说，“两人感情很好，我爸脾气不好，老打我妈。孙景玉对我妈挺好。”黄秀英是辽阳人，“1.63米的身高，很胖”，曾是辽阳精编厂的职工，第一个丈夫叫郑士力。在女儿郑波的记忆里，父亲是做基建工程的，现在辽阳白塔公园后的房子就是父亲承包盖的。“小时候家境很好。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家里就已经有电视机、洗衣机和冰箱了。父亲给别人盖房子的时候，我就在前面自己荡秋千玩。”1985年，郑士力的工程出了事故，从银行借的贷款无力偿还，夫妻俩选择了逃避。黄秀英将7岁的女儿寄养在母亲家，和丈夫出去打工。中间曾回过家看女儿，黄秀英的母亲王庆云问女儿在外面干什么，黄秀英回答说是做买卖。王庆云很疑惑，女儿没有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什么买卖？河南，是王庆云唯一听女儿说起过的地方。黄秀英去世那年，王庆云的疑惑有了并不确定的答案。从精编厂女儿前同事的嘴里，她听说女儿以前在外卖血，时间可以追溯到跟郑士力一起出外打工的时候。根据郑波回忆，母亲和父亲还去过青岛，后来回了辽阳，在家呆了一年后，两人又出去打工了。1993年郑波上高一，父亲一个人回来了，留在老家做小买卖。他告诉郑波，“你妈跟别人走了。”两年后，黄秀英一个人回到辽阳，郑波这才知道，母亲已经在黑龙江和一个叫孙景玉的人生活在一起。

孙景玉和黄秀英在北安建设农场安家。这里离孙景玉的老家克山大约250公里路程。孙景玉曾带黄秀英回了趟老家，“特意带着黄秀英在街上晃，晃了几天，显示自己有本事，在外面打工挣了钱还带回一个老婆。”将家安在建设农场或许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原因：这里挣钱的机会更多。北安建设农场有58.6万亩地，每年6月和10月农忙时候，一些地多的人家需要雇人干活，按天数给钱，依据市场行情定价。另外，农场也经常有拉沙石、养马等活要雇人干。农场有自己的职工医院，遇到危重病人需要输血动手术的，孙景玉和黄秀英可以额外挣一笔钱。职工医院有据可查的输血记录显示，1997年是这对夫妻拿着写有孙岩和王英

名字的献血证和健康证在这家医院卖血的开始，也是两人卖血次数最多的一年，黄秀英曾 4 次卖血，仅 4 月份的 8 天时间，3 次卖血给同一个人，总计 1200 毫升。农场的 4 名职工，在这一年因为输了她的血感染了艾滋病。也就是在 1997 年，郑波考上了辽宁师范大学，黄秀英给女儿寄去了 4000 元钱。她告诉女儿，“农场有地，可以干活，家里还养了猪。”

这个家庭的变故发生在 1999 年。“那一年，我妈自己回来探亲。呆了没几天，瘦了很多，还掉头发。”2001 年春节前，黄秀英又回了辽阳。在家打了 20 天左右的点滴，之后就回东北准备过年。到了正月，黄秀英病重，打电话回家让家里人接她回去。“从辽阳打车回到刘家沟口，我给付的车钱。下车后扶进屋的，都不能走了。”之后，黄秀英先后在辽阳中心医院、辽化医院、峨嵋疗养院看病，一直没有确诊。郑波说，为了给母亲治病，孙景玉将农场的住房卖了，自己也花了 3 万多元钱。2001 年 4 月份，孙景玉带着儿子孙林来到辽阳，一边照顾黄秀英，一边在沟帮子蹬三轮车为生，打算和黄秀英在这里常住。7 月 3 日，黄秀英去世，死因不明。也是在同一年冬天，郑士力去世，两人症状极其相似，“咳嗽，吐痰，下午总是脸红发烧，四肢无力，肺里有影。”让人震惊的是，即使在发病的 1999 年和 2000 年，黄秀英在建设农场职工医院还先后输了 400 毫升血给 17 岁的陈某和做剖宫产手术的孔某。黄秀英去世 3 个月后，孙景玉回到了农场，依然在医院有需要的时候充当血源。

（2006-12-14 15:57:00 记者李翊 新浪网独家稿件）

故事讲到这里，“源头”指向竟然又是河南。被称作“血鬼”的孙景玉、黄秀英，应当还包括郑士力，他们都曾经在河南卖血，他们是比黑龙江北安建设农场的职工们更为“底层”的人。通过这些对他们无法详尽的不多的描述，我们看到了他们挣扎在社会底边的更为悲惨的人生命运。他们为什么要去卖血？他们什么时候感染了艾滋病？是谁感染了他们？谁来替他们伸张正义讨还公道？他们都已经死去，死得非常痛苦，而且至死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死去。如果不是这场官司，没有人会关注到他们的生死，甚至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还有多少个孙景玉、黄秀英们在无知中死去？还有多少个没有死去的孙景玉、黄秀英在充当“血鬼”？

## 第五章 故事背后的故事：被“嵌住”的

我是慢慢被“嵌住”的，或者说，我是慢慢才意识到我是被“嵌住”的。而谁又是不被“嵌住”的呢？

## 一 进入疫区

做社会田野调查，进入调查现场是关键。我进入河南农村艾滋病疫情高发区现场经历了“三步曲”：第一步，参加河南省社科院“河南省艾滋病防治与帮扶工作研究”课题调研，进行有组织的自上而下的走马观花式的“面”调查；第二步，单独返身回访调查地，直插艾滋病村庄，在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取得个人调查研究的独立自主权和“合法性”；第三步，开展详尽的实地调查：逐村走去切近观察，驻足重点调查村，开展“点”的个案研究，再由“点”及“面”、“点面结合”进行全面综合考量。

### 第一步：集体受命

根据省委副书记陈全国同志和副省长王菊梅同志等领导的指示精神，我院拟集中精干力量，组成由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学科专家参加的课题组，对我省的艾滋病防治和帮扶工作进行跨学科、多纬度、多层面的专题性综合研究。

——2004年9月16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省社会科学院关于进行我省艾滋病防治与帮扶工作课题研究的报告》

2004年9月，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召开动员大会，号召院里年轻人报名参加艾滋病课题组调研。我不年轻，但是立即到科研处报名要求参加。当时河南艾滋病问题，在我内心已经纠缠很久，我认为这不仅是一项我们学科领域应当关注的非常有意义的选题，而且，还是一项国家急需研究的应用对策性课题。最重要的是，我感到作为河南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应当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的大事件有所认知有所作为，这当是我们的本分。但艾滋病是敏感的课题，几经尝试无法切入。这次院里成立课题组，给了我进入现场的机会。

课题组调研活动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在省会郑州调研。与省直有关部门举行座谈会，其中包括与省委艾滋病帮扶领导小组、驻村工作队、省卫生厅、民政厅等的座谈。第二阶段，赴有关市县调研。其中包括对驻马店、周口、商丘三市及其所辖重点县、乡、村的调研。同时强调纪律：严格按照省委、省政府的有关要求，在院党委的直接领导下行动，严格遵守保密纪律，有关情况不得外传，任何人不得私自接受媒体采访，不得擅自发表相关研究成果。

课题组基本按照计划开展调研工作。10月12日在省委9楼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座谈会，听取省委艾滋病帮扶领导组的疫情介绍与工作安排。有点类似“通气会”“打招呼会”和“定调子会”。明确课题组任务：按照9月省委省政府布置，全面反映河南省在艾滋病防治帮扶

工作中的成绩，系统总结省委省政府艾滋病救助工作的经验，澄清社会传言，在对以往工作成绩经验做总结的同时进行理论分析，以政府的名义，权威的说法，在国际社会以正视听挽回影响。会议强调：过去因为有法律规定，艾滋病是机密，已经做过的大量工作主渠道没有反映出来，正面宣传不够，而一些媒体进行阴暗面宣传，使政府处于尴尬被动地位。这次专门请了凤凰卫视刘长乐来报道，“各级领导汇报情况，陈全国书记陪同进艾滋病村采访，当天晚上就上电视报道，称赞河南省委省政府在艾滋病问题上表现出了非凡勇气，说过去对河南的报道是片面的。”之后，课题组召开了省直相关部门、驻村工作队以及市县乡各级座谈会。各部门各地方的汇报发言基本沿着疫情、救助、成绩、经验的程式，条理清楚层次分明，基调是“弘扬主旋律”。

第二阶段的市县调研一路顺风。当时艾滋病帮扶工作是全省各项工作中放在第一位的头等大事，从省里到乡里，层层设立了“艾滋病帮扶领导小组”，各级党委一把手亲自担任组长，专门分管艾滋病工作的副书记负责接待课题组调研，皆一路绿灯。特别是在各地市基层，课题组所到之处，都受到隆重接待。在一次接待宴席上，一位分管艾滋病工作的市委副书记给课题组敬酒：“上边到下边来，就是喝喝酒玩玩，地方特色食品尝尝，放松放松。调研事儿好办，把材料收齐交给你们。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们服好务，现在的任务就是请大家喝好！”——言简意赅，道出当下一般流行的调研定式，说者坦然，闻者欣然，大家哈哈一笑，举杯共饮。

从10月到11月，将近2个月时间，调查组如此这般一路下来：根据既定目标召开座谈会听取汇报，实地考察了解疫情以及相关救助政策，也进到艾滋病村庄接触了感染者，在村卫生室见到了正在接受治疗的艾滋病人，参观阳光家园看到了被救助的艾滋孤儿。但终究还是隔了一层，像是雾里看花花不清。倒是在正式会议之外的非正式场合人们聊天，那些座谈会上言犹未尽者谈论疫区的具体情境，留给我挥之不去的深刻印象——

一位驻村工作队员说，开封尉氏那里，卖血盖房子，房盖好了，人死了，有的都死绝了。在一个村里见到这样三户：一户三间瓦房一个院，院里长着窜天杨，大门封了，说没人了绝户了。还有一户，只剩一个人了，条几上放着4张遗像。第三家光剩一老一小。

一位上蔡县的乡党委书记说，过去村村卖血，没用药（用药，指国家救治措施）时，热天加快死亡，有一年全乡一季死70多人，有一个村死12人，没人埋。旁边另一位基层卫生官员说，冬季寒冷更容易发病，集中发病死亡更多。

驻马店市委组织部帮扶办一位科长告诉我，艾滋病感染潜伏期8—10年，现在都已经到了死亡高峰期，“底下真都急眼了，去年（2003）真有大乱的架势，艾滋病人成群结队上访

闹事，堵国道高速公路，不采取措施真要出大事哩！”

……

回到院里课题组开会，院领导鼓励大家要深入艾滋病村庄进行典型调查，这正是我希望的。我希望尽快进入现场，具体感知疫情真实情况。

## 第二步：单独行动

许多年来，田野调查是我主要的研究方法，以至我离开了田野就完全失去方向失去主张；同时，多年的田野工作也使我对自己有一份信心和把握：只要能够走进现场，就一定会扎下根深入进去。院课题组集体调查结束后，我立即单独返回现场。参加院课题组调研，最实际的收获是与当地相关部门和个人建立了联系，为真正进入现场创造了条件。我根据已经掌握的相关部门和个人的联系方法，“按图索骥”，进入疫区实地调查走访了十几个村庄。最终驻足后来成为我的重点调查村的银庄，在那里度过了整个春节假期。春节是中国民间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外出的人都回家过年与亲人团聚，比平素更多的“各种关系”都呈现出来。银庄外出打工的人——其中不少是辍学的孩子，也回家来了。他们很多人失去了亲人，他们回来给死去的亲人上坟，或是守候在生命垂危的父母身边。走在村中泥泞的道路上，两边满眼是贴在门上的紫色或蓝色、绿色的对联<sup>①</sup>，有些没有粘牢，在寒风中飘荡，那情景真的是很凄惨。春节前夕，连着两天我走在送葬的队伍里，耳边哭声令人震撼……。尽管我已经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现实情况比预想的还要严重令人心痛心惊，许多情境不是亲眼目睹难以想象。那些疫情严重的村庄，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艾滋病人。来自各个方面的信息还表明，经血传播艾滋病还不仅限于河南，还有河北、安徽、湖北、四川、山东、山西等等省份，情况都不容乐观。就在当时，中国发现艾滋病 20 年、河南发生血液传播艾滋病毒引发疫情大规模爆发 10 多年之后的公元 2005 年，就在紧邻河南边界的某省地界，人们仍在偷偷买血卖血，从夜里 12 点到清晨 6 点，卖血的人群排着长队。我真不敢相信，事已至此，还会有人如此这般不知死活。但是告知我消息的人拿出了现场拍摄的照片：在“采血者请上二楼”的牌子前，排队卖血的人争先恐后，拥挤的队伍里后边人抱着前边人的腰，不由你不相信！令人担忧的还有社会治安。在一些艾滋病重灾区，拦路抢劫敲诈勒索已经成为某些人的日常工作“生活方式”；驻村工作队担心的是一些处于死亡边缘的艾滋病患者极度绝望心理扭曲变态，疯狂报复社会的极端失控行为，已经直接威胁着他人的生活生命安全；一些乡镇派出所档案记录表明，艾滋病人恶意伤人自杀杀人的恶性案件已见怪不怪。公安部门担心，有朝一日黑社会与艾滋病联手（事实上已见端倪）后果更加不堪设想。

<sup>①</sup> 当地风俗，丧事三年之内不能贴红色对联，只能贴紫色、绿色或蓝色对联。

很显然，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已经不单单是对艾滋病人群的生命生活救治救助了。情况真的很严重太严重了，但是当时，无论官方还是民众，对这种严重性都缺乏应有的认知和危机感。而我知道，仅我一己的所见所闻，才是最为“显见显知”的现象，更多更复杂的“潜隐潜在”的现象还未在我面前展现，艾滋病这场灾难所导致的更广泛更深层意义上的“社会报复”，人们早早晚晚还必将面对与承受。我更想知道的是，这一切现象背后的更深层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它对于我们，对于我们的国家和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深感这不仅是一项我们学科领域应当关注的非常有意义的选题，而且，还的确是一项当前国家急需研究的应用对策性课题。

我决定申请国家课题。当时我已经置身的田野现场令我激动，职业本能使我意识到我正面临一个大课题。我几乎没有耐心去写课题论证申请报告，只想直接进入课题研究。同时也非常明白自己的处境——实际上，我当时所有的调研行动都是在半秘密状态下进行，我非常小心谨慎。因此深知课题立项至关紧要意义重大——我只能以此解决调研所急需的经费，还要以“国家课题”的名义为自己“正名”，取得法理的依据以减少阻力和压力，争取相对独立自由的研究空间。但是，申请国家课题谈何容易？申请书写好后，我想了想，动手给我所知道的可能会参加评审的师友发邮件，开门见山请求帮助：冒昧致信请求援手。这是直接来自疫情高发区的研究课题，我非常珍惜进入调查现场的机会，着手写这项论证报告的前一天我还在艾滋病村里。我说：都说申请课题需要跑，时间很紧，我写信给您，就算“跑”您了。深深鞠躬致谢……。附件寄上课题论证。很幸运，国家课题获准立项。感谢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各位评委，他们是我的贵人。从此我作为国家课题的负责人，开始了名正言顺的河南艾滋病田野调查，虽然并非一帆风顺。

### **第三步：“嵌入”调查地**

我原本计划首先细访省市有关部门，取得大面上的资料和有关方面必要的理解支持，然后再做最基层的现场调查。于是，得到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的立项通知书，我立即到院办开具介绍信，走访相关部门。当然从最高领导机构“河南省艾滋病帮扶工作领导小组委员会”开始——这是河南省委省政府为开展艾滋病帮扶救助工作而设立的专门领导机构，一是报到，希望得到理解支持，也是对一级政府领导的尊重；二是获得最高层最权威相关信息资料，对全省整个艾滋病状况有一个总体把握，使课题研究对省里的艾滋病防治工作真的有些实际促进的作用。先打电话联系省委艾滋病帮扶办公室，说明意图。办公室说这事找指导督查室。指导督查室说找材料组。材料组说他们没材料，也拒绝访谈。说：“我们的任务，只在上级领导来时负责接待一下。你找宣传部、卫生厅吧。”最后大约是不耐烦了，电话里说：“接个电



话，你等一下。”电话挂断了。之后，我电话又打过去，再也无人接听。一上午时间就这样过去了。院科研处长说：“你这课题调查不好搞。你又不是不知道，当时院里课题组调研，省委交办，咱们院长出面，陈全国书记批字，组织部领着，还不行哩！何况你个人。”事情一开始，我便发现自己的处境非常困难，研究工作阻力重重压力很大。走访民政厅、卫生厅，事先预约往往遭拒绝，不预约或许能够抓到一些访谈机会。于是我不再事先预约，而是直接登门。但各相关处室谈话都很谨慎，正如我们的科研处长所说“这课题调查不好搞。”终于，我放弃了省级层面的调查，到了我可能去到的“次级”市县艾滋病疫区现场。

在各县市，之前曾经作为“省派调研组成员”的“亮相”，是我身份的证明，为我的调查提供了方便。有了在省里调查受阻的经验，在市县的调查，我尽可能利用同学朋友的“熟人”关系“公事公办”，以避免一些矛盾一些关隘，直接拜访需要访谈的部门和当事人，调研行动在“官私兼半”的状态下进行。除了集体调研已经去过的驻马店、周口、商丘，我还走访了开封、南阳、信阳一些疫区，这是官方报告中认定的疫情波及严重的河南省中南六市。我尽可能走到了我能够走到的地方，“绕场一遭”之后，最终驻足艾滋病村银庄，开始“嵌入式”重点调查。

我是带着锅碗瓢盆“搬家”到银庄的，为了不给当地添麻烦，也为了自己方便。置办了电磁炉、饭锅、炒锅、水壶、水桶、碗、勺、筷子等等一应炊具，一辆小面包车再装上米面油盐，在集镇上买了白菜萝卜，拉到银庄村室里安营扎寨。我知道，这不是一时半会三天五天的事。（照片 52）

也许是因为最初进入银庄时正值年末岁首的春节假期，无意间避开了拜会某些级层部门的麻烦，而乡村节日气氛也为培养“革命感情”创造了机会。2005年初冬，当我带着“国家课题”又一次来到银庄的时候，感到我已经被当作了“自己人”。当时第一批工作队已经撤离，第二批工作队还没有到来。B镇党委书记答应支持配合我的调查研究，还帮助安排落实食宿：“阳光家园的棉被抱两床，住原工作队住过的税所，吃饭在镇政府食堂。”税所李所长是个热情实在的人，说就在税所搭伙，“镇政府食堂水不行。”李所长说自己自幼父母双亡，吃百家饭长大，只读过小学三年，能有今天要感谢党的培养感谢地方百姓。他调查了几个村庄的艾滋病情，希望帮助写材料递上去，“为他们争取利益”……。

地方干部这么热情周到，令我十分感动，不止一次生出“天下无贼”之感叹。真的，都说官场腐败基层腐败，而这里“谁是贼？”贼在哪里？

凡经历过的人都会知道，真正进入一个艾滋病村庄并站住脚扎下根，在河南实在是太难了。我非常珍惜这次机会，低调低调再低调，尽量不引起注意几乎是悄无声息。我小心翼翼，

唯恐稍有不慎触动哪根神经我的研究就会被禁止中断。我真的很幸运，我真的很珍惜这次机会。我希望能够安安稳稳将研究课题深入进行下去。（田野手记 20051201）

## 二 从“天下无贼”到“转入地下”

### 失灵的“尚方宝剑”

10天之后的一个中午，我从银庄回到B镇的住处。镇党委书记的通讯员等在门口，说：书记请去哩，在镇政府等着。

正午，镇政府大院里很安静。冬日的太阳暖暖地照着，当院一张小桌，小桌上一碟水果，一个水瓶几只水杯，桌边坐着书记和镇长，他们在等我。坐定，寒暄之后，书记说，村里有什么事，刘教授天天往村里去？究竟是做什么课题？于是我又把“国家课题”的意图大略复述一遍。书记说，哦，是国家的课题，不是省里市里的任务。<sup>①</sup>镇长说：刘教授到底调查什么？你需要什么材料镇上都有。过去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都没有像刘教授这样天天下村的。我又赶紧解释，我是一个研究人员不是领导，这是我的工作方法，做社科研究不是检查工作，没有经常给你们汇报沟通是怕打扰你们。又说来到基层更能理解基层工作的难处，真不愿意再给你们添麻烦了，不用太在意我。这都是真心话。其实这些话一开始我就告诉过他们，一方面这的确是我的工作方式，另一方面也真的怕太打扰他们。镇长、书记对视一下，说：“看来刘教授境界还是很高的。”

于是气氛慢慢缓和下来，话题转到免收农业税后乡镇一级政府的难处。刘镇长说：现在乡镇工作真是困难重重，税费改革之前已欠巨额债务。B镇更特殊，前任靠拆借发放教师工资，实行工分制时候的债务，至今都没有还。全镇修“村村通”道路65公里，学校建设，全县实行义务教育，免去学生45元学杂费，35元书本费，这些都由上级财政承担。

接着镇长的话茬，我说，村里人都在问，别的村庄都在修“村村通”道路，为什么银庄不修？镇长说，他们艾滋病村“六个一工程”修了路，算是已经提前享受罢这项政策了。又略一沉吟，接着说，按说路还是该修<sup>②</sup>，可钱哩？……现在老百姓农业税免了，每亩地还补贴16元。这是贫困县待遇。但是乡镇财政困难得很。国家、省里对乡镇弥补部分就是转移支付，今年给B镇100万。以往农业税、农业附加税每亩收150元，加上各种税款提留等每亩平均摊到200元。就按150元计算，全镇6万亩土地也收入900万。100万与900万，差

<sup>①</sup> 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这句话的实际含义，而当时我并没有在意。它的含义有两层：第一这是一项研究课题而不是政治任务；第二这是“国家”的而不是“省市”的。而这两层含义对我的研究而言就是两层“阻隔”，一层是“学界”与“政界”的，一层是“国家”与“地方”的。“国家课题”的名义不仅不能起到“尚方宝剑”的作用，反倒使地方部门警觉警惕起来。

<sup>②</sup> “六个一工程”只修了村委会通往镇公路的道路，村之间并没有“村村通”。

距就这么大！一年那点经费，够干啥？100万元用于村干部工资，五保户供养，行政村办公经费。全镇38个行政村，平均每村5个村干部，将近200人。村干部工资，村支书、村主任每月150元，会计、组长每月100元，实在不高。还不如打工。一个建筑队掂泥兜的，一个月吃完喝完也至少能剩余200-300元。

书记说：基层问题太多了，没法捅开，你看到的不过冰山一角。就说艾滋病，只救助银庄，其他还有9个重点村，怎么办？还不说还有那么多散落的病人。现在艾滋病的救助资金大多用于设施装备，县防疫站、卫生局都坐丰田车。而乡镇政府部门没有丝毫待遇，政治待遇、经济待遇都没有体现。有时我们还得掏自己工资解决问题，为不被抓伤，自掏腰包把艾滋病人打发走。驻村工作队员来几个月回去就要作检测，我们长年在这里没人提。在基层工作，看到东西问题很多，但不能说。说出去影响政治前途，上级领导来了也只能说好的。

我说，你们最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上级来领导了只说好的不说困难和问题，上级走了不是还是自己为难？是否需要我写研究报告时把咱们这里的困难和问题一并提出来？书记连连摆手，说：千万不敢！刘教授要这样说，我们啥话都不能跟你讲了！

次日走访镇卫生院，院长出乎意料地冷淡。之前我们曾做过访谈，还在一桌喝过酒。现在竟然好像不认识了。说：任何人不能采访。“我这里有单位介绍信，还有项目立项通知书。”我只好再次跟这位院长说明我的目的，并出示“尚方宝剑”国家课题立项通知书和社科院介绍信。

院长说：谁的介绍信通知书也不行，国家课题更不行，必须有县委宣传部的介绍信，再经卫生局批准，这上头有指示。

问：什么时候的指示？

早啦，2002年就有。

现在不是有变化，一切公开透明？

没听说，没接到新指示。前两个月有记者来，也拒绝采访。无论国内国外新闻媒体，任何部门，都不允许采访。

至此我才意识到，并不仅仅是地方领导不习惯我的工作方法，而是接到了“上头指示”。我知道已经不宜久留，便做随时“撤离”的准备。

两天之后，一个周六。税所所长挺不好意思地说：下周一县局大检查，所里住外人不合适……。所长重情义好面子，话说得很婉转。我明白话里的意思，赶紧说，我出来太久了，天气也冷了，也该回去了。周日早上打点行装。上午到镇政府、镇党委、派出所一一辞别，“礼节路数走到”。镇政府、镇党委均未见人，周日休息，书记、镇长的家都在县城。也许

他们专门选择这个日子让我离开，可以避免彼此的尴尬。派出所长还在坚守岗位，他拿出一份《大河报》给我看，上面刊载一则 B 镇派出所破案消息，大意是派出所又建奇功，夜间巡逻偶遇可疑车辆，抓获 5 名蒙面人，避免了高庄炮厂谋杀案。所长叙说案情：派出所前几天夜里巡逻，“碰巧”遇到一辆外地可疑车辆，抓住了 5 个蒙面人。经审讯得知他们要对高庄炮厂老板行凶，供出背后雇凶杀人者是 B 镇女出租车司机王爱。雇凶杀人嫌疑人王爱在逃。所长说，都说可以报功了，避免了一场重大杀人案。

中午在税所小煤炉上吃最后一顿中餐。依然是“煤炉火锅”，火腿肠、大白菜、粉条，放在锅里一起煮，边吃边添菜，热乎便当。邀请刚从下面村庄收缴税款回来的税务员小王共餐，边吃边聊。小王说，B 镇没有空白村，村村都有艾滋病。怕艾滋病人吗？问他。小王说：怕！咋不怕？不接触。下乡收税款不给他们说话；他们来了，离得远点；夏天有蚊子，尽量避开点；冬天下去收线，手套不管抹，钱让他直接塞包里，不过手。为这，去年收了两张假钱。过去下去，叫吃饭就吃，现在不管了。今天村里有婚宴，专另设一桌待艾滋病人，吃罢餐具一兜扔了。

饭毕走人，当着镇上送行的人上了汽车。多日相处，都有些依依不舍，他们说：刘老师还来啊！

### **“地下工作”：零距离接触**

汽车开出镇外不久，路边加油站处，接应我的银庄村主任栗卫华已经等在那里。下汽车坐上卫华的摩托，调头返回。返回不走原路，而是绕道避开 B 镇，经过黄庄、中庭湖，进入银庄村。隐隐听到唢呐声，村里谁家再过“三周年”<sup>①</sup>。要是平常，我是一定会去看看艾滋病村庄是如何过三周年的，这种特殊时期的民间仪式，是难得的现场观察机会。但是现在，只能由卫华带领直奔栗可顶家，上房顶二楼。栗可顶已经等候在家里。卫华说：“这是村里一等一（最好的）的人家，一等一的房子。能给我说的话，都能给可顶大爷说。我平时遇事常跟他商量拿主意，他就像我一样可以信任。”说罢匆匆走掉，那边“三周年”的场面还等着这位村主任“支应”。

卫华事先跟我介绍过，栗可顶参加过军，当过城里工人，有知识有见识，在村里德高望重。卫华走后，栗可顶领我看他的家：楼下客厅、卧室、厨房和院落角上的厕所，二楼是我临时的住处。上下两层钢筋水泥结构的住房，的确是“一等一”。特别令我高兴的是有专门的厕所——村里一般户家，只在屋后或屋山边上一处空地“方便”，连个“坑”都没有，实在“不方便”。栗可顶一边领我参观一边自我介绍：今年 62 岁（1944 年出生）了，初中毕业，1965

<sup>①</sup> 当地风俗，人死后 3 年的祭祀活动，请亲友吃饭，请唢呐班。

年参军，1969年复员到地区化肥厂当操作员，1972年调Q县化肥厂，1975年调镇企业工作站，1976年单位破产，离职回乡，“换农业户口领地了”。平素家里只有他和老伴两人。他们只有一个儿子，在镇上开缝纫铺，儿子媳妇孙子孙女一家4口都住镇上。老两口住楼下，二楼是儿子媳妇的新房，他们只偶尔回来住住，现在是我的安身之处，铺盖都是新的。大约是怕我不放心，他说，刘老师尽管安心住下，俺家没有艾滋病。我不赞成卖血，她（妻）偷着去过几回，早，全采，没染上。于是说起当年村里卖血情形。

冬季天短，说话天色暗下来了。听得外面门响，可顶说，老伴插炮捻回来了。于是我们一起下楼，可顶开门接老伴进来。可顶嫂乍看上去是一个快乐开朗的人，她大声笑着交给丈夫一把零钱：这是今天发的！可顶说不指望她挣钱，只图她高兴，她脑子不清气有毛病。可顶嫂也笑说，我是傻子，不识数，人家算账给多少是多少。可顶说，一共三块七，给你存起来了啊！一边随手在门闩上加了锁。他说，晚上不敢出门，5点半老伴插炮捻回来就上门。夜里狗咬是“走炮”（外运鞭炮），出去看见了都是事，任它咬去。再有啥也不出去看。就是“查炮”，问起来，咱不知道。不管发生啥事谁问都是不知道。（田野手记20051211）

从此开始我在村里的隐蔽生活。从这一天开始，我才真正“零距离”接触到了我的研究对象，越加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生活、处境，感受到他们的感受。

### **盘根错节：微妙的关系**

中原农村习惯早睡早起。每天一早吃了饭，可顶嫂都高高兴兴出去插炮捻。可顶有时在家里跟我聊天，告诉我许多村里情况。有时也出门去“打探打探”，我就一人在二楼整理笔记和收集来的资料。卫华不时领一些“可靠的人”来“反映情况”。二楼一间卧室，前面是一个宽敞的阳台，堆晒着玉米。像中原农村许多地方的“平房”一样，水泥抹平的房顶是收晒粮食的晒台。太阳好的时候，外面比屋里暖和，我就坐在阳台上工作。这里是全村的制高点，可以看到四周家家户户房顶上晒晾着一排排半成品的鞭炮。乡土社会无秘密，隔墙有耳到处是嘴。可顶每次出门“打探”，都会带回来一些“情况”——

**高庄炮厂预谋杀入案很可疑。**高庄炮厂厂长高布袋是派出所长的干亲家，都说于安在炮厂有股份。村里老点在炮厂当经理，3个人关系好哩很。高布袋、老点欠王爱几万元不还，王爱雇人讨债，“雇凶杀人”说不上。几天后又传说，从王爱家抄出几百万假钞，她的46万存款被查封冻结。说王爱一度跟老点关系极好，“不分你我”。她知道事太多，只要抓着王爱，老点说不清，许多事摆不脱干系。由于老点与王爱关系暧昧，高布袋疑心老点，不敢再用他担任高庄炮厂经理。老点现在开起了出租车，据说小面包出租车是高布袋出钱帮他买的，也有说就是王爱原先开的那辆出租车。他们关系依然很好。

当时正在发生的“7.15”事件。人们议论的热点是“7.15”事件，因为牵连到村里不少人家。村民栗高喜因“7.15”事件被抓，因为找不到在现场的证据，就以非法生产烟花炮竹定罪名，刑事拘留。栗高喜通过老点找高布袋给于安 2000 元，放出来了。莫俊成，因万家乐案批捕在押，莫俊成的姐夫是高庄的，也是通过高布袋送给于安 3000 元，事没办到底，人没有放出来，但排罪名排到最轻。当时于安主抓此案，在这位置上他该捞就捞了。主犯莫俊成是艾滋病人，因为事情因他而起，已花了 9000 元了，还是用于保别人，顾不上自己了，家里没钱了，也没人去看他了。只要抓人，就是等着拿钱保人，都不想叫家里人在里头受罪，“借钱也得叫人扒出来”。“现在当官，在任几年贪一把走了。（19）70 年代还好一点，现在是一任不胜一任。老百姓日子不好过。”栗可顶说。

“炮的事”。说得最多的是有关“炮的事”。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在非法生产烟花爆竹，经常有人被抓被罚。一天，可顶回来说：昨晚栗存 3 家的炮，在东张庄窑场装车时被查住了，罚 1 万元。第二天卫华来说，有人想见见你，想跟你说说“炮的事”。就是夜黑（昨天夜里）叫抓住那一家。能不能叫他们上来？我没有理由拒绝。本来就是来找他们的。来人是栗存，这是第一个主动找我的人。和以后所有人一样，一上来都是先诉说艾滋病苦难——

我兄弟 5 个，妯娌 5 个，10 人都卖血，我卖血早，没卖单采没感染艾滋病，另外 4 兄弟都感染了。二哥、三哥已死亡，五弟病重。父母年纪大了，半身不遂。现在弟兄 5 家，俩老人，全靠我一人了。二哥看病钱花干，留下儿子还小，女儿残疾。三嫂另走一家带走一个女儿，儿子 16 岁就跟着我外出打工。五弟已发病（卫华插话：就是你前几天见过的，说下面一直流水），弟媳艾滋病，还有子宫癌，两个孩子都小着哩，将来都得跟我。

这一回是俺弟兄仨，有我大哥、堂哥，帮五弟家卖炮，他两口这种情况，两个孩子无论将来是丢到谁跟前，想给他们留两个（留些钱给孩子）。夜黑在卞路口乡张庄窑场，一共 6 个人，正装车，一扭头见小车开过来了，赶紧跑，人躲起来。堂哥跑得慢了，就藏房后头，叫抓起来了。我们几个跑得远，趴麦地、藏砖后，眼看人抓走了。抓着送拘留所，给钱捞人，少了不中。连夜我找所长的熟人说情，当时先给 1000 元稳住。那边说要 1 万，再给派出所里见人（每人）买一双皮鞋。通过熟人说，最终同意 5000 元，请客送礼又 1500 元。“当时不先送 1000 元稳住，立马就送拘留了。”不是人叫抓住了，炮就不要了，没办法。弄干了，几家才凑这一车炮。扎本（本钱）11000 元，能赚 2000 元，货到付款，13000 元。没法活了。9 月间已经叫抓过一回了。那一车炮值价 1 万元，抓了 3 人，直接上家抓人，连人带车一起带走哩，那一回花了 5000 多元。

这么冒风险，为什么还要干？

没法，俩老的得养活得治病，几家小的得管……上一回在家院里被抓的，有内线。抓几铺子了，信儿咋恁准？派出所出举报信息费 2000 元。都知道有内奸。这一回不敢在村里了，跑张庄亲戚包的窑场，还是叫抓住了。这一车死路一条了。想着我们不都是有老有小，就拼上了，早晚是个死！……这，跑一夜，借 6000 元扒人，我那嫂子坐路当中哭得，多少人掉眼泪。孩子该成媒时候，找老婆不好找，大儿在湖南打工结婚，盖不起房不回来。东借西借扎本做点炮，这又抓了……。

栗存说，村里艾滋病户都在做炮。打工，没力气，艾滋病不敢下力，出汗就发病。做炮，又不卡死（严格禁止），叫你干，就是走不了货。前几天派出所查住最大一铺，“十几家的炮合在一起走（运出），价值 35000 元”，派出所没收卖掉了。艾滋病人坐在派出所哭，路上人都同情。其中有一家两口艾滋病，一个傻儿子。这几天又没收 5 铺了，值十几万。炮拉到于海峰炮厂去了。于海峰跟派出所长关系好，炮厂他们合伙开。派出所与炮厂合伙做生意，没收的货拉炮厂卖钱，派出所抓人还收“买人钱”。俺村冤事多了，告状他抓你，罪名定得重重的，你上访还没走到，派出所就拦住了。

栗存说，真算起来，村里几乎每家都有艾滋病。就是有的家没有，他兄弟家也得有，家家不漏。像我们家说起来一大家人，但数起来没有人（健康人）。现在五弟两口病重了，当时就是为交提留款三十五十（元）应个急才卖血。艾滋病借钱没人敢借，卖粮食扎本做炮，这一回扎的本赔光。

栗存的堂嫂，被抓的就是她的丈夫，上到二楼平台时两眼已哭得通红，坐下又是一阵抽泣，然后跪下拉起上衣要我看她肚子上的伤疤：拉麦秸时从车上摔下来，肝脾出血，手术大出血……也卖过血，查几回查不出艾滋病，可我身体也有病……（言语之间，似乎因查不出艾滋病感到“理亏”，只好展示其另外的伤痛。也许她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来表达她的苦难。）这一家就指望他（丈夫）了。他就弟兄俩，大哥一家清毁了：大哥死了，大哥家的俩儿也死了，都是因为卖血得了艾滋病。嫂子神经了，疯了，一下就去了多少口。媳妇、孙子、孙女都走了……。这一房就剩俺这一家了，儿子成媒难，他抓走了，我可咋办？欠恁些账……。

两位老人，栗存的父母，拄着拐杖，颤颤巍巍互相搀扶着也上楼来了，我赶紧扶他们坐下，老父亲用手捂着泪脸，老母亲痴呆呆看着我：可咋弄哩？……

山岭，刚“出来”，头还光着：我才出来，头是叫他们剃哩。有 500 多饼炮，一小昌河车，值 1000 多元。鉴定炸药 10 公斤，说是可以判刑 3-7 年。花了 1 万多元找人说情，判了 3 年。又托住人了，拘了 40 天“刑满释放”。

我几乎不相信，怎么会判这么重？判3年怎么40天就“刑满释放”了？问：有证明吗？这些有手续，有文件吗？有。你刑事释放书给我看看？……没在我手里，在槐店集朋友家放哩。谁说情？花多少钱？再问。

山岭急了，语无伦次：“刑满释放”人家可没要钱，1万多元是给葛雷的。人家说情1分没要，出来连取保金、伙食费，每天30元，一共40天，都没交……

说得我一头雾水：葛雷是什么人？“人家”是谁？

最终总算弄清事情脉络，山岭再三要求我对“人家”帮他“刑满释放”保密。山岭是被安管大队葛雷抓的。要7000元罚金，取保金2000元，请客1000多元。共花一万多，都是哥哥交的。还嫌少，还要“抓典型”，判3年。一切合乎程序：检察院查实，以制作500饼鞭炮的10公斤炸药定罪，批捕科批捕，公诉人起诉，开庭审判判决3年。“葛雷恨这庄。”山岭说。在这之前他带人翻墙进栗可勤家查炮，抄家，没查着任啥。栗可勤告他，他理亏，托人说情才把事摆平。他恨让他丢人失面子。我与栗可勤是堂兄弟，他报复哩！后来找K市公安局山岭的哥哥的一个朋友，再找局长说情，算是“刑满释放”出来了。

问：为啥不一开始就找这个朋友？答：想着事不大，值不当找这么大人情，就500饼炮，没想到会弄成这……。在拘留所里40天，也是做炮，不分黑天白夜，完不成任务挨打。狱警打，有时找牢头狱霸打。我在里头没挨打，没人敢挨我，怕我传染艾滋病。饭也不抢我的，脸盆牙具另外搁，都离我远远哩。我们艾滋病在哪都没人理。我原来是在外边作生意的，查出艾滋病后，原来的生意伙伴都不来往了，生意做不成回来了。

村民气愤不平的是：这炮不叫生产也算毕，要取缔就取缔，或是没收了就销毁，“销毁也能听个响。”都不是。是让他们贪了。现在抓得狠、抓得多了，人抓怕了，不敢讲理了。

……

之后的几天，就是这样人来人往，都是来说“炮的事”。他们希望我能帮帮他们，他们把我看成“上头”来的。可我，能怎么帮他们？

**村主任“掏心窝”的话：上访不是过年……实在活不下去了**

这天一早卫华就来了，先说“7.15”万家乐事件：拿来一份县法院关于万家乐事件的起诉书，他说，“新臣在法院有亲戚，这是他从亲戚那找来的。”说是明天开庭，都传着说不会轻判，莫俊方在里面想自杀。再说7.15”城管大队打人的事：早上7点半，派出所长就打电话，叫我带那6个人（城管打伤的艾滋病病人）过去调解。所长说：不要再去城管找了，再去找就抓人哩！县领导下命令了。没有想到现在这样“调解”，几个人很失望很气愤。都不是好消息。说着，卫华又被人找走了。



下午，卫华又过来了，说又带他们几个（被打伤的艾滋病人）一起去找乡里。乡里几个领导都在。书记说一句：又来干啥哩？一个人包（赔偿）七八百算了！就走了。派出所长说：上面说好了，一个人解决 1000 元。还说，就这我费了多少劲，请吃饭都赔了好几百了。艾滋病人不愿意，说要找个说理地方，破上了。所长说：告状，你们一分钱也得不到了！艾滋病人说，不要了，你看着办吧。人都走了。所长留下卫华，叫作工作，说“差不多就算了。”他几个都不认，说 2000 元还不认哩，光瞧病花多少钱。要上北京去上访。

正说着，要上北京的几个人来了。他们说，计划明天就去，村里群众答应兑钱，每家出 10 元。留安病重，他媳妇替他去。他们问我：刘老师，你说上北京去找谁，那说理的地方在哪？我说，如果你们真的问我，我劝你们不要去。天这么冷，你们没有钱又有病，怎么好出门呢？咱们再想想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卫华劝走了几人。说话天色已晚，挽留卫华一起吃晚饭，也好边吃边谈，把几天了解到的情况理理顺。但他借口为我回家取暖瓶，还是走掉了。晚饭过后，他提着暖瓶过来了，脸上红红的：“家里来客了，非让喝一杯。”也许因为喝了点酒，他说出了“掏心窝”的话。卫华说——

不是实在没法，谁想去上访？上访可不是过年，遭罪哩很！这么冷的天，艾滋病还不能着凉。走不了防暴队“按你”，拿做炮说事。可除了做炮又指望啥呢？搞养殖吧，养牛养羊养猪，不安全，偷得厉害，晚上看不住，“看着在家搁哩，不是你的。”搞种植吧，工作队帮着争取了 5 万元大棚款，群众都问哩，县农业局是拨下来了，可到不手里……。除了这案子，要操的心多了，可是办法没有。这一村老老小小……，该咋说？……说实在的，烟花爆竹在村里做，确实很危险，涉及到每家每户，万一要是出了事，全村可是一片海洋，是一片火海，关系到每个村民的生命安全……，做烟花炮竹终不是长事，可一旦停了，人怎么办？“十人抬一人好抬，一人抬十人难办”，除了老的小的，都是有病的人，难。几个人一堆议议，想出去义演募捐……。

怎么义演募捐？问他。

组织点艾滋病人，印点宣传单子，说说艾滋病防治方法，说说咱村有多难，站人家大老板企业门口表演表演，让人家同情同情，演演募捐……。就是“巧要饭”……，说难听的，就是要饭……。带人去打工，他们干不了重活，除非带他们去要饭！在这实在活不下去了，也不想再求他们去了。

“这些，都是我掏心窝子的话。”他说，多少年了，村里家里没人来，连亲戚都不来，就因为这艾滋病。你能到村里来，这样待我们，我很感动，感到亲近，信任，就想跟你说说。跟人说说，有人理解我，我说有人能听进去，心里有安慰。卫华有满肚子话需要跟人说。这

么一个大个子，竟说得涕泪交流。

听得人心酸。再三要他一起吃顿饭都不好意思，怎么会去“站在人家大老板企业门前让人家同情同情”？我说：卫华，你以为要饭就这么容易？卫华却像中了魔症一般，只顾问：刘老师，你说这样会不会违法？我们不上北京，省得他们说上访闹事，只上南方边远沿海一带……。我哽咽不能回答。几天之前，卫华们对我还断然不肯说出这样的话，那时我们的心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贴近。

这时候电视里正在播放中央统战部的干部领导为灾区捐款捐物。有人手中数百元投进捐款箱，大包的棉衣棉被装上卡车。栗可顶很关心国家大事，每天新闻必看，看了还要结合村里实际加以评论。每每感叹上头政策是好的，底下搞坏了。这时可顶、卫华又说：上级都是好的，都是底下坏了，按上级政策，县里这些官都该杀。可顶说，刘老师，你不管向上反映反映，叫上级派人来俺这调查调查么？整治几个，再来当官的就不敢胡搞了。卫华说，来明察暗访，不然了解不到真实情况……。

### 艾滋病村寒冷的冬季

卫华走后，又跟可顶聊了一会。实在太冷坐不住，我就上二楼自己的房间，坐进被窝打开电脑写田野笔记。没有想到村里会这么冷。房东家媳妇的新被子，新里新面新棉花，很厚的两床，盖在身上很重了。但只感到重量，依然彻骨地寒冷。既是水杯又当暖壶的旅行杯，放被窝里很快就凉了，比体温还凉。

实在冷得受不了了，只好钻进被窝躺下。看表，才8点半。

冷，钻心寒冷，从外到内，从内到外。冷得睡不着。心里有事，也许。村里狗一直在叫，听见谁家拍门喊人，声很急。想到卫华说：夜里村人都不敢睡，听到动静就立马起来了，拿着铁锹抓钩砖头，拦住了派出所长砸锁卸炮。又想到派出所夜巡偶遇可疑车辆抓获5个蒙面人。胡乱想着，还是睡不着，狗一直叫一直叫。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卫华们肯定没有睡。

睡不着，又起身翻看手边的材料，有往年历次的上访信，有这几天村民们的“反映材料”，厚厚一大叠。不屈不挠地“挣命”，顽强地要活。内心生出一种敬佩与感动。身上拥着可顶家儿媳妇的新棉被，还披着可顶嫂子的新棉袄，依然很冷，冷得骨头痛。周身发紧，真是怕病了，吃了卫华带给的药，胃痛好一些了，但咳嗽得更厉害了。不由设想，假如我处于村人的生存境况，我能活下去吗？我不会比他们的生命更顽强。

艾滋病高发村的冬夜，实在是惨人。实在是冷。

### 三 一次自上而下的调研

那一次我离开银庄不久，就接到村主任栗卫华的电话。他告诉我，在城管大队挨打的6个艾滋病人听劝，没有到北京上访，城管大队赔了8000元。留安已经死了，大家都说留安家太难，给了他家2000元，余下的其他5个人分了。“万家乐”一案，抓走的几个人迟迟没有判决，村里人心惶惶，情绪很不稳定。村里人问，那些反映材料递上去没有？村民都在盼望结果。

不想当时劝阻村人上访，一句“咱们再想想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竟然成了一个承诺，从此村民们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我希望通过正常的渠道反映问题解决问题。我不希望村民们上访，因为那样于事无益。那次卫华、栗因开小三轮护送我离开村庄，又眼巴巴看着我从高速公路上上了长途汽车。我怀抱着的电脑包里，装着众人写的“反映材料”。卫华们一再说，这些“反映材料”，请刘老师一定转交“上级领导”。但是，看着厚厚一叠“反映材料”，我很是犯难。我没有料到有这么多人写这么多材料。为了情况属实，我要求材料要写清事件、时间、地点，并且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如果这些材料真的又“旅行”到当地“被告”的手里，会不会使村民们的处境雪上加霜？还有，这些材料递交哪一级“上级”比较合适？县里？市里？省里？搞不好也会增加不必要的矛盾。

我决定遵循“属地问题属地解决”的原则，在调研过程中相机行事，寻找机会与当地有关领导部门沟通，希图以一种婉转的方式，将田野调查中了解到的“下情”传达给“上面”，不触犯当局，又能化解矛盾解决问题。我一直以为，造成许多基层社会矛盾的原因，是上下级层之间“阻隔”太多难以沟通，下情难以上达，上情也难以下达。我希望能够起到上下沟通的桥梁作用。

### **热烈欢迎全力支持积极配合**

电话联系陈明。陈明是K市组织部一位科长，市委艾滋病防治帮扶工作办公室综合组组长。最初院课题组到K市调研时，陈科长负责接待，当时就跟他约定，我还会再到K地做深入调研，之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陈科长很热情，说早就等你来呢，派车去接你？我连说不用，自己搭长途车就好。他说市里刚好有车到郑州大修，顺便。于是便搭趁这辆大修车。司机是一位很健谈的年轻人，一路说了不少，不外是通常百姓对贪污腐败不满的话。车在郑州绕路接K市某领导的关系户亲戚，女人孩子满满一车。这在基层县市是常见的情理中事。到K市已是中午，陈科长安排我住市委宾馆套房，这是省委下派的督导组组长的房间，他长期在郑州不来这里，房间空着。这对于我来说，是很奢侈了。服务员很小心地收拾起督导组挂在衣架上的衣服，说待我走之后会按原样挂好，“他脾气古怪得很。”午餐后跟陈科长商量调研计划，陈科长热情、干练、周到，说：“刘教授放心，一切都安排好啦！下午走访疾控

中心，晚上观看组织部文艺会演，之后几天先访谈市里相关部门，然后走访下面基层重点县乡村。这一回刘教授在我们这里多走些地方多做指导。”最后一句，“多走些地方”是多次联系中陈科长了解我的意图，“多指导”是一般基层“下级”对“上边来人”的客套话。

在 K 市的调研基本顺利收获不小。陈科长为我安排好的下边基层调研，第一个便是 Q 县，要去的村庄便是银庄。

陈科长亲自陪同我来到 Q 县时，县里一班人已经在县委新区招待所等待。在座的有：县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主管副县长、卫生局正副局长、卫生股长。一一介绍后入席就座。县委组织部陈部长很热情，说，刘教授来调研，市委组织部早就安排了，我们热烈欢迎全力支持积极配合，刘教授有啥事只管安排，需要什么资料，我来安排他们办公室提供。主管卫生工作的女副县长和卫生局长们也都说全力配合调查工作。只有那位年轻漂亮的女宣传部长，据说是从市委宣传部下派的市妇联干部，略显冷淡矜持。午餐席间，陈科长又安排：县里要全力配合刘教授工作，卫生、民政、组织部要协调好。

#### **卫生局的“新思路”：给艾滋病人的药品加价，用来解决医生的待遇问题**

有市委组织部的安排，第一天的县级部门调研很顺利。主管县长和卫生局长谈疫情高发地 B 镇及重点村银庄艾滋病救治工作的开展情况与存在的困难，虽然简单了点，但是谈得很实在——

**救治救助措施。**在国家政策之前 Q 县就做工作了，市财政也拿了钱。当时是张金海当市长，现在调省水利厅。当时对艾滋病的照顾是，一免提留，记不清是 02 年还是 03 年，县里提出先免艾滋病的提留，情况反映到市里批准了，**说只要不出事，不让上面知道。**二免学费，在 2003 年前后，只汇报到县委书记，安排教育局免去艾滋病家庭孩子的学费，但是事后没有把钱补给教育局。2003 年非典会议上，县财政给了 20 多万，用于艾滋病检测救治。中药治疗从 2004 年开始。国家够关心了。现在建立个人账户，平等了，没有“光棍眼子”了。病人基本稳定，由乱到治，由不规范到规范。重点村银庄卫生室，配五六个人。其中 3 个村医。另外县医院派一个主治医生，镇卫生院派一个在药房。忙的时候，镇卫生院还会派护理。重病号到镇卫生院输液。村卫生室这五六个人，每人每月都有 300 元补贴。<sup>①</sup>

**问题和困难。**主要问题还是钱的问题。有些政策定得不错，但是没有配套资金，没法落实。比如 2001 年减免部分抗机会感染医药费，每天每人平均 2.2 元，省里拨款，但是后续资金不足。2005 年起规定 3 个月检测一次 CD4，根本办不到，6 个月一次也办不到。试剂是进口的，很贵，常常缺。没少跟上面提，跟市里省里都提过，光说跟上面协调，还是没有实

<sup>①</sup> 实际情况有出入，详见第三章之二。

际解决问题。卫生部长高强来的时候，省里王菊梅省长先表态，建学校修路等“五个一”工程，王菊梅拍板，说请高部长放心！象这些资助的钱，上面给十个，下面能花一个就不错了。比如建村室，事先非要搞设计招标监督预算，净是多花钱，为的是层层揩油。象这些过场，大工程需要，小工程根本没有必要。县财政很困难，医疗部门待遇低。乡镇财政更困难，特别是减免农业税之后，不准搞摊派，各村干部都很穷，工作不好开展。现在医疗卫生人员，待遇没有经济来源，建艾滋病个人账户之后，给艾滋病每人每月150元，“对艾滋病人的药品加价，用来解决医生的待遇问题。这是卫生局现在的一条新思路。”<sup>①</sup>

这样合适吗？问。

答：符合政策规定。

谈到《艾滋病防治条例》宣传实施情况，说“那些事以前都做了，在重点村办培训班。”问什么时候？却又答：正定计划哩……

最后给了我一份年度工作总结，说，情况上面都写着哩，很全面。我早就注意到，县市各部门都有一些写家，文字功夫不错，很会写工作汇报和总结，套路都一样。这是一份很“经典”的中国基层部门工作总结汇报类的当代文本，真的很全面，方方面面点水不漏。这就是“自上而下”进入调查场地的好处，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接待，省力省事。但是最后你会发现，种种方便之后也有种种不便。

### **听说你在那时间很久了，都不敢见你**

我以为，我在Q县的B镇做了田野调查之后，再进行这种“自上而下”的访谈，可以避免“种种不便”的弊端，有利于双方沟通与更好的相互了解。不料事与愿违。第二天，当县卫生局长陪同我到镇卫生院之后，县里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们不再诉说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而是强调艾滋病病人“法律意识道德水平低有神经病”，历数艾滋病人的种种“妨碍公务恶劣行径”。卫生局长说，“艾滋病的法律意识道德水平就是比一般人低，我的车都被他们拦过。”又说：“刘教授，你不能跟艾滋病站在一边。”主管县长说：“艾滋病快死的人了，他们脑子有问题，思维不正常，神经病，你不能听信他们的。他们给我们提意见，不能说明我们工作没有作好。现在没啥问题，工作都做到顶了。”而已经安排的日后几场民政、防疫等部门的访谈竟然进行不下去了。到访的第一天县委组织部长就亲自安排办公室主任提供的文件资料，也一份没有见到，说是资料室的人出差钥匙带走了。陪同调研的县委组织部干事小王，人很谨慎，看上去总是忧心重重，顾虑重重，很少说话。这时悄声跟我说，“难啊，

---

<sup>①</sup> 抬高艾滋病患者用药的药价，也是许多基层卫生部门解决财政困难的“思路”，此口一开，后患无穷，引发许多矛盾，第三章，第四章的一些故事都反映了这个问题。

整个大气氛就是这样，B镇说你已经在时间很久了，都不敢见你了……。”

### **都没公开，那都是为你们的调查开座谈会“专意培养的典型”**

陈科长是个痛快的人。他说，看起来调查有难度，基层情况就是这。上面来人从来没有像你问得这么细，你这么细问，他们很紧张。一般都有准备，按准备好的材料汇报不出圈。上次你们省调研组一起来，在西赵桥开的座谈会，你问人家艾滋病人卖血时间、次数、爱人情况，人家很难为。实际上都没公开，那些艾滋病人都是为你们的调查开座谈会“专意培养的典型”。这回你来，那天下午在市疾控中心，其实啥材料都有，也是不愿叫看。数字材料更不愿给。

问：不是你领着的吗？你是组织部的，咋会不听你的？你不还是市委艾滋病防治帮扶工作办公室综合组组长吗？

陈科长说：他们部门的考虑吧，我也不好勉强。市帮扶办？一个空名罢了，还不知在哪设着哩！别说我们，就是省艾滋病帮扶办也只管38个工作队，其他部门调动不了。2004年普查，就动不了，组织部出头督导，市委分管组织的刘书记严肃强调，结果一查一弄，还是有漏的。

“如果卫生部门有顾虑，能不能跟县委县政府的领导谈谈呢？”我惦着银庄的事，希望有机会见一见县领导，希望那些具体的事情能够“属地解决”。

### **正开两会，四大班子调整，“政治敏感时期”，都怕惹事**

陈科长说，那得能拍板管事的领导。于是帮我联系预约县长、书记。结果都说开会出差，不在。“实际是都不敢见你。”陈科长说。连原来已经约好的县委组织部长，也说开会出差了。陈科长解释说，Q县委书记刚刚升任开封副市长，县长可能任书记，还没有宣布，这时候都怕惹事。你这是敏感课题，现在又是敏感时期。“正开两会哩！两会之后，四大班子调整，正是处在政治敏感时期，谁都怕惹事。”不光县里，市里也一样。现在市里没有卫生局长，老局长去世了，新的没有任命，都盯着呢。你这事，难度很大，都没放开。艾滋病本来就是敏感的事。原指望艾滋病人自生自灭，卖血感染这些人死完事情过去就完了，没想到他们比外国（艾滋病）人还能活！都有顾虑，别说县里有顾虑，市里也有顾虑<sup>①</sup>。你是不知道，你这回来，有的人滑得很，约几遍不谈，有的谈罢了也后悔。

“你呢，谈不谈？”问得直接。

答得也直接：“我也不谈，说了也没好处。”

### **我们怕追问是谁接待的你**

<sup>①</sup> 我还是无意间触动了一根敏感的政治神经，“被嵌住”是必然的后果，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这一点。

陈科长说，他们不愿见就算了，他们有他们的难处。刘教授有什么事情能不能跟我说，看我能不能帮上忙？我看他说得很诚恳，便把银庄情况简要告诉了他。并且说，本不想跟你这位市里领导说这些的，因为我不愿意让 Q 县认为我是向上级“告状”，我希望把矛盾化解在当地，而不希望事态扩散扩大。

这位科长没有料到我真的有问题要反映，真的已经对基层情况了解那么多，脸色即刻凝重起来。我知道，他感到事情棘手了。陈科长说，看来这里难度太大很难突破，那咱去鹿邑、郸城？鹿邑、郸城我已经去过了，我不想再重复 Q 县的经历。就说算了，不难为你了。陈科长说，说实在话，全市定了 5 个省级重点村，除了银庄可以放开说，其他庄还都不敢说，不敢公开，去了也没啥意思。那些不是重点村的就更不敢说了。政府不敢叫说怕影响政绩，群众也不敢说，怕歧视丢人孩子寻不下媳妇。

直到坐上回 K 市的汽车，离开 Q 县城，陈科长才长出一口气，说：刘教授你不知道，沙河的癌症村、Q 县的假药报道，对当地政治经济造成致命打击，所有班子换完。非典时期，撤换一把手，一票否决。底下情况就是这样。……我现在也担心你把我卖出去呢……，心里一直沉甸甸。我笑说：你放心，我还得跟你做朋友呢！陈科长建议我到 Z 市作课题：“他们那里都公开了，好搞一些。材料不够，K 市再补充……。”他在向外推我了。说完似乎很过意不去，说陪着你去淮阳看看太昊陵，吃个鱼？到东湖鲜，最有名的鱼餐馆……。为了科长安心，我只有客随主便，去了已经去过的太昊陵，去吃“最有名的鲜鱼馆”。淮阳县组织部负责接待的小干事，一路陪同毕恭毕敬，跟陈科长汇报说这两天正忙着整材料，要报先进党支部。“头天发文，‘文儿’才打出来还没发出去哩，今天就要底下把材料报上去，主要为了书记竞选。”如果不是长期的农村社会田野调查，我不会理解这一切就是中国国家机器在基层社会的政治运转。

**艾滋病的事，不准宣传不准报道不准调查不准研究。对艾滋病的打击力度要比平常人大。**

临别，陈科长说：“刘教授说的问题我都记录转达报告给市领导了。”又说，“我们也非常害怕。怕追问是谁接待的你。”我明白他的意思，也明白他的处境。我再次请他们放心。陈科长说：“上面宣传部说了，艾滋病的事，不准宣传不准报道不准调查不准研究。对艾滋病的打击力度要比平常人大。”看来事情不是像我想得那么简单。也许不能太着急解决问题，着急也不行。

不久陈科长专门打电话给我“汇报工作”。他说：刘教授，你说的几件事，已经查实，给你汇报结果。第一，万家乐事件，艾滋病人一、二、三，三天，连着三天每天砸三场。对

他们定位在打砸抢犯罪团伙，还不只是扰乱社会秩序罪。不能姑息迁就，不能减刑，放出去麻烦。第二，砸城管的事，跟砸万家乐商场是同一件事，警察去维持秩序，见一个打一个。问：谁打谁？答：艾滋病打警察。第三，B镇派出所长是全国全省表彰的先进模范人物，省级劳模，上级树立的标兵典型。一进村，就被艾滋病人抓伤了脖子，在镇上住80天，不给家里人报。因为工作能力强才派去的，他工作干得很好，把那里治理得很好。

我瞠然。

只听电话中陈科长又重复强调了上次说过的话：“上面宣传部说了，艾滋病的事，不准宣传不准报道不准调查不准研究。对艾滋病的打击力度要比平常人大。”他说，这也是K市领导的意见。

平心而论，陈科长是位很负责的干部——他完全可以不答复我不给我这个电话。在基层很少遇到像他这样干练高效、办事点水不漏有始有终的干部。

#### 四 给省委省政府的报告

##### 递交报告

“刘老师，大年初一向您哭着说着，叫顾艳平的女人已去世。时间是昨天。”

“又有一些人做炮被抓了。群众情绪很不稳定，还是想上省里上北京。向上级反映情况的事，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请回信，村民都在盼望结果。”

收到村主任栗卫华接连发来的这两封手机短信时，时间已经又过去一个多月了。自从学会了发短信，卫华就用这种方式与我联系。后一封短信有村里好几个人的署名，这是向我强调“村民都在盼望结果”的急切心情。

其实我的心情和他们一样急切。受人之托，总得有个交代。电话打过去，了解到情况真的很紧急，可以说是“形势严峻”。由于抓人罚款愈演愈烈，加之抗病毒治疗不到位以及不断发生断药现象，村里死亡率开始回升，矛盾进一步激化。待我再次来到村里，看到村头扎起一个麦草人，村民对着它烧香诅咒放鞭炮，有人扬言，反正是个死，再发病就上天安门！还有人说腰里缠上炸药，平了Q县！

无奈无法与当地政府领导取得沟通。考虑再三，我决定从社会安定的角度，向省委省政府写一份报告。我这样开始我的报告——

河南省委、省政府：

我是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正在承担一项关于河南艾滋病问题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从2004年下半年到2006年初，我走访了4市9县数十个艾滋病村庄，对若干相关部



门进行了调查访谈，在艾滋病村庄度过了两个春节，现在刚从调查现场回来。田野调查发现基层社会中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事关全省大局，现在郑重向省委、省政府报告，请求采取及时措施。对外讲策略，对内要确实，我对自己这里所写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负责……

报告写完了，我才发现，不知道应当递交给谁？如何递交？我忽然明白了那些上访的农民，他们为什么再三问我，到北京找谁？那说理的地方在哪？

我向正在信访局任职的大学同学求助。同窗好友，谈了好久。他听完了，满脸严肃地说，这事非同小可，你一定要想想清楚。艾滋病这事太敏感了，省里对高耀洁评价不一，还有个南方教授（当指桂希恩），一动就捅到国外了，国外只会拿着这些攻击我们。我说，这当中存在一个沟通理解信任的问题。中国的事不依靠中国政府解决，还能指望外国政府？这个道理，知识分子，任何一个中国公民，难道能不明白？发现问题说出问题，是相信政府依靠政府解决问题。是帮政府。帮政府把事情办好就是帮自己。你如果到过现场，一定会与我有一样感受。他说我当然相信你，但是事情不像你想得那么简单，我是为你好。你再考虑考虑，想清楚，决定了，再给我电话，你一定要做，我帮你联系。我一回到家立即给他电话。想好了？想好了。决定了？决定了。在他的帮助联络之下，我见到了一位副省长的秘书，也是省政府的副秘书长，递交了这份报告。省长秘书态度很谦和，耐心听我说完后，说：感谢你帮助我们做了工作，对你的精神深表敬佩，会及时向领导反映，派暗访组去查明情况再做处理等等。

### 王百姓与省市调查组

接着是漫长的等待。两个多月也许不能算漫长，但我心急如焚。是我太着急了？村里几乎天天有电话、短信催问结果。两个多月之后，2007年4月将尽，我突然接到K市公安局徐局长的电话，说：接到了省厅转来你的报告，有秦省长的批示。省长2月份就批了，3月份到省厅，4月份才到市局，刚见到，即刻着手调查处理。希望刘教授配合取证，提供调查线索。局里治安支队长会直接与你联系，都是女同志好相处配合……。最后免不了又表示“敬佩感谢”等等。随即女支队长给我电话联系，说很快会到现场调查，希望配合。也说十分钦佩衷心感谢。事情终于有了“答复”，我自然高兴，说，随时等待消息，一定全力配合。

却很快又接到村主任栗卫华电话：市公安局的人在镇派出所当着所长向卫华“调查”。“我咋说？”卫华借口上厕所给我打电话，说，刘老师，你快来吧！事情不能就这样就算完了。接着又发短信：刘老师不要直接进村，我们高速路口见面再说。

担心意外，想最好单位有人和我一起去。联系我们研究所说明情况。所里让联系院里，

院里说联系科研处，科研处支支吾吾……。最终还是决定独自行动，“单乘马车好赶路”，这也算是跟单位“打过了招呼”。次日一早即赶往长途客运站，几经周折，才坐上10点发往Q县的长途车，临开车又被换上一辆过路车，一直转圈接客，11点才开出郑州，将近下午2点，我被撂在高速公路上，徒步找到Q县出口下高速。卫华们已等候多时，匆匆交换了情况进村。

刚进村，手机响了，是省厅调查组的电话。电话中说，省里委派公安厅王百姓处长作为调查组长，现在王处长已经在县公安局，即刻开车进村。问，刘老师人在哪里？可否赶来配合调查？我喜出望外，事情有了转机。赶紧回答说，我正好在村里呢，等你们过来。省公安厅王百姓是全国著名英模、排爆专家，“人民群众最喜爱的十大警察”之一，他经常在K市讲课调研，在当地口碑很好。因为烟花爆竹的事情，我专门拜访过王百姓专家，感觉他是一位诚恳正直富于同情心的人。当时他刚刚处理过林州一起爆炸事故。说起K市，王百姓对当地情况非常熟悉，也是忧心忡忡。他说，那里群众在村里家里生产烟花炮竹，隐患极大，是得尽快妥善解决，宜疏不宜堵。否则一旦发生事故，比林州还要严重，死的可不止是三五十人！这次省派调查组由他出面负责，真是太好不过。

于是赶到村委会，调查组也到了。省、市、县3辆车，5个人：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各2人，县公安局来一位卢副局长。村民听说了，都聚集来。开始众人情绪激烈场面很混乱。王百姓跟我说，这样解决不了问题，你熟悉情况，还是你先跟群众说说吧。不等我回答便大声跟村民们说道：大家相信不相信刘老师？众人答：相信！我们听听刘老师怎么说好不好？我原本想做一个“观察者”，这时只好“登台”说话：咱们不是一直盼望上级领导来了解我们村里的实际情况吗？现在省领导派调查组下来，就是听取大家的意见和要求的。请大家一个一个说，把问题要求说清楚，好不好？众人情绪渐渐安静下来。现场调查会开始，卢局长按“程序”作村情介绍，人口多少、土地若干……，只开个头，王处长说，还是听群众说吧。于是在屋子当中摆一把椅子作为发言席，发言的村民坐在上面，直接面对省市调查组。一个接一个说，半下午一直说到天黑透：发病、死人、生活困难、打工没人要，万般无奈只好冒险做鞭炮找个活路……，最后“焦点问题”集中在派出所抓人罚款收缴货物没有手续没有字据。村室内坐满了人，村室门口窗口挤满了人，院内还站着许多人，但秩序良好。中间一度人少，村里大嫂们几次来悄悄告诉说：派出所的人在外面来回转几趟了；派出所长在村外车边站着听手机；有人怕报复，不敢说了，散了。见卢局长一直向我们这边看，我便将人们告诉我的这些话告诉他。市、县局领导皆当即表态：决不打击报复，问题一查到底，该退还的钱一定退还，一分也不能少！众人听了鼓掌欢呼。散了的人们又聚拢来，比原来还多，还有

一些外村人听说了也赶过来。当坐在屋子中间的椅子上的发言者发言时，其他人都出奇地安静，而发言也愈来愈简练：姓名、事件、时间、地点、罚没数量。说完就走，让位给下一个发言者。省调查组长王百姓很认真地听取每一个人的发言，市调查组魏支队一直埋头记录。

（照片 53）一些老人、妇女说着说着泣不成声，一些中年汉子也会眼含泪水说不下去。现场情形显然对调查组每一个人都触动很大。

事后才知道，此前在县公安局接待省市调查组的宴席上，争论很激烈：市调查组通过在派出所的“调查”已经有了结论：B 镇派出所没有问题，所长是个好同志。省调查组长王百姓则坚持进村调查，要听听群众的反映。县里说不能进村，“进去就出不来了！村民会掀翻汽车抓伤人，艾滋病恶意报复。”王百姓处长说，我相信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坚持进了村。

现场调查会结束后，王百姓邀我一同到市公安局汇报情况。天色已晚，当日住 Q 县新世纪迎宾馆。晚上县公安局设宴盛情款待，席间局长亲自敬酒称颂，相邀今后携手合作。王百姓处长是一个工作很认真很有条理的人，晚餐后跟我商议第二天到市局汇报的要点：第一搞好退赔，给群众一个满意交代；第二从长远计，建合法炮场或者给群众寻求其他生产自救的门路。我建议，群众反映很强烈的“7.15 事件”是否也一起谈一谈？王处长说，那就一共三条。

### 派出所长夜访，请求撤回报告

已经晚上 9 点多了，派出所长跟我打电话，要求见面“谈谈。”和他一起来的还有 B 镇派出所的女警员小赵，小赵负责派出所户籍，她的父亲是退休的老所长。谈到半夜 2 点，直至宾馆保安再三催促要锁大门。所长说——

B 镇治安，艾滋病是突出问题，直接影响县市国家稳定。“稳定压倒一切”，派出所工作很重要。我调任 B 镇派出所以前，艾滋病人很猖狂，闹得很凶，肆虐无忌。有人敢打公安人员、打医生。我去之前都不敢处理。我去之后，该打击打击，该关爱关爱。第一次处理了 3 人，抓起来拷所里，判拘留 15 天，6 天提前放出来，他们很感激。后来老点因为学校事被抓，放出来戴罪立功，一直是好朋友。抓满囤是因为在李竹园非法生产炮，他是第一个拘押的艾滋病人。押在里头的第三天，同案胡琴英的丈夫死了，艾滋病。我帮着协调了 100 元火葬费。做工作把满囤也放出来了。不能一棍子打死，对他们采取教育、关爱相结合。满囤是第一个撂里头（被抓捕）的，通过帮扶，现在很感激我<sup>①</sup>。我为他们办好事，满囤的沼气，是我协调的。为城管挨打的 6 个人，我出面请客，协调了 1 万元，他们跪下来感谢我。我给留安们分钱，留安找过我，事先给了他 2000 元（就知道了城管打人赔偿有猫腻，留安已死，

<sup>①</sup> 村民说，老点和满囤，都是派出所的“奸细”。

死无对证)。“艾滋病人刁横贪财，不分好他们回去会挣抢打架……”。当时留安都准备死到那儿的，县领导根本不可怜他们。我为村里做了不少好事。我多次到艾滋病村巡逻站岗。村村站岗户户联防，车辆夜间巡逻，不光为查炮。栗新臣站岗发现偷盗，一吆喝被贼打伤，头上缝好几针，是派出所把他拉到乡卫生院。A 处帮扶那年，省厅六七月份捐助书包等价值 10 多万，当夜失盗。我去之后，案件成倍下降。今年春节，给致孤户特困户 20 多户表爱心，派出所出 2000 元。搞捐助活动我本人出 200 元表心意。给银庄免费办身份证 9 人，入户口免费，过去每人收 50 元。省厅发被子装卸维持秩序，医生挨打维持救治秩序，都是派出所做的工作。现在 B 镇基本稳定住了，为此我付出很多。在艾滋病区工作，受歧视。朋友一块喝酒大家不刀菜，回家不洗澡老婆不让上床，朋友亲戚都嫌弃，都不愿在艾滋病区工作。我 11 年没有做恶。

领导对我工作完全肯定，本来要进局党委了。新的镇党委班子很看重派出所，要我列席班子会。顾局长说坚决支持我工作，对我一保到底。“我一走，换谁也不中，村里肯定大乱”。顾局长、卢局长都说要我放心大胆工作，百分之百信任，不管艾滋病人怎么说。情况不是像个人反映的，那个别人，是因为打击他他有刻骨仇恨。烟花炮竹管理，堵疏结合，打击个人，保护大多数。多次与卫华商量，10 天半月不查，让艾滋病人自己拉到炮厂去变卖成钱。但是很多人要钱不要命。银庄出租小屋非法生产，每月 2000 元，出事火烧连营。查过四五车炮，都销毁了。对他们多次治安拘留，“打击与关爱并举。”

卢克局长跟我说了你的报告内容。<sup>①</sup>很后悔没有早点跟刘教授沟通。过去沟通不够，向你道歉。基层工作很困难，公安局从来没有返回过 1 分钱办公费，有些情况是逼上梁山。确实有不开票的情况，收的钱用于办公了，用于办案经费。有些事是底下人干的，现在孙彦调走了，很多事是他干的，群众反映强烈。刘教授不能只听艾滋病一面之词，也理解理解一线工作的民警，求刘教授说说基层民警辛苦的一面。现在我事业未成前途完了，成了你手下的阶下囚了，准备辞职做生意去……。“没有功劳有苦劳，咱都是农民家庭出身的孩子，不容易。”

虽然我知道他说的许多情况不符合事实，但是他最后这句话打动了。我很能理解他现时的心情，我知道，农民家的孩子走到这一步是很不容易。

但是他又说：求刘教授，我们自己解决问题，不要上边干预行不行？给我一次机会，安抚村民保证摆平。这件事情，咱们自己解决，不要上级干预……。

我一时竟不能明白他的意思，或者说不敢相信他会说出这样的话。

---

<sup>①</sup> 这样做是违反信访条例规定的。

小赵帮助所长解释：他们（艾滋病人）本来就是打击对象，是对立面。连局长也被搂住过腿。于所长是公安老人，我爸当所长时就在。刘教授给领导说说你的报告只是听艾滋病一面之词，现在听于所长说了，了解全面了，就说以往反映情况片面了，撤回报告。

这回听明白了。我说：这我可做不到。但是我一定会把今晚的谈话全部反映给调查组。相信调查组会全面了解情况，慎重作出处理。

临走，于所长说，过去对刘教授照顾不周沟通不够，小赵给刘教授手机充上话费，以后多联系……。我说，不用，千万别。

次日早上我就跟王百姓处长沟通了所长的谈话。王处长也说只要接受教训认识错误换个地方算了。调走就行，不必扳倒。底下人弄个事，也不容易。“问清楚收那么多炮，都弄哪了？收多少钱，上交没，都弄哪了？让他知道上头一直关注这件事，该退赔的一定要退赔。你材料写得很好，事情完了再给秦省长写个汇报材料。”

正说着，于所长又来了。我说我已经转达了你昨晚的意见。现在你可以直接把你的想法告诉调查组了。所长跟王处长谈过之后，还是要再跟我“谈谈”。

问他，跟王处长谈得好吗？他说，不好。还得给你刘教授谈谈。他开门见山，要求在 B 镇继续干。他说：要原则与灵活相结合，给我机会，我能够安抚老百姓。县局对我的工作是肯定的，对我要治病救人不能一棍子打死，对犯罪分子还是这样哩。疫区工作要面对现实，我有能力协调好关系，做好整改，以观后效，给自己找个台阶，事情完善后自己要求调走。否则对艾滋病治理不利，走了悬置，不利于安定。“问题只有我在那才能落实解决。”我有能力协调好各种关系，筹资为村民办实事，请刘教授帮助与村民沟通一次，谈谈他们有啥要求。最后说，“为打造乡镇派出所形象，建派出所办公楼我自己掏腰包垫资八九万，这一调走，谁还？”比起头天晚上，他态度有很大不同。

我再次把他的要求转达给调查组。王百姓处长说：他也太没有自知之明了！连调走都做不到，怎么向群众交代？

### **调查组旗帜鲜明的表态：彻底清查，严肃处理**

在 K 市公安局，见到的是刘副局长。他说徐局长在省厅开会，交给他处理此事。除了省市调查组成员，在场的还有治安支队的女队长。

**省调查组长：群众情绪很激动，执法确实有问题** 省调查组长王百姓处长先讲，他说，刘教授调查中发现问题，给省委省政府的报告主要反映了三件事：第一派出所执法中的问题；第二、艾滋病人的出路；第三、7.15 案件。

关于第一件事，前天市局到 B 镇派出所做了调查。昨天魏支队、小队督察我们一起进

村见了老百姓，群众情绪很激动，执法确实有问题，主要是没收货物、收缴的罚款、保证金的问题。第二件事，艾滋病人出路的问题，根据老百姓提出的建议，客观如实反映给政府协调解决。第三、7.15 案件，最后再跟刘局谈。

咱的干警，收没东西，不开单据。东西去向哪里？群众反映拉到炮厂变卖现金了。说销毁了，光用销毁照片说服不了群众，也绝对不可能。几百件炮（鞭炮）去烧毁不可能，县局也认为不可能。群众也指明拉到哪儿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收没权限是否合法？镇、县、市每级收没权限是有规定的，镇一级不得超过 50 元。（女支队问：有这个规定吗？王处答：有。）程序是否合法？第三、收钱，村民说“钱不违法”，哪条规定你一下收人家 6000 元？这问题如果我们解决不了，建议市局汇报到督查组弄清楚，给秦省长一个说法。群众情绪很激烈，屋里屋外都是人。我相信百分之八九十是真实情况，假的不可能那么多人坐在那里说。主要问题在于，生产时候不管不制止，拉出去时候截住罚没抓人，收缴罚款不写条。

要给艾滋病人出路，根据当地条件，群众意见，给他们生产自救的出路。公安机关可以提建设性意见，移交安检机关，由政府协调解决。刘教授也可以提出建议。于所长自己还要求在 B 镇干，这不是我能提的事，给老百姓也没法交代。

**市调查组长：令人震惊，想不到群众处境那么困难** 市调查组长魏支队很激动。他说，前天你（刘副局长）安排到 B 镇派出所调查。从卷宗上看，扣押清单，手续齐全，共有 4 卷，于安说还有一部分转在预审上。昨天进村，发现事情严重。令人震惊，想不到群众处境那么困难！现场调查共 27 人揭发问题，主要是炮被没收、罚款问题，另外还有 3 人反映生活困难、断药问题。我个人认为，要彻底调查。转交督查查证，派出所执法手续是否属实，私吞多少款项。现在有一个问题，非法生产炮竹是否应当打击？工作方法是否有缺欠？是执法人性化不够，还是执法违法？能否统一发证，分散经营？到村里调查，安检部门拽都拽不去！这事需要县政府协调解决，单靠公安恐怕不行。

**K 市公安局：派联合工作组进村，彻底清查，严肃处理** 刘副局长一直很严肃地听完调查汇报。说：刘教授的报告我看了两遍，很受启发很感动。刘教授搞社科研究深入调查，掌握一手资料，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调查过程中发现公安派出所问题，向政府反映真实情况，我看了很感动很感谢。当时就汇报给徐局长，提出建议，要针对执法违法问题逐条查处。不管问题大小，只要发现，依法处理。我是晚饭前看到报告，晚上签署意见，一早送交徐局长。徐局长发话，进驻村里逐户核实查办。听了调查情况，感到事情的确很严重。我的意见是：

第一、按照秦省长、徐局长、王处长的指示，加大力量，派得力干部，组成精干可靠的

联合工作组进村，逐案核实，客观公正、发动群众、澄清事实。过几天联合工作组就进村。

第二、政策界限问题。今年（2006）元月 21 日颁发“条例”对非法生产烟花爆竹要打击处罚，这是原则。但是处理过程中要讲执法严肃性与实践中的效果，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现在出现的是个人素质、水平、操作问题。为什么生产时不查，那样不是也减少群众损失？这是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就是该罚也有个上限下限，为什么都是顶格甚至是超规格罚款？特别是对艾滋病病人顶格处罚，这是为什么？这是人性化执法问题。打击是手段，目的是教育。这种做法没有体现出社会效果，没有替艾滋病人设身处地着想。不要说几千几万，多一分也要退回给群众！这事必须一查到底，该退的一律无条件退还，多收一分退一分，多收一万退一万！吃拿卡要，有一查一！别说对艾滋病病人弱势群体，就是对一般群众也不行！这是公安的败类，败坏了公安执法形象，性质非常恶劣！自己站到人民对立面了。群众还有不敢说出来的，还有什么要求，要让他们放开说，要彻底清查。这件事一定要严肃处理，如果有人在这个问题上犯糊涂，该处分就处分该法办就法办，绝不手软！在这个问题上谁都不要犯糊涂，是立场问题。

第三、至于 7.15 案件，只有听法院裁定。可向同级、上级反映情况。要求合法生产爆竹，现在这归安检局，公安部门管不了了。

调查组 and 市局领导观点一致旗帜鲜明的表态：严肃处理，一查到底。特别是市局，不仅态度明确而且措施具体：组成精干可靠的联合工作组进村，逐案核实，多收一分退一分，多收一万退一万！

这一切比我希望的还要好。我以为事情可以有一个圆满结果。

### 一夜之间风云突变

事毕，省厅调查组王百姓等回省城。我乘坐县局车返回村里，继续我的课题调研。王百姓对我一个人留下来不太放心，说不如一起回郑州。我说村里我很熟悉，没有问题。王处长说，既然一定要留下就要小心。拿出 100 元钱，说手机里多出 100 元话费，可能是于安干的，嘱咐转交给他。再看我的手机，也一样输进 100 元。于是 200 元用纸包了，请人转交于所长。

从市里回到村里，已是半下午。刚在村室坐定，于安电话请吃饭，谢绝了。的确没有时间。与卫华等谈了情况，大家都很高兴。于安却又来电话：银庄艾滋病病人闹事，打伤医生，头上骨头都露出来了，住进医院了。“你不是研究艾滋病吗？这跟你的课题有关，你快过来看看吧。”放下电话，派出所的车已经停在门口，小赵来“接”我。说，村里条件太差，所长让接刘教授到镇上住。拎起我的行包放进车里，径直来到派出所。

派出所所长室里坐着村里几个艾滋病病人，所长于安却坐等在小赵的户籍室。小赵拉着我到

户籍室，一见我于所长就说：上级领导一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王处长来村里，艾滋病啥要求都答应，把村子搞乱了。艾滋病人心理变态、贪得无厌、得寸进尺。感到有人撑腰了，到县里卫生局抢药，扔下借条，“他们都狡猾得很，抢了药还说是借的”，还打伤了医生。他们说要到北京上访告状，已经选好代表。我几年来治理打击艾滋病前功尽弃。现在我也不管了。也管不了了，也不得罪他们了，叫局里派人来管吧。县局说，必须严厉打击，这次该抓抓该拘留，已经定下来了。

我过去问几个艾滋病人。见是牛延东、栗松才、满囤和老点。他们说是在等待答复抗病毒药的问题，又断药了。问打伤医生的事，都说不知道。只是说，镇卫生院没有抗病毒药，让上县卫生局要。县卫生局王股长每人给2盒共8盒，分两次掏出来，说是先发给我们，要我们先打个条，以后再让萧峰补手续。正准备走时，萧峰来了，喝醉酒了，东倒西歪，拉着老点让滚回去，抓伤了老点的胳膊，两人撕扯起来，被在场的办公室人员拉开了。萧峰自己摔一跤，没见伤着，坐车走了。办公室的人都说萧峰不对，说人家来要药，你骂人家干啥？上班时间喝醉酒啥形象？

说话间老点数次出去接听手机，偶一回头却见他与于安在院里说话。老点回来问我，刘教授你说咋办？他们想断药搦死我们呢，我得上北京！

我说，你真要问我咋办，我说现在就回村去。刚才在市局，调查组也提出药的问题，领导也很重视。上级领导正在解决我们村的问题，没有去上访的理由。

老点说，前三天卫生院已经打电话说没有药了，要我们自己想办法，早就想上京告状了。为啥县里有药镇卫生院没有？我一定要上北京告状！

我感到这事蹊跷。却被小赵盯死脱不了身。只好对栗松才说，你们赶快回去告诉卫华，无论如何，现在村里不能出乱子。上级正在解决问题，要耐心等待。

于安“忙着”，并不跟我“谈”，却又让人盯牢我不让回村。在镇食堂吃晚饭时遇上新上任的张书记，之前并不认识，小赵作介绍。张书记说他刚到B镇，正在搞小城镇建设，新农村建设的一部分，“亮点”工程，上级要求一个月完成。“没办法，不理解也得执行。”这时，县卫生局顾局长、王股长、镇卫生院李院长一群人走过。只听于安一人喊：艾滋病抢药，你们不敢作证，今后有啥事不要找我，我不管了……！众人沉默。

当晚我被安排在派出所据说是小赵的房间住下，没有灯，摸黑躺下。我知道被软禁了。半夜醒来，前思后想，发生的事情在脑子里“过电影”。

天蒙蒙亮，看对面床上小赵还在睡着，悄悄起身离开派出所走回村子。路边一座小庙，据说有位老奶奶曾在这里跪了三天三夜，求神灵保佑她患了艾滋病的儿孙们平安。太阳渐渐



升起来了。这是一个初春的早晨。麦苗已经长高，麦田里的坟墓走进去才能看到，已不像在冬季光裸的田野里那么刺眼。村头矮房里住着的孤老太在打水，身后跟着她的小孙女。要开始早炊了。

村里人听说我回来了，都聚集过来，议论纷纷。说老点在村里煽风点火闹事，扬言要上北京上访，没有人听他的。卫华说：“昨天镇上找我长谈 40 分钟，问刘教授要调查啥；B 处打电话说，你来没有通过政府，不要让你进村，说省厅开会研究你和调查组的事，说你们把村搞乱了，弄得县委县政府不安宁，要我不要受人指使。我说，这么些年，你们没人替百姓说话，现在刘老师替我们说，如果真把刘老师赶走，村民们非上北京。”

……

一夜之间，事情发生这么大的逆转。我总以为其中有误会。还是希望沟通。

### **谁想把村里搞乱？**

卫华说，前几天新上任的镇党委书记想跟我见面谈谈。于是请卫华联系张书记，说很高兴跟他面谈。但是对方接了电话却说，“就说我不在。”又联系工作组组长 B 处，告诉他我在村里，希望等他来了或者我回郑州后，大家见个面，好好沟通一下。不想很快，却接到来自郑州单位的电话：省委组织部通知院人事处，要你立即回来，你把人家村里搞乱了，县里乡里压力很大，县委县政府很有意见，让你赶快回来！

这个时候，究竟谁想把村里搞乱？这才意识到事情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也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于是打电话给省调查组长王百姓。

电话里王百姓说：“B 处也给我打电话了，说，县委县政府对他施加压力，说是工作组让刘教授进村的，查问她到底是怎么进来的？说刘在村里，村庄已经大乱，艾滋病打人闹事，刘要带领村民到北京上访。我回答他说，相信刘老师的为人，只要她在村里就不会乱，不要听信有的人的谣言。刘老师作调查，到哪里是她的自由。一般人也有人身自由。怎么来的？她想到哪到哪，不用任何人批准。没有听说厅里开会的事。现在关键是村里无论如何不能乱，你要在村里稳定群众心态。”又说，“要有耐心等待市里再派调查组进村彻底解决问题。五一节前抓‘三逃’，突击任务，公安局都熬夜，五一又放长假，调查组进村时间可能往后延长，要有思想准备。”

单位又来电话，态度很强硬，不容丝毫辩解：组织部的命令，立即回来！

而我知道，这时我无论如何不能离开村庄，在这关键时刻，村庄不能乱。唯一的办法，关上手机，消失掉。

村室不便再住了。栗庄目标太大。于是村人带领我到滩头村外一处空房安身。“放心，

他谁也找不着你。”房东栗新臣说。这房子是他给儿子建的，儿子在外打工，一直没人住。房子在村边东头，孤零零一处小小院落，出门便是田野。真的“地下工作”了。接连两天，村里发生许多事情，倘若我不在现场，我无法相信。

第一、于安所说的被打伤的医生，是镇防疫站长萧峰。果然伤得很严重，头上缝了6针。打人者是老点。住在县医院的萧峰说，他与老点在县卫生局争吵之后，先坐车离开了，老点坐着高布袋儿子开的车，撵到高庄炮厂边上打的。“没想到他出手恁狠，上去封住眼！一下打眼上，当时眼前一黑就啥也看不见了。”都知道萧峰、老点关系不错，别人拿不到的药，老点能拿到，老点服用的抗病毒药总是当地最好的。萧峰很恼火，说非告他不行！但是事后有人做了工作，萧峰就没有告。萧峰住院半月，公家出的医药费。老点跟人说，于安没有多少路了，我一嘴就能把他咬出来！

第二、于安要县卫生局出面指控艾滋病病人抢药，没有人出面。就又找村医栗树东出面证明艾滋病到村卫生室抢药，“抢了药是为了带上到北京上访。”栗树东也不敢。说“这不又是做假证么？这回可不敢了，省里都来人了。”

第三、县公安局把我写给省委省政府的报告直接通给了于安。这当然是违反规定的。<sup>①</sup>于安公然拿着那份报告的复印件到处说，那个刘老师把政府、工作队都告了，第一是告乡里，第二工作队，第三派出所，把政府说得不是任啥。而实际上，报告主要反映当地派出所借查处非法生产烟花爆竹乱抓人罚款激化社会矛盾，很少涉及其他。村民说，于家18口人在县局，于安跟卢局长是“一条船”（连襟），卢局长跟老表们商量如何帮于安过关。

第四、于安公开对村民说，只要不“瞎掺和”，作炮开绿灯，我不再管你们了。谁告我我查谁，不告我的今后扶持，告我的没有好下场！邻村也想告派出所，整理了好多材料。派出所扣了他们一车炮，警告他们不要瞎掺和，这车炮要等事情过去了再做处理，如果没有瞎掺和就退还，如果瞎掺和就重罚。现在他们也不敢再告了。

第五、镇书记、镇长、县公安局都在打听刘老师在哪？说刘老师的课题省里已经取消了，安排村干部不要让她进村，“防止她搞反革命。”有人听到他们在镇上喝酒时说，要弄死她，一个车祸就解决了……。

那天天不亮，发现房东栗新臣睡在屋外门口。我说这么冷的天你怎么能睡在院子里？他说：“得照护着刘老师不能出事，他们啥事都能干出来。”又说，邻居运良一夜还起来照护两回哩！都不放心，说这些年没有人替咱百姓说话了，得保护好刘老师。

---

<sup>①</sup> 《信访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将信访人的检举、揭发材料及有关情况透露或者转给被检举、揭发的人员或者单位。

.....

乡亲们的情义令我感动。同时，心里也暗自诧异，怎么会是这样？

卫华们倒是好像很是见怪不怪。他们说，这几天老点闹事、煽动上访、打伤萧峰，都是派出所长指使他干的。省市调查组来那天下午，大约4点左右，老点打电话叫几个人一起去卫生局要抗病毒药。说他开车也不用花钱，几个人就跟着去了。到县局要了药，老点又说到村卫生室要药。说一人破上500块钱，要点药带上出去“逛五一”去哩。明摆是挑事闹事。于安拉政府、工作队当挡箭牌，挑拨刘老师调查组与政府工作队关系。想把村子搞乱，嫁祸于人，好证明这里没有他就会天下大乱。似乎分析得很透彻。

王百姓打来电话：看来情况比预料得复杂，斗争很激烈。你要小心，你可能会被他们拖进去。要与村里卫华他们沟通配合，联系市局徐局长，说明情况。抓紧取证，以村民名义直接写给“徐青天”，材料放在安全处藏好，防止他们搜身。集中对付一个人，“我们还想好心对他，他却这么干，还要诬陷我们！”王百姓说。我想到那天晚上在Q县宾馆里苦苦求情的派出所长，不知该做如何感想。

于是我打电话给徐局长，通报了几天情况。徐局长说，市局没有向他汇报，他昨晚4点才睡，统一行动抓“三逃”，手头还有个案子要处理。他会着市局派人直接给我联系，要我注意等电话。但是，市局没有人跟我联系。

几天后，我回到省城，将村民们的补充材料共52页送交省调查组长王百姓，请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 结果……

市局没有派联合工作组进村，当然就没有“彻底清查，严肃处理”，村民没有得到退赔，于安也没有调走。对于这种没有结果的结果，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没有人追问处理结果。开始还有村民惦记着那些罚款“该退的一定得退”，可最终也没有退。

但是银庄局势还是发生了明显变化。首先是派出所不再到村里抓人罚款。两名警员做了替罪羊：记大过，调离。没有正式宣布这一处理决定，“不能告诉村民，得维护公安干警的威信。”B镇书记说。其次，镇上态度似乎也有所松动，新上任的镇党委书记召集银庄老党员、村干部及村民代表开会。说：“刘老师给咱们办了不少好事，我没有见过她，但是我们通了两个小时的电话，讨论咱村里的事情。以后我还要再跟她坐在一起好好沟通沟通，研究咱村的事。”——当栗可顶告诉我这话时，我没有说我们从来没有通过电话。只是想，上任不久的镇党委书记假借我的名义，是为了尽快取得村民信任以便开展工作。我还把这谎言当作一个善意的友好的信号，以为我们真的可以沟通了，我也可以结束“地下工作”状态了。

而之后发生的事实表明，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良好愿望。

最意想不到的惊人变化是，银庄的鞭炮生产如火如荼。人们不再躲躲藏藏，而是大张旗鼓明目张胆。制作的成品半成品鞭炮，公然摆放在村委门前的大路上。大大小小的炮场遍布村里村外房前屋后，炮场上奔跑着玩耍的孩子。有人甚至就在床前配炸药，床上是正在输液的病人、床头坐着插炮捻的妻子（照片 54）。村主任说：“乡里把我叫去私下沟通了，说对咱村特殊照顾，平常做炮不查咱村，上级安全检查时搞好配合，只要不出事保证安全。这事交给我负责，签了安全协议书。”周边村庄的人知道银庄做炮不查，都到银庄来“打工”，人们成群结队夹着雨伞带着干粮到银庄炮场，女人插炮捻，男人摔炮饼子或是配炸药……（照片 55）

看来，村民不追究结果，矛盾双方能够相安无事和平共处，是在这里找到了“摆平”的平衡点：派出所对银庄网开一面，“做炮不管了，开绿灯！”我想到人们说的当年银庄开血站卖血的疯狂场面。

最终，在王百姓处长帮助下联系了专家为银庄村民讲安全生产课。但是他说最好要由乡里出面邀请，“便于理顺关系。”——跟基层政府打交道，王处长比我有经验。刚好当时县里正要求各乡镇开展安全教育活动，于是 B 镇张书记很乐意地接受了请专家讲课的建议，让安排在镇礼堂讲，“要镇上几个炮厂也来听听。”但是他说，银庄“糙家”多，不会来。我说怎么会呢？这是专门为他们请人讲课。书记说，除非你刘教授说话，他们听你的。果然，卫华说村里人不肯到镇上去听课。他们说，说好了到村里讲课，为什么又到镇里？他们担心又是“下套”，要抓人。我说：如果抓人，我们一起坐牢。外面人对我们有误解，我们为什么不去改变这种印象呢？这种集会的场合，我们不但要去，还应当整整齐齐漂漂亮亮地亮相。那天，陆续来到村委会门前集合的银庄村民，果然穿戴整齐，一向因为做炮而总是黑灰着的手脸也洗得干干净净。我不由又一次在心里赞叹：我们中原的男人和女人们，英武漂亮！我悄悄问卫华，你是怎么安排的？真行啊！卫华说，都说只要是刘老师说的，没错！我心头一热。B 镇政府院内大礼堂里，中间一条走道，左右两排长椅。左边坐银庄人，右边坐各炮厂的人。左边银庄座位坐得满满的，人们落座后很快安静下来，连孩子们都乖得出奇，听讲很认真，没有人中途退场。倒是右边各炮厂的人员，显得散漫不守规矩。看着银庄人一双双渴望求知的眼睛，我想，谁不珍惜自己的生命？（照片 56）

村主任栗卫华说：这回银庄又一次出名了，外边人都说，银庄做炮政府不管，还一人发一只羊！（爱德基金会救助银庄艾滋病家庭养羊项目）

**补记：**

有人告诉我，K市公安局刘副局长是上一届Q县公安局长。就是他把Q县警风带坏了，提拔靠花钱疏通关系。他在任几年，2000年以后局里没有进过正规学校毕业生，全是进的“关系人”。他在上海赌博一把输了2万块，说：“这算个啥，我回去调（调换，调动）几个所长就行了！”

于安原来就有案子在身。他在治安大队任副队长时，罚没人家制炮原料又转卖，却正好卖给了被罚的人。包装箱上都有记号，被认出来了。有证据，人家告发了。于安找领导说情，说他自己没责任，事是别人干的。领导放他自己去跑，去“摆平”。于安跑到外边3个月，怕抓他，当时就是要真查他事的。他花了20多万元“摆平”了。结果也是处理了手下另外两个人。

一年后，2008年5月18日一早可坤发来短信：刘老师，17号晚9点50左右栗现灵炮爆炸10多间房屋倒塌他死亡，全村所有房屋都有损坏，断电。

一直担心的事情还是在不断发生，而且情况一次比一次严重。立即打电话问可坤：

不是一直说查炮禁炮不让做了吗？

禁不住。前一阵抓两个，都是替栗金海做炮的外村人，栗金海俩口艾滋病。干警刘勇抓的，金海两口去跟刘勇开门市部的爹妈“拼哩！”他们带着4个孩子，3个女孩最大的9岁，最小的男孩怀里抱着，到人家门市部，金海对他孩子说，想吃啥，拿吧！抓的人昨天放出来了，关了大约十天半个月。

打电话告诉省调查组长王百姓，希望他能继续向上反映情况解决银庄问题。他说，反映有啥用？现在他们正气头上，春节时候K市刚出了事，项城炸死八九个……

那他们什么时候不生气呢？……你的意思是没办法了？

“我们有什么办法呢？让老百姓自己想法生存吧。”王百姓处长说。他已经没有了当初的信心。

无奈，又打电话给帮助过我的省信访局长。

局长说：怎么会是这样？你写材料，或者老百姓写材料，直接说明什么要求。

“什么要求，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写材料，还怎么写？……上次当面表态多好啊，可结果是那样。”我发现自己也已失去信心。“还有一个结果，就是把我盯死<sup>①</sup>了，严重干扰我的科研。”我又补充说。

“不会吧？艾滋病问题已经不封锁了，政府对他们很好了，修路、建学校……，做得很好了。当然还存在困难。如果是帮助政府解决问题，怎么提问题都不过分。但是少数学者总

---

<sup>①</sup> 从此，不断有安全局请我“喝咖啡”谈话，电话被监听。

觉得不满意，把问题弄到海外，给外国提供炮弹。你可不要像那个高耀洁……”他重复着以往的告诫。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的事情可以依靠别人，中国的事情只有依靠中国自己，只是希望自己的政府把事情做得更好一些。你有底层实践的经验，又了解上层为官之道，你说事情该怎么办效果才好？”我重复着以往的回答，又真心请教他。

“你写材料我还给你转。或者你把地址发给我，我派人直接下去了解情况。”真是负责任的好局长。

再打电话给栗可坤。不料栗可坤说：“既不要写材料，也不要再找人下来调查。如果那样对你很不利：当地政府恨你“横事”（惹是生非）；镇派出所正好趁机挑拨你跟政府的关系；老百姓也会恨你——恨你不让他挣钱，断了他的财路。”

……

“现在情况跟那时候不一样了！”看我不说话，栗可昆继续说：“都看见我去拍照了，还会怀疑是我捅出去了。连卫华也会不高兴，因为每一家都受到损害，村人议论很大，纷纷找卫华。卫华说‘不要说出去，弄不好我还得进去哩，签的有协议书<sup>①</sup>。’……情况也已经报告给派出所长，于安说，千万不要闹事。他是真怕了。”

不是都说不愿意做炮了吗？想其他生产门路不好吗？

做啥都没有做炮来钱快。表面说不做了，实际还是想做愿做。过去说有人为了钱不要脸了，现在是为了钱不要命了。

村里还有多少人做炮？

全村 100 多户，做炮的还有三四十户，都是“有威望的光棍茬子！”有的有艾滋病，有的没有艾滋病，都打艾滋病旗号。

要命的是，有了前面的经历，我不相信“派人下去”能够了解到真实情况。——情况太复杂了，谁也不能保证短时间内能够了解真实情况。我更担心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话语权的底层艾滋病人，很可能再被妖魔化一次。

也许王百姓说得对：让老百姓自己想法生存吧。

### 悖论怪圈

似乎一切都陷入了一个悖论的怪圈。如同计划生育一样，只有制造“超生”才有罚款的收益；必须非法生产烟花爆竹，才有查处中的创收。同样的逻辑，“稳定压倒一切”，在政治运作的各个层面变成了行政执法者创建政绩牟取利益的资源和筹码——只有制造“不稳定”，

<sup>①</sup> 为做鞭炮的事，镇党委政府跟村支书栗卫华签订“协议书”，要求村党支部村委会对村里安全负全部责任。

才能彰显职能部门作为“捍卫稳定”的工具的功能，完成经济的和政治的“寻租”。于是，事物走向反面，“稳定压倒一切”制造了“不稳定”，成了“最不稳定的因素”。

于安们妖魔化艾滋病人群，以种种口实加大“打击力度”，抓人罚款敛聚钱财创建政绩，不惜把人头打破“把村子搞乱”制造假相嫁祸于人，挑动事端制造种种“不稳定”，证明自己的“政治正确”。他们独霸话语权，为自己涂上意识形态的合法色彩：对上，借“维稳”之名，任意夸大不和谐、不稳定因素，欺蒙上级；对下，借“防乱”之名，把一般社会矛盾政治化，上纲上线，超常规地强化利用法治机制，阻止打压百姓正当的利益诉求，甚至肆无忌惮地执法犯法，欺压盘剥百姓。这种对社会公平和普通民众的伤害，对国家执政宗旨的践踏，对政府公信力的玷污，正在造成严重后果，激发生成新的社会矛盾的爆发点。就这样，打着“维护稳定”的旗号，体制自己制造反体制的力量。社会自己制造了反社会力量，变成一个被颠覆的社会。

买官卖官，行贿受贿之风更导致新一轮恶性循环。卖官自上而下，捞本自下而上。上层卖官积蓄资本买更大的官，下层买官变本加厉盘剥百姓。羊毛出在羊身上：以种种罪名处以罚款、拘留、批捕、判刑，这个过程拉得很长，“等着层层烧香送钱”——不花钱办不成事，成为官方民间上下一致的“共识”。最终的结果是，全民腐败，花钱也办不成事。——“恶政刁民”，极易“出事”，官民关系严重对立，基层矛盾白热化一触即发。且盘根错节，一旦东窗事发上上下下连带出一大群——引发更高层次的“不稳定”。矛盾重重内外交困，实则皆祸起萧墙。

## 五 一场被取消的学术报告

### 报告题目：用脚做田野，用心写文章——我的艾滋病课题研究

那次一回到院里，便被院长找去谈话。没有想到谈那么久。整整4个小时，话头一打开便无法收住。从给省委省政府的报告说起，到艾滋病村的现实情况、艾滋病人的生存处境、到我的田野工作经历、到省市调查组进村调查情况及其旗帜鲜明的表态、到一夜之间情况逆转有人制造事端我不能离开村庄的原因……。开始只是陈述事实，有问有答，后来彼此都有许多感慨。最后，院长说：“院里准备举办学术论坛，每两周一次。你能不能讲一次，把你对艾滋病课题的调查，做一次学术报告？”

怎么讲？把握一个什么样的度？问。

答：畅所欲言，放开讲！研究无禁区，只在我们学术圈子里讲。

这是我跟院领导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我当时体会到“沟通”的快乐。

我想，沟通，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是很重要的。人和人之间，特别是人心和人心之间，应当是共通的，许多隔膜屏障造成的不了解或者是误解，就是因为缺少沟通。

果然院里第一场学术报告会安排我来讲。科研处通知我的时候，我在村里。他们要我尽快赶回，拟定报告提纲。我提交的报告题目是：用脚做田野，用心写文章——我的艾滋病课题研究。待我赶回院里，报告会的海报已经张贴出来了。我跟院长谈了我准备报告的内容和形式：我的田野方法、河南农村艾滋病现状，以图片为主，不谈观点只谈事实。院长依然说，放开讲，学术研究无禁区。“没有限制，敞开讲，研究无禁区，学者要有自己的观点立场！”又说，准备邀请一些院外人士参加，问我希望邀请谁？我说，省委组织部。我最希望省委组织部来参加，更高级别的领导更好，如果可能的话。希望他们了解我究竟在做什么，希望把我的了解传达给他们，希望我的研究能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我希望沟通。院长又说，我个人还可以邀请一些我认为合适的学界同人参加，以扩大社科院学术论坛的影响。

科研处找我具体讨论报告内容。说是院里很重视这次论坛，想转变院里学风，有些人搞研究关起门不接触实际，有些人连门也不关直接从网上下载，还是一些专家……。“安排这次报告，就是要转变院里学术空气。以后要形成制度，每两周搞一次。”科研处要我尽快把讲稿拿出来，以便准备讲评。我的这次报告是不需要“讲稿”的，想了想，便把一篇已经在互联网上流传的研究报告《河南省艾滋病流行特点、社会影响及相关政策效应研究》交给了科研处。那是我提交给全国社会学年会的一篇论文，后来不知怎么被放在了网上，有人告诉我的时候，早已经流传开了。交给科研处的时候，我特意告诉，这不是“讲稿”，只是请讲评者先感知一下河南艾滋病的基本情况，以图片为主的课件，随后送上。既然院里这么重视这次学术报告，我要认真准备，在90分钟的报告时间内，传达出尽可能多的信息。

### **我知道的比你多，但是敏感问题，不能说**

开讲的前一天，科研处又找我讨论报告内容，我带上准备好的课件到科研处。处长说，我在下面2年哩，知道的比你多。（处长曾作为河南省“三个代表”工作队在河南南部一个县驻村，兼职副县长。）我知道光是城关俩村，艾滋病就多得很。谁都知道，但是敏感问题，不能说。艾滋病的家庭成本肯定比社会成本高。（问：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艾滋病治病主要还是靠自己，最后倾家荡产，社会（当指政府救助）付出还是少部分。你说的都是真的，河南艾滋病起源于血浆经济，但是不能这么说。你去采访一下就走了，我们下去，马那比……，他给你倒杯水你喝不喝？当然后来听人说喝水不传染。我们下去发被子，进到村里，小媳妇在你身上摸一把，几天恶心得吃不下饭。捞住县委书记的手，你握不握？你是肯定不会在村里待，采访了就走了，不挨他们。你不知道，艾滋病人又可怜又可恨。当然主要还是可怜。



发给他们的药不吃都卖了。艾滋病人卖药，你不知道吧？马那比，爹妈都是艾滋病，闺女还嫁人，不是哄哩（骗人、欺骗）是咋？得了艾滋病还出来打工，搞装修，给你家装修你都不知道，不是害人哩？！……这位“在下面2年”的科研处长对“下面社会”的认知和对艾滋病的无知令我惊讶。

处长只顾自己一路说下去，不容他人插言。然后对我说：刘老师，你看报告内容咋改改？

我说，我已经准备好了课件，我们先看看再说？

处长并不听我的，继续侃下去：我知道的比你清楚，但是不管说。我在的县，有一两千艾滋病，只报500，剩下的不管了。高露洁（当指高耀洁）说实话遭打压。政府修路、建学校、解决水问题，派几十人下去跟他们同吃同住。政府投入很大，当然这都是前期隐瞒付出的代价。那个高露洁，就很遭人恨。当然有人恨有人不恨。要说她给老百姓办好事了，救了很多，少数人恨多数人，当官的恨老百姓不恨……。

### 换个题目，讲南街村吧

处长突然话锋一转，说，南街村不是咱俩一块改的稿子，后来就通过了？（我笑说，那是你自己改的，不是咱俩。）<sup>①</sup>处长说，不改就考虑取消论坛，要顾及大局，如果你不改，我得跟院长说说取消还是延期。……海报都贴出去了，顾及影响还是要讲一讲吧。要不然你讲讲南街吧！题目不用改副标题改改。《南街社会》书都出版了，证明没有问题了。

我又说，先看看我的课件再说？只看事实，不讲观点。请相信我，尽管院长说我们学术界内部，放开讲，没有禁区，但是我还是有分寸的。我一向的原则：不讲假话，只讲真话；真话可以不讲，假话一句不讲。

但是处长还是不看我的课件。他说，要讲就讲南街村。

我拒绝了：南街村没有做准备，怎么讲呢？要讲以后可以讲。现在要讲就是艾滋病。

处长说：你先不要走开。讲与不讲，如何讲，听候领导研究的结果。

从科研处出来，发现贴在门口的海报已经不见了。我便知道已经有了结果。

直到过了下班时间，科研处长才找我。说：刘老师，不要再搞艾滋病了，换个题目，到我那个县去咱们合作搞研究，提供食宿。我笑望着他，没有说话。我以前是找他说过，想到他任职的县做一些调查，但一直未能成行。处长言归正传：院领导研究决定，这是论坛第一次报告会，要讲主旋律。换别人讲，你以后再讲。好不好？

我笑说：好。

---

<sup>①</sup>南街村研究是我完成的另一项国家课题，出版《南街社会》。当时在河南也属“敏感课题”，结项报告递交国家规划办之前被省委宣传部再三审查，科研处长连夜赶到我家里追索原稿，要求我修改。我说，你看哪里不合适删去就是了。凡他指出不当之处要我修改，我都说：“删去。”

他说，这是你自己同意的啊！

我依然笑说：我可以不同意吗？

那一年，当Q县的县委书记升任副市长走马上任时，我们单位从处所长中提拔的唯一一名副厅级干部，是这位科研处长。

### **“你是资深学者，要注意影响”**

如果不是研究所所长告诉，我还不知道那次院里派去银庄“接我”的就是他，还搞不清事情的缘由。所长说，省委组织部两次电话院里，第一次通知院人事处，第二次直接下命令赶快把人领回来！那不是县乡基层的意思，是K市组织部的意思。我还跑去村里一趟接你，和人事处的人一起。当地组织部门反映，说你要领着村民去北京上访！他们最害怕不稳定。镇里书记镇长都不跟我们进村，说肯定找不着你，看出来镇上与群众很对立。当地政府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到处都是这样。现在艾滋病人犯罪是个大问题，他们就是报复社会，不要被他们利用。你是资深学者，要注意影响，不然我们院里也没法支持你。你的调查还没有搞完吗？要搞到什么时候？不要再惹麻烦。河南七君子的事你知道吗？省里点名批评了，要影响改变国家政策呢！幸亏跟咱院没有关系。一出事，省里马上找社科院书记谈话。书记很紧张，首先想到你。院领导开会，分析你做事的性格，……就担心从你这里出问题。省里说了，“十七大”前一定要保持稳定，不能出任何乱子！你最近跟村里接触注意点，最好不要接触！书记开处所长会专门说到这件事。你只顾自己我行我素，再这样下去对你很不利，影响很不好！这一年多你没有搞科研，这次论坛，你的学术分量不够，搞研究不见得光说凄惨吧？你更多的关注艾滋病人的生存，而不是研究了。领导认为不适合在学术会议上讲。

“什么是研究？研究该怎么搞？”诚心诚意问他。

“人家说你在村里又开会又拍照取证。”答非所问。

“那是我的研究方法啊，有什么问题吗？”

“你改变不了现实，谁也改变不了。不要对政府有批判攻击。”

“怎么是攻击政府？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不是院里倡导的学风吗？”我真的给搞糊涂了。

所长突然很生气：“总之，以后你少参与这些事，我是很烦这种除了学术之外的事！哪个领导也不喜欢这种事！现在谁愿意多事啊！不要参与进去，你没有能力改变世界。谁也不是救世主，没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光你的事给院里所里找了多少麻烦！”

这位所长比较年轻，刚刚上任不久，原本大家相处不错。他态度的陡然转变，让我意外。突然感到很累。待他发作完毕，才慢慢递过一句话：我一直以为我们是以诚相处的……。他大约也感到有些过分了，缓和道：我不会像有些人圆滑，我是有啥说啥。其实我一直很尊重

你的，你优点很多，缺点也很突出，优点缺点都很突出……

“优点不必说了，缺点说来听听？”我说。

缺点嘛，就是太投入，顾及社会问题太少。（不懂所云，也许是说我不懂政治？）要更多把握住科研，不要管研究之外的事情。

“什么是研究之外的事情？”再真心实意地问。

“可是你现在的文章格调太灰暗……”又是答非所问。

“其实艾滋病村庄也并非没有希望，只是人们对艾滋病和艾滋病人群了解太少。”我说。

“艾滋病本身就是悲剧，光明不可能。”他说。

知道左右不是，便不再说话。沉默听他讲：“你研究南街村的方法就很好嘛，学术界评价很高。上次学术会上崔大华<sup>①</sup>老师对《南街社会》评价很高。国家课题审查通过，也出版了，证明没有政治问题。院里5个一等奖，崔老师等都推荐你。我们小组力争，说出版两年了不也没发现什么问题？还有一个是书记的。但是大组评选有人说当时被宣传部审查过，票数就没有书记的高，评了二等。你的话很对，社科研究要客观求实，要有对社会的敏感。你应当继承南街研究的传统。你的南街村就做得不错嘛，希望在所里给年轻人带个好头做个榜样……。”

面对这么一个新任所长，我保持无言的和颜悦色。感谢他的直爽不圆滑。这本总是被拿来做比较的《南街社会》，也并非像他们说的那么“好”。他们也未必真的认为它“好”。说它“好”，只是为了证明我现在做艾滋病的“不好”。证明《南街社会》“好”的根据，就是它“审查通过了，也出版了。”学术品格的优劣没有学术界自身标准，而只凭非学术部门的认定。这是学术界的悲哀。我的关于南街村的研究，当初也遭人非议，能够争取到国家课题的立项，能够出版，对于我所在的河南省和河南社科院都是意外。出版的当年，科研处要我申报省级科技进步奖。说是院长的意思，原本也是好意。结果评奖结果下来，院里不少人获奖，长长一串名单，包括一些一般性调研文章，都是二等奖，《南街社会》名列最后，是唯一的一个三等奖，没有一等奖。科研处的人很不好意思。说，对不起啊，还不如不要你申报呢！我倒无所谓。我对这些年的各种评奖没有兴趣，那一次更是感到很滑稽。其实院里除了令人尊敬的崔老师，至今也未必有人认真读过这本书。我自己心里有数，实事求是地讲，它并非尽如人意，只是因为它的真实，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其实出版后的《南街社会》也引起多方争议和批评，包括我永远难以释怀的南街村。惟可欣慰的是，这是一部用“心”完成的著作，我以我真实的文字存留了一个真实的村庄个案版本，一段变革时代极具

---

<sup>①</sup>崔大华，河南省社科院资深研究员，哲学界知名学者。

中国特色的乡村历史；我一直认为，南街村的意义和价值并不在于闹热一时的风云风光，也绝不会因“炒作”的结束而结束。从这个意义上，我以我真实的文字使这个村庄不朽，并以此回报南街村。

而现在，对于河南艾滋病村庄的观察研究，使我感到自己比做南街的时候更加触到了社会的深处。我沉到了社会最底层，探到了社会的底，社会底层故事也更加触动我心。我自信，这本关于艾滋病事件的著作，应当比南街村写得好一些。

### 国务院检查组来了

**工作队长的电话** 2007年1月末，临近春节的一天，接到驻村工作队队长C处的电话：“刘教授最近好吗？忙什么呢？我们还是要多多联系啊，大家都很敬佩你！”听上去很热情。自从C处表示不方便与我接触，我们就没有再联系过。现在接到他的电话我还是很高兴。听他说过两天要到银庄去，我说我也正要到村里去，我们可以同行，一路上好好聊聊。他说好啊，到时候电话联系。两天之后，C处没有给我电话，我按计划独自来到村里。第二天村支书栗卫华告诉我，工作队要召开艾滋病座谈会，C处、镇党委书记都问我是不是在村里，说是请我也参加。当时我还奇怪，原来C处也已经来到村里，怎么没有联系我同行呢？很久以后——准确地说，直到现在，在我整理我的田野手记的时候，前后发生的事情串联在一起，我才恍然大悟，我就是这样被“盯着”的。

当时我只是想，既然镇领导和省工作队邀请，我当然要参加，我一直很注意维护我们之间的关系，我把邀请看作友好的表示。那天我先去看望了病重的栗铁印，到场时会议已经开始，工作队队长C处正在讲话。坐在后排的村民看见我，亲热地笑着，递过来一个凳子，我便坐在最后的门边听讲。这时候，在场的百姓群众并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两天之后，2007年2月1日，将会有国务院检查组到银庄检查工作。召开这次会议，就是为了预防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时“出事”，“一定要确保稳定。”<sup>①</sup>

C处讲完话，镇党委张书记接着讲话。C处稍稍听了一会，便离开了会场。出门时看见坐在门边的我，显然有些意外，解释道：“昨天是厅里有人跟我一块来，不方便给你打电话，希望你能理解。”我笑答：当然理解。心下思忖，原来还是“不方便”与我接触。

台上B镇党委书记继续讲话。说到银庄今后的出路时，站在一边的村支书栗卫华拿出一些编织样品，说村里几个女孩子正在上海学习编织，下一步村里要发展工艺品编织搞生产自救。张书记接口道：这个工艺品好。却又话锋一转：那个红丝带就有问题！……你们从红丝带问题要接受教训！一个看大门的，说是市委秘书长，实际上只是保卫科长，让县委出证明，

<sup>①</sup> 关于这次座谈会，详见第三章之四。

是不可能的，不符合法律程序！那些红丝带，县委压到乡里，要求既不能上访，也不能出事，要乡里自己消化，乡里只好全收，34000元钱，要求干部都戴上……。镇上给的3万多红丝带的钱，是对全村艾滋病人的关爱，钱已经到位，给你们村主任了。卫华，你发下去没有？春节前要落实到艾滋病每家每户！卫华傻了。

这时，会场一下乱了。因为参与编织红丝带的，只是栗庄、滩头村两个自然村少数艾滋病感染者，初衷是尝试着开展生产自救；而此时参加会议的是4个自然村的全体艾滋病病人，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这件事。这时矛头都对准了栗卫华，以为他贪污了镇领导对大家的关爱。

**镇党委书记发难：我代表一级党委政府，你代表谁？** 这时我只好站起来帮助卫华，我说，大家能不能安静一下，请村主任给大家解释清楚？卫华刚要开口，张书记却突然对我发难：刘老师你究竟卖了多少红丝带，得了多少钱，是不是给大家一个交代？我听出了语气中明显的恶意，但不敢也不愿意相信。我耐下心慢慢说，红丝带的事情，您张书记一开始不就是支持的吗？情况您都清楚的呀。我想努力维持与当地政府的关系，也尽量理解基层工作的为难之处。自从进入B镇，我一直尽己所能，帮助当地做一些事情，包括争取社会捐助、邀请专家讲安全生产课、争取基金会生产自救项目，而且尽量做到为当地政府“贴金”。就在前不久，由于我的牵线搭桥，爱德基金会捐助B镇12万元养殖项目款交接仪式刚刚举行，B镇党委政府功劳簿上又添了一项政绩。甚至他们借这项养羊项目“消化”几年前就应当用于银庄百姓生产自救的蔬菜大棚项目款，我也尽可能理解为基层财政困难，没有做声。所以一直以来，关系相处还算可以。不想此时张书记却突然翻脸，说道：我代表一级党委政府，你代表谁？你没有资格跟我说话！张书记的态度，使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会场一下静了下来。这时我才意识到这种匪夷所思的不讲道理并非偶然，从一开始就是有意挑衅。于是打消了解释沟通的一厢情愿。我依然慢慢说道：我只代表我自己。在场的任何个人都有资格与您这位一级党委政府的代表说话，套用您的话说，这“符合法律程序”。书记大约也感到自己言语失当，尴尬地似笑非笑地望着我。那情境实在荒唐可笑。这使我想到了B镇关于红丝带写给县市政府的邀功“报告”和写给社科院的告状“说明”，同样的出尔反尔荒唐可笑。于是我也笑着走近这位镇党委书记，他果然把耳朵伸过来，我悄悄对他耳语：“你这一套对我不灵。”有点恶作剧。然后转身扬长而去，任凭他在背后气急败坏恼羞成怒大喊大叫……。只听村民纷纷指责这位书记：你们还是政府哩，不是来解决问题，是来“横事”（当地方言“挑事”）哩！

此时我看清楚了：如果能够给他们带来好处，他们立即贪天之功，无论政绩还是物质利益；稍有不利，随时准备出卖我。B镇张书记眼中的红丝带、邀请专家讲安全课、联系社会

捐赠、爱德基金项目，包括我正在做的国家课题，都是如此。难道，这就是我的处境，我与地方官员的关系？

我理解了高耀洁的绝望和怀疑一切。

我想，这次怕是又要生是非。

**人事处长电话：立即回来！** “希望家园”建成后，这里也成了我在村里的落脚之地。午饭后，孩子们上学去了，院子里很安静。我正约了几位村民来做访谈，我的手机响了。社科院人事处来电话：立即回来！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反应”这么快，我没有想到。后来才知道，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给我两天时间，两天之后一定回。我晕车，来一趟不易，总不能白跑一趟吧？做一些补充调查就回去。”我说。

“不行，马上回来！”

“我现在走不了，没法走。”这是真的。在场的村民都说，要走，我们跟刘老师一起走。而我并不想事态扩大激化矛盾。

“院里开会刚强调纪律，你不打招呼就去了，这是违犯纪律。”电话里很有些威胁的味道。

“我做国家课题调研，名正言顺。”不卑不亢回过去。

“回来吧，这回还是组织部的命令，说无论如何要你回来。刘老师你别让我为难，你不回来我完不成任务。”看我态度强硬，对方口气反倒软了下来。

“我实在没法回去。你也不希望‘闹事’吧？给我两天时间，只两天，相信我会处理好，事态缓和一些，我就回去，好不好？”我以为就是与镇党委书记那点事。

“不行，你必须立即回来，你不回来，院里派车接你回来！”

“派吧。”

我想院里来人看看实际情况也好，省得像上次那样听信谣言。关上手机。

**村民：这回一定得给你“扳平”！** 栗可昆说：刘老师，这回一定得给你扳平！栗可昆一向处事谨慎温和，他这么说时，我并没有在意。不一会儿，院子里聚集了很多人，村民说有人要把刘老师“赶走”，群情激愤。有人说，为啥叫刘老师走？谁说刘老师不好谁坏良心！有人说，冤枉好人的事多了，毛主席那么好，还有人说他不好哩！有人说，咱不能叫冤枉刘老师，咱跟刘老师一起上省里证明刘老师是好人！平素几个“管闲事”的主事人，一本正经聚在屋里“开小会”，商量对策。我顾不了许多，抓紧时间继续已经开始的座谈会，想

在走之前完成对“7.15 事件”当事人的访谈。栗可昆已经学会了使用录像机，这时帮助我做录像。就这样闹闹热热，一下午很快就过去了。直到天黑，我才劝散了大家。栗可昆也说，天黑了，今天不会来接刘老师了，都回家吃饭吧。

人们刚走，村支书栗卫华打来电话，说社科院的车到了村里。几乎同时村室广播响了，柳桂枝的声音：刘老师走哩，都到村室来送刘老师！刘老师走哩，都到村室送刘老师！接着有人跑来说：村民把汽车堵到村室院里了，掀翻它吧？我大吃一惊，赶忙说：那是我们单位来接我的车，为什么要掀翻？这时院人事处派来“接我”的H也给我电话了，问刘老师在哪里？我便请栗可昆接他们过来，吃了晚饭一起走，同来的还有我们研究所的一个年轻人小X。那天晚饭很丰盛，栗可昆的妻子小董专门炒了好几个菜为我送行。饭后，早已等在院门外的村民围着不让走，人们七嘴八舌吵吵嚷嚷。这种场面使所里来的年轻人小X激动得满脸通红。而人事处的H一脸冷漠。她竟然拉着我说：你这样对你可不好！

“你这话什么意思？听你这活，我还真不能跟你回去了呢！”我说。

“不是那个意思……”她吞吐道。

“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再问。

“没有意思……”她愈加狼狈吞吞吐吐。

我不再追问，只管分开人群走出院门，装傻充愣，边走边向她介绍村里情况。走上大路，我说这是新修的道路，“六个一工程”之一，咱们要去的村室，也属“六个一工程”。她不懂，问“什么六个一工程？”于是向她解释什么是“六个一工程”，向这位社会科学院的人事干部宣传普及党和国家的艾滋病救助政策。刚走出不远，又一群村民涌来了，老太太们上来搂着抱着我不让走。抱得最紧的是亚东奶奶。她大声喊着，刘老师是好人！刘老师救了俺俩小孙子，不是刘老师俺的孙子活不成！她的孙子亚东在希望家园，她把功劳记在了我头上。有人悄悄在我耳边说，不要走，咱的人找的两辆大巴车马上就到！

正嚷嚷得不可开交，工作队长C处出现了。C处人高马大，有的村民不认识他，见他向我挤过来，以为他“找事”，说打他！我赶忙制止说，不能乱来，那是咱村工作队长，为咱村做了很多好事。C处来到我跟前，低声跟我说：有些情况，我们到高速路口再好好谈……。然后高声吆喝：请大家让开一条路送刘教授走，你们不懂，这是组织决定，你们这样做对刘教授不好，对我也不好。请大家信任我，我保证年前一定还请刘教授过来。我警车为刘教授开道，代表大家送刘教授到高速路口……。

就这样，人们一路簇拥着来到村室。村室大院门口聚集着更多村民，正围着司机诉说“刘老师是好人”，他们把他当成了上级领导。H说，太冷，请刘老师先上车休息吧？众人拉着

不让上车，又有人悄声跟我说，刘老师再等等再等等。我知道他们在等大巴车，要跟我一起上郑州“扳平”。我并不想事情闹大，我不想有任何的节外生枝，我只想完成我的课题研究，于是上车。C处果然开了公安厅的警车在前面开道，他一边按喇叭一边伸出头在车窗外，大声喊着重复先前的话：请大家让开一条路送刘教授走……。终于，大家让开了一条路，但是并不散去，而是簇拥着我乘坐的车辆一路慢慢行驶，穿过整个银庄又穿过B镇集市。4个村庄数百号人浩浩荡荡，只听得咚咚脚步声没有人说话，引得镇上居民都出来观看。前面警车在镇中心十字路口停下，C处下车再次劝众人回去：县委书记也没有这么风光过，将来我走时候你们能这样送我吗？刘教授好不好，群众的态度就是最好的评价！我会如实向上级汇报，请大家放心回去，我保证过年时候把刘教授再请回来……。

我知道很多人还没有吃晚饭，也请乡亲们回去。人们争相把手按在车窗玻璃上，我也隔了玻璃把手按上去回应大家。“请刘老师下车再跟我们说说话！”后边人群喊道。H赶紧拉着我生怕又出什么意外。我想了想，还是开门走下车来，望着黑压压的人群，内心充满感动。没有说话，只是给乡亲们深深鞠躬。所有人都安静下来。我上车，说走吧。坐进车里，好像在做梦。一切是那么不真实，就像电影中的场面，一出没有导演的戏剧……。

行至高速路口，下车与送行的C处告别。C处握着我的手说：刘教授，作为私人关系，我们是朋友，我敬佩你。不过这是上面决定，请刘教授理解。年前我一定让镇里把你再请来一次……。

我上车后，人事处H和C处在路边又一阵嘀咕。我已经见惯了这种当面的“背着说”。

一路晕车，更像做梦，极不舒服的梦。半路接到一位郑州朋友的电话，问刘老师到了没？我便知道是栗可昆不放心，给了他电话。接了电话，再也无法控制晕车反应。司机把车开向路边，我未及停稳便冲下车喷射出去，仿佛苦胆都要吐出来了，满眼金星天旋地转。

再上车时听到H正跟院领导通电话，说是“人接到了，正在路上。”关了手机，H跟我说，你回去后一定每天给村里人打电话，他们说一天没有刘老师电话他们就到郑州来……。

回到家里已是半夜，昏昏沉沉倒头便睡，一觉天亮。很久没有这样好睡过了。（田野手记 20070130）

**省委组织部下死命令：无论如何一定要把你弄回来** 一早醒来接到可昆电话，说村民们都要来，“要杀头猪、带点粉条子到郑州和刘老师一起过年。”我说这里一切都好，千万别来。接着是卫华的电话，说是“村委会和老党员一起开会研究的意见，一定要派人去看望刘老师。不派年轻的省得惹事，派两个年长的会说话的老党员，到你单位给你送块匾，向领导反映真实情况，说说你做的好事，证明你是好人。”我说谁都不要来，领导知道我是好人。



我不愿事情复杂化。放下电话，洗澡，整理自己。然后到院里去。迎面碰上那位昨夜跟车上H通电话的院领导，互相点头招呼，他竟然一句解释都没有，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来到院里，有人悄声告诉我：知道为啥接你回来吗？国务院检查组要去，怕你乱说。是省委组织部下死命令，无论如何一定要把你弄回来。才知道，院里一定要“接我”回来，并不是因为镇党委书记发难，也不是因为我“违犯院里规定的纪律”。（20070131）

### 国务院来人之后

20070201 周四

尽管电话中再三说不要村里来人，栗可昆还是来了。他说：“村里派我当代表。原来老支书栗可栋和栗可顶要来，我说我去过刘老师家，我先来看看情况。都说不来看看不放心，怕刘老师‘出事’。”坐定后，栗可昆告诉我离开村子之后发生的情况。说C处找他谈话了，说刘老师是好人，怪张书记不会办事，“想不到我刚离开会场一会，就出那么大的纰漏！”说过年一定要镇里把刘老师请回来；张书记很后悔，后悔得“眼里都噙着泪”，说不该那样对待刘教授；民政所鲁所长又一次托人说情，要找刘教授解释，到社科院告状不是他的主意。等等。

晚上10点多了，村支书栗卫华来电话：“下午国务院来人了。”果然国务院去了检查组。我没有想到的是，国务院检查组竟然进了银庄村。电话中卫华说——

村里村外撒了好些岗，也不通知我，这两天我心情不好，在家睡觉不知道。上级直接进的村卫生室（我想起上次市卫生局官员“陪同”我进村的戏剧场面）。云良在输水，问低保，说发到8月里，问药的问题，政策落实了没有。乡里书记镇长、县卫生局长都跟着。村民也不知道咋回事，是啥人，都不敢说啥。怕栗新臣乱说，给（把）他支到大滩李去了。来人要找栗中祥，说是在互联网上知道的栗中祥。栗树东领着找的栗中祥，满囤跟着，栗中祥也不敢说啥……。

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观察研究国家—地方政府—民间关系的典型故事典型个案。虽然我被“弄回来”不能“亲历”故事过程令人遗憾，但是从学术研究现场观察的角度来讲，我的“不在场”有不在场的好处，它可以使故事处于“平常自然”的状态，不会因为我这样一个“外人”的在场打破“常态”而变得“特殊异常”。当然，如果有我“在场”，也会发生故事，那故事也同样是有意义的，但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我的“不在场”本身，其实也是现场故事的一个“现场情节”。

无论如何，我不愿意放弃对这样一个难得遭遇的典型个案——尽管是“事后”的——观察记录的机会。这种“事后”，是故事文本的继续演进。这样的好故事，不能放过。当即决

定，明天进村。

20070202 周五

今天是星期五。之后的两天周六、周日双休日，当属于我自由支配的时间，谁也管不着，不用跟任何人请假打招呼。半下午快下班时才出发——为了避免节外生枝，我不想“违反纪律”授人以口实。好在有来看望我的栗可昆同行。栗可昆路熟，带着我转乘两趟公交车，黄昏时分来到郑州高速路口，搭乘上一辆过路长途车，到达Q县天已黑透。下长途车又上一辆小三轮，悄悄进村。

村里卫华几人已经在等我们，在“希望家园”我们谈到凌晨1时。听到有人说：“国务院来人，先是说十二号（农历，公历2007年1月30日）要来，结果十四号（农历，公历2007年2月1日）才来。村里前一两天办的单亲（救助）证，也不要火化证了。”心里不由一动：1月30日，正是我在村里被“接回”院里的那一天！总不至于因为我一个小小人物在村里而改变国务院检查组的行程计划吧？但是很清楚的是，村里事先已经得知国务院来人的消息，回想工作队长在艾滋病人座谈会上的讲话，“上级要来人”的意思也明明白白。只怪我太迟钝，太缺少政治的敏锐。那几天B镇政府突然要求银庄村干部们突击填发低保户名单和孤儿救助证，栗卫华等几个村干部为了填写这些表格证件，连轴转忙了几天几夜。作为一村之长的栗卫华，肯定是得到了确切消息和指令，但是他没有告诉我。而他对我曾经是无话不谈有事必报。这时，卫华才跟我说，参加武汉会议回来，他便被找去谈话受到警告：“你是党员，怎么连非政府会议都敢参加？！进去（进监狱）都不知道咋进去的！”那时他刚被批准入党，刚由村主任升任村支书。才意识到，从那时起，栗卫华，作为一名中国社会行政层级最末端的小小村官，便被“嵌住”了。但是，毕竟，事后他还是打电话告诉我：“下午国务院来人了，也不通知我。”特意强调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他不能告诉我做“辩解”。也才明白为什么他说“这两天我心情不好……”

你现在心情如何？问他。卫华笑了，很不好意思。

众人说，不管咋样吧，这上头来人还是对老百姓有好处，要不然这些救助的钱还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发到群众手里……。

20070203 周六

一早，我刚起床，亚东奶奶来了。进门就说：听亚东说刘奶奶来了，喜欢的啥样，家里门都没关就来看你了！你走那天都哭哩啥样，半夜睡不着，年都过不成，这你来了就好啦！俩孩子没人管了，要不是你……。

我知道老人言辞间的夸张，我也懂得老人希望表达的一番情意。亚东10岁，是“希望

家园”收养的孤儿，他的父亲 2003 年死于艾滋病，母亲“走了”，撇下亚东和他的弟弟，还有年迈的奶奶。实际上，名额有限，“希望家园”只收养了他们两弟兄中的一人，亚东的弟弟寄养在他的姑姑家。

这天天气很好，虽是冬季，太阳照得院子里很温暖。周六，村小学不上课，栗可昆带领“希望家园”的 30 多名孩子去参观县城动物园，据说那里新近来了大象。栗可昆说，这是早就答应过孩子们的，“说话要算数。”这些孩子从来没有到过动物园，更没有见过大象，所以很兴奋。栗可昆带领孩子们走后，几位当事人陆续到场，我们在院子里的访谈会也开始了。

云良说：头天都说好了，要我在村卫生所输水。来几个上级领导，镇上张书记几个陪着。他们问我低保发放情况，我不知道啥是低保。张书记说就是那 180 元，咋会不知道？我说那领到了。头一天才发手里，咋会忘记哩？又问服用抗病毒药没有？我服用用了。还问收入靠啥？我说靠种地。别的也没再问啥，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干啥哩，也没敢再说啥。

栗中祥：北京国务院来了人，下午三、四点的时候，他们来了，说专意找我哩。我说不认识你啊，他说从网上查的。他们问我的家庭情况，几个孩子，都在哪儿？问有啥要求没？还问大滩李（栗中祥是该村卫生室村医）有多少人？多少人感染？卫生室有多少房子？还问了病号的情况。大滩李感染的不多，一共就 53 个人感染，全村总共有三千多口人。我说有一百多种药，抗病毒药都用着哩。比以前好多了，死的人数少了，下降了。最后俺说能不能让俺们这些村医生都享受财政工资？人家说，你们这都是半财政了。我说完，张书记领着去大滩李诊所去了。我琢磨着，他们跟你差不多，也是搞社会调查的。其中一人姓陈。人家说话可好，平易近人。三十来岁，都是年轻人。没坐车，走着往大滩李去了，一点架子也没有。萧峰院长，郑局长，顾局长都跟着哩，我还能咋说？谁知道他们是弄啥的哩？当时好几个人在场，满囤、老六、栗可峰，B 镇卫生院会计王晓夏，栗树东，都在。你说啥，旁边都有做笔录的。他们从北京来的，肯定是跟当地政府联系好的。国家的钱也有数，抗病毒药，咱这还供应，有的地方都不供应，咱还能再说啥不满意？人多，也没敢跟人家要名片。后来他们又去了栗长山家，跟去不少人，有派出所两人跟着。

栗长山：来了 3 个人，都 30 多岁，看着也是不当家的。他们问我家庭收入。我说：没法劳动，有啥收入？CD4 剩百十个，发烧。全家 7 口人，3 个艾滋病。孩子上学，还有一个小的孩子艾滋病，老娘七八十岁了，房子漏雨。问有啥要求？我说：房子能不能盖起来？早就要求，没人答复。问老人为啥不住养老院？我回答说，不让去么，我这不还活着么？问有多少土地？我回答：7 口人 4 亩地，不够吃。满囤说咋会不够吃？我说麦已经没有了，过明儿就找书记镇长去哩。小孩子一发烧就只有输蛋白，一支 160 元，一次 2 支，平均每月输一

支，不输要死人。200斤麦不抵一支蛋白，粮食换药了。我屋里没任啥，搭个棚子为养羊的，也没有羊。他们拍拍照，也没说啥。派出所马中峰放风，一会儿给政府打一回电话，报告说：“没啥事。”

栗新臣：前天国务院来人检查来了，我看（恰好）走到村卫生室门口，见几辆小车过来。栗树东他们几个村医都穿着白大褂，可干净。我说你又搞应付哩，逮黄鼠狼哩！栗树东骂我：你就会说败话，今儿个上头来人参观哩！院长萧峰去了，他看见我，说栗新臣你看病？我说没啥病，来玩哩。后来县卫生局郑局长从车上下来，拉我上车，说好长时候不见了好好说说话！一下把我拉到黄庄，又到大滩李，又到集上，就这样叫我拉走了，拉着转了一大圈。我在车上看到村里路上桥上都停着警车站着警察。就对郑局长说，我知道是上头来人了，你团着我怕我说啥。郑局长“忒”笑了。郑局长说，你不管相信刘老师，她有神经病，天天背个电脑到处乱转，又没有钱。我说，她哪还有钱？她的钱都给村上艾滋病人了。郑局长说，怪不得你们说她好……。等转完送我回来，人家检查的走了。走了群众才知道，事先谁也不知道。

问：再有一次这样的机会，你们会怎么办？

“不知道。时间太短，都是他问你啥你说啥，他不问你你咋说？也不知道他是干啥哩，说了有啥用？”

“还有政府派出所人跟着，谁敢说啥？再说也到不跟前。”

问：国务院都来人了，他们能了解到一些情况吗？。

“能了解啥？当官的都瞒着哩，群众想说也不知道咋说，老百姓见上头的人都紧张害怕。再说，起先也不知道……。”

“走到哪都有那几个人跟着，都是安排好哩，专听你都说些啥，立马汇报你。还能说啥？说了也没有用，人家走了你受‘挤兑’。大喇叭吆喝：举报奖励2000元！村里几辈子出过这号人么？”

有几个艾滋病户拿着新办的孤儿救助证给我看，说他们刚刚领到一次孤儿救助款（200701），但是本子上填写的时间却是从2005年就开始发放了。他们问：以前发的钱哩？

“国家给艾滋病病人钱再多，到不了咱老百姓手里，都是底下的贪官们贪了！”“给艾滋病病人开药，药价贵得很！”“还有假药的事哩？！”

……

人们七嘴八舌。

最终一致要求我：刘老师，你得替我们向上级反映！

我已无话可说。

桂枝说，你们就会光给刘老师说，当时人家国务院的人来时候咋不说？

是啊。咋不说？……可又怎么说？

来自中央政府最高层的国务院检查组，能够走到中原地区一个最基层的艾滋病村庄，调查不可谓不深入。他们走进村里的卫生室，看望卫生室里输液的艾滋病病人；走进艾滋病家庭，调查最低生活保障政策落实情况、询问抗病毒药服用情况、了解百姓生活收入情况；他们专程拜访一位从互联网上得知姓名的乡村医生，向他调查艾滋病疫情，了解治疗情况，药品供应多少种？抗病毒治疗效果如何？还有什么困难什么要求？他们“说话平易近人，一点架子都没有”……。可以说，他们从最高层深入到了最底层，他们亲自看到了最底层的艾滋病病人，他们了解到了最底层的情况。

但是，银庄的百姓说，他们什么也没有看到，他们什么也不了解。如果我这么说，或许有人会不赞同。

许多到河南艾滋病疫区参观视察访问过的人，其中包括国内各级领导人，包括国际一些相关部门机构人士，包括凤凰卫视的刘长乐，都真心实意地称赞河南省艾滋救助工作做得好。党和国家、河南省委省政府，对艾滋病疫区的确投入很大措施很多成绩也很明显。在许多相关场合，常常只有我一个人在说“存在的问题”。因为我的确看到许多问题的存在，就像那个拼命要指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在强大的主流话语面前，这孩子即便不被认为心怀叵测别有用心，也会被看做是“神经病”，不谙世事的愚蠢。这种时候，那孩子四顾茫然显得很很小很傻很无助。仿佛真的很愚蠢。

我愈来愈感到自己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嵌住”。“察见渊鱼者，不祥！”我看到的越多，被“嵌住”的感觉越强烈。

### **红丝带故事的演绎版本：我们在哪里被“嵌住”了？**

20070204 周日

村中长者栗可顶说——

刘老师你走后，村民都说带上粉条子豆腐杀头猪到郑州给你过年去哩！工作队和镇上都找我了，要我给大家做做工作，说过年的时候一定接刘老师过来。工作队C处长说，这是一场误会。原来刘教授给卫华说成立一个编织厂，你们编织红丝带，我给你们想办法，联系联系卖了，给病号搞点收入，让大家献点爱心。刘教授跟他说让他编一万个，刘教授跟要饭的一样，挎着个包，到处跟人家商量，这一万个处理了。但他们想着再多编点吧，一下编了一两万，多编好些。他说刘教授不知道，他几个跑市里去了，秘书长接待的他。秘书长说你们这

多少钱一个？卫华说，俺这本儿（本钱）都一块钱一个呢，你们看着随便拿，拿多少都中，最后说，两块钱一个。秘书长说，这样吧，你们回去叫乡里写个信，县里写个信，到镇里你们也别卖了，俺给你们想办法处理了。他们几个跑回来写信，乡里给信写了，县里不写。县里不可能写！你们还不明白这不是个圈套吗？明知道处理不掉，他还得给你们处理，还叫县里写信？这个信不可能写出来。也不知道市里给县里打电话咋说的，反正问题交给了县里，县里又拿回来交给了乡里，这个事就是这样的。镇上张书记说，因为这个红丝带，县里一直压我，地区也压，说既不能上访，还得把这事儿处理好！我也有气……，这些红丝带顶几万块钱哩，你叫乡里这点办公用费都占完了，办公都办不成啊！又责怪村支书卫华办事不对，编织红丝带没有跟镇上报告，“跟谁也不打招呼。”（录音整理 20070204）

——才知道，红丝带的故事还被演绎出这样一种版本。

村支书栗卫华说，他们这样说是把责任推到我身上。这事一开始就清清楚楚，是艾滋病人自己寻找生产自救的门路，不是村委会的事也不是全村的事，乡里当时也支持。计划书写得也很清楚，签名是艾滋病人，要是村委的事，怎么没有村里盖章？

最后栗可顶又说，“镇民政所几次托人捎话给我说，上社科院告你刘老师不是他的主意，想找你好好说说。”

认真思量，“被嵌住”的不只是我。从乡镇到县市、从地方到中央，其中包括镇党委书记、驻村工作队长、信访局长、省长和省长秘书、以至“国务院来人”，卫生部门从村医到各级院长局长厅长们以至到卫生部，最终包括一个小小民政所长、一个小小村官，还有，我们社会科学院这类科研单位，谁又不是被“嵌住”的呢？

那“嵌住”的力量究竟是什么？它来自哪里？

又过了一年多，2008年8月，最初送给我一枚红丝带的“全球企业抗艾滋病结核和疟疾联合会”，电话联系我，说他们的一家会员企业为世界艾滋病日搞活动，需要购买红丝带，问上次给他们的红丝带是从哪里购买的？我把银庄的联系方法告诉他们，请他们直接联系。电话中我们聊了好多，大家都希望，彼此的联系合作不仅仅是一次“购买红丝带”，而真的是能够“红丝带连结你我他”。一边是急于寻求生产自救门路的艾滋病村庄，一边是抗击艾滋的企业联合会，而且是全球的！不由使我又生出许多美好的想象，似乎也真的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多好的一条路子啊，为什么走起来这么艰难曲曲折折？我们在哪里被阻隔了？

政府希望安定团结，百姓希望安居乐业，社会需要进步和谐。目标一致绝无矛盾。透过一个红丝带的故事，我看到了各方力量为各自目标做的努力。我宁愿相信那位市秘书长帮助“包销”红丝带的诚意，因为他把话都已经说到具体细处：“让市里各机关单位都要点解决

了”，他有这个能力，而且完全可以运作成一场效果很好的艾滋病防治宣传活动；他还充满善意和同情地说道“这样跑对你们身体也不好。”我更相信 B 镇张书记支持银庄艾滋病人生产自救，他对村民编织红丝带，从一开始就持积极赞赏的态度——作为一方领导，他怎么会不希望把自己属地的事情办好百姓生活得好？我也能理解县里上下左右为难的处境。我更是亲眼目睹艾滋病人群，在这故事里为改变自己的生存困境所做的艰辛奋争而绝无“闹事”的企图。然而，一个开端很美好的故事——故事所有人，包括银庄村民、市秘书长、镇党委书记，还有满怀爱心伸出援助之手的青年学子、社会各界，都怀抱美好愿望，是什么因素导致人们违背初衷，以至故事情势逆转，演进出那么一个不美好的结局？国家对河南艾滋病的救治救助投入大量金钱人力物力，但是具体执行过程中，资金精力却过多地用在防范上访闹事而不是艾滋病的治疗与预防，眼睁睁看着，资源被无意义地内耗掉了。官方和民间，人民的政府和政府的人民，沟通起来，怎么就那么困难呢？“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抗击艾滋”是我们国家政府提出的重要行动策略，而主动行动起来的“各界力量”怎么就那么难以发挥他们的力量呢？我们究竟被“阻隔”在哪里，我们的社会怎样才能重建彼此的信任？

至今，那一麻袋红丝带还躺在我们社科院办公室角落里。

## “大结局”

### 一个被忽略了的重要情节，1963、1978—1999

在这部书稿即将收笔之际，我在 2008 年 10 月份的《南方周末》，读到一个早已故去的人和一段逝去的故事。这家媒体也许是在无意之间拾起的这段往事，使整个中国艾滋病事件在关键情节上明朗起来，不再显得扑朔迷离，问题似乎有了答案。它使我立即想到“大结局”，因为这个意外得来的故事似乎使整个中国艾滋病大故事“尘埃落定”，之所以“似乎”，是因为也可以说成是“尘埃并非落定。”这是一个被忽略了的发生在中国的艾滋病大事件中极为重要的情节——这个人 and 这段故事，不但链接了中国医学科学与中国社会政治的一段历史，还衔接上了中国艾滋病事件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因缘。有了这个情节，我讲述的发生在全球化当下的关于中国的艾滋病的故事，才变得清晰完整起来；这个故事所包涵的意义，才更加深刻地被照亮。

这篇报道在充满悲剧的气氛中，从 9 年之前老科学家刘隽湘的故去，开始讲述这段逝去的往事——

### 科学家的夙愿与采浆术：单采血浆中国推广第一人

1999年，83岁的科学家刘隽湘逝世。公众视野里几乎忽视了他的离去，唯一的讣告刊登在一份发行千份的专业学术刊物《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上，他的“单采血浆中国推广第一人”的身份亦就此尘封。彼时中原的艾滋之祸正盛，人们无从得知刘隽湘在弥留之际是否曾有一丝的后悔，最后的岁月里，唯见其以古稀之年跑遍河北、河南、山东，奔走在各地血浆站间，身边的助手感觉到他的忧心忡忡。这是一位科学家最无奈的悲剧。

1963年，时任卫生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血液制剂室主任的刘隽湘与他的学生陈醒明合作研究绿脓杆菌的免疫血清，这种杆菌是烧伤病人的最大威胁。

“对烧伤病人而言，与输全血相比，输浆急救是更好的方式，因为不用配型，也没有用量控制。”陈醒明回忆，刘隽湘当时感叹道：“我们应该发展人血浆。”“他这个人很有超前意识，有时会提出些领导尚不能接受的观点。我每次进他的办公室，他都在阅读各种材料，非常关心国外的先进技术。”陈醒明说。

这种单采血浆术，是指将献浆员的血液抽出后，分离成血浆与血球两部分，红血球回输到献血员体内，血浆用于制作生物制品。

上世纪60年代，临床上血制剂的应用日广，对原料血浆的需求迅速增长，采浆术开始在美国广泛应用，到了70年代，在欧洲也成为常规方式。

“文革”期间，刘隽湘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那时他说话没人肯听，更别说什么从国外文献上看到东西。”陈醒明说。

但科学家的夙愿未丢。1978年，“文革”结束两年之后，刘隽湘成立了研究组，专门负责这一课题，开始推动引进单采血浆技术，这时他已经63岁了。也在这一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血液采集、加工和血制剂规范》，对采浆术作出若干解释，正式认可。

### **“潘多拉魔盒”：血瓶与手铐**

研究开始时，曾有人提醒他们：小心，小心，上面挂的是血瓶子，下面放的是手铐。“研究组由临床、血液、化验、技工等方面的专家组成，从两三位义务献浆员开始试验，一直增加到百来人。因为有国外成熟的采浆技术，我们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实验进展顺利，得出的结论是：在按规定程序操作的条件下，单采血浆术对献浆者无害。安全。”参与了此项研究的另一位同事金国栋回忆。

之后，卫生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向卫生部正式提出建议：使用该技术采集原料血浆。

1979年建议获得了卫生部批准，开始试行。卫生部原副部长、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杨纯非常支持，他说：“势在必行。”

1979年，单采血浆术由天津中心血站试行，很快就在全国范围被迅速推广。



初期的献浆员来自大专院校，后来开始慢慢向社会征集。各级红十字会和血液中心在媒体上竞相宣传采浆政策、原理以及国内外献浆员的先进事迹。

献浆者很积极。“那时有偿献浆的营养费几乎是一个月的工资，比较有吸引力。”金国栋回忆。

就在这一年，艾滋病病毒在美国潜入人体，但还无人知晓。

彼时的中国正积极地拥抱着新的科学技术。最先是北京、成都、武汉等生物制品研究所都设立了血站，之后由河北扩展到山东、河南，不久中原地区血站也大多具备了采浆功能。

1982年7月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单采血浆经验交流会时，全国已施行了采浆术14万余人次。待到1984年第二次经验交流会时，数字已飙升至56万人次以上。1985年更是达到了80余万人次。“从研究时开始，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异型输血，对每个血浆站都在强调，可谓苦口婆心。”金国栋说，但在80年代初，各家血站依然发生过此类问题，金就曾亲自为血站抢救过献浆员。“疏忽大意。”他说，“异型输血多发生在快下班的时候。曾有一例是女护士急着回家给孩子喂奶，让同事帮她回输最后几袋红细胞，结果搞错了血型。”

于是，各家血站都开始想办法调整规范：有的提出在血浆站内挂上明显大牌子；有的提出在献浆员的帽子上清楚标示。最终的方式是，让献浆员在自己的血袋上签字，回输后自行确认。

1983年，艾滋病病毒感染了第一位中国公民。被感染者是血友病患者，注射了来自美国的血液制品“凝血八因子。”

刚刚改革开放后不久的中国，临床使用的血制品几乎全部依赖国外进口，但渐渐被艾滋病威胁的欧美血制品令中国卫生部门忧虑。

反应不可谓不快。1984年——此时艾滋病病毒尚未被国际医学界正式命名，卫生部、外经贸部、海关总署就已几次联合下发通知，禁止或限制进口血浆、人血白蛋白等血液制品。此时的目标是：将艾滋病御于国门之外。

“献血（浆）是公民的光荣的社会义务，特别是我国有十亿人口，血（浆）必须自给自足。”刘隽湘此间也曾如是呼吁。

国内临床的血制品瞬间短缺，“血浆经济”被快速加热。但那种理想状态下的安全，与被经济利益挟持的现实渐相背离，不安全因素隐现。

1984年，在全国第二次单采浆经验交流会上，通过了《单采血浆术规程》，这是我国采浆领域第一部规范性文件。

同一年，刘隽湘等人受卫生部委托对8个省的22个采浆站进行调研。“因为不大放心，

刘隽湘也希望到全国去看看血浆站的情况。”金国栋说。

调研结束后，刘隽湘和嵇幼初主编了《血浆单采术手册》。在这本 280 页的小册子中，对血浆站和献浆员做出细致的规范。

“我很担心采浆不按严格的程序操作，发生意外情况。”金国栋记得刘隽湘回到北京后曾说。

那本手册中写道：“有些站虽然建立较早，但因当时经验不足或条件困难，可能存在某些缺点，也应根据规定的要求加以整顿。”

可惜，这一和缓的措辞，从血浆站诞生之始，就被利益驱动下的操作者忘于脑后。

### **暴利之下的疯狂：以血致富**

时间进入到（19）90 年代，“血浆经济”遵从利益的逻辑突飞猛进。多个省份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兴建血浆采集站和血液制品企业。在部分地区，“血浆经济”被视为带领农民脱贫致富的第三产业。

暴利时代即将来临，而农民体内温热的血浆正在成为一座取之不竭的富矿，危险的种子也悄然埋下。

刘隽湘编著的那本《血浆单采术手册》已经分发到各血站，但“当时政府管理意识不强，根本无法对各家血站进行有效监控”，现任（惠水）县卫生局副局长周前云说。

“当时没有特别针对性的培训，会打针、抽血的护士就行。”周前云说。各县采来的血浆由贵州省统一定价、销售给厂家。

“客观地说，血浆站对地方经济是有贡献的。”周前云说，就以惠水为例，虽然给予献浆员的营养费最初仅为 50 元，但对当地人尤其农民而言都比种田划算。那些挑进县城来卖的大头菜，一斤只挣一毛钱。

“那时做血浆真是比卖毒品还要赚钱。”现任惠水血浆站站长的陈昌建当时在贵州省血液中心工作，常去各县的血浆站调血浆，“有些 600 克容量的血浆袋被涨得鼓起来，摸着吓人。”

地方政府的急切心态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越规的行为。1992 年，河南省卫生厅与省红十字血液中心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目标竟陡然超过历年最高水平两倍之多。

而其下辖各地，疾控部门、卫生部门、医院，药厂，甚至个人开办的，或合法或非非法的血浆站，雨后春笋般涌现，1993 年时驻马店地区 33 家，而信阳地区则上百家之多。

按照规范要求，离体的血液不可以多人混合，否则，丙肝、乙肝、疟疾等病毒在混合血回输过程中的传播风险很大。

“但部分血站常年混合操作，只为便捷操作，降低成本，榨取最大利润。”一位血浆站的老员工说。

仅仅过了一年，1993年的河南省，疟疾疫情已经在提示采浆混乱。当年8月6日《河南卫生报》披露：“今年上半年全省报告疟疾301例，是去年同期69例的4.36倍。”

20天后，河南省卫生厅发出了《关于加强血站、单采浆站传染病预防工作的通知》，以防止疟疾病毒通过采浆传播。

而一年之后，令他们更加忧虑的传染病将不再是疟疾，而是致命的艾滋病病毒。

……

### **最早的警讯：1994, 1992?**

这篇报道除了主要讲述发生在贵州惠水血浆站的故事，还涉及安徽阜阳：最早的警讯发生在离惠水小城千里之外的阜阳——

1994年9月，上海莱氏生物制品公司反馈安徽省阜阳地区献浆员李某的血浆为“HIV+”，但是，当地血站的工作人员不知HIV为何物，未引起任何重视。11月，该公司的抽检报告中，再次出现：李某，“HIV+。”

卫生部的一个研究小组随后进入安徽阜阳地区调查，最终将感染途径锁定在当地的单采血浆站。这可能是第一份证明艾滋病与血浆站间存在关联的正式报告。

几乎同时，晚年的刘隽湘与他的同事金国栋也下到血浆站，跑遍河北、河南、山东。“我们这些技术人员没有权力，只能常用晚饭后的时间给护士们讲讲课。”金国栋说。（参考沈亮，2008）

这篇报道表明，贵州惠水和安徽阜阳，发生着与河南相同的故事。无独有偶，我在河南艾滋病疫区的现场调查中发现，上海的生物制品厂家也反馈K地区Q县数名献浆员的血浆为“HIV+”，在当地也未引起任何重视。而且反馈时间比安徽阜阳更早2年，是1992年10月。（见第一章之五）

### **谁之罪？**

故事讲到这里，似乎揭开了谜底，一切似乎有了“结局”。河南卫生官员的说法没有错，“单采浆是卫生部搞的”——卫生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刘隽湘是“单采血浆中国推广第一人”，卫生部领导支持，说：“势在必行！”

但是，酿成如此一场大灾难，能归咎于刘隽湘或者卫生部吗？又能归咎于谁呢？

让我们厘清故事的主要脉络——

“发展人血浆”，是老科学家刘隽湘上世纪60年代的夙愿，这种国外的先进技术，当

时在美国被广泛应用，到了 70 年代，在欧洲也成为常规方式。

1978 年，“文革”结束后，刘隽湘负责推动引进单采血浆技术。当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血液采集、加工和血制剂规范》，对采浆术作出若干解释，正式认可。

1979 年卫生部批准使用该技术采集原料血浆，当年由天津中心血站试行，很快在全国迅速推广。就在这一年，艾滋病病毒在美国潜入人体，但还无人知晓。

而彼时的中国，正“积极拥抱新的科学技术。”最先是北京、成都、武汉等生物制品研究所都设立了血站，之后由河北扩展到山东、河南。

1984 年中国禁止或限制进口血液制品，目的是将艾滋病御于国门之外。国内临床的血制品瞬间短缺，“血浆经济”快速加热，不安全因素隐现。“从研究时开始，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异型输血，对每个血浆站都在强调，可谓苦口婆心。”这年，刘隽湘等人受卫生部委托对 8 个省的 22 个采浆站进行调研，主编了《血浆单采术手册》，对血浆站和献浆员做出细致的规范。当年通过了我国采浆领域第一部规范性文件《单采血浆术规程》。

但是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急切心态助长了越规的行为，“那时做血浆真是比卖毒品还要赚钱”，部分血站常年混合操作，只为降低成本，榨取最大利润。

时间进入到 1990 年代，“血浆经济”遵从利益的逻辑突飞猛进。多个省份开始大规模兴建血浆采集站和血液制品企业。

1992 年，河南省卫生厅与省红十字血液中心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目标竟陡然超过历年最高水平两倍之多。就在当年，上海的生物制品厂家反馈 K 地区 Q 县数名献浆员的血浆“HIV+”。

1993 年的河南省，疟疾疫情已经在提示采浆乱相。

1994 年 9 月，上海莱氏生物制品公司反馈安徽省阜阳地区献浆员李某的血浆为“HIV+”。卫生部一个研究小组进入安徽阜阳地区调查，晚年的刘隽湘与他的同事金国栋也下到血浆站，跑遍河北、河南、山东。身边的助手感觉到老科学家的忧心忡忡，但是“我们这些技术人员没有权力，只能利用晚饭后的时间给护士们讲讲课。”

1999 年，83 岁的科学家刘隽湘逝世，彼时中原的艾滋之祸正盛。

……

如果刘隽湘没有推动引进单采血浆技术；

如果卫生部没有批准使用该项技术采集原料血浆；

如果彼时的中国没有“积极地拥抱新的科学技术”；

或者，干脆，如果根本就没有这种国外的先进技术……

——也许，这场艾滋病灾祸就可以避免？

如果没有暴利时代的“以血致富”；

如果没有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急切心态助长越规的行为；

如果认真学习《血浆单采术手册》，按照《单采血浆术规程》规范操作；

或者，即便是，如果亡羊补牢，在发现单采浆传播各种疾病，特别是发现传播艾滋病毒的最早的警讯时，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有效的防治……

——也许，这场大的艾滋病灾祸就可以得到及时控制，使风险损失降到最低？

但是，历史不能“假设”，也没有“也许”。

究竟在哪里出了问题，是谁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河南、中国、包括世界，遭遇这场无以计数的人丧失生命的艾滋病大灾难，是偶然，还是必然？老科学家刘隽湘的悲剧，是他一个人的悲剧，还是医学科学的、社会政治的、人类历史的悲剧？

关于中国河南农村艾滋病的故事讲完了。仿佛一个大寓言：有人打了一个喷嚏，无意间却酿成一个大悲剧。历史往往就是这样。

## 尾声

2009年01月08日，阳历元旦刚过，旧历新年将至。收到小丁老师的电子邮件——

刘老师：您好！

先祝您新年快乐！我们快放寒假，元旦之后，我们学校的学生捐了一些钱，买了130多本书，已经寄给可昆大叔。元月2号寄出，估计10号左右应该能够收到。具体书单见附件。我和可昆叔联系了一下，希望能够做个书架，以后可能还会有一些书送过去。另外，我们还做了一块牌子“浙江财经学院爱心图书室”，让我一个研究生李阳带回银庄（我学生李阳是Q县人）。为了保证图书室能够正常运转，我们特意定了一个管理章程，同时希望刘老师也能一起监督，以使图书室能够办得更好。

这就是小丁做事的风格：有板有眼有始有终。附表列出《人生成功励志书系》、《中华五千年》等129种、135本书目及价格，表下注明：丁老师个人捐赠的图书数目及价格未列入表中。青年学子的爱心令人感动，让人看到人性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

2009年01月28日，春节，农历正月初一。可昆、卫华、华中、新臣，电话拜年。说到村里情况——

工作队为村里又修了几条路，现在4个自然村该修的路都修了，也“村村通”了。小学校的东边建了操场，这样学校的操场终于可以搬出小小的校园，不至于因为体育课影响其他班级上文化课了。小学校的西边还建了学前班。这些都是工作队出的钱。现在驻村的已经是第四任工作队，说是任期要延长到5月份，是否还有后续工作队进村，不知道。关爱之家、智行、博爱等外界机构对村里的救助活动一如既往，智行基金会还为村小学建了图书馆。桂希恩教授两次进村为村民治病，并进行了抗病毒治疗的依从性教育。“希望家园”的孩子们都很好。卫华的母亲、妻子烧伤基本痊愈，伤口已经愈合。村里又起了不少新房。鞭炮基本不做了，除了个别户在“收尾”还做一点，“现在都看到危险性了，大家反对做炮。”华中的水泥板场、新臣的面粉厂经营都不错。但是，不做炮了，多数人还是没有事情做，终究还是个问题。现在村里最缺的不是钱不是资金，是项目——生产自救的项目。

基本都是好消息。特别是修路、建学校（早年还有修桥，现在水源少了，不再需要修桥），在中国农村历朝历代都是善举义举大事好事。几年之前初识村主任栗卫华，修路是他最大心愿。当时他处境正困难，说，无论如何，坚持到把村里的路修好，就不干了。现在，卫华修路的心愿已经实现，工作也渐上轨道。学校建设几经周折，也在向好的方面发展。还有人人挂心的房子，也正在兴建。卫华说，比起前些年，现在好多了。

我想到滩头村失去妈妈的五个小姐弟。他们13岁的大姐在屋门口的墙壁上写下誓言般的话语：

我爱我家

我的家一定会兴旺起来

我的家一定会富裕起来……（照片58）

我想到栗庄村几次病危大难不死的艾滋病人栗万里。他顽强地坚持着，要把自家房子盖起来的。那站在屋顶砌砖的泥瓦工匠，组合成一段美丽的五线谱音符。他们是生活的建设者，再苦再难绝不放弃，灾难后的人们在兴建自己的家园，谱写新的生活乐章。（照片59）

我还想到村里那些可爱的孩子们。一天放学路上，几个小学生看到我手中的相机，嬉笑着涌向我，要我给他们“照个像。”照片上，孩子们友好亲密地挤在一起，活泼、健康、快乐，与背后田野上近处远处的坟墓，形成生命和死亡的鲜明比照。这种画面效果使我想到了生生不息。（照片60）

……

所有这一切，像当时一样，使我内心涌起一阵感动。

无论如何，银庄，这个经历了死亡经历了地狱般大劫大难的村庄，正在复苏，正在一步

步走出困境走向新生。

## 结语 田野实践与反思

本节是研究者对自己的研究的反思。思考的动因缘自田野工作中一路走来所经验的矛盾和困惑，以及对研究效验的检讨。思考的主要平台是自我对话，以及与田野伙伴的讨论。<sup>①</sup>一直困扰着我的矛盾与困惑是：如何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自主和客观公正？作为研究者如何把握局外观察与局内行动的关系？我以为，进行社会研究，最基本的功课是追寻真相，认知真实。但作为社会研究者，并不仅仅是简单的记录者，还应当是知识结构健全、学术视野开阔的思想者；不仅仅关注事实，还应当能够审时度势，关注影响事实的社会时代种种因素；不仅仅只是自己研究领域的专家，还需要通透人性和世事。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作为一名专职研究者，我远未企及。

河南农民因卖血引发的艾滋病灾难，实际上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中国经济体制大变革的双重背景下，完全没有竞争资本的农民以自己身体的血为资本卷入与市场的交换，从此堕入更深的底层。这是一场灾难性大事件。如何将这一复杂背景下的中国艾滋病事件展现出来？重要的是用“我们”的视野和话语，而不是“他者”的，使之以“原本形态”进入历史进入世界语境。中国河南艾滋病事件的主要受害者是社会底边的农民感染者群体，他们应当是话语表达的主体。不是“代言”，而是“原声者”开口发音，这是我渴望实现的一种书写境界——原本形态地呈现他们在事件中的命运遭际，说出他们所思所想所要表达的话语，他们的生命感受与诉求。我不知道，是否有这种可能？当我“说出”，已经经过学者的过滤；当我变成他们中的一员，我是否还能够“客观地说出”？反之亦然：他们中能够真正开口发声的人是他们之中的精英，当精英地位发生变化之后，是否还是“他们”？他发声所表达的是否真的还能代表他们的“表达”？书写真实著述信史，需要保持“原我”的“定力”。这是书写的最高境界。也是科学研究者应当追求的学术境界。

### 进入田野才是第一步，离开田野比进入田野更难

田野调查是本研究的主要方法。参与观察是田野工作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研究者的身份原本是冷静客观的局外观察者。但是研究者所处的社会位置、选择进入田野的方法、田野路径的延伸，以及事件本身的发展过程，使研究者在田野社会中逐渐产生了新的角色与位置。这样的角色或位置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亦即观察对象）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具体化。于是，

---

<sup>①</sup> 本节思路开启得益于与王占玺博士的讨论，田野工作的经验使我们有许多相同和不同的感触，多次彻夜长谈。写作中参考其未完成文稿《旅者观察与观察旅者》。

研究者的身份定位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位移。

这种位移首先缘于研究者希望进入“局内”（局：研究场域）的动机。由于研究者希望深入“局内”观察，发现了解研究对象的动机与行为，必然与“局内人”产生各种各样的关系。而“观察”本身并非是单纯的独立行动，观察的行为，尤其是参与观察，必然伴随着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互动以及由此而生的其他的行动意义。比如访谈，在对话交谈的过程中，研究者只有表达出对既往事件的理解认知，才可能使访谈深入进行，在与被访者不断深入的谈话中，捕捉潜在的信息，掌握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发现事物的内在逻辑。在这一过程中，“位移”已经发生。

其次，位移来自研究对象对研究者的认知与期待。在研究者“发现”的同时，自己也“被发现”。一问一答的访谈过程，即是双方彼此“发现”的过程。在艾滋病村银庄，开始，村民们期待的是研究者的同情与理解。在这种期望“外界”认同的过程中，反映的是研究者在田野社会中边缘位置的特殊性，一个处于“局外”的角色，对于处在“局内”的艾滋病村庄而言，其价值就在于其“局外人”的身份。渐次，在“被发现”中，研究者本身的社会位置显现出另外的“资源价值”，研究对象对于此一位置所可能隐含资源的发现与期待，使二者的关系发生转化，研究者同时被研究对象观察研究，使研究者被赋予的期待意义变得现实而具体，原本潜在的资源已经可触可及可资利用，比如，成为“向上级反映实情”、争取社会资源的桥梁工具。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即使研究者尽力单纯化自己的角色，也依然会被研究对象依照他们的需求进行解读与认知。

第三，主观情感的渗入。这种“彼此发现”还意味着双方之间已经形成一定程度的信任与相互理解，这种信任与理解关系一方面帮助研究者深入“局内”，完成“发现”研究对象的原初动机，同时对对方的处境与期待要求也很难做到无动于衷。价值的认同与情感倾向，驱使研究者尝试藉由自己的位置，为研究对象提供策略建议乃至资源动员，心甘情愿成为可资利用的桥梁工具。这种行为使研究者在各种关系网络结构中的位置逐渐凝固，使原本游移于局外与局内、边缘与核心的研究者，逐渐丧失了作为一个隐形观察者进退裕如的主动。于是，研究者的角色身分逐渐变得模糊不清，甚或被贴上不好的（错误的、可疑的）标签，事情变得复杂起来，无意之间，研究者已在各种关系网络中被“嵌住”。

如果说当初研究者只是一名旁观的“听者”，那么在这里，不知不觉之间，这听者身不由己地走进了故事，变成了故事中人。继而，不单是研究者走进了银庄人的生活，银庄人也走进了研究者的工作。他们成为合作者，共同完成银庄故事。在研究伦理上，此种行为是否恰当一直存在争议。不深入局内不用心交流，能够真正了解研究对象吗？深入局内付出心血



之后，还能做到真正的客观公允吗？自我察觉敏锐的研究者，很容易觉察到自己位置的“位移”，在关注研究对象的同时，还会觉察自己作为“研究工具”与作为有情有感的主体间的矛盾困惑。在实际田野工作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分寸”，参与观察的“参与度”，实在很难把握。

最终发现，作为研究者，进入田野才是第一步，离开田野比进入田野更难。

但是，必须“进入”也必须“离开”。淡出（超越）故事，回归研究者的角色。从不自觉的故事中人（演员）成长为自觉的“察见者”（而非一般观众）。才会看清围绕中国艾滋病事件呈现出的图景：国际、国内各种政府、非政府的力量蜂拥而来，互相牵引，互相制约，而且是多层面的，都被“嵌在”各自的“位置”里。而位置高低及其分量，由角逐的成效而决定，并且不断发生变化。掌握舆论话语权的官方主流价值，强调“政治正确”，安定压倒一切；民间草根则高呼“艾滋有理”，艾滋病是一株眼泪之树，孤儿在树的顶端；国际机构引进资源“作项目”，同时带来全球观念在地化。——这一切牵动着中国社会中制度环境、秩序环境、组织环境的变化。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打着艾滋病旗号的各种机构，互动的逻辑是权力和权利竞争的游戏，运作的核心与目的是机构自身利益而不是艾滋病，艾滋病是标签，艾滋病人是工具。在中国，大多声言“非营利”的 NGO 是逐利的，它们在自己的生存环境中找寻自己的利益位置。选择目标救助艾滋是为了建立业绩——建立业绩是为了寻求认可与赞助。募款能力——绩效指标——特定做法，环环相扣。募款能力等于生存能力。表面上看，国际组织做公益“出钱”作项目，草根组织做私益找寻项目的钱。越到后来越发现，底层的草根组织只是上层几个大的 NGO 寡头的“采掘对象”。艾滋病是 NGO 运作的由头，他们在消费艾滋病，将之转换为对自己有用的工具和资源。实际上，艾滋病是艾滋病，NGO 是 NGO。谁是最终的胜利者？双赢，多赢？数败俱伤？最终发现，观察到的“风景”原来还是回到政治游戏而不是艾滋病。那个拼命要告诉别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发现，其实那些煞有其事夸耀着新衣美丽的人，谁都看到皇帝是赤身裸体。——艾滋病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和公共卫生问题，而是一个被意识形态化了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这时候，已经走到“风景”深处。

### 历史的“罗生门”与“通天塔”

多年的田野实践使我终于悟到：人们对事物的看法不可能完全相同。作为社会历史的研究者，不仅需要犀利洞察之目光，还需有开阔包容之心怀。

田野调查中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同一件事情，不同的访谈对象说法不同；同一事件，在不同的场合不同时间被表述得也不相同。处境、地位、身份、场合以及叙事者的目的，都

会影响对事物的感受和看法，不同的“利基”导致不同的说法。而且，人们各持一端彼此很难理解沟通。我们姑且称之为历史的“罗生门”与“通天塔”现象。

《罗生门》是拍摄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一部日本影片<sup>①</sup>。影片展现了一个由4个人讲述的、不同版本的发生在丛林中的同一个凶杀故事：强盗自夸英勇无比，杀死武士赢得美人心；武士妻自诩贞妇烈女，受辱后不堪忍受丈夫冷酷鄙夷的目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神智迷乱中误杀了丈夫；武士则透过灵媒自称壮烈切腹自杀——武士是日本各个阶级中最看重自身名誉的一族，妻子被辱使自己名誉蒙上耻辱，“自杀”是挽回名誉的唯一正道。当事人都自称杀人，那么，究竟谁是凶手？唯一的现场目击者樵夫，则因偷了镶嵌着珠宝的短剑，“一个不错的细软”，不敢吐露真相。“导演是用镜头写作的作家”，黑泽明以他的镜像世界，表达他对世事人性的洞察与思考。影片中，黑泽明没有个人的好恶与评判，甚至没有“真相的答案”，他只是用镜头客观而真实地讲述着一个没有答案的故事，层层展现出世事人性的矛盾与复杂；影片没有强加给观众的主观倾向，却启迪人们生发无尽的省思。这似乎是一个没有真相的故事。原著者芥川龙之介一语道破，《罗生门》所要讲述的是：真相客观存在，讲法取决主观；世人互为听众，天下各自旁观。

影片《通天塔》<sup>②</sup>要表达的是“沟通障碍”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误解与争斗：人们因为局限在自己的认知里，而陷入“无明”的困境，在困境中的挣扎，以及对“沟通理解”的渴望。故事以一个偶发事件把四个国家（摩洛哥、墨西哥、美国、日本）多个人物的命运交织连结在一起，在不同地域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的背景下展开：只因一支偶然得来的枪，一声儿童嬉戏的枪响，令众多人物陷入厄运。故事中人——一对生活在贫瘠土地上摩洛哥小兄弟，一对面临感情危机的美国夫妇，一对日本家庭中的聋哑女儿和父亲，一位移居美国16年的墨西哥保姆，由于不同国度、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以及不同的生活经历和阶级处境，对事物的感知和判断大相径庭，每个人都无法理解对方的行为，以致造成相互之间的误解与敌对。在主流强力秩序的背景下，最终遭受伤害的必然是处于弱势的落后民族和下层民众。弱者无意间的过失，放大了强者想象中的危机感，弱者因此受到打击；弱者出于本能的反抗，则进一步激怒强者加深误解，导致事态恶化升级。人们都在做着认为自己正确的事情，而无法明白对方为何那般无理。“短短的11天中发生的事情几尽浓缩了

---

<sup>①</sup> 《罗生门》，由著名剧作家桥本忍根据名作家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筱竹丛中》改编，黑泽明导演。黑泽明被誉为日本战后最伟大的艺术家，“世界十佳导演”之一；而《罗生门》被誉为“有史以来最有价值的十部影片”之一。

<sup>②</sup> 《通天塔》导演亚里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多。他说：“《通天塔》探讨了是什么将我们连结在一起，而不是讲我们分离的主题。”“生命就像是灵魂在尘世间的一次旅程，这个世界上一定存在着一些超出我们认知范围的东西，这也是信仰的一种。人类的生命是一个减损的过程，唯一能赋予它意义的就是‘希望’，我始终坚信这一点。”

这世上所有的不幸，而所有的不幸几乎源于沟通的不畅……。”这是一个关于隔阂的话题，大的隔阂嵌套着一个个小隔阂，人们在隔阂中试探摸索，虽然遍体鳞伤但依然怀抱希望。

直面真实真相很难，直面真实的自我更难。许多时候，关于历史的叙述，由于人性的弱点与局限，利益相关者只会说出对自己有利的一部分事实，掩盖对自己不利的部分；而有利不利因时势而变化，有人甚至为了有利而编造故事，另一些人则因“罗生门”效应而甘愿把自己装进虚构的故事而掉进记忆的陷阱，“三人成虎”假话成真，于是“真实真相”越来越模糊不清，历史陷入“罗生门的困境”。而且，越是各持一端离事实真相越远，越不能理解认同对方，隔阂误解也会越深。就像《通天塔》的故事，每个人都在各自的痛苦中无法抽身，人们在强大的隔阂与误解力之下显得无奈与无知，正如那位墨西哥保姆所说：人不是坏，而是做了愚蠢的事。历史中的“罗生门现象”屡见不鲜，而且越是大的历史事件，“罗生门”效应越强烈，因为直接涉及历史评价，责任重大。中国是一个“讲政治”的国度，最大的“罗生门困境”是意识形态对人们思想的禁锢。随着事态的演变，人们至少会受到“政治正确”和“自我合理化”倾向的干扰，记忆中的故事也随之变化，历史的面目也愈来愈变幻莫测扑朔迷离，以致在一些常识的问题上丧失判断力和事后的反省能力，陷入“历史的罗生门”。

对于发生于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的艾滋病大事件，每个人的记忆和认知是不同的，而且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有关方面对现场信息资料的封锁，一些当事人出于个人需要编造故事，不同势力出于不同利基各取所需制造“典型”，海内外媒体或受到限制不允许报道某些事实或人云亦云夸大某些现象，都很大程度上歪曲了历史真相。如何认知人类遭遇艾滋病这一段历史？我以为，需要将问题置于历史事件动态的演进中进行考量。而对于“中国河南农村艾滋病事件”，最重要的是超越意识形态的“罗生门困境”，挣脱中国习惯的定式思维，跳出“意识形态”“政治观念”，回归常识回归平常，以平常之心才能做出理性判断。

那么，我的研究，我的这本关于艾滋病事件的写作，是否能够逃避罗生门的困境呢？我想不能。哪怕我已经意识到罗生门的存在，我依然无法逃开。我曾经信誓旦旦：研究真问题书写真历史，这是我对自己的期许。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感觉到，真正做到这一点几乎是是不可能的。讲真话写信史，如实道来，似乎简单，其实不易。必须承认，我的研究是有限的，因为我也无法挣脱“历史的罗生门”陷阱。首先，我只能记述我所能够经验的和看到的，而我的经验和眼界是有限的。还有更多的很重要的部分，比如官方决策过程、社会各界参与情况、国际社会的各种反应与行动等等，我都不可能一一探究。我这本书只是记述了事件的一部分提供了一种视角。其次，这种“有限”使我很难克服主观情感的“偏向”而做到完全的客观中立。任何个人都是有局限的，看清全部的唯有上帝，人不是上帝。我唯有捧出

真心以心写作。我想，如此的“用心之作”纵然有限，但凭空臆造更糟。只要我们意识到个人各自的局限，知情者和当事人都能尊重事实尽可能准确记述所见所闻和各自经历，将诸多的“有限”以真诚包容之心“九九归一”，就有可能接近“真知真相”，就有望超越“局限”去认知“全局”。正视“历史的罗生门现象”，就有望走出“罗生门的困境”。以我之有限行我之本分，力所能及的就是：只讲真话，不讲假话，事实表述尽可能客观，而规避主观臆断。走笔至此恍然悟到，佛家所谓“无说而说，说而无说”，大约就是这个意思。

“通天塔”，见于《圣经》旧约·创世纪第11章巴别塔：“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華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華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華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華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

耶和華阻止人类修造通天塔，不是因为人类的骄傲，而是因为人们的无知。——竟然无知地认为只要言语相通就可以相互理解共同建造通天塔，而不明白真正的理解是心灵的相通。于是耶和華“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为的是让人类去历练自己的灵魂心智，达成心灵的相通。只有到了人们心心相通的那一天，人类的“通天塔”才会筑就，通天之梦才会变为现实。《通天塔》影片以黑夜阳台上赤身女孩投向父亲怀抱做结尾，最终显现字幕：“献给我的孩子。最暗的夜，最亮的光。”影片将人类沟通的希望寄托于一个最难与外界沟通的聋哑女孩。冥冥之中，最终一切将归于生命的本真——回到相互理解，回到心灵的沟通。通天之塔需由最赤诚的灵魂生命筑就。

沟通不仅仅单靠言语，甚至无须言语，最大的障碍来自我们“心的无明”。愿人类挣脱无明走向澄明，超越罗生门陷阱建造理想中的通天塔。愿未来的世界不再有误解、隔阂和悲伤。

我把这份“有限”的，但是“用心”的作品交给读者交给世人交给历史。

## 参考文献

- 孔飞力，1999：《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等译，上海三联书店
- 布迪厄、华康德，1996年：《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 塞威尔, 2001:《三类时间性: 迈向事件社会学》, 应星译,《国外社会学》2001年第4期
- 奥尔森, 1995:《集体行动的逻辑》, 陈郁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巴特摩尔, 1998:《平等还是精英》, 尤卫军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 福柯, 1999:《疯癫与文明》, 刘北成、杨远婴译, 三联书店
- 华尔德, 1996:《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 龚小夏译, 牛津大学出版社
- 威廉·怀特, 1994,《街角社会》, 黄育馥译, 商务印书馆
- 格尔兹, 1999:《尼加拉: 19世纪巴厘剧场国家》, 赵炳祥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吉登斯, 1998:《民族—国家与暴力》, 胡宗泽、赵力涛译, 三联书店
- 卢梭, 1982:《社会契约论》, 何兆武译, 商务印书馆
- 尼采, 1998:《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 姚可昆译, 商务印书馆
- 施卢赫特, 1986:《理性化与官僚化》, 顾中华译, 联经出版社(台湾)
- 汤森、沃马克, 1994:《中国政治》, 顾速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 王亚南, 1981:《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韦伯, 1999:《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 康乐等译, 远流出版公司(台湾)
- 魏特夫, 1989:《东方专制主义》, 徐式谷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叶启政, 2000:《进出“结构—行动”的困境》, 三民书局(台湾)
- 费孝通, 1984:《乡土中国》, 三联书店
- 高夫曼, 1992:《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 徐江敏等译, 桂冠图书公司(台湾)
- 奥德嘉, 1989:《群众的反叛》, 蔡英文译, 远流出版公司(台湾)
- 林耀华, 1989年:《金翼》, 三联书店
- 黄树民, 1994年:《林村的故事》, 台湾张老师出版社
- 陈佩华等, 1996:《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 孙万国等译, 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
- 应星, 2001年:《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三联书店
- 邵京, 2005:《记录与思考:农村有偿献血与HIV感染》,《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 2007:《河南农村出现的新底边阶级》, 底边阶级与底边社会工作坊论文,《底边阶级与边缘社会》论文集, 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台湾)
- 刘倩, 2005:《河南省艾滋病流行特点、社会影响及相关政策效应研究》, 中国社会学年会论文,
- 2007:《河南省艾滋病疫情高发区现场报告之一》, 美中公共管理, 第2期

- 《在底边：中原农村的艾滋病人群》，底边阶级与底边社会工作坊论文，《底边阶级与边缘社会》论文集，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台湾）
- 李清川，2003：《传媒与艾滋病》，《复旦大讲堂——艾滋病的“社会免疫”》，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 景 军，2003：《中国艾滋病视野中的弱势人群》，《复旦大讲堂——艾滋病的“社会免疫”》，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 2006：《泰坦尼克定律：中国艾滋病风险分析》，北京《社会学研究》2006 年第 5 期
- 李 楠，2004：《艾滋病在中国——法律评估与事实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9：《艾滋病防治的“产业化”和艾滋病防治具体项目的“麦当劳化”》，<http://opinion.huanqiu.com/roll/2009-12/649867.html>
- 高燕宁主编，2005 年：《复旦大讲堂系列——艾滋病的“社会免疫”》，复旦大学出版社
- 高燕宁，2005：《血殇》，未发表文稿
- 张 可，2005：《河南艾滋病五年调查报告》（非正式出版稿）
- 吕守信，2003：《关于艾滋病传播的途径分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3 年 3 期；
- 潘绥铭，2001：《艾滋病研究给社会学提出的新问题》，《社会学研究》2001 年 4 期；
- 邱仁宗，1999：《艾滋病、性和伦理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
- 夏国美，2002：《中国艾滋病问题报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年 10 月
- 夏国美、 杨秀石，2006：《社会性别、人口流动与艾滋病风险》，《中国社会科学》第 6 期
- 高耀洁，2002：《艾滋病/性病的防治》，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 2003：《鲜为人知的故事》，中原农民出版社
- 2004：《一万封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08：《中国艾滋病祸》，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
- 桂希恩，2003：《我所知道的艾滋病》，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 苏惠存，1997：《河南省部分献血浆人群血源性传播疾病监测结果分析》，《疾病监测》第 12 卷第 7 期
- 郑锡文，2000：《我国某县有偿献血员艾滋病病毒感染流行病学研究》，《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第 8 期
- 2000：《遏制艾滋病在我国经吸毒及采供血传播的流行》，《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第 1 期

郑锡文等, 2000: 《我国某县有偿献血员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流行病学调查》《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第 4 期

颜江英等, 2000: 《我国某县有偿献血员艾滋病病毒感染率调查》《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第 10 期

刘淑贞等, 2000: 《山东省某地区献血人群艾滋病病毒感染状况调查》《实用预防医学》第 7 期

刘学周等, 2006: 《河南艾滋病监测哨点》,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6 年 11 期

程华等, 2004: 《血站类型和献血方式对献血员感染 HIV 的影响》

靳 薇, 2005: 《艾滋病防治政策干部读本》, 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51201

李银河, 2003: 《与艾滋病问题有关的社会科学经验研究综述》, 第一届社会科学与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研讨会文稿, 北京, 2003 年 9 月 27-28 日

包丽敏, 2004: 《民政部: “关爱之家” 合情不合法》, 《中国青年报》20040225

何爱芳, 2000: 《艾滋病在中原大地肆虐 —— 写在新千年的第一个艾滋病日前夕》, 《揭开河南省传播艾滋病的“血痂”》, <http://www.aizhi.org/jkwz/bloodwound.txt>

张 捷, 2000: 《艾滋病、新国难》, 《中国新闻周刊》, 第 18 期

李玉霄, 2000: 《怪病》, 《南方周末》, 11 月 30 日

高昱等, 2001: 《血祸——走访河南“艾滋村”》《三联生活周刊》2001 年 9 月 5 日

Pierre Haski, 2002: 法国记者组现场采访河南爱滋村长篇报导, 法国《解放报》2002 年 1 月 14 日

张惠君、潘志贤, 2001: 《河南血头血霸又见抬头 省府要求从重从快查处》, 中新网, 2001 年 08 月 17 日

张 彤, 2001: 《药比命贵: 药价问题阻碍中国防治艾滋病进程》, 《华夏时报》, 2001 年 12 月

江 华, 2001: 《河南政府部门: 我们愿意做艾滋病防治的一个标本》, 《南方周末》2001 年 11 月 30 日

李 煦, 2005: 《“感动中国”的防艾英雄桂希恩》, 人民网 2005 年 12 月 29 日

周启尧, 2002: 《世纪的哭泣——直击双庙集艾滋村》《香港文汇报》, 2002 年 8 月 13 日

万延海, 2003: 《“河南艾滋病、法律和人权”长篇报告》, 多维邮报 09 月出版, 总第 124 期至总第 134 期,

文楼村究竟有多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http://www.aizhi.org/shyx/wenlou.txt>

健康报—河南人民健康的遮羞布, <http://www.aizhi.org/shyx/jkb2.txt>

张继承等, 2000:《河南某村“怪病”惊动高层》,《华西都市报》, 2000年1月18日

王 丽, 2000:《艾滋病在河南》,《大河报新闻周刊》2000年5月11日—5月17日

喻 尘, 2005:《河南发现艾滋病十年回顾》(1—6)《南方都市报》2005年12月16日

2004:《从暧昧到阳光的中国艾滋病政策》,《新周报》2004年12月02日

曾繁旭, 吴虹飞, 2004:《喻尘:我对自己的名字感到陌生》,《人物周刊》2004年12月01日

老 枪, 2006:《那4500个震惊世界的文字——关于华西都市报首次披露河南艾滋病疫情的记忆》

李生旺, 孙桂君, 2000:《对非法血站血液质量检测结果的分析》,《中国艾滋病性病》2000年第1期

刘志明, 2004:《新闻界的一条汉子》,《人物周刊》2004年12月01日

李 煦, 2005:《“感动中国”的防艾英雄桂希恩》人民网2005年12月29日

魏 娜, 2007:《连线防艾专家桂希恩:随温总理再访文楼村》《长江日报》2007年12月02日

张惠君、潘志贤, 2001:《河南血头血霸又见抬头 省府要求从重从快查处》中新网北京2001年08月17日

郑灵巧, 2001:《农村、农民、艾滋病》,《健康报》2001年12月4日

《艾滋病花费了我们多少钱》,健康报2001年11月16日

叶 子, 2006:《中国艾滋病第一案调查:19名艾滋病感染者及家属获赔过千万》武汉晚报, 20061207

贾 平, 2007:“关于中国全球基金项目非政府组织类别代表选举培训和社区意见征询会”总结报告, 2007年3月5日, 互联网

徐 笛, 2006:《艾滋病毒携带者昨走进师大校园——自编红丝带 学生帮义卖》,《北京青年报》12月2日

苑海震, 2007:《党和政府温暖我们河南艾滋病防治工作综述》, 20070830 大河网—河南日报

曾 毅, 2002:《艾滋病的流行趋势、研究进展及遏制策略》, 11月27日中科院第十次



## 院士大会学术报告

王占玺, 2007:《旅者观察与观察旅者》, 未完成讨论稿

沈亮, 2008:《30年采血史》, 南方周末, 2008年10月23日

柯南, 2006:《利比亚的艾滋病疑案》, 中国青年报, 20061122

第457号国务院令:《艾滋病防治条例》, 20060212

卫生部:《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情况》, <http://www.cdc.org.cn/aids/gzQk.htm>.

卫生部:《2005年中国艾滋病疫情与防治工作进展》, <http://www.chinaids.org.cn/zhQ/Show>

《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2010)》

《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备忘录》, 2002年

《四川省性病艾滋病防治项目中期工作报告》, 2003年

卫生部, 2001: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超过60万人, 人民网2001年8月23日, <http://www.peopledaily.com.cn/GB/tupian/74/20010823/542269.html>

卫生部、国家计委、科技部、财政部, 1998: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2010), 1998年10月26日, <http://www.aids.net.cn/>

艾滋病大流行将造成中国的国家性灾难, 2002年11月27日, 互联网

艾滋病一旦“普遍流行”, 中国将每年损失411亿元, 新华网北京12月1日电

卫生部公布河南艾滋病疫情, 文楼村241人染病, 中新网北京8月23日消息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 关于中国2000年艾滋病现状的观点, <http://ns.unchina.org/un aids/key8.html>

2005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艾滋病流行状况最新数据, <http://www.cctv.com/health/topic/health/UNAIDS/20060207/101434.shtml>.

河南省卫生厅,《关于全省艾滋病工作的汇报》200208

Q县委县政府,《关于AIDS疫情的说明与建议》20030724

《二〇〇五年Q县艾滋病医疗救治工作总结》20051205

银庄驻村工作队,《省驻Q县银庄村帮扶工作情况汇报》200411

《K市Q县艾滋病高发型区社会治安状况的调查报告》200412

《银村驻村工作队队长个人总结》200412

B镇党委政府,《关于发生艾滋病及救治救助救治管理情况的报告》20030412

《关于97年度开展计划生育“乡征县管财政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

## 后记

这几年，我几乎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头扎进调查现场作这项很不容易才争取到的关于河南艾滋病的研究课题。极度的劳累和内心的孤独，不会有人知道。自找。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这个问题常常使我感到窘迫感到惭愧。特别是，当我发现不知不觉不知什么时候，一些明明白白个人难以担当的“担当”已经担当在自己身上时，更是羞愧难当……。可是，我还是就这么无可救药地陷进去了，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如果硬要给自己给友人一个理由一个交代，我只能说，我拗不过我自己，我拗不过我的心。是的，这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不是一个快乐的选择。只是，我如果不这样做，会更加不快乐。面对人世间的苦难我不可能作“壁上观”。我不可能有别的更好的选择。在这条自觉选择的道路上，我的生命也在成长。跟着自己的心就这么一路走来，还要别无选择地一直走下去。也许我的生命需要承受沉重，它沉重的分量使我心安。这是我的宿命。我们这一代人很多人的宿命。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为名？为利？为了社会责任或者历史使命？都不是。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历练早已淘洗了我轻狂少年时代的虚华虚妄。我很清楚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社科研究是我的工作。我只不过是在做我分内之事，尽一个做人的本分。人活着总得给自己一个理由，我们做的许多事情都是在给生命附着一层意义。河南农民艾滋病人群用他们的苦难救赎了我，使我找到活着的理由，找到我生命的意义。尽管我知道会有一些异议，但是我内心始终踏实坦然。无论别人认同、反对、赞赏、嘲讽，或者遭遇怀疑误解，我都知道自己不过是平常人作平常事，以平常心泰然处之。

终于完成了这本书的写作。感谢命运引领我走进这个领域，让我去见证书写人间一段悲惨的历史。我想，作为一名社会科学研究者，这是我的福分。我是幸运的。如果没有驻村工作队、镇党委、村主任的信任和接待，我不可能真正走进艾滋病村庄；如果没有基层卫生部门的局长院长们接受我的访谈，为我提供大量真实可信的当时资料和只有身居一线现场才会具有的真知灼见，我不可能对整个事件做到“心中有数”的把握；如果没有参与“省课题组”调研的机会，这一切根本无法开始；如果没有国家社科规划评审组专家们的理解支持使这项研究得到“国家课题”的“正名”，这一切都将无法进行下去；关键时刻，如果不是同学同道朋友们的鼎力相助，我将寸步难行。特别是，如果没有艾滋病村庄乡亲们全力配合和生死相交的情义，我不可能在村里扎下根深入我的调查一直看到风景的最深处，关于他们，或许将有一部传奇故事问世。

对所有帮助过我的人，对所有这一切，我心中满怀感激。感谢朋友们，感谢这一切。

作者

2009年4月